



周恩来选集

(上)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周恩来选集

上 卷



周恩来

目 录

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1—5
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一九二七年四月)	6—7
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一九二八年 十一月十一日)	8—13
关于湘鄂西苏区发展的几个问题(一九二九年三月 十七日)	14—18
在白色恐怖下如何健全党的组织工作(一九二九年 三月二十五日)	19—22
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一九二九年九月 十四日)	23—28
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一九二九年 九月二十八日)	29—43
目前军阀混战的形势	29
红军的根本任务与其前途	33
红军发展方向及其战略	34
红军与群众	35
红军的组织与训练	37
红军给养与经济问题	39
红军中党的工作	40
红军目前的行动问题	42

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

- (一九二九年十月) 44—47
- 关于武汉工作问题(一九三〇年九月四日) 48—54
- 立三路线的理论基础(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一日) 55—58
- 关于粉碎第四次“围剿”的电报(一九三三年一月——
三月) 59—69
- 一 一月二十七日的电报 59
- 二 一月三十日的电报 61
- 三 二月七日的电报 63
- 四 二月十三日的电报 64
- 五 二月十五日的电报 65
- 六 三月二日的电报 66
- 七 三月四日的电报 66
- 八 三月十六日的电报 67
- 九 三月二十日的电报 68
- 关于西安事变的三个电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70—75
- 一 与宋子文谈判情况(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70
- 二 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二十五日) 72
- 三 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局势和我们的方针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73
- 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一九三七年七月
十五日) 76—78
- 反对妥协求和,坚持华北抗战(一九三七年十一月
十三日) 79—80

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81—87
一 目前抗战形势及其危机	81
二 坚持华北抗战的可能及其前途	83
三 坚持华北抗战中我们的任务	86
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88—91
今日青年运动的性质	88
今日青年运动的任务	89
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	92—100
一 革命的政治工作是民族革命的生命线	92
二 抗战军队政治工作的任务与内容	95
三 政治工作的组织与方法	99
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一九三九年三月）	101—109
一 目前的形势与新四军的环境	101
二 新四军的发展与困难的克服	103
三 新四军的战略、方针和任务	105
建设坚强的战斗的西南党组织（一九四二年一月）	110—111
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一九四三年春）	112—124
我的修养要则（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八日）	125
致柯棣华大夫家属的慰问信（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126—127
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128—132
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一九四三年八月二日）	133—141

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一九四三年 八月十六日)	142—156
一 问题的提出和回答	142
二 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体系	145
三 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根源	150
四 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政纲和策略	152
五 中国法西斯主义的组织和活动	155
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四日) ...	157—187
一 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	157
二 中国革命的动力和阶级关系	163
三 大革命的经验教训	168
四 革命形势和党的策略	175
五 党的各项政策	179
六 “六大”本身及其影响	183
关于大后方文化人整风问题的意见(一九四五年 一月十八日)	188—189
论统一战线(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	190—220
一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	190
二 关于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问题	207
目前紧急要求(一九四五年八月)	221—222
积极宣传反内战反独裁, 揭穿蒋介石的欺骗 阴谋(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	223—224
致邹韬奋夫人沈粹缜的慰问信(一九四五年九月 十二日)	225
关于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谈话(一九四六年三月 十八日)	226—232

“四八”烈士永垂不朽(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九日)·····	233—235
反对扩大内战与政治暗杀的严正声明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七日)·····	236—237
对进步朋友应多加关照(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238
悼李公朴、闻一多词(一九四六年十月四日)·····	239
在上海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九日)·····	240—241
对国民党召开“国大”的严正声明(一九四六年 十一月十六日)·····	242—244
为庆贺朱总司令六十大寿的祝辞(一九四六年 十一月三十日)·····	245—246
在延安各界举行的“双十二”纪念会上的讲演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247—250
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251—261
一 一年来的谈判情况·····	251
二 一年谈判的经验教训与将来的前途·····	260
评马歇尔离华声明(一九四七年一月十日)·····	262—267
关于在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两个 文件(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五月五日)·····	268—271
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一九四七年九月 二十八日)·····	272—282
关于当前民主党派工作的意见(一九四八年一月)·····	283—286
领导作风的一个重要问题(一九四八年二月五日)·····	287
老区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一九四八年 二月二十二日)·····	288—296

关于土改和整党问题给阜平中央局的电报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297—300
党的政策必须适时地向群众公开(一九四八年 三月七日)	301—302
在部队中试验组织士兵委员会(一九四八年三月 八日)	303—304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	305—306
击破敌人假和平运动的阴谋(一九四八年七月 二十七日)	307—309
蒋管区斗争要有清醒头脑和灵活策略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310—312
致郑洞国信(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八日)	313
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七日) ...	314—325
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前进(一九四九年四月 二十二日)	326—330
学习毛泽东(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	331—343
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 报告(一九四九年七月六日)	344—358
一 三年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345
二 文艺方面的几个问题	351
恢复生产,建设中国(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359—365
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草案的特点(一九四九年九月 二十二日)	366—371
注 释	372—437

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

我们既肯定而且坚信目前的政治争斗是应为打倒半封建势力⁽¹⁾而争斗,为实现民主政治而争斗,于是就有人怀疑到目前的革命工作既无差别,何以于国民党⁽²⁾之外还有共产党的存在和活动;既有了共产党的存在和活动,便定会与国民党发生冲突和分裂。

本来关于这个问题的解释,三年来已经写得说得很多了。只是我们为目前政治争斗做得更有意义,革命分子愈加团结和互相了解起见,仍须有以下的回答:

(一)国民革命原是中国各被压迫阶级共同的出路。不过在这革命过程中,各阶级却有他们各自的出发点,尤其是在民主政治的实施期中,他们更有各自所欲获得的利益。阶级的利

* 一九二六年冬,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和工农群众运动的迅猛发展,国民党右派势力加紧进行反革命活动,掀起一股反对国共合作和工农运动的逆流。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被这股反动潮流所吓倒,不敢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迁就退让。这篇文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的,发表于中共两广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第三十七期。

益既不同，被压迫最苦的工农阶级自然需要有专门为他们阶级谋利益的共产党为之奋斗，为其先驱。共产党为工农阶级奋斗并引导其参加国民革命，决无碍于国民党领导各阶级努力国民革命，转而在实际工作上更可收相成相助之益。

(二)各被压迫阶级的共同目的虽在国民革命，但在革命的长期争斗中，民族资产阶级总是富于妥协性，小资产阶级也常摇摆不定，只有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要靠他携同农民、手工业工人督促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妥协地与敌人争斗，才能达到国民革命的真正目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的实现。所以为工农阶级奋斗的共产党的活动，当然不外领导工农群众的革命力量推进国民革命，以防止其他阶级的妥协性在革命中发生不良影响。这种活动，只有于领导国民革命的国民党有利，使他革命成份更加充实，决无与他有冲突和分裂的危险。因为要有冲突，必是革命的工农群众与和帝国主义敌人妥协的资产阶级冲突；要有分裂，必是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分子与不革命的右派分子分裂。国民党是革命的，是站在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的，自无须怕这种冲突和分裂。而且证之事实：五卅运动⁽³⁾以来，革命的工农群众，尤其是无产阶级，坚持其反帝精神、罢工策略，时时与想和英帝国主义妥协的资产阶级冲突；廖案⁽⁴⁾发生以后，国民党左派和共产派，曾联合一致地与廖案有关的以至反共、反俄、反农工运动的分子争斗，更分裂出许多不革命分子。结果不但于国民革命以至国民党无损，而革命势力转因是而愈加团结，国民革命才得有今日的发展。

二

我们的解释既完，而我们的态度亦更有较具体地表明之必要。

(一)我们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参加国民革命，其目的是在打倒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半封建势力，其要求不能超过民主政治的范围。但当着资本家压迫工人谋生活改善的正当要求，或是地主联合一切旧势力摧残农民谋解放的运动时，共产党必须站在工农群众方面，为解除他们的痛苦奋斗到底。为实现民主政治，共产党站在工农方面，其争斗、其要求亦自较他人为急迫。这并非超过国民革命，而实是推进国民革命。

(二)我们知道，国民革命的唯一目的是解放目前的中国，同时中国国民革命又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承认革命的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分子必须加入国民党共同奋斗。但这不是说中国共产党便失其独立性而不应再有何种独立主张。国民党的联共政策和共产分子加入国民党，事实上是表示了两党的密切关系和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在这个原则之下，共产党除赞助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之外，他还应为工农阶级在民主政治范围内提出政治上、经济上的要求，并督促国民党政府次第实施。

(三)我们很希望国民党能成为一个无左右之分的革命的中国国民党，但事实上不能尽如我们所想。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的革命，不同的阶级性反映到国民党内自也形成了各派。过去，右派很显然地做了许多反共、反俄、反工农以及勾结旧

势力的工作，而左派很坚决地努力于国民革命和民主政治之实现，实行联俄、联共和拥护工农利益的三大革命政策。在这种不同的倾向上，共产派是时时刻刻帮助左派同右派作理论上和事实上的争斗，从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直到现在。同时共产派还希望右派能彻底了解民主政治，日趋左倾，忠实的国民党党员都成左派。我们态度如此，既不是要分裂国民党，更不是不愿造成整个的革命的国民党。

(四)我们为了上述三种原故——为工农阶级的利益，为共产党在政治争斗中的主张，为对于国民党的希望，均不能不有公开的意见发表。马克思说，“共产党最鄙薄隐蔽自己的主义和政见”⁽⁵⁾，所以我们除宣传主义外，还时时有将政见宣布的必要。不过在现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我们的政见和批评是属于善意的，希望党政府能予以容纳，这与帝国主义、军阀以及一切半封建势力的敌意攻击和破坏宣传根本相反。若国民党同志竟以此善意的批评和帝国主义反动派的造谣离间等量齐观，或竟以批评一些不法官吏军人的谬误设施和批评国民党政府中有些不合宜的处置，便将事实置之不论，而硬说这是污蔑整个国民党，破坏国民政府，均未免近于武断，故陷人罪。譬如近几月来有几件压迫工人摧残农民运动的案件，工农群众的要求，我们的批评，都是希望党政府能惩办这些不法官吏军人，以拥护国民党农工政策。就是左派同志的《国民周刊》上从前亦曾说过：“在党政府下，是不应该有这种不助进农工运动，不能利用政治力量去运动的官吏，在本党内是绝对不容那些摧残农工运动或轻视农工运动的党员。党政府应要有铁的纪律去受理。”“我们日夕希望民众接近本党，拥护本党，

不料这种党员执政权者的一切设施，已使民众退避三舍，这是何等痛恨的事！”“……我们正为着本党民众基础着想，我们更是为一般所谓护党派日夕忧虑亡党的着想，在已逐渐觉悟的民众不是能够以革命帽子戴了去盲目的冲动，在已有组织的民众，我们更不能用什么口惠而实不至的假面具去蒙骗他，何况我们在有组织的民众，我们现在急须民众认识的本党，发生这种摧残，不特民众不为我有，那时如你们所认为该死的程度，一定不绝起来收拾民众，我们党只有损失，你们杀也杀不尽，杀也杀不来。那是事实，那是十分可虑的。”⁽⁶⁾这些严厉的批评持与我们的批评较，我们的岂得谓过？至若捷拾市上的流言，莫须有的事实，以至绝无关系的各种风潮，都硬指为共产党在挑拨，在捣乱，则三年来我们已受尽如此之骂，左派同志亦曾为此受了许多冤枉，我们又何必置辩！只要国民党革命的同志能了解我们批评的立场，继续努力，国民革命将终归胜利。

我们最后高呼：

一切革命分子团结起来！

一切被压迫阶级团结起来！

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

(一九二七年四月)

郭沫若来⁽⁷⁾，道及九江、安庆捣毁党部、工会，屠杀民众⁽⁸⁾，纯由蒋氏直接指挥。近日宁波、杭州、南京及上海之大屠杀与捕杀共产党⁽⁹⁾，死伤者近四百人；封闭党部、工会，解散市政府，强缴工人武装，勾结帝国主义与中国银行界，借款一千万，组织租界包探、流氓专司暗杀，成立工贼工会，压迫工人，引诱资产阶级，巩固政权，控制财源，更得以动摇左倾而穷苦之军队。蒋氏之叛迹如此，苟再犹豫，图谋和缓或预备长期争斗，则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广东屠杀现又开始⁽¹⁰⁾。粤沪每月一千五百万之收入将源源不绝。蒋氏现已赶走薛岳⁽¹¹⁾、严重⁽¹²⁾及所有左派军官，撤销、拘捕一切政治工作人员，左倾军队日益惶惧。即使武汉北伐，能直捣京津，而蒋之政权已固，继蒋而起者亦将大有人在，日帝国主义在北方亦未尝不可与国民政府成直接冲突。反之，政府苟下决心讨伐，迅速出师，直指南京，则安庆有三军二师与芜湖七军隔江相持，二、六军之一部闻已退至安徽，可任侧面攻击。七军不过万人。陈调元⁽¹³⁾仅四团，且在前敌不易调回。芜湖如下，

* 这是写给中共中央的意见书，署名的还有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同志等。

南京必震动。蒋能直接使用之军队仅五个师，但一师、二十一师薛、严走后，战斗力已失泰半，现改驻镇江、苏州；二师久败之师，现驻昆山；在南京者仅为三师、十四师，如何能抗东下之兵？四十军已一半渡江，余者未必尽为蒋助。十七军为蒋牺牲于扬州，大陆。二十六军、十四军都有反蒋愿望。南京一失，苏、沪可不战自定。故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上海于暴动后，已曾铸此大错。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又，东南军事工作必须有计划、有名义、有负责人、有密函，方能使左派军官相信中央政府⁽¹⁴⁾也。如何，望与左派同志切实商复为要。

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 无产阶级的意识*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同志们：党的政治路线上许多不正确思想的来源，固然是客观环境的反映，然而党的组织还没有布尔什维克化，党内还存在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中国共产党产生于五四运动以后，当时国民党只是一个官僚政客的集团，此外则别无革命的政党，因此许多急进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甚至资产阶级分子都进入我们党内来；尤其在国共合作时代，又加入了许多小资产阶级的群众。所以革命形势一经变动，许多党员动摇消极，甚至公然叛党，投降敌人，陷害同志。“八七”会议⁽¹⁵⁾以后，提出改造党的口号，坚决洗刷一切动摇的分子，改造指导机关，的确使党渐渐加强了无产阶级的意识，这是党走向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但是，到现在党的组织仍然还没有强大的无产阶级的基础，仍然存在有许多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尤其在党员成份上，农民占百分之七十五。因此，这种小资产阶级意识还有大大发展的可能。要使党布尔什维克化，

* 这是中共中央为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而发布的《告全体同志书》的第四部分，这部分是周恩来同志起草的。周恩来同志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第一要加强无产阶级的基础,同时要继续改造党的组织,尤其要坚决地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所以我们在检查了政治路线之后,必须把组织观念上的错误严密检查一下。

第一,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从前组织上有一种“家长制”的形式,党员群众对于党部,下级机关对于上级,只有机械的服从,而无活泼的党的生活。及到改造党的时候,许多地方又走向极端民主化的方向。党员对于党的决议,可以随便不执行。上级机关发一传单,没有交支部通过,支部居然提出质问。党员不得党的许可,可以自由行动。这种小资产阶级极端自由的思想,可以把党的组织打得粉碎,以至于消灭。还有一种不正确的平等观念,如用钱,不管工作的重要与环境,要机械地平均分配,用人要按地域区分,更完全是农民意识均产思想的反映,尤须严厉地肃清。

第二,反机会主义的认识上的错误。反机会主义主要的是要肃清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但有些同志竟专门攻击个人,因此而放轻了对于机会主义观念的批评。仿佛某几个人如果打倒了,机会主义便可肃清。殊不知机会主义的来源很深,决不是排除了几个人就能把机会主义肃清的。诚然,党对于那有系统的执迷不悟的机会主义分子,只有尽情驱逐,才能坚固本身壁垒;但是主要的还在批判一切机会主义观念,使全党同志有明白的认识,然后党的政治路线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至于因私人感情而借题发挥,那更是一种政客式的行为,这是与无产阶级的党绝对不相容的。

第三,个人的意气之争。反对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在政治上何等重要,但是一把对政治变成专门对人,便成了闹不清

的意气之争了。因意气而攻击他人，因意气而不接受他人的批评，甚至不站在党的立场去考查同志的意见与工作，专以意气去推测他的动机，而造成党内无穷的纠纷，这是充分的小资产阶级之意识的表现。

第四，小组织的倾向。现在党内许多小组织的倾向，都是由私人感情的结合，或部落的观念形成的。少数有领袖欲的人想造个人地位，利用这些结合，攻击地位较高或地位相等的人，因此资产阶级种种政客官僚的卑污恶浊手段一同发生了。这是破坏党的最恶劣的倾向。

第五，工学界限。因反机会主义而变成反知识分子，这是很错误的。知识分子虽然有很多动摇的，但是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来奋斗的人亦不少。在无产阶级的中，也有不少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意识而染有小资产阶级意识的。许多同志不明这个道理，于是放着反对小资产阶级意识不谈，专门反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个人，而造成了党内的工学界限，增加了党内的纠纷。这种观念根本上仍是小资产阶级意识。

第六，怀疑改造党的路线。不坚决地引进新的积极分子，尤其是工人分子。保存一种旧的组织观念，使党始终停留在一种命令委派的“家长制”形式之下。分配工作，始终只相信脑筋中几个熟悉的人，而不相信下层中产生出来的新的积极分子，尤其是工人同志。这样会使党的机体日益腐化，永远没有生机，永远不能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

第七，改造党的形式主义。引进工农分子是改造党的重要方法。但许多党部执行起来，又陷于形式主义的错误。只是机械地找些工人分子进来，而不加以积极的教育，或则机械地规

定指导机关中工人成份的比例，结果还不是由原来那些人——知识分子包办？甚至闹成秘书长专政的笑话。这种引进工农分子的方法，是毫无意义的。

第八，雇佣革命的观念。党只需要少数的革命职业家担负日常的党务，至于在群众中工作的党员，应当不离开社会的职业而为党工作，方能深入群众。然而有些同志，竟有一种雇佣劳动的观念，做工作就要钱，不拿钱就不做事的现象，支部干事也要津贴，以求利益均沾，这是严重的错误。

第九，把党看成救济会。许多同志因失业穷无所归，专门找党来解决生活问题。殊不知党并不是救济的机关，党的工作主要的是在群众中，而不是在党部，决不能人人都派作党部工作。加之同志们如果继续不断地脱离社会的职业，而不去找社会的职业，则党成了和群众没有联系的党，怎样能组织群众领导群众呢？

第十，消极怠工。许多同志观念动摇，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或者看了党内有些个人的意气之争和政客式的结合挑拨，于是心灰意懒，不愿积极工作，这完全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悲观主义。其实革命每天都在向前发展，只要我们能够深刻地去了解群众的情绪，便可以引导我们走向积极的道路。至于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群众的党，只要全党同志坚决地一致地奋斗，少数坏蛋断乎不能破坏党的组织。消极观念，只是一种堕落的倾向。

同志们！上面指出的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意识，的确还时时在破坏党的组织，妨碍党的工作。全党的同志，应坚决地起来奋斗，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

中央受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¹⁶⁾的委托,坚决地执行六大会议的决议,与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等不正确的倾向继续猛烈争斗,尤其在党内要把一切小资产阶级意识扫除干净。中央对于党内的纠纷,反对弥缝敷衍的妥协办法,而要坚决地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只有这样,才能使全党的同志团结在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之下一致奋斗。

同志们!中央有决心继续改造党的组织。对于闹私人意气的同志,无论其历史的长短和工作的好坏,一律不客气地排除,决不让我们无产阶级的政党保留着一毫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中央要求全党同志共同负起这个责任,一致奋斗,完成党的布尔什维克化。

中央指出下面几点为全党同志一致奋斗的标准:

第一,强固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要使党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加强,首先要扩大党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基础。到产业工人中去,建立强固的工厂支部,增加党的工人的成份,集中注意于全国产业区域的党的组织的健全,造成党的新生命,这是目前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主要的道路。

第二,发展党内政治的讨论,提高政治的水平线。各级党部都要尽可能地讨论一切党的政治问题,引导每个同志都尽量发表对于政治问题的意见。同时加紧党内的政治教育,提高党的理论水平。这是从积极方面消灭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正确的出路。

第三,党员的职业化。失业同志应当设法找到职业。党部应当帮助同志去谋职业,无职业技能的还要学习,特别注意到工厂中去做工,同志间也应互相介绍职业。要使党员不依赖党

生活,而且能深入群众,把党的影响扩大到群众中去,同时能把群众的意见正确地反映到党里来,使党成为真正群众的党。

第四,支部生活的改进。政治的宣传鼓动,群众的组织,只有支部才能深入;日常的斗争,只有支部才能灵敏地领导。如果仅仅高级党部订几个空架子的计划,发布几种宣传的文书,而支部不起作用,党和群众终究没有接近的时候。所谓支部生活,并不是仅仅开会听政治报告、交纳党费就算完事,最要紧的是讨论当地的政治问题、工作问题。无论是一工厂、一学校、一军营、一农村、一街道,范围虽小,都有它的不同的政治环境与工作方法。要能把党的政策正确地运用,首先要了解实际的情形。这是每个支部的任务,每个同志的任务。必须充分执行这些任务,然后支部才能成为群众的核心,党员才能成为群众的领导者。

关于湘鄂西苏区发展的 几个问题*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七日)

去年年底卢冬生同志⁽¹⁷⁾来,得到你们的报告,当即进行了研究,写信作出答复,并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¹⁶⁾决议案中规定的我党总的政治路线、目前革命的形势以及游击战争的主要任务告诉你们。信系由冬生同志带回去的,想现在已经收到了。

兹又得你们去年旧历十二月初七日信,得悉你们不畏困难,带领同志及士兵忍饥耐寒地作了英勇的武装斗争,发动了不少的群众,并夺取了敌人许多武装,肃清了一些反动的民团,这些都是对的。

根据你们这次来信,中央尚有下列的指示:

(一)暴动问题。暴动是革命斗争发展到了最高峰的一种群众武装推翻反动阶级、夺取政权的直接行动。现在,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一种直接革命的形势,故工农兵士贫民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在目前还是一个宣传的口号。在农村斗争中,自然不能说没有从日常生活斗争发展到武装斗争以至暴动推翻

* 这是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贺龙同志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

豪绅政权、建立农村苏维埃政权的可能和事实。海陆丰、琼崖、万安、黄安、醴陵等区域的苏维埃虽然失败了⁽¹⁸⁾，但土地革命在农村中的发动与深入，仍然使农民有由日常斗争走到武装暴动的需要。故农民暴动的直接行动，我们不但不应加以阻止，且应对农民自发的暴动极力加以领导，对农民的武装斗争极力加以扩大，使群众对于推翻豪绅乡村统治、建立农村苏维埃的观念日益明了与热望其实现，并使这一行动能渐渐与城市工作配合起来，得到城市的领导。这样的农民暴动才真是群众创造的，才较易持久，才能发动和影响更广大的群众来拥护，才能从群众的直接行动中建立起苏维埃政权。

假使你们所领导的群众斗争，统治乡村的豪绅地主还没有到动摇恐慌的时候，还有大批武装力量来镇压你们，群众斗争还没转变到没收地主土地的要求，还只是一些日常生活的微小要求，甚至还没做抗债、抗租、抗粮的行动，群众的发动亦不广大，则这种斗争即便是有了武装冲突，仍然是一个游击战争的局面，还不是建立农民乡村政权的武装暴动。对此，你们应分别认清。

(二)游击战争。从建始与鹤峰两次战争⁽¹⁹⁾经过看来，你们发动了群众，镇压了豪绅，收缴了反动民团和警察的枪枝，这些都是合乎游击战争的原则的，是对的。不过，游击战争最重要的是要有组织性，要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过去各处的游击战争，发生过一些不好的倾向，今后尚容易犯而应注意者：第一是脱离群众，使群众完全不了解游击战争的意义是为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第二是毁灭城市及大烧、大杀、大抢的倾向。这种倾向是一种游民无产者心理的反映，它足以妨害党

在一般群众中甚至工人群众中的影响的发展,我们在党内必须极力肃清这种不正确的观念。当然农民群众打倒地主豪绅削弱反革命势力的斗争,党应积极去领导。第三是散漫而缺乏组织。至于游击战争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农民斗争的口号,削弱反动派的力量及建立红军,这些当然是你们能够了解而且正在进行的。关于没收土地问题,六次大会已将没收一切土地的口号,改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归农民,这点你们在工作中亦须注意。

(三)游击区域内党的组织与群众的组织问题。我们游击队势力所达到的区域,自然必须发展党的组织,扩大群众的组织,推动并帮助群众的斗争,扩大我们的宣传。不过,在革命空气高涨的时候,很容易把一切组织公开,而不保留一部分秘密组织。及至游击队一走,一切组织随之瓦解,甚至一切革命的群众,都要牺牲于清乡军的白色恐怖之下。这无异于自己向敌人告密。过去,有许多地方的游击战争都犯过这种错误,所以你们必须特别注意。无论游击到什么地区,必须告知当地党部及当地的革命群众的组织,注意保存秘密,预备在红色势力被白色恐怖压迫时,还可以继续工作。

(四)游击队中党的组织问题及训练问题。你们现在在前委之下组织一个支部,管理全军党的组织,只要工作上感觉方便,也不是不可以的。在朱、毛军队中,党的组织是以连为单位,每连建立一个支部,连以下分小组,连以上有营委、团委等组织。因为每连都有组织,所以在平日及作战时,都有党的指导和帮助。据朱、毛处来说,这样组织,感觉还好。将来你们部队建党时,这个经验可以备你们参考。此外尚应注意者,是

红军中的党组织，仍须保存组织上的秘密性。至于训练问题，党的训练是加强军队纪律的，党的纪律也是帮助军队纪律无障碍地执行的。自然，红军的军事训练不能同于军阀军队的方式，施行强迫的和机械的军事纪律，应在党员以身作则的影响下，得到全体兵士的拥护。正因为这样，党的训练应多带教育性，党的组织要发展党员的自觉性，比较明了的同志应在思想上帮助尚不明的同志，使一般同志咸能注意自觉地遵守纪律。党训练、教育同志，应用很浅近的理论，很容易明白的事实，提高他们的阶级意识，增进他们的革命情绪，使他们不但自己严格地遵守军队纪律，还能成为士兵的模范。对杨维藩的问题⁽²⁰⁾，如你们所云，杨是犯了不少的错误，你们决定开除他的党籍是对的。不过以后训练同志，应特别注意教育方法。

(五) 目前政治局面及你们今后的出路问题。目前，反动的统治阶级内部各派势力的冲突，正由酝酿而加紧而准备更大的破裂——军阀战争。关于目前政治局面的详细情形及我们应付的策略，中央有两个政治通告⁽²¹⁾，兹另抄录寄上，此地不多说。在这个政局之下，虽然可与你们一个很好发展的机会，不过你们的实力还很微弱，同时湘西、鄂西一带党的组织及群众的组织还缺乏基础，此时欲图大的发展，亦尚困难。你们来信说，红军拟向下游发展，将来以湘西之常德或鄂西之宜昌为目的地，这种计划还太大而不切实。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故你们此时主要的任务，还在游击区域之扩大，群众发动之广大，决不应超越了主观的力量（主要的还

是群众的力量，不应只看见武装的力量)，而企图立刻占领中心工商业的城市。

(六)发展的区域问题。鄂西、湘西发展区域究竟以何处为最好，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对湘西、鄂西的实际情形尚不十分明了，不能具体地答复。在原则上说，游击战争的发展，应该是向农村阶级矛盾与斗争到了更激烈的地方，党与群众的组织有相当基础的地方，以及给养丰富、地势险峻的地方为最宜。不过这些条件很难俱备，你们可斟酌实际环境，取这些条件最多者而选择之。

(七)派遣军事人才问题。你们军事人才缺乏，我们亦久想多派军事工作同志到你们那边工作，不过因为交通的阻碍，你们的驻防地又无一定，所以尚未派人去。以后有可能时，自然可以多派些人前去。

在白色恐怖下 如何健全党的组织工作*

(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关于山西党的组织，中央最近依据全国组织的变动，有一新的决定，特分项说明如下：

一、自“八七”会议⁽¹⁵⁾至今一年有半，在白色恐怖压迫之下，各省组织几经破坏，干部牺牲不计其数，而自首告密叛变的事亦由南而北渐渐遍及于全国上级党部。于是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日益削弱，党的组织日益脱离群众、隔绝社会，上级党部机关尤多形成空架子，完全与群众生活相隔绝。因之自中央至支部有层层机关，而工作效能极其微弱。有时且因党的上级机关一再破坏，各地党部唯一的办法，便是要求中央派人前往恢复。中央过去确也循着这个路线，派人至各省恢复组织。结果不但工作不能推动，新的关系不能发生，甚至旧的基础也日益缩小。工作既没做起，而机关已立，于是这个架空的组织，在社会中便极易为敌人发现，屡遭破坏，在党内因有了这些不落实际的机关，反足以助长同志依赖机关、忽视下层群众工作的错误观念。因此，中央特改定，各级党部的设立，必须其所管辖

* 这是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顺直省委并汪铭同志的指示信。

区域的下层组织已经建立起来,工作已有开展,然后才能由此种下层组织成立上层组织。嗣后凡是下层组织没有工作,或是破坏之后,主要的路线应是领导同志走入工厂农村社会中,寻找职业,深入群众,以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党的组织必须在此种基础上才能谈到恢复和建立。如果超越了这一基础工作而谈恢复,而先立一上级机关,则必致基础没有,徒然发生一些个人的关系,牵引这些同志围绕在党的机关左右,无职业,无社会关系。这种人越多,越妨碍党的下层基础的恢复和建立,于是这一机关越隔离群众,越隔绝社会,形成一架空而不合实际需要的组织。

二、依照上项说明的组织路线运用到北方党部,山西省委便成为目前最不必要的组织。如强行组织起来,必成为一空架子机关。汪铭同志⁽²²⁾来信还主张调一批人到太原,结果必如上项所说,因为有了省委这一级空架子机关,于是又团聚了许多同志离开社会的关系而围绕在党的机关左右,这是最妨碍深入群众工作的。故中央决定,目前山西可不成立省委,先着手于地方工作的恢复和建立,山西工作改归顺直省委⁽²³⁾兼管。

整顿地方工作的程序,应先从中心区域做起,如太原、阳泉、绛州、榆次、河东诸地(大同由京绥路方面建立关系)。目前第一步工作,便应先在这些地方寻找有社会关系的同志,建立党的基础。工作恢复开始,党员的线索并不求多,重在质量的选择,要有一人能得一人之用。主要的还在产业工人,即无产业工人之地,亦应注意寻找手工业工人及乡村中雇农贫民。知识分子,必求能在社会中生活活动的人,如与社会一无关系而

又畏怯深入社会，不努力寻找职业，这种人从前即便是同志，现在找到也无甚利于党，这种人越多，反而越易使党停留在这些与社会隔绝的流落分子圈中，而不能建立社会基础——党的阶级基础。

假使在太原、榆次这类地方，仅只找到几个同志，最初便须以支部的形式开始他们党的生活。主要的工作自然须依照中央前次致山西的信去做。要能在群众中注意日常生活的痛苦所在，鼓动起日常斗争的要求和情绪，以发展到行动，并在这一艰难困苦的工作中训练我们的战斗员。假使我们能在每一地方，得到几个能深藏在群众中、能领导群众斗争的同志，即便是仅仅这几个同志，便是仅仅一两个工人支部，也会使这一些组织成为山西工作发展的核心。要在一个地方有了几个健全的支部后，再成立地方党部——县、市委的组织。务使这一组织，能从几个有群众基础、有社会关系的支部基础上建立起来，县、市委负责同志也要多由在业同志选出担任，这样才能避免空架子机关的毛病。在县、市委没有成立前，几个支部并存时，可指定一个较健全的支部为特支，指导其他支部的工作。中心县、市委须指导其他邻近县份。

三、根据上述的办法，目前山西实无集中一部分同志到太原的必要。便是太原的工作，也只能设法在当地找有社会职业或下决心找社会职业的同志，去开始恢复党的工作和建立党的基础。

顺直省委应根据此信所指示的办法，函知汪铭同志至天津面商；依指示的区域，速即计划如何用巡视方法去寻找各地在业的同志，开始恢复中心区域的工作。汪铭同志得此信后，

亦应速至顺直省委处面商。

*

*

*

河东有七县范围⁽²⁴⁾，工作不可忽视。在目前春荒期中，主要的斗争固在扩大借粮分粮运动，但斗争的对象宜多领导着向地主方面进攻，尤其重要的是不要使农民斗争专停顿在这一运动上，宜从抗债分粮运动发展到农民反抗地主的日常斗争。只有斗争的范围日益扩大，斗争有继续不断的小胜利，然后农民运动才会深入，土地革命的阶段才得在北方开始进行。这一点很重要的指示，望你们于指示河东工作时特别注意。

对士兵运动和土匪、民团等工作，也望依照中央的工作计划指示河东特委。

彭杨颜邢四同志⁽²⁵⁾ 被敌人捕杀经过*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四日)

帝国主义、国民党是时时合作以压迫工农群众，以屠杀革命领袖的。尤其是上海的十里洋场，自“四一二”⁽²⁶⁾以来，在帝国主义强盗与居民党军阀铁蹄之下牺牲的已经有几万人；现时关闭在西牢，在漕河泾，在公安局与警备司令部的，还有成千以上的工农群众、革命战士，过着那无期徒刑的岁月。

近来因世界大战危机日益紧迫，军阀战争还在继续，而群众斗争又在日益开展，于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乃更加紧地合作，向着革命群众与革命的先锋队伍——中国共产党施行更残酷的进攻。彭、杨诸同志便是在他们这种密切的合作、残酷的进攻之下的牺牲者，便是在他们共同的阴谋计算之下遭了暗杀！

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同志之被捕，日期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时许。那时，帝国主义的武装巡捕与公安局的中国包探，驾着几辆红皮钢甲车，如临大敌地到沪西叛徒白鑫夫妇的住家。彼等于弄堂内外布置妥贴后，登楼捕人

* 本文刊载于一九三〇年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

如象预知的一样，按名拘捕共五人（除彭、杨、颜、邢外，还有张际春⁽²⁷⁾同志），而对白鑫夫妇则置诸不问。人捕齐后，于白鑫床下搜出一些革命刊物，如《布尔塞维克》、《红旗》⁽²⁸⁾及共产党的中央通告等。被捕五同志当即即为警探拥上汽车，直驶向新闻捕房。此事发生后，各报均禁止登载，因此广大的群众直不知其领袖有此被捕的事件。

二十五日为星期日，临时法院不办公。二十六日法院开审，合作的帝国主义走狗法官与公安局代表故意做作一番，然后判交公安局引渡带去。在审问时，只被捕五同志到案，照片已于被捕当日弄好，按名询问，显然叛徒白鑫已在暗中作证指明。引渡时，公安局亦以铁甲汽车武装解入城内公安局。审问与引渡情形，曾载在当日晚报，但未将其真姓名宣布。这是统治阶级故意如此，为的是避免广大群众严厉的直接反抗。

彭、杨五同志至公安局，当晚即开审，问官一无所得。而彭、杨五同志在看守所中即开始宣传，许多保安队员为之感动。二十七日下午复开审，审问历四五小时。问至彭湃同志，有人出为证明，彭湃同志公开承认。问官询其经过历史，彭同志慷慨而谈，历时一点多钟，从未入党以前在海陆丰做农民运动起，直谈至在海陆丰建立苏维埃的经过。当谈至在海陆丰惩办反革命时，彭同志向审问官抗声说道：似你们这班反革命党，我们在海陆丰不知杀了好多，你现在不必再问了，将我枪毙好了。问官亦为之动容。问至杨殷同志，杨殷同志亦公开承认自己的经过。审问毕，回至看守所，五同志齐唱国际歌，以赋同仇，直影响了全所。

第二审过后，公安局深惧有意外，至二十八日清晨即转解

警备司令部。适当晚发生了蒋介石被刺事，一切嫌疑卫兵统押至司令部。上至熊式辉⁽²⁹⁾，下至司法科，统忙得屁滚尿流。被押卫兵，经严刑拷打，血肉横飞，骨折肢断，无一肯供出刺蒋来源。于是五同志在押的三天中（二十八——三十日）未经一审，只是手烤脚镣，铁链钉锁，被严重地看管在司令部看守所中。在这三天中，五同志没放过一刻机会，不断向在狱群众与司令部内的士兵宣传。当彭、杨诸同志与士兵谈至痛切处，士兵中竟有捶胸落泪，痛骂国民党军阀非杀尽不可的。当他们说至激昂处，便齐唱国际歌与少年先锋歌⁽³⁰⁾，士兵与狱中群众亦高呼口号和之，于是愁苦惨淡的狱中，一变而为激昂慷慨的沙场。有些因贫穷而走入抢劫的盗犯，他们都感动而觉悟道：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是我们穷人的正当出路！有些因革命嫌疑而下狱的群众乃更加坚决说：我们今后只有革命的一条路了！有些被难的同志则说道：到底是我们的中央领袖，能做我们的表率！有些久闻彭湃大名的人，闻得彭湃在此，均争相来看；还有几个识得彭湃的人，均以旧时相识为荣。

他们入警备司令部后，已知必死，故他们传出书信多是遗嘱之辞。他们嘱咐党中同志不要因他们被捕而伤痛，要继续努力谋得革命的发展。他们嘱咐党中重要负责同志要为党惜身。他们望党内对于反对派⁽³¹⁾的斗争要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他们相聚谈话时，亦曾谈及许多政治问题，可惜未曾传出他们所谈的内容。他们都是谈笑自如，杨殷同志曾笑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他们对于自己爱人的遗嘱，都是勉其为党努力。

在三十日这天，临时法院忽又故意票传五人复审。司令部

遂亦于当天午后，在形式上将五人严密地解送至法院。到法院时有步兵一排，公安局包探多人，司令部副官几个，并有捕房巡捕携手提机关枪两架跟着警戒。法院在特别法庭开审，不许人旁听，问辞与供辞如上次。法官与陪审之帝国主义领事及捕房律师都含糊其辞地说了一些，并未将彭、杨等同志罪状究竟是些什么公开宣布。被告律师虽说了一些，法官等并不注意，最后判决文亦无人能听见法官究竟读了些什么。直至彭、杨等四同志已经枪毙了，上海英文报上忽皇皇地登着法院判决文是处彭、杨等同志以八年的有期徒刑。这一复审，简直是帝国主义强盗与国民党军阀合作的一出滑稽的杀人剧。他们想以法律的手续来欺骗群众，但又深恐怕群众晓得。其实，广大的革命群众老早就不相信你们这种鸟法律了！从一九二七年的“四一二”到现在，帝国主义者与国民党不知暗杀了冤杀了几多群众。屠杀成河的血，早已染红了工农劳苦群众的心，他们只知道以群众的斗争力量来回答你们的白色恐怖，谁还管你们的鸟法律！

在临时法院审后，即刻又武装紧严地解回警备司令部。当由法庭回至囚车时，颜昌颐同志举手呼共产党万岁，五人相视而笑。至司令部，先回看守所，当即送进一桌酒饭，五同志都知道是死期已届，谁还肯吃这一桌劳什子“赏饭”！约一小时，便提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同志行刑。他们四人慷慨地向士兵及在狱群众说了最后的赠言，唱着国际歌，呼着口号出了狱门，引得一般士兵及狱犯都痛哭失声，甚至看守所员都为之掩面。行刑是秘密的，枪毙地点并未出司令部，开熊式辉任内之先例，其严重与畏惧之情可想而知。四同志死时的枪声，狱

中群众隐约闻见。有一狱犯特杀鸡一只望空致祭，可见其感动之诚！四同志死时特留下内衣三件作为纪念，成为最后的遗物！死后，司令部又秘密地派人掩埋，以图灭迹。但是，广大的革命群众虽看不见他们领袖的英勇遗体，然他们领袖之英勇的战绩，却永远光明地纪念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永远不会湮灭！

当着彭、杨五同志初被捕时，南京国民党中央便得到上海国民党市党部的夸功报告。他们的回电是命令熊式辉着即枪毙，加以刺蒋案件忙得这班走狗们寝食不安，所以枪毙的执行乃更加迅速。

阶级斗争剧烈的今日中国，革命的群众、革命的领袖死在敌人的明枪暗箭中的不知几多！这原是革命成功前所难免的事变，而且是革命成功之血的基础。没有前仆后继的革命战士，筑不起伟大的革命的胜利之途！每一个革命战士牺牲，不管是在前线，是在后方，都有他伟大的代价。尤其是革命领袖的牺牲，更有他不可磨灭的战绩，照耀在千万群众的心中，熔成伟大革命的推动之力，燃烧着每一个被压迫群众的革命热情，一齐奔向革命的火原！所以我们在死难的烈士前面，不需要流泪的悲哀，而需要更痛切更坚决地继续着死难烈士的遗志，踏着死难烈士的血迹，一直向前努力，一直向前斗争！

的确，彭、杨、颜、邢四烈士的牺牲是中国革命、中国党之很大的损失！革命的领袖是积了无数次的斗争与战绩，从广大的群众中涌现而锻炼出来的。敌人可以在几分钟内毁灭了我们革命的领袖，我们却不能在几分钟内锻炼出我们新的领袖。故敌人消灭我们肉体的办法，是压迫革命之最残酷最恶毒的

办法。我们只有努力于群众的斗争,加紧群众的斗争,使群众的斗争力量足以消灭白色恐怖,消灭敌人的屠杀,则革命的胜利便将临近,敌人的统治便届末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偿赎今日的损失!只有这样,我们才尽了彭、杨四烈士的遗志!才报了我们的被压迫阶级的大恨深仇!

国民党、帝国主义一班强盗用鬼蜮的伎俩、卑鄙的手段来谋害革命,来暗杀革命领袖,我们革命群众对他们的回答,却永远是赤裸裸的公开的阶级斗争!仅只这一点差别,便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利器。因为只有公开斗争才能争取广大群众,只有群众力量才能消灭敌人!惯于阴谋暗杀的国民党、帝国主义一班强盗,便要在这公开的阶级斗争中一齐消灭,一齐死绝!

工农兵士劳苦群众们!革命先锋战士们!烈士的革命精神不死!我们的奋斗不绝!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前进!努力地前进!直进到革命的最后胜利!

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 前委的指示信*

(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四军前委并转全体同志：

陈毅同志来⁽³²⁾，详谈一切。中央于其口头及书面报告后，决定给前委以下列之指示：

目前军阀混战的形势

中国政局自蒋桂、蒋冯战争⁽³³⁾后，表面上蒋系的南京政府得了胜利，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加大了些，但实际上一切引起战争的矛盾并未解决，且日益加深地向前发展，因此反蒋的军阀混战又由酝酿至于爆发。美帝国主义与中国定了航空合同⁽³⁴⁾，英帝国主义定了中英海军协定⁽³⁵⁾，日本帝国主义满蒙计划⁽³⁶⁾的急进，各帝国主义都努力在华的军事布置，这都表示帝国主义间互相冲突的尖锐化。中东路问题⁽³⁷⁾是帝国主义联合进攻苏联的露骨表现，亦是各帝国主义在开始战争前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帝国主义冲突的激烈成了军阀混战的主

* 这封信是陈毅同志按照周恩来同志多次谈话和中共中央会议的精神代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同志审定的，收入本书时个别段落没有选入。

要动因。再则蒋桂、蒋冯战争后，并没能在这些战争中获得什么实际利益，固然一方面削弱了封建势力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的封建势力却又抬起头来，这乃资产阶级本身力量微弱必须拉拢封建势力以自固的必然命运。资产阶级利用封建势力去打击封建势力的这种企图，不但不能解决两个阶级的矛盾，而且成为军阀混战的又一动因。又中国军阀因数个帝国主义的唆使，中国经济破产的加速，庞大军队需要财源维持，因此为各自争夺地盘与饷源又推动着军阀混战的危机。上面这三种矛盾，是军阀混战的动因，亦是军阀混战所不能解决的。每一次混战只有使这三种矛盾加深。目前反蒋的军阀战争⁽³⁸⁾就是上次蒋桂冯混战的继续，这次混战爆发后，也当然要继续发展下去，除工农兵暴动的力量而外，绝没有第二种方法可以解决引起军阀混战的各种矛盾。这是我们应该坚决认定的。

目前蒋系政府把持南京反革命政权，对外得了帝国主义承认，想独揽出卖民族利益的特权，对内把持长江下游财权及重要军械制造所，自然要成为众矢之的，造成全国其他军阀各派的反蒋联合。蒋系除浙江比较统一外，其余各省都有着反蒋的势力。蒋的嫡系军队号称九师，此九师有些还系改编别人的部队，同时有改组派⁽³⁹⁾从中活动，所以亦包含有反蒋的分子。这些，是蒋本身的弱点。在反蒋方面以汪陈派的改良主义⁽⁴⁰⁾的理论为旗帜，但没有一个中心势力。南方各省散布着不少的反蒋力量，在表面上可以为改组派利用，但实际上还各怀鬼胎，如张发奎、俞作柏都想攻下广东，而彼此则不相下。冯、唐、朱诸系军阀⁽⁴¹⁾则想攻下南京、武汉，而本身的利害又各冲突。

北方阎、张两派⁽⁴²⁾则自知无力统治南京，故始终有在北京建立中央政权的企图，对于拥护改组派便不十分积极。同时各派部下都有被蒋收买之事，阎部下另成系统与蒋不无关系。奉张内部有新旧之争⁽⁴³⁾，新派自杨、常⁽⁴⁴⁾死后势力大衰，张学良对于旧派已不能如意支配，旧派则忠顺于日本帝国主义，因此入关的企图十分积极。中东路问题发生后，显然与蒋有冲突。这都是军阀间不能协调互相排挤的实况。张发奎事件⁽³⁸⁾发生，显然是改组派反蒋运动开始爆发的第一声，武汉战争、两广战争都有扩大为全国混战的可能。如蒋得一时胜利，混战局面并不能因之消灭，且必然要继续发生；如改组派胜利，则小军阀割据局面更要加多。军阀战争的目的只是争夺反革命政权以便于出卖民族独立利益，夺取地盘以加紧剥削工农，反蒋与护蒋两方皆是如此的。党在军阀混战中，应该采取失败主义的策略，发动广大群众，反对军阀混战。这一工作须与群众日常斗争相联系。这是走向以工农兵暴动的力量消灭军阀战争的正确道路。

在军阀混战中，我们不可过分去估量，专空想一些大的斗争到来而忽略许多切实的群众日常斗争工作，尤其在红军中更要注意到敌人的“会剿”。应付敌人“会剿”是红军经常应注意的问题，不可因为军阀混战爆发，便松懈起来疏忽起来，尤不可因军阀混战暂时休止，便恐慌起来。我们应认清军阀“会剿”红军，有其必然要遇到的困难，常常使“会剿”不能完局反而便利于我们的发展，但并不因此便使我们不注意“会剿”，不下决心去与敌人作艰苦斗争了。前委过去尝根据红军近邻军阀的行动来判断整个统治局面的稳定与动摇，这样的分析是

不对的。前委要十分注意纠正军事同志以红军为革命本位的狭隘观念。根据红军部分的环境去观察整个革命形势，这是万分不够的，而且一定要陷于错误。军阀对红军曾三次“会剿”，每次都含着两方面的意义：一面固然是在共同进攻革命势力，一面却又是军阀为了准备自己战争，必须先求解决红军以固后防，过去湘、赣、粤三省“会剿”以及最近闽、赣、粤三省“会剿”皆是如此。最近蒋派刘和鼎入闽⁽⁴⁵⁾，固然为的进攻朱、毛，但还有一个解决张贞⁽⁴⁶⁾的任务，因此闽军每一部分都互相戒备，对于进攻红军反互相推诿起来。粤军在二陈冲突⁽⁴⁷⁾、两广冲突的形势下面，虽然有入闽部队，现亦急急撤退。金汉鼎⁽⁴⁸⁾部自朱培德失掉江西地盘⁽⁴⁹⁾、王均⁽⁵⁰⁾调蚌埠后，独处赣南，此次又参加改组派运动，对红军几月来皆采取防御性质。这就是三省“会剿”的实际。红军应该采取坚决斗争的前进精神，认识整个的敌人的形势，团结广大群众来打破敌人的“会剿”，不要存丝毫退却苟全的犹豫念头。红军存在于反动政局走向崩溃及土地革命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地势辽阔也是一个条件，从你们过去的艰苦经验中就可以证明。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如果红军中藏有这种取消观念，于红军有特殊的危险，前委应该坚决地予以斗争，以教育的方法肃清。在目前反动政局走向崩溃过程中，在全国革命高潮未来时，红军此时主要地采取粤、湘、赣、闽四省边界游击的策略是对的，但要注意使这四个区域的赤色势力联系起来。红军尤要加紧帮助发动群众斗争以取得广大群众拥护。有了广大群众在红

军的周围，红军的一切困难及本身发展便将较顺利地得以解决。

红军的根本任务与其前途

目前红军的基本任务主要的有以下几项：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红军不能实现上面三个任务，则与普通军队无异。红军第四军两年来对于上述任务克尽了一部分，在全国政治局势中有极大影响，这证明了统治阶级在乡村力量的薄弱，证明了革命势力的存在与发展。红军四军有此种伟大意义是我们不能否认的，继续努力下去，将必然要成为全国革命高潮的动力之一，这是无疑义的。红军四军的同志务要明了自己的任务的重大。

至于红军是否应该固守一个地区的割据，这个问题你们在行动中常常碰见。要知在统治阶级政权未崩溃以及革命高潮未到来的时期，红军应该是采取经常游击的政策，若停留在一个地区，或企图固守一个地带，求其继续存在，这不但不可能而且必然陷于失败。过去罗霄山脉政权的经验告诉了我们。在一省或几省以上的政权就不然，因为它有一个比较足以维持的经济基础，自然有可能作为一个发展或保持的根据。总之，农村的政权或游击队应该是一个斗争的单位，实行游击四向发展的策略，保守必然要失败。反之，预定一年内夺取江西全省政权的决定，也是错误的。

红军发展方向及其战略

红军发展的方向，应该向着群众有发展斗争可能的地方，去扶助其发展，使当地的革命斗争深入。若经常停滞在边境，在缺乏斗争的某些边境，将减少红军的政治意义。对于敌人军事力量空虚地带或乡村中白色势力范围，应实行游击，以驱逐反动势力，发动群众斗争。对于较小于我的敌人，应该坚决地去歼灭他，非如此不能扩大本身及群众武装，绝不可有保存实力观望时局的等待倾向。固然亦决不应以较小兵力硬与较强之敌人作殊死战，致非牺牲偌大兵力，不能有胜利把握，而敌人又可从容退去，丝毫不能扩大红军武装，这种打硬仗的办法是无益于游击战争的，但这决不能动摇围缴敌人武装以扩大自己的必要信念。红军不从斗争中锻炼自己绝不能发展。我们有了避免战斗的观念，必然要错过许多可以使自己发展的良机。这是关于红军发展的主要几点，是最值得注意的。

关于红军战争中之分兵与集中问题，过去四军各级党部讨论中间曾有分散红军，分兵后不必要有联络，集中怕目标太大等不正确观念。分兵与集中只是某一个时期中工作方式的利便问题，绝不能把红军四军分成几路各不相属的部队，这样就是分散而不是分兵，或者把红军四军分小，化成无数的游击队而不相联属。两者皆是取消观念，皆原于对政局的估量不正确，恐惧反动势力稳定，红军会被消灭，才发生减小目标各个自了自己的右倾思想。这种倾向于红军发展及对全国政治影响有极大危险。红军四军此时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去实行游击

以求本身的扩大,如何集中力量去实现党的政治口号以发动群众斗争。分兵游击集中指导是不可移易的原则。分兵时应密切联络互相策应,应防敌人各个击破。红军四军两年来集中奋斗,渡过各种难关,此种艰苦的经验不应为全体同志忽视。至于全军如集中行动,当然有一些困难,如行军、宿营、给养等之不轻便,但这大部分是一些属于技术上的困难,绝不能因此而取消集中指挥的必要条件与忽视了对于全国政治影响的伟大作用。

关于一般战术问题,如前委来信所提出之波浪式推进,兜圈子以及十六字诀等办法,应就实际情况去运用,不能定为一个原则。前委在两年奋斗中已有不少经验可以运用,中央在此不作机械的指示。

红军与群众

前委在过去忽略了所到地区之群众的日常斗争。红军本身是一种阶级的集聚力量,所到地区豪绅等多已闻风逃窜,群众在军事力量掩护下勇气倍增,一切行动自然是政治的或军事的,但党的指导绝不要忽略群众日常生活中许多未解决的问题。全国有苏维埃区域的党均忽视了这个问题。红军四军经过许多群众未曾发动的地方,不要只是提出一般的政治口号,应该细心去了解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从群众日常生活斗争引导到政治斗争以至武装斗争。这种斗争才是群众本身所需要的,才不是单纯军事力量的发动,才不是少数个人英勇的硬干,才会团结广大群众在党的周围。对于地方党部工作之帮

助,特别要指示这一点。

红军到一地区不要只是找地方党部,应该与地方的群众组织工会、农会开联席会,发生密切关系。在政治上,在宣传上,在斗争上,都要与工农会协议共同去做,红军不要单独去干或者只是发命令,然后才可以扩大红军在工农中的政治影响,提高群众对于自己组织的信仰与效能。如群众尚未组成工农会,则更应帮助群众建立自己的群众组织。

红军对于苏维埃政权应帮助群众去建立并扶助其工作之发展,从一切斗争中帮助群众建立自己政权的基础。要提高对农会的信仰,一切问题都拿到农会去解决,做成转变为苏维埃的基础。例如一切政治布告等要与农会共同联名发出,增加群众组织的威信,使群众相信自己政权的力量。

红军的群众工作,四军过去有相当努力,兹特别指出重要几点:第一,关于调查工作应切实去做。过去有许多调查成绩,因没人统计以致放弃,甚属可惜。前委应指定专人去做,这个工作做得好,对于了解中国农村实际生活及帮助土地革命策略之决定有重大意义。第二,关于宣传工作务求其扩大,不要只限于红军游击区域以内,可用寄信方法及于大都会的群众,则影响更大。第三,关于组织工作,如反帝组织、拥护苏联组织、雇农工会及其他的平常有助于革命的临时组织都很重要,要用各种方法去建立。第四,关于肃清反革命工作要经过群众组织来执行,才有群众的意义,而且这一工作要特别加深。第五,关于筹款工作,亦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此时固然做不到由群众组织来担负红军给养,但在筹款时要用群众组织去执行才有意义。党与红军有时可斟酌情形在群

众中募捐,尤其红军的给养,更应在群众中举行盛大的募集以扩大红军影响。关于经费支配亦要顾及群众组织,与其共同支配,一切经费的开支应多用在群众工作之支付上,绝不要大半作为党费开支,养成党之腐化。第六,对于武装工农问题,四军同志中尚保存有许多不正确的观念,以致工作没有做好。好枪不发给地方,坏枪尽数送给农民,把群众与红军分做两个东西,有根本不相信群众力量的危险。须知红军与工农的武装力量是相成的而不是相消的。固然有些地区群众斗争尚未起来,先发给以武装不能有多大作用,或者红军枪不够分配时,是可以暂不发给的,但需要发给时,一定要纠正过去的不好倾向。同时,派人去担任农军的训练,亦甚重要。

红军的组织与训练

(1) 红军扩大问题。红军扩大与红军生存问题有莫大关系。扩大红军,在红军中在群众中应该是一个普遍而深入的口号。扩大的路线,应该从广大群众斗争中去取得帮助。红军所到区域,应举行扩大红军的宣传大会,鼓动工农群众自动参加红军,同时,如能有机会收缴敌人枪械时,不要轻易错过。

(2) 红军的成份与来源。红军的来源只有收纳广大的破产农民,此种农民固然有极浓厚的非无产阶级意识表现,但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决不是幻想目前红军可以吸收广大工人成份来改变红军倾向的。

(3) 组织系统与编制。红军由前委指挥,对外用军部、政治

部号召,目前是可以的,但到了各苏维埃区域扩大时,则必须召集各地苏维埃代表会成立几省边境苏维埃政权,公开指挥红军,免除党军的毛病,更可以使群众认识红军是自己的阶级军队。这一个办法目前不必马上执行,以免徒为一个空心机关,至少应在闽西、赣南、东江三地区工作扩大能开联席会时,再设法执行。关于红军编制,最要紧的是使之能适合于游击动作,指挥单位不要过多,军事组织及名称不必拘于一个固定形式。

(4) 党代表制度。党代表名称应立即废除,改为政治委员,其职务为监督军队行政事务,巩固军队政治领导,副署命令等。军政治委员可由前委书记兼,军政治委员可不兼任政治部主任。

(5) 兵委的组织。四军中兵委过去有成绩,其组织路线也很正确。其职权规定为监督军队经济,参加军队管理,厉行士兵政治教育,做群众工作,与军事机关的关系用报告建议而不能直接管涉。发生特别事件,政治委员有解散兵委之权;兵委开会政治委员列席为顾问等。这些规定虽然较之俄国红军兵委权力扩大得很多,但在目前红军游击时期是可以适用的;不过要注意军队中民主化要有限度,否则于斗争是有害的。

(6) 政治工作。军与纵队设政治部,营连只设政治委员,这是可以的,其任务为对内管理政治教育,对外作政治宣传以至管理地方政务,发动群众斗争,扶助群众组织等。

(7) 军事训练。红军的军事技术要特别注意,决不应附和 不爱严格训练与组织的农民意识,红军有好的军事技术,有严

格的军事训练,才能加强自己的战斗力。

(8)军队中民主化问题。红军不是与工会农会同等的组织,他是经常与敌人在血搏状态中的战斗组织,他的指挥应该集中。固然,对红军的兵士应该以政治教育发动他们自觉向上,但绝不能动摇指挥集中这个原则。军队中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导下存在,并且实行的限度必须依据客观条件来决定伸缩,不应漫无限制,以妨害军纪之巩固。

(9)妇女参加红军的问题。对于革命妇女可引导她们参加农村斗争,不必加入红军,四军过去对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但对于农村的妇女运动,红军应扶助之。

(10)红军的纪律与处罚。应做到使士兵自动守纪律,以群众的力量与影响来裁制违犯纪律的人,坚决地废除肉刑。至于军事上所规定之一般纪律,可以斟酌实施。

红军给养与经济问题

(1)没收地主豪绅财产是红军给养的主要来源,但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在最短促时间中也要注意这一工作方式的运用。

(2)筹款标准,主要的是不要侵犯工农及小有产者的一般利益,这一点,四军执行得很好,可应用到其他游击队伍中去。

(3)募捐亦是红军筹款的一个办法,四军要应用这个办法,可以在群众中组织募捐委员会,特别要向富农及中小商人募捐。

(4)对中小商人及富农态度。我们为实现党的政纲所规定及为工农经济流通与贫民利益,在城市不举行经济没收,这是对的。城市的政治没收应该执行。对富农及中小商人要向其募捐,并要防止其反动。

(5)红军给养及需用品问题。红军中废除军饷,只发零用钱与吃饭钱,这是对的。对于需用品可渐次做到由群众路线去找出路,红军自己办固然好,但同时要能由群众供给与募集才能建立红军与群众的更密切关系。

(6)经济组织。对红军的给养费用可由兵委审查,其他特别开支不必要由兵委审查,将来应由群众政权组织决定和审查。

红军中党的工作

(1)党的组织系统可保存现在状态,前委委员不要过九人,前委下面不需要成立军委。党在军队中采取秘密形式,党的机关设在政治部内,党的机关的人员不要过多,要尽量利用群众组织中的人做事。一般的可以不必设立营委,营部可成立直属小组,一营单独行动时,可委托营的支部来指挥,但此点前委可斟酌采用。

(2)党的工作路线。党对军队的指挥尽可能实现党团路线,不要直接指挥军队,经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经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以后成立上层政权,则组织党团,经过党团指挥之。党的系统,军事系统,政治系统,要弄清楚。

(3)集权制问题。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

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前委对于一切问题毫无疑义应先有决定后交下级讨论，绝不能先征求下级同意或者不作决定俟下级发表意见后再定办法，这样不但削弱上级指导机关的权力，而且也不是下级党部的正确生活，这就是极端民主化发展到极度的现象。前委在前次党的争论问题，即表示这个弱点，这是一个损失。

(4) 团的小组。团应该成立小组，现在指定成年人做青年工作即以之为团的小组，这个办法是不好的。红军中团员与党员应有划分，连支部中设CY⁽⁵¹⁾小组属于连委管理。纵委前委中设青年工作科，表面归政治部，计划并指导CY小组如何在群众中做青年工作。前委更须帮助所到地区的CY工作。

(5) 组织上的争论问题。党管一切这口号，在原则上事实上都是不通，党只能经过党团作用作政治的领导。目前前委指挥军部、政治部，这是一个临时的办法。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由政治委员监督，前委应着眼在红军的政治军事经济及群众斗争的领导上。一切工作归支部这个口号是对的，是作经过支部去工作的解释，但不是与党的民主集权制相对立。

(6) 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红军中右倾思想如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与缩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红军脱离生产即不能存在等观念，都非常错误，皆原于同志理论水平低，党的教育缺乏。这些观念不肃清，于红军前途有极大危险，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

(7)成立边界特委问题。在几省边界工作可以联系,能够指挥时,可以成立特委,目前则尚不需要。如今后工作发展,前委即可负责特委的责任,届时再报告中央指定名单,或开边界各县代表会议选定。

(8)前委在红军经过区域应与地方党部有密切联络,一切地方政治问题应与地方党部开联席会议决定。如所经地区无党的组织时,前委应尽可能从发动群众斗争中帮助建立地方党部组织。

红军目前的行动问题

在军阀战争开始爆发之际,红军应以全部力量到韩江上游闽、粤边界游击,以发动群众斗争。至两广军阀混战爆发东江空虚时,红军可进至梅县、丰顺、五华、兴宁一带游击,发动广大群众斗争,并帮助东江各赤色区域的扩大,相机围缴敌军枪械,集中东江各县赤卫队建立红军。如两广军阀混战成相持局面而且蔓延及于全国,红军即可向潮汕方面游击,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向惠属方面逼近。如蒋系军队失败,红军应位置于粤、赣大道左右或其败退所经之路围缴其枪械。如军阀战争结束较快或蒋系军队得胜时,红军仍留粤、闽、赣边界一带游击,以发动群众。

凡红军一切行动务要避免单纯的军事行动,要与群众斗争取得密切联系。前委对赣南、闽西的游击工作亦要同时注意,要与该地方党部有密切联系,然后才能使其与红军四军及东江斗争相策应。

凡此各项,概指其大要,详细解释及具体办法已向陈毅同志面谈,当由其口达前委及全军同志。

专此。

革命的敬礼!

中 央

托洛茨基反对派⁽⁵²⁾ 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

(一九二九年十月)

中央第四十四号通告⁽⁵³⁾上说：固然我们不必夸大反对派⁽³¹⁾在中国党内之政治上组织上的作用，但是他们的活动情形与反党现象的发展，实不容许党丝毫忽视。

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大革命之失败与新的革命浪潮之复兴，存留在党内落后的小资产阶级“同路者”形成了反对派发展的基础。有人说，反对派在中国的发生是因为有了“莫斯科回来的学生”。这是错误的，他们只是起了反对派的介绍作用。现在，我们指出反对派发生的几种主要的客观的原因。

第一，南京政府在初成立时，很注意如何引俄国反对派到中国来，以分裂中国共产党。托洛茨基反对派这个“宝贝”不但为欧洲的资产阶级所利用，即中国的统治阶级也一样地看上了。在联共的反对派坚决地固执他们的路线时，欧洲资产阶级即非常之注意，想利用他们分裂联共的组织，破坏联共的正确路线。在中国，胡汉民⁽⁵⁴⁾、戴季陶⁽⁵⁵⁾、周佛海⁽⁵⁶⁾，都企图借着

* 这是在中共中央直属支部干事会上所做的报告。

宣传反对派以分裂中国党。中国的统治阶级恨不得抓住中国党内的这一工具,以达到消灭中国革命领导者的目的。中国的政治环境的确容许反对派在中国活动。这是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第一个客观原因。

第二,在革命失败之后,必然有许多失败的情绪,引起许多争论的问题。俄国在一九〇五年以后,德国在革命失败后,都有过这样的情形。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亦是如此。中国党自“八七”会议⁽¹⁵⁾以后,对于机会主义的纠正,在组织上有相当成功、但在理论上思想上的斗争,并未完成,直到六次大会⁽¹⁶⁾,才有相当成功;然党内种种不良的倾向,以及大革命失败以来的不同的政治倾向,尤其是机会主义的倾向,还都是待机而动。这是中国发生反对派的第二个原因,也就是所以形成中国党内机会主义——反对派结合之思想上组织上的根本原因。

第三,中国党的党内生活,到现在还不能说是完全健全。虽然在组织上肃清机会主义,引进工人分子入党,但尚未把支部生活坚固地建立起来。因此,党的生活上,常发生动摇的现象。党的正确路线还未得到有些支部全体热烈的讨论,因之,党的政治路线在组织上遂尚未得到完全巩固。有些支部对某一问题,常不能在正确路线下予以回答,常因某一问题不能回答而表现动摇。在上海,有些中心的产业支部并不巩固,有些产业支部非常缺乏政治生活,因此,斗争胜利了,支部就活跃;斗争失败了,支部就消沉,甚至有瓦解的。这表明政治路线还没有得到组织上的完全巩固,不但反对派可以借此活动,即机会主义者亦容易去活动。这是第三个客观原因。

第四，大革命失败以后，许多国共合作时代的动摇分子，有脱离工作的，有坚持地方观念的，有固执自己错误的，这些在组织上并未克服。他们专以个人的小问题闹无原则的纠纷，而反对派就抓住了这些不满意党的路线的分子，利用这种无原则的斗争，以进行其反党的活动。这是第四个客观原因。

尽管过去没有发生过反对派的活动，然而有了这四个原因，就必不可免地使中国有反对派暂时活动的可能。自然直接的原因，还是回国的学生与机会主义的复活。

至于托洛茨基反对派活动的策略路线，我们可以看出有下列四点：

第一，必然不可免地要与统治阶级勾结。《新生命》⁽⁵⁷⁾已经登过关于反对派的文章。将来反对派更要利用统治阶级的宣传机关，以进行其帮助统治阶级反党的活动。如果在党内斗争中失败了，他们必然会整个卖给统治阶级。这是必不可免的前途。

第二，在一切当前实际问题上表现他们的反党路线的宣传与活动。他们在“五卅”⁽³⁾纪念时，宣言号召同志向党斗争，要比反帝国主义斗争更重要，客观上毫无疑问地是帮助敌人。“八一”示威⁽⁵⁸⁾，他们又认为是盲动主义，反映出许多失败的情绪。在论调上表现出极右的悲观的取消主义。

第三，利用某些不健全的支部生活，以实行其停留在支部内活动的策略。他们借着停留在支部内，以动摇下层群众，并专门找斗争失败的支部，专利用失败的事实，以攻击党的路线。当斗争困难时，反对派在宣传上可以说出极左的口号，如“没收工厂”，以使工人阶级孤立，并引导工人群众幻想未来的

天国而忽略了目前斗争的实际意义；反之，在实际问题上却又提出极右的策略，使工人支部走到无出路的消沉状态。

第四，与中国的机会主义者结合。这些机会主义者因为固执自己的路线，现在既不能深入群众，又不能不找一新的政纲，以掩饰自己的错误。这样，反对派的政纲，正好在掩饰自己过去的错误上，在口头上“左”的革命口号而实际上右的革命形势的估计与策略上，恰恰脾胃相合，于是就被他们利用了。而反对派的策略，也正是利用这些分子帮助他们进行反党的活动。机会主义者与反对派在“惺惺惜惺惺”⁽⁵⁹⁾的情形之下，便结合起来了。

此外，托洛茨基反对派抛开原则，专门利用些小的问题小的纠纷，进行非事实的毁谤与有意的造谣诬蔑，企图用这些卑劣无耻的手段以破坏同志对党的指导机关的信仰。这除了帮助敌人破坏革命的指导者以外，简直没有任何意义。

在上海、香港、北方，都发现有反对派的活动。他们在组织上对党是秘密的。惟其如此，就更应该将这一问题提到下层去，指导同志们讨论与坚决地肃清一切机会主义——反对派的活动。反对派有些并不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有些我们已知道他们有反对派的倾向，有些尚不知道。因此，这一问题必须提到支部中，运用这一机会教育同志，树立党的正确路线的基础。务使每个同志认识以正确的路线同不正确的路线斗争之必要，使党的正确路线得到组织上的巩固。所以，除了组织上的制裁之外，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是绝对必要的，这是目前巩固党的很重要的武器！

关于武汉工作问题^{*}

(一九三〇年九月四日)

第一，我们要决定武汉的工作计划，不仅要客观形势上去了解目前工作发展的可能及其趋势（这一点我们已无可怀疑与争辩），更其重要的还是目前我们究在何种主观的可能上去发动工作。依据你们许多来信，都证明在今天的武汉，我们的主观力量的确还是很弱。严重的是，党员团员及赤色工会⁽⁶⁰⁾会员总共不出三百人，支部生活多数没有，主要部分的产业工人组织微弱到万分，各级党部的关系非常隔阂。尤其严重的是，下层群众的实际情形还不能反映到指导机关中来。在这样模糊的主观情形之下，要想定出一个切实而具体的计划，是万万不可能的。因此，钧兄⁽⁶¹⁾几次来信都说，不能知道下层群众情形是最苦痛的事。中央因此更加严重指出：如不能知道

* 一九三〇年六月，党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同志领导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要求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从而形成了第二次“左”倾路线。“八一”、“八三”会议上，李立三同志又要求在南京、武汉举行暴动，在上海举行总同盟罢工，并将党、青年团、工会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周恩来同志于一九三〇年五月出国，八月下旬回国，九月中、下旬出席并参与主持了六届三中全会，会议停止了立三路线的执行。这篇文章是在三中全会前起草的中共中央给长江局的指示信的第一部分。

下层群众实际情形，不仅工作计划定不好，便连你们所说的政治影响的扩大，群众革命情绪的高涨，也还与实际行动离着很远，因为这中间还找不出党的领导作用与组织力量，而没有这些，是不能达到革命的胜利的。所以你们的第一个任务，便是要将武汉工人群众的实际生活与要求弄清（不仅是先进的分子的要求，最重要的是广泛的、落后的群众的一般要求都要计及）。不仅要注意一些先进勇敢分子或是少数干部所说的“现在不是谈工钱的事，而是大干问题”，“现在只有拿武装来干，才有用处”等等，而更加要注意的，还是大多数群众现在还没有人领导他们去作任何的斗争，大多数群众现在还没有造成可以干的组织力量。即使这种只要大干不要小干的情绪是大多数群众的，我们也还不能说，大多数群众有了这种情绪，革命便可达到胜利。相反，我们必须从这样的观点去了解，即群众不愿小干只愿大干的情绪，是对于极端白色恐怖的反感，是对于广大农民战争发展的同情；从这种反感引导到坚决的斗争上，还须我们做极艰苦的工作，从这种同情引导到工人群众领导和参加农民战争的决心上，还须做很多的宣传工作与组织工作。工人阶级只愿大干，而没有可以大干的斗争力量和组织基础，尤其是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大干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要造成大干的斗争力量和组织基础，不是仅仅以党的政治口号去动员便可以造成的，尤其不是仅仅以大干的口号即是以武装暴动的口号便可以造成的。少数分子的要武装，多数群众“普遍地希望红军来到武汉，一切事情都好了”的观念，这不但不是群众决心要大干的表示，且反而是依赖红军的怯弱表示了。所以斗争力量和组织基础必须从日常斗争、罢工与示威

之不断开展中培植起来，以联系到党的政治口号。绝对不是没有这些日常斗争、罢工与示威之不断开展与锻炼，斗争力量与组织基础便会突然存在的；也绝对不是没有这些日常斗争、罢工与示威之不断领导与发动，党的领导便会自然巩固的。这是你们决定一切策略与工作计划的根本观点，望你们对这一点多加注意。

第二，因为你们在主客观上有了上述的缺点与困难（缺点是你们注意力偏向一方，困难是对下层情形还很隔膜），所以你们所定的“目前党在工人中主要的策略”还是偏于原则，还是偏于在“准备武装暴动”本身上做文章，而没有注意于策略运用的实际意义，没有注意于在武汉特殊情形下做一些具体办法的规定。所以你们决定的几条办法，与中央通告无异，可以适用在任何地方。现在，我们指出这几条办法中的缺点与错误。

第一条，你们说：“党只有在政治上去动员，才能迅速夺取广大工人群众去实际组织武装暴动。”这样的解释，显然将日常斗争与准备武装暴动对立起来。这样的解释，显然忘记了发动群众的的政治经济要求以联系到党的政治口号，正是积极准备武装暴动中争取广大群众的最基本的方法。

第二条，你们主张由省总制定武汉工人及各业工人的要求的纲领来组织同盟罢工，这是绝对不够的。假使没有各厂各业的工人日常斗争的发动与领导，假使没有不断的各部分工人的罢工与示威，而只注意于总的纲领的号召与鼓动，总同盟罢工是不会突然而至的。尤其重要的是失业工人中的工作。特别在现在武汉形势下，失业工人的数量一天一天增加，在准备

武装暴动中，他们更将成为主要的动力之一，故你们必须加重此种工作。

第三条，你们将“参加黄色工会去争取群众”与消灭国民党工会的策略对立起来，这更是不妥的。如果国民党工会有群众，我们还是要参加进去，去争取群众大多数，直做到推翻这个工会为止。如果它是没有群众的，则我们便根本不必去参加了。不能因为现在黄色工会一天天国民党化与法西斯化，就认定对黄色工会的策略已根本改变。这是不实际的，而且会使一般党员机会主义地去了解过去加入黄色工会不是要消灭黄色工会⁽⁶²⁾的了。

第四条，猛烈地发展赤色先锋队⁽⁶³⁾是对的，但如果离开群众斗争，离开组织广大群众，专门等待武装暴动，拿枪就干，与群众日常斗争、实际生活一点也不联系，则赤色先锋队就会变成招兵式的武装别动队的组织。这不仅不能成为群众的先锋，而且必将离开群众很远，成为孤立的组织。现在上海就有这种危险现象发生。

你们累次来信提到武器的事，假使以此为中心来团结赤色先锋队，这将失掉赤色先锋队的群众性与夺取敌人武装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决心。在这一工作上，你们必须注意到兵工厂工人中的工作。武装要从敌人方面想法子，这是武装工人的根本出路。

第五、第六两条，你们提到党与团的发展，丝毫没有联系到斗争问题。这将埋伏着一种危险倾向，即是在猛烈地为准备武装暴动而发展党与团的组织时，将助长一些机会主义分子接受“左”倾的空谈武装暴动，而不去领导群众实际斗争的危

险倾向。上海已有这种倾向发生，武汉必须预先看到。必须知道，在只谈武装暴动只要枪来训练而不去领导群众日常斗争，说只有大干不要小干的动员之下，也同样会聚集一些机会主义分子在“左”倾的形式上表现出来。

第七条，你们提到产业委员会的工作，你们必须注意，产业委员会是一种临时的组织，是要聚集党内一些工运干部去推动与组织产业的赤色工会的。当产业的赤色工会以及各厂的分会已经吸收群众正式成立起来的时候，产业委员会便须立刻取消，退居党团地位，取消其在党内的直接指挥系统，推动各级工会发挥其独立的工会作用。所以产委只是党发展赤色工会的一种动力，赤色工会一成立，即须集全力于工会的独立系统的运用，绝对不容许再以党的产委来代行赤色工会的指挥职权。现时上海在这一组织方式中也正犯着使赤色工会退居无权地位的错误，望能引起你们预先注意。

第八条，你们提出加强反右倾的斗争是对的，同时“左”倾的危险也在党内继续发生。你们应坚决反对这一观念：“左”倾会比右倾好些，在现时只怕右倾不怕“左”倾。要知右倾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而“左”倾也同样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的。自然，在目前右倾还是党内主要的危险^[64]，尤其是在一般旧的干部分子中。

除了你们决定的八条外，还有行动委员会的组织问题。过去将党与团合并于行委组织之中，不再存在团的独立组织系统，这是错误的。团是非党的组织，必须容许其存在独立的组织系统与工作。团从支部起直到中央，参加党的行委组织是加重其政治责任，而不是与党合并。团本身的组织与工作

系统，仍应存在。过去的办法，你们应有所改正。尤其是青年工作，更须督促团加紧注意。团的工作人员要尽可能地不调动。

支部工作的建立，是目前武汉工作中的最中心问题之一。如何建立支部工作，你们已知道很多。中央要特别指出的是，你们对于干部的分配与吸引，要特别注意于下层。许多中央派出的干部可以选择得力分子派他们到支部中去，即使不能立即入厂参加生产，也要他们能脱下长衫到工人群众中去，帮助工人党员建立支部生活。另一方面，你们要迅速地从小人斗争中吸引新的党员，吸引新的干部并引进他们到指导机关中来。所以，你们向中央要得力的干部，中央当然还要派人给你们，但最主要的还是要从下层支部中坚决地吸引新的干部上来。

你们关于示威的意见是正确的。只有少数先进分子的单独示威是失策，应准备发动广大的群众性的示威。从这点上也可推论到：只以准备武装暴动为号召，而不注意群众的日常斗争，不注意群众的部份的政治经济要求，不注意从日常斗争中发展赤色工会与赤色先锋队的组织，不注意从一切部份的要求联系到政治总要求，则组织总罢工示威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总之，你们一切工作计划，最中心的缺点是在布置暴动上做文章，而忘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是要动员最广泛的群众，从斗争中锻炼自己，从斗争中组织自己，从斗争中认识党的领导与接受党的口号。只有这样，才能造成伟大的群众斗争力量与组织基础，才能造成党的坚强的领导。而所谓斗争又必须从各

部分的要求发展到总要求,从各种日常斗争、罢工、示威发展到总罢工。党的领导,尤其是在目前形势中的领导,便在于抓紧这些斗争,联系到总的政治要求,联系到总的行动,以准备最后的决战。

在这一原则下,我们要求你们,对于武汉工作要有最切实的计划与办法,要特别着重于中心工作之建立。在武汉,我们提出,铁路、海员、兵工厂、码头、市政、纱厂、黄包车夫是你们指导武汉工作的中心对象。

立三⁽⁶⁵⁾路线的理论基础^{*}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一日)

我们要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不仅是复述国际⁽⁶⁶⁾的路线,必须对立三路线有彻底的揭发与批评。立三路红之形成不是偶然的,如果在党内没有形成这一路线的基础,则它不会在党的领导机关起领导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在下面三个条件之下认识立三路线之形成:1.历史的条件,六次大会后有些根本问题没有得到适当的解释;2.党内无产阶级成份薄弱,小资产阶级成份占了很大的数量,这使党的路线有忽“左”忽右的表现;3.立三的思想,在过去的讨论中没有受到强烈的反对。这三个条件,帮助了它在领导机关中起了领导作用。

同时,我们在这里,必须认识立三路线之理论的基础:

(1)不懂得正确地估计阶级斗争力量的对比。国际来信所指出的,立三路线不懂得正确地分析客观形势及正确地估计阶级斗争力量的对比,这完全是正确的。我们可以从他的文章、报告以及他起草的六月十一日的决议案⁽⁶⁷⁾中得到充分的材料来证明。当初立三同志分析敌人的力量时,总是只注意敌人的弱点,或将敌人的某一弱点特别夸大;估计主观的力量

* 这是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所做的批判立三路线的报告节录。

时,则只看到强点而掩盖了自己的弱点。所以六月十一日决议案对世界革命及中国革命的进展问题,估量到帝国主义及统治阶级时,把他们看成是无能为力、只有等待崩溃的状态,对于革命力量的估计,不仅夸大了红军的发展,尤其对于城市工人斗争的发展及其觉悟性与组织性夸大了,不合实际。这两方面的会合,对于革命形势的估量自然变成为不正确的了。这是立三同志之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问题之观点。

(2) 否认革命发展之不平衡的特点与对革命高潮认识的错误。不仅在中国问题上,在世界革命形势的估量上也是如此。中央七十号通告⁽⁶⁸⁾中提出中国革命的发展将走向平衡。这一句话,在表面看来是没有问题的,但已经种下了以后错误的根源。在立三同志起草的向国际的报告中说:中国革命之发展,不平衡其表面,平衡其实质。这完全否认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所以当时中央工作人员会上与陈韶玉⁽⁶⁹⁾的争论,对这一点也完全错误了。立三同志的观点,认为中国革命爆发必然地引起世界革命之同时的爆发。对长沙事件⁽⁷⁰⁾,党的宣言说,中国革命之爆发必然掀起世界之普遍的武装暴动。立三同志想以世界革命第三时期⁽⁷¹⁾的特点来取消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这是他对于世界革命的观点,同时也就是他对于中国革命的观点。他否认不平衡的观点,是将革命高潮解释成为直接革命形势。六次大会⁽¹⁶⁾的决议案中说,“将来的新的高潮,更加要使党将准备武装暴动以至实行武装暴动,认做当前的实际任务”。这就表明由高潮到直接革命形势,虽然中间没有万里长城隔着,但是有一个过程的。而回国后的第一号通告却说,将来新的高潮的到来,武装暴动的口号将要从宣传的口号变成

为行动的口号，这便已经将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模糊了。去年中国党接到国际十次大会的决议⁽⁷²⁾，说中国革命运动已开始了新的高潮。在江苏省的代表大会上我曾说明这一问题，所谓新的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是不同的，现在已经有了新的高潮，但还不是直接革命形势。这个问题当时并未引起政治局热烈的讨论，只是在文件上有一点修正，这也足以证明中国党之理论基础的薄弱，同时也就助长了立三路线的形成。立三同志说，坡的阿姆（подъём）的意义不应译作高潮，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是一个东西。如果这样，那末，六次大会的决议案中“在总的新高潮之下，可以使革命先在一省或数省重要省区之内胜利”一句话，便应改作“在总的直接革命形势之下，可以使革命先在一省或数省重要省区之内胜利”了。既是总的直接革命形势之下，那里还有什么革命先在一省或数省重要省区的首先胜利呢！当然，在他这样的认识之下，所谓今天是湘鄂赣之首先胜利，但必须得到武汉，武汉之首先胜利也就是全国革命胜利之开始的理论，是一点不奇怪的。所以他会提出组织西伯利亚的华侨回国，要蒙古出兵参加中国苏维埃联邦，要苏联出兵打日本。当然，这不仅是由于否认革命发展之不平衡一点，一切盲动主义、命令主义都同时爆发。

(3) 组织观念不正确。立三同志对于组织的解释，常常以加强主观力量来回答，他完全是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他在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⁷³⁾的报告中，将主观力量放在革命发展的条件以外，而只分析客观的条件。他说革命形势一到，主观力量不成问题，例如“五卅”时期⁽³⁾与武汉时期。他虽然在“八一”、“八三”的会⁽⁷⁴⁾上提出要“加强组织”，但这一“加强组

织”，他是认为革命形势已经一般的成熟，只要一组织便起来了。所以他只要用武装暴动的口号来号召，在上海则以四次暴动的口号来号召。这完全将组织力量放在革命形势成熟条件以外，实际上必然走到取消组织的路上去。总行动委员会的组织不仅取消了团，实际也取消了党。

(4)在估量斗争形势与布置工作中含有军事投机与军事冒险的观点。立三同志对于红军及农民斗争之发展与组织，有奇怪的意见。这一方面是由于由农村来的人随便报告一些数目字可以帮助他，但根源还不在于此。在“八一”、“八三”的会上他认为：红军进攻武汉，工人必然会起来暴动。另一个政治局同志在《红旗》上说：单纯用红军进攻武汉，我们是反对的；但如果说红军逼近了武汉，工人斗争还不能起来，这也是错误的，工人一定会起来。立三同志之另一观点是建筑在南京士兵暴动的身上，他以为南京士兵一暴动，一定可以占领南京，响应武汉，引起上海总同盟罢工。因此，他以为红军逼近了武汉，武汉工人暴动，南京占领，上海暴动；同时蒋介石在陇海路的军阀战争中失败，冯玉祥⁽⁷⁵⁾在河南也因农民暴动而失败；北方军队南下，北方空虚，则北方农民也可以起来暴动，因此要求蒙古出兵，苏联出兵。用这样的分析来决定与布置举行武装暴动，这完全是军事投机的观点，是想在军阀战争中取巧的观点。

(5)用托洛茨基的理论来补充他革命转变的理论。立三同志在六月十一日的决议案中说：一省数省胜利的开始，也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这实际上是取消了民主革命政纲之中心的任务。所以他影响到苏代会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用过早的办法，企图在现在的苏维埃区域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纲。

关于粉碎第四次“围剿”⁽⁷⁶⁾的电报^{*}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月)

一 一月二十七日的电报

(甲)金溪战役⁽⁷⁷⁾后,我军继取备战姿势,调动敌人与征集资材,即三军团开往贵溪亦本此旨。敌此次被我调动,一方企以信江之敌吸引我军,以抚州来敌截击我于金溪之北,一方则又因对我情况不明,深惧前辙,故抚州之敌前进极缓,且向北靠,至今日吴、罗、周三师⁽⁷⁸⁾仍在浒湾、琉璃冈、黎墟一线。我方面军集中南移,只一天便达金溪东南部,以备战姿势吸引

* 一九三三年二月至三月,蒋介石调集四五十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这时,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已统治中央领导机关。他们不仅提出了一条“左”倾的政治路线,而且提出了一条错误的军事路线。在第四次反“围剿”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已被排挤离开了红军。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在前线指挥作战,他们在实践中认识到中央和苏区中央局要求红军先发制人、攻占敌人重兵驻防的坚城南丰和南城命令是错误的。周恩来同志向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提出了集中兵力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在周恩来、朱德同志的指挥下,第四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这次战役先后歼敌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和敌主力十一师,缴枪万余枝。这里收入的电报,前八件是周恩来同志给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第九件是和朱德同志联合署名发布的命令。

敌人。但敌今日已侦知我主力不在金溪以北，故又改变计划，以吴、周两师集中浒湾附近，罗师退回抚州，二十三师仍西移乐安，回复其原定进攻部署。

(乙)我军决利用此两日时机，发动战斗员将金溪南之七八百病伤员一律后运至黎川地域，以便后方来运。俟敌二十三师明后日向西移动后(最好罗师也西移)，我军即以十一军一部游击浒湾，一部佯攻南城，迷惑并牵制敌人。以十二军牵制邵武之敌，另以全力渡河，直攻南丰城，并准备在抚河西消灭敌人增援队，以突破抚河围攻线。

(丙)本来依现时敌情，即抚河流域敌之两个较强的“进剿”军还未组织完备以前，我军能在抚河东岸会合十一军求得运动战消灭敌人主力，确比围攻南丰暴露我军企图去打敌增援队为好，且抚河东这一地域，幅员并不窄，地形尤好，尤便征集资材，只是后方连络远不便运输，主要还由于南丰、广昌、建宁、黎川的赤化工作差。但我之利即敌之不利。敌几次想在河东岸以一翼吸我一翼截击我之战略求战，但南丰、南城、金溪三次战役⁽⁷⁹⁾，都因被我集中力量迅速击破或消灭其一翼而失败。故敌在抚河东岸作战，非俟其强有力之两个“进剿”军组织完备后，才敢猛进。上次礼西赵(南城)胜利后我以备战姿势在黎川待机，这次金溪胜利后我在金溪待机，都因敌不敢冒进坚守城防致不得在运动战中连续战斗而必须转移地区，因此由南丰东而南城东而浒湾东。我军万分谨慎地弄清敌情，以迟迟进逼的战略调动敌人，求得运动战的胜利，决无忽视敌之进攻与截击的观念。上次东出邵武引敌，因我恐敌截击回师过早，致敌吴、周两师已半至硝石又复缩回，这证明一切战略决定都

与敌情、地形、任务有关。假使敌之抚河两强有力纵队已成，又如这次三军团逼近贵溪处于不利阵势，则战略便须改变。故十军渡河时，曾、邵、唐⁽⁸⁰⁾等主张三军团过河攻贵溪，我们便立电反对。

(丁)现时敌既执行其组织三个“进剿”军与“清剿”军坚守城防的进攻部署，我自须夺取先机，立即转移作战地区，调动敌人以破坏其进攻部署，转移抚河西岸即由此。但须说明，这次宜黄、乐安战役⁽⁸¹⁾以后，敌对城防已更坚守，其虽有主张放弃机械城防的，但必在我进攻与胜利调动敌人和消灭野战敌人条件下。我独立师两次袭击入崇仁，便由于我东岸的胜利和进攻。因此转到抚河西，须攻城才能立即调动敌人，因南丰、南城、宜黄，抚州都在河西岸，不能如东岸一直深入抚州附近去威胁与调动敌人。攻城与消灭增援队一有暴露企图二有易受夹击的不利，故不如在东岸自如。因此在东岸目前如不能求得运动战，决不应轻易过河。这须请你们注意。

二 一月三十日的电报

甲、二十七日夜得确报，罗、周、吴三师企图乘我军南移，压迫我军于远距离外，定二十八日开金溪、左坊、琅玕之线，二十九日开珀圩、黄狮渡、琅玕之线，三十日罗师经礼西赵回南城，周、吴两师回浒湾。因此，我方面军乃更集中，准备在其三师分开时，首先消灭罗师。但二十八日敌仅达肖公庙、浒坊、琅玕之线，陈诚⁽⁸²⁾更以“进剿”尚未准备完毕停止远追，于是二十九日敌复向回缩。今日十一师又开回浒湾、河西之东馆待

命，十四师、九十师集中浒湾附近，二十三师已西移乐安，五师到贵溪，八十三师二月半后来赣。蒋介石二十九日已抵南昌，其进攻布置当更加紧加速。

乙、敌不愿在布置完毕前，轻易冒进与分兵损实力，已甚明显。周至柔师现正急图补充，吴奇伟师正在整理，吴本人已往见蒋。在此敌情下，连续的残酷的战斗转眼就到。我如立即转到抚河西，只有攻城才能调动敌人。攻城除前电所述，一暴露企图，二易受夹击之不利外，还有三损伤大，四不能筹款，五耗费时日的不利。在大战前如蒙此不利，而坚城又攻不下，增援军三个师并进又不便打，则不仅未破坏敌人进攻部署，且更便利于敌人的进攻。因此在敌人部署完毕前，如能在抚河东岸连续求得运动战解决敌人，我都不主张立即过河攻城。即使敌暂不出击，仍可筹一笔款（金溪胜利后共得现款二十万），以利大战经费，并可加强十一军的赤化金溪、资溪，以更利于牵制敌五、六两师之编入“进剿”军。如敌因蒋来与我在抚河东岸，立即向苏区深入截击，我军自当迅速移转至苏区边境，背靠苏区决战。

丙、上述意见，朱、王⁽⁸³⁾等同志大都同意。只中央累电催我们攻破城防，与我两电所陈战略实有出入。但我终觉消灭敌人尤其主力，是取得坚城的先决条件。敌人被消灭，城虽坚，亦无从围我，我可大踏步地直入坚城之背后，否则徒损主力，攻坚不下正中敌人目前要求。中央局诸同志同意此意见否，望于明日简电复，过期因时机不容再缓，我当负责决定，同时仍请中央给以原则指示。

三 二月七日的电报

甲、中央局命令攻南丰，我们部署意见：

(一)乘敌第八师有两团欠一营在新丰街，一营在里塔圩之时，我以一部兵力袭击新丰，以主力由南丰下游渡河，断新丰之敌向南丰退路，并直扑南丰城。城内外敌仅四团，有被我强袭入可能，在强袭时，南丰东岸亦配置一部兵力。

(二)以十一军主力逼近浒湾，一部向南城对岸游击，威胁并牵制敌人，其工作团则努力赤化金溪、资溪。二十一军向永丰逼近。独四、五师在宜黄、乐安以南行动。

(三)如强袭不成，而已驱逐城外工事中敌人，则可一面坑道作业，一面准备打击增援队。

(四)如城外工事中敌人尚未驱逐，而敌增援队已至，则只能准备打击增援队。

(五)如我牵制敌人兵力不奏效，敌以增援队三四师由马路并进，迎击则我受夹击，侧击则便于城内外敌人会合，如此则便须转移地区，攻宜黄、乐安调动敌人，于山地运动战中解决。因山地易于牵制一部，消灭一部，而由马路并进，便甚难牵制。

乙、上述部署不是呆板的，敌情地形有变尚须活用。万一南丰下游因雪水下融不便徒涉，而须改由南丰上游渡河，则我之企图易先暴露，新丰两团便无法截断，南丰城防便可增至六团，且敌可以十一、九十两师先向南丰开来策应。如是将更不便我强袭，便须经过苏区改攻宜黄或乐安去调动敌人，求得运

动战中解决敌人。

丙、这一部署与中央局命令原旨有出入。我认为攻下南丰最好，但攻下宜黄，乐安，在运动战中消灭增援敌人，仍然可乘胜直胁抚州，且更便运转。你们同意否？或仍坚持唯一是猛攻南丰，虽大损失亦所不惜，虽敌三四师由马路并进亦非与之决战不可？请于今日十八时前立电复，以便明日行动。

丁、不攻南丰或宜黄、乐安，先攻南城，在目前敌情与地形上是不可能的事，请中央注意。

四 二月十三日的电报

甲、昨日继续侦察南丰堡垒工事，只西北门外堡垒利用夜色可接近强袭。黄昏后我军开始攻击，与敌激战一夜，夺取敌人大小重要堡垒十数个。但城外仍有二十多个堡垒在敌人手中，且极险要，堡垒后又有开旷地。已夺得工事离城边尚远，城墙上又有炮楼。敌守堡垒多一班一排，最重要的不过一连，我攻堡垒费时久，险要的须围困。整夜激战结果，我缴获不足一营，损失却过三百。三军团为主攻，师长彭鳌⁽⁸⁴⁾及两团长均阵亡。攻城激战虽夜雨，士气极旺。

乙、十日，我十一军已牵制敌八师之一团于新丰街，十一日，二十二军又伸出里塔圩断其归路，故南丰敌为五团。今日，南丰敌在河南之一团，因夜中十二军在河东占第一个堡垒，亦撤回城内，并断浮桥，显示其守城待援之决心。敌对增援部署约以三路分进：两师由南城，一师由宜黄，两师由乐安。敌十一师已向宜黄开动。

丙、据此情况，我们遂改强袭南丰为佯攻，决心先消灭增援队。现部队正在南丰西部一带集结，今明两日弄清敌军行进路线后，当求得于预期遭遇的运动战中消灭敌之一翼，以各个消灭之。

五 二月十五日的电报

甲、确报，当我军在黎川时，敌大举部署为陈诚领中路军分三个纵队：第一纵队罗卓英，为第十一、五十二、五十九三个师，集中宜黄、棠荫；第二纵队吴奇伟，为第十、第十四、九十三个师，集中抚州、龙骨渡；第三纵队赵观涛⁽⁸⁵⁾，为第五、第六、第九、第七十九四个师，集中浒湾、金溪，以一部出资溪。四十三师集中宜黄，乐安间，为预备队。都限二十日前集中完毕。第四、第八十三师为总预备队。

乙、我军围攻南丰既急，敌即提前集中，以十一师十四日开至宜黄、棠荫，以五十二、五十九两师开乐安，准备由东陂、黄陂，新丰市截击我军，现均向乐安前进。以第二纵队向南丰前进，十四日九十师到东馆，十四师亦有开动讯，十师尚未动。第三纵队集中时间与地点未变。四十三师向宜黄开，十四日到公陂，宜黄原有其一团。二十七师已集中永丰、新淦。

丙、我们现改强攻为佯攻与监视南丰之敌，准备消灭其增援队。敌又有改变进击路线可能。敌对我军猛攻坚城，认为可以损伤与疲劳我兵力，并吸引我于坚城之下，便于其增援队之截击与连续战斗，已定十八日开始“进剿”。

丁、现我军集结兵力于南丰城、里塔圩以西地域，背靠苏

区,更积极佯攻南丰,引致敌仍依原定路线“进剿”,以便我首先迎击与消灭其右翼。

戊、猛攻南丰我军伤亡全数过四百人。

六 三月二日的电报

甲、我军与敌激战三昼夜,第三日本可将敌十一师继续消灭或击溃,只因山地战各军联络与我指挥均不易达到,故在第二日消灭五十二师及五十九师大部后,各军位置不利于出击十一师增援队,致昨日战斗未完全解决,只继续消灭五十九师,但胜利是空前的。本日,因敌二纵队三个师已于昨日西向增援,今日可到新丰市、东陂,黄陂,截我归路,我将陷于被包围中,且战场未清理,伤兵未撤,战利品到处堆积,故于今日在胜利中撤退,开始向小布、南团、东韶、水口地区集中,准备继续战斗。

乙、因此胜利,敌已纷纷调动,除十一师、二十八师已来河口外,第九师由南城今日抵杏祥坊,二纵队由南丰、里塔圩、新丰移至永兴桥、饶坊之线,明日逼近东陂、黄陂,三纵队一部一日已占领硝石,今日五师又被调龙骨渡,六师、七十九师则改在南城河西集中。

七 三月四日的电报

甲、这几天,敌完全处于被动。二纵队三个师原拟由新丰市截击我归路,嗣知五十二、五十九两师消灭,乃改向黄陂开

进。及闻我军已离黄陂，敌十四师急由党口、饶坊北开演口，十师、九十师停在崇五都，十一师进黄陂，九师赶到河口，今口均未动。三纵队之第五师被调龙骨渡，今日又令由岳口回南城。三纵队现已改向南丰进，先头明日可到。

乙、闽敌刘和鼎⁽⁴⁵⁾昨日率一旅一团进太宁。十九路军以区寿年师及张炎旅三日集中永安为右翼，以沈光汉及张贞师为左翼。右翼定八日进连城。这一部署是黄陂战役前预定的。

丙、陈诚中路军的进攻路线已改变。三纵队改走南丰，一、二纵队（现只五个师）或将更靠近，出东陂，黄陂、新丰市，求我主力决战于东韶、河口，而以三纵队趋广昌，出头陂、东山坝，截我归路。

丁、我军拟俟集中后（一军团带胜利品，经招携路较远）仍选敌一翼，求于运动战中消灭之。

八 三月十六日的电报

甲、北面敌两纵队各三个师靠拢并梯次轮番向东南搜索前进。今日其前纵队十四师始达新丰市，九十师达侯坊，十师达草台冈；后纵队九师达东陂，五师达黄陂，十一师达安槎、蛟湖。预备队七十九师在宜黄，有两团在河口，六师在抚州，许克祥全师在南城，刘绍先师在乐安、崇仁，余无变动。

乙、我们已调十一军，十八日可至广昌西北，配合独立师、团及地方武装，牵制并抑留敌进攻广昌之前纵队。我主力决以待机姿势，准备侧击敌之后纵队，并首先消灭其行动中后卫部队，以便连续作战，各个击破敌人。

丙、我方面军昨日已开始移动，因敌两纵队太靠拢，故尚在待机中。但这是四次战役决定胜负的战斗，已下最大决心，准备一切牺牲，部署与敌三个师决战的阵势和动员。

九 三月二十日的电报

甲、敌情另电告。

我十一军已于十八日到广昌附近，拟于二十日起领导地方武装牵制向广昌去的敌人前纵队，并以主力阻敌回援，以掩护我军右侧背。

乙、我军拟于二十一日拂晓，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灭草台冈、徐庄附近之十一师，再突击东陂，五里排之敌。

丙、五军团、十二军、宜黄独立团为右翼队，归董、朱⁽⁸⁶⁾指挥，应于二十一日拂晓以主力进攻草台冈、徐庄敌左侧背，以一部从摇篮寨方面牵制东陂之敌，其预定动作如次：

(1)第十二军(附宜黄两独立团)应于二十日黄昏时到斜蕃附近，二十一日取捷路到侯坊上游适当地点渡河，占领灵埂山、三角砦一带，侧击侯坊，徐庄、雷公岬之敌，并以一部领导宜黄老独立团，往石背、摇篮寨游击东陂之敌。新独立团往新丰市西南地带，挖毁由东向西的交通路(防敌回援)，并警戒我右侧背。

(2)第五军团应于二十日到端溪附近，并派队伪装逼近侯坊游击。二十一日拂晓沿落马山、霹雳山进攻侯坊、徐庄、雷公岬之敌。

丁、第三军团、第一军团、二十一军、独立第五师为左翼

队，归彭、滕⁽⁸⁷⁾指挥，应于二十一日拂晓先迅速消灭草台冈附近之敌，再突击东陂之敌，其预定动作如次：

(1)第三军团应于二十日以掩护队占领界上、雷母山之线，掩护其主力于黄昏时到东边岭、亮溪附近，二十一日拂晓由西南向东北进攻草台冈之敌。

(2)第一军团应于二十日以掩护队占领三溪附近，掩护其主力于黄昏时到大坪、徐坊、沚洲之线，二十一日拂晓即由西向东突击铁石坳附近之敌，以截断东陂与草台冈敌人之联系。

(3)二十一军（直受林⁽⁸⁸⁾、聂⁽⁸⁹⁾指挥）应于二十日以掩护队占领王都、上堡附近，掩护其主力于黄昏时到达古王坑、邱坪附近，二十一日拂晓即由西向东进攻东陂之敌。

(4)独立第五师（直受林、聂指挥）应于二十一日拂晓由吴城出秀山，由北向南佯攻五里排之敌，并警戒我左翼侧。

戊、两翼队战斗分界线由东边岭到东陂大路之右侧（道路归左翼队）。

己、第二十二军为总预备队，二十日在现地不动，二十一日随第一军团左后方前进，必要时由林、聂直接指挥。

庚、第一军团卫生部准备在长罗开设野战医院。三军团卫生部准备在徐庄、荫水开设兵站医院。后方联络线仍照作战计划规定。

辛、总部拟明（二十一）日到亮溪附近。

关于西安事变的三个电报^{*}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一 与宋子文谈判情况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甲)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⁹⁰⁾昨到西安。蒋暗示宋改组政府,三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

(乙)今日我及张⁽⁹¹⁾、杨⁽⁹²⁾与宋谈判。

第一部分,我提出中共及红军六项主张:

子、停战,撤兵至潼关外。

丑、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 在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的严重形势下,以张学良将军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将军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受红军和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被蒋介石拒绝。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杨联合行动,在西安逮捕了蒋介石。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准备乘机发动大规模内战,除掉蒋介石并取而代之。当时,中共中央坚持了反对新的内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逼蒋抗日的方针,并派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叶剑英同志为代表去西安。经过周恩来等同志艰苦的工作,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合作形成了,不久,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这三份电报是在谈判过程中发给中共中央的,其中后两份是和博古同志联合署名的。

寅、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卯、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

辰、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

己、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以上六项要蒋接受并保证实行。中共、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对日。宋个人同意，承认转达蒋。

第二部分，宋提办法及讨论情况：

子、宋提议先组织过渡政府，三个月后再改造成抗日政府。目前先将何应钦、张群、张嘉璈、蒋鼎文、吴鼎昌、陈绍宽⁽⁹³⁾赶走。推荐孔祥熙为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兼长财政，徐新六或颜惠庆长外交，赵戴文或邵力子（张、杨推荐）长内政，严重⁽¹²⁾或胡宗南长军政，陈季良或沈鸿烈长海军，孙科或曾养甫长铁路，朱家骅或俞飞鹏长交通，卢作孚长实业，张伯苓或王世杰长教育。我们推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⁹⁴⁾等入行政院。宋力言此为过渡政府，三个月后抗日面幕揭开后，再彻底改组。我们原则同意，要宋负责；杜、沈、章等可为次长。

丑、宋提议由蒋下令撤兵，蒋即回京，到后再释爱国七领袖⁽⁹⁵⁾。我们坚持中央军先撤走，爱国领袖先释放。

寅、我们提议在这过渡政府时期，西北联军先成立，以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成立联合委员会，受张领导，进行抗日准备，实行训练补充，由南京负责接济。宋答此事可转蒋。

卯、在蒋同意上述办法下，我们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

(即前述六项)。宋答可先见宋美龄(子文、学良言她力主和平与抗日)。

(丙)如你们同意这些原则,我即以全权与蒋谈判,但要告我,你们决心在何种条件实现下许蒋回京。请即复。

二 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甲)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

子、孔、宋组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

丑、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线已退)。

寅、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

卯、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辰、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

巳、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

午、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

未、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

申、蒋回后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

酉、宋表示要我们为他抗日反亲日派后盾,并派专人驻沪

与他秘密接洽。

(乙)蒋已病,我见蒋,他表示:

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

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

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

(丙)宋坚请我们信任他,他愿负全责去进行上述各项,要蒋、宋今日即走。张亦同意并愿亲身送蒋走。杨及我们对条件同意。我们只认为在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张去。但通知未到张已亲送蒋、宋、宋飞往洛阳。

(丁)估计此事,蒋在此表示确有转机,委托子文确具诚意,子文确有抗日决心与改院布置。故蒋走张去虽有缺憾,但大体是转好的。

(戊)现在军事布置仍旧,并加紧戒备。

(蒋临行时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

三 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后的局势和我们的方针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我们以下的意见供你们参考:

一、西安事变之和平解决,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生活走入一个新的阶段的开端。就是:

子、进攻红军战斗走向停止;

- 丑、对外退让政策将告终结；
- 寅、国内统一战线初步局面的形成；
- 卯、陕甘两省变成抗日根据地之现实的可能性。

二、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指示着阶级力量之分化及重新结合，特别是资产阶级营垒之决定性的分化过程，其意义就在推动和加速了资产阶级营垒中左派之集中，打击了中间道路之思想。然而分化过程没有终结，大致的情况仍然存在着三个营垒：抗日、降日、中间。新的变动就在：

- 子、抗日力量的增强与合法化（至少部分地）；
- 丑、亲日派遭受一致命打击；
- 寅、中间派开始接近于左派（虽然依旧不免动摇地缓慢地，即保存中间之基础）。

方针：打击亲日派，巩固以西北为中心之左派，影响与吸收中派。

三、孔、宋政府是一个过渡的政府。这个政府在目前基本问题——对日问题上将采取较强硬的态度，在民主问题上或许可有一小步之前进，但显然在许多方面仍然会继续着旧的路线。我们对孔、宋政府，应当以过渡政府看待，即是：推动与赞助其抗日倾向，争取逐步的即使不大的民主改革，同时丝毫不放松对他的批评。如一切过渡政府一样，有着必然的摇摆与不同可能的前途，我们应与他每一个摇摆斗争，而争取他过渡到抗日政府。

四、在这个情况下召集抗日救国会议的运动，在发动、觉醒、组织群众及推动时局的进展上，均具有重大之意义。应该把要求南京召集和平会议和人民的促进运动联结起来。但会

议召集的时期及胜利的保证, 依靠于促进运动之开展, 这是局势开展之一个重要的环节, 加强抗日统一战线的群众性的关键。

五、局势开展之另一个中心环节是巩固西北, 将西北变成抗日根据地和统一战线的模范地区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这需要:

子、规定和实现三方面共同合作的纲领和西北的军事计划;

丑、张、杨两部之巩固与改造, 红军的休整与在新的基础上之正规化, 以及三方面的休戚相关的互相尊重的合作和互助;

寅、群众运动之开展和发动, 在这个基础上地方政权之民主化与改造;

卯、宁、青、甘西之解决回民问题。

六、坚持全国团结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发动者的立场: 一方面, 在抗日与打击亲日分子的基础上, 和南京左派合作, 吸取中间派到我们方面来; 另一方面, 结合南京之外的各派, 以西北为中心, 以抗日为目的和条件, 为推动南京向左之力量。

七、转变党的全部工作, 使之适合于新的环境, 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的主导者。

子、恢复在大城市, 首先在工人阶级中的党的工作。

丑、改变各地零散的游击队为农民自卫武装, 并成为农民运动之策源地。

寅、迁移中央至便于领导全国政治生活之地区。

卯、教育与重新教育干部。

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

亲爱的同胞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以极大的热忱向我全国父老兄弟诸姊妹宣言，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国难了。这对于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前途有着怎样重大的意义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民族团结的基础已经定下了，我们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前提也已创设了，中共中央特为我们民族的光明灿烂的前途庆贺。

不过我们知道，要把这个民族的光辉前途变为现实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仍需要全国同胞，每一个热血的黄帝子孙，坚韧不拔地努力奋斗。中国共产党愿当此时机，向全国同胞提出我们奋斗之总的目标，这就是：

(一)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地迅

* 这是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宣言。此宣言起草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四日，七月十五由中共中央交付国民党，至九月二十二日国民党中央社才发表。

速地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

(二)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

(三)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

凡此诸项，均为中国的急需，以此悬为奋斗之鹄的，我们相信必能获得全国同胞之热烈的赞助。中共愿在这个总纲领的目标下，与全国同胞手携手地一致努力。

中共深切知道，在实现这个崇高目标的前进路上，须要克服许多的障碍和困难，首先将遇到日本帝国主义的阻碍和破坏。为着取消敌人的阴谋之借口，为着解除一切善意的怀疑者之误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有披沥自己对于民族解放事业的赤忱之必要。因此，中共中央再郑重向全国宣言：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亲爱的同胞们！本党这种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与委曲求全的态度，早已向全国同胞在言论行动上明白表示出来，并且已

获得同胞们的赞许。现在为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准备把这些诺言中在形式上尚未实行的部分，如苏区取消、红军改编等，立即实行，以使用统一团结的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

寇深矣！祸亟矣！同胞们，起来，一致地团结啊！我们伟大的悠久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屈服的。起来，为巩固民族的团结而奋斗！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奋斗！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

抗日战争胜利万岁！

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反对妥协求和，坚持华北抗战^{*}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甲、太原既失，敌正长驱南进，沪战亦转至松江，浦东已失。英美出头调解，日敌提出条件：一、沪占领区划为租界。二、华北自治。三、内蒙独立。四、取消中国捕鱼权。因此，沪、宁失败求和的空气渐浓，晋局亦危。阎⁽⁹⁶⁾留石口镇、隰县，集结其教导团、决死队、少先队⁽⁹⁷⁾，坚持吕梁山脉，不来临汾，胜则发展游击战争，败则退河西，战事主持完全推之黄、卫⁽⁹⁸⁾。黄已失信心，卫虽口头同意我们对持久战与游击战主张，但其心已不在晋，各军均纷纷谋退过河。蒋似已不如以前之严令坚守。对刘湘⁽⁹⁹⁾，阎已希望其不会来晋主持。故灵石韩信岭之阻敌已无大望，敌直下风陵渡只是时间问题。

乙、因此，我意目前应：

一、反对妥协求和，坚持华北抗战，以此为一切动员的中心。指出凡要退过河的都是帮助日寇统治华北。

二、强调游击抗战，争取和影响友军改造，一致行动。分：(1)同情者，如决死队、教导团等。(2)有关系者，如许旅、赵师、孙军⁽¹⁰⁰⁾等。(3)有来往者。

* 这是从山西临汾发给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同志的电报。

三、广泛发展游击战争，并训练干部，以坚持抗战。(1)红军组织和领导的游击队，已达万人。(2)山西各县游击队，知者十四县，有四千余人。(3)总动委⁽¹⁰¹⁾组织和领导的一千人。关于游击干部训练，各军区应自行组织训练队，收容各地青年学生及工农分子。

四、扩大红军，以增强主力的决定作用(此项成绩最差)。胡服⁽¹⁰²⁾提议三个月扩大到十万。我赞成，并提议华北扩大三万，陕北五千，老苏区一万五千。华北三万，请朱、彭、任下令规定办法，地方党政协助。

五、放手收容溃兵散枪及资材。方开始做，东线稍有成绩，西线因无兵较困难。

六、加强各军区的工作。加强晋东南，提议宋任穷⁽¹⁰³⁾、彭真⁽¹⁰⁴⁾去主持，以决死队八千人为基础。晋南以雪枫⁽¹⁰⁵⁾为主，兼负责军政党委，以集中和统一党政军的行动。

七、实现地方政治民主化，以及于省区。

八、实行党的战区政策，并组织民众，发动群众斗争。

九、加强反汉奸的斗争。

丙、党的工作布置，由胡服电告。

目前抗战危机与 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一 目前抗战形势及其危机

在上海、太原相继失陷后，目前抗战局势正遇着一个新的危机。这个危机的特点，是政府军队抗战颇难为继而全民抗战犹未兴起的青黄不接，国内外调停的空气相当抬头。具体地分析来看：

甲、在战局方面——日寇已占领上海，突破松江，我军防线已退至嘉善、苏州、昆山、浏河之线；华北方面，敌人自占领太原后，已进逼汾阳、介休、子洪镇之线；平汉、津浦亦有前进消息。日寇企图是想在稍加整理后，压迫我大军退过黄河南岸，以便其向全世界宣告：华北战事已告段落，上海亦已占领。它将从事于华北自治，上海中立，分化蒙回，捣乱华中、华南的计划。这一计划可以在口头的停战协定掩护之下来进行，以欺蒙列强，利诱汉奸。这比明枪真火来得毒辣！

乙、在国际方面——九国公约会议⁽¹⁰⁶⁾，虽表示了英美的

* 这是在山西临汾一次群众大会上的演讲，刊载于汉口《群众》周刊第一卷第二期。

接近与积极，但他们中心仍在调停。他们不愿考虑制裁手段，因此，日本愈强硬他们愈无办法；而其调停中心，仍在企图苟安，这只有损害中华民族利益才能做到。因此，驻沪领事团公开从事和平运动，德意完全赞成日本说话，日本不但拒绝参加九国公约会议，并提出它的六项要求⁽¹⁰⁷⁾，英美并预言，如果日本态度强硬，中国坚持抗战，他们将使九国公约会议延续下去，准备觅取新机从事调停。苏联因英美态度如此，自不能单独行动，虽说它在道义上在实际上已给了中国以有力的帮助。

丙、在军事上——中国正规军队现已用到相当的数目，而全民全面的动员，军队的改造，战略战术的改变，后方工作的改善，在全国范围内依然没有开始。战争的失利，部队的损伤，给养的不充，这使部分的军人发生颓丧失望的心理。如恃着现有的正规军持久抗战，其胜利信心确已锐减。

丁、在民众动员方面——三四月来，不但政权没有开放，民运也没有开放。直到现在，党部仍固执其统制民运的政策。因此，包而不办是普遍现象。于是，许多大城市民运反不如过去局部抗战时的活跃，前线得不到民众的响应，后方得不到民众的援助，民众武装不能组织。这是给日本造顺民，给自己造反对者。不怕战争失利，最怕战争失了人心！失掉民众，这是万劫不复的。

由于上述的严重现象，遂至国内外妥协调解空气渐渐抬头而发生了下列的危机：

甲、汉奸政权的活跃——华北自治政府⁽¹⁰⁸⁾，上海、华北维持会⁽¹⁰⁹⁾，内蒙独立⁽¹¹⁰⁾，汉奸的活跃等等。

乙、投降主义的生长——亲日派的活跃，主张对日直接谈判；英美系的软弱，主张依靠英美谈判条件，没有自力更生的信心；对苏联失望的人，主张结束战争。这一切都是投降主义的变相。汪⁽¹¹¹⁾说主和者是汉奸；蒋亦说抗战到底，目前讲妥协者是汉奸。政府给中国代表团的训令，亦说日军不从中国撤退，没有调解的余地。这是反对投降主义的当头棒！

丙、特殊化⁽¹¹²⁾思想的增长——冀察特殊化的影响，至今尚引诱着许多人企图在此特殊化之下苟安。这可能吗？绝对不可能，而且这是制造汉奸、颓丧民气、出卖正义的过渡政治机构。故对日绝交十分必要。战败不能使中国民族屈服，特殊化可使中国民族万劫不复！

丁、失败主义情绪的发生——认为军事失败，一切都无办法，不是一拚求幸，便是退求自保。拚而求幸，胜已不可能，便更倾向于退过黄河以自保。果真在华北已无战的可能吗？如无可能，退过黄河也不能自保。故无命令自由退过黄河的，是等于让日寇来便利统治华北。

我们要为消灭这一切现象与克服这一切危机而奋斗，而战斗到底。要如此，就必须坚持抗战到底。只有全民众起来抗战，抗战才能持久；只有坚持抗战，才能得到国际友邦的赞助，才能拒绝任何不利于我们的调停，才能最后战胜敌人。

二 坚持华北抗战的可能及其前途

抗战危机发生了，日寇更集中全力来加深我们的危机。其中心的一环，仍在压迫我军迅速退过黄河，拿着华北，好做文

章。上海原是其牵制方面，次作战线，谁知沪战中的损失出乎敌人意料之外，因而进迫苏州，现正向南京前进。但日寇的战略中心，第一步仍在取得华北。故华北的抗战如真告一段落，抗战的危机便严重到万分，而且日寇也可以喘一口气再干。

因此，坚持抗战必须以坚持华北战争为中心。华北抗战能持久，日寇将无法实现其全部阴谋。目前太原已失，华北抗战能继续么？能持久么？我们回答：绝对地能。

第一，假使中央能有得力的生力军开来，能实行各线配合的出击，能增加生力军到敌人后侧，改变过去专守防御的战略战术，能动员广大民众参战，则华北战争可转变目前的危机，进入胜利的反攻！

第二，如果上述这些条件一时做不到，甚至于敌人继续前进，占领了我们的渡河点——风陵渡，企图占领我们黄河要口，我们也还是有办法在华北在山西进行持久抗战。这持久战有下列各条件：

甲、敌人的兵力没有可能统治全华北，不仅是乡村占不了，城市也占据不了太多。即使是铁路公路要道，也不能普遍占据。因之，敌人不能不用汉奸部队来统治许多城镇，用他的重兵火力巩固他的交通要道，用他的主力来和我们的部队作战。正好，我们便以游击部队消灭汉奸，武装民众，以一部轻装部队袭击、截断敌人大道交通，劫夺敌人辎重弹药，并以主力部队在山地寻求敌人一部而消灭之。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证以八路军在敌人后方恢复了十四个县城，烧毁了二十二架飞机，最近又夺回了南怀化⁽¹¹³⁾，击败了敌人许多前进的部队，就可以相信。

乙、在地形上,持久战也是可能的。因为敌人兵力的准备,只能适用于铁路公路上,最不适应于山地,且不熟识中国内地道路。而山西全境、冀察西部、热冀边地,都是山地,最便于我军的活动、存在与扩大。

丙、在气候上,外国人总不能较中国人适应,尤其是冬春两季,更于日军不利。

丁、民众的条件是基本的。日寇侵略中国,不论他怎样欺骗利诱,只能收买少数汉奸,大多数人民的财产是遭蹂躏的。故民众的反抗,是持久战的最主要的条件。敌人愈摧残,群众将愈觉醒起来,为民族的最后生存而奋斗。

戊、民众武装已有了初步的发展。特别是晋冀察边的广大发展,将是我华北持久战的模范根据地。

己、政府领袖和军队的决心成为争取华北持久抗战的主要条件。现在蒋、阎⁽⁹⁶⁾及不少军队,正在加强着这个战争。我们还望他们有进一步的全局的布置。

庚、最后,八路军留在华北作战,也为推动和领导华北持久抗战的重要因素。因为八路军是红军改编的,他有着长期运动战及游击战的素养。他将要发挥在这方面的特长,来影响友军,来组织和领导广大民众齐来抗战。

这一切有利的条件,将决定着华北持久抗战的极大可能。这个抗战的性质,在极困难的时候,将成为以游击战争为主体,来坚持华北抗战。这虽然会有一个时候,但它决不同于六年来的东北四省。它的持久战,将影响和推动着全国抗战的开展,掩护全国新的军队的组织;全国抗战的开展,也正支持着它,同时也使着日本无法结束它的战争,而要影响着全世界援

助中国抗战的运动。因此，这个游击战将有胜利的前途。它要在持久战中，壮大自己，武装人民，恢复许多城镇，破坏敌人交通，消灭部分敌人，最后得到全国生力军的参加，可以转到胜利的反攻，收复失地，驱逐日寇帝国主义出中国！

三 坚持华北抗战中我们的任务

怎样来坚持华北抗战呢？这是我们现在要说的，也就是实现华北持久战的任务如何？最主要的，我提出四项问题：

第一，军队的改造。原有的正规军，虽越打越少，但打仗要用组织好了的军队来打，因此，改造旧军，成立新军，便成为目前迫切的任务了。改造军队，目的不是在换一批人，而是在改造他的组织制度。在这里，今后在华北作战的部队，其组织必须适合山地运动战和游击战，应采用“三三制”⁽¹¹⁴⁾，而附有游击队及轻便后方辎重与多数的通讯资材的编制。其次，政治工作制度必须建立，而且要成为军队的生命线来巩固部队。提倡自觉纪律，保障部队与人民的密切关系。其三，部队的的生活必须改善。政治生活要平等，连队经济要公开，士兵生活要提高，官兵要团结一致。其四，部队的指挥要给以独断专行的权力，要使其能独立作战，分区活动，不怕留在敌人背后，不怕被敌人切断。其五，作战的战略战术要改变，要认识现在是野战，是运动战，是游击战，争人不争地。其六，要建立各部队的后方，要有源源不绝的后方接济，在困难时也要独立自给。这样的军队是活的，是人民的，是革命的军队。这样的军队，这样的指挥，便能坚持华北抗战到最后的胜利！

第二，开放政权。现在，全华北已不是中华民国的统一政权，而是日寇汉奸的政权。日寇的自治是伪自治，我们应该以真自治来发动民众，开放政权。因此，目前华北的政权，应该是国民政府一部分的地方政权。首先，它在制度上，应该是民主政治，应该团结全华北的抗日人民，不论何党何派何军，均应容纳他们的代表，来共同担当国事，主持救亡大计。其二，在组织上，应该从县区上施行地方自治自给，以坚持中华民国的正统，然后及于省区。其三，在政策上，应实行抗日的纲领。我们提议应该根据共产党提出的十大纲领⁽¹¹⁵⁾来实施战区的救亡政策。

第三，开放民运。华北若再不开放民运，军队就无法补充，作战将无人援助，民众武装将无法建立，强悍者将受日寇的屠杀，懦弱者将变为日本顺民，狡黠者将变为汉奸，而奸商劣绅将首先悬挂日旗担任维持。我们如不愿意这样，只有无丝毫迟疑地宣传民众，发动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起来共同担当华北的持久游击战。首先，应向民众作广泛深入的抗日宣传。其二，要组织广大的民众在工会、商会、农会和学生会之中，并吸引他们到政治团体中来。其三，要发动民众为保护其自身利益而斗争，并联系到民族利益上来。其四，要组织他们在武装训练之中，引导其参加人民自卫队、游击队、义勇军，并吸引到部队中来。

第四，肃清汉奸。坚决反对投降主义、失败主义及特殊化的倾向，是争取持久战的先决条件。只有反对这些汉奸，才能团结全华北人民，全华北军队，影响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坚持华北持久战争，而取得最后胜利。

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今日青年运动的性质

根据今天抗战的形势，我们来说一说目前青年的环境。

今天，无疑是个变动的战斗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时代。敌人要我们每个人、每个人的子子孙孙都做亡国奴。我们要求生路，便只有抗战，便只有坚持抗战到底。这时代是战斗的。这个时代不能与过去“五四”、“五卅”⁽³⁾、一九二五年大革命时代相比。过去是对内的局部的政治斗争，这一次却是对外的全面的反法西斯侵略的抗战。现在是整个被压迫、被屠杀、被奸淫、被侵略的中华民族的人民起来反抗的时候，所以现在的形势全变了。在国家环境整个的变动下，青年在这时代里所占的地位是最困难而又最重要的。如今我们青年再不能如过去那样地学习，找工作，结婚……再也不能依照平常的生活程序过日子了。战争了，我们再不能安心求学了。文化中心的京、沪、平、津、粤、汉，已去其四；后方的学校，也多半停了课；成千成万的青年人无家可归，无学可求，尤其是东北的

* 这是在武汉大学的演讲的第二、三部分，刊载于武汉《战时青年》第一期。

青年朋友，一再地飘泊流浪，一再地尝受人世间的惨痛。一支名叫《松花江上》的歌曲，真使伤心的人断肠。然而我们应该骄傲，应该自豪。我们这一代青年应该庆幸恰好生活在这样大的动乱的时代里。我们要在这时代里学习得充实起来，锻炼得强健起来。

我们青年不仅仅有今天，而且还有远大的未来。他不仅管自己的一生，而且还要管及他的子孙，他的后代。今天的青年不仅要问，怎样争取抗战最后的胜利；而且要问，在抗战的胜利取得后，怎样改造中国，使它成为一个自由的、民主的、共和的国家。

因此，我们想，在积极方面，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期。它可以把我们这一辈的青年锻炼得更伟大，前程更远。这机会在平常是很难找到的。

今日青年运动的任务

我们中国的青年，不仅要在救亡的事业中复兴民族，而且要担负起将来建国的责任。救国，建国，我想“任重道远”这四个字，加在中国青年的身上是非常恰当的。

我们今天应该努力的方向是什么？我贡献给诸位青年朋友的有四个：

第一，到军队里去——这是在今天挽救民族危亡的最有效的方法。建立生力军，充实我们的旧队伍，责任都在我们青年朋友的肩上。我想，一个人不能自卫，便不能做人，国家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最好受正规的军事训练，随时到直接杀敌的战

场上去。

第二，到战地服务去——战地的民众缺乏组织，到处在流浪着，彷徨着。要起来自卫，要起来斗争，却没有人领导。我们得去把他们组织起来，武装起来，领导着他们去打游击战，去配合正规军的行动，去封锁消息，坚壁清野，破坏敌人必经的交通线……至少也得做到军民合作，使汉奸活动不易。

第三，到乡村中去——我们虽然失去了许多地方，但后方还有广大的城乡。今天的后方民众，有许多还不知道抗日是什么一回事。我们要继续作战，继续加强军队的战斗力，必须动员起广大的群众到军队中来。我们要改良过去那种不合理的动员方式。有作为的青年们，因此必须有组织地、直接下乡动员群众，使农村壮丁勇敢地、自动地到前线去。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得注意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问题。最好能够做到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让乡下有钱而不愿当兵的人切实负责赡养抗日军人的家属，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这样，我相信会造成政府与人民的合作，减去许多磨擦的。再，我们还可以进行许多人民自卫的工作，准备将来配合着政府军的抗战。

第四，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我们再不能让华东、华南象东北四省⁽¹¹⁶⁾一样，给敌人安安稳稳地拿去了。我们要艰苦地在那残暴的统治之下锻炼我们自己，秘密地把我们的救国组织发展起来，把我们被压迫的同胞暗地里武装起来，准备迎接我们正规军的反攻，与我们的正规军取得里应外合。

我们的青年朋友们分散到群众中去，分散到全国各个角落里去，那我们的力量是无比的！

工作和学习是分不开的。如今我们只有在不断地学习中，

我们的工作才能够顺利地展开。我相信，只要我们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学习的。我们要各找一个适合于自己的地方，去发扬我们自己的长处，去学习，去工作。

这并不是说我们得抛弃以往的学习，而是根据以往的那点根基，去发扬光大，去使理论适合于实际，去把知识活用。

中国的青年运动有着最光荣的传统。今天，我们青年面对着民族解放的斗争，我们的使命是伟大的。

我们去工作，我们要克服任何的困难，我们要解除任何的疑团，我们是勇敢的，沉毅的，艰苦的，深刻的……我们是抗战的支柱。

我们的前程是光明的，远大的。

青年朋友们，努力去争取抗战的最后的胜利，努力去争取独立的自由的幸福的新中国的来临！

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

一 革命的政治工作是 民族革命的生命线

两个月全国抗战的教训，很清楚而迫切地把改造军队使之适合民族抗战需要的大问题，提在全国人民的面前，特别是尖锐地提在国民党的面前。

改造军队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制度。只有在抗战军队中把政治工作实际地建立起来，才能把民族抗战的战斗力的提高，才能把官与兵、军与民联结成一条心，象一个人一样，为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战斗到底！

当着一九二四年国民党在广州改组⁽²⁾，国民政府成立前，当时旧的军队尚未改造，革命军队还未建立，所以虽有二十余万粤、湘、滇等军与陈炯明等部酣战于东江、西江、北江、南路⁽¹¹⁷⁾各地，而胜负不决。在黄埔军校⁽¹¹⁸⁾第一期毕业，新的国民革命军成立了两个团后，仅仅以新成立这两个团为骨干，举兵“东征”⁽¹¹⁹⁾，即得着东江民众的热烈欢迎与帮助，克复潮汕，

* 本文刊载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上海出版的《抗战政治工作纲领》小册子，未标明写作时间。

直抵闽境，并迅速扫平杨、刘⁽¹⁰²⁾。如果从单纯的军事观点上说，以二十万众的粤、湘、滇军血战经年不能打败陈炯明，后来只加两个团，以数千之众，即起了全部胜负决定的作用，这不是奇迹吗？这是由于新成立的两个团，是新的革命军队，是有着革命的三民主义作政治工作基础的军队。政治力量超过了敌人，提高了战斗力，保障了军队本身及军队与人民的团结。当时国民党正因为有了这一铁的事实教训，才决心以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为中心，继续成立新的革命军队，改造旧的军队，如是才有北伐⁽¹²¹⁾的胜利。

苏联红军所以能够团结全国工农在残破困苦之中击败白党与外国的进攻，中国红军在过去十年所以能团结苏区人民进行残酷的战斗，西班牙政府军所以能团结人民与法西斯德、意侵略军及佛朗哥叛军进行坚决持久的战斗⁽¹²²⁾，这些“奇迹”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革命军队有坚强的革命政治工作！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以革命主义为基础的革命政治工作是一切革命军队的生命线与灵魂！

有人说，政治工作是空谈，是“卖狗皮膏药”的。又有人说，政治工作徒然增加军队中上下级的磨擦，军官带兵更困难了；军队对民众关系“太好”，就更难指挥人民了。

我们必须坦白诚恳地说，这些非难政治工作的理由，不是不了解政治工作的实际意义，就是故意反对军队中的革命政治工作，而不想军队革命化。政治工作之变为空谈，这决不是政治工作的本身错误，而是由于政治工作人员没有实行真正的革命的政治工作。如果一方面空谈革命主义与革命政纲，另

一方面在实际上却又多方阻碍革命主义与政纲付诸实行；如果一方面在宣言、广播谈话、训练中，向军队官兵与人民空喊全民族大家要参战，但另一方面在实际上又处处不给人民参战的权利与机会，处处阻碍人民与军队的联系，甚至人民慰劳抗战军队都被禁止；如果一方面高谈抗战，空喊士兵要勇敢上前线，但是实际上高级军官临阵不前，甚至化装先逃：这一切的一切，与革命主义、革命政纲、革命军队的行动都背道而驰。这样的政治工作，也就不得不变成点缀、凑趣、捧场的东西了。这样的政治工作必然会变成空谈，变成“卖狗皮膏药”的东西了。

政治工作，原是以革命主义、革命政纲来团结和联系军与民、官与兵的。如果官与兵、军与民之间没有这种为民族为国家而团结一致、坚决牺牲奋斗的最高原则来联系，没有“在上者”的提倡与做模范，而继续军队中的军阀制度，继续官压迫兵、军压迫民的离心作用，要想指挥如意，打成一片，是不可能的。欲使军队真正成为为民族解放的前卫战士的革命军队，也是不可能的。

另外又有人说，现在全国国民革命军中不是也有继承大革命时代所建立的政治工作么？对于这一问题，我们也必须坦白诚恳地答复说，大革命时代军队的政治组织与制度已不复存在于现在的所谓政训处⁽¹²³⁾中。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大政策，已经不是十年来的政治工作内容了。这样没有革命制度与革命内容的政治工作，还能适合现在民族革命军队的需要么？一九二七年后，十年来保持与发扬了大革命时代革命制度与革命内容的政治工作的，只有现在的第十

八集团军,即红军。

二 抗战军队政治工作的任务与内容

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的基本目的,是提高革命军队的战斗力,保证战争的胜利,是使军队本身团结起来,军队与人民结合起来。

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决定关头,迫切需要抗战军队的牺牲奋斗到底的战斗力,迫切需要军队与人民团结共赴国难,争取持久抗战的最后胜利。而今天要消除现有军队的一切派系,要消灭保存实力及把军队作为个人工具的观念,要消灭上压迫下、官压迫兵、军压迫民的一切军阀制度,要消灭一切畏缩不前、借故推诿、友军遇危险而不援、望风而逃的恐日病等等可耻的现象,只有发扬大革命时代的革命政治工作,使全国军队成为为民族解放而坚持奋斗到底的革命军队。

全国军队的革命的政治工作,必须恢复以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为基础,革命的三大政策为骨干,使每个指挥员、战斗员,每个人民懂得而且确信我们今天的抗战是为国家,为民族,为自己,为子孙,为着争取民族解放、民生幸福、民权自由这三大目的而奋斗,而且深刻了解与坚决执行联俄、联共、联工农三大政策,认识这是达到革命三民主义的唯一方策。只有这样的政治工作与革命政策的实际执行配合起来,才能使全国军民上下一心,军民一体,抱着抗战胜利的信心,望着民族解放的光明而坚固团结起来,不怕艰难挫折,不受威迫利诱,不迷惑于挑拨离间,坚持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根据这样的目的与基础，我们在政治工作的实施方面应做些什么呢？我以为革命政治工作应分为军队、居民、敌军三方面的工作。

在军队内部方面的政治工作，目前亟需做的是：

（一）向每个部队的全体官兵实施革命的政治教育，发挥革命的三民主义，把理论与实践相联系，使每个官兵有着革命的前进的人生观，使之了解国际大势、国内形势、日本状况，以及如何争取抗战最后胜利，高度地提高战士的民族觉醒与自我牺牲精神。因此军队的政治教育，必须与军事教育并重，必须有经常的政治教育时间，必须有革命内容的政治教育材料，必须开展指挥员、战斗员中的充分讨论，耐心解释一切疑难与误解，反对政治教育的形式主义与宗教仪式，提高战士们学习研究的兴趣。只有这样，政治教育才能深入。

（二）努力注意改善士兵待遇与生活。必须承认，旧军队中士兵的待遇与生活是极不好的，如果不努力尽可能地改善，是不能把士兵的战斗积极性提高，消除官与兵的隔阂的。必须禁止肉刑与打骂，禁止克扣军饷，这些均应明令规定，由政治机关监督实行。设置各种必要的组织，如抗战室、俱乐部、晚会等等，发展官兵中的正当娱乐与体育运动，发展士兵文化识字运动，保证部队的给养，由士兵自己选举伙食委员会，注意改善伙食。民众的一切慰劳品，主要的应尽量分给下级官佐与士兵，并应使慰劳的民众亲密地接近士兵。只有这样，才能使官兵生活愉快与兴奋。如果政治机关的政治工作不能和改善士兵生活与待遇密切联系起来，政治工作就成为“卖狗皮膏药”。

(三)建立革命军队自觉的革命军风纪。民族革命军队的军风纪的建立,部队的巩固,是建筑在政治的民族的觉悟上的,而不是依靠皮鞭、军棍、打骂及肉刑的。军队与人民的团结是建筑在每个官兵自觉地爱护民众、保护民众利益上的,而不是依靠压迫、摧残、强迫、命令所能成功的。对于犯错误犯纪律的分子,主要是要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执行纪律条令。因此,只有充分的政治教育,官兵间互相的了解与信任,军民间互相爱护,才有革命军队的自觉纪律。政治机关的政治工作,必须从加强政治教育与改善士兵待遇中,来建立革命的军风纪。

(四)保障军事指挥员在军事行政上命令的贯彻执行。军事指挥员为着抗日的民族利益、为着发挥部队作用和巩固部队组织的一切命令,政治机关应经过政治工作,依靠下级官兵的高度民族觉悟与自觉的军风纪来贯彻执行,并向一切违犯命令的倾向作严肃的斗争,来教育全体官兵。

(五)全体政治工作人员以身作则的模范作用。政治工作人员本身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能够做全体官兵的模范,忠实于革命主义,以百折不挠的意志,艰苦耐劳的作风,去影响全体官兵;以谦逊和睦的态度,耐心说服的精神,去团结全体官兵。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政治工作的威信,推动政治工作的前进,发展政治工作的效果。一切高傲的出风头的空谈的恶习,以至贪污腐化的生活,必须克服与排除。

对地方居民的政治工作,目前迫切需要的是:

(一)保护人民的利益,使军民打成一片。军队所到之地,必须禁止拉伕拉车和征粮征草。买卖要公平,不扰民,不害民。

在军事上必须人民帮助时，要召集民众的真正代表会议，说服人民，鼓动人民，使人民自愿地帮助军队。

革命军队所经之地，不仅要保障自己不扰民，不害民，而且还要为民除害。军队政治机关必须坚决站在保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上，为人民解除痛苦。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从自己的实际生活中认识军队是人民自己的军队，是为民族利益而战的军队，军民才能坚固地联结起来。

(二)组织人民，武装人民。抗战军队所经之地，政治机关必须给人民自主权利，宣传与动员人民，帮助与领导人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使各界各业人民都自动地组织抗日救国的团体，组织抗日的武装，一切不适合于动员广大人民参战的、限制人民行动的旧有组织，应给以改造，充实其民众基础，发挥民众的作用。只有这样，抗日的军队才能取得千千万万的民众力量的配合，抗战军队的一切需要与补充才能依靠人民的力量来解决。

(三)发动人民肃清汉奸。日本特务机关散布全国，汉奸到处横行。抗日军队为着巩固自己作战的战场与后方，为着提高军队与人民的政治警觉性，政治机关必须注意动员人民，配合人民进行锄奸运动。对日寇、汉奸的仁慈，即是对民族的犯罪。培养军民的力量，用坚决的手段，扑灭间谍、奸细的活动，是政治机关保障抗战的主要工作之一。

对敌军的工作，也应当进行：

(一)经常地对敌军宣传煽动，抓住敌军中每一个可能利用的机会，使敌军瓦解和涣散，因而减弱敌人的战斗力量。

(二)在火线上，即在战斗中，也要进行对敌军的喊话或散

放传单,使敌军动摇。

(三)应当极力禁止虐待俘虏,经过优待、教育、解释后,立即把他们放回去。

三 政治工作的组织与方法

要进行革命的政治工作,获得政治工作的完满效果,必须建立严格的政治工作制度与健全的政治工作组织。这里,首先就应排除一切忽视政治工作,把政治机关看成点缀品装门面的错误观念。

政治工作,必须在军队的各级,从最高的全国的总政治部直到连队的政治指导员,建立其独立的组织系统。除各级部队的指挥员可指导同级的政治工作机关外,下级政治机关必须服从上级政治机关的指挥。政治机关对同级指挥官的指导有异议时,有向其上级机关申诉之权。各级军事长官必须给同级政治机关实施政治工作的一切便利,而不应予以干涉与阻碍。各级政治机关的官长,对其同级及下级官佐违反革命主义、革命政纲与革命纪律的行动,有向上级政治机关弹劾之权。只有这样,才能使政治机关有达到其政治工作目的与任务的保障。

正因为政治工作人员有这样严重的责任与不能逃避的负担,所以对于政治工作人员的选择与培养必须慎重。必须集中全国优秀的政治工作人材,必须不断地培养全国前进的青年干部,分到全国军队的政治工作的组织中去,才能保障政治工作任务的完成。一切对人员安排位置滥竽充数的观念,都是危

害政治工作的。

正因为政治工作机关与人员负有如此重大的责任，所以必须注意实施政治工作的方法。要根据每一部队的历史、组织、习惯、组成成份、官兵关系等等不同的情况，要根据各地的社会、经济、政治、人民等等不同的复杂条件，采取灵活的方式去进行，不要造成军事与政治对立，不要造成格格不入的现象，不要脱离军民。要以耐心说服诱导的精神，争取官兵和人民的信仰，团结他们在革命主义与政纲的领导下而坚决奋斗。

全国一切抗战的武装队伍，迫切需要以最大决心迅速实行革命的政治工作，才能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对于这一紧迫的重大问题，特将此刍议提在全国各军队之前。

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

(一九三九年三月)

一 目前的形势与新四军的环境

今天,抗战正向新的阶段过渡,敌方、我方、国际三个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

一、敌人的政策明显地表示了三个特点:

(1)认定扫荡敌后方是它的中心。不论军事政治文化经济各方面,特别是军事的行动,都把主要的力量放在敌后方,所以四个月来敌人没有进攻与深入内地的形势。

(2)实行政治为主、军事配合的政策。敌人要拿这个政策来利用我沦陷区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

(3)无论如何还是继续战争的局面。不是以政治为主了,战争就可以停止。除非是中国胜利或者是中国屈服,战争决不会停止,敌人也不会因扫荡后方就停止进攻。

二、我方的政策已转到要重视敌人后方。在新阶段中,我们抗战的中心放在敌后,在敌人占领地区开展游击战,实施新的施政纲领,整理地方武装,跟敌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军

* 这是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事上争胜负。我党总结了一年抗战的经验，在六中全会⁽¹²⁴⁾决议案中讨论了敌后工作问题。在武汉危急时，我们强调了全国军民和各党派应重视敌后工作。在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占优势的地方，欢迎各抗日党派共同到敌后去工作。

三、国际上也是极注意中国问题的：

(1) 非常注意敌人占领地区的情况和敌人在占领地区的政策。

(2) 非常注意游击战争的发展。

(3) 非常注意中国共产党在游击区的政权。都想看一看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在游击区能不能坚持到最后的胜利，看一看中国共产党所实施的政策是否侵犯各国的利益，看一看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在游击区是否能真正破坏敌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实施，还要看这些军队能不能壮大起来成为正规军与敌人进行更大的胜利的战斗。

根据敌人、我们、国际三方面的情况可以看出，今天新阶段的中心问题是在敌人占领区，在中国的东部，在黄河以东、平汉路粤汉路以东的广大地区。不仅仅是因为中国东部被敌人占领了，而且更主要的是，这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地区，是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经济发达、文化程度高的财富地区。整个的中国东部，代表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最有力的地区。中国的西部当然不如东部，尽管西北、西南可以成为我们的大后方，但是，假如中国东部完全被敌人统治，我们的西部就要一天一天地贫弱危困起来，困难就要无形地加深，而敌人就能够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克服自己的困难。我们要认识这个环境，这就是新四军的环境。新四军就处在敌人占领的中国东部。新

四军今天所处的客观环境恰恰使得新四军的地位更加提高，落在新四军肩上的任务也就更加重要。

二 新四军的发展与困难的克服

正是因为这样的形势和环境，所以我们新四军是有发展前途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一、我们愈向敌人的后方，愈能够得到发展的机会。

二、愈在困难的条件下，愈能够显出我们的特长，愈能够锻炼我们。我们不求在安逸的地区发展。因为安逸的地区谁也要来，谁也能够存在。我们主要地向困难的地区发展。因为困难危险，国民党的许多部队和工作人员克服不了，忍耐不了。而我们新四军能吃苦耐劳，不怕困难。

三、愈深入到民众中间，愈能够创造根据地。我们如果打算把新四军所在的地方建立成根据地，就要依靠这个地方的广大群众，深入到群众中去。深入群众才能够保障我们的发展。

四、愈复杂，愈能够使我们的统一战线发展。中国统一战线的特点就是复杂。只有在复杂的情形下，我们才能够造成民族统一战线的模范区域。

五、愈有竞赛，愈能够使我们本身进步。国民党五中全会提出了彼此竞赛，我想江南江北地区特别是江南地方政府、民众团体各方面同我们竞赛，更能够锻炼我们，使我们进步。

六、愈坚持，愈能够影响全国全世界。我们要坚持游击战争，创造大江南北的根据地，给敌人看，给全国全世界看：我们

绝不退后，绝不逃避。在这样困难的地区，我们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就用事实证明游击战争在中国的自卫抗战中是能够发展的。

虽然我们有发展的有利条件，但困难还是存在的：

一、敌人的政策和他的军事技术在不断变化。我们绝不要满足于现在能够克服敌人的进攻。敌人遭到挫折就会改变，他们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在研究新的政策。所以，虽然今天的困难我们能够克服，还有明天的困难需要我们研究怎样克服。

二、我们活动的地区是有限的。大江南北和华北的情形不同，北方是一个广大的地区，而大江南北敌人所占有的地区是有限的。而且敌人要加紧造成电线公路网，在北岸要造铁路，以缩小我们的活动范围。

三、地形交通条件不利。

四、江南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不十分有利。

五、我们的力量还小。虽然一年的战斗锻炼了我们，坚强了我们，我们还是游击队。

六、友党友军不会放弃江南，这个重要地区是他们誓死必争的。

这些困难我们如何来克服呢？

一、要坚持游击战争。拿战争的胜利来克服困难。只有我们胜利的扩大，胜利的增加，才会使友党友军重视我们，使敌人畏惧我们，使国际友邦尊重我们。

二、要坚持统一战线。拿统一战线的发展来击退敌人的一切造谣中伤，团结我们周围的友党、友军、地方政府和广大民

众,造成有利的工作环境。

三、要坚持强大自己。要使我们的部队发展,使我们的地位提高,使我们的力量增强,这样才便于我们在大江南北进行工作。

四、要坚持深入群众。要使大江南北广大群众知道我们是为人民谋利益,为民族谋解放的,环绕在我们周围。由劳苦群众以至上层分子,只要不当汉奸,都是我们要团结的。我们要到群众中间去埋头苦干,扩大我们的影响。

五、要坚持帮助友党友军。我们采取帮助的方法,影响的方法,使友党友军感到我们是合作的朋友。

这些就是我们克服困难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方针。只要坚持这样的方针,我们就能够基本上克服困难。至于克服困难的具体办法,那全靠我们各级领导同志的实际运用。

三 新四军的战略、方针和任务

讲四个问题:

一、发展的方向。

我们在江南敌后地区确定发展的方向,有三个原则:

(1)那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那个地方发展。

(2)那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

(3)那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那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磨擦,利于抗战。

根据过去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我们认为,现在在跟民族

敌人作斗争的时候,大江南北游击根据地的创造是完全可能的。尽管敌人封锁严密,只要我们能够深入广大的群众,善于进行游击战争,我们就不会让敌人完全占领这个地区。

二、作战的方针。

根据全国在新阶段的任务,根据新四军所处地区的情况,游击战仍然是我们新四军主要的作战方针。我们要适合所处地区的特点,对游击战术有新的发展,新的研究,新的发扬。我们的游击战术应不同于华北,也不能只运用过去三年游击战的经验,应该更加灵活,更加机动,更加出没无常,更加变化无穷。

三、建军工作。

以强大为原则,也就是说,第一要精,第二要发展。我们不能忽略精的方面,因为我们的扩充是有限制的。我们要使一个人有十个人的用处,一个干部当一百个干部用。我们走向正规军不能采取跳跃的方式,不是一下子可以成功的。干部在我们成为强大的新四军上有决定的意义。干部健全才能使工作发展。在这一方面,新四军要用很大的力量,因为现在干部的水平在军事上文化上技术上政治上都是不够的,要很好地培养和教育。

战斗动作的教育很重要,特别是夜战、白刃战。要学习跳跃、游泳,这是打游击战特别要学会的,比如攻据点时跳铁丝网,携枪游泳袭击敌人。将来我们要在长江上打击敌人,破坏敌人的运输,发扬水上游击队的特长对我们游击队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爆炸的方法也要研究。还要学习爬城,这也是我们必须掌握的基本动作。在游击战中我们要把体育运动提倡

起来。

我们要以政治工作保证建军工作的完成，巩固党在新四军的领导，保持并发扬我们的优良传统。

四、对敌人的政治经济斗争。

过去我们的中心任务，是争取游击队胜利地集中，迅速开赴前线，转入敌人后方作战。我们完成了这个任务。现在我们要与敌人进行艰苦的政治经济斗争。敌人实行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开发占领区资源的政策，针对这个情况，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

(1) 尽量摧毁敌伪政权。能够破坏的应该去破坏它，能够推翻的应该去推翻它。

(2) 保障恢复我抗日政权。在敌后，应该尽量帮助地方，配合地方自卫武装，恢复和保护抗日政权，并帮助地方群众团体进行工作。

(3) 用一切方法动摇敌军军心，使他们部队里面反战情绪高涨，不愿意打仗，到最后五分钟不拚命。

(4) 瓦解伪军。敌人从本国抽调部队到中国来是非常困难的，主要的是利用伪军，以华制华，来弥补他兵力不足的缺陷。因此，我们应该把瓦解伪军的工作放在很重要的地位，不仅在军事上消灭他，而且在政治上瓦解他，使敌人不敢运用伪军。

(5) 利用维持会、伪军等做内线，为我们侦察敌情，通报消息，将来时机成熟可以里应外合。

(6) 彻底破坏敌人的交通要道。这不仅有军事上的作用，而且有政治经济上的作用。

(7) 爆炸敌人的矿山、工厂。

(8) 封锁敌人的商业。

(9) 敌人发行的伪币, 我们的地区不能使用。

(10) 研究在游击战中怎样加强我们自己的经济力量, 譬如江南有许多棉花, 应研究怎样自纺自织, 供给自己的需要。

(11) 组织民众, 训练民众, 尽一切可能的力量提高民众的文化程度、政治认识, 使他们的政治军事文化水平一天天地提高起来, 加强地方自治的能力。

(12) 发展地方自卫武装, 由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进而发展到游击队。

(13) 争取青帮、大刀会^[125]的群众。我们应研究这些组织, 进行政治工作, 争取他们。

(14) 适当地改善民生。凡是跑到敌人那方面去的地主, 不可以回来收租。

(15) 坚决肃清汉奸。在伪军伪政府中是有两面派的, 我们做这个工作的时候, 要注意策略。

(16) 加强宣传工作。对我们的胜利消息应该尽量地宣传, 对敌人的欺骗宣传应该不放松地驳斥。敌人贴了一个布告, 我们也应该贴一个布告, 揭穿敌人的欺骗。这项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决不要迟疑。我们政治部以后应该听敌人的广播, 好来研究对策。

(17) 在大城市中建立秘密的工作。

我只能提出这些大纲, 请大家来研究讨论。在跟敌人作政治经济斗争中, 有这许多工作要我们做, 这方面的工作很重要, 不亚于拿刀枪跟敌人斗争。我所说的是很浅薄的, 仅仅是

过去的一点经验和现在的一些问题。希望我们新四军的政治工作人员来共同努力,提出更多的具体材料和具体办法,表示出我们新四军不仅有模范的游击战争,而且在游击战争中有模范的政治工作,模范的和敌人作政治经济斗争的成绩。

建设坚强的战斗的 西南党组织*

(一九四二年一月)

目前的政治形势要求我们沉机观变,把西南的党建设成为更加坚强更能战斗的党,以实现中央给我们规定的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

建设坚强的战斗的党组织的条件是:

一、要使五千党员成为隐蔽的、坚强得力的、与群众有联系并善于影响和推动群众的干部。

二、要在主要的群众集聚的单位(工厂、学校、农村、大机关等)建立起巩固的一个乃至数个平行的支部。要在主要的工作部门和机关(如行政机关、团体、公司、交通经济部门等)保有我党的组织或个人的联系。

三、要使党的领导机关有独立领导的能力和自信。不要怕犯错误,要能认识和改正错误。要善于估计情况,运用策略,创造各种各样的工作方法,使党的方针能在每一项实际工作(组织的改编,干部和党员的审查、反奸细的斗争、秘密工作的教

*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二年一月间,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召开会议,总结两年来的工作。周恩来同志在会议最后发了言,这是发言中关于西南党组织的任务部分。

育等)中体现出来。

四、要在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党,使西南党成为真正的彻底的地下党,成为群众的党。

五、要熟悉各主要方面的情况,特别是其历史、政策、人物和活动,首先要知道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当局的、特别是各特务机关的经常情况和紧急措施。

六、要做到凡有群众的地方一定要进去工作。这种工作是以社会的方式进行的。首先要解决的便是进入国民党、三青团、工人团体、学校中的合法组织、农村中的合作社以及一切重要行政机关中去工作,去实现党的抗战、民主、进步的方针。

七、要善于使上层工作和下层工作相配合,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配合,公开宣传和秘密宣传相配合,党外的联系和党内的联系相配合。但配合不是暴露。

这七点都做到了,我们西南党组织就是一个坚强的战斗的党组织,时机一到,立即可以起来战斗。

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 党对国民党的关系*

(一九四三年春)

国共合作后,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重新走向革命,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他在一九二四年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接受了我们党起草的宣言,使三民主义成为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当时,国民党⁽²⁾不但思想上依靠我们,复活和发展他的三民主义,而且组织上也依靠我们,在各省普遍建立党部,发展组织。国民党和他的三民主义,靠着我们才得以把影响扩大到广大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去。国民党改组后,由于我们党的努力,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在全国大大发展起来。各省国民党的组织,也由于我们同志的努力而建立和发展起来。当时各省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我们的同志,如湖北的董必武⁽¹²⁶⁾、陈潭秋同志⁽¹²⁷⁾,湖南的何叔衡⁽¹²⁸⁾、夏曦同志⁽¹²⁹⁾,浙江的宣中华同志⁽¹³⁰⁾,江苏的侯绍裘同志⁽¹³¹⁾,北方的李大钊同志⁽¹³²⁾、于树德⁽¹³³⁾(那时是共产党员)和李永声⁽¹³⁴⁾、于方舟同志⁽¹³⁵⁾等。是我们党把革命青年吸引到国民党中,是我们党使国民党与工

* 这是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学习会上所做的报告。

农发生关系。国民党左派在各地的国民党组织中都占优势。国民党组织得到最大发展的地方，就是左派最占优势的地方，也是共产党员最多的地方。孙中山先生北上⁽¹³⁶⁾的时候，我们党在全国组织了各界的召集国民会议运动⁽¹³⁷⁾，各地纷纷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和妇女界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因为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宣言中没有明确说应有妇女参加）。这样，孙中山北上才有了群众作后盾，他和国民党的影响才得以更广泛地扩大到北方。

在当时形势下，国民党在组织上自然而然地形成各种派别，对三民主义也自然而然地作各种解释。国民党改组时，反对改组最坚决的是广东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冯自由、谢持⁽¹³⁸⁾这些人。当时，这些人被孙中山痛骂过，并被开除了党籍。改组首先受到他们的反对与破坏是不奇怪的，因为广东是英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革命在广东的发展，锋芒必然朝向英帝国主义，也就必然侵犯依赖英帝国主义为生的广东买办资产阶级。冯自由等在广东革命势力向上发展时，首先分裂出去，充分地说明了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地域性。孙中山去世以后，公开起来反对国民党革命的，是西山会议派⁽¹³⁹⁾。他们公开分裂出去，成立独立的组织。他们大骂广东的国民党，大骂国民党左派的廖仲恺先生，大骂广东被赤化了，但一般地不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右派在香港办报纸，公开活动，对广东国民党进行分化工作。他们的策略是打击廖仲恺，拉拢蒋介石。他们对蒋介石是看对了的。这些右派一直到一九二五年全国革命风起云涌地起来以后，始终是反对革命的。右派中最危险的一个家伙是戴季陶⁽⁵⁵⁾。他虽然也在孙中山的遗嘱上签了字，表面上

不赞成西山会议派的分裂，也说要维持国民党的统一，但他采用的是打入广东国民党从内部来分裂国民党的阴谋。他从思想上大大发展了孙中山的消极方面，写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完全抽去了孙中山学说中的一切革命的东西。他大讲道统，说孙中山的道统是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他见着人就痛哭流涕地大讲其“孙文主义”，从上海讲到广东，又从广东讲到上海。他到黄埔军官学校⁽¹¹⁸⁾讲演，进行分化工作。在他讲演以后不久，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黄埔军校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¹⁴⁰⁾，这是右派的组织。另一个右派头子是孙科⁽¹⁴¹⁾。他是资产阶级两面派，表面上有时赞成革命，实际上反对革命。抗日战争期间，他还是耍两面派，有时主张民主，实际上他的民主是国民党“五五宪草”⁽¹⁴²⁾式的民主。国民党中派表面上与我们合作，赞成革命，但并不是真心和我们合作，而是随时提防和限制共产党的，其代表人物就是蒋介石。蒋介石实际上是是与右派合作的，是右派势力的保护者和组织者。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在一个短时期内，他算是国民党的中派，但后来便成了公开的右派。

筹办黄埔军官学校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九二三年以前，孙中山部下比较带有一点革命性的部队，是李济深⁽¹⁴³⁾的第一师。这是邓铿⁽¹⁴⁴⁾系统的部队，大革命时代的张发奎⁽¹⁴⁵⁾、叶挺⁽³⁶⁹⁾、邓演达⁽¹⁴⁶⁾以至陈诚⁽⁸²⁾，都出自这个师。开办黄埔军校应该说是孙中山军事上失败的结果。辛亥革命⁽¹⁴⁷⁾时，孙中山有两个运动，一个是新军运动，另一个是会党运动⁽¹⁴⁸⁾。辛亥革命以后，他的活动渐渐变成了拉拢军阀，结果是不断遭到失

败。这就教训了孙中山，所以他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懂得了建立革命军队的重要，接受了苏联顾问的建议，一九二三年决策，一九二四年正式开办黄埔军校，并决定由蒋介石当校长。

蒋介石为什么能接近孙中山以至于当了黄埔军校校长呢？蒋与孙的接近首先是因为陈其美⁽¹⁴⁹⁾的关系。陈其美从事政治活动以后，始终追随孙中山。例如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¹⁵⁰⁾，要求参加者在誓词上打手印，许多士家出身的如胡汉民⁽⁵⁴⁾、汪精卫⁽¹¹¹⁾等都不干，黄克强⁽¹⁵¹⁾则更是反对，而陈其美却第一个宣了誓，打了手印。因此陈在当时得到孙中山的信任。蒋介石是陈其美的徒弟之一，因而得与孙中山接近。其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永丰舰⁽¹⁵²⁾的事情上蒋介石投了一个机。一九二二年陈炯明炮轰总统府⁽¹⁵³⁾，赶走了孙中山。孙中山在永丰舰上与陈炯明相持了五十多天。当时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做生意失败了，看到这个机可投，特意从上海跑到永丰舰，表示誓与孙中山共存亡。从此蒋介石与孙中山比较密切起来。一直到现在，蒋介石还常以这件事作为他是孙总理忠实信徒的资本，把他与孙中山在永丰舰上的相处，作为他为孙总理赴难的证据。孙中山和苏联建立关系后，因为邓铿等离不开广东，就派蒋介石到苏联去参观，后来叫他当黄埔军校校长。

蒋介石开始办黄埔军校时，表面上赞成革命，但他的思想实际上是反共反苏的，并不是真心诚意地与共产党合作。有一次苏联顾问为革命说了几句话，他就不高兴，拂袖跑到上海去了。当时黄埔军校有六百学生，大部分是我党从各省秘密活动

来的左倾青年，其中党团员五六十人，占学生的十分之一。蒋介石对这些人提防、限制的。他的军阀思想在那时也是发展的。他让最为人所不齿的王柏龄⁽¹⁵⁴⁾负责训育。他所能用的就是奴才。对有些骨气不愿做奴才的邓演达，他就容不下；对经王柏龄介绍的何应钦，这第二个奴才，他却非常相信。黄埔军校内的队长都是他的私人。有一次我派了几个左派的人当队长，他就大为不满，撤销任命。他用人的方法是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操纵矛盾，拿一个反动的看住一个进步的，叫一个反左派的牵制一个左派的，用反共的牵制相信共产主义的。例如第一师师长是何应钦，党代表就可用我周恩来。第二师师长王懋功⁽¹⁵⁵⁾因接近汪精卫而成为当时的左派，我推荐我党的鲁易同志⁽¹⁵⁶⁾去当党代表，他就无论如何也不干，用了右派的人。第三师师长谭曙卿是右派，他就用鲁易同志为党代表。第一次东征以前，一九二五年二月，黄埔军校成立了青年军人联合会⁽¹⁵⁷⁾，他接着就在四月，在戴季陶的分裂阴谋下，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以相牵制。

当时广东的国民党内，中派是少数，左派占极大多数。廖仲恺是国民党的左派。因为他是华侨出身，与国内的买办阶级、地主阶级关系较少，所以更多地带着民族资产阶级进步派的倾向。在广州商团事件⁽¹⁵⁸⁾上，他开始就是主张坚决镇压的。省港罢工⁽¹⁵⁹⁾以后，他是同情工人，站在工人方面的。当时农民运动在广东有发展，他也是和我们站在一起赞助和推动农民运动的。虽然他在政治斗争中有其动摇性，对工人、农民和我党的力量有所畏惧，但他晚年的政治生活是光荣的。他尊重苏联顾问的意见，但他有自己的立场，有自己独立的见

解。他是资产阶级左派的坚强的代表。汪精卫是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的代表。当他还革命时，他会把苏联顾问和我们党的意见加以发挥，会做一个很好的留声机。胡汉民从思想上说是右派，虽然有时也可以同左派妥协，但有他地主阶级的独立的立场。因此商团事变时，他是最主张妥协的；而暗杀廖仲恺⁽⁴⁾，他是知情的。谭延闿⁽¹⁶⁰⁾实际上也是右派，但在利害关系上，由于蒋介石的军事力量日渐扩张，他想发展自己的实力，所以在行动上有时与左派靠近。朱培德⁽¹⁶¹⁾有时靠近汪精卫，有时靠近蒋介石。程潜⁽¹⁶²⁾也是因为要想扩大自己的军队而靠近汪精卫。但这些人总是害怕民众。他们在广东之所以还没有公开反对民众，是因为民众运动在广东的发展还没有直接侵害到他们本身的利益。一旦民众运动在他们的家乡湖南、湖北、江西发展起来，他们反对民众的面目便马上暴露了。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³⁾以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在全国得到空前的大发展，规模之大是过去所从来没有的。从这个运动中，能看到革命的发展是走向农民的革命战争，能看到革命发展这个全局的，在我们党内的代表是毛泽东同志。他接办农民运动讲习所⁽¹⁶³⁾，进行农民土地问题的调查研究，出了二十几种小册子。历届讲习所的学生后来分散到湖南、湖北和其他各地，发动了广大的农民运动。

对于革命在这一年中的大发展，国民党中派是非常恐惧的。第一次东征⁽¹¹⁹⁾回来，镇压了刘震寰、杨希闵的叛乱⁽¹²⁰⁾，在沙基惨案⁽¹⁶⁴⁾中，我们已看到蒋介石动摇，畏惧帝国主义。一九二五年六月，国民党中央党部通知黄埔军校参加广州的游行

示威。我从军队中抽出两个营，学校里抽出一个营去参加。蒋介石后来知道了，非常不满意，认为不应当游行示威。廖仲恺去世以后，他赶走了胡汉民、许崇智⁽¹⁶⁵⁾，表面上是反对右派，表示革命，实际上他是为了夺取个人权力。因为胡汉民是代帅，许崇智是军界前辈，他们在，蒋介石无从提高自己在军队与政权中的地位。一九二五年十月第二次东征⁽¹¹⁹⁾时，海陆丰一带的农民运动在彭湃同志⁽²⁵⁾领导下，已有很大发展，农民自卫军在军队到来以前已经占领了县城，选举了彭湃同志的哥哥当县长⁽¹⁶⁶⁾。蒋介石去后成了客人，这自然不能不引起蒋介石对民众运动的畏惧。特别是当时在黄埔军校内部，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发展大大超过孙文主义学会；军队中三个师的党代表，我们党占两个，九个团的党代表，我们占七个，在连、排、班以及士兵中有了我们党的组织；各军又成立了政治部。在革命力量的发展面前，蒋介石更加动摇起来，企图加以限制。所以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东征途中，他召集了连以上的军政人员联席会，会上公开表示他的黄埔军校不可分裂，要求把所有在黄埔军校以及在军队中的共产党员的名字都告诉他，所有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名字也都要告诉他。当时我以此事关系两党，须请示中央才能决定，搪塞过去了。后来他同我个别谈话中进一步提出，为了保证黄埔军校的统一，共产党员或者退出共产党，或者退出黄埔军校与国民党，并假惺惺地表示后者是他所不愿意的。

这时正是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我从汕头回广州，和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同志⁽¹⁶⁷⁾、苏联派到广东的国民党和政府的顾问鲍罗廷⁽¹⁶⁸⁾商量。当时，我们本来确定的政策

是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我们计划在大会上公开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在中央执委中我们党员占三分之一，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的优势。在军队方面，当时的实际情况，蒋介石的第一军只有三个师，第一师是何应钦，第二师王懋功接近当时国民党左派的汪精卫。除第一军以外都不是蒋介石的。因此计划给蒋介石以回击，把我们的党员完全从蒋介石部下撤出，另外与汪精卫成立国共两党合作的军队。我带着这个意见回汕头去，并等待中央回电到后，立即正式向蒋介石提出。当时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左派占了绝对优势，实现上述计划是完全有保证的。等了好久，中央来电不同意。更可惜的是中央居然在上海与戴季陶大开谈判，请戴季陶等回粤；为了争取右派回粤，还特地拍电报到广州把大会延期一个月，等候他们，对右派采取完全让步的政策。孙科于是代表右派回到广东，把蒋介石的腰撑起来了。中央则派张国焘⁽¹⁶⁹⁾做这次大会的党团书记，说我们过去把左派包办了，以后应独立形成共产派，使共产派与左派分开，让左派独立起来。在选举上，向右派作了极大的让步。结果，三十六个执委中，共产党只有七个，比我们原来计划的少了将近一半。国民党左派连朱培德、谭延闿等算在内一共才十四人；右派、中派却有十五人。右派孙科、戴季陶、胡汉民、伍朝枢、萧佛成等都当选了。在监委中，右派更是占了绝对优势。国民党的中央执委、监委是常常合在一起开会的，所以结果成了右派势力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这是陈独秀⁽¹⁷⁰⁾右倾机会主义对国民党右派、中派的第一次大让步。这是政治上的大让步。

这次大会后，在实际行动上也是孤立了左派。大会完了，鲍罗廷回国去了，苏联军事顾问加伦⁽¹⁷¹⁾到冯玉祥⁽⁷⁵⁾那里去了，执委中的党员大部分都走了，以至汪精卫问我们还帮不帮助他。正在这时，陈独秀因病躺起来，总书记“失踪”，中央无主，陈延年同志又到上海去开紧急会议了。另一方面，右派却纷纷回粤，张静江⁽¹⁷²⁾、陈立夫都于一九二六年一二月回到广州，同蒋介石进行勾结，挑拨国共关系。这就是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的远因，也是三月二十日事变以前的政治形势。

至于三月二十日事变，则完全是蒋介石制造的。二月五日，蒋介石把王懋功赶走，向汪精卫做了第一次示威。他打电报要我回广州。我因为看到他与右派来往密切，并且察觉他的神色不对，报告了张太雷同志⁽¹⁷³⁾。当时的苏联顾问不重视这事，把一个大问题当做小问题，儿戏对之。陈延年同志因三月二十日前一二天从上海才回到广州，方针上也掌握得不大稳。

李之龙同志当时是中山舰的舰长。他抓住了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走私的事，报告汪精卫。陈肇英是蒋介石的人，自然向蒋介石报告。于是蒋介石在右派的支持下，乘机发动了三月二十日事变，造谣说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军校，共产党要赶走蒋介石。他逮捕李之龙，下令黄埔戒严，监视各师党代表，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解除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把我也软禁了一天。蒋介石与右派勾结，打击汪精卫，向共产党进攻，向革命示威。这时谭延闿、程潜、李济深都对蒋介石不满，朱培德、李福林⁽¹⁷⁴⁾有些动摇，但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如果这时党中央的政策是给蒋介石以有力的回击，毫无问

题,事情是有办法的。但当时却采取了继续退让的政策,不了解蒋介石这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他是不敢分裂的,却以为蒋介石是要分裂,就向蒋介石说这是误会。蒋介石于是乘机立刻放了人,表示误会。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向蒋介石的大让步。这是军事上的大让步。

为了解释“误会”,在汪精卫床前开了一个一点钟的政治委员会。汪精卫、谭延闿、苏联顾问都客气地表示了歉意,而蒋介石倒反而一句话都没说,精神上占了优势,政治上得到极大成功。从此以后汪精卫“失踪”了,国民党左派束手无策。蒋介石向革命进攻,我们没有给他有力的回击,蒋介石的地位更加巩固了,于是他回过头来又打击右派,逮捕了欧阳格⁽¹⁷⁵⁾,不用陈肇英,不理古应芬⁽¹⁷⁶⁾、伍朝枢。胡汉民在三月二十日事变后,回到广东想进行活动,这时又不得不再度离粤,恰好与“失踪”的汪精卫同船到港。蒋介石打击左派以取得右派的支持,又打击右派以表示革命,这就是他的流氓手段阴险刻毒的地方。从此以后,蒋介石实际上成了国民党的右派。这个时候,他乘机把广东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解散了,并压迫我们的党员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以及黄埔军校撤出。我们已经暴露了的党员退出国民党和第一师的有二百五十多人,其中有蒋介石最得意的学生蒋先云同志⁽¹⁷⁷⁾,他第一个声明退出国民党。只有三十九个人退出共产党,其中第一个就是李默庵⁽¹⁷⁸⁾。从此以后,第一军的元气完全丧失,战斗力一落千丈了。

蒋介石在陈独秀机会主义的让步下,巩固了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接着又从党务上对我们展开进攻,这就是五月十五

日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目的完全在压共产党。他们定了几条：

一、凡他党党员之加入国民党者，各该党应训令其党员明了国民党的基础为总理所创造之三民主义，对于总理及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及批评。

二、凡他党党员之加入国民党者，各该党应将其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名册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

三、凡他党党员之加入国民党者，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额数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三分之一。

四、凡他党党员之加入国民党者，不得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之部长。

五、凡属于国民党籍者，不许在党部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之党务集会。

六、凡属于国民党籍者，非得有最高级党部之许可，不得别有有政治关系之组织及行动。

七、对于加入国民党之他党党员，各该党所发之一切训令，应先交国民党、共产党联席会议通过，如有特别紧急事故，不及提出通过时，应将此项训令请联席会议追认。

八、国民党党员未准予脱党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如既脱离国民党党籍而加入他党者，不得再入国民党。

九、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立即取消其国民党籍，或依其所犯之程度，加以惩罚。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蒋介石这个进攻仍然是不难打垮的。当时他的兵力仍占少数，所有民众运动完

全在我们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下，他在这个时候是不敢决然分裂的。但党中央仍采取机会主义的政策，并且派了彭述之⁽¹⁷⁹⁾、张国焘来指导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在党团会上，讨论了接不接受整理党务案。彭述之引经据典地证明不能接受。问他不接受又怎么办？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说大家讨论好了。但当有人提出意见时，他又引经据典地说这个不行，那个错误。如此讨论了七天，毫无结果。后来张国焘用了非常不正派的办法要大家签字接受。这样，又作了第三次大让步。这是党务上的大让步。

右派的蒋介石占了极大的优势。他把张静江捧出来做中央执委会的主席，实际上这人是陈果夫⁽¹⁸⁰⁾的傀儡。蒋介石亲自做了组织部长，新设军人部长也是由他兼任。组织部实际上由陈立夫代理。原来我们好几个部长（宣传部长、农民部长等）的位置都让出来了。这样，右派在组织上占了极大的优势，我们在党务方面已毫无地位了。陈果夫、陈立夫便利用他们的地位，在各省发展右派。在北方以丁惟汾、王法勤的大同盟⁽¹⁸¹⁾为基础，收买西山会议派。从此各地方党部左派和右派的斗争也更激烈起来。

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党务上接连得到三次大胜利，但形势还不是不可挽回的。只要我们善于反击，蒋介石右派的力量还是可以压下去的。因为到这时为止，蒋介石的直系还只有六个师。总共八个军中，他只占一个军。第二军的党代表是李富春同志⁽¹⁸²⁾，第三军的党代表是朱克靖同志⁽¹⁸³⁾，第四军的党代表是罗汉⁽¹⁸⁴⁾（那时还是共产党员），第六军的党代表是林伯渠同志⁽¹⁸⁵⁾。但是，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领导，在北伐时继续犯了

极大的错误。

北伐⁽¹²¹⁾时,军事上是有绝对把握的。我们有精密的计划,加伦保证在双十节⁽¹⁸⁶⁾前打到武汉。出师以前加伦曾请我转问中央,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呢,还是削弱蒋介石,这一政治问题如何解决?我到上海请示中央。陈独秀说你们开个会商量商量好了(他这时之所以这样谦虚,是因为在北伐前,他在医院里毫无调查研究,不管政治形势有了什么样的变化,竟写了一篇反对北伐的文章,因此受到同志们的批评,也受到国民党的攻击)。开会时,又是张国焘代理主席,也没有真正讨论,只由他说了两句话,说北伐中我们的方针就是: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所以在北伐战争中,一直到国民党三中全会前,对蒋介石的方针是不明确的,结果就是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而助成了蒋介石地位的提高。然而他的嫡系力量在战斗中是受挫的,第一军与第十七师首败于牛行,王柏龄率部队进攻南昌时全军覆没,王柏龄、缪斌⁽¹⁸⁷⁾等被俘虏。这时蒋介石是惨败的。但机会主义者的陈独秀,并没有认识这些事实,并没有终止他的错误。

我的修养要则^{*}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八日)

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

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

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

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

五、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

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

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

* 本文是在重庆红岩整风学习时写的。

致柯棣华大夫⁽¹⁸⁸⁾家属的慰问信*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亲爱的朋友：

我谨代表第十八集团军和中国共产党，为柯棣华大夫的逝世，向你们致最深挚的悲悼。柯大夫曾予华北敌后五台区最需帮助的军民以无可比拟的贡献。

柯棣华大夫系于一九三八年受印度国民大会之命，参加其所派遣的印度医疗队，去到延安，于一九三九年进入华北游击区。他在华北曾经过许多地方，最后定居于五台区，成为故白求恩大夫事业的承继者，担任国际和平医院院长，直到逝世。他的中国同志都爱他，尊敬他。为了在抗日游击根据地中之最高贵的任务，为了给伤病战士以兄弟般的友爱，他曾救活了许多抵抗日寇侵入自己祖国的战士的生命，还帮助了許多人免于残废。我们受惠于他的极多，使我们永不能忘。

柯大夫曾是中印两大民族友爱的象征，是印度人民积极参加反对日本黷武主义和世界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战斗的模范。他的名字将永存于他所服务终生的两大民族之间。

* 本文刊载于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二日重庆《新华日报》。

我们在全体爱自由的人类的共同损失中，分担你们的悲痛。

谨致热烈的敬礼！

周 恩 来

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一、领导者的定义。

一般干部都有做领导工作可能,而且多半已经做了领导工作。所以讲领导工作,是包含了上中下各级领导干部说的。

两岩⁽¹⁸⁹⁾的工作人员,是以工作为区别,而非以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来区别,更非以干部与非干部来区别。今天两岩、报馆有些同志虽未直接做领导工作,但实际上仍是领导干部。

二、领导者的立场。

党的立场就是领导干部的立场,但这样说太简单了,分开来具体说说,有下列几点:

- (一)要有确定的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
- (二)要有坚持原则精神。
- (三)要相信群众力量。
- (四)要有学习精神。
- (五)要有坚韧的奋斗精神。
- (六)要有高度的纪律性。

三、领导者与领导机关。

* 这是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为向干部做报告而写的提纲,原题为《领导与检查报告大纲》。

(一)集体领导与按级领导——领导的一元化,集中化与民主生活(讨论与分工)。

(二)个人负责制与个人领导——大后方环境更需要这一方式,但在集体领导下也并不取消这一方式。

(三)直接干涉与直接解决——这不是经常的办法,而是在特殊情况下的办法或是为了示范。

四、什么是正确领导?

我现在按照斯大林说过的三点⁽¹⁹⁰⁾来加以说明:

(一)必须正确地决定问题。首先,要估计环境及其变动,并找出此地此时的特点。次之,要依此与党的总任务联系起来,确定一时期的任务和方针。再次,要依此方针,规定当前适当的口号和策略。又次,然后据此定出合乎实际的计划和指示。这一切,必须经过最实际的调查研究,并使这些实际材料与党的原理原则联系起来。

(二)必须组织正确决定之执行。首先,要经过组织计划和指示的执行之讨论。次之,要慎选人材,负责计划之执行。再次,要组织斗争,来实现党的计划。又次,还要躬行实践,以为倡导。这样,就能从实践中证明党的路线和策略之是否正确和是否需要补充。

(三)必须组织对于执行这种决定的情形之审查。这种审查的方法:(1)不根据允诺,而看工作结果;(2)不根据室内纸上计划,而看实地情形是否做了或是否敷衍;(3)不看形式,而看内容和实际是否正确地执行或被曲解了;(4)不仅由上而下,还要由下而上地审查;(5)要有系统的经常的审查;(6)要有领导者自己参加。

这一切，正如斯大林所说，必须与群众取得联系，必须把领导者与群众两方面的经验综合起来。只有这样，领导才是正确的。

五、领导者的任务。

毛泽东同志说用人行政是领导者的任务，这是真理。分开来看，我以为：

(一)要求领导干部抓紧思想政治的领导。这就是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加强自己的政治锻炼。我们要求同志注意这样几件事：(1)注意大事；(2)提高政治警觉性；(3)提高理论水平；(4)加紧党内外思想斗争；(5)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和成绩。

(二)要求领导干部抓紧组织领导。有了政治路线，组织工作就决定一切。我们要求同志注意这样几件事：(1)要使组织领导提到政治领导的水平，这就是说，一切工作要提到原则的高度，要与政治任务联系起来；(2)要使一切组织和实际工作保证党的政治任务和工作计划的实现；(3)要注意日常党的领导，使党的组织接近于下层，工作更具体化；(4)要动员组织和群众，为克服工作中一切困难而斗争；(5)反对一切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如马虎主义，空谈家，妄自尊大者，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文牍主义，事务主义等）以及蜕化或腐化思想等等。

(三)慎重地挑选干部和分配工作。这也是组织工作之一，不过可以单独来说。挑选干部的标准，政治标准与工作能力，二者是缺一不可的，而政治上可以信任是先决问题。斯大林曾指出用人不依原则的危害于党。他指出这种人到什么地方，都

是“随员”一大批，专用所谓“自家人”⁽¹⁹¹⁾。毛泽东同志在整风报告中，也批评这种人的不老实，而过去“钦差大臣满天飞”就犯有这种毛病。有了政治信任，用得其当（适时适地适合条件）也很重要。

（四）审查工作。审查工作人员和工作计划之执行情形。审查的任务如斯大林所说，第一是认识人材的品质，第二是查明执行机关的优缺点，第三是查明工作计划或指示本身的优缺点⁽¹⁹²⁾。有人以为这样审查容易暴露自己弱点，有损领导威信，或动摇自己信心。这是不对的。领导威信不是从掩饰错误中而是从改正错误中提高起来的；不是从自吹自擂中而是从埋头苦干中培养起来的。工作信心，改正错误后只会增强，不会减弱。只有那种要虚荣爱面子的人才会怕揭发错误呢！

（五）面向群众。不仅要教育群众，还要向群众学习。因为领导者本身知识还不完全，经验还不够，领导地位并不能使你得到知识和经验，所以面向群众，汲取群众经验，十分必要。我们要求同志们：（1）与群众接近和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要与他们打成一片；（2）倾听群众意见；（3）向群众学习；（4）教育群众，不做群众的尾巴。

六、领导群众，结交朋友。

（一）领导党的方式和领导群众的方式是不同的，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

（二）领导群众的基本方法是说服，决不是命令；只有在多数已经同意而少数尚不同意的情形下，必要时可用多数的意见强制少数执行。

（三）领导群众和结交朋友，领导者自己要起模范作用。

(四)领导者在必要时应忘记他所受的侮辱。

(五)领导者切勿轻视自己的作用和影响,要戒慎恐惧地工作。

七、领导艺术。

列宁、斯大林论领导艺术,不可跑得太前,也不可落在运动后面,而应抓住中心一环,推向前进。

毛泽东同志论领导艺术,要照顾全局,照顾多数,以及和同盟者一道干。

八、工作方法。

(一)在斗争中审查理论原理和原则。

(二)从实际工作中规定和审查政策。

(三)要用革命的精神改造工作。

(四)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五)主要用说服的方法,不用行政的方法,只有在情况紧急时,才用命令的方式。

九、工作作风。

(一)列宁的工作作风是:俄国人的革命胆略;美国人的求实精神。

(二)毛泽东同志的工作作风是:中华民族的谦逊实际;中国农民的朴素勤勉;知识分子的好学深思;革命军人的机动沉着;布尔什维克的坚韧顽强。

(三)反对一切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在目前,特别应反对马虎主义,空谈主义,自大主义,形式主义,事务主义,以及破坏党和军队传统的现象。

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

(一九四三年八月二日)

同志们：感谢大家的欢迎。我这三年在外，做的事实在太多了。可是在这三年中间，国际的国内的变化，我们党内的进步，却特别的多，特别的大，我们在外边也看得格外分明。

在国际方面，我们从法兰西投降⁽¹⁹³⁾后欧陆所遭受的法西斯浩劫起，看到希特勒德国对于苏联所进行的背信弃义的疯狂进攻⁽¹⁹⁴⁾，一而再，再而三；看到太平洋上日本强盗对于英美所进行的闪击⁽¹⁹⁵⁾；看到全世界除苏联外都有法西斯第五纵队⁽¹⁹⁶⁾的猖獗活动。同时，我们看到苏联红军和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之下奋起抵抗希特勒进攻的英勇战绩和生产热忱；从列宁格勒、莫斯科保卫战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¹⁹⁷⁾，从两年的冬季反攻到今年的夏季反攻，获得了举世称赞的辉煌战绩。我们也看到同盟国抵抗法西斯侵略的阵线的形成和进步：从罗斯福、丘吉尔大西洋宪章⁽¹⁹⁸⁾的公布到苏英同盟、苏美协定的缔结⁽¹⁹⁹⁾，到二十六国公约在华盛顿的签字⁽²⁰⁰⁾；从英美盟军在北非的反攻和胜利直到西西里的登陆。我们又看到全世界反法西斯统治的斗争的兴起和扩大：从欧陆被侵占国中反法西斯

* 本文刊载于一九四三年八月六日延安《解放日报》。

游击战争的发展到德意国内反法西斯的罢工示威和游行的兴起；从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合作⁽²⁰¹⁾到“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的建立⁽²⁰²⁾；从美国、印度共产党合法地位的恢复或被承认到日本共产党领袖冈野进⁽²⁰³⁾同志的来延。三年来，同盟国反法西斯的解放战争是由危而安，转败为胜，由被动的作战转为主动的进攻。这种变化主要地倚靠于苏联红军和人民的两年抵抗和三次反攻，同时，也倚靠于英美同盟军在北非的胜利和在南太平洋的积极行动，倚靠于美国的巨大生产和盟国的战争动员，倚靠于中国抗战的坚持，尤其是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

现在，墨索里尼倒台了⁽²⁰⁴⁾，意大利法西斯党解散了，世界法西斯统治在其最薄弱的一处开始崩溃了，世界法西斯主义正走向死亡。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曙光已现，曾经猖獗一时的法西斯党徒及其第五纵队的死期是一天一天逼近了。不看见意大利法西斯党员的末路么？不看见德国第五纵队在意大利的抱头鼠窜么？这就是世界法西斯主义信徒的活榜样！这就是中国法西斯主义信徒的活榜样！

在国内方面，这三年来，我们依然是处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中。三年来，有人以为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既已先后发生，日寇今后不攻印必攻苏，决无余暇余力来打中国，于是便以消极抗战来暗示日寇不打中国，以积极反共来推动日寇移兵攻苏。可惜此计虽巧，日寇并不完全听话。日寇有日寇的国策。他虽赞成你消极抗战，毕竟你还未投降，而且武装也未解除，所以一有间隙，一有必要，他就要打到中国头上来了。他虽更赞成你积极反共，可是你尚未全面“剿共”，而且也无法“灭

共”，所以日寇还得以其在华半数以上的兵力在敌后进行“治安强化运动”⁽²⁰⁵⁾，自己来“扫荡”八路军和新四军。

三年来，又有人以为太平洋战争既起，美英若不是很快地打败日寇，便要以大力来援助中国，如此，中国便可坐享其成。殊不知美英不能很快地战胜日寇，已为事实所证明。而美英援助中国，固为我们大家所切望，但他们生产不易，他们首先要援助那直接参战的部队和作战有效的地方，若作战迟疑、心怀二用的部队，必然会成为他们慎重考虑的对象。而且自从吴开先由宁奔渝⁽²⁰⁶⁾，两方特务勾勾搭搭，直到昨日日寇广播竟公开地提出条件诱降⁽²⁰⁷⁾，更不能不使同盟友邦有所顾虑。

三年来，还有人以为抗战只要能拖，就可拖到胜利。殊不知你要拖，敌人却不让你拖。敌人要在希特勒垮台以前，至迟要在太平洋决战以前，解决中国问题，这是很明显的，而这次公开诱降，主要的就是由于墨索里尼倒台所引起。不仅敌人不让你拖，就是国内情形也不会让你拖。许多军队不开到前线，不积极作战，士气能提高么？兵役制度不改善，军队待遇不提高，战斗力能加强么？财政经济政策不改变，官僚资本不倒，贪污腐化不惩办，囤积居奇不肃清，财政经济的破产能避免么？人民自由不取得，人民生活不改善，劳动生产力不提高，官僚政治不肃清，排除异己的压迫政策不取消，抗战后方能够安定么？这些现象不改变或消灭，中国抗战的局面能拖到胜利么？我们的回答：要胜利，不是拖而是打！要胜利，不是消极的抗战而是积极的抗战！要胜利，不是国内的分裂而是国内的团结！要胜利，不是政治的压迫而是政治的民主！

三年来，更有人以为内政虽坏，只要特务统治加强，便可

维持抗战局面到胜利。殊不知抗战是要争取民族解放、民主政治的胜利，决不是为的法西斯化的特务制度的胜利。如果特务统治加强，那只是为日本法西斯军阀的统治开道路，决不是为中国抗战的胜利开道路。

照这样，三年来，国民党当局中这些想法既都错了，那末，要争取中国抗战的胜利，还有没有办法呢？我们回答：有办法！办法就出在陕甘宁边区！办法就出在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办法就出在中国人民的身上！办法就出在真正抗日的党派和军队中间！办法就在中国共产党，尤其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的手中！

谈到抗战，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三年来没有外来枪弹的补充，没有外来粮服的供给，没有外来医药器材的接济，全凭人民和自力更生，终年打仗，支持着这抗日的战略根据地，吸引着半数以上的在华敌人。八路军、新四军有了这种抗战成绩，就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最坚强最可怕的抗日力量。这种抗日力量，难道还不值得全国其他愿意抗日的军队照样学么？凡是要想进攻和取消这种抗日力量的人，难道还不是亲日的第五纵队么？

谈到民主，三年来，我们党在边区抗日根据地，宣布施政纲领，实行人民普选的“三三制”⁽²⁰⁸⁾，实行保护人权财权政权的民主法令，实行减租减息、交租交息和合理负担的农村政策，实行十小时工作制，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劳动政策，实行志愿兵制和民兵制度，实行正确的财政经济政策和文化教育政策，并允许任何外人在尊重主权、遵守法令的原则下，得在边区参加抗日工作，进行实业、文化和宗教

的活动，由此做到各根据地的自给自足直到丰衣足食的地步。这种边区，这种抗日根据地，难道还不值得全国真正愿意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地方照样学么？凡是要想进攻和取消这种边区、这种根据地的人，难道还不是反民主、反三民主义的法西斯么？所以凡是真正抗日的党派和军队，凡是爱国的同胞，必定会不满意于现在国民党当局中对抗战的摇摆政策，对内政的错误政策，尤其是又抗战又反共的两面政策；必定会愿意同八路军、新四军做朋友结同盟，从边区根据地采取民主政治的经验，尤其会愿意同中国共产党结成真正的统一战线。

所以这三年中，在全中国人民面前，在全世界同盟国家面前，我们国中究竟那个是抗战积极的军队？那个是抗战消极的军队？那里是民主政治的区域？那里是反民主政治的区域？大家心里明白。而且不仅在心里，国内外的舆论，也已经表现出来了。

说到这里，我们就必须提到我们党在这三年来的伟大进步。我们党在这三年做了比过去二十年还要伟大、还有更多成就的工作。对全国说，我们党两度制止了内战的危机（皖南事变⁽²⁰⁹⁾和这次进攻边区的阴谋的揭露⁽²¹⁰⁾），坚持了敌后最艰苦的游击战争，坚强了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撑持。因此稳定了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情绪和意志，维系了大后方对抗战前途的信心和希望。对国际说，我们党不仅预见三年来的国际事变而指出世界法西斯主义必趋死亡民主国家必然胜利的前途，并且也使同盟国家认识了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抗日根据地，才是真正反攻大陆日寇心脏的力量和

基地。对全党全军全边区说，我们党领导的整风运动，收获了从来没有的思想上改造的成绩；精兵简政，收获了力量上巩固的成绩；统一领导，收获了政治上一致的成绩；拥政爱民，收获了党政军民联成一体的成绩；发展生产，树立了真正自力更生的楷模；最后，审查干部，使我们党达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团结。这一切成绩，是怎样得到的呢？是全党依靠人民的力量得到的！是全党团结在中央领导之下得到的！尤其有决定意义的，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得到的！

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示，在这三年来许多紧急时机、许多重要关键上，保证了我们党丝毫没有迷失了方向，没有走错了道路。

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

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

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同志们，我们有了这样的党，不应该骄傲么？我们有了这样的领袖，不应该骄傲么？但是国内有些反共分子，竟敢无耻高叫取消中国共产党，解散中国共产党，难道他们还不是日寇汉奸的第五纵队么？他们早不提迟不提，偏偏在现在公开提出。他们故意说共产国际解散⁽⁶⁶⁾了，共产主义便不适用于中国，中国共产党便失掉靠山，中国共产党内部便要分裂了。他

们这种鬼话,有人相信么?

共产主义是不适用于中国么?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可以适用于全人类,可以改造全世界,为什么中国会独独除外?反共分子所以要这样胡说,就是因为他们最怕我们用马列主义的照妖镜,在中国人民面前,照出他们第五纵队的原形。反共分子所以要这样胡说,就是因为他们最怕我们用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在中国人民面前,解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诸现象,指出中国革命的真正道理。我们敢正告反共分子:共产主义不但适用于中国,而且它经过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运用和发展,已经和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中国人民的实际利益结合起来,而成为在中国土地上生根的共产主义了。谁要想来摇撼它,谁就会自趋死亡。

中国共产党是失掉了靠山么?不错,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是得到了共产国际不少的指导和帮助的,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靠山却不是共产国际,而是中国的人民。中国共产党是从中国劳动人民中生长起来的,它是存在在中国人民中间。我们党是群众的党,在今天,已有了八十万的党员,五十万的军队,并与近万万的群众在实际的战争的生活中血肉相连起来了。中国民族需要他,中国的人民需要他,谁能取消他、解散他?我们敢正告反共分子:中国共产党不仅不会取消,而且要永久地存在下去!在世界法西斯主义走向死亡的道路,应该取消、应该解散的倒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那些法西斯化的中国特务组织。

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是要分裂么?反共分子一年到头日以继夜地梦想我们党会象他们一样,分成许多派系,于是遂制造

许多谰言蜚语，想来中伤我们。殊不知我们党的组织是统一的，是基于主义的信仰、阶级的觉悟和革命的锻炼的，并有自觉的纪律来巩固他，决不同于国民党可以派别分歧，毫不统一。不错，我们党内曾经有过不少的错误，有过不少犯错误的分子，但是我们党正是在反对和克服这些错误的斗争中成长起来，党的思想才趋于一致，党的组织才趋于巩固。犯错误而肯改的人，自然会与党的正确路线复归一致。屡犯而不肯改的人，自然会被党所唾弃。陈独秀⁽¹⁷⁰⁾、张国焘⁽¹⁶⁹⁾还不是中共的创始者么？但当他们怙恶不悛，为党所开除的时候，他们何尝能分裂党，反而使党更加巩固了。这三年，我们全党的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经过整风学习到干部审查，已达到空前巩固的程度。我们敢正告反共分子：中国共产党不仅不会因为你们的造谣中伤而分裂，反而会因为你们的阴谋破坏而更加警觉，更加团结，更加巩固起来！我们想，抗战愈艰难，革命愈向前发展，分裂的倒不会是中国国民党，而会别有所在，并且这种例子，历史已不止一次重复了。

共产国际解散，有一事却须要特别说明，即是中国共产党将要更负责地更独立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我们是坚持抗战到底的。我们认为只有用自己的力量才能将日寇赶出中国去！消极的抗战，两面的政策，必致半途而废，有招致投降妥协的危险。并且只有积极的抗战，才配争取外援，才能协同盟国取得战争的胜利。

我们是坚持国内团结的。我们仍然准备与国民党继续进行协商，共同消灭内战的危机，解决已经存在的问题。但这种协商必须是真诚的平等的互让的，而不应一面谈判一面磨擦，

一面信使往还一面调兵遣将，一面讲团结一面又要取消解散我们。若国民党有人将国共合作看作国共合一，以为非逼不能就范，这就是内战的动机，决非团结的道理。

我们是坚持民主进步的。我们仍然希望国民党当局改变内政的错误政策，真正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我们也愿意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与其他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力量进行合作，以坚持抗战，以推动进步。

这就是我们党的方针！

同志们！我现在回来了。我要为这个方针，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继续努力，奋斗到底！

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 ——新专制主义*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六日)

一 问题的提出和回答

自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开始抗战以来，党内党外，国内国外，对于蒋介石国民党亦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实质，多缺乏深刻的了解。只有毛泽东同志在抗战前就指出他的动摇性与被动性，抗战初期又指出他的妥协性与两面性，到今天更指出他的法西斯性。这些都是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启示，而且有其时代意义的。因此，我现在便来讲中国的法西斯主义。

在这里，须先回答一些疑问。

有人问：为什么早不说蒋介石国民党是法西斯主义，偏偏现在来说？我们回答：抗战前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政策重心在争取他抗战，故强调其可变性与革命性，而只注意其动摇性与被动性就够了。抗战初期，我们的政策重心在争取他长期抗战，全面抗战，故强调持久战，强调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

* 这是一个报告提纲，收入本书时第五部分有删节。

裂、倒退，于是就要深刻地认识他的妥协性与两面性。等到现在，他的抗战作用日益减少，反动方面日益扩大，并且著书立说，出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样下去，必致抗战失败，内战重起。故我们就要公开地揭穿其法西斯实质了。过去只是因他的发展还没有象现在这样坏，故未强调，并不是没有什么法西斯派。

于是又有人问：蒋介石国民党既是法西斯主义，为什么又能抗战呢？我们回答：毛泽东同志告诉了我们，他是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因为他带买办性，所以当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的时候，他能依靠别的帝国主义去抵抗，并利用民族救亡高潮，起着抗战的革命作用。同时，他又带封建性，所以当同盟国家渐渐重视中国民族抗战的时候，他又回到复古的排外的思想上去，起着反动的作用。并且正因为他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所以对内总是反对人民，惧怕人民，压迫人民的。他的抗战是决不会彻底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争取和巩固自己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决不能成为大资产阶级的尾巴。这一点，毛泽东同志在抗战前苏区党的代表大会上就警告了我们的⁽²¹¹⁾。

于是又有人问：法西斯主义是民族侵略主义，蒋介石国民党既还抗战以抵抗日本侵略者，为什么叫他做法西斯主义呢？我们回答：正因为这样，所以毛泽东同志叫他做中国的法西斯主义了。民族侵略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一种特征，不是唯一的特征。季米特洛夫报告中讲的法西斯主义的四种特征⁽²¹²⁾，除了民族侵略主义这一点外，中国法西斯主义都是具有的。蒋介石国民党在历史上在现在，都是向人民向劳动群众施行最残

酷的进攻，以至于进行镇压革命的内战，实行疯狂猖獗的反动和反革命，成为全中国人民的死敌。只是因为中国已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环境中，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无力对外侵略。至于他对国内各小民族，还不是充满了大汉族主义的民族优越感和传统的理藩政策⁽²¹³⁾的思想么？即在对外，国民党还不是有人在提倡大中华联邦应该圈入安南、泰国、缅甸、朝鲜甚至南洋群岛么？季米特洛夫曾经说过，因各国历史社会经济条件不同，因各国民族特性及国际地位不同，所以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和法西斯专政本身，在各国所采取的形式也是不同的。斯大林也早说过，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是表明资产阶级的力量已经削弱，资产阶级在内政方面已经不能采用旧的国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方法来维持其统治，因此，就只得采用恐怖的手段⁽²¹⁴⁾。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不也可以用于解释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么？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是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际上就是蒋介石国民党和官僚资本公开的恐怖的专政，亦即特务统治。

于是又有人问：既是这样，为什么只反对国民党内的反动派，而不反对整个国民党呢？为什么只主张取消法西斯主义，而不提取消法西斯主义的头子呢？我们回答：这就因为以蒋介石国民党为代表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尚存在，尚未走到只有反动性的一面的地步，因为他们的抗战旗帜尚未倒下，国民党尚能影响一部分虽然是日渐减少的人民，尚不敢公开以法西斯主义为号召（不仅因为抗战，而且也由于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而不能独立，因而也不敢公开

承认)。故我们只反对国民党中的反动派,并不反对那些愿意抗战愿意民主的国民党员,并且还希望他们和我们一道去反对那些反动派。故我们只主张取消法西斯主义,并且还希望这些国民党员能自动地起来取消法西斯主义而真正实行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故我们只主张解散法西斯的特务组织,并不主张取消国民党组织。由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日渐抬头,甚至于写出一本《中国之命运》,提出最反动的取消中共的主张,故我们今天乃必须强调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及其实质。这不仅对于中国人民是一种警醒和教育,首先对于我们党内也是一种警醒和教育,并且这是最实际的肃清党内对于大资产阶级的投降主义的思想。

于是又有人问:既是这样,蒋介石国民党的法西斯主义是否有它的思想体系、历史根源、纲领策略和组织活动呢?我们回答:有的。下面,我们就分段来回答这些问题。

二 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体系

打着抗战旗帜、戴着三民主义帽子的中国法西斯主义,是有其自己的思想体系的。

蒋介石的哲学思想是极端的唯心论。他最喜欢引这几句古话:“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²¹⁵⁾同时,又强调“心”的作用,将孙中山的“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²¹⁶⁾的话,完全解释成为极端唯心论。于是他要消灭共产党,便装着“不诚无物”⁽²¹⁷⁾的样子,很沉痛地说“不解决

中共问题，死了也不瞑目”，其实这正是他“无物不诚”之处。于是他要取消边区，虽经过他在庐山谈话会⁽²¹⁶⁾承认，经过行政院三三三次会议通过，他也可一手取消，这又是他“有物不诚”之处。

蒋介石提倡力行哲学⁽²¹⁹⁾，其中心是要人民于不识不知之中，盲目地服从他，盲目地去行。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的时候，要人民盲从他不抗日而安内。抗战初期，要人民盲从他片面抗战。现在，又要人民盲从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其实，他在内战时，早夸下海口：“剿共失败，必将自杀以谢国人。”可是从来也没见他实行过。失败时要实行连坐法⁽²²⁰⁾，但也没“坐”到他头上。抗战前，他也曾夸下又一海口，说“我可以相信，如果有六十万以上真正革命军，能够绝对的服从我的命令，指挥统一，我一定有高明的策略可以打败这小小的倭寇”。可是，“八一三”上海战争绝对服从他命令的何止六十万，也没看见他有什么高明策略打败日本。而现在绝对服从他命令的嫡系军队更不止六十万，他反而倒要勾搭日本了。可见他的力行哲学，不止是唯心的愚民哲学，也是牛皮哲学，流氓哲学，与希特勒⁽²²¹⁾如出一辙！

蒋介石在心理建设方面，强调“独立自主”。其实，他的买办性是依赖外力，最不独立的；他的封建性，有时候又发展为排外性，而非正确的民族自主。他强调诚，但他是最不诚的。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到这次抗战合作，对苏对共对人民，也就是对革命对抗战，他都没有诚意。并且他讲诚，是要别人对他诚心诚意地盲从，他对别人却丝毫也没有诚意的。

在伦理建设方面，蒋介石强调四维八德⁽²²²⁾的抽象道德。

若一按之实际，则在他身上乃至他领导的统治群中，真是亡礼弃义，寡廉鲜耻！他们不给孙夫人居住自由，不给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养病自由，得苏联帮助而反苏，得共产党帮助而反共，得人民的帮助而压迫人民，满朝囤积、遍地贪污而不惩，通敌叛国、走私吃饷而不办。抗战不勇，内战当先，还谈什么忠孝！捆上疆场，官逼民反，还谈什么仁爱！抗战业已六年，还和日寇勾搭，对德既已宣战，还有信使往还，这那能说到信义！挑拨日本攻苏，飞机轰炸民变，这那能说到和平！所以他这套唯心主义的道德观，都是虚伪的。同时，也是以此感人，要人民对蒋介石国民党实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好便利他的压迫和进攻。

蒋介石的历史观，是一套复古的封建思想，反映着浓厚的传统的剥削阶级意识。在《中国之命运》中，有所谓“孟子起而以孔子之道定义利王霸之分，……辟杨墨，正人心，由此遂奠定中国三千年来一脉相传的正统思想之基础”的话，故《皇朝经世文编》及陈弘谋《五种遗规》两书⁽²²³⁾乃得大用。

蒋介石的民族观，是彻头彻尾的大汉族主义。在名义上，他简直将蒙、回、藏、苗等称为边民，而不承认其为民族。在行动上，也实行民族的歧视和压迫。

蒋介石的国家观，是伪托民族国家或全民政治之名，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党专政之实，更确切地说，是新专制主义的个人独裁，是法西斯主义的特务统治。他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就是因为他愈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软弱无力，他就愈不敢采用资产阶级的民主方法，甚至连一党的专政也不敢采用，而愈要采用恐怖的手段，实行特务的统治和个人的独裁。

蒋介石的战争观，是唯武力主义。它是近代中国传统的军阀思想（曾、胡、左、李的湘、淮军传统思想⁽²²⁴⁾）和拿破仑⁽²²⁵⁾的武力统一思想的结合物，所以又叫做新军阀主义，也就是新专制主义。因为他唯武力是尚，所以他对外认为不能单独抗日，必须依靠外援。他公开说：“（日本）不仅是十天之内，三天之内他就可以把我们中国所有沿江沿海的地方都占领起来，无论那一个地方，西边不仅是到重庆，而且可以到成都；南边不仅是到广东，而且可到梧州、邕宁。”“他（指日本）要发一个号令，真是只要三天之内，就完全可以把我们中国要害之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们中国。”“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打他？不仅是没有武器可以打他，就是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政治，这些作战的条件，有那一项是具备可以同他现代国家作战呢？”因此，他的抗战国策，早就定在日本“现在陆军的目标是苏联，海军的目标是英、美。日本为要吞并我们中国，而须先征服俄罗斯，吃下美国，击破英国”的上头。但现在日本既未征服俄罗斯，又不能吃下美国，反倒压在中国头上，于是他便着急起来，一方面消极抗战，保存实力，以便内战，另一方面便要与日本勾勾搭搭了。因为他唯武力是尚，所以他对内坚持武力统一，主张“军主政治”。他统治十八年，从一九二六年“三二〇”事变⁽²²⁶⁾直到今天，他几乎无一年不在战争中，而且无一时不在打内战的主意。北伐前有“三二〇”，北伐后有宁汉分家，宁汉合作⁽²²⁷⁾。内战中有党内战争，党外战争。抗战中又有削除异己，进攻中共的军事行动。

蒋介石的政党观，是要全国各党各派都统一溶化于蒋记国民党、蒋记三青团之内。他公开说：“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动

脉，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动脉里面的新血轮”；“中国国民党如能存在一天，则中国国家亦必能存在一天，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简单的说，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故“成年的国民务须加入国民党，青年的国民，只有加入青年团”。这是最露骨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思想的自白了！但是他居然还假惺惺地说：“我对于中国的各种思想与组织，只要他不割据地方、反对革命；不组织武力、破坏抗战；只要他对于国家民族和革命建国真有利益；我不但没有加以妨碍的意思，而且希望他亦能发展，亦能成功。”不要说中共及其领导的武力和边区是抗战的，是革命的组织、武力和政权，就连其他党派既没有武力，也没有政权，为什么也是一点自由没有，而且到处受压迫，更不要说“发展和成功”了。甚至国民党内其他派系，尤其是真正奉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孙夫人，还不也是不自由而受压迫么？所以国民党也好，三青团也好，都是蒋记的，早已不是孙中山改组时的国民党，也不是思想自由或各派共存的国民党了。

蒋介石对人民的看法，完全是以之为牛马的。所以他强调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话，要人民听话守法，任凭剥削，随他统治。所以蒋介石口中的民权主义，实是党权高于一切，早就没有民权。各级参议会、新县制等，都是粉饰门面的欺人摆设。进一步说，连党权也不是，还是军权高于一切，特务高于一切吧！

最后，蒋介石的经济思想，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主买办思想。他一方面侈谈工业化的计划经济，另一方面又憧憬于

《礼运》大同之篇^[228]，所以实质上他是在民生主义的幌子下，存在着最落后最反动的封建经济买办经济的思想，也就是农业中国工业外国的思想。他这种经济思想，不仅不能解决民生问题，而且必然地使中国经济更加破产，人民生活更加痛苦，中华民族更难脱离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地位。

从蒋介石这一切思想体系中，我们只能看出中国法西斯主义，决看不出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孙中山的思想中的唯心观点、消极因素，被蒋介石拿来发展成为他今天的思想体系；但孙中山的思想中还有某些合理的因素，更多的革命观点，尤其在他晚年接近了共产党，采取了俄国革命的某些办法后，他的三民主义便成为革命的三民主义了。而蒋介石主义，却是另一套东西，只能成其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

三 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根源

蒋介石及其统治集团的法西斯主义，是有他们的历史来源的。蒋介石常夸称他是孙中山的信徒、学生，其实他早已不走正路，已经背叛过一次，现在又一次要背叛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呢！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是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具体说来，就是官僚资本（资本、土地、工具集中在极少数的官僚财阀手里）与特务制度的结合。在蒋介石身上，便是军阀、交易所老板和流氓头子的结合，他是集古今中外反动之大成的。

我们从蒋介石及其统治集团来看，蒋出身于封建家庭。辛

亥革命⁽¹⁴⁷⁾，他一出手便在军阀张宗昌⁽²⁹⁹⁾之下当排长，奉陈其美⁽¹⁴⁹⁾之命杀了浙江革命党魁陶成章⁽²³⁰⁾，而窃取了浙江光复的革命果实。这时，孙中山是以革命党和新军、会党的结合而成功，而陈其美、蒋介石却以流氓的行径，造成革命党的初期分裂，造成辛亥以后直到现在上海滩上在帝国主义庇护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帮会相结合的流氓政治的始基。

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〇年，蒋介石、戴季陶⁽⁵⁵⁾、陈果夫⁽¹⁸⁰⁾结帮卷入交易所的投机浪潮中。后来这种传统，更为孔祥熙、宋子文及其他人物所发展。于是，这一买办集团，遂成为统治后二十年中国的核心。虽然蒋介石在广东也反对广东的英国买办，可是戴、陈留在上海，一开始便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联工农的三大政策，而蒋介石一到长江流域，便投入江浙大资产阶级的怀抱，首先揭旗反苏、反共、反工农。所以蒋介石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从未真正承认，也从未真正实行过。

蒋介石虽曾一度组织黄埔军校，指挥北伐，但他的军阀思想和投机思想却与他“参加”革命相随而来。即在去苏联考察时，他所真正崇拜的，也不是苏俄革命，而是拿破仑征俄。在办黄埔之初，他是反对苏联顾问的，等到得到苏联军火帮助，他又高叫第三国际⁽⁶⁶⁾是世界革命的大本营，中国应该服从第三国际的指挥。然而不久，三月二十日围攻苏联顾问在广州的东山住宅的，也就是他。他办黄埔，不是以革命的战略战术思想教育学生，而是以《曾胡治兵语录》⁽²³¹⁾及《拿破仑传》为之先的。他领兵东征，便与许崇智发生地盘的争执。他赶走汪精卫，更是军阀行为。他率兵北伐，对待各军，更是排除异己，拥兵自私。所以，不待宁汉分裂，他已经发展起新军阀的思想和行为

了。不过当他在革命队伍时，他还是挂革命招牌，利用人民以增大自己的力量和影响。等到一旦反革命，他便成为直接屠杀人民的刽子手了。而他所领导的集团，也是亦步亦趋地跟着他走。

十年内战，便是他这个军阀、交易所老板和流氓头子的具体表演。不论是对国民党的党内斗争、党内战争还是“剿共”，他都用了这一套手法，并且从德、意、日那里学到了法西斯主义的新法宝。十年中，他派了不少的黄埔学生去学，并请了德国将军塞克特、柏林警察总监白朗堡和德国特务人员直接来教。

从西安事变⁽²³²⁾到抗战六年，他更是精彩地表演了这一套手法。不要忘记蒋介石代表的那部分半殖民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两面性的革命性一面，但更不要忘记他那反动性的另一面，而且这一面他愈玩愈精。有了十年内战的经验，所以他在这次抗战当中，居然敢演局部的内战，同时又能见风使舵，故作悬崖勒马的惊人之举。不过，我们不要为他迷住，戳穿这套西洋景，也就没有什么奥妙。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的两面政策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及针锋相对的办法，便是最好的对策。

四 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政纲和策略

蒋介石虽标榜三民主义，但他在大革命时，并未诚意地实行过三大政策。在内战时，更将三民主义丢之脑后。抗战初期，又曾标榜过抗战建国纲领⁽²³³⁾，实际上只是骗人，并且将其中

条文解释和实行成为反全面抗战、反共、反民主的东西，于是就造成法西斯的纲领，而决不是三民主义的抗战建国纲领。

这纲领我们可以为它归纳成为十二项：

- 一、实行消极抗战，准备对日妥协；
- 二、背叛孙中山三民主义，接受德意日法西斯主义，反对苏联社会主义，排斥英美自由主义；
- 三、通敌反共，破坏抗战，利用外援，进行内战；
- 四、压迫各小党派，欺凌少数民族，不顾华侨痛痒，漠视灾民苦难；
- 五、凭借武力，削除异己，组织特务，篡夺党权；
- 六、摧残民权，剥夺自由，利用保甲，实行独裁；
- 七、依靠官僚资本，实行独占经济，提倡商业投机，破坏工业生产；
- 八、滥发法币⁽²³⁴⁾，抬高物价，垄断民生，剥削劳动；
- 九、集中土地，损害民食，捆绑壮丁，损伤民力；
- 十、放任贪污，强征捐税，纵容走私，任意检查；
- 十一、焚书坑儒，荼毒青年，威迫利诱，斫丧人格；
- 十二、紊乱法纪，败坏道德，摧残文化，毁灭民族。

中国法西斯主义的这十二条纲领，当然不是公开宣布的，也永不会公开承认的。不过，在实际上，它是一条一条一项一项在实行，而且只有比这多，不会比这少。这就是中国法西斯主义之软弱处，也正是它的无耻和卑怯处。蒋介石国民党拿着这样纲领在实行，如何能将抗战领导到胜利？无疑地，要将中国领导到分、到烂、到乱、到垮，将抗战领导到失败。

我们共产党是坚持抗战团结和民主进步的，我们决不容

许抗战失败。我们必须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加强领导权的争取，这首先就必须壮大和巩固自身的力量，然后才能有力地领导别人，制止中间分子的动摇，孤立顽固分子，而坚决地实行我们的抗战十大纲领⁽¹¹⁵⁾和“三三制”⁽²⁰⁸⁾的施政纲领。

讲到策略，中国法西斯主义的策略是依其纲领的方向，依照蒋介石国民党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而灵活运用。

如对日的一打一拉，以冀走向有利的妥协。

如对英美的哄吓兼施，以冀得到外援便其内战。

如对苏的冷冷热热，以冀达到为它牵制日本，便其解决内争的目的。

如对地方势力、各小党派威迫利诱，以图达到离间我们、孤立我们便其各个击破的目的。

如对民族资本家、开明士绅和国民党元老时好时坏，来看他们是否对统治者怀有贰心。

如对进步的文化人、知识分子以及学生明压暗勾，以逼其离开我们，反对我们。

如对工农劳动大众监视侦察，隔断其与我们的一切来往。

最后，对待我们，则一切以消灭我们为中心，而其策略亦时软时硬。不过软的只是敷衍一时，决非真正好转，同时，也是为下一步硬的做准备；在硬的做不通时，也可暂时软一下。论时期，在内战时期，蒋介石对我们是硬打、硬捉、硬杀。但“九一八”前后，他也采取了一些软的辅助办法，那就是自首政策、内线政策等。抗战后，表面上转向团结，但是先暗斗而后明争，这时候，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便由限共、溶共而转到取消共产

党。他的特务政策，也与这三时期相适应。我们如不了解蒋介石国民党反共的一贯性，便不能对他有高度的警觉和适当的斗争。同时，我们如不了解他反共政策的发展与变化，也就不能对他有适当的分析和认识，来分别对待。

五 中国法西斯主义的组织 and 活动

中国法西斯主义是有它的组织的。它的组织寄生在国民党内而篡夺了党，寄生在三青团内而统治了团，寄生在军队中而管制了军队。这就是特务组织。

特务组织有三个系统：

第一个系统是在国民党内，那就是 CC⁽¹⁸⁰⁾。他胚胎于一九二六年，创始于大革命失败后，以中央调查统计局为其灵魂和核心。从中央直到地方有调统局、调统室。CC 的势力也就是特务的势力，笼罩全党，伸入到全国的民政系统、教育系统，伸入到全国部分的建设机关、交通机关、财政税收机关、银行机关（如交通银行及某些私人银行）和救济、华侨、妇女团体。他掌握着文化宣传机关和出版事业。宣传方针以反共为第一。国民党经费，一九四三年度预算为二万万八千四百万元，大部分是用在特务的党务活动上，而特别费并不在内。

第二个系统是在三青团内。那就是以复兴社为前身而转成今日三青团内的特务组织。复兴社胚胎于孙文主义学会⁽¹⁴⁰⁾和黄埔军校同学会⁽²³⁵⁾，创始于“九一八”后之力行社，后改复兴社，至抗战初并入三青团，而康泽⁽²³⁶⁾所领导之别动队及特训班加入进来，成为三青团的特务灵魂。

第三个系统是在军事系统内，那就是政训处和军委会调查统计局。贺衷寒的政训处有一批军队特务，连军官都厌恨他们。军委会调查统计局是戴笠一手组成的，始于一九三二年，初期为戴笠复兴社之特务组，现在羽毛丰满自成一系了。军统局的组织最庞大，人、钱均多。军统局本身分处，下分区、站、组、队。他的组织触角最广，军队中有军令部第二厅直属的各级情报参谋，军事机关中有调统专员，边区有军事督导组，保安团队中从保安处长、第三科长直到下层情报人员，全国的整个警宪系统除少数几省外，都在其控制之下。全国整个税收系统，有其缉私队和检查处来管。全国交通机关，有其监察处和检查站来管。国内外外交系统乃至武官情报人员，都归其管辖派遣。全国经济系统有其稽查和特工人员。敌伪沦陷区工作归其管理。破坏我军、我区的军事行动和情报工作，也归其布置。与CC平行进行。

于此可以看出，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已成一特务统治的世界，而且国民党特务还与日特、伪特勾结在一起。从组织和活动上看，他们也是最反动、最野蛮、最黑暗、最残暴的。

但是，今天的世界究竟不同了，世界法西斯主义正走向死亡，中国法西斯主义决难独存。中国的抗战有它胜利的前途，中国人民有他自己的解放道路，尽管蒋介石国民党要将中国引向法西斯道路，但中国人民一定会懂得和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脱离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影响和圈套，而走上光明的道路。

中国决不是法西斯主义的！

中国一定是新民主主义的！

关于党的“六大”⁽¹⁶⁾的研究*

(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四日)

同志们：近半年来，大家都在学习两条路线斗争问题。在学习大革命时期的文件中，大家对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看法有很多争论，而且争论得很热烈。这是启发思想的一种争论。党内思想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解放。这是毛泽东同志领导整风学习的结果，是思想上很大的进步。

我参加了“六大”的工作，是当时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按理应当比别人认识得更清楚些。我觉得，研究“六大”要有合乎历史实际情况的眼光，要有今天整风的思想方法，两者缺一，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对“六大”的历史情况，有些我已经记得不很清楚了，有些我已经忘记。现在在延安还有十个同志参加过“六大”，我同有些同志谈了一下，不过没有都找到一起对一对。我分六部分来讲，先说事实，事实是对的，就说对，不对的，就说不对，结论放在后面。

一 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

讲到中国革命的性质，今天似乎是老生常谈了，因为毛泽

* 这是在延安中央党校所做的报告。

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已经讲到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是在“六大”时，这却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什么叫革命性质？革命性质是以什么来决定的？这些在当时都是问题。后来才知道：应以革命任务来决定革命性质，而不是以革命动力来决定革命性质，这个问题还是一个新的问题。本来，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²³⁷⁾上已经确定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更早，在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²³⁸⁾也提出过。中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是又要反对资产阶级，这在当时就成为很难理解的问题，虽然俄国一九〇五年的革命⁽²³⁹⁾就是这样的，但我们没有很好地研究。当时无论从莫斯科中山大学⁽²⁴⁰⁾或从西欧回来的同志又都轻视理论，所以对革命的性质问题搞不清。在今天看来是很幼稚的问题，但在当时却是严重问题。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²⁴¹⁾的精神刚传到中国，我们都去出席“六大”。开会之前，斯大林同志找我们谈话。他主要谈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革命的性质，一个是革命的高潮与低潮。他指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并以俄国的二月革命⁽²⁴²⁾为例说明。这样，我们才懂了。“六大”前，中国党是不懂这个问题的。从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承认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的观点，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不是领导而是帮助资产阶级，是替资产阶级抬轿子的，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不要争取领导权；认为帮助资产阶级革命成

功，无产阶级可以得到自由、八小时工作制，以后再搞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这种观点实质上是旧民主主义的，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用这种观点来看中国革命，领导权问题就很久得不到解决。关于参加国民党⁽²⁾的问题，当时有争论。有的主张参加，这是对的，但认为参加进去只是帮忙，又是错的。另外，张国焘⁽¹⁶⁹⁾开始是反对参加，后来又主张至少产业工人要留在外面。他不了解广大工农群众参加进去，可以改造国民党，争取领导权。在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彭述之⁽¹⁷⁹⁾认为领导权是天然地落到了无产阶级身上，是“天然的领导权”，不用无产阶级去争。这就是没有看到资产阶级在争领导权。所以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来了个反共⁽²²⁶⁾，我们毫无准备。一九二六年冬的共产国际第七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的精神传到中国时，资产阶级已经叛变。我们党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才承认了领导权要争，批评了天然领导权的说法。但争的方法是到处贴标语，喊口号，说要争领导权。这只是空的，没有实际意义。另外，有一个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的问题，在共产国际也发生了争论。托派认为在武汉时期就要组织苏维埃，把工会变为政权，推翻武汉政府。这是把俄国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经验搬到中国来。斯大林同志和共产国际的多数同志则认为我们应在武汉政府中夺取领导权，而不应马上和武汉政府分裂。虽经斯大林同志的反对，托派在共产国际第八次执委会⁽²⁴³⁾上还是提出了他们的意见交大会讨论。当时曾在中国工作过的印度人罗易、法国人多里欧⁽²⁴⁴⁾都同意托派的意见。陈独秀虽然没有公开同意

托派的意见，却认为共产国际的决议是错的，但又没有组织工农与武汉政府破裂。及至武汉政府叛变后，托派主张中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¹⁷⁰⁾则受了这个影响。那时，共产国际派罗米那兹⁽²⁴⁵⁾来中国。罗米那兹认为中国是“不断革命”，说中国是民主革命，但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他说广州时期是四个阶级联合，武汉时期是三个阶级联合，南昌起义⁽²⁴⁶⁾时只有工农，是两个阶级，中间不经任何停留，不经任何阶段，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与托派调和的论调，实质上是托派的观点。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²⁴⁷⁾接受了这种观点，认为当时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罗米那兹的意见，在我们党员中间是有影响的。

当时之所以搞不清中国革命是民主革命，是因为：第一，对什么叫革命性质，革命性质是以什么来决定的搞不清；第二，中国党历史上没有从理论方面搞清这个问题；第三，国际上托派的影响以及同托派调和的观点的影响。这些问题都须要“六大”解决，“六大”正确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为什么在决议中写得这样简单呢？因为当时在党内已经有宣传：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如认为中国革命目前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中国现在的革命是“不断革命”，也是不对的。

讲到革命任务，就要联系到性质、动力等问题。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建立工农民主专政。这个问题当时讨论过，工农民主专政是包括小资产阶级在内的，并不是将小资产阶级除外。以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实现反帝反封建两个任务，基本的力

量是依靠工农。这个政权是反对资产阶级的，但不是消灭资本主义。这个性质和任务的确定，基本上没有错，但不如毛泽东同志后来概括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明确。这个阶段是很长的。毛泽东同志分析，中国自鸦片战争后就开始旧民主主义的革命，自“五四”以后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六大”提出中国革命的十大要求⁽²⁴⁸⁾，就是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党纲。当时详细的党纲还产生不出来。详细的党纲应该有两部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恰巧那时通过了共产国际纲领，就作为我党的最高纲领。“六大”的十大要求是我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中的纲领，也就是民主革命阶段的战略任务。作为战略任务来看，十大要求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作为策略任务来看，有些就不妥当。如第一条，反帝，是对的。第二条，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是对的，但策略上不一定采取强力没收的办法。第四条，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现在抗战时期当然不提，但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要使革命彻底胜利，必须推翻它，这是不言而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人民大众的胜利，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权是不能存在的。第五条，关于苏维埃，不管名词是否妥当，但苏维埃是工农代表会议，它与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是有原则区别的。列宁说苏维埃政权不仅可以用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可以用于殖民地国家⁽²⁴⁹⁾。毛泽东同志发展了这种思想，把它发展成为中国的代表会议制。这种政权是一元化的，不是两权并立⁽²⁵⁰⁾的。我们现在实行的“三三制”⁽²⁰⁸⁾就是各级代表会议制，是真正的民主制度。关于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是战略任务，今天在边区还实行十小时工作制，是策略问题。关于发给士兵土

地,过去认为是很难实现的,今天在南泥湾就实现了。关于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没有提到被压迫民族的问题,当然是缺点。十大要求基本上没有多大错误,就是将来“七大”,也不会有多大的修正,不能只以抗战时期为限,因为抗战时期是民主革命的一个阶段。

关于非资本主义前途的问题,现在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来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六大”作了原则的决定。至于怎样转变,要看我们将来力量是否占优势和革命发展的程度而定。不能犯急性病。这与后来李立三同志⁽⁶⁵⁾的意见完全不同。李立三同志认为只要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就可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了。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讲得很清楚。

但“六大”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的决定中也有缺点,这就是没有把中国的情况搞得很清楚。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已经指出了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六大”时本来可以对这点做具体的研究,但做得不够。什么是中国的情况?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上农业占主要地位,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社会是两头小中间大,政治上是军阀战争,国家的不统一,历史上有不断的农民战争如太平天国等。如果分析了这些问题,就可得出中国革命的主要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结论。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是这种思想,认为殖民地问题就是农民战争问题。在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农民革命战争是可以长期存在的。当时我们不理解这个问题,没有把不平衡的问题同农民战争联系起来,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估计不足。

二 中国革命的动力和阶级关系

“六大”时阶级阵营有了新的分化，帝国主义、军阀都是反革命，资产阶级分化到反革命方面。大革命时，民族资产阶级是反对北洋军阀的，带有革命性。大革命失败，蒋介石同帝国主义勾结，同买办资产阶级勾结，并同江浙的财阀南四行⁽²⁵¹⁾勾结，在上海、广州屠杀革命的工农⁽²⁵²⁾，所以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指出当时的反革命是三个：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资产阶级。在革命的方面也有分化，城市小资产阶级动摇，有的跑到改组派⁽³⁹⁾与第三党⁽²⁵³⁾方面。反映到党内，党员有的脱党，有的畏缩，有的则拚命、发狂。因此革命的力量主要依靠工农，当然也不是把小资产阶级除外。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说中国向两个极端急剧分化，中间阶层是动摇的。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主要是依靠工农。当时，在城市主要依靠先进的工人，一般的大多数的工人也有些畏惧；在农村，农民也有畏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小商人、学生等）也是畏惧的。“六大”把资产阶级算成反革命，但没有主张消灭资本主义。主要依靠工农，这是对的，不能把城市小资产阶级看成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否则便会使我们的思想混乱。但“六大”对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认识是不清的，虽然承认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在动力上又认为只有工农，小资产阶级被除掉了，把当时某些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参加资产阶级反对派，误认为全体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因而在策略观点上错误了。

“六大”对反革命方面没有分析，特别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与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不同。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认为反革命内部有矛盾，可以利用。“六大”则把这一点翻过来，认为他们虽然有矛盾，但反共是共同的，因此他们的矛盾无法利用。这种认识是错的。毛泽东同志说，把敌人看成铁板一块，这是关门主义的分析方法。事实上，南京政府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府。另外还有不满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对派，这是当时的第三营垒。这个第三营垒不是动摇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中间力量（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而是统治阶级营垒中的反对派，是政府的反对派。第三营垒开始是改组派，以后改组派跑进政府，又有史量才、杨杏佛⁽²⁵⁴⁾等代表人物。蒋介石和汪精卫在一九二八年三四月本来要一起回南京，桂系反对汪精卫，汪精卫被阻在上海反桂系、反胡汉民，那时蒋、汪的矛盾不明显，但他们之间是有矛盾的。毛泽东同志的分析是正确的。

“六大”对农村阶级关系的分析基本上没有错，但不象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明确。“六大”决议中说对地主是没收一切土地，对富农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在雇农反对富农时，我们要站在雇农方面（这同后来的加紧反对富农是不同的），但对小地主、富农没有进一步分析。

大革命时是四个革命阶级（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这四者有区别：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工农是基本的革命力量；小资产阶级有动摇性；资产阶级有两重性，有时参加革命，有时反对革命。大革

命时,有些带买办性的资产阶级也投机参加了,这是国共合作初期的国民党右派,不能算作革命的动力。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北洋军阀时是革命的,但也有软弱性,他们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有联系。

武汉政府当时不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府,还有谭延闿⁽¹⁶⁰⁾、孙科⁽²⁵⁵⁾、唐生智⁽²⁵⁶⁾等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人物坐在政府中,汪精卫则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当时我们应把改变武汉政府为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当作努力的方向,当时实现这一种方向也是可能的。共产国际⁽⁶⁶⁾把国民党看做阶级联盟,内分左、中、右三派,右派是大资产阶级,中派是民族资产阶级,左派是工农和小资产阶级,包括我们党。但是那时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却把我们从左派划出来,叫共产派,没有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国民党中改造国民党,争取领导权。

现在我举出几个典型人物来研究一下。

(一)胡汉民⁽⁵⁴⁾。他是彻头彻尾的右派,是买办阶级的思想。他在广东时反对工农很厉害,反对农民组织武装队伍,站在机器工会⁽²⁵⁷⁾方面反对工人群众。他下面的大将有吴铁城⁽²⁵⁸⁾、马超骏⁽²⁵⁹⁾、古应芬⁽¹⁷⁶⁾。刺廖仲恺⁽⁴⁾便是他的弟弟胡毅生⁽²⁶⁰⁾干的,而他知道。

(二)蒋介石。他在大革命时主要是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但也不否认他有一点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蒋介石的民族资产阶级性多些,是中派,但与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有关系。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四一二”这期间,群众起来,他便反共。一九二六年“三二〇”事件时他的立场已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

变为新右派，其灵魂便是戴季陶⁽⁵⁵⁾。“四一二”⁽²⁶⁾后他便成了反革命，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表面上却仍以民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进行欺骗。

(三)汪精卫。他在大革命时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虽有时很“左”，却不赞成没收地主土地，对工农有戒心。汪精卫在大革命初期并不积极，孙中山曾说：精卫、展堂已不能代表俄国式的革命⁽²⁶¹⁾。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是孙中山先生委托鲍罗廷⁽¹⁶⁸⁾起草，由瞿秋白⁽²⁶²⁾翻译，汪精卫润色的。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汪精卫乘机积极起来，在广东又被选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主席。一九二七年汪精卫由俄国回来，并没有想反蒋。他一到上海，蒋介石就找他开会。这时陈独秀找他写了个“汪陈宣言”⁽²⁶³⁾，此事被蒋介石知道了，汪精卫又想不发表，而报馆已上版来不及抽回。第二天汪精卫又去开会，吴稚晖⁽²⁶⁴⁾在会上大骂，汪精卫一怒，拔腿就跑到武汉去了。就这样他成了左派的领袖，大叫革命的向左边来，这完全是投机的。抗战期间他投降日本侵略者，成为卖国贼。

(四)廖仲恺。他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激进的代表，没有买办性。他是华侨，但不大富有，对帝国主义很仇视，反对封建势力，同情农民减租减息，但对工人反对中国资本家却采取调和的态度，对反对外国资本家则是赞助的。在黄埔军校⁽¹¹⁸⁾，当我们青年军人联合会⁽¹⁵⁷⁾反孙文主义学会⁽¹⁴⁰⁾时，他采取调和的态度。他是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家。

(五)邓演达⁽¹⁴⁶⁾。他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的代表，赞成土地革命，能与我们长期合作，是国民党中的左派。开始他相信无政府主义。当他从苏联回来，在讨论土地问题时，他和毛泽

东同志的意见一致。他积极主张摧毁封建势力。他是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与军队有些关系。在武汉时，若以邓演达为中心，不以汪精卫为中心，会更好些，而当时我们不重视他。大革命失败，他很苦闷，同俄国顾问一起走了，后来回国组织了第三党。虽然他在思想上是反对我们的，应该批评斗争，但在策略上应该同他联合。这人的品格很高尚，对蒋介石始终不低头。在“九一八”以后，蒋介石把他杀了。

在阶级关系的分析上，过去我们的缺点，一是公式化，一是定型化。所谓公式化，是教条地搬用俄国一九〇五年反对沙皇和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的公式到中国来，对中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正确地认识，不能分析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把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看成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小资产阶级一样。所谓定型化，是把人定死了，不懂得人是会变的。蒋介石代表过民族资产阶级讲话，但不能把蒋介石的叛变看成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对汪精卫也一样。看不到中国的阶级关系的复杂与变化，这是错误的。第三党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一九三〇年邓演达回国后，曾找我们谈判合作反对蒋介石，可是我们没有理睬他，这是不对的。

至于大革命失败后，是否还可以用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旗帜问题，我也讲一下。假如邓演达没有走，仍与他合作，是还可以用国民党旗帜的。但在南昌起义之后，只有共产党是革命的，国民党叛变了，这时再用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旗帜，就会使群众的认识发生混乱。对三民主义不革命的方面应该批驳，对三民主义革命的方面应该保留下来，而我们当时却是对它全部否定了，没有给以历史的科学的分析。

三 大革命的经验教训

“六大”开会时，革命正处在转变关头，当时对许多问题是有很热烈的争论的，如对过去的主要错误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认识等。但时间不够，大会总共开了十天，接着就开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没有象现在我们为开党的“七大”做准备这样多的时间。会上没有解决的问题，决定组织专门委员会来解决。当时组织了研究秋收起义⁽²⁶⁵⁾、南昌起义、广州起义⁽²⁶⁶⁾三个委员会，由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可是许多代表已经回国，事实上也研究不出什么东西来。“六大”是把一些基本问题提出来了，做了结论，但因为研究不够，不能抓住问题的本质和中心，把问题平列了。

第一，对机会主义的分析。虽然指出了它是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没有抓住要点。布哈林⁽²⁶⁷⁾在大会上的报告，对机会主义的错误曾指出以下三点：一、中共在与国民党合作中没有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二、对同盟者不敢作正面的批评；三、动员群众的力量不够。这三点是机会主义的错误，但当时的情况也并不完全如此。从整个大革命的过程来看，特别是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六年中，党的两次中央扩大会议都强调了我们的组织上的独立性；对国民党的批评是有的，甚至有些批评是不恰当的；群众是动员起来了，在一九二七年初，我们就组织了二百万以上的农民协会会员，以后更多，工人有工会及纠察队的组织，从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可看到群众是动员起来了。只有武汉时期，机会主义者才说群众

运动过火了。当时是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是历史上空前的，就是在抗战期间也没有过。所以，虽然这三点是机会主义的错误，但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没有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国民党、政府、军队中争取领导权，搞土地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执行委员会会议对中国问题的决议包括这四点：改造国民党使工农分子大批参加进去，这就是争取党权；把农民协会变成为乡村的政权，这就是争取政权；组织七万军队，其中要包括二万共产党员，这就是争取军权；再就是要没收土地，搞土地革命。共产国际在没有把这个决议送来之前，先用电报把这四点告诉了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罗易。罗易收到这个电报后，不给我们党中央看，却拿给了汪精卫。汪精卫看了后大怒，骂共产国际有阴谋。罗易这种叛卖阶级的行为是和十月革命前夕加米涅夫的行为⁽²⁶⁸⁾一样的。后来中央也知道了这个电报的内容。这时离国共分裂还有两个月，如果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努力去做，还不失时机，但当时中央不重视这个指示，反觉得没有办法。身任国民政府农政部长的谭平山⁽²⁶⁹⁾以“不能纳农运入正轨”而辞职，希望国民党去整顿、改革下层政权，而不把农民协会变为乡村政权。关于军队，我们当时已经有一个军、两个师和武汉的警卫团，以当时的军校作骨干，再加上湖南、湖北的工农武装和武汉的工人纠察队，组织五万到七万军队是有可能的。还有朱德同志在江西有一个军官教育团，他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有这些条件不去运用，是不对的。后来军校被张发奎解散了⁽²⁷⁰⁾。对于土地革命问题，当时曾有争论，是扩大还是深入？主张深入的要在湖南、湖北搞土地革命；主张

扩大的却不要在湖南、湖北搞土地革命，而要向西北发展，首先打通西北国际路线，将来经过地方自治、减租减息再解决土地问题。讲到西北国际路线，也是有历史的。在广东时鲍罗廷就主张向西北发展，不要过早与帝国主义冲突，与国际打通后，再与帝国主义作战。在当时，这个意见是值得考虑的。可是到武汉之后形势变了，当时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北洋军阀张作霖⁽²⁷¹⁾。在中央内部有东下还是北上的争论。多数人的意见不主张东下，理由首先是蒋介石的欺骗在群众中还有影响，他也高喊北伐；其次是东下会与帝国主义过早发生冲突；第三是如果我们东下打蒋介石，张作霖可能从后面来打武汉。所谓北上的中心思想，是想避开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接冯玉祥⁽⁷⁵⁾出来，与国际打通。所以四五月间，唐生智带兵继续北伐。那时对冯玉祥的认识比对蒋介石的认识更错误。当打下武汉，以武汉为革命中心来对抗在南昌的蒋介石时，听说驻中央的共产国际代表伍廷康⁽²⁷²⁾还跑到南昌去见蒋介石，想同他妥协。冯玉祥在北平驱逐溥仪出了皇宫以后，跑到苏联大吹自己，说自己是工农合种生出来的。共产国际对他也弄不清，相信他是农民军队的领袖。当时，武汉的环境是困难的，在敌人封锁、内部动摇的情况下，把最后的希望押在冯玉祥身上，所以对“马日事变”⁽²⁷³⁾并不重视。在郑州打下后，什么人都跑到郑州去会冯玉祥了。鲍罗廷、加伦⁽¹⁷¹⁾也去了。可是这时蒋介石也派吴稚晖到了郑州。冯玉祥一面与武汉来的这些人应付，一面宣布他要去徐州会蒋介石。于是武汉去的这些人一连串地跑回来。这时汪精卫、谭延闿、孙科、顾孟余⁽²⁷⁴⁾等态度全变了，国民党的人更加动

摇了。共产党领导人六月三十日的让步（承认国民党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承认共产党员参加政府是以国民党员资格，共产党员可以请假退出，工农武装应在国民党领导之下，武汉工人纠察队编入军队，取消纠察队）是投降式的让步，企图以此来挽回局面，结果更糟。从整个过程来看，党的领导在大革命初期对的多，错的少；中期有对的，也有错的，有些还是原则的错误，如对中山舰事件及北伐等问题；到大革命的后期，机会主义路线形成。说大革命时期党的领导完全错误是不对的。如果当时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四点指示，局面不是不可以挽救的。“六大”决议对机会主义错误的总结，虽然指出它的最高表现是“不去发展土地革命和群众的阶级斗争，却只做上层勾结功夫，蒙蔽阶级的矛盾，不去夺取军队，不去武装工农，不能利用参加政权机关的机会，去为群众谋利，所以在紧急关头不去打破敌人的包围，而被敌人包围”，但与其他错误并列，没有指出主要的问题。所以从决议来看，不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第二，对“八七”会议⁽¹⁵⁾的总结。指出了“八七”会议的成功与成绩，也指出了有两个缺点：一是对国民党左派还保存了些幻想，一是对土地问题还不大彻底。这两点也不是中心问题。“八七”会议后，南昌起义的部队仍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并不是最主要的错误。土地革命当时是决定要干的，但经验证明实行土地革命的初期是不能够彻底的，总要有一个过程。我认为“八七”会议的主要缺点是：一、“八七”会议把机会主义骂得痛快淋漓，指出了要以起义来反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但到底怎样具体办，没有明确地指出，以作为全党的方向；二、“八

七”会议在党内斗争上造成了不良倾向，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而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的人身攻击。所以发展到后来，各地反对机会主义都找一两个负责者当做机会主义，斗争一番，工作撤换一下，就认为机会主义没有了，万事大吉了，犯了惩办主义的错误。我认为这是主要的缺点。

第三，对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也总结了。我看十一月扩大会议的错误方面多于正确方面。正确方面是放弃国民党的旗帜，打出苏维埃的旗帜。事实上在十一月扩大会议以前，海陆丰已经打起苏维埃的旗帜。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也不是用国民党的名义，而是用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认为十一月扩大会议的主要错误：一是认为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一直发展下去没有间断地达到社会主义；二是对革命形势的估计认为是一直高涨上去；三是认为革命的方针是全国总暴动。“六大”决议对这些都批评了。“不断革命论”是那时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罗米那兹提出来的，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对革命形势的低潮，“六大”没有严重地指出来。十一月扩大会议还有个错误就是规定了政治纪律，这也是国际代表提出的。我们当时觉得这一条很新鲜。政治纪律是为了处罚领导起义失败的同志，当时认为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²⁷⁵⁾是失败的，曾给他处罚，解除他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还处罚了其他同志。事实上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是成功的。他把起义的农民武装和武汉的警卫团带出来，到了井冈山，创造了井冈山根据地和以后的中央苏区。南昌起义时，谭平山是共产党员，是国民

党革命委员会委员长，他也因犯错误被开除出党。他被开除党籍的原因，是张国焘反对南昌起义，谭平山对一位师长说，张国焘若反对起义就把他杀掉。当时我任前委书记，这位师长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党内斗争不能这样做。后来有人把这事告诉了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代表就决定把谭平山开除了。今天看来，这个处分是不完全妥当的。如果给他别的处分或送他到莫斯科去，是会好些的。当然谭平山是有错误的，但张国焘也是有错误的。张国焘当时也受了处分。我和李立三也受了处分。

第四，“六大”对于南昌起义，总结也不够。南昌起义是反对国民党的一种军事行动的尝试，中央虽指出了南昌起义五点错误，但没有指出它的主要错误。我觉得它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当时如果就地进行土地革命，是可以把武汉被解散的军校学生和两湖起义尚存的一部分农民集合起来的，是可以更大地发展自己的力量。但南昌起义后不是在当地进行土地革命，而是远走汕头；不是就地慢慢发展，而是单纯的军事进攻和到海港去，希望得到苏联的军火接济。假使就地革命，不一定能保住南昌，但湘、鄂、赣三省的形势就会不同，并且能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第五，秋收起义。各地的秋收起义，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农民自动起来把农会变成政权的情况，当时在湘、鄂、赣三省到处都有。后来毛泽东同志到平江、浏阳等地，起义就搞起来了。他把队伍带到井冈山。鄂豫皖、赣东北等地也都受到秋收起义的影响而搞起来了。但也有些地方失败了，如鄂西、鄂

北等地，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当时中央领导上还有盲动主义的错误。主要的盲动主义是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以后，但“八七”会议就已有盲动主义的因素。例如“八七”会议以后普遍提出杀土豪劣绅的口号，甚至有些地方把杀土豪劣绅当作动员的口号，以致发展为烧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狂热性，在秋收起义时，在中央领导机关中就发生了。当时一部分人由于大革命失败而产生了愤慨、报复、拚命的情绪，这也是造成盲动主义发展的因素。

第六，广州起义。这时正是反革命猖獗的时候，全国的城市在反革命手里。广州起义是广州工人与革命军人联合起来的英勇尝试。“六大”指出广州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退兵时的一战，这是正确的。当时正是汪精卫继李济深⁽¹⁴³⁾之后统治广州，汪精卫要解散罢工委员会。工会还有一部分武装。跟张发奎从武汉回到广州的教导团的一部分，已由叶剑英同志当了团长，叶剑英同志说他们也将要被解散。同时，张发奎的军队正好开去挡黄绍竑⁽²⁷⁶⁾去了，如再等一个短时期，他们就会调一师兵力回广州解散工会和教导团。我们乘这空子把部队拖出来，并且根据情况估计，要起义是可能的，但坚守不容易。当时在广州的共产国际代表是德国人纽曼，他主张起义后坚守广州，建立苏维埃。起义的总指挥叶挺同志⁽³⁶⁹⁾是起义的前夜才请去的。叶剑英同志刚入党，搁在一旁没有被用。叶挺在起义的当夜主张把队伍拖出去，纽曼大骂叶挺动摇，说广州起义是进攻的，应该“进攻进攻再进攻”。第二天张太雷同志⁽¹⁷³⁾牺牲。第三天大败，仓皇退出。结果张发奎回到广州，来了个大屠杀。那时如果采取退却的方针，实行有

计划的退却，或同海陆丰农民运动会合，或同在曲江的朱德同志会合，都不会如此仓皇，可以保持更大的革命力量，可以保存更多的干部。

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²⁷⁷⁾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在皖南事变⁽²⁰⁹⁾时他是非常英勇的，想以个人的牺牲来保存革命的力量，比某些共产党员表现还坚决，而且迄今还未向国民党低头。

“六大”对这些问题的总结有缺点，没有抓住基本的问题，但一般的都总结了。在总结起义的经验时，反映出各地代表的一些地方倾向，即今天的所谓山头倾向。假如说到某地起义搞得不好时，某地的代表就很激动，总希望把自己的起义说得好一点。因此，就不易冷静地去总结这些经验教训。

中国党在策略的运用上所犯的错误是：在革命处于高潮应当进攻的时候，不善于进攻，如在武汉时期；在革命处于低潮应当退却的时候，不善于退却，如在广州起义时期。

四 革命形势和党的策略

关于对革命形势的估计问题，当时有过争论。中国代表曾争论到斯大林同志面前。斯大林同志说，现在的形势不是高潮，是低潮。李立三同志则说，现在还是高潮，因为各地还存在工人、农民的斗争。斯大林同志说，在低潮时也有几个浪花。

关于土地问题，当时也争论得很厉害。有人以为蒋介石也可能在中国实行俄国斯托雷平式的土地政策⁽²⁷⁸⁾。斯大林同志指出，中国不可能实行斯托雷平式的土地政策，因为蒋介石是依靠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的，他不可能实行这种改良的土地政策。

“六大”指出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因为当时所有能够引起革命的矛盾，没有一个得到解决。农民的武装斗争还部分地存在，是新的革命高潮的微弱的象征，但它并没有说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以后事变的发展证明，当时指出农民斗争将成为新的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预见是对的。一九三〇年红军打下了长沙。不管红军打长沙的政策对不对，但它可以说明当时的农民游击战争处在高潮中。“六大”指出民族革命运动又在生长，是指高潮快要到来，这在“九一八”事变后也证明了。所以，我们还不能说“六大”对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预见是性急或过早。

“六大”的争取群众、准备起义的基本策略方针是对的，同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的不同。“六大”当时反倾向斗争中的主要锋芒是反对左倾盲动主义与命令主义，因为机会主义已经过去，陈独秀、彭述之又没有到会，只有张国焘一人到了，而犯盲动主义错误的人到得比较多，受批评最多的是李立三同志。虽然如此，“六大”还有它“左”的错误。

首先，对于革命高潮与低潮，有几个问题一直是模糊的：一、对革命高潮的客观条件与主观力量区分不清楚，不知道主观的群众运动对促成革命高潮到来的作用。所以后来对革命高潮的估计，往往强调有利的客观条件，而不知道主观力量薄

弱是不能真正造成革命高潮的。二、没有把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区分清楚，不知道革命高潮是说明起义的条件正在甚至已经成熟，但仍不是说全国可以马上到处起义。如一九三〇年农村革命形势是高潮，但不能马上到处起义。立三路线的失败就因为要到处起义。三、没有把局部的高潮与全面的高潮区分清楚。所以当时虽然肯定了是低潮，但并没有很清楚地去了解这个问题。正因为没有把这几个问题弄清楚，所以我们一九二八年十月回国后，对革命高潮问题还是空洞地争论浪潮与浪花的问题。

其次，在策略方针问题上，也有几点是模糊的：一、虽然当时决定了我们是退却，争取群众，但是“六大”对于高潮是进攻，低潮是退却，并没有斩钉截铁地分别开来。二、没有弄清在总的退却中，还可以在局部的地方举行进攻与攻势防御。例如当时在井冈山就是局部的进攻，但在全国是退却的。三、没有弄清在进攻中也有退却。如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在进攻中有时还采取退却的办法。由于对这些问题没有清楚认识，所以不能使策略更具体明确，而当时是有可能去认识这些问题的。这是“六大”的缺点。

我们对革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没有很好分析，同这个问题相联系的“乡村中心”、“乡村战胜城市”的观点也没有产生。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与理论水平，要求“六大”产生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乡村作中心的思想是不可能的。当时虽然有了农民游击战争，但我们这种经验还不够，还在摸索。我也根据历史的经验与当时的情况研究了一下，太平天国是从乡村中发动的，占了南京才有以后的局面。还有一种“流寇”式的农

民游击战争，没有占城市，终归失败。这些使我感到要以城市作中心方能长期存在。俄国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革命失败后，农村也没有高潮，而且农村的革命运动比城市的工人运动更快地低落下去。至于其他的小国家更不用说。所以在历史上无论中外都找不到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从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正是处在整个农村革命的游击运动非常困难的时期，蒋桂战争⁽³³⁾还未爆发，想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以乡村作中心是不可能的。

讲到乡村中心的时候，还必须联系到一个问题，即农民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但当时要党不去用主要的力量与城市无产阶级联系，而把主要力量放在农村，这是史无前例的。共产国际的一切文献，一讲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就是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中国党经过长期的实践，证明在脱离城市无产阶级的情况下，也能够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党，这才能得出这个结论来。我们研究这个问题，不妨再从反面想一下，如果没有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即使以“乡村为中心”，也难免要失败，事实上也是有许多地方失败了。当时海陆丰的力量比井冈山大，各种条件都比井冈山好，但结果还是失败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那里无产阶级领导的思想没有展开，由于领导上还带有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气味的缘故。

当然，我不是说乡村中心的思想永远不会产生，在“六大”以后，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应该产生这种观点。但一九四〇年我到共产国际去，共产国际的领导同志都还担心我们离开工人阶级太远了。我说我们在农村里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有

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共产国际的一些同志听了之后大哗，不以为然。

毛泽东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是有其发展过程的。大革命前，有一次恽代英同志⁽²⁷⁹⁾看到陶行知⁽²⁸⁰⁾他们搞乡村工作，写信给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回信说：我们现在做城市工人工作还忙不过来，那有空去做乡村工作。一九二五年他回家养病，在湖南作了一些农村调查，才开始注意农民问题。在“六大”那时候，关于要重视乡村工作、在农村里搞武装割据的重要与可能等问题，毛泽东同志是认识到了的，而“六大”则没有认识。但是，关于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游击战争，我认为当时毛泽东同志也还没有这些思想，他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开始他还主张在闽浙赣边创造苏区来影响城市工作，配合城市工作，到给林彪⁽⁸⁸⁾的信中才明确指出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认为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乡村为中心。所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发展的。斯大林同志的思想也是发展的，例如他把中国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不是在一九二八年，而是在一九三〇年红军打长沙的前夜，这是接受了一九二九年红军发展的经验。

五 党的各项政策

“六大”对党的各项政策，大体上有了规定，如关于苏维埃区域的红军问题、工人工作、农民工作、土地政策等，都有单独的决定。但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政策是缺乏策略观点的，

深入地研究实际情况与群众观点非常不够，最明显的是不重视农村武装割据，搞军队和政权，其次是关于建党问题。毛泽东同志当时已经重视这些问题，这在一九二八年十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已经明白表现出来。

第一，关于建党问题。大革命失败以前，党的组织都是处在半公开或公开的状态。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区域的党要转为地下秘密党，在游击区域的党则要公开领导群众进行武装斗争。当时的建党问题，在白区是如何把公开半公开的党转为地下秘密党，在游击区域是如何以武装来建党的问题。“六大”对党的组织问题并未很好地讨论。记得我曾做了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但那时所知道的材料也仅限于白区城市党的问题。“六大”没有认识到白区党应以积蓄力量为总的方针，只注意在组织形式上改变和缩小。但事实上党的组织仍是半公开的，如上下级关系仍是那样密切，领导机关庞大，支部仍以领导斗争为中心，不是象列宁所说的为着积蓄力量保存干部甚至可以不作声息。当时并没有这种思想。如果谁有这种意见，那时一定会说他是机会主义。工作作风是“跑街主义”的，谁跑得最多谁就是好党员，谁要坐下来多研究一些问题，谁就会被当作坏党员看。后来刘少奇同志到北方，曾批评过这种作风，当时许多同志还认为他这种批评是不正确的。关于领导机关工人化的问题，在“八七”会议后，就把与机会主义作斗争看成了简单的人事撤换，这种形式主义影响到后来关于领导机关的工人化，把工人干部当作偶像，对知识分子干部不分别看待。那时李立三同志当广东省委书记，

曾说：知识分子的作用完了，今后只有依靠工农干部。所以到广州起义失败后，教导团有几百学生退到海陆丰，就没有把他们当作干部来使用，而把他们编到第四师去当兵，后来绝大多数在作战中牺牲了。关于思想斗争问题，也没有象毛泽东同志给林彪的信中那种循循善诱耐心说服的精神。在“六大”会议上是有“山头”倾向的，不能完全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特别是与自己有关的问题，把反对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看成人身攻击。那时机会主义的代表是张国焘，盲动主义的代表是瞿秋白同志，两人争论不休。后来布哈林出来讲话，说就是你们这两个大知识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来代替你们。他这话在当时和以后影响都非常不好，使工人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相互对立。

第二，关于工人运动。当时提出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是对的，并且写在决议上了。可是如何去争取？是组织赤色工会⁽⁶⁰⁾去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呢，还是到黄色工会里去工作来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呢？“六大”决议对这个问题没有作明确的规定。后来在关于职工运动的决议上，决定以组织赤色工会为主。这是错误的。大革命时期，我们在上海、武汉、广州等大城市是组织了广大的工人群众的，可是大革命失败后，这些工人组织差不多都被摧垮了，即使有留下来的工会，会员数量与党员差不多，已经很少。当时存在的还有这样几种工会：一种是原来的工会，到国民党部那里去登了记，成为合法的组织；一种是原来的工会，没有到国民党部那里去登记，也还存在；还有一种是国民党派人组织的工会。当时这些工会中有的还是有群众的，再去组织赤色工会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应该是到

黄色工会里去工作。关于职工运动的决议确定以组织赤色工会为主,这与中国党内对工人运动“左”的倾向和职工国际⁽²⁸¹⁾一贯的“左”倾是有关系的,对后来党的职工运动过左起了很大影响。关于工厂委员会的组织,是企图在工人斗争中建立既非赤色工会亦非黄色工会的工人统一组织,今天看来在当时也是不可能的。

第三,关于农民运动。“六大”写了关于农民与土地问题的两个决议。关于如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是要经过一个长期摸索过程的,而且要有许多具体的办法,如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这就是很好的办法。如果根据“六大”的原则,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只分给贫苦的农民,那就必然发展到从肉体上消灭地主或驱逐地主出苏区。这样对斗争是不利的。

第四,关于苏维埃问题。从决议中看不出象毛泽东同志那样的在农村中创造苏区长长期割据的思想,而是抄袭苏联的经验,看重城市苏维埃,所以仍是教条主义的。

第五,关于反帝反军阀斗争。军阀和帝国主义我们都是要反对的。但“六大”是把他们看成铁板一块,没有矛盾可以利用,不是象毛泽东同志那样特别看重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来发展我们的力量。

第六,对其他党派的政策。没有加以区别,把他们一律看成敌人。如改组派当时是反对我们的,但他们同南京的矛盾是可以利用的。再如第三党,对他们在思想上瓦解我们这一点应该反对和批评,但在反蒋问题上仍是可以与他们合作的。再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时应该在城市中间发动广泛的民权主

义斗争，“六大”没有着重指出这一点。

第七，关于军事运动。“六大”有一个秘密的关于军事工作的决定，没有宣布，里边有一部分是关于白军工作的。当时对这一工作的重视是非常不够的，而且把白军工作完全放在士兵当中也是一个偏向。不错，在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军队中许多军官是反动的。但中国雇佣式军队的特点，军官在军队中是有很大作用的。“六大”认为在官长中进行工作就是军事投机。后来的事实证明，敌军大部队的哗变和投降红军，都是由于我们在军官中进行了工作。如广西李明瑞的一个师变为红军⁽²⁸²⁾，江西第二十六路军的起义⁽²⁸³⁾，都是由军官领导的。

六 “六大”本身及其影响

(一)共产国际对“六大”的影响。“六大”是直接共产国际领导下召开的，今天对它应有个分析。我上面说的“六大”正确的地方，主要是斯大林同志的影响。这里有两点证明：一是 一九二八年二月间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是经过斯大林同志看过、改过的，它成了“六大”的基本根据。主要的问题都是这个决议上有的，如革命的性质、动力等。二是斯大林同志在“六大”前夜曾和中国党的几个负责人谈话，具体地解释了革命性质与革命形势这两个问题。

当时在“六大”做实际工作和做报告的是布哈林、米夫等人。布哈林是共产国际书记，米夫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

他们对“六大”当然也会有影响。如布哈林在大会上做报告骂张国焘和瞿秋白同志，说他们是大知识分子，要让工人干部来代替他们，这是一。二、布哈林对中国苏维埃、红军运动的估计是悲观的。他认为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他要高级干部离开红军，比方说，要调朱德、毛泽东同志去学习。所以我们回国后就指示要调朱德、毛泽东同志离开红军。朱德、毛泽东同志不同意。后来蒋桂战争起来了，我们觉得红军有可能发展，就作罢了，但没有认识到这种调动是错误的。三、至于对中国富农的问题，布哈林在苏联对富农问题虽然犯了错误，但是“六大”对农民问题的决议强调了富农的封建性，又说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富农，所以没有多大坏的影响。

“六大”决议是瞿秋白同志起草的，米夫、布哈林都修改过，拿回来后秋白同志又改过。米夫的作用在这里还不大。他起的主要作用是：一、散布了一些对中国党负责人轻视、不相信的话，有影响。在“六大”筹备选举时，他在筹备选举的委员会中说过，中国党负责人理论上很弱，现在有些较强的同志如王明⁽⁶⁹⁾、沈泽民⁽²⁸⁴⁾等，暗示可以提拔他们参加中央。当然，当时是没有什么人理他的（后来传出去说，米夫要提他们当中央委员），可是这种说法却起了影响，造成了东方大学等校学生对党的负责人轻视，以致后来发生了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斗争。二、造成了工学界限。例如他对向忠发⁽²⁸⁵⁾极力地捧，利用他放炮，要他反“江浙同乡会”等。在“六大”会后，有的代表没有走，还召集了几个报告会，王明还报告了反“江浙同乡会”的斗争。一般地说，代表们对米夫印象不好。三、在组织

上起了些作用,但不是主要的。例如,在“六大”工作人员的人选上,东方部的人员多,这是有宗派的意味的。

(二)代表成份。今天看来是不很健全的。代表有七十五人,各地方的都有。到会的代表,连工作人员旁听的,共有一百十二人。不健全的地方在于:一、太重视工人成份。工人代表要占多数,这是可以的。但是,大革命中工人干部牺牲很多,有些做实际工作的领导同志又调不出来,所以很多是从支部中找来的代表。大革命后,支部负责人都是新的,老的都牺牲或离开了,所以许多人是很弱的。七十五个代表中,工人有四十一人,经过大革命锻炼的人不多。二、没有把当时有革命经验的干部集中起来参加“六大”。共产国际三月底来电通知,四月代表就要走。当时要毛泽东同志去是有困难的,但还有许多同志是可以去的,如刘少奇、任弼时⁽²⁸⁶⁾、恽代英、陈潭秋⁽¹²⁷⁾、李富春⁽²⁸⁷⁾等同志。如果多去一些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就可以多反映一些实际问题和意见。但当时觉得国内工作更重要,所以没有去。三、有失败情绪、“山头”倾向和人身攻击等。所以讨论问题不能深入,一讨论到实际问题就闹起来。例如,当检讨到两湖起义的错误时,两湖的代表们便觉得他们的工作中也有些成绩而极力争辩。但必须说明,当时各地代表团中并没有宗派小组织的活动。

这是三个主要的弱点。代表成份不健全,问题就不能深入讨论。加之在领导上又没有少奇、泽东等更正确的同志参加。

在选举中,有多选工人为中央委员的倾向。三十六个中央委员中就有二十一个是工人。过去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工人

领袖虽然不少,但党对他们的教育不够,而知识分子干部中有许多是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做了许多实际工作,有经验的不少。由于太强调工人成份,很多较好的知识分子干部参加中央工作就受到了限制,如刘少奇同志只被选为审查委员会的书记,没有被选为中央委员。恽代英同志也没有选上,到二中全会才补上。这和后来中央很弱是有关系的。但当时对选举的态度并没有什么宗派主义,如毛泽东同志和关向应同志⁽²⁸⁸⁾等得票是很多的,而张国焘和瞿秋白同志等犯过错误的,票数最少。

(三)大会时间。大会没有充分时间来研究讨论问题。代表在思想上没有什么准备,代表又不是各地选来的(只有广东来的是开会选出的,其他大多数是中央指定的),对许多决议的讨论也不充分,只是所谓原则通过交委员会在文字上修改。如果时间多一点,可能好些。

总起来说,“六大”关于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形势和策略方针等问题的决定基本上是对的,所以说“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对的。但错误的方面也不少,就是说,在具体的实际的问题上犯了许多错误:一、不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农民斗争与武装割据,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土地问题。二、不认识中国阶级关系变化的复杂性,没有把策略观点着重放在争取中间阶级上。三、不认识革命形势发展的不平衡性,因而没有重视农村工作与建党工作,虽然当时还不可能产生乡村包围城市的观点。四、没有更认真地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从而认识武装的重要,以武装建党、建政、做群众工作,这些,毛泽东同志当时已经做了。所以说,“六大”是有原则性的错误,对

以后发生了坏的影响。毛泽东同志是正确的，但是，“六大”决议在当时的影响更大，因为“六大”是全党性的，毛泽东同志还没有成为全党的领导，这是党的不幸。

我们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是从党一产生就开始的，是逐步发展的，毛泽东同志是一个代表。“六大”正确的东西属于这方面。“六大”也有毛病，犯了一些错误。但这些错误没有形成路线错误，没有形成宗派主义，虽然一些倾向是有的。这些，对以后立三路线、宗派主义的形成是有影响的，但不能负直接责任。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关于大后方文化人 整风问题的意见*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八日)

对大后方文化人整风的问题,我们有以下意见,请考虑:

(一)如文化人整风只限于文委⁽²⁸⁹⁾及《新华日报》⁽²⁹⁰⁾社两部门的同志,则可行;如欲扩大到党外文化人,似非其时。因目前民主运动正在开展,正好引导文化界进步分子联合中间分子,向国民党当局作要求学术、言论、出版自由的斗争,向顽固分子作思想斗争,揭露国民党文化统制政策的罪恶,并引导其与青年接近,关心劳动人民生活,以便实际上参加和推动群众性的民主运动。这也就是很好的整风。否则,抽象地争论世界观、人生观,甚至引起不必要的对历史问题的争论,必致松懈对国民党内顽固派的斗争,招致内部的纠纷,这是很要慎重的。至于延安文教大会⁽²⁹¹⁾,只能以其群众观点、实事求是、统一战线、民族化、大众化诸方面的影响,教育大后方的文化人,而不是以它的决议和内容来衡量他们的工作。

(二)即便对文委及《新华日报》社同志的整风,历史的反省固需要,但检讨的中心仍应多从目前实际出发,顾及大后方

* 这是给当时在重庆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的王若飞同志的电报,与董必武同志联名从延安发出。

环境,联系到目前工作,以便引导同志们更加团结,更加积极地进行对国民党的斗争,而防止同志们相互埋怨、相互猜疑的情绪的增长。

论统一战线*

(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

同志们：我想讲两个问题，一个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着重讲国共关系，一个是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问题。合起来说，都是关于统一战线的问题。

一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

自从我们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到去年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有了发展，实际上是一个东西。联合政府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上的最高形式。国民党对于我们的主张，不管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好，民主共和国也好，联合政府也好，总是反对的。因为他是站在极少数人的利益的立场上，反对我们代表的极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利益。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告诉我们，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方面是国民党政府压迫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另一方面是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我们知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酝酿时间很长，差不多“九

* 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一八”以后就逐渐向着这个方向发展。从“九一八”到现在，可以分成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九一八”到西安事变⁽²³²⁾；第二个阶段，是从西安事变到“七七”事变；第三个阶段，是从“七七”事变到武汉撤退；第四个阶段，是从一九三九年国民党五中全会到去年国民参政会开会；最后一个阶段，是从我们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一直继续到现在。在这五个阶段中，国共两党在全国抗日与民主的问题上，长期地存在着原则的分歧和严重的斗争。

第一个阶段，从“九一八”到西安事变，有五年多时间。国共两方面斗争的中心，是抵抗日本侵略还是不抵抗日本侵略。我们这方面，在全国人民面前所提出的，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国民党当局，在全国人民面前所提出、所坚持的，是“攘外必先安内”，实际上就是内战的方针。“九一八”以后，我们向全国国民党的军队提议，在停止进攻、给予人民以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三个条件之下，订立停战协定，以便一致抗日。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已经写了。我们的号召得到了若干国民党军队的响应。例如察北同盟军⁽²⁹²⁾、福建人民政府⁽²⁹³⁾和十九路军，以后的东北军、十七路军，都响应我们，跟我们合作。其他一些地方系的军队虽然不是完全同意我们的口号，也和我们有些合作。就连国民党中央系的军队，在江西打我们时，也有主张开到华北去抗日的。但是那时国民党蒋介石怎样对付呢？对于我们，是不断的“围剿”，更加猖狂的内战。对于那些和我们合作的友军，是进攻他们，解散他们，消灭他们。对于自己的嫡系军队，他发过这样一个命令，“侈言抗日者，杀无赦”。就是谁敢多说抗日的话，就杀了他。以后，一九三五年

华北事变发生了，我们的红军主力北上了，我们就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和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并且在一九三六年给国民党的信⁽²⁹⁴⁾中，提议召集国防会议，发动抗战，召集民选的国民大会，实现民主共和国。在行动上，我们东渡黄河抗日⁽²⁹⁵⁾，响应那时华北的“一二九”运动⁽²⁹⁶⁾，掀起了全国的救亡运动。这时候国民党当局却调了大兵到山西阻拦我们抗日，目的是想把我们消灭在西北地方。在西安事变时，我曾经问蒋介石：“我们要求停止内战，为什么不停止？”他说：“我等你们到西北来。”我说：“我们已经到西北一年多了。”他就没有话说了。他的意思很清楚，是要在西北消灭我们。所以在西安事变前，还有山城堡的一仗⁽²⁹⁷⁾。东边也堵，西边也堵，就是要消灭我们。对于全国的救亡运动，他是极力地压迫，最后发生七君子⁽⁹⁵⁾入狱的事。所以那时毛泽东同志写的我们党给国民党的信里说：“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虽然这样，但是因为我们不断地要求，全国人民不断地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所以国民党先派了两个代表到瓦窑堡来谈判，以后我们就派了代表潘汉年⁽²⁹⁸⁾同志去跟他们谈判。国民党蒋介石对谈判的想法是怎样呢？那时他是把我们当投诚看待，想收编我们，直到西安事变以前，还是这样的想法，要把我们的军队顶多编三千人到五千人。至于对国民党军队中很多愿意抗日的军队，特别是东北军，就压迫他们。蒋介石对张学良将军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你的责任就是剿共，不许到绥远抗战。若要不然，就把你换掉。”以后召集西安会议，陈诚⁽⁸²⁾来了，蒋鼎文⁽⁹⁰⁾也来了，是准备以蒋鼎文代替张学良的。这样就逼出来一个西安事变。对西安

事变，我们党坚持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取得了张学良⁽⁹¹⁾、杨虎城将军⁽⁹²⁾的同意，把蒋介石放回去。蒋介石本人当时具体的诺言是什么呢？就是“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但是张学良送他到南京以后，他就把张学良扣起来，把杨虎城送出洋。这样一来，就激动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几乎把和平破坏。而且他又拿军队来压迫，派特务挑拨，闹出了杀王以哲⁽²⁹⁹⁾的事情。从此可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他的内战思想还没有死，并且一直没有死过。现在还可以说一件事，宋子文⁽⁹⁰⁾也是当时谈判的所谓和平使者，那时他答应在蒋介石出去以后，负责改组南京政府。结果这话一直到今天，已经有八年，仍没有兑现。去年我在重庆见他时，说过这样一句讽刺话，我说：“西安事变时你答应的诺言，我还没有给你宣布过。”事实证明他一直没有兑现。所以在这第一个阶段，虽然内战是停止了，和平是取得了，但这是逼出来的。这就是我们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方针：逼蒋抗日。但蒋介石内战之心并没有死。

第二个阶段，从西安事变到“七七”抗战，大概有半年多时间。两方面争论的中心，是真正准备抗战，还是空谈准备抗战。当时我们党在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中，毛泽东同志在党的苏区代表会议的报告⁽³⁰⁰⁾中，都是这样说：要真正地实行民主自由，真正地准备抗战。要真正准备抗战就要有民主。我们的中心口号是以民主来推动抗战。国民党当时的方针是什么呢？是“根绝赤祸”，拖延抗战。就是要把共产党的活动消灭、根绝，就是在准备抗战的借口下把抗战拖下去。这是当时蒋介石的思想。

我们来看事实。在一九三七年二月，我们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上，提出了四项诺言、五项要求。四项诺言大意是，答应改编我们的军队，把我们的苏区改为民主的边区，停止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政权，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五项要求大意是，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给人民自由和释放政治犯，召集各党派会议，真正实行抗战的准备，改善民生。而国民党的回答是什么呢？就是来一个“根绝赤祸”的决议案。那决议有四条：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政权，停止赤化宣传，停止阶级斗争。这个东西是双关的，因为红军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红军，但红军还存在，苏区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苏区，但苏区还存在。所谓停止阶级斗争，停止赤化宣传，就是不许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有政治活动。那时候一方面和平了，一方面又埋伏了文章。这个文章一直埋伏到现在，还是要取消我们的军队和政权。那时候国民党内也发生了一部分人跟我们合作的运动。这一部分人，孙科⁽⁹⁴⁾、冯玉祥⁽⁷⁵⁾等也在内，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决议案，但是没有通过。那时我们曾经主张召开民选的国民大会，成立民主的政府。毛泽东同志在五月代表会上做了报告，我奉中央命令也写了一篇文章⁽³⁰¹⁾，国内国外的民主分子都很赞成。但是国民党的回答是什么呢？搞包办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现在准备召开的国大的祸根，就是那时候种下的。那时我们主张召开各党派会议，但国民党来了个庐山谈话会⁽²¹⁸⁾，不是大家坐下来开圆桌会议，一道商量，而是以国民党作主人，请大家谈话一番。这个谈话会的方式，一直到上次王世杰⁽³⁰²⁾同我谈判时，还想采用，提议组织什么政治咨询会，结果还是谈话会。不过庐山谈话会的

时候，共产党没有份，我同林伯渠⁽³⁰³⁾、博古同志⁽³⁶⁸⁾三个人不露面，是秘密的，现在他们提议的办法，是给个“公开”，我看就是差了这一点。我们同国民党的谈判一次在西安，一次在杭州西湖，两次在庐山进行⁽³⁰⁴⁾。谈判的对象是顾祝同⁽³⁰⁵⁾、蒋介石等人。谈判的内容是要他们承认我们的军队，承认我们的边区，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组织各党派的联盟，就是统一战线。国民党蒋介石的回答是什么呢？他只准我们编三个师（四万五千人），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而且无论如何不给建立统帅部，他要直接指挥。对边区呢？开始承认了，但是抗战以后又推翻了。蒋介石有一次对朱总司令说：“你抗战了还要边区！”他想给个总司令的名义，就可以取消边区。结果平型关打了一个胜仗⁽³⁰⁶⁾，他又承认了，那是在行政院第三百三十三次会议通过的。到南京撤退，他又把这个决议束之高阁，直到现在还没有承认。对我们的党，就更荒唐了。我们要求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建立各党派的联盟，但他在庐山第一次谈话会上居然敢说：“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你看，他竟会这样想！我们这样好好地同他谈判，他却以送杨虎城出洋的办法来对付我们。关于发表国共合作的宣言问题，在第二次庐山谈话会上，我们带去起草好的宣言，他要动手改两句，那时候我们还客气，同意他修改了两点。但修改了他也不发表，总想把共产党合法这一点抹杀掉。要不是“八一三”打响了，就不会允许我们建立八路军总指挥部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的组织。朱总司令和我同叶剑英参谋长到南京，开始蒋介石还没有决定给八路军的名义，但是到上海打响了，他从庐山跑回来，觉得这是全面战争了，才发表了八路军的番号，紧跟着又发表了十八集

团军的番号，要我们的军队去打仗。后来宣言也发表了，但蒋介石又发表了一个谈话，一方面是承认我们，可是另一方面，还是说要取消红军，取消苏区。他说我们是一个派，不承认我们是一个党，强调要集中在国民党领导之下，还是以阿 Q 的精神来对付我们。

这些经历证明，我们的主张把全国人民振奋起来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全国抗战。这样，抗战是逼成了，谈判也算逼成了，统一战线也算逼成了。同时又证明，只有人民有力量才能逼成。而且还证明，蒋介石的反共思想是不变的。

第三个阶段，从“七七”抗战到武汉撤退，大概有一年半时间。这个时期斗争的中心，是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我们党的口号，是持久战争、人民战争，就是全面的抗战、全民族的抗战。而国民党方面呢？他们是要速决战，只许政府抗战，不许人民起来，以此来对抗我们的持久战争、人民战争的方针。首先是“八一三”后发生的对出兵问题的争论。我们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方针，是要分批出兵，不要一下子开出去。我们主要是到华北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去创造华北战场，作持久战的准备，这样才能取得胜利。而国民党要求我们一次开出去，并只指定五台山东北边的小块地方（如涞源、蔚县）为我们的防区，企图在那个山屹崂里叫日本人把我们包围消灭。

在全国范围内，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方针是坚持持久战。而国民党呢？是幻想速胜。他们觉得，只要打几个胜仗，就可以引起国际的干涉。最大的希望是苏联出兵，次之就是英

美在上海干涉。所以他们就打阵地战，把一二百万军队都调到上海，拿去拚，牺牲极大。在南京快丢失之前，蒋介石曾打电报给斯大林说：啊呀！我这个地方已经不能苟安了，请你赶快出兵吧！他还要求同苏联缔结军事协定。事实上，苏联已经帮助了中国的抗战，帮助了军火、飞机，还和中国签订了一个互不侵犯协定⁽³⁰⁷⁾，在政治上给以帮助。蒋介石实行阵地战的结果，把主力拚掉了，所以在南京撤退的时候曾一度动摇过，想议和，不过没有搞成，因为日本的条件很苛刻，主要的还是全国的抗战高潮已经起来了，他不敢投降。由于国共双方采取这样不同的方针和做法，结果我们在华北就创造了游击战场、根据地，而他就失掉了华北和华中的大块土地，一直到武汉撤退，在许多次的阵地战中，损伤了很大的兵力。这是战略方面不同的意见。当然那个时候在武汉，我们自己也有错误。就是说，当时在武汉做领导工作的同志，我也在内，着重在相信国民党的力量可以打胜仗，而轻视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在战争上强调运动战，轻视游击战。所以在武汉时期，我们在长江流域的工作，没有能象华北一样，利用国民党军队撤退的时候，到农村去，发动农民，广泛发展游击战争。在武汉谈判当中，我们还是继续坚持各党派联盟的主张，就是建立统一战线组织，制订共同纲领，改革那时的政治机构。而国民党方面呢？他们提出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口号，想把我们吸收到国民党里头去，加以溶化。他们那时叫“溶共政策”，好象要拿水把我们化了。国民党是水做的林黛玉，但是我们没有做贾宝玉，化不了。另外，他们提议，只要你们加进来就好了。我们说，组织一个联合的同盟是可以的，你们是一份，我们也是一份，

各有独立的组织。我们进到国民党里面去，要保持我们共产党的独立的组织，也可以象大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一样。但蒋介石又不干，他说，党外不能有党。我们说，你那个党内就有派，党外有党有什么关系！他说，你们可以进党来作为共产派，不要在外面。他就是想把我们将溶化，当然用这个办法是谈不通的。他组织三青团，我们也主张共同参加，发展青年运动，但蒋介石也不干，他就是要拿三青团把一切青年组织都取消，统一到他那里，不许有别的党派在里面活动。这当然也就谈不通。他对我们在敌后的政策，就是让我们到敌后打敌人，削弱我们。正如朱德同志那天说的，国民党在华北很快地就退走了，不能不让我们去。所以武汉时期，他答应要我们到华北、山东去发展游击战争。徐向前同志⁽³⁰⁸⁾带一一五师到山东去，还得到了他的同意。但是他看到我们的游击战争有发展，人民力量有发展，建立了根据地，就害怕，所以紧跟着就派鹿钟麟，张荫梧⁽³⁰⁹⁾带兵同我们磨擦。我们在政治上主张要改革政治，成立民意机关。他那个时候，一方面搞参政会，另一方面还是一党专政，参政会只是一个“作客的机关”，并且还解散了一些人民团体。

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出，国民党蒋介石速胜论失败了，依赖外国参战也落空了，投机不成，投降又不敢。他被八路军的力量、人民的力量逼得不能不走向持久战，不能不在政治上表示一点进步。但他的投机性、反动性还是继续保留的。

第四个阶段，从一九三九年国民党五中全会一直到去年参政会国共两党公开谈判为止，时间整整有六年之久。我们党跟国民党争论的中心，也就是象我们党一九三九年“七七”宣

言上所说的，我们是坚持抗战、团结、进步，而国民党则是要妥协、分裂、倒退。这种斗争到现在还继续进行着。我们在这六年当中，主张积极抗战，求进步，靠自己。我们一方面要求国民党能够这样做；另一方面我们在敌后做出了成绩，创造了十九个解放区，发展了很多的军队，证明了我们的办法是对的，这样才支持了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推动了全国的民主运动。可是国民党在这六年中怎么样呢？是相反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毛泽东同志在这个会议的报告中，也分析了他们依靠外国帮助，等待胜利，勾结敌人伪军来制造内战的这一套。正因为这样，所以在这六年中，就有三次反共高潮，进行过三次谈判。

关于这两个“三”，也可以说一说。开头有一个帽子，就是国民党的五中全会。五中全会是一九三九年一月武汉撤退以后开的。我们党在那个时候去了一个电报，态度是要求进步，反对汪精卫投降，主张严整抗战阵容，刷新政治，改革政府。但是国民党五中全会的回答是，来一个《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会上原则通过，会后国民党蒋介石又对我们军队，对边区，对共产党，对人民的活动等等，订了许多限制的办法。总起来就是：首先，抗战只有一个领导，军令政令必须统一。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主张。第二，取消“特殊化”，反对所谓“封建割据”，对边区要包围要封锁。这也是一直搞到现在的。第三，不许再叫八路军，只能叫十八集团军。这是什么意思呢？八路军是平时的军队编制，就是说平常的时候也是有的，而十八集团军是抗战时期的军队编制，既然是战时编制，那么战后可以取消了！文章在此。但是华北的老百姓回答了他：还是八路军这个名字

便当，十八集团军字多不好念。蒋介石订这一条就是他准备取消八路军的一个步骤。以后他就不断地把队伍开到华北，跟我们磨擦。先后有朱怀冰、石友三⁽³¹⁰⁾、高树勋⁽³¹¹⁾、汤恩伯⁽³¹²⁾这些人。并且还要取消我们的办事处，只许西安和重庆的办事处存在，其他的都要取消。因此，平江惨案⁽³¹³⁾发生了，竹沟惨案⁽³¹⁴⁾发生了，广东韶关办事处、桂林办事处也取消了。这些都是那个时期的事情。第四，不许国民党区域有共产党的组织。所以以后发现了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就破坏。不许有秘密的人民运动，而且不许宣传。所以《新华日报》⁽²⁹⁰⁾常常被检查、扣留，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许多文章不许登。一九三九年国民党五中全会这个方针，一直贯彻了七个年头。我们说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当然，根子是从历史上来的。

有了这个帽子，底下就有了三次反共高潮。第一次，朱德同志已经说了，是从打边区、取消我们的办事处和制造平江惨案开始。最主要的是在华北，从新军事变⁽³¹⁵⁾一直到朱怀冰和我们磨擦。以后蒋介石打不下去了，失败了。朱德同志说得很对，蒋介石就是怕一个东西，怕力量。你有力量把他那个东西消灭得干干净净，他就没有说的。朱怀冰被消灭完了，蒋介石从来没有提过这个事情。他只好捏住鼻子叫卫立煌⁽⁹⁸⁾和朱总司令谈判，划漳河为界。第一次反共高潮过去了，就来了个第一次谈判。我们的方针是有理、有利、有节。我们打了胜仗不骄傲，还是和他谈判。我们是相忍为国。那次是我出去谈判的⁽³¹⁶⁾。我们和他一谈判，他就想讨一点便宜。那时谈判有四件事：党的合法，边区的承认，军队的增加，还有作战地区的划

分。中心是在第四条。他就是想把我们赶到黄河以北，不要新四军在长江以南。那个时候有几个“北”：山东是鲁北，山西是晋北，还有一个黄河以北。他是想把我们往北送，这真是“投畀有北”⁽³¹⁷⁾。那我们就不干，所以发生了严重的争论。他毫无让步。我们作了一点让步，答应皖南部队退到长江以北，也是一个“北”，叫做江北。但是他还不干，来了一个何白《皓电》⁽³¹⁸⁾，要我们到黄河以北，也是一个“北”。他坚持《中央提示案》⁽³¹⁹⁾，因此引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这是一九四〇年冬天开始，是从苏北战争埋伏下来的。苏北战争是他的阴谋，他原来想先从苏北下手，后打皖南。因为苏北我们的力量小，而他有韩德勤、李守维两个军⁽³²⁰⁾在那里。他们企图北面一压，南面一打，我们就只有“喝水”了！那晓得他搞错了，因为苏北有刘少奇同志的领导，改正了项英同志⁽⁶¹⁾的错误。陈毅同志⁽³²¹⁾领导军队，执行了中央的正确方针，来了一个“退避三舍”。他打来了我们就先退。后来在黄桥来了个反击，消灭了他们两个师。蒋介石捏住鼻子没有说话，但他是要复仇的。在苏北战争结束后，王懋功⁽¹⁵⁵⁾就到顾祝同⁽³⁰⁵⁾那里去，布置皖南事变⁽²⁰⁹⁾，但是表面上他还想麻痹你一下。那时候我在重庆。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那一天，就是当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放回去的那个日子，他忽然请我去他那里，大谈我们是患难朋友，大灌米汤。我看米汤不好喝，引起我的警惕，赶紧打电报给毛泽东同志，说这里面有文章。果然不过十天，他就动手包围皖南的部队，来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因为当时皖南领导部队的同志犯了错误，所以受了损失。他就更加蛮横起来，宣布取消新四军的番号。但是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来了一个

回击，他不承认我们承认。从此新四军变成只受共产党领导、指挥的军队，不受蒋介石领导了，于是就麻雀满天飞，从十万人发展到三十万人，从三个省的地区发展到现在七八个省。这就是第二次反共高潮。等到第二届参政会的斗争取得胜利，第二次反共高潮就结束了。从第二次反共高潮到第二次谈判，中间隔的时间很长，因为这时候正是一个复杂时期，有日苏协定⁽³²²⁾，德苏战争⁽¹⁹⁴⁾，太平洋战争⁽¹⁹⁵⁾，以及新疆问题⁽³²³⁾。第二次谈判是在一九四二年的下半年，但事前也有些小的接触。日苏协定订立以后，紧跟着有中条山战役，蒋介石怕中条山守不住，希望我们配合，但主要是试探我们还打不打日本，当然这完全是他的糊涂想法。我们表示配合作战，但是蒋介石又怕我们，不要我们过漳河之线，要限制我们作战，这就很难配合。他在中条山，我们在漳河北怎么样打呢？同时他又不给我们下作战命令，要我们自己打。我们要一点补充，他说，只要打，我不会辜负你们的。我们打了，他又取消诺言，食言而肥。这是一次接触。后来，太平洋战争前夜，中国的情势很紧张，日本和美国有妥协的可能，这时要开参政会，他又表示要举国一致。我们为了阻止日美妥协，表示在抗日问题上还是和他一致，所以参加了参政会。那时候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把叶挺将军⁽³⁶⁹⁾放出来（皖南事变中叶挺将军很勇敢，站在最前线 and 国民党斗争）。蒋介石答应了这个条件，并由张群⁽³²⁴⁾担保。我们要求参政会以前就放出来，他不干。我们也打个折扣，那时候董必武同志⁽³²⁵⁾和邓颖超同志⁽³²⁶⁾都在重庆，两个人就只出席一个人，他来这一手，我们也来这一手。参政会开了，他仍不放。根据最近的消息，叶挺将军被

蒋介石搞到重庆戴笠的特务机关里去了。世界上最不守信义的莫过于蒋介石。这是这个时期小的交涉。到一九四二年下半年谈判以前，蒋介石还想来一套手法，因为那时候新疆问题解决了，有点得意忘形，他说：“我到西安去请毛泽东先生出来谈一谈。”后来林彪师长去进行第二次谈判。当时我们还是希望在抗战中能找到一个团结的办法，所以在一九四二年党的“七七”宣言中表示出团结的态度。蒋介石以为我们有点可以让步的样子，提出的条件更苛刻，坚持我们的军队不能多编，仍是八个师，军队编了以后党才能合法，边区要改为行政区，作战地区还要向北移动。这个谈判拖了很久，实际上是他不想解决问题。他是想继续投机，希望那时候有一个日苏战争，一旦日苏打起来，就把我们赶到北边去，实行他原来的计划，所以他就要拖。我和林彪⁽⁸⁸⁾去见张治中⁽³²⁷⁾，他公开说“还不是拖”！这里头又有文章，结果拖出来一本《中国之命运》，拖出来一个第三次反共高潮。那个时候正遇上共产国际解散⁽⁶⁶⁾，蒋介石以为我们党内会有争论，于是就投这个机，来了一个取消中国共产党，而且还来了一个包围边区，打我们的心脏。第一次反共高潮打华北，第二次反共高潮打华中，第三次反共高潮打西北。我们揭露了他，全国人民都同情我们。在国际舆论上，不管苏联也好，英美也好，都反对中国的内战。所以就把蒋介石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压下去了。国民党十一中全会以后，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又表示愿意政治解决，可是来了个八字由头，说我们“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第三次反共高潮过去了，我们表示，如果他愿意政治解决，我们总是可以谈的。所以去年林伯渠同志又出去

进行第三次谈判。这次谈判正值宪政运动⁽³²⁸⁾之期，我们就表示要实行民主和宪政，提出了政治问题三条，具体问题先是十七条，以后改为九条，其他的八条改为口头的，这样正式文件共有十二条。从西安谈到重庆，一直谈了差不多半年，还得不到结果。蒋介石就来了第二次《中央提示案》，集中起来就是要我们做三件事：第一，十个师以外的队伍全部限期取消。第二，规定要十个师集中到那里就必须到那里。第三，敌后解放区所有的政府一律都交给流亡重庆的省政府接收。这样的条件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谈判就在林伯渠同志在国民参政会报告后告一个段落。

从这三次反共高潮和三次国共谈判中可以看出，国民党继续反共和内战的方针，在第四个阶段中特别明显，所以谈判时他们充满着反共思想，反共高潮时就打起来了，这就是内战。虽然这样，文章还没有了结，还有新文章：不是再来第四次反共高潮，就是再来第四次谈判。结果，不是反共高潮而是继续谈判。这个谈判不仅有第三方面的民主人士参加，而且有外国人参加；同时，谈判又是公开的。这是和过去谈判不同之点，是一个新的阶段。

第五个阶段，从我们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到现在。这个谈判有一个中心，就是我们提出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国民党要继续一党专制的政府。这是一个斗争，就是毛泽东同志报告里说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的方针是，立即召开党派会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战后召集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国民党的方针是，不放弃一党专政，包办国民大会，继续一党专制。半年来斗争更加尖锐。这样的斗争更振奋了全国的

民主运动,更使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为国际国内民主人士所拥护,所同情。正因为这样,所以谈判也就继续下去,于是有了赫尔利⁽³²⁹⁾到延安以及我的两次出去⁽³³⁰⁾。赫尔利在延安和我们签定了五条协定,同意我党毛泽东同志所提的联合政府的方针。这五条内容主要是:为共同打败日本强盗建设新中国,要在联合政府之下统一起来;要成立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联合政府,要成立代表所有抗战力量的联合统帅部;要给人民自由,要实行民主的改革;要承认所有抗日的力量,装备所有抗日的力量,统一所有抗日的力量(用联合政府来统一);承认所有党派的合法地位。这样五条不仅我们提出,而且美国大使赫尔利也是签了字的。这五条他承认了,所以我到了重庆,就是为实现这个方针——联合政府的方针。但是蒋介石又拒绝了。我回延安以后,赫尔利又继续邀请,我就又出去一次,提出为实现联合政府,办法可以采取一个准备的步骤,先开一个各党各派的会议,就是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³³¹⁾三方面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的会议,来讨论如何改组国民政府成为联合政府,如何起草共同纲领,如何废止一党专政。这一次谈判国民党蒋介石还是不同意,反而叫嚷什么“你们要联合政府就是要推翻政府,开党派会议就是分赃会议”。完全把我们的主张抹杀了。他还是要继续原来的方针。从《根绝赤祸案》到《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历来的主张,就是要我们把军权、政权交出来。这从蒋介石今年三月一日的演说上就可以完全看出来,要把军队和敌后的政府都移交给他。他给我们什么呢?不是联合政府。他能够给我们的,就是参加政府去作客。这个客我们作了八年,我们还稀罕作这个客?要把军权、政权

交出去,当然是绝对做不到的事。但是蒋介石还是要你这样做,他说可以给共产党合法,但那是把我们手脚捆起来的合法,手脚捆起来还有什么合法!当然很清楚地可以看到,这样的主张后面还有一手,就是三月一日宣布的要在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但这还是八年以前国民党包办选举的国民大会⁽³³²⁾。他名义上要还政于民,实际上是要经过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通过一党专制的宪法,来承认国民党专制的合法。假使谁出来反对,他就说你是分裂,他就要统一你,你不受他统一,他就要讨伐你,这就是他所准备的全国规模的内战。他这条方针完全是和我们对立的。今天除了抗战这点上还可说是相同之外,至于如何抗战,完全是两套。我们是要胜利——彻底的胜利,要民主——新民主主义的民主,要团结——民主的团结,不但要国内的团结而且要国际的团结。国民党是另外一套,不是要彻底的胜利而是企图妥协投降,将来能用日本的资本和武器来打内战,把伪军收编过来打内战,不是要民主而是要维持独裁,不是要团结而是要分裂,在国际上是挑拨离间,企图英美帮助来一个“斯科比”⁽³³³⁾,国民党就是这一条路线。

从“九一八”以来的国共关系发展到今天,一般地是停止了大规模的内战,发动了抗战,这是统一战线的成功。我们创造和扩大了解放区,振奋了中国人民,推动了中国的民主运动。但是,就是在抗战之下还是有局部的内战,还是充满了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行动,这是国民党所实行的。这个对立斗争现在还是继续着。我们一方面反对这种反动的消极抗战的路线,另一方面还是留有余地,不关谈判之门。三次

反共高潮三次谈判，三次谈判后又继续谈判。谈判是为了胜利，为了民主，为了团结，这样的谈判才有作用，否则那真是谈话会了，那就不会有结果。这是长期以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过情形。

二 关于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问题

谈到经验教训，不能不联系到十年内战时期，甚至大革命时期的一些错误问题。大革命时期我们有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统一战线，后来因为国民党反动集团背叛了革命，使这个统一战线破裂了。共产党——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被打败了，不得不退入乡村，发动广大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形式的红色政权和工农红军。这个时期的统一战线，是反封建压迫、反国民党统治的工农民主的民族统一战线。“九一八”以后我们才转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以，大革命、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三个时期的统一战线，是有不同的形式和性质的。但是这三个时期的统一战线又都是属于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因为新民主主义是我们三个时期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同志说得很清楚，要建立一个巩固的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就是要认清敌人、队伍和司令官这三个问题。在革命发展过程中，由于敌我关系和斗争营垒时常发生变化，形势时常变动，所以统一战线的问题就很复杂。我们应当根据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三个方面，来研究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

现在先说敌人方面。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这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不变的。可是帝国主义不仅是一个，而国内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又有不同的派别和集团，这些敌人又常常不一致，所以敌人营垒又是变化的。这样，我们要认清敌人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就成了复杂的问题。有时候敌人是合在一起压迫人民大众的。例如大革命失败，南京和武汉的反动势力合作，即所谓“宁汉合作”⁽²²⁷⁾的时候，帝国主义站在他们后面一致地压迫革命。但是这种情形在整个二十多年当中并不很多，许多时候敌人是分开的。“九一八”以后就很明显，日本用武力侵占中国，他们就分开了。抗战以后更加明显，英美站在反对日本方面，成为中国抗战的同盟军。所以帝国主义是有分有合，分开的时间还是长的。从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来说，北伐战争反对北洋军阀的时候，南方就有些封建势力、大资产阶级和军阀到革命阵线里来投机，夺取领导权。十年内战时候，敌人对红军的进攻也是不一致的。抗战时期，英美派大资产阶级翻过来站在抗战方面反对日本，但同时又和日本勾结。这样，敌人有分有合，情况就更复杂了。特别是各阶级的代表人物更不是固定不变的。代表性改变了，本来不是敌人也可以变成敌人，常常使我们搞不清楚。蒋介石在大革命初期，起了一些一般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作用，但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²²⁶⁾以后，很快地就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汪精卫⁽¹¹¹⁾在大革命初期，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在大革命中期，他很激进，接近小资产阶级，但是在武汉时期，他又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去了。总之，各阶级代表人

物是能变化的。在中国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方面变动很大，尤其以抗战时期为最。在这二十五年革命奋斗当中，我们所遇到的统一战线的变动是这样多，这样大，又这样复杂，因此就要求我们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善于调查研究，分析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思想，能够正确地认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矛盾变化，能够随时地认识敌人、分析敌人，能够提出战胜敌人的正确方针。而各种“左”右倾机会主义，就是弄不清楚这些，首先在认识和对待敌人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很多错误。右的错误常常把敌人当成朋友。最明显的是北伐到了武汉，蒋介石在江西杀了陈赞贤⁽³³⁴⁾，向共产党开了刀以后，一天天地走向反动，很清楚的是要走到敌人方面去，但是那时候我们党内象陈独秀⁽¹⁷⁰⁾这样的人，还主张继续和蒋介石合作，就没有认识这个转变关头的变动。“左”的错误常常把朋友当成敌人。内战时期，小资产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是我们的朋友，特别在“九一八”以后，就是中产阶级都可以做朋友，而“左”倾观点认为他们是敌人，并且是最危险的敌人，竟错到这样的程度。

有些敌人在一定条件下是有两面性的。在同他们结成统一战线的时候，有右倾观点的同志，只注意他们可以联合的一面，忘记了他们的反动性。比如抗战初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集团参加了抗战，但还保有他的反动性。右倾的错误是替他擦粉，把他的反动性抹杀了。在一九三八年第二个武汉时期，说蒋介石集团不是法西斯，不是军阀，这就错了。蒋介石确有反动性，他是军阀，是法西斯，一定时候我们不去强调这方面是可以的，但是替他擦胭脂抹粉就错了。有“左”倾观点的

同志，在转变的关头看不到变化，只注意这些敌人的反动性，看不到他们可以联合的方面。比如一九三五年在瓦窑堡会议⁽³³⁵⁾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估计到中国的资产阶级，甚至部分的大资产阶级，有转向抗战的可能，那时候“左”倾观点的同志就不相信，不懂得联合他们来推动抗战。

对统治阶级营垒中的不一致，要分别清楚是那一种性质的。比如说现在的大后方，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独裁专制的，有许多地方实力派，在这一点上当然可以跟他们联合。但是一定要懂得他们本身还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他们同蒋介石在反对民主这一点上没有根本的区别，在抗战不彻底上也没有根本的区别。所以，他们同蒋介石的矛盾是统治阶级营垒中间的矛盾。“左”的观点不承认这种矛盾，认为凡是敌人，在一个时期内都要一律打倒。但是，要打倒一切，就一切打不倒。

敌人营垒是会变化的。右的观点把昨天是朋友而今天已成为敌人的人仍当作朋友。例如刚才说的第一次武汉时期的汪精卫，以前他的确是代表资产阶级同我们合作的，但是到了武汉以后，一天一天地受到大资产阶级影响，走向反动，走到敌人方面去。有右倾观点的同志却还认为他是可靠的朋友，相信他，依靠他。“左”的观点把昨天是敌人而今天可能成为朋友的人当作敌人。例如“九一八”以前，十九路军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江西进攻我们，但是到了“九一八”以后，民族革命高潮来到了，在福建和我们合作。有“左”倾观点的同志还把他們当作敌人，反对他们。这些都说明了敌人营垒极不统一、极不一致，变动极大。我们应该很好地分析，运用毛泽东同

志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方针，才不会犯“左”的右的错误。

再说队伍方面。

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有无产阶级，有农民，有小资产阶级，有自由资产阶级，甚至有时有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也来参加，所以这个队伍很大，很复杂，力量不平衡，不容易统一。对这样一个队伍要弄得很清楚，要会分析，懂得怎么争取队伍的大多数，反对这个队伍中和我们争领导权的少数人，同他们斗争。不懂得这一点就要犯错误。

无产阶级是这个队伍的骨干。无产阶级的觉悟高，本事大，可是人数少，力量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必须依靠一个最可靠的同盟军——农民。农民是这个队伍的主要力量，象毛泽东同志说的，五个指头占四个。中国的战争实际上就是农民战争，离开了农民就打不好仗。北伐战争⁽¹²¹⁾时，军队本身也好，军队以外的配合力量也好，最大多数是农民。内战时候更清楚，完全依靠农民。抗战时期还是一样。有了农民，我们就能进能退；没有农民，进是少数孤军前进，退则没有地方可退。“左”倾的也好，右倾的也好，恰恰都是不认识农民，忘记了农民。“左”倾的错误是不依靠农民，只凭无产阶级打冲锋，结果使自己孤立。右倾的错误是依靠资产阶级，甚至依靠大资产阶级。大革命后期，在武汉时期，认为资产阶级可靠，甚至把唐生智⁽²⁵⁶⁾、冯玉祥⁽⁷⁵⁾这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力量当成依靠，而不去依靠农民。第二个武汉时期，抗战初期，有一部分同志不是依靠农民，而是依靠大资产阶级，以为国民党领导的军队能够打胜仗，把主要的力量农民忘记了。这种依靠法很危险，不

仅要打败仗，还会被人家俘虏。第二个武汉时期，由于中央路线是正确的，我们主要的力量在华北，所以没有象第一次大革命时候那样失败，但是危险还是有的。后来，大后方工作存在一个弱点，就是民主运动没有深入到农村。

城市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队伍中也是一个基本的力量。有了这个力量，还要跟农民结合，假使不跟农民结合，仅仅依靠工人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也不能使革命取胜。右的观点以为依靠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工人，就可以取胜。这是不对的。“左”的观点就是连城市小资产阶级都不要。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没有作用。这也是不对的。大革命失败前后，曾经只依靠工人和城市的知识分子。譬如广州起义⁽²⁶⁶⁾，只把城市工人和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成份的教导团动员起来，发动起义，没有依靠农民，也没有打算退到农村中去，所以广州起义失败了。上海起义⁽³³⁶⁾也是如此，想依靠城市的工人和一部分城市知识分子，在敌人力量最强的上海硬坚持，结果失败。现在我们又到了要进大城市的时候了，当然我们现在的主力军是在农村。做沦陷区城市工作的同志应该认识，要与农村配合才能进退自如，工农小资产阶级结合起来才能有力量。

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队伍里面，还有一个自由资产阶级，我们叫他中间力量。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这是个软弱的动摇的阶级，无产阶级应该争取他，联合他，至少可以使他中立，但是不能依靠他。右的观点忘了农民，忘了工农群众，去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是错误的。“左”的观点否定与自由资产阶级的联合，也是错误的。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有时也会参加到统一战线队伍里来，但是他们带着很明显的两面性。资产阶级有他的两面性，小资产阶级也有他的两面性，但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更明显的，他们的反动性的那一面是根深蒂固的。因此，在与他们合作时，要随时提防他们，反对他们的反动性，绝不能依靠他们。大革命末期，武汉时期，不仅依靠汪精卫，还依靠唐生智，依靠冯玉祥，结果落了空。这是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之一。当时有两种武装力量。一种是我们党的武装力量，有叶挺⁽³⁶⁹⁾的二十四师等，这是我们党直接领导的，同时还有广大的工农群众的武装，从广东到武汉，特别是湖南的工农群众有了武装，这是我们的力量。另一种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那时候我们党的政策，不是面向自己的力量，而是面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力量，唐生智的军队，冯玉祥的军队。我记得最明显的是在武汉危急、“马日事变”以后，我们党的中央还仰望所谓农民领袖、基督将军的冯玉祥。那时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就连外国的同志也好，大家都仰望他。当冯玉祥从潼关打到郑州的时候，武汉国民政府的头子就坐专车去接他，我党也派张国焘⁽¹⁶⁹⁾接他去了。结果，冯玉祥在徐州和蒋介石会面，来了一个大反动，把所有的武汉的人都出卖了，于是武汉全面落空了。这就是依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武装力量不依靠自己武装力量的恶果。当然还有土地革命问题，不过武装是一个中心问题，这在当时是可以看出来的。第二个武汉时期，以为国民党军队不改造也可以同他很好地合作，这同样是机会主义的错误。

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括无产阶

级、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大资产阶级，这样大、这样复杂的队伍，如果不搞清楚，就会发生“左”的右的错误。我们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析了这个队伍，把这个队伍里面的人分作三类：一类是进步力量，就是工农小资产阶级；一类是中间力量，就是中间阶层；一类是顽固力量，或者反动力量，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地方卖力派近乎中间，或者是中间和顽固之间，在阶级性上是接近反动派的，在反蒋这一点上又起了中间力量的作用。根据这三种力量的分析，我们订出了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分化和打击顽固力量，也就是联合大多数，反对少数，打击最顽固的力量的方针。右的观点就不是这样。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不分左中右，怕人家说我们分化他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不喜欢我们分左中右，陈独秀就作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应声虫。不分左中右，结果左派就要跑到中间，最后跟右派跑了。第二个武汉时期重复了这个错误。一九三七年的十二月会议上，又有人主张不要分什么左中右，只要抗日与不抗日之分，抗日与亲日之分，除了亲日派以外，剩下的就是铁板一块，都是坚决抗日的⁽³³⁷⁾。这是受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影响。所以第二个武汉时期，就把国民党蒋介石的军阀性、法西斯性都抹杀了，认为站在一起，一般高、一般美、一般漂亮。左中右是应该分的，分才对，不分不对。“左”的观点是只相信无产阶级，只相信无产阶级先锋队，脱离一切群众，自己队伍里的人不去联合。这也是不对的。所以不管是“左”的错误或右的错误，都是不懂得毛泽东同志关于左中右的分析，不懂得如何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顽固、反动力量，结果孤立了自己。这是我们对

统一战线队伍的分析，我们应有这样的认识，没有这样的认识就会犯错误。

但是队伍光分左中右还不够，还要有进一步的严格的区别。这样大的队伍，在无产阶级以外，有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甚至有时候还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来参加，就应该有一个严格的区别。无产阶级在这个队伍里是带队的，起领导作用的，其余的阶级都同他有区别。不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就是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也都同无产阶级有区别。所以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在统一战线中应该坚持独立自主。独立自主，就是指无产阶级的独立性，他有自己独立的政策、独立的思想。他是去联合人家，而不是同化于人家。有了区别，就有斗争。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团结，是在坚持独立自主的条件下同人家讲团结，而不要受其他阶级的影响。毛泽东同志常说，我们在统一战线中最容易受别的阶级的影响，所以不主张区别是不对的。右的观点就是不主张区别。抗战的武汉时期，有人主张我们是“求同而非异”，就是说只有同而没有异。这是不知道我们无产阶级和别的阶级不同。有些同志不懂得这个统一性和区别性的道理。假如不区别，那就是和人家混合在一块，一定受人家的影响。“左”的观点是天天讲区别，不去和人家共同行动，急于搞社会主义，土地革命时期就要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要使一切人都具有社会主义的思想，不懂得应该进行新民主主义教育，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右的不区别，“左”的强调区别而不去求得今天统一的方法，都是不正确的，都是受了别的阶级的影响，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思想。右的错误是受了

大资产阶级的影响。因为和他合作，就容易受他的影响。他们的态度好一点，请我们作客，吃茶吃饭，就不去区别了，就把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主张当作自己的主张提出来了。毛泽东同志说过，右的错误，一般地说，在与资产阶级联合的时候比较容易发生；“左”的呢？一般地说，在与资产阶级分裂的时候比较容易发生。这在我们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也这样指出了。同时，因为我们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份多，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在受了大资产阶级压迫的时候，容易受小资产阶级直接的影响，容易有“左”倾情绪。这些都是受了别的阶级的影响而产生的错误。

再说领导权的问题。

无产阶级比别的阶级先进，是应当领导别的阶级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司令官”。但无产阶级也不是天然的司令官，不是从农民一直到大资产阶级都公推你、公认你为司令官。大革命时期有一个彭述之⁽¹⁷⁹⁾，他写了一篇文章，说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天然的，不要争！这和毛泽东同志关于争领导权的思想完全相反。领导权要用力量来争，因为领导权是有人和无产阶级争，和共产党争的。不但大资产阶级争，自由资产阶级也争，小资产阶级也争。他们总要照他们的思想来领导这个队伍。但是和我们争领导权最主要的力量，还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这个统治集团。所以在统一战线当中，互争领导权的主要是国共两党，大资产阶级就成为我们斗争的主要对象。因为一个队伍有两个司令官，就要打架，两个中间总要下去一个。在大革命初期，国共两党曾经联合成一个队伍，大革命失败以后，就分了家，成了两

个队伍。一直到现在还是两个队伍。一个是无产阶级，共产党为代表，所领导的队伍，发展到今天有了解放区，有了人民的武装。另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国民党为代表，所领导的队伍，十八年来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的统治。这两个队伍在那里斗争，双方争取的对象就是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有人说我们只争取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这是不对的。我们还要争取自由资产阶级。双方进行争取和领导的方法是不同的。国民党是采取压迫的方法，不但压迫工农，也压迫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我们的方法是同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合作。我们和农民的关系搞得最好，和小资产阶级的关系也很好。至于对自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方法有所不同，就象和友军的关系一样。大革命初期、中期就是这样的方法。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就是自由资产阶级并不那样听话，常常闹独立性。所以我们对自由资产阶级的领导，只能是主要问题上的领导，而不可能是完全的领导。当然，在另一种条件下，我们对自由资产阶级，不但实质上可以领导，而且形式上也可以领导。如在解放区，自由资产阶级就可能在形式上也受我们的领导，但他的独立性还是要保持的。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时是不是可以受我们领导一下呢？从历史的经验看，一时的或一个问题上的领导也是可能的。一般地说，当他们的力量小的时候可以受我们领导。譬如蒋介石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以后，就不愿受我们的领导了，但他没有力量北伐，就叫我们帮助他，叫苏联帮助他。这时还受我们领导，但这是靠不住的，因为他表面上受你领导，实际上他准备和你分裂。又如那一天朱德同志报告中讲的，当华北敌人

九路围攻的时候，国民党的军队处在很困难的地位，他就要我们朱总司令领导。但那是一时的，一旦他和他的后方打通，就要跑掉，反而来打我们。所以我们应该时常警惕。在要不要抗战的问题上，蒋介石受了我们的领导，就是我们推动了他抗战。但是如何抗战，他要按他的办法，不愿意照我们的办法，不受我们的领导。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仅在不得已时、在某一个问题上能受我们领导，他们一旦有了力量，有了外援，就会立刻和我们分裂。所以在领导权的问题上，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小资产阶级，可以搞得很好，很亲密。对自由资产阶级，虽然他闹独立性，但是还可以领导。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般地说不能领导，只能在某个问题上、某个时期内领导。

我们党在历史上几个时期的许多成功，都是因为执行了毛泽东同志关于领导权问题的思想和路线。“左”右倾机会主义在领导权问题上翻的跟头最厉害。可以说“左”倾右倾都不懂得领导权问题，不懂得争取这个领导权。

右倾观点是不要领导权。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就是不要领导权，认为只要说一句风凉话，所谓天然领导权就够了，实际上他觉得既是资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就是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顶多是抬轿子的，顶多搞一些集会、结社、言论、罢工的自由。在农民问题上，陈独秀连减租减息都不赞成，更谈不到解决土地问题了。那时贴了很多标语，有两个口号，一个是要建立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一个是要争取非资本主义的前途。我们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这样的口号也有很多。但口号是口号，而实际上是放弃领导权，认为领导权是天然的，用不着争。所以在政策上就不发展工农武装，不建立工农领导的政府。虽然

那时候湖南、江西、湖北等省，还有一些县政权是归武汉政府的，但是陈独秀压制工农斗争，一切都退让，退让的结果使大革命失败了。这是第一个武汉时期的错误。

第二个武汉时期的错误也是不懂得这个领导权问题。那时有一种解释，说只要抗战就是统一，说蒋介石的政府已经是统一的政府，蒋介石的大资产阶级的政府已经开始民主化，人民已经得到充分自由。这就是说，大资产阶级很好，很民主，很统一，也就是承认大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因而在政策上也就不要民主改革，不要改善民生。但当时党中央是很强调民主改革、改善民生这两点的。武汉时期放弃领导权，还表现在不重视敌后的发展，不主张建立敌后政权，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假若这个统一战线是我们领导的，当然很好。但实际上，国民党并不承认我们的领导。他所承认的统一战线，就是把我们的队伍统一到他的军令、政令里去。所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实际上就是一切经过国民党的军令、政令。那时提出了七个统一⁽³³⁸⁾，就是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这不是都统一于国民党的军令吗？还不是都统一给他吗？又如提出晋察冀边区也必须经过国民党批准才能成立。这还不是统一于国民党的政令吗？这样退让政策的结果，在武汉被解散了三个群众团体⁽³³⁹⁾，后来在华中弄出来一个皖南事变⁽²⁰⁹⁾。这就是没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要时刻提防人家反对我们，不是把国民党的主张提高到我们的主张上来，而是把我们的主张降低到国民党那方面去，也就是争取领导权上犯的右倾错误。

“左”倾机会主义也在领导权问题上翻了很多跟头。简单

说来,就是他们不懂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以为已经越过俄国一九〇五年到一九〇七年的阶段,急于转变,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政策“左”了,不仅脱离了小资产阶级群众,而且脱离了工农群众,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抗战时期的某些“左”倾观点,也是在这些问题上弄不清楚,只要斗争,不要团结,没有认识毛泽东同志关于在统一战线中有团结有斗争,在斗争中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

所以领导权的问题,是统一战线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右的是放弃领导权,“左”的是把自己孤立起来,成了“无兵司令”、“空军司令”。可以说右倾是把整个队伍送出去,“左”倾是把整个队伍推出去。

以上是从历史经验检讨中得出来的全面认识。我自己在三个时期特别是后两个时期中,犯了不少的错误。今天我讲统一战线的经验,觉得应该看到错误的严重性。当然这些错误已经改正了。假使今后对敌人、队伍、司令官这三方面不能清楚认识,不管在那一点上还存在着不自觉或盲目性,那一点上就会犯错误。我个人是如此,对我们全党同志也是如此。

目前紧急要求^{*}

(一九四五年八月)

目前,抗日战争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设的新阶段业已来临。为着团结全国各抗日党派,保证国内和平,在民主基础上进入建设新中国的轨道,并巩固国际团结,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向国民政府提出下列的紧急要求:

一、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

二、撤退包围和进攻中国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避免危害全国人民和扰乱国际和平的内战。

三、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

四、容许中国解放区抗日军队及其代表参加处置日本投降后的一切重要工作。

五、容许中国解放区选出代表参加将来关于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及联合国会议。

六、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七、释放爱国政治犯。

* 这是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文件,经毛泽东同志修改过,当时没有发出,后来在八月二十五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宣言》中包括了本文的内容。

八、救济被难同胞。

九、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

十、取消特务机关。

十一、取消一切妨碍人民自由的法令和对新闻出版物的检查条例。

十二、在一切收复地区，组织地方性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容纳中共及各方面抗日民主分子参加。

十三、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办理复员。

十四、立即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政治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紧急措施，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³⁴⁰⁾，成立民主的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

积极宣传反内战反独裁， 揭穿蒋介石的欺骗阴谋*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

1. 数日来，蒋介石以更大力量在扩大内战宣传，动员接近他的中外记者向外广播，企图嫁其责任于我，吓唬人民，好便于他放手内战，继续独裁。

2. 我为揭穿蒋之欺骗阴谋，应集中于宣传反对内战、反对独裁、主张和平、主张民主四个口号。在具体问题上，应强调被我包围的敌伪军队应归我缴械，指出五六年来蒋素不承认、接济和命令的解放区军队，今忽令其留原防待命⁽³⁴¹⁾，其目的即在一方面便于他来解决，另一方面便于他进行蒋伪合流。我们反对乱命即反对内战，实际上蒋早已无权命令解放区抗日军队。盟国最高统帅⁽³⁴²⁾如强令日军只许向蒋军投降，不许向我军缴械，即等于助蒋内战，我们坚决反对。国共谈判，蒋之三月一日演说已拒绝于先，六参政员携回方案又被拒绝于后⁽³⁴³⁾，而且又骂我们为人民公敌，故请毛往渝全系欺骗。目前蒋之一切宣传均为内战做文章，只是步调常乱，空隙甚多。你们应在报纸上，在中外人士中，配合延安广播，坚

* 这是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重庆局的指示电。

决地予以严斥,以压倒蒋之反动宣传,推动各方。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均极有利于我们反对蒋之内战,望坚持此方针,以便放手动员群众,巩固和发展我们已得的胜利。

致邹韬奋⁽³⁴⁴⁾夫人沈粹缜的慰问信^{*}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二日)

粹缜先生：

在抗战胜利的欢呼声中，想起毕生为民族的自由解放而奋斗的韬奋先生已经不能和我们同享欢喜，我们不能不感到无限的痛苦。您所感到的痛苦自然是更加深切的了。我们知道，韬奋先生生前尽瘁国事，不治生产，由于您的协助和鼓励，才使他能够无所顾虑地为他的事业而努力。现在，他一生光辉的努力已经开始获得报偿了。在他的笔底，培育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促成了现在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国人民一定要继续努力，为实现韬奋先生全心向往的和平、团结、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不懈。韬奋先生的功业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永垂不朽，他的名字将永远是引导中国人民前进的旗帜。想到这些，您，最亲切地了解韬奋先生的人，一定也会在苦痛中感到安慰的吧！您的孩子——嘉骝，在延安过得很好，他的品格和勤学，都使他能无负于他的父亲，这也一定是可以使您欣慰的事吧！谨向您致衷心的慰问，并祝

您和您的孩子们健康！

周 恩 来 启

卅四年九月十二日

关于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谈话^{*}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八日)

诸位先生：在政治协商会议⁽³⁴⁵⁾之后召开的国民党二中全会，我们曾寄以很大的希望，但二中全会的结果实令人失望，因二中全会的决议动摇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国民党内为数不少的顽固派利用二中全会通过了很多重要的违反政协决议的议案，这不足为怪，而可怪的是这两个会议的决议既如此相反，却都是在蒋主席主持和领导之下通过的。

一、关于保障人民权利问题。在政协开会时，蒋主席曾作了保障人民权利的四项诺言⁽³⁴⁶⁾，但在政协开会后，就连续不断地发生了沧白堂打人⁽³⁴⁷⁾、较场口事件⁽³⁴⁸⁾、捣毁新华报馆⁽³⁴⁹⁾、捣乱西安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³⁵⁰⁾，一直到捣乱执行停战决议的北平执行部事件⁽³⁵¹⁾。这许多事件至今没有一件得到解决。如言论、出版的自由问题，限制言论自由的法令名义上虽已废止，但实际上仍限制重重，并且采用了极不平等的限制办法。象中共在北平出版的《解放》三日刊受到非法的禁止，而别的新出版的报纸在上海则得到许可。又如释放著名的政治犯，除叶挺⁽³⁶⁹⁾、廖承志⁽³⁵²⁾外，不论中共或其他党派及无党派

* 这是在重庆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刊载于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九日重庆《新华日报》。

被捕的人和青年学生，至今仍毫无消息。现在的政府仍然是国民党一党政府，这些违反保障人权的事件，国民党负有责任，但二中全会对这些问题一字未提，所有决议案中，没有一字谴责这些妨害人权的罪恶行为。

二、关于改组政府问题。改组政府是件大事，究竟是否结束训政⁽³⁴⁰⁾走向宪政，在此过渡期间成立举国一致的各党派合作的政府，二中全会无明确态度。它不仅避开结束训政不谈，反而要把各党派推选的国府委员拿到国民党中常会去选任，这是完全违反政协决议的。这不能不令人怀疑到二中全会后将要“恢复”的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性质，很可能“恢复”到从前指导国民政府的政治委员会去⁽³⁵³⁾。果如此，国府委员由国民党中常会选任，中政会又要指导国民政府，这说明政府仍是一党的政府，决不是民主的各党派合作的政府，与政协会议、各党各派、社会贤达、全国人民以及友邦的期望完全背道而驰。

三、更重要的是关于宪草问题。宪法关系中国今后是民主或仍是一党独裁的大问题。政协修改宪草的原则⁽³⁵⁴⁾是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全体起立通过的，对这些原则如有任何变动，一定要经过政协各方代表的一致协议。国民党中有些人特别指责宪草修改原则不合于五权宪法⁽³⁵⁵⁾。我们且不说这些修改原则是在蒋主席主持下，经政协代表（包括政府代表在内）全体起立赞成通过的。即从五权宪法本身来说，五权宪法，第一是主张五权分立，孙先生是反对中央集权于一人或一院的。第二是地方均权，某些权应归中央，某些权应归地方，故孙先生主张实行省自治并得制定省宪。可见政协的修改原则是与孙先

生的五权宪法原则完全符合的。至于根据这些原则如何规定政府组织,那就要因时间与条件而定,过去的办法不一定适合现在。如说孙先生遗教的一个字也不能修改,那么,国民党今天所做的,就违反了建国大纲⁽³⁵⁶⁾。根据建国大纲的程序先实行县自治,然后实行省自治,在全国有过半数省自治后,才可以召开国大,实行宪政。现在政府并没照这程序做,可见政府的组织程序是可以变动的。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与国民党协商。为了减少国民党内主张民主和平团结统一的人士在其党内所遇到的困难,最近各方又商得了三个协议⁽³⁵⁷⁾。但这种让步,反而增加了顽固派的嚣张。二中全会对于宪草通过了五点修正原则,所增加之两点半关系至大⁽³⁵⁸⁾,其目的就是推翻政协修改宪草的原则,不受政协拘束。另外,吴稚晖先生⁽²⁶⁴⁾又提出了三点反对意见,立即在二中全会上成为决议。他主张“五五宪草”⁽¹⁴²⁾,政协协议事项,二中全会决议……一并提交国大参考,这是与政协决议完全相反的。按政协决定,只能将宪草审议委员会的修正案提交国大,并无其他,国大代表个人虽自由,但各党派要负责约束其自己的党员,使这个民主的宪草得以通过,这样,包括十年前一党包办的旧代表的国大⁽³³²⁾就不是重要的了,重要的还是要保证能通过一个真正民主的宪法,所以在国大问题上,各党派曾向国民党作了极大的让步。但今天,国民党却想利用各党派承认的国大,反转来反对政协决定的宪草修改原则,来动摇民主宪法的产生。这种违反民主的做法,是任何人不能忍受的。

四、国大问题。国大代表中地区代表还未最后确定,国大组织法也还没有修改,根据政协决议,国大的职权只限于制

宪，而宪法要有四分之三的多数才能通过，但国大组织法如再迟迟不改或改而不当，就很有可能被利用，只有三分之二的多数就可以通过决议，来做更多其他不利于民主的事情。这样，将来的国民大会就会更便于做一党专政的保镖。

五、整军问题。在政协会议中，军政部次长林蔚氏报告，政府军队现有三百八十万，要减到一百八十万，编为九十个师。但在二中全会中，同一人的报告则说政府军队及机关学校现有四百九十万，将来只减到三百四十七万，仍编九十个师，这和政协报告中的数目比较，多出了一百六十七万。即去掉机关学校，仍然会多出很多，那就是所谓兵工总队，成为正规军的后备队或补充队。这是违反政协决议和整军方案⁽³⁵⁹⁾中复员计划的，因这既不能减少国库开支，且将保持额外的一部分队伍，完全与复员精神相反。

六、停战问题。国民党二中全会在宣言上要求中共部队即速停止继续攻袭，但实际上究竟是谁不遵守停战命令⁽³⁶⁰⁾实行继续攻袭？只要听到方才林、郑两位⁽³⁶¹⁾关于广东、湖北情形的报告，就很清楚了。在山西，任何人都可看到，太原、大同的日军到现在还没有被解除武装，因为阎锡山氏⁽⁹⁶⁾还在利用他们攻打中共和解放区的军民。在华北、华中其他地方，继续进攻和蚕食中共地区的村镇的事，还在不断发生。

关于东北的情形，马歇尔将军⁽³⁶²⁾在两个月前曾提议派遣执行小组去东北调处军事冲突，当时我们立即赞成，政府却在最近才同意了这个提议，可是又发生了执行小组的任务问题。我们曾提出了两个解决办法：一个是无条件派遣执行小组去，立刻停止一切军事冲突，并调查当地实际情况，把问题带回来

提供三人会议⁽³⁶³⁾解决。另一个更好的办法是先在重庆谈判关于军事、政治问题解决方法的一般原则,然后再派遣执行小组根据已经谈好的原则去具体执行。这两个办法,都还没商得结果。我们向来主张东北的内政与外交问题应分开解决:外交问题,过去一直是政府负责的,现在依然如此;但是内政问题,大家都有责任,必须用政治方法和平解决。这不仅仅是中共的意见,这也是其他民主党派和东北人民的意见。

以上所说的绝大部分,都是国民党二中全会所表现的。国民党内顽固派有意识地破坏政协整个决议,并不奇怪。但是,亲自主持政协的蒋主席,竟使顽固派的要求得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中通过,实使我们奇怪。虽然,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议中也有表示要执行政协决议的话,但是容许了上述反政协的决议存在,实际上就等于取消了前一可能。同时,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议又着重于反共,说中共如何如何。中共愿坚决实行自己签了字的停战协定、政协决议和整军方案,也愿意朋友们善意地(而不是恶意地)来督促我们。但是我们要反转来问问国民党朋友,你们一方面要求人家来做,另一方面又把违反政协决议的东西写在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议上,这不能不说其中包含了欺骗。骗什么呢?就是想模糊过去。要是在这种情况下,各党派参加了政府,国大开成,宪法照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要求通过,中国不就是“民主”了吗?!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受骗,也决不去骗人民。我们要向人民说真话,谈实事,一定要先弄清楚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定是想做些什么?这不一个人或一党的问题,而是要不要欺骗老百姓的问题。我们不能把没有完全和平对人民说成有了完全和平,还没有民主说

才有了民主，还没有稳定说成已经稳定。

我们同意马歇尔将军说的：中国在今后几个月内，将是一个极严重的时期。照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发展下去，将会更加严重，不能象某些国内外舆论那样的乐观。但情势不是不能更改，这须要全国人民的努力，友邦的帮助，特别是政协各方代表要努力来维护政协决议。

此外，亦如马歇尔将军在华府招待记者席上所说：国民党当权一派，不愿把大部分权力交出来。其实政协决议并未要求国民党交出大部分的权力，只是要求人民能有自由权利，如各党派在政府中能有充分代表性。现在国民党无论在中央政府，在各省乃至在国大中，仍占第一大党地位。可是就是这一点点民主，顽固派还是不愿意让人民享有，只是压迫和打击人民与其他党派的民主运动。而且照杜鲁门总统的声明⁽³⁶⁴⁾及三国外长会议公报⁽³⁶⁵⁾中所指的内容来看，也可见政协决议还没达到那样的民主要求。现在军队整编统编方案是有了，但是组成一个有充分代表性的政府仍未做到，就连政协决定的这样一点点民主，国民党还不愿实行，还要由国民党中常会来选任国府委员。

因此，我觉得政协的一切决议不能动摇或修改，这是由五方面代表⁽³⁶⁶⁾起立通过的，应成为中国的民主契约。谁要破坏，谁就是破坏今天中国的民主和平团结统一。对三人会议关于停止冲突与军事小组关于整军方案的协定，也是一样的。人权若无保障，就无法改组政府成为真正的民主合作的政府。修改宪草，各党派如不受约束，如不照五方通过的修改原则制成修正案，国大一定开不好。军事冲突，若不在全国范围内停止下

来,和平也无保障。我们要求的是一个真和平、真民主、真稳定的中国。

我们愿号召全国人民、盟邦朋友、各党派朋友,一致来拥护并监督政协全部协议的实现。特别希望国民党内主张民主团结的朋友,在蒋主席领导之下,来纠正和推翻党内这种反政协的企图。且这种企图现在已成为决议,快要实行了。我们应提醒国民党的朋友,因为国民党对今天的政治是负有最大的责任的。由于这一缘故,在国民党二中全会闭幕之后,来做这一声明,是有必要的。我们不愿蒙蔽舆论,而愿诉诸舆论。

“四八”烈士永垂不朽^{*}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九日)

若飞⁽³⁶⁷⁾！博古⁽³⁶⁸⁾！希夷⁽³⁶⁹⁾！邓发⁽³⁷⁰⁾！黄老先生⁽³⁷¹⁾以及一切遇难的中美朋友、同志和扬眉⁽³⁷²⁾！你们集体牺牲，你们已成了“四八”烈士。

十天过去了，沉重的十天！沉痛的心，悲愤的泪，残酷的回忆，还有，你们遗留下来的沉重的担子，抑压得我们还只在默默无言中悼念你们。

二十多年来，成千成万的战友和同志，在共同奋斗中牺牲了，但没有一次象你们死得这样突然，这样意外。突然的袭击，意外的牺牲，使我们更加感觉到这真是无可补偿的损失！

二三十年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奋斗生涯，已经把你们锻炼成为人民的英雄，群众的领袖，青年的导师和坚强不屈的革命战士。你们中，象若飞等七位同志，都经过一二十年共产主义党的教育，已成为久经考验永远忠于人民事业的党的优秀领导者和党的骨干。你们是中国人民的瑰宝，你们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辉。现在竟活生生地把你们从我们中间夺去，从中国人民中间夺去，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大不幸！这是中国人民的最大不幸！

* 这是在重庆各界举行追悼“四八”烈士大会的同一天，为《新华日报》写的署名文章。

抗战胜利后,若飞等同志为中国的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事业,努力奋斗,奔走呼号,从未息止。双十国共会谈纪要⁽³⁷³⁾、政协五项决议⁽³⁴⁵⁾、停战协定⁽³⁶⁰⁾、整军方案⁽³⁵⁹⁾,直至三月二十七日的东北停战协定⁽³⁷⁴⁾,都有着若飞同志的共同筹划以及其他同志的后来参加。尤其近两月来,为保障人权,为保护政协五项决议,为坚持宪草修改原则⁽³⁵⁴⁾,为反对破坏停战协定,若飞、博古两同志更站在斗争的前线,与一切破坏分子的反动阴谋作最坚强的搏斗。四月八日飞回延安,也正是为保护政协决议、坚持宪草修改原则而向我党中央报告和请示的,不幸竟遭大难。你们是为国奔波、为人民事业奋斗到最后一口气的。你们的功绩,在人民历史中,将永垂不朽!你们的精神,激励着千百万群众、党员向着你们的奋斗目标,补上你们的岗位前进。

如果没有反动派破坏政协决议的阴谋活动,也就没有你们这次冒着恶劣天气飞回延安的必要。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政协决议、停战协定和整军方案的实施,是决不会顺利的。中国人民为求和平民主的实现,已付了极大代价,没料到还付上这样惨重的代价,并且还未付完;反动派正在改组政府、召开国大和接收主权等表面文章后面,进行着更大的独裁、分裂和屠杀的阴谋活动呢!

烈士们!同志们!你们的责任已尽。我敢向你们保证:有中国人民在,有中国共产党在,有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力量在,我们决不让反动派破坏政协、破坏停战、破坏整军的阴谋活动成功。你们坚持的方针,是全中国人民的方针。和平、民主终必会在全中国实现。

若飞!你最后一夕话,是为中国人民及其代表所受到统治

者的压迫鸣不平的。我记住，我永远记住。我敢向你保证：万万以上的中国人民已经觉醒了，已经起来了，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思想领导下永远不会离开他们的。我们要为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世纪奋斗到底！

博古！你是为修改宪草而粉身碎骨的。我记住，我永远记住。我敢向你保证：我们要为坚持完成一部民主宪法、建立民主中国而奋斗到底！

希夷！你是人民队伍的创造者，北伐抗战，你为新旧四军立下了解放人民的汗马功劳。十年流亡，五年牢监，虽苍白了你的头发，但更坚强了你的意志。一出狱，你就要求重新入党。一见面，你就提到皖南死难同志，检讨皖南事变⁽²⁰⁹⁾，要我交涉继续放人。我记住，我永远记住。我敢向你保证：我们要为保护人民队伍和释放一切政治犯而奋斗到底！

邓发！你是工人队伍里培养出来的领袖，最后，你为中国工人阶级统一战线同时也是为世界工人阶级统一战线，建立了光辉的成绩。但是这成就刚刚开始，你竟一去不返。为继续和发扬这一成就，我敢向你保证：我们要为中国和世界的职工联合运动的彻底成功而奋斗！

一切飞延遇难的中美朋友、同志！你们每一个人的优点和成就，都是人民中的希望。我们要向你们学习。我们要继续你们遗留下来的为人民教育服务、为革命工作努力、为培养革命后代而自我牺牲、为努力中美合作而奋不顾身的精神，并把它们永远坚持下去。

我们要将一切悲痛化成团结的力量，向一切反动派搏斗！
和平民主，就是你们的旗帜！

“四八”烈士永垂不朽！

反对扩大内战与 政治暗杀的严正声明*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七日)

中国目前最严重的最急迫的有两个问题，一是内战，二是政治暗杀。我代表中共代表团，特发表严正的声明：

(一)目前内战形势已经从局部向全面发展，大规模内战主要地已在四个战场上进行。首先是中原战场：国民党军三十万，于六月二十六日开始对中原军区“围歼”⁽³⁷⁵⁾，二十九日占宣化店，六月三十日和七月一日，我军开始突过平汉路，现仍在被追击中。第二是山东战场：国民党军五个军，约十五万人，沿胶济路向我进攻，其济南、潍县间已于本月中旬会师。第三为苏北战场：国民党用十二个军，加上地方团队约五十万人，于本月十五日从三方面向我作全面进攻，并有海空军配合。第四为晋南三角地区：胡宗南⁽³⁷⁶⁾的第一军于七月三日由陕西过黄河，占茅津渡，配合阎锡山⁽⁹⁶⁾军队，已占我闻喜、侯马。此等情势，如果任其发展，平汉、津浦两线与热河及东北也很快有卷入内战的可能。我们要求国民党当局，少作违反事实的宣传，立即下令全面停战，否则应负内战全部责任。

* 这是在南京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声明，刊载于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八日重庆《新华日报》。

(二)昆明两次政治暗杀,足以根本动摇全国各民主党派与国民党当局团结合作的大局。李公朴先生⁽³⁷⁷⁾被刺后四天,闻一多先生父子又被刺⁽³⁷⁸⁾,这完全是计划的,而且是肆无忌惮的政治暗杀。西安、南通之血案⁽³⁷⁹⁾未了,昆明今又继之,则重庆、成都、武汉、北平、广州,甚至南京、上海亦可以任意杀人。这完全赤裸裸地暴露了国民党特务残暴的法西斯本质,采用了最卑劣的手段来镇压和平民主运动及其代表人物。如果国民党当局对此仍不采取紧急处置,改弦更张,取消特务,则一切政治协商都将徒然无望。

对进步朋友应多加关照^{*}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一、我及小超⁽³⁸⁰⁾等今日下午飞回南京。

二、在离沪前，陶行知⁽²⁸⁰⁾于今晨忽得脑出血，我们赶到时已断气，痛心至极，惟握手时体温、气色未动。据沈钧儒子（系医生）云，确系脑出血，尚无其他中毒症候。为慎重计，我们已商定将尸体在殡仪馆放过十二时，看有无变化，然后入殓。

三、如无其他原因，陶先生确是死于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这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偿的损失。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我这次去沪，曾意识到陶先生的安全，提出要上海工委劝他休养一时期。话未传到人已不在。假使陶先生临终能说话，我相信他必继韬奋⁽³⁴⁴⁾之后请求入党。

四、今后，对进步朋友的安全、健康，我们必须负责保护。已告上海潘汉年⁽²⁹⁸⁾及伍云甫⁽³⁸¹⁾，在救济方面多给以经济和物资的帮助，在政治方面亦须时时关照。

五、请中央将南京新华社关于陶先生逝世的报道广播全国。

六、我今日弄清情况，明日再见马歇尔⁽³⁶²⁾及司徒雷登⁽³⁸²⁾。

* 这是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悼李公朴⁽³⁷⁷⁾、闻一多⁽³⁷⁸⁾词*

(一九四六年十月四日)

今天在此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时局极端险恶，人心异常悲愤。但此时此地，有何话可说？我谨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

* 这篇悼词是为上海各界追悼李公朴、闻一多先生写的，由邓颖超同志代表周恩来同志在会上宣读，刊载于一九四六年十月四日重庆《新华日报》。

在上海鲁迅逝世十周年 纪念会上的演说*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九日)

鲁迅先生死了十年了，整整的十年了。中国是从内战进入抗战，现在又回到了内战。内战乃鲁迅先生所诅咒的，抗战才是鲁迅先生所希望、所称颂的。他希望的事在人民大众努力下实现了，而他诅咒的内战可仍还存在，这应该是我们参加这会的每个人所难过的。人民希望民主、独立、团结、统一，而日本投降了一年多了，这一个愿望还没有达到。鲁迅先生逝世那年也在谈判，到今天足足谈了十年了，还不能为中国人民谈出一点和平，我个人也很难过。但人民团结起来，就一定能够解决中国的和平民主统一的问题。今天，我要在鲁迅先生之像面前立下誓言：只要和平有望，仍不放弃和平的谈判，即使被逼得进行全面自卫抵抗，也仍是为争取独立、和平、民主、统一。

鲁迅先生曾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鲁迅先生的方向，也是鲁迅先生之立场。在人民面前，鲁迅先生痛恨的是反动派，对于反动派，所谓之千夫指，我们

* 本文刊载于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一日重庆《新华日报》。

是只有横眉冷对的，不怕的。我们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假如是对人民，我们要如对孺子一样地为他们做牛的。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我们要有所恨，有所怒，有所爱，有所为。过去历史上有多少暴君、皇帝、独裁者，都一个个地倒下去了。但是历史上的多少奴隶、被压迫者、农民还是牢牢地站住的，而且长大下去。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象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鲁迅和闻一多⁽³⁷⁸⁾，都是我们的榜样。

对国民党召开“国大”的 严正声明*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国民党政府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已于昨天开幕了。这一“国大”，是违背政协决议与全国民意，而由一党政府单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不但这一“国大”的开会日期未经政协协议，更重要的它是一党召开的分裂的“国大”，而不是各党派参加的团结的国大。政协协议的国大，依照政协决议及其程序与精神，必须将政协决议次第付诸实施之后，在改组后的政府领导之下，始能召开。

政协各项决议⁽³⁴⁵⁾，是各党派协议的临时大宪章，是一个整体而不可分割的。十个月来，政协决议不但未曾丝毫付诸实施，而且被国民党当局破坏无遗。停战协定是经过政协决议批准的，但内战从东北大打到关内，政府当局已彻底破坏了一月间停战令⁽³⁶⁰⁾的位置。政府当局在政协开幕时所宣布的四项诺

*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一日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之后，蒋介石立即发布命令，单独召开“国民大会”，妄图通过一个所谓的宪法，使其内战、独裁、卖国的路线“合法”化。“国大”召开的第二天，周恩来同志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这个书面声明，刊载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七日重庆《新华日报》。

言⁽³⁴⁶⁾，从较场口大打⁽³⁴⁸⁾直到李⁽³⁷⁷⁾、闻⁽³⁷⁸⁾暗杀案，已被国民党特务统治破坏得一干二净。政府改组迄未协议成功，和平建国纲领遂亦无从实行，而对许多解放区的地方政府，国民党当局不仅不准其依照纲领规定维持现状，且欲实行“接收”，不允则实行武力占领。军事决议的基本精神是军民分治，但现在国民党政府的各省主席几无不以现役军人充当。宪草审议在重庆既未完工，中共代表当即有全部保留之声明；政府迁南京后，国民党当局更将其一搁至今，从未再议。国大问题的协议，是政协开会期中最后一个妥协。国民党当局保证不开一党包办的分裂的“国大”，并保证通过政协审议完成的宪草，其他党派方允许十年前一党包办的代表⁽³³²⁾得保留在区域与职业的代表名额之中，且必须增加各党派代表与解放区代表。在内战完全停止、政协决议已付诸实施、人民自由权利已获保障及政府改组之后，才能够召开国大。这样的国大，才算是各党派参加的团结的国大。现在开幕的所谓国大，不只违背上述决议及其精神，而且连开会日期或延期也由一党政府决定。代表名额，据十一月十五日上午已公布者竟达一千五百八十人，在原协议二千零五十人中，已侵占其他党派名额四百一十人，尤其是已侵占解放区二百人代表名额至一百四十人之多。可见这一“国大”是彻头彻尾一党包办的分裂的“国大”。所谓空出名额等待中共参加，既系破坏政协，又属完全骗局，实际上只是想骗取中共以外的其他党派参加，以粉饰国民党当局个人独裁的面目而已。

一月来，南京商谈经第三方面人士的辛勤努力，中共方面曾不断提议商谈形式可以不拘，但必须依照政协决议及其程

序办事，惟均被政府当局拒绝。一党“国大”的会议期愈近，我们愈主张停开一党“国大”，方有可能使军事三人会议⁽³⁶³⁾、政协综合小组及宪草审议委员会得以同时开会，根据停战协定、整军方案⁽³⁵⁹⁾与政协决议，分别解决当前的军事政治问题，并立付实施，然后方能在和平的环境中，从容召开各党派参加的团结的国大。但急于粉饰独裁的政府当局，对此根本不予考虑。

现在开幕的一党“国大”，不但使中共及第三方面最近在商谈中的协议成为不可能，并且最后破坏了政协以来的一切决议、停战协定与整军方案，隔断了政协以来和平商谈的道路，同时也很快地彻底揭穿了政府当局十一月八日“停战令”⁽³⁸³⁾的欺骗性。这一党“国大”还要通过一个所谓宪法，把独裁“合法”化，把内战“合法”化，把分裂“合法”化，把出卖国家与人民利益“合法”化。照这样做下去，中国人民一定要陷入苦痛的深渊。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坚决不承认这个“国大”。和谈之门已为国民党政府当局一手关闭了。一党“国大”中将要玩的一切把戏，乃至改组政府，我们决无一顾之必要。参加了这一个“国大”，承认了这个把戏，就必然推翻了政协决议，破坏了政协以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轨道。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进攻解放区的血战方殷，美国政府援蒋内战的政策依然未变，假和平假民主绝对骗不了人。我们中国共产党愿同中国人民及一切真正为和平民主而努力的党派，为真和平真民主奋斗到底。

为庆贺朱总司令 六十大寿的祝辞*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亲爱的总司令朱德同志：

你的六十大寿，是全党的喜事，是中国人民的光荣！

我能回到延安亲自向你祝寿，使我万分高兴。我愿代表那反动统治区千千万万见不到你的同志、朋友和人民向你祝寿，这对我更是无上荣幸。

亲爱的总司令，你几十年的奋斗，已使举世人民公认你是中华民族的救星，劳动群众的先驱，人民军队的创造者和领导者。

亲爱的总司令，你为党为人民真是忠贞不贰，你在革命过程中，经历了艰难曲折，千辛万苦，但你永远高举着革命的火炬，照耀着光明的前途，使千千万万的人民，能够跟随着你充满信心向前迈进！

在我们相识的二十五年当中，你是那样平易近人，但又永远坚定不移，这正是你的伟大！对人民你是那样亲切关怀，对敌人你又是那样憎恶仇恨，这更是你的伟大。

*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一日是朱德同志六十寿辰。本文刊载于十一月三十日延安《解放日报》。

全党中你首先和毛泽东同志合作，创造了中国人民的军队，建立了人民革命的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写下了新的纪录。在毛泽东同志旗帜之下，你不愧为他的亲密战友，你称得起人民领袖之一！

亲爱的总司令，你的革命历史，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辛亥革命^[147]、云南起义^[384]、北伐战争^[121]、南昌起义^[246]、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生产运动，一直到现在的自卫战争，你是无役不与。你现在六十岁了，仍然这样健壮，相信你会领导中国人民达到民族解放的最后胜利，亲眼看到独裁者的失败，反动力量的灭亡！

你的强健身体，你的快乐精神，象征着中国人民的必然兴旺。

人民祝你长寿！

全党祝你永康！！

在延安各界举行的 “双十二”⁽²³²⁾ 纪念会上的讲演*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诸位先生，诸位同志：“双十二”事变过了整整十年了，中国从内战转入抗战，现在又不幸地回到内战，这是值得大家研究的一段历史教训！不管现在又回到内战中，中国总经历了八年的抗日战争阶段：日本法西斯被打倒了，抗日的人民军队强大起来了，一万万四千万人口的地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得到了真正解放，在那里，人民实行民主，农民获得土地，而全中国人民在这种鼓舞之下，亦认识了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是可以被打倒的。这就是“双十二”事变的历史收获。“双十二”事变本身的意义，是在它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九一八”事变以后，人民已日渐不满于国民党当局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尤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武装北上抗日与号召全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后，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呼声更因之日益广泛，并影响到当时的“剿共”军队，首先影响到在内战前线的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经过“一二九”学生运动⁽²⁹⁶⁾、全国救亡运动、七君子之

* 本文刊载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延安《解放日报》。

狱⁽⁹⁵⁾，尤其是中国人民红军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转向东渡黄河抗日⁽²⁹⁵⁾，全国抗日高潮必然要走向抗战。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已无可阻止。唯独蒋介石先生别具心肠，硬要在日寇进攻绥东⁽³⁸⁵⁾之际，拒绝东北军请缨抗日，强迫张学良⁽⁹¹⁾、杨虎城⁽⁹²⁾两将军继续进行内战。但他这种倒行逆施，不仅未能达到目的，反而激起了西安事变，而他自己也因此一逼，才勉强抗日。历史应该公断，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蒋先生抗战是张、杨两将军顺应人民公意逼成的；张、杨两将军从此就获得人民的谅解与拥护，不是偶然的。现在抗战已经胜利一年多了，然而张、杨两将军却被蒋介石先生幽囚了十年。这段公案，人民会起来给以正当裁判，也只有人民才会真正坚持释放张、杨，那些担保张、杨无事的大人先生和太太们却早已忘恩负义，食言而肥。在纪念“双十二”十周年的今天，我们要求立即释放张、杨两将军，他们是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

蒋介石的抗战既是被逼的勉强的，所以在抗战的全部过程中，都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抗战、团结、民主的路线；一条是妥协、分裂、独裁的路线。前者为中共所坚持，得到人民的拥护；而后者则为蒋介石所坚持，得到敌伪与反动分子的喝采。中共及人民是主张积极抗战、坚持胜利的；而蒋介石在抗战初期则联合德意，企图妥协，在抗战后期则勾结敌伪，消极抗战。中共及人民是主张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以便击败日寇的，而蒋介石则分裂抗日阵线，利用抗战不断地削弱乃至消灭非嫡系军队，首先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对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更不惜实行内战。中共及人民是主张实行民主，以便能动

员人民的一切力量坚持抗战的，而蒋介石则厉行独裁，压迫人民，使抗战陷于无力。在这种情形下，要不是中共在敌后努力，人民在全国坚持，中国的抗战早已被蒋介石断送了。所以日寇一经投降，蒋介石便利用日俘，收编伪军，进行更大规模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今年一月在全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声中，蒋介石又曾被逼地勉强地接受过停战协定⁽³⁶⁰⁾与政协决议⁽³⁴⁵⁾，但不久便被他所指使的南京二月“整军会议”与重庆三月“二中全会”或明或暗地推翻了。等到东北大打与关内大打，更证明他接受政协决议与停战协定决非心甘情愿。内战发展到最近，五个月侵占我解放区这样多的地方，现在又在开着一党包办的非法的分裂的“国大”，蒋介石的一切欺骗作用都被他自己揭穿无遗了。

就这一年多的情况看来，蒋介石与中国人民之间依然继续着西安事变以前及西安事变以后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抗战胜利后，中共及人民是主张依照政协路线实现和平民主与独立，坚决拥护一月停战令，主张政协决议的依序实施，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要求撤退驻华美军，停止援蒋内战。而蒋介石则不惜破坏政协路线，坚决走上内战、独裁与卖国的道路。他企图以武力消灭解放区，以“宪法”形式使他的独裁合法化，以亡国的“中美商约”⁽³⁸⁶⁾出卖民族利益，换取美帝国主义更多的援助来进行内战，但他这种企图，一定会如十年前进行内战时一样遭遇到悲惨的失败。现在的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和平、民主与独立。美帝国主义独霸世界、奴役人民的企图，将引导自己到众叛亲离。蒋介石独霸中国、奴役人民的企图，亦将引导自己到众叛亲离。蒋介石想追随美帝国主义之后

寻找出路，结果必走到悬崖绝壁。只有政协的路线才是康庄大道。人民的世纪已经降临。中国的民主新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解放区人民自卫战争的坚持和胜利，反动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各国人民的进步，将促进这一新高潮的到来。历史的发展会警告反动统治者：内战、独裁、卖国的道路是不是要走到底？

就在目前，蒋介石还高谈“政治解决”，然而，多数人已经知道这是骗局，或者叫做“和平攻势”。为辨别这一“政治解决”的真伪，我们只要求他立刻解散正在开会的一党包办的非法的分裂的“国大”，承认恢复一月停战令所规定的双方军队的位置，国共谈判便可重开。蒋介石如果肯这样做，那才有回到政协路线上的可能。不然，中国人民就会看得更清楚：对于蒋介石，“武力消灭解放区”才是他的目的，“政治解决”不过是他的欺骗口号而已。我们相信：经过西安事变以来的十年经验教训，中国人民是再不会上当的了。

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一年来的情况很复杂,变化多端,现在只能把几个主要的问题说一说,把中国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分析一下,同时讲讲前途。

一 一年来的谈判情况

日本投降后,国共谈判可分三个阶段来说:从去年八月二十五日党中央发表宣言⁽³⁸⁷⁾、毛泽东同志去重庆直到年底,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阶段从政协到六月休战;第三阶段从七月大打到现在。三个阶段有很多区别:第一阶段是国共直接谈判,没有结果,打了三个月的内战;第二阶段各党派协商,得到结果,但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实际上已被推翻;第三阶段,谈判成为烟幕,实际上大打,证明谈判失败。这就是谈判各阶段的特征。现在分开来看:

第一个阶段。

抗战八年,赢得了日本的投降,当时的情况是:(1)日本投降后,人民非常希望和平,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2)中共所领

* 这是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其中第二部分是摘要。

导的人民主力,还不能产生一个全国的民主政府,但又有部分的在我们领导下的民主政府;(3)只要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任何强大的帝国主义都可以打倒,这是八年抗战所证明了的。所以这三种要求——和平、民主、独立成为中国人民的愿望,我们根据此愿望,在去年八月二十五日发表了宣言,以适应这种要求,这是完全正确的。在过去大革命、十年内战、抗战三个阶段,我党就贯串了这个新民主主义的方针,那么在第四个历史阶段,我们更一定要贯串它。这是我党的历史方针,也就是毛泽东同志去年《论联合政府》报告的方针,在今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要贯串它与实行它。

根据以上方针,毛泽东同志去重庆,在去年十月十日发表了双十会谈纪要⁽³⁷³⁾。在此纪要中,解决了许多问题,但同时还有几个重要问题没有解决。

解决的最重要的有三点:

一、承认了中共的地位。尽管到现在,国民党在各地还捉杀我们的人,我们的党在蒋管区还处在地下,但中共在全国全世界的地位,从双十会谈纪要发表后,是不同了。我们的地位已为国内外人民所承认,这是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十年前西安事变⁽²³²⁾后,蒋还在庐山向我提出要朱、毛出洋的要求,把我们看成是地方军阀,污辱我党;抗战,我们向蒋提出国共共同纲领⁽³⁸⁸⁾,他不理,自己发表了抗战建国纲领⁽²³³⁾;抗战八年中,蒋对共产党无论在形式上本质上,都不是放在平等的地位。但在日本投降后,因为经过我们八年的努力,解放区有了一万万四千万人口,共产党军队达到了一百四十万的人数,中国的问题,要没有共产党的过问是不行的,因此,蒋也不能不

一而再再而三地打电报请毛泽东同志去。毛泽东同志的去重庆是关系着中共在中国及在世界上的地位的问题，去年这一次去是完全需要的，对我们没有任何损失。虽然力量的发展是八年的成绩，但毛泽东同志去后就不同了，取得能适合我党现在力量的地位。所以今年九月蒋在庐山训话中说，中共已不象过去江西时代那样容易剿灭的，他是有了国际地位了。

二、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在这以前，蒋根本不承认各党派的地位，而此后却承认了，提高了各党派的地位。历史的发展是非常之快的。党派会议、联合政府都是中共提出的，各党派今天之所以有地位，是共产党与人民的努力取得的，连青年党⁽³⁸⁹⁾也不得不暗自说，因为有共产党才能有他们的地位。张君勱⁽³⁹⁰⁾虽参加了“国大”，但在其见记者时，还说希望共产党原谅。这样使国民党不能一党包办，中国的事情，一定要经过各党派协商，这也就是实行了毛泽东同志的“三三制”⁽²⁰⁸⁾思想。“三三制”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共产党不一定要在数量上占多数，而争取其他民主人士与我们合作。任何一个大党不应以绝对多数去压倒人家，而要容纳各方，以自己的主张取得胜利。第二个特点就是各方协商，一致协议，取得共同纲领，以作为施政的方针。这两特点是毛泽东同志“三三制”的思想。

三、承认了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地位与数目。在此方案中，承认了我军二十个师。但抗战初期只给我们三个师；林彪同志⁽⁸⁸⁾去时，我们要九个师，蒋只给六个师；林伯渠⁽³⁰³⁾主席去时，我们要十六个，蒋只给八个；毛主席去，一下就给了二十个师。

以上三点是双十会谈纪要的收获。我们并不因为蒋破坏了这些协定,就以为没有了收获。因为全中国人民都承认了这样的事实,认为中共的地位是不容抹杀的。国民党虽背叛了协议,但他还不敢放弃党派协商。

另一方面,没有达到协议的是地区问题与政权问题。在那时,我们的方针是要争取承认我们已有的民主政权,由此推向其他地方使之民主化。这对蒋来说,比前面的三个问题重大得多,因为凡是民主的地方,就没有独裁者的份儿。这对蒋是一个根本的威胁,因此蒋不承认。同时这也是与赫尔利⁽³²⁹⁾闹翻的中心。毛泽东同志回来后,我与若飞同志⁽³⁶⁷⁾还同国民党谈了一个半月。我们用各种方法想使他们承认,但他们还是不承认,中心就是他们不愿中国人民得到一个民主的根据地。中国这样大的国家,革命不可能是平衡前进,中国的革命就是这样的走出来,起起伏伏,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地发展。所以对中国人民来说,根据地比什么都重要。武装固然重要,但武装毕竟是保持根据地的工具,武装脱离了根据地就无法生存。蒋看清了这点,他也特别懂得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因此,他无论如何不承认。

还有形式上承认而实质上未执行的问题,就是受降、遣俘、改编伪军三个问题。原则上虽已承认,但实际上他干他的。受降,他要经过美国人,而这样他的军队才由西南到了各大城市,同时又利用日俘、伪军打我们,把内战重新打起来了。

所以,在第一阶段谈判中,我们有不可磨灭的成绩,同时又有第二类没有承认的问题,还有第三类形式上承认而实际上又被破坏了的问题,这样使谈判不能有结果,打了三个月的

内战。

三个月的内战，证明蒋当时还没有准备好。他的主要力量在西南，虽然美国尽一切可能帮他运了五个军到山海关，两个军到华北，两个军到山东等，但他的绝大部分军队还在西南，东北、华北广大地区还被我们解放着，使蒋不可能继续打下去。同时，在国际上有杜鲁门声明⁽³⁶⁴⁾、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公报⁽³⁶⁵⁾，马歇尔⁽³⁶²⁾来华等。因此，使内战暂停，进入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

在这一阶段初期应该说有成绩，如一月十日停战令⁽³⁶⁰⁾、一月底政协决议⁽³⁴⁵⁾、二月整军协议⁽³⁵⁹⁾、三月东北停战协议⁽³⁷⁴⁾等四个文件的签订。这里有四个问题，需加以说明：

一、战争在全国范围的确是停止了一个时期，给中国人民一个希望，战争可能停止，这也不能不影响我们解放区的人民与党的方针。当然，如果我们把它夸大了，那就是幻想了。但中央当时估计和平的可能也确有许多根据。蒋在被逼下把战争暂时停下来了，在当时的协议中，不允许双方军队移动，假使蒋不动，他的大部分军队还在西南，华北不多，的确打不起象过去五六个月来那样的大仗。所以当时我们签了字。但到后来蒋大的调动，使此协议被破坏（大的调动还是在五六月）。我党在当时也需要停战整顿，特别在东北是日本投降后才搞起来的。就是在华北，过去也没有这样大，所以当时党签订停战协议是对的。这，一直到今天还成为我们的斗争口号。我们拥护停战协定，并不要因蒋破坏而不去拥护，如果照停战令作下去，对人民还是有利的。

二、政协就是党派会议，在政协决议中承认了联合政府。照政协的决议改组的政府，就是联合政府。蒋虽不愿承认联合政府这名词，但实际上如翻成英文，还是联合政府。当然这与我们的新民主主义还有很长的距离，但如照政协做下去，则是向新民主主义的方向发展。因此，蒋不敢这样做，所以破坏它。但直到今天蒋还不敢公开否认它，因为政协是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的。在一年前的“七大”，我们也还没有预料到这样快就会有这样一个党派会议，产生这样一些决议。因此，这个决议还要成为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个决议实际上也就是实现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我们对此要有个深刻的认识，政协路线就是毛泽东同志《论联合政府》的路线，这将是今后长时期的奋斗目标。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口号不叫政协决议而叫政协路线呢？因为政协决议已被他们破坏。当时许多问题都协议了，就是国大问题也妥协了，我们还承认国民党圈定的九百五十名代表，因为如依决议去做，国大只是形式，一切问题需经党派会议协商解决。但国民党现在开“国大”，已破坏了政协宪草⁽³⁵⁴⁾，国大问题我们就无法妥协。如果将来再谈判，我们决不承认他过去的“国大”。如谈改组政府，在政府的成份名额条件上也不能象过去那样了。整军方案也是如此，条件是要变更的。将来的整军我们绝不能接受五比一了。所以决议是要变的，但路线不能变，党派协商、共同纲领、联合政府是不能变的。中国的事情对蒋介石来说签了字也是没有用的，但我们不管他将来谈得好谈不好，政协这一条路线，我们还是不变的，不能放弃的。

三、整军方案。这件事，许多同志比较不大容易了解。整

军方案是使中国人民的武装受束缚的，但也受保障的，这有它的两面性。在数目上，五十比十，对我们是一个束缚，但也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规定要经过美国装备，我们的十个师也包括在内。装备虽好，但可把你集中起来，不给你汽油弹药，那你就没有办法，而且这些东西都是美国来的，如果打起来是废铁一堆。美国人是想经过这些东西来控制我们，但这是否能把我们完全困死了呢？不会的。整军方案还有它好的一面，这就是地方自治。人民的武装是地方自治的东西，六十个师只是用在国防上的。地方自治要依靠人民的武装的自卫，我们这里已经自治了，不再需要国家的军队来防匪了，这样就保障了我们解放区人民自己的武装不受国家军队的干涉。这样一看人民并不吃亏。受束缚的就是美国人插进来一只手，但也不要紧，我们就准备着把那十个师变为废铁好了。

四、在整军方案中，我们在军事上取得了与蒋军的平等地位。抗战八年，蒋以他的统帅地位来压我们，但在谈判过程中，马歇尔来后，为了套我们，在地位上也不得不承认我们与蒋军的平等地位，结果蒋成了一方面的统帅，而不是两方面的统帅。

所以，第二个阶段的成绩，主要就是上述的四项成就，尽管蒋很快就破坏了协定，但这四项成就是不能否认的。对停战协定，蒋从二月南京军事会议时便开始破坏它。当时在该会上有两句口号：“为领袖任劳任怨，为国家死里求生。”实质上就是：“破坏政协任劳任怨，反动集团死里求生。”此会后，在重庆为了欺骗，还命令张治中⁽³²⁷⁾与我们签订了整军方案。三月召开二中全会，又从政治上破坏政协，大骂国民党政协代表，集

中到宪草问题向我进攻,经过综合小组提出三点修改:要使国大变无形为有形;取消立法院对行政院的不信任权⁽³⁹¹⁾;取消省宪法,改为省自治法等。我们当时不慎重,同意作三点修改。但国民党的企图是要把自治缩小到县,使省没有权力,实行中央集权,变内阁制为总统制,扩大国大的权力,使国会无权,其中心就是“中央集权个人独裁”八个大字。所以从国民党的整军会议后,证明国民党是采取上面谈判下面破坏的方针。这样,五月五日国大就无法开,同时东北三四五月大打,从沈阳打到长春,停战、政协都被破坏了。但为什么又有六月休战呢?因为国民党占了长春后,兵力分得很散,没有兵再进。当时我们在东北占了有利的地位,山东、山西收复了几个伪军占领的城市,这样国民党需要在东北实行几个月的休息,而在关内动手大打,于是有东北休战。二十三天的谈判,讨论了许多问题,我们还打算再让一二个地方以保全广大的解放区。在停止东北战争、恢复交通、整军等问题上,都作了许多的让步,但结果还是破裂,中心问题仍是政权问题,根据地问题。蒋在形式上是要我退出苏、皖、承德、安东、冀东等地,但他承认的只是黑龙江、兴安两省及嫩江半省,华北只是临沂、大名、上党等几个地区,想把我们完全隔开,先限制在这几个地区,然后再来消灭我们。所以六月争论的还是根据地问题,这与第一阶段破裂的关键是一样的。

第三个阶段。

这个阶段是表面谈判,实际大打,也就是拖中大打。一方面是我们坚持政协路线,另一方面是蒋不断地破坏它。我们把谈判作为教育人民的工作,这个方针,连马歇尔也对叶剑英参谋

长说：周将军最近几个月来，并不是为谈判而谈判，而是为宣传而谈判。这句话有一半道理，但责任并不在我，因为对方不愿解决问题，我们就告诉人民是他不愿解决，用以教育人民。从七月到我回来以前就是这样一个方针。七月时，马歇尔说各党派谈不好，国共直接谈，我们说也好，于是就开五人会议⁽³⁹²⁾，但还是那样不能解决问题。后来又要司徒雷登⁽³⁸²⁾参加，司徒雷登就上庐山，但蒋的条件更高了，除以前提的条件外，还要我退出山东、山西六月七日后占领的城市。司徒雷登从庐山下来问我们，我们问他看我们能否接受，他不表示意见。我们说，连你都知道困难，我们怎能接受。第三次，马歇尔、司徒雷登又说先谈改组政府，我说也好，但要保证停战，但蒋介石、马歇尔、司徒雷登都不能保证停战，所以就无可谈。我们就主动提出恢复三人会议⁽³⁶³⁾，恢复一月十三日位置。马歇尔不召开会议，我就到上海，马歇尔又急了，来找我。这时正打张家口，我们认为，三人会议既不开，又打张家口，这等于国民党造成全面破裂。于是他又来了停攻十天，要我们交国大代表名单，交十八个师的驻地，我们如何能接受，这样谈判又破裂了。最后一幕戏，就是第三方面出来调解，因为他们还没有单独试验过。我们为了使第三方面得到教育，懂得谈判不会有结果，就同意他们调解。蒋提八条，我们提两条，第三方面想试试，要我回南京，我们就跟着第三方面之后，一道回南京。第三方面想来个折衷方案。他们内部大部分很动摇，我们也料想到青年党⁽³⁸⁹⁾、民社党⁽³⁹³⁾一定要参加“国大”，只要把民盟⁽³³¹⁾拉住不参加，“国大”开了就很臭。这个目的达到了，这是八年抗战和最近一年来谈判的成果，第三方面大部分人居然敢于反对蒋

记国大，跟着我们这条路走了。

关于“国大”，有些无党派的人被蒋套住。十一月十一日，有些“社会贤达”本来是去请求蒋允许“国大”延期的，蒋吓唬说：“明天不开就要亡国了。”“贤达”又请再延几天。蒋说：“好，为了尊重你们意见，延长三天，那你们一定要参加了，问题在请你们劝青年党、民社党也参加‘国大’。”消息传出，结果社会贤达四字加了引号，从此开会躲在角落里，生怕记者照像。胡政之⁽³⁹⁴⁾说：“不参加，《大公报》会受压迫，参加了又怕没有销路。”青年党说：“左右为难，内外夹攻。”黄炎培⁽³⁹⁵⁾又替他们加上一句：“天人交战。”所以第三方面都知道参加不光荣，但不参加又怕。到了“国大”开幕后，谈判全部破裂，无事可做。蒋及青年党、民社党、一部分“贤达”破坏了政协，被人唾弃。

由此看出，七月以来谈判的本身不会有什么结果，但马歇尔、蒋介石还在欺骗。假如那时我们不谈就会孤立，因为人民不了解，我们只有在“国大”开了之后才能走，一定要在第三个阶段结束后才能走，这样才能完成教育人民的一课。

二 一年谈判的经验教训与将来的前途

总结三个阶段的经验教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斗争的双方，在斗争的基本方针上是绝不会让步和变动的。基本方针，对蒋来说，是要用各种迂回方法消灭中共；对中共来说，是要用各种方法来实现民主，将反动阵营压下去。不过反动集团的反动方针，不能公开地提出来，这是对他不利的，任何的反动集团都没有勇气公开号召，因为反动力量削弱，人民的力量

起来了。而我们共产党却公开把我们的和平民主独立的方针拿出来，光明正大地动员全国人民来实现，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但是否双方没有谈判可能与妥协的余地呢？这就要根据形势来决定策略。策略是根据形势的变动而变动的，但策略又是为着实现基本方针的。联合政府是取消独裁政府的方针，在我们区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集团没有法子站得住，这是事实。所以联合政府的实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当然不会赞成，因为与他的方针是相反的。因此反动集团的基本方针任何时候不会改变，他一有机会就要实现他的方针，但客观形势常常不让它实现，那就要走些迂回的道路。我们也是同样的，联合政府的方针，要搞垮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个方针也是定了的，但也因为客观形势与主观力量的对比，我们有时也不得不走些迂回的道路。所以斗争就非常复杂，变化就很大，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但策略又不能违背方针。我们的基本方针当然仍是“七大”的方针，武装斗争、和平谈判都是为着政协路线亦即联合政府的实现。

从第三阶段起，关内就大打了，美国更大量援蒋了。今天的斗争不仅是解放区，而且蒋管区，不但下层群众，而且工业家，都反对美蒋的独占独裁。我们可以相信，如再打半年到一年，就以过去的条件，至少可以再去掉他四十到六十个旅，这样他就再没有进攻的能力，我们就可与他平衡。所以我们在今后的半年到一年内，的确是最紧张的一个时期。假使再打半年到一年，战局一定要改观，这也就影响到蒋管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与农村的武装斗争。这三种斗争的汇合，在不久的将来，将会造成民主的新高潮。

评马歇尔⁽³⁶²⁾离华声明^{*}

(一九四七年一月十日)

去年今日，正是全国停战协定⁽³⁶⁰⁾签字与政治协商会议开幕的日子。在整整一年中，情形的变化与人民的觉悟发展得真快。一年前的今天，全国人民都在欢呼和平停战，但是为时不久，全国又陷入内战的深渊。大家已明白：不取消军阀主义的统治，中国永远得不到和平。去年一二月间，全国人民都在庆祝政协成功，但是为时不久，政协全部决议⁽³⁴⁵⁾都被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了。大家已明白：不取消个人独裁的制度，民主的政协路线是永不会实现的。一年前，全中国人民都在欢迎杜鲁门总统的对华声明⁽³⁶⁴⁾与马歇尔将军的来华调解，但是为时不久，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已原形毕露，蒋介石政府的卖国外交亦暴露无遗。于是全中国各大城市，从几十万学生一直到广大市民，都喊出“美军退出中国”、“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反对奴才外交”，“反对中美商约”等口号。

去年一年的变化，不仅国民党反动派重新挑起了内战，破坏了政协，便连一同签字于停战协定上的美国调人也不再提起去年一月的停战令了，一同参加政协的青年党⁽³⁸⁹⁾、民社

* 这是在延安各界代表声援全国学生爱国运动及纪念政治协商会议一周年大会上的演说，刊载于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四日延安《解放日报》。

党⁽³⁹³⁾及大部分所谓“社会贤达”也竟参加了彻底破坏政协路线的一党包办的非法“国大”，制定完全违背政协原则的独裁“宪法”，以加深全国的分裂局面。所以，现在只有中国共产党与真正民主党派、真正社会贤达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才一直为坚持去年一月停战协定与政协路线而奋斗，为要求美军退出中国与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而奋斗。回顾这一年的奋斗，不由得想起去年为停战、政协奔走的“四八”遇难烈士及闻一多⁽³⁷⁸⁾、李公朴⁽³⁷⁷⁾、陶行知⁽²⁸⁰⁾诸先生。他们与破坏停战、破坏政协的反动集团搏斗的精神，一直在激励着我们。

就在这一年正满，马歇尔将军于他离华前夜，发表了关于一年调解之总结性的声明。我现在借着他这个声明，略论一下一年谈判中的几个主要问题。

马歇尔将军承认国民党内有反动集团，在国民党政府中占优势，而且包括军事与政治领袖，他们反对联合政府，不相信国内合作，只信武力可以解决问题，对实施政协决议显无诚意，这都是说得对的。但遗憾的是他并未指出蒋介石就是这个反动集团的最高领袖。蒋介石说，联合政府就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就是分赃会议。去年北平执行部成立后，蒋介石反对派执行小组到东北调处。三月二十七日东北停战协议⁽³⁷⁴⁾方签字，蒋介石便命令杜聿明⁽³⁹⁶⁾在东北大打。六月休战谈判未成，是蒋介石硬违背政协决议要求中共退出苏北、热河等四个解放区破坏了的。接着，他便在关内大打，直到现在。一年来，他违背停战协定，调动了二百一十八个旅（或师）占其全兵力百分之九十来进攻中共领导的解放区，至去年年底止，还侵入解放区十七万九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侵占解放区一百六十五

个城市,这不是武力进攻是什么?去年召开的一党“国大”,彻底破坏了政协路线,自始至终都是蒋介石一人决定的。所以破坏停战协定,破坏政协决议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自己。

蒋介石反动集团用武力“维持其自身的封建控制”,但结果连马歇尔将军也不得不承认,“已使其政府的力量愈益薄弱”。至于“经济破坏”与“交通破坏”,都是蒋介石进行内战所造成的结果。蒋介石政府以其预算的百分之八十用在军费上,加以官僚资本的盘剥统制,独裁政府的腐败无能,金融如何不乱,经济如何不溃?

这样的坏政府,在同一个蒋介石领导之下,换上几个去年一月曾经参加政协,后来又背叛政协,并积极参加蒋记“国大”的某些所谓国民党内自由分子与少数党派如青年党、民社党之流的人,便可以一变而为好政府,马歇尔将军的想法,未免太廉价了罢。没有中共参加的所谓联合政府,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制度是无法取消的,也绝不会成为自由主义政府。

马歇尔将军明知去年召开的蒋记“国大”,是破坏了政协决议及其程序的,但他却故意说它通过的独裁宪法是“民主宪法”,其中主要部分均与政协原则相符合,且似已包括中共要求在内。这真是欺人之谈。去年蒋记“国大”通过的独裁宪法,其主要部分均与政协原则相反。政协主张保障人民自由,蒋宪则限制人民自由。政协主张保障少数民族自治权,蒋宪则取消少数民族自治权。政协主张省为地方自治最高单位,自订省宪,实行地方均权主义,蒋宪则取消省宪,实行中央集权主义。政协主张中央政权实行联合政府的责任内阁制,蒋宪则恢复

“五五宪草”⁽¹⁴²⁾的总统独裁制。马歇尔将军想以实行蒋宪、改组政府的办法，算作结束一党训政⁽³⁴⁰⁾，为蒋介石独裁政府找出路，结果只会使它更加失信，更加孤立，绝对得不到人民拥护。

那么，中共这样反对蒋宪，反对在现在情况下参加政府，要求恢复去年一月十三日的双方军事位置，要求取消蒋宪与重开党派会议，是否如马歇尔将军所说不愿促成公允的妥协呢？恰恰相反，这些要求，正是最公允的妥协，也是最低限度的和平民主要求。连马歇尔将军也承认中共在去年一二月间是愿意妥协的。而二三月起，破坏政协、破坏停战的一切行动，又显然出之国民党反动集团。故中共直到现在，还是坚持在去年一月的停战协定与政协路线的基础上求妥协，其根据正是马歇尔所称赞的“自由而且远大的宪章”。两相比较，蒋介石是在破坏停战协定，破坏政协路线，中共是在维持停战协定，维持政协路线，究竟是蒋介石在企图消灭解放区，还是中共在追求推翻政府，岂不十分明显了么？若说蒋介石可以不接受取消蒋宪与恢复一月十三日军事位置之最公允的妥协，难道中共就应承认破坏政协的蒋记“国大”、“宪法”与破坏停战协定的进占位置，才算“公允的妥协”么？中共不承认这些无理要求，就说中共党内有激烈分子，不顾国家利益与人民痛苦，这是最不合事实而且企图污辱中共的说法，中国人民决不会相信。因为中共为人民服务，二十六年来如一日，一切依靠人民，才有今天的威信。如果中共同意蒋介石进占解放区这些地方，让他自由压迫人民，承认蒋记“国大”、“宪法”，让他继续独裁，那才真是不顾人民痛苦与国家

利益呢！而且也必然得不到真正和平。

有许多渴望和平的天真朋友，不去研究停战的可靠根据和最低保障，不愿为坚持原则而奋斗，只痴等和平之赐予。于是蒋介石看透了这点，在他进攻有利的时候，便决不停战；在他进攻失败，需要取得时间整顿军队，以便重新进攻，如象去年一二月间那样，他便赞成停战，举行所谓“和谈”。请问，这样怎能得到公允妥协呢？永远不能。公允妥协必须建立在一个对人民有利而可靠的基础上，这个基础就是去年一月为马歇尔及蒋介石代表张群⁽³²⁴⁾所签字的停战协定与蒋介石所主持通过的政协决议。马歇尔将军的声明只提政协决议，不提停战协定，这不是偶然忘记，而是有意规避他签字在上边的责任，并为三人会议⁽³⁶³⁾及北平执行部的美方代表寻求解脱，但反而愈加证明美国政府是在有意助长蒋介石大打内战了。

因此，马歇尔将军对中共宣传工作最为怀恨，也可得到证明。的确，在过去一年中，中共对去年三月以来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改变，曾不断揭发其错误，尤其对美军驻华，干涉中国内政，侵扰解放区（马歇尔所提之安平事件⁽³⁹⁷⁾，不过此中三十余件之一件而已），运送蒋军，及美政府以租借物资、剩余物资、经济借款、军舰、飞机、军事顾问、技术训练等等援助蒋介石政府军队，更不断予以暴露和抗议。而美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政策的本质及国民党政府卖国外交的事实（如缔结“中美商约”⁽³⁸⁶⁾、“航空协定”⁽³⁹⁸⁾等），又常为我们揭露无遗。七月以后，中共在蒋介石大举进攻之下，犹与美国调人不断寻求妥协之道，乃蒋介石得寸进尺，贪得无厌，无理要求，层出不穷，而美国调人始终无片言相责，反两次声明，深怪中共未能接受其

调解,这自不能不引起我方的驳斥。马歇尔将军认为上述各种宣传,足以激发世人对美政府的痛恨心理,故有“罪恶性质”。其实,能激发人的并不是抽象宣传,而是活生生的事实。如果上述的事实不改,在爱好独立自由的民族看来,都是罪恶。

现在马歇尔将军回去任美国国务卿了。我很希望他能站在故罗斯福总统对华政策的立场上,为着中美两大民族的传统友谊和利益,重新检讨美国政府近一年来的对华政策,不再继续过去的错误,停止援助蒋介石政府进行内战,撤退驻华美军,不再干涉中国内政,重新调整中美关系,那一定会有大助于中国人民对于和平、民主与独立的努力,也更有助于远东和平与国际合作。

停战协定签字和政协会议召开一周年,我们不能忘怀于这一伟大的纪念日,并且要为停战协定与政协路线继续奋斗。我们相信一切民主人士、全国同胞都愿为它一道奋斗,以求其完全彻底实现,不达目的不止。

关于在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两个文件*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五月五日)

—

(一)目前,蒋顽在前方大败、后方危机重重及莫斯科会议趋向于解决国际问题的情况下,竟于其统治的城市,大施镇压,赶走我方人员,威胁民主运动,捕打人民学生。其企图不外:一、如我及人民团体、社会舆论默不作声,彼正好得寸进尺,加强镇压;二、如我及进步群众受其挑衅,实行硬碰,彼正好以有准备的打击,挫我锐气,加强恐怖;三、如我只动员少数进步分子提出中间分子尚不能接受的口号,进行反抗,正好中其暴露我方力量之计,便于其分化挑拨,各个击破。因此,蒋的镇压政策仍具试探性。尤其是使人活不下去的财经危机,人民既忍受不了,而前线继续大败,人民也吓唬不了,故蒋管区群众斗争,固然要经过一些迂回起伏,但总的趋势必然会继长增高,问题就要看我们领导的斗争策略如何,组织力量如何,以决定群众斗争增长的快慢与可否避免一些挫折。

* 一九四七年春,周恩来同志根据中国革命将要出现新高潮的形势,对蒋管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多次为中共中央起草指示,这是其中的两份。

(二) 针对目前蒋的镇压政策，我们应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在宣传上，我们对蒋之任何一个反动设施、恐怖行为，都要尽情揭露，宣告中外，只要我们善于抓住其弱点，击中其要害。蒋美的反动阴谋是最怕被人揭穿的。在行动上，我们应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去硬碰，这不是保守，而是领导群众变换方式，绕过暗礁。去年底，各地学生反美示威，由于一年多美军横行，半年多反美宣传，加之沈崇事件⁽³⁹⁹⁾的激动，而蒋美于事前又毫无准备，故运动成功，收获至大。此次蒋特捕人打人，是其预定计划，我如不管条件如何，仍在学生中号召游行示威，有遭其屠杀的危险。且一般学生对捕人事件，有愤激的，也有畏缩的，我应顾及此种不同情绪，联合大多数学生首先向学校当局要求生命保障与释放同学，继之联合学校当局向地方当局要求生命保障与释放同学。如仍捕人，则在校内实行自保，如集体出入，互相联保，在条件成熟时，亦可实行罢课，要求释放同学等。同时在斗争中要联系到、有时要转移到经济斗争上去，才能动员更广大群众参加，而且易于取得合法形式。有了经济斗争的广大基础，也易于联系到反特务反内战的斗争上去。在组织上，学生的抗暴联合会虽已在京、沪、平、津、渝学生中有了基础和联络，但也要建立可以自保的防线，即在名称上与行动上，在蒋特发现施以高压后，不妨改换名称或分开作战，使我损失不大，而仍能继续斗争，继续联络。在工人与城市贫民(如小贩)中，更要着重经济斗争的领导和发展。现在沪津一带，工人反对

一月指数、要求加薪的斗争已起⁽⁴⁰⁰⁾，我应善为领导，求得局部胜利，以便巩固阵地，利于今后发展。

(三)今后数月，蒋管区的变化必大，望你们依照具体情况，善于运用斗争策略为要。吴、张⁽⁴⁰¹⁾在撤退前，望尽可能将此种意见转告隐蔽的同志。

二

近日，蒋顽因军事、经济、政治种种危机难以解脱，于是大造谣言，捏造所谓“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企图一方面借此陷害民主人士和群众团体，另一方面借此捕杀我党秘密人员和进步分子，以镇压蒋管区的人民运动。在此情况下，你们在蒋管区统治尚严的地方尤其是蒋管区大城市中的工作方针，就是要保护我党及民主进步力量，以继续加紧开展人民运动。为此目的，既要坚定勇敢，又要机警谨慎。要时时注视情势的发展，坚持我党放手动员群众进行反美反蒋的方针，灵活地既结合又分别合法与非法的斗争。将适合群众迫切要求、提高群众斗争情绪的口号，均经过群众面目提出，以发动群众；将党的宣传工作，侧重于以群众中有职业有地位人物，利用公开刊物、报纸、集会，批评时政，增强不满；而将党的广播言论、解放区胜利消息，经过极可靠关系，辗转秘密散布。党与民主团体、群众组织及进步人士等关系，亦要多发展极端隐蔽党员及同情分子，成单线领导，居中工作，不要以党的公开面目经常来往，尤要避免书信文件来往，以防牵涉。党的组织要严守精干隐蔽，平行组织，单线领导，不转关系，城乡分开，上下分开，公

开与秘密分开等原则。从城市派人往外县乡村去发动、组织与领导武装斗争，必须与城市其他任何工作及人员分开，免致牵连。高级领导机关更须十分隐蔽，少开会，少接头，多做局势研究与策略指导的工作。总之，蒋管区城市工作，一切要从长期存在打算，以推动群众斗争，开展统一战线，如此，方能配合解放区胜利，推动全国新高潮的到来。

全国大反攻, 打倒蒋介石*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现在已进入大反攻时期。自卫战争是从去年大打起来的, 为什么那时不提出大反攻, 不提出打倒蒋介石, 现在才提? 这是同志们所关心的问题。全国大反攻, 打倒蒋介石, 不是随随便便提出来的, 而是有根据的。我们先讲一讲过去一年自卫战争的总结。

日本投降后, 党的方针是要建立一个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用什么方法实现? 大家记得, 毛泽东同志到重庆去谈判, 签订停战协定^[360], 召开政治协商会议^[345], 通过政协决议, 那是用的和平方法。党在日本投降后的一个时期, 在决不放松武装自卫的条件下, 曾经想用和平的方法实现建立新中国的目的。那时和今天是不同的, 今天要用武力才能实现这一目的。这两个方法不同, 是不是有一个对, 有一个不对? 大家知道现在这个方法对, 只有用武力打垮蒋介石, 才能有独立和平

* 一九四六年六月底, 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 对解放区实行全面进攻。我解放区军民奋起反击, 经过八个月的激战, 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改取重点进攻的方针。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 蒋介石的重点进攻也被粉碎, 我人民解放军转入了全国规模的大反攻。本文是在陕北佳县神泉堡对中共中央直属单位干部、战士所做的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

民主。那末，过去就不对？我们答复：现在对，过去也对。同志们会以为讲不通。讲得通的。那时，和平就是要在我们这边巩固解放区，在国民党统治区那边动员人民。那时用和平方法实现我们的目的，可能性大不大？不大，但要试一试。全国大部分人民要和平，全世界要和平，这个呼声，党不能不考虑。党是人民的先锋队，看得远，但先锋队不能脱离群众，要尊重人民的意见。经过十年内战、八年抗战，人民要和平。因为人民有这种想法，所以要去试一试和平的但也是麻烦的方法。于是就有了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³⁷³⁾，有了停战协定，有了政协决议，蒋介石也签了字，可见也是有可能的。这样做，我们没有吃亏。在这期间，我们的军队开进东北，不是胜利吗？对大部解放区的巩固，部队的整理，也是有好处的。另外，我们照协议办事，蒋介石破坏协议，这就证明给人民看：蒋介石不要和平。不仅一次证明，而且几次（一月停战、六月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⁴⁰²⁾等）都证明蒋介石不要和平。这就把人民的认识提高一步：和平不是靠几个协议就能实现的，要靠武力保卫自己的利益，要用武力才能取得和平。从和平到要用武力，其间有个过程，有个变化，就是人民认清了一个道理：只有靠武力才能解决问题。

在去年七月就提出打倒蒋介石，行不行？还不行。当时提的口号是武装自卫，还不能公开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因为当时主客观条件还不具备。蒋介石号称四百万军队，这么多部队，一下子不容易打倒。过去有人说，“国民党打不垮共产党，共产党也打不垮国民党”，“谁也消灭不了谁”。这种说法很流行。大打起来后，在人民中，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

其他一部分中间分子，不是都与我们的想法相同，还有很多人以为是谁也消灭不了谁。如果我们那时就提出打倒蒋介石，他们会不相信，不接受。同时，去年蒋介石刚开始大打，我们如提出“打倒蒋介石”，他就会反过来说共产党要打他，进攻他。如果我们把自卫口号变成进攻口号，那末就成为国共两方面都要进攻，就抵销了。我们说自卫，就是抵制他的进攻。但是怎样表明我们要打倒蒋介石呢？就是讲我们一定胜利！讲胜利信心，蒋必败，我必胜！而不是正面说谁消灭谁。我们这样讲，人民中许多人还要想一想，成不成？我们就拿事实来证明。我们人民解放军有把握，因为我们是新生力量，茁壮如青年，蒋介石犹如垂死的肺病鬼。去年一年的自卫战争，就证明了这个道理——蒋必败，我必胜！

去年一年自卫战争，蒋介石用三百万军队进攻我们。一年作战，死伤和被俘一百一十多万，就是说被消灭了三分之一以上。这是从人数上说。从建制上看，蒋介石共有二百四十八个旅，被我消灭九十七个半旅，平均一个月八个旅，还多出一个半旅，也超过三分之一。蒋军建制被打垮这样多，把打垮的再补充起来，就没有战斗力。如胡宗南⁽³⁷⁶⁾有几个旅就被消灭过两次，被我消灭一次以后，再来就容易打了。不少俘虏军官在放回去时说，再碰到我们一定举手缴枪。敌军的新兵是绑来的，象我们在《抓壮丁》那个戏中看到的一样，他们没有经过训练，战斗力弱，逃亡的比老兵更多。蒋军被我俘虏和击毙的将级军官就有二百多，新提拔上来的军官，战斗经验少。武器方面也是如此，美造装备有许多缴获到我们手里来了。所以无论从人力上、战斗力上、装备上看，蒋介石都不行。粮食也是如

此，胡宗南军队打到解放区来，每天要用十架飞机运粮，才够他十万人吃。蒋介石的种种困难，证明他是无法长期打下去的。蒋介石不能消灭我们是定了的。这一点甚至已成为蒋军军官相当普遍的看法。不仅被俘军官这样看，就是现在蒋介石下面的军官，见到蒋介石时腰挺得很硬，说一定消灭共产党，但一背过蒋介石就摇头。开始大打时，蒋军是一旅一旅地被消灭，后来成为一师一师地被消灭。蒋介石说我们专门打他们的司令部，所以，旅长、师长都被我活捉了。那有这样的事？！他们的司令部都是在自己队伍的紧紧围护中，部队全部被我歼灭了，旅长师长当然被我活捉。对这样的消灭，那有不寒心不害怕的？所以，一年自卫战争的结果，就是蒋介石的军队承认不能消灭我们，而且他们是要失败的。在人民中，去年下半年还有许多人不相信蒋必败、我必胜，但自今年山东等地胜利以后就相信了。这是一个发展，这个发展很快，仅仅一年，变化就这样大。因此，经过一年战斗取得的胜利，我们有根据有把握地在“七七”口号中提出，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蒋介石进犯军。九月又提出大反攻，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对这个口号，人民已经能够接受了。

蒋介石一年来做了许多蠢事，也证明他已无法统治下去。他单独召开“国大”，中共不参加，民盟⁽³³¹⁾不参加，立刻就使它不能起作用，人民就不拥护它。人民不高兴他的“宪法”，就叫它伪宪法。蒋介石一不做，二不休，又在四月改组政府⁽⁴⁰³⁾。政协规定组织联合政府要有中共参加。他改组政府不要中共参加，中共当然也不会去参加。他拉拢了民社党⁽³⁹³⁾、青年党⁽³⁸⁹⁾，这两个党，人民很熟悉，臭得很，没有人相信他们。蒋介石的办

法用完了，戏法变完了，再来一个没有了。单靠政治手法也不顶用，人民还要看一看：有没有饭吃？黄金涨不涨，美钞涨不涨？现在蒋管区不仅工农劳苦大众没法生活，就是小资产阶级、公务员也没法生活。美货滚滚来，入口大大超过出口，入口货半数以上为美国货，这在国民党统治区域，那一个人会欢迎？蒋介石靠借钱过日子，四十亿美元早用完了，又伸手向美国借。人民已看到他靠借款也挽救不了军事上的大败、政治上的破产和经济上的崩溃。因此，城市里的青年学生到处示威，反对美军强奸中国妇女，反对美军打死中国人，有的直接起来反对蒋介石。蒋介石出席参政会议时，南京中央大学学生到礼堂闹起来，使蒋介石下不了台⁽⁴⁰⁴⁾。蒋介石遭到人民反对，政治上破了产，所以我们应当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一方面，我们已用事实证明给老百姓看，我们有力量打倒蒋介石；另一方面，老百姓也不要蒋介石，就连上层分子（除了少数反动集团外）、中产阶级也不想给蒋介石抬轿子了，也要推翻他了。所以这个时候提出打倒蒋介石正合时宜。

为什么我们取得这样大的胜利？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能够成功？

第一，人民拥护我们作战，相信我们是为他们做事的。土地改革，平分土地，把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推翻封建势力，贫苦农民当家作主。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实行减租减息，是争取地主一道抗日。现在日本打败了，大地主拥护蒋介石。要打倒蒋介石的势力，就要消灭地主阶级，使他们都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土地问题解决得好，人民就拥护我们，仗就打得好。全国人口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其中得到土改

利益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这样大的力量，能不打胜仗吗？

第二，我们的军队，是为人民的，是人民的子弟兵。他从诞生的时候起，就是为人民谋利的。他有坚强的骨干，坚持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同人民有密切的联系，经过艰苦奋斗流血牺牲的锻炼，官兵一致，善于战斗。我们的军队有光荣传统，是战无不胜的。

第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得好。去年以来，我们的方针，就是消灭蒋军在解放区内，就是在内线作战中诱敌深入，让他占些地方，把兵力分散，我们把人民动员起来，找机会消灭他，由此转到反攻。所以一年来，我们是战略防御，战术进攻，消灭敌人在解放区内。结果，他占我百余城，我们消灭他百余万军队，包括近七十万俘虏。这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防御中的进攻，消灭他的有生力量。蒋介石的战略是进攻，而战术却是防御的。这个战术与日本人的差不多。如在陕北的作战就是如此，蒋军开始凶得很，但到了岔口时，他五个旅，我用同等兵力就把他围住了。他动也不敢动，没有一点攻击精神。这就是蒋介石、陈诚⁽⁸²⁾用的战术。他们定的办法，专说如何防卫，如何突围，如何待援，如何警戒，如象一个人患了肺病，专门讲究如何防感冒，防咳嗽，防消化不良，防这防那，这样的人距死期也就不远了。

这是一年战争的总结。从这里可以看出，第二年提出大反攻、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是适当的。

现在再讲讲如何达到打倒蒋介石的目的。

打倒蒋介石，这是早就定了的。十年内战是如此；抗日是一个时期，要他共同抗日；日本投降后一个时期，是要用和平

方法打倒他；现在是要打出去，全国大反攻，不是消灭蒋介石在解放区内，而是要消灭蒋介石在蒋管区。去年一年我们是战略防御，战术进攻，现在战略也是进攻。蒋介石不仅战术是防御，而且战略也是防御了。光在解放区内作战消灭不了他，因为在全国他还占有四分之三的土地、三分之二的人口。只有战略进攻，才能彻底消灭他。口号一提出，战争行动就要配合，就是全国性反攻，就是打出去，突破解放区的界线，我们的行动完全是为实现这个口号的。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南下⁽⁴⁰⁵⁾，过黄河，过陇海路，直到长江以北。黄河是蒋介石的“外壕”，陇海路是他的“铁丝网”，长江是他的“内壕”。蒋介石总想赶我们过“外壕”，而我们已过了“铁丝网”，打到他的“内壕”了。形势变动了，我们是在黄河、长江之间来发展。中国中部有江、淮、河、汉四条大水，现在要在这之间来打。这是南线，我们已有三路大军。西北解放军也要打出去。东北解放军已经出击。这是全国反攻的形势。我们的方针就是：打到蒋管区，发展解放区，消灭蒋介石的部队在蒋管区。这个方针在今后一年到两年间要实现。有把握没有？有把握的，有根据的。从三方面看：

先从敌人方面看，他有三个弱点：兵力不足，后方空虚，人民反对。

第一，兵力不足。蒋介石共有正规部队一百八十万，被打剩一百五十万，非正规军一百一十万，剩下九十万。今后一年，敌人减员数目还会大。就算和过去一年一样，每月平均被歼八个旅，还将有九十六至一百个旅被消灭，这是没有疑义的。他是否还能象去年补充那样多呢？肯定会更少。就

算他一切照去年一样，再只减少三十万正规军，明年不就只剩下一百二十万了！这样，蒋介石的兵愈打愈少。第一年，他的机动兵力多，开始用半数进攻，到今年四月份只有四十个旅进攻，现在则更少了。先看南线，这是他的主要方面。他的全部兵力二百四十八个旅，在南线用了一百五十七个旅，其中只有胶东十五个旅是进攻，其余都是防御。如我各路大军再获胜利，这十五个旅也会转为守势。北线七十个旅，只有孙连仲和傅作义⁽⁴⁰⁶⁾的二十九个旅能作点地方性的进攻。除去南北线二百二十七个旅，后备只剩二十一个旅。从各方面看，他的兵力不足。

第二，后方空虚。后方剩二十一个旅，当然空虚。而且其中有八个旅在新疆和甘西，新疆有民族问题，现在又闹起来，八个旅出不来了。另外的十三个旅，放在长江以南，云南两个，川康七个，广东两个，台湾两个，其他地方都依靠民团、保安队。保安队只能守，而且数量也不多，那好打得很。所以蒋介石的后方空虚不可言状。我们到了江北，江南就恐慌起来了。

第三，人民反对。上面已讲到蒋管区经济破产、政治黑暗，到处表现出来。那里的人民运动象海潮一样，时起时落，反对蒋介石的日益增多，连大学教授、开明一点的绅士商人也会参加。我们愈向外打出去，愈能促使蒋管区人民运动的高涨。

敌人方面的这三个弱点，是我们打出去的好条件。

我们方面充分具备了大反攻的条件。

首先是我军愈战愈强。过去，我们消灭敌人一个团一个营就算胜仗，现在消灭他个把旅都不在话下了。战斗力强了，人数也增加了。我们队伍的来源，除了大量的翻身农民参加以

外,同时还有大量的俘虏参加进来。在我们部队里,解放战士占半数以上。经过诉苦教育,他们就调转枪口打蒋介石。例如这次打陕州的炮兵,前一天才从灵宝解放过来,第二天原人原炮就参加了战斗,这是历史上世界上所少有的。我们的正规部队,从去年到今年,差不多增多了一半,野战军和地方部队已接近二百万人,蒋军总数也只有二百五十万,我们与他差不了多少。我们的主力走了以后,地方武装也能打下运城,围困汾阳。大的走了,小的就长大起来了。这真叫做大的不走,小的不长。

第二是土地改革。土地改革的影响,不仅在解放区,而且蒋管区的人民听了也喜欢。近来在华北开土地会议,要宣布一个新的土地纲领⁽⁴⁰⁷⁾,用彻底的办法平分土地。中国农民翻身,只有依靠共产党。要打倒蒋介石,土改和打仗,二者不能缺一。

第三是扩大解放区。去年一年,消灭敌人是在解放区以内,好处是我们有群众帮助。但是打一年可以,长此下去人民负担太重。只有打出去,才能吃蒋管区的饭,扩蒋管区的兵,打翻蒋介石的征兵计划,破坏他的总动员。当然也有困难,在新区地形不熟,人民还没有与我们打成一片。但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我们为人民办事,领导人民进行土地改革,就可以得到人民的积极拥护,解放区就可以更加扩大。

举行大反攻,国内条件都成熟了,再从国际形势看,许可不许可?关起门来计算可以有把握,但是美国人来了怎么办?对这个问题,我们要看世界大势,要分析,不要一提到美国就给吓住了。美国不可能用原子弹来对付农民战争。美帝国主

义能给蒋介石什么东西？第一是给军火。过去他给了蒋介石多少？先是说给三十九个师的装备，后来给了四十五个师的装备，东北、山东给的最多，但是我们在这两个地区的缴获也最多，有什么可怕？第二是给钱。美国究竟能给他多少？从抗日以来共给了四十亿美元⁽⁴⁰⁸⁾，日本投降以来，占二十多亿，但是都被蒋介石用光了。美国还能再给多少？美帝国主义是“阔少”，很多国家都向他要钱，但他有多少钱？能给蒋介石多少？马歇尔⁽³⁶²⁾刚走不久，魏德迈⁽⁴⁰⁹⁾就来。为什么来？是想进一步控制蒋介石的军队与经济，经营台湾。宋子文⁽⁴¹⁰⁾主张修铁路，建军事基地，筑海港，由美国控制。现在蒋介石卖国，让美帝国主义侵略，我们更容易动员人民反对蒋介石。第三，再厉害一些，就是美国出兵。那末美国共有多少兵？一百一十万。全世界许多地方他都要出兵，要多少？算他拿出二十万来中国，占全部兵力的五分之一。但二十万人放在中国算什么？顶多只能放在大城市，放在台湾。日本人在华北放过一百万，美国兵是少爷兵，就算他放上五十万，又算什么？同志们的确要打破以为美国了不起这样一个观念。如果美国真的出兵，那就完全暴露他的侵略面目，更利于我们动员人民。他顶多占几个城市。我们围困他，他不被歼灭就只有逃走。美国是可以打败的。不要以为我们在神泉堡这样落后的小地方不行，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在落后的小地方干大事情！美国的困难多得很，他的政治、经济危机不能避免。世界人民的力量一天天大起来，美帝国主义的日子更不好过。

总之，我们打倒蒋介石是有把握的，第二年打出去，实行大反攻的决定是正确的。无论国内条件、国际条件，都是有根

据的,是能够实现的。当然不是再打一年就能解决的,要到第三年,可能到第四年。今后两年我们将要登上山顶,还要鼓两年劲,蒋介石的力量已是下降的,但还没有下降到最低点。现在是运动战,将来还要打阵地战,太原等城市还放在那里,最后如果美帝国主义守上海,我们还是要收回,所以火力要发展,要打阵地战。我们还有困难,如军事工业基础薄弱、干部不足、粮食不宽裕等等,这些困难都要我们来克服。战胜蒋介石,也就是把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根子挖去,所以战争不是小规模。中国地区这样大,四万万五千万人翻了身,革命胜利了,对世界革命有很大意义。所以打倒蒋介石,不要说还要两年,就是五年也划得来。同志们大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年,还怕等不到成功?我还有这个信心呢!

同志们会问,我们现在还在乡村,蒋介石、美国人仍占着城市,如何取得城市取得全国胜利呢?中国革命就是农村包围城市而后夺取城市。主力打出去以后,地方武装起来“拔钉子”。不要看胡宗南今天还占了陕北多少城镇,一旦我们大军到了大关中,他不走也要被我们拔去的。城市要在最后取得,才是牢靠的。要从局部到全国,就是这样发展。我们是从井冈山起来的,现在要到处建立解放区,解放全中国,整个形势的发展趋势是定了的。这个规律,党的领导同志是熟悉的,现在全党同志都要熟悉这个规律。

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是我们最兴奋最高兴的。无论在那个部门工作的同志,都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都要做一个有用的螺丝钉,都要发挥自己的作用。

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

关于当前民主党派工作的意见^{*}

(一九四八年一月)

一、民主同盟⁽³³¹⁾一部分中委已集会香港,恢复活动。国民党反对派已在香港成立革命委员会⁽⁴¹¹⁾,宣言反蒋。冯玉祥⁽⁷⁵⁾在美组成“旅美中国和平民主同盟”,反对美援蒋内战,要求美助民盟获致中国和平。国民党已宣布开除冯玉祥党籍。另一方面,宋子文⁽⁴¹⁰⁾确曾至港与李济深⁽¹⁴³⁾、蔡廷锴⁽⁴¹²⁾接洽。民盟及国民党民主人士多对冯、李、蔡等估计高,且有对两广反动当局伪装反蒋的阴谋感兴趣者。这一切,都需要我党对蒋管区民主党派问题根据中央去年十月二十七日指示⁽⁴¹³⁾作进一步的具体的分析,并规定对待他们的明确方针。

二、自民盟在蒋管区被迫并由其一部分领导人接受国民党的命令自行宣布解散后,全国性的第三大党运动已经失败,第三条道路的想法已经破产。中国的民主运动,由于历史的发展,武装斗争成为主要形式。到了大革命后,就只有两个全国性大党,经过二十多年的斗争和战争,一天天证明中间道路即第三条道路已成为不可能。民盟由于抗战特别由于政协⁽³⁴⁵⁾的机缘,客观上一时造成了他在全国的第三党地位,使

* 这是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稿的节录。

他中间许多领导人物代表着中产阶级的想法，企图在国共对立的纲领之外，寻找出第三条道路。但一接触到实际斗争，尤其是内战重起，就使他只能在靠近共产党或靠近国民党中选择道路，而不能有其他道路。青年党⁽³⁸⁹⁾、民社党⁽³⁹³⁾分子依其本来面目先后分裂出去，跟随国民党走了。其他民盟大多数分子在一个时期内，特别是在不参加“国大”、国民党政府和反对伪宪⁽⁴¹⁴⁾的斗争中，是靠近共产党的，这就使民盟在人民中获得了信任。可是国民党威胁一来，民盟有的领导人就表态宣布解散，这又使民盟在人民中赢得的信任跟着丧失，从而也证明要想在国共之间建立起中间道路的第三大党运动是失败了。

三、指出第三大党运动的失败，中间道路想法的破产，并不等于说民盟不再恢复活动，国民党不可能分裂，各地小党派或其他人民政治团体从此也不存在了，也不等于说中间道路的想法就从此消失了。相反，在香港，在海外，乃至在蒋管区许多大城市中，现在已经有，将来还会有代表某些资产阶级集团，或地方性上层集团，或进步的民主分子集团的小党派出现。美蒋愈失败，他们会出现愈多。我们愈胜利，他们会愈要求到解放区来活动。这些党派之所以小而且常为地方性所局限，一方面由于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做或很少做群众工作，另一方面由于斗争的尖锐，特别是长期地处在战争中，使他们很难在国共双方阵线之外有多少活动余地。因此，这些党派，除在纲领和行动上明显地靠近国民党或靠近共产党易于使我党决定对策者外，最值得注意的，还是些带中间性的民主党派及其所代表和影响的中产阶级、海外侨商及其他

爱国分子。这些党派虽带中间性，但其组织成份又常从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一直包含到进步分子，如民主同盟、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建国会⁽⁴¹⁵⁾等皆是，而其中政治倾向又从君主立宪⁽⁴¹⁶⁾一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有。尤其因为这些党派，现在多数处在香港或海外，无更多实际行动来证明其政治倾向，而美蒋正在华南运用伪装分裂的阴谋，冯、李、蔡等又是最易为美英政府所选择的对象。于是情势发展的复杂性，使我党在发展进步、争取中间、孤立右翼的统战政策上，在鼓吹好的、批评错的、揭露坏的宣传工作上，都需要有合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分析。

四、在革命战争和阶级变化的发展上，需要我党有领导的预见，但证实这个预见的正确，还需动员全党领导群众在实际工作中循着这个预见的方向努力奋斗，否则，预见便会落空。所以，宣传只能起原则启示和一般推动的作用，最主要的还靠群众自己切身经验来证明。如果空谈某某为君主立宪派，而不去争取民主同盟、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旅美中国和平民主同盟等走向进步，并在实际斗争中揭露美蒋阴谋，反对对美蒋的任何幻想与保存美帝侵略及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任何企图，以证实和孤立这些君主立宪的右翼分子，那末，群众的觉悟不但不会提高，甚至还会反对我们的宣传，以为是无的放矢。可以说，这种宣传有不如无。应该记得，我党代表团在与民主同盟关于不参加南京“国大”的合作和斗争中，当时对于张君勱⁽³⁹⁰⁾等右翼分子乃至对青年党所采取的成功策略，并不在预言民社党、青年党一定参加“国大”，而在强调参加“国大”就一定破坏政协，成为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帮凶，并欢迎任何人

拒绝参加“国大”，连国民党代表在内。当时，我党及左派报纸刊物是配合这一宣传的。这样，就在群众面前孤立并抛弃了民社党、青年党，并阻止了民主同盟以后对于伪宪及改组政府的动摇。尤其应该记住毛泽东同志的统战方针：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这在任何时候任何斗争场合都是坚定不移的原则。要了解那个多数一直要包含到敌人营垒中的少数开明分子（即封建买办阶级中的开明士绅、爱国分子等），均须以我党的行动纲领（即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志《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及十月十日解放军宣言⁽⁴¹⁷⁾、土地法大纲⁽⁴⁰⁷⁾）争取之。在利用敌人矛盾上，当其还只是反动统治内部的反对派及反蒋的地方实力派时，我们只能看做是间接同盟军；但当其已经改变立场，拥护我党行动纲领，公开反对美蒋时，我们就须采取欢迎态度，促其在行动中改造自己，证明其为直接同盟军。自然，这中间的不稳定性与投机性还会很大，我们应持若干保留态度，但也只有在加强我党领导和又团结又斗争中才能解决。

领导作风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九四八年二月五日)

对许多思想上作风上确有问题的同志，不应采取排斥的态度，而应采取信任他们又抓紧做他们工作的态度。这是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作风。因为对任何一个同志，必须有一个基本估计，就是基本上是可信任的还是不可信任的。如果有充分材料说明他是不可信任的，那党就应该对他采取排斥或怀疑的态度。如果是可信任的，那就不管他有多少条错误，思想作风有怎样的毛病，党对他还应给以信任，在信任中来批评他的错误，纠正他的作风。这些人既是基本上好的，虽有严重而多的错误，我们只能在信任中抓紧，而不应置之不理，冷淡起来。否则，领导者自己就无法批评他们的错误，反使自己陷于被动。要做领导者，必须团结他所不喜欢和不愿接近的同志，然后抓紧他们，称赞其对的方面，批评其坏的方面，然后才能改造他们，同时也就改造了自己的领导。

* 这是一封党内信件的摘录。

老区半老区的 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

根据各地最近数月的报告看来,各解放区,除了去年秋季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进攻以后解放的新区以外,在所有老区与半老区中,大致应分为三类地区,并应根据三类地区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工作方针。

第一类地区,是土地改革较为彻底的地区。其中,大多数地区,经过了减租减息、清算斗争和一九四六年“五四指示”⁽⁴¹⁸⁾以后的土地改革;一部分地区,经过了清算和土地改革;而陕甘宁的一部分地区则经过了一九三七年以前的分地及一九四〇年的归地⁽⁴¹⁹⁾。在这些地区,土地已经平分,封建制度已不存在,农民各阶层占有土地的平均数相差不多。阶级情况,除了东北及其他平分不久的地区尚有不同外,地主与旧式富农均比过去大为减少,且有已下降为劳动农民或贫民者,但尚有一小部分地主旧富农占有较多较好的土地财产。这类地

* 这是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经毛泽东同志修改过。

区的工作干部有许多人占有较多较好的土地财产。这类地区，新富农已经生长，且有多过旧富农者。中农在这类地区已发展为多数，占乡村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到八十上下，其中，新中农占很大数量，有达一半以上者。中农所有土地的平均数，一般超过贫雇农所有土地的平均数约二分之一上下。贫雇农变为少数，占百分之十到四十上下，其中尚有若干未彻底翻身者，亦有由地主旧富农下降为贫农者。这类地区，应被认为土地已经平分，决无再行平分的必要。留下的问题是在较小的范围内，用抽补方法调剂土地及一部分其他生产资料，使尚未彻底翻身的贫雇农，从地主旧富农尤其是占有超过农民很多的土地财产的干部家庭那里，补进土地及其他必需的生产资料。如果需要抽出新富农甚至一部分富裕中农的土地时，必须取得被抽者的同意，方可抽动。绥德黄家川的典型经验⁽⁴²⁰⁾，可以大致应用于这类地区。

第二类地区，是土地改革尚不彻底的地区。其中，一部分地区，经过了减租减息、清算斗争与“五四指示”后的土改；另一部分地区，经过了清算和土改，但均由于各种原因，例如领导方针动摇、党内不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及战争情况等，致使土地平分尚不彻底，封建制度尚有残余，农民各阶层占有土地的平均数相差较大。阶级情况，地主旧富农较第一类地区为多，大都仍占有较多较好的土地财产。工作干部中许多人占有较多较好的土地财产。新富农尚不多。中农占人口的少数，约为百分之二十到四十上下，其中新中农亦占少数。中农所有土地的平均数，因减租清算致土地转移的结果，一般超过贫雇农所有土地的平均数达一倍上下。贫

雇农仍占多数，占百分之五十到七十上下，其中多数尚未彻底翻身。这类地区，应被认为平分已大体实施，但不彻底。因此，一般地也不是再来一次全面的平分，而是实行在较大范围内的调剂。只在某些特殊地方，在多数农民要求并取得中农同意的条件之下，应当重新平分。由于这类地区贫雇农人数最多而土地平均差额又较大，单动地主旧富农及干部的土地财产，一般不能满足贫雇农的要求，势非抽动新富农及一部分中农的土地不可。因此，凡中农所有土地的平均数，超过贫雇农所有土地的平均数在一倍上下者，在取得本人同意以后，可以抽出中农的一部分土地，但以不超过其全部土地的四分之一为限度。如此，一方面可使中农波动面不致太大，另一方面仍可保持中农所有土地的平均数超过贫雇农所有土地的平均数，但又不致相差太大。如果中农所有土地的平均数超过贫雇农所有土地的平均数在一倍以上，并赞成平时，可以实行平分。在这类地区，绥德黄家川经验中所述土改工作人员的工作方法，亦必须注意采用。

第三类地区，是土地改革很不彻底的地区。其中，一部分地区虽然也经过了清算和土改，但是工作很坏；另一部分地区，则是边沿区或收复区，土改工作尚未进行。所有这些地区，土地并未平分，封建制度依然存在，土地关系及阶级情况仅有若干变动，地主旧富农仍占有大量的土地财产，贫雇农仍然是人多地少。在这类地区，完全适用平分土地彻底消灭封建制度的方针。平分的重点，应放在没收地主土地财产及征收旧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上面。对于一部分中农的多余土地，必须在取得其同意以后，方能抽出平分。如果某些中农所有土地较一般

农民所有土地的平均数只超出百分之十以下者，应不变动。边沿区，如尚带游击性质，应作新区看待，适用中央关于新区土改要点的规定，不应列入此类地区。

二

不论是平分土地或调剂土地，不但应注重土地数量的差别，还应注重土地的质量、产量及其位置远近的差别；不但应从农村的一般耕地着眼，还应从公地、荒地、黑地、绝户地等着眼；尤其是非法强占的土地财产，分配不公的土地财产及干部贪污或侵占的果实，更应首先注意解决。如此，才能真正实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平分方针，才能从多方面设法满足贫雇农的要求，而同时又照顾了中农的利益。在平分或调剂土地中，对于在抽动新富农及中农的土地时必须充分说明理由取得本人同意一点，甚为重要。如果本人不同意，则应向他们让步，不得采取强制办法。

三

为着满足贫雇农的要求，在实行调剂土地时，应首先补足缺地较多的贫雇农。然后，才对于有完全劳动力的青壮年单身汉，补足其两人份的土地，但如土地不足时，亦可补给较两人份为少的土地，或者不补。对于孤老寡妇，因其缺乏劳动力，在土地不足时，亦可不补给两人份的土地。对家庭人口多的，亦可较家庭人口少的少补。对流氓习气很深一时难望改好者，也

可少补,后补,或不补。对于此种流氓,暂时应只给与土地使用权,不给与土地所有权。对于由地主富农下降到贫雇农为时不久者,亦可后补,或不补。总之,要使广大贫雇农群众能合理地补足土地,以利生产,而不应附和绝对平均主义的错误思想。在调剂土地以后,对于孤老寡妇及贫雇农中仍有困难不能解决者,政府应另行设法帮助其解决困难。

四

在第一第二两类地区中,在农民已经发动和组织起来的地方,目前应依上述各项规定,于春耕前实行调剂完毕,确定地权,以利生产。在工作尚未做好,估计春耕前已不可能完成土改任务的地方,即应将土改工作推迟至夏季以后进行,并保证今年的土地生产物归耕者所有,而将工作迅速转入生产、整党和建立乡村民主生活上去。在第一第二两类地区中,调剂土地的工作已经做好的地方,即应确定地权,不再变动。在第三类地区中,更应将已着手的土改工作赶快作一结束,推迟至夏季以后重新进行,以便迅速转入生产及一般的宣传组织工作。

五

在老区半老区,应准备以二年到三年时间(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〇年),有计划地完成全区域的土改与整党任务,而不宜操之过急,致发生许多不应有的毛病。土改工作与整党工

作,均是很细致的群众工作,必须依据群众的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领导干部的多少强弱,决定工作的速度。每一个乡村土改与整党问题的解决,均必须酝酿成熟,取得绝大多数人的同意,方能作出决定,采取行动,不能由少数人强制解决,致犯命令主义的错误。同时,对于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意见,又必须耐心说服,实现党的领导作用,不要犯尾巴主义的错误。

六

土改与整党,均应采取有重点的、波浪式的、逐步推广的方法。凡无得力的领导者或健全的工作团的地方,宁可暂缓发动,不要急于求成,致走弯路。但是在一切决定发动工作的地方,又要集中力量,按期完成工作计划,不要拖延太久,致使群众情绪减低,既碍生产,又不利于工作的推进。对于一切领导土改与整党工作的领导者及工作团,均必须加以训练,讲明政策,并要适时地检查他们的工作。

七

贫农团无疑是农民群众中坚决实行土地改革彻底消灭封建制度的骨干组织。但是在第一类地区平分已经实现、中农已占多数的情况下,如果也要人为地组织贫农团去领导一切,势必脱离多数,孤立自己。因此,在这类地区,应就原有的农会加以扩充,并改选农会的委员会,使其能领导各项工作。原来无农会者,应成立农会。在农会中,成立贫雇农小组。如果贫农

团已经组织起来,则不应马上宣布取消,而应使贫农团逐渐改为农会中的贫雇农小组。在第二类地区,因为平分尚不彻底,贫雇农仍占多数,贫农团的独立领导作用尚未失去,因此应该组织贫农团,并使其在农民中起领导作用,但在组织时,应吸收新中农参加。在贫农团成立一个短时期(例如一两个月)以后,即应就原有农会加以扩充,改选农会的委员会,使其能领导各项工作。原来无农会者,即应成立农会。在土地调剂工作完成以后,贫农团即可改为贫雇农小组。如果在过去土地改革中业已成立有贫雇农及新中农领导的健全的农会,或者有顺利条件能够保证改选农会的委员会使贫雇农及新中农占三分之二、实施土改工作的健全领导的地方,亦可不组织贫农团,而只于农会中组织贫雇农小组。在第三类地区,因为平分尚未实施,贫雇农占多数尚未翻身,中农对土改尚存观望心理,必须首先组织贫农团,发动土改斗争,树立领导威信,一个时期(例如三四个月)以后,再成立包括全体农民在内的农会。农会应容许新富农入会,但对地主旧富农及一切投机分子,则应坚决拒绝其入会。在一切地方,在土改工作与整党工作大致完成以后,即应实行普选,成立乡村人民代表大会,并改选乡村政府。在农会的委员会中,在乡村人民代表大会及政府委员会中,一般地贫雇农新中农应合占三分之二,旧中农及其他劳动分子应占三分之一。

八

各地整党工作正在开展,并创造了许多方法。其中,以经

过党的支部，邀集党外群众参加党的会议，共同审查党员及干部的方法，为最健全的方法。平山县的典型经验⁽⁴²¹⁾，应为各地所取法。在第一第二类地区，一般的封建势力业已消灭，而农民中的不满常常集中于一批利用政治地位为非作恶、侵占土改果实的党员及干部身上。因此，在这些地区进行调剂土地的工作，必须与整党工作相结合，有时还须从整党开始，才能发动群众的积极性。采用上述党员与党外群众结合开会的整党方法，一方面，使参加会议的党外群众能够尽情地批判与审查他们所反对的或赞成的党员及干部，使他们感觉到他们已与党通了气；另一方面，党的领导者又可根据群众意见及党内情况，全面地考虑问题，分别是非轻重，给以应罚应奖的公平的处置，使党内外群众均感觉满意；同时，又可以吸收被群众所推荐的或拥护的积极分子加入党的组织。如此，既整顿了党的队伍，又整顿了群众的队伍，建立起党内的民主生活，将极大地提高党的威信。此种方法，在农村中，在城市中，在工厂中，在军队中，在机关和学校中，均应实行。除尚未巩固的新区以外，一切党的支部，均应公开。一切党的支部，在其讨论有关群众利益的问题的一切会议上，包括党的批评检讨会议在内，均应有党外群众参加，不许开秘密会议，借以破除群众对党的组织与党的会议的神秘感觉，使党内一切好的与坏的现象暴露于群众之前，为群众所监督，为群众所批评或拥护。实行这种方法，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上级党的领导的健全，一个是本支部要有几个好的党员骨干。如果上级党的领导者的领导不健全，便须先健全领导。如果某些支部确已为坏分子所统治，甚或全部为坏分子所盘据，没有好的党员骨干，无法进行

改造时,就应解散这个支部。上级领导者就应超过该组织,直接动员群众,依靠贫农团、贫雇农小组及农会,领导土改与生产。这样经过一个时期之后,重新吸收党员,建立支部。对于原支部的党员,在该支部被宣布解散以后,上级党的领导者得依情况将他们提交贫农团大会或农民大会予以批判或审查,并给以应得的处分。其中,经群众评定认为错误较轻的分子,经过一定时期的考察,证明其确已改正者,仍可个别地恢复党籍。但这是指特殊的情况。一般的支部,总有若干好党员。上级领导者的责任,就在善于发现这些好党员,并依靠他们为骨干,吸收新鲜力量,改造支部,而不要抛弃或不理他们。整党审干,必须采取严肃而又谨慎的态度。我们既要严肃地注视党内不纯的现象,又要勿忘我党的整个情况是业已经过长期考验,在群众中有了极大威信,并正在胜利前进中。应当承认,在战争和土改的过程中,一定会有一批阶级异己分子从党内清洗出去,同时又一定会有大批的革命积极分子涌进党来。因此,各地党委在整党工作中,应当分别情况,解决问题。对于那些显然犯有重大罪恶、业已丧失作为一个党员的起码资格的分子,应当开除出党。对于那些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对于那些不可救药的党内蜕化分子,均应坚决清洗出党。对于那些虽然是从剥削阶级出身,但是自愿放弃其原来的阶级立场的党内的知识分子或其他分子,在他们犯有严重错误,但尚未丧失作一个党员的起码资格的时候,只要他们承认错误,愿意改正错误,并获得党外群众的同意,我们就应采取考察和教育的态度,而不要马上开除出党。对于那些犯有较轻错误的党员,不论其出身如何,均应采取教育方针。

关于土改和整党问题 给阜平中央局的电报*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阜平局关于平分土地的指示，一般很好。中央发表了一个关于老区半老区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除在那个文件中已经说到者外，另有点与你们的指示有关者，告如下：

(一)关于土改，你们在乙项二节中，原已依据不同情况，规定各种地区的不同方针。但在乙项三、四、五三节中，却显得实现这个方针的分类和办法不够明确。在第三节土改较彻底区，规定一般土地不平差额如都在平均数百分之十以下，就不再分，至多把差额较大者加以调剂，但对差额如在平均数百分之十以上，则无规定。在第四节所指地区，规定如缺地农户在百分之四十或五十以下，平时时需抽出土地的户数在百分之二十以上，即不要平分，而采取中间不动两头动的办法。实际上，这种地区如是土改不彻底区，中间可能有小动，而缺地农户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抽地户数在百分之二十以下，仍可用调剂办法解决。如系土改极不彻底区，则又应平分，无所谓调剂。

* 这是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

我们认为可以有这样两类地区，主要均由于土地已经变动，地富封建剥削已不存在或只存残余，而占有较多较好土地者，是干部、军属、烈属及一部分地富，故原则上，不应再来一次平分土地，而应是调剂土地。在第一类土改较彻底区，中农多，贫雇农少，故调剂范围就小。在第二类土改不彻底区，中农少，贫雇农多，故调剂范围就大。因中农多，其所有土地的平均数，就不可能与贫雇农所有土地的平均数相差太大，贫雇农少，其所需抽补的土地就不多，故应尽可能不动或少动中农的土地。反之，因中农少，其所有土地的平均数，就可能与贫雇农所有土地的平均数相差较大，贫雇农多，其所需抽补的土地就较多，故不得不动一部分中农的土地。照中央指示，在这后一类地区，凡中农所有土地的平均数，超过贫雇农所有土地的平均数在一倍上下者，在取得其本人同意后，可以抽出中农一部分土地，但以不超过其全部土地的四分之一为限度，似较合理些。望你们根据实情，加以斟酌。但这类地区，即使需要平分，也应当作为特殊的而不是一般的规定。在这类地区，你们规定了其他一些具体办法很好，在较彻底地区也一样适用。在土改极不彻底地区的主要情况，应是土改一般并未实施，地富封建剥削仍然存在，故原则应是平分土地，不是调剂土地，但办法仍应是抽补，而不是完全打烂。你们第四节第五节，如均系指这类地区，就无须划一界限，规定缺地农户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抽地户数又在百分之二十以下时才平分，否则不平分而两头动。实际上，地富土地多，贫雇人数多，在实行抽补平时，就是中间不动两头动。在这类地区，再规定某些中农占有土地不超过平均数百

分之十者即不动，那对中农动的就会更少，你们在第四第五两节规定两种标准（百分之十与百分之五），也不甚妥。

（二）关于春耕生产问题，关系确是很大。但如为满足农民分地要求，而不问工作是否做到，条件是否成熟，只靠一股劲，就将三类地区的土地都调剂好或平分好，这恐怕是不可能的。凡是靠一股劲，就想完成这样细致的土改工作，最多象东北煮成夹生饭，还要再煮，否则，就会搞错了，还要纠正。贫雇农欲罢不能，而中农无心生产，大吃大喝，地富则对生产怠工，故意破坏，正证明我们工作尚未深入。如就在这样的基础上调剂土地，平分土地，其结果，可以想象得到不会很好。你们要研究绥德黄家川调剂土地的典型⁽⁴²⁰⁾，那样土改较彻底地区，还需要那样“深耕细作”的群众工作，那不彻底或很不彻底的地区，更可想而知。群众中此种情绪，你们还应在宣传上检查其影响，是否由于过去强调为贫雇农撑腰将中农冷落了，划分阶级有错误，宣传平分土地又没在抽补上定出办法，致中贫农情绪如此不同。而组织上又一下子停止几万村级地富党员的党籍，是否也起了副作用。凡此，你们应从造成这一心理现象的各种因素分析它的根源，迅速采取正确的领导和办法去纠正这些现象。同时，应根据中央的指示，并采用晋绥分局二月十日紧急通知及晋绥行署、农委会以命令保证的办法，使农民愿意加紧春耕，敢于发展生产，劳动致富。

（三）几万村级地富党员不加区别不分地区地一下子都停止党籍，也值得考虑。因为在地富党员本身，固然坏的投机的异己分子会多，但也不能说没有自愿放弃或脱离剥削关系的人，这是一。划成份既有错误，不能使中农党员不受影响而被

当成富农党员处置，这是二。在抗战、自卫战期中，地方党吸收了这么多村级地富党员，党的高级领导毫无警觉，现在一下子全部停止党籍，乡村支部不会毫无影响，而且有可能是一种带普遍性的震动，这是三。各地方县、区、村领导者及工作团，是否都很健全，又处在战争中，对于这件事可能发生的副作用，能否应付裕如，这是四。这些，当然不是地富党员原则上是否还应留在党内的问题，而是实行步骤是否应该如此急促，如此不加区别的问题。你们对这件事的决定和实行，是否已筹划妥当，执行后的情形和影响又如何，均望你们搜集材料仔细研究后电告。你们既已下令停止地富党籍，如果现在又说不停止，当然不好。我们不是要你们取消过去停止党籍的规定，而是要你们研究停止后的结果如何，如果结果不好则应采取适当处理办法。在这里，我们认为平山用党内外民主结合的办法来整党审干是一个新创造，是最健全的整党方法。

党的政策必须适时地 向群众公开*

(一九四八年三月七日)

近两月来,晋绥分局许多指示及二月十日在《晋绥日报》上公布的分局紧急通知,对土改和整党工作所规定的方针和办法,与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改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基本上并无不同之处。故中央这一指示,仍应公开发表。这种新精神很有助于你们澄清干部中认识问题模糊、不懂得区别情况、不能掌握具体政策的混乱思想。

任何政策的决定或改变,任何政策中之正确的部分或错误的部分,必须适时地不但向干部而且向群众公开指出,才能得到群众的了解和拥护而成为力量。领导者必须经常掌握这一主动,不要因为过分小心,许多有关政策问题,仅限于少数干部知道,弄得群众及下级干部反彷徨不定,结果必使自己陷于被动。你们如果认为中央指示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不是原则问题上)在实行时还须加以解释,不致使下级干部看到后以为他们所做的凡不完全合这一指示的,都需推翻重做,那你们可作一个决议接受这一指示,而将应该注意之点写在上边同时

* 这是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晋绥分局的指示。

发表。

中央指示第四项有“调剂土地的工作已经做好的地方，即应确定地权，不再变动”的规定，对你区多数土地已经分配的地方，除掉如你们紧急通知所指因动中农面过宽，应对不愿抽地的中农（划错成份的在内）实行减抽或退回一部外，完全适用。

在部队中试验组织士兵委员会^{*}

(一九四八年三月八日)

三查与诉苦的新式整军运动⁽⁴²²⁾，在我各野战军各军区部队中都已实行或正在实行着，其成绩已逐渐从部队的觉悟、巩固、团结、学习和作战上表现出来，其本身就是部队中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民主精神的新创造新发扬。如果运动中尚有若干错误与偏差，大多由于领导者没能很好地掌握三查运动的方向，开始时不敢放手发动，发动后又未能预见一些“左”的偏向加以防止。但一般地说，这次新式整军运动的成绩却是极大，各战略单位都是有领导地有计划地有秩序地在进行。为巩固和发扬这一成绩，现在确实需要将这一民主精神的新运动转为部队中集中领导下的经常的民主生活。中共四军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上规定的士兵会的组织，似较适宜。在名称上，究用士兵会与士兵委员会，或革命军人大会与革命军人委员会，可由各部酌定，主要的是其权限及其工作方式究应如何方为适当。现在这一组织，除在少数部队已开始建立外，大多数部队都还未着手组织。中央认为必须经过各军自己的实践，才能更有把握地对于这一组织作出适合于今天各种条

* 这是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

件的具体规定。为此，中央特责成各野战军、各军区政治部于最近数月内，利用作战间隙，选择几个不同情况的连队，一两个不同情况的营以上的直属队或机关，试行这一组织，并派负责人员亲去指导，以便取得经验，报告中央。所谓不同情况，是指要选择连队中俘虏兵成份多或少、新兵多或少、连队或机关的行政领导强或弱、党的支部健全或不健全、前方或后方、火线上或休整中等的不同情况，得出不同的工作方式的规律。进行这一组织的基本原则大致是：

（一）这一组织不论在连队中，在机关中，必须在其直接的行政首长领导之下进行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民主生活；

（二）这一组织的任何决定，必须得其行政首长批准后，方得实施；

（三）上级命令，这一组织必须绝对服从，无权变更，只在情况许可和需要时，得由其行政首长提交讨论这一命令中的实施办法；

（四）这一组织如欲对其行政上领导干部进行思想检讨，必须在情况许可和需要时，得到上级政治部的批准和领导，方准定期进行；

（五）这一组织中的一般批评与自我批评，亦必须领导其向着有利于战争胜利和部队巩固的方向进行。

各政治部在试行时，可根据自己所遇到的实际情况，使这些基本原则具体化，或加以新的补充。试行的经验不论好坏（而且必须看到好坏两方面），几个月后由各野战军、各军区政治部负责向中央提出意见，以便集中起来，规定最后办法。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是反对旧民主主义或旧资本主义的经济方针的。

新民主主义经济与旧民主主义经济的基本区别。

原则：

1. 无产阶级领导的经济还是资产阶级领导的经济；2. 为多数人还是为少数人；
3. 以劳动大众为主附加自由资产阶级，还是以资产阶级为主附加劳动大众；
4. 基本上计划经济，还是完全自由主义经济；
5. 如果个人或少数人利益与大多数人不冲突时，则大多数加少数；如果少数人或个人利益与大多数发生根本冲突时，则抛弃少数而顾大多数。

工业与商业的区别。工业是生产的，商业则附属于工业，投机性大，必须区别二者，尤其要以是否于国计民生有利为标准。

* 这是周恩来同志写的一个提纲。

金融斗争——国家银行与私人钱庄。什么是我们要提倡的保护的,什么是我们要反对的取消的,什么又是我们今天尚不能取消而于我们不利应暂时容忍而须加以限制的。

税收政策。区别超利润税、限制税、普通税、免税、减税及区别营业牌照、所得税及摊派包税的各种根据。

公营、私营与合作社三种经济。主要与次要,少数与多数,国家命脉所系或非国家命脉所系,于国计民生有利或不利。

国家权力如何运用。政权、法律、监狱、税收、管制、奖励、贷款、禁令、会计核算新观点。

新民主主义的合理组织与旧资本主义合理化。

工厂委员会与厂长负责制。

工会、党委的作用。

同时,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也是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或极端平均主义的经济方针的。

工业的科学管理还是后方机关制度。

工资制度还是供给制度。

生产观点还是救济观点。

工业无产阶级立场还是贫雇农路线。

技术进步还是安于落后。

政治条件是什么?老资格还是新资格。

向谁学习,学习什么?

击破敌人假和平运动的阴谋^{*}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一)在我人民解放战争日益胜利面前,国民党区域各阶级、党派、团体、个人都在为自己前途作打算。进步的及中间偏左的分子,多已表示赞成我党“五一”口号中召开新的政协会议⁽⁴³³⁾的主张。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则有不少的派别及个人,已在美帝国主义当权派的策动和鼓励下,进行一种假和平运动,企图利用国民党区域一部分人民中尚存在的对于和平的幻想,准备在蒋介石军队更加失败、国民党局势更加危急的时机发起政变,表面上牺牲蒋介石,宣布停战议和,实际上是为整个国民党反动统治取得喘息时间,以便休整兵力,卷土重来,消灭人民力量。在这一活动当中,许多地方系军阀政客,以李宗仁⁽⁴²⁴⁾为首,企图取蒋介石而代之。一部分中间派右翼分子,亦企图倒蒋取得权位,使中国革命限制于他们所要求的范围,避免彻底的改革。此外,确有一部分人民天真地认为在蒋倒之后会有和平,他们对于美帝、李宗仁及中间派左翼分子尚存幻想。至于蒋介石及其死党则将尽力挣扎,非至万不得已,不肯

* 这是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稿,经毛泽东同志修改过。

轻易下台。这样，就使在目前的革命战争和反美反蒋的人民运动之外，有一种复杂的情况和趋势在发展着。这一可能的发展，中央在去年十月曾经告诉你们，要你们在群众中进行准备工作，现在这种工作应当加紧进行。你们必须认识，美帝与某些国民党反动派所进行的和平阴谋，是对革命不利的，因为它能够欺骗群众。但在另一方面，倒蒋的活动，显示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极大分裂。蒋介石一倒，不管改变者使用什么法术，总是无法挽救反动派的命运，而且会加深国民党分崩离析的局面，这是对革命有利的。

(二)你们必须注视这一局势的发展。在人民中，在民主党派及民主分子中，根据事情的演变，不断地揭露美帝与中国反动分子的阴谋。你们必须注意具有说服性地而不是笼统地武断地分析这一阴谋的企图及其所具有的危险性，以打破他们对于倒蒋和平的幻想。同时，又要区别反动统治内部的倒蒋和平阴谋与人民群众及民主分子中的和平要求两者之间的不同性质。如果后者把自己的要求混同于前者，必致为反动分子所骗而阻碍革命的发展。如果后者把自己的要求严格区别于前者，则可利用反动统治内部的分裂而有助于革命的开展和胜利。所以，你们在国民党区不应笼统地反对和平，反对某些人倒蒋，而应利用各种倒蒋活动分化反动统治，使我各个击破，并准备将敌人的假和平运动转变为人民群众的真和平运动。这就是说，在凡有群众的地方，或在某些民主分子的集会中，当着反动派的倒蒋和平阴谋与人民的和平要求尚混杂在一起时，我们不要害怕和逃避，而应积极参加，领导群众，坚持人民对于和平民主独立的革命要求，以区别和揭破反动派的阴谋。

同时,对于企图发动政变的国民党反蒋派别,当着他们找我们商谈时,你们亦不要拒绝商谈。一旦反动统治内部的政变果真爆发,我们便能有准备地将敌人的欺骗口号转变为群众的行动口号,这即是向代替蒋介石上台而依然是美国走狗的人们要求人民自由,保障生活,逮捕战犯,解散蒋军,取消伪宪伪国大,停止美援,撤退美军,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等等,以推动人民革命运动的高涨,以配合人民革命战争走向全国胜利。同时,也只有这样做,才有可能使那些口头上反美反蒋分子即中间派右翼分子在行动上有所表现,或者跟着我党前进,或者暴露他们的虚伪而在人民面前破产。但你们必须注意,对于一切中间派右翼分子,只要他们尚处在中间地位,尚未公开站在美帝及其走狗一边,直接妨碍人民革命的发展时,我们还必须联合他们一道前进,不要不适当地和过分地打击他们。

(三)如果你们对于上述这一策略方针能有清楚的认识,并坚定而又灵活地执行下去,你们将有可能配合解放战争的胜利,在国民党区域进行活动,击破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

蒋管区斗争要有 清醒头脑和灵活策略*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蒋近已决心撕破民主伪装的最后残余,实行疯狂的法西斯独裁的最后挣扎。其表现在经济方面的,已有财经紧急处分令⁽⁴²⁵⁾。其表现在政治方面的,已有特种刑事检举⁽⁴²⁶⁾。现北平已发出拘捕学生传票二百四十份,南京已发出传票一百四十份,上海、天津、广州、昆明及全国各蒋管区城市必将接着大行检举,必将由学生发展到工人、文化工作者及一切民主进步人士。在紧急处分令中,已禁止罢工、怠工,不久必将禁止其他一切群众活动。这是蒋在我人民解放军愈加胜利面前必然要采取的步骤和手段,这是蒋愈加接近死亡的表现。但蒋愈接近死亡,他的统治内部便会愈加分崩离析,各找生路,他统治下的群众便会愈加不能生活而走向革命化。到那时,蒋及其死党仍有可能在其最后据守的城市,继续其疯狂的法西斯的最后挣扎。但这种挣扎不是将自己的统治直接送进坟墓,便是被其统治内部在美帝国主义策动之下进行和平阴谋的政变所代替,从而也使代替者进入坟墓。因此,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目前

* 这是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经毛泽东同志修改过。

工作，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和灵活的策略，必须依靠广大群众而不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

在此原则下，针对当前紧急情况及可能发展的情势，除乡村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尽量发展武装斗争、在条件不成熟或我工作薄弱的地区坚持群众工作和隐蔽党的组织以待解放军的到来外，在城市方面，应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在国民党统治的城市，单独进行工人、市民的武装起义，肯定地说，一般地是不可能的。故城市的工人、学生及一切人民斗争的发展，在国民党反动武装力量尚能控制的地方，是有其一定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就是说要提出或接近于提出打倒蒋介石、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口号，采取或准备采取武装斗争的直接行动，都是不许可的，都有使少数先锋队脱离广大群众、遭受严重摧残与招致一时失败的危险。尤其是将城市中多年积聚的革命领导力量在解放军尚未逼近、敌人尚未最后崩溃之前过早地损失掉，这是最失策的事。根据最近上海来的材料，党的准备工作及学生运动情形，都有此冒险倾向，这对于今天的坚持，明天的配合解放军进城，或在反动统治内部举行政变时所需发动的人民革命运动，都是不利的。

现在敌人已向你们发出最后警号了。一切蒋管区的城市，尤其是上海，应实行有秩序的疏散。不论党内党外，凡是已经暴露或为敌特注意的分子，都应设法离开岗位，首先向解放区撤退。其已进入解放区受训者（如泊头），目前绝不容许再出去。如一时无从进入解放区而又有可能回至家乡者，即回家乡进行隐蔽工作；不能回家者，即须转移地区，另找职

业隐蔽。凡未暴露而又未为敌特注意的分子，应继续深入隐蔽，在检举风浪过去后，再谋有步骤的发展，以便积蓄新的力量，等待时机。在这次大检举中的斗争策略，要依据各个单位自己群众的觉悟程度和人数，实行合法斗争（尽量利用统治内部的矛盾），如要求学校保护，反对特种刑事检举，在特种刑庭上据理力争，组织社会营救等。如果大多数学生已发生恐慌，不敢或不愿进行斗争，则不要使少数觉悟者单独去斗争。必须注意争取中间派，凡脱离中间派的群众行动必须力求避免。隐蔽后的组织形式，应采取抗战后期经验，实行平行组织、单线领导、转移地区不转关系的方针。在蒋管区城市中的党的领导机关，亦须严格遵守单线联络、分散领导的原则，不得违犯。必须认识敌人所欲打击的中心是我党组织，必然从公开检举当中寻找打击我党组织的线索，你们应特别注意党组织尤其领导机关的保护。对已经破坏的组织，不要急于恢复。对其中发生了叛变分子的关系，应暂时隔绝，待弄清情况，再谋处理。

无论反动派如何疯狂镇压，只要我党能有清醒的头脑，灵活的策略，并坚决依靠广大群众，而不犯冒险主义错误，我们是一定能够对付反动派的进攻，保持并发展自己的阵地的。

致 郑 洞 国⁽⁴²⁷⁾ 信*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八日)

洞国兄鉴：

欣闻曾泽生军长已率部起义⁽⁴²⁸⁾，兄亦在考虑中。目前，全国胜负之局已定。远者不论，近一个月，济南、锦州相继解放，二十万大军全部覆没，王耀武、范汉杰⁽⁴²⁹⁾先后被俘，吴化文⁽⁴³⁰⁾、曾泽生相继起义，即足证明人民解放军必将取得全国胜利已无疑义。兄今孤处危城，人心士气久已背离，蒋介石纵数令兄部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何能逃脱。曾军长此次举义，已为兄开一为人民立功自赎之门。届此祸福荣辱决于俄顷之际，兄宜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美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则我敢保证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必将依照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不咎既往，欢迎兄部起义，并照曾军长及其所部同等待遇。时机急迫，顾念旧谊，特电促速下决心。望与我前线肖劲光、肖华两将军⁽⁴³¹⁾进行接洽，不使吴化文、曾泽生两将军专美于前也。

周 恩 来

十月十八日

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七日)

各位朋友：今天特别请诸位来此聚会。我们虽然来了二十多天，但因为忙，未及分头拜访和请教，很感不安。昨天我们请了住在北京、六国二饭店的朋友来谈，今天又请了各大学的教授及外面的朋友，向大家请教。

要谈的问题很多，今天只能把最近的和平谈判问题向诸位报告一下。这样的报告，我已经做过很多次。但这一次，我相信是与以前不同了。过去与蒋介石谈判，正如陈嘉庚先生⁽⁴³²⁾在一九四六年打给我的电报中所说，是“无异与虎谋皮”。但是又不能不谈，因为人民切望和平，而当时象陈嘉庚、张奚若⁽⁴³³⁾二先生这样的人还不多，广大人民还不了解蒋介石的和平骗局。今天情况变了。今天可以说，如果诸位赞成这次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的话，不论和也好，打也好，我们有信心、有力量使它一定实现。我们要尽可能用和平方法来实现，但如果不能用和平方法，用战斗也一样要把它实现。这个变化是由于中国人民力量的壮大，由于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发展和人民解放军奋战的结果。关于民主运动，诸位知道

* 这是向来北平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部分爱国民主人士、北平一些大学教授做的报告。

的比我还多，我今天只把军事的胜利说一下。

蒋介石敢于撕毁政协决议发动战争，是靠着武装力量和美国援助。他当时在武装力量上的确占着优势。他有正规军四百三十万人，二百四十八个旅。这些都是在抗战中未受损失的，因为他实行的是消极抗战。一九四六年七月大打开始，他以为几个月就可以消灭人民解放军。但在两年零九个月中，却完全变了。头两年，战争平稳发展，我们每年消灭敌军一百五十万人，第三年起就起了突变，七个月（截至今年一月）就消灭敌军二百多万人。造成这个突变的是济南战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及平津战役⁽⁴³⁴⁾。现在蒋介石的兵力，连后方机关如学校、后勤等在内，只有二百二十万人，正规军则只有一百多万人，其中不少是受过歼灭而又补充起来的，战斗力更弱。所以，蒋介石自己也知道，这个战争是失败了，他的反革命企图是失败了。

与此同时，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壮大了。两年零九个月以前，人民解放军是一百二十万人，现在则发展到四百万人以上，并且大部分都美械化了。美帝国主义给了我们许多装备（当然，这是用不着打收条的），蒋介石做了很好的运输大队长。我们的战士有很大部分是俘虏过来的，称为解放战士，有的部队，解放战士竟占百分之八十，少的也占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平均约占百分之六十五至七十。对于俘虏，我们实行即俘、即查、即补、即训、即打的办法，就是说士兵一俘虏过来就补充到部队，经过诉苦教育，就参加作战。在打黄伯韬⁽⁴³⁵⁾时，情形竟发展到上午的俘虏下午就参加作战。当时的解放战士现在有许多已经做了排长、连长。这种情形是世界

战史上所少有的，若没有高度的政治训练是不可能的。今天我们部队民主化程度之高，连我们指挥的人都没有想到。虽然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就提出了在部队中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制度，但今天的发展的确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在三评运动中，革命士兵委员会可以批评干部，可以推荐下级指挥员，推荐得对的就批准，而且多数是批准的。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因为士兵们很了解，指挥员必须是能勇敢作战的，并且必须有智慧，单单勇敢是不够的，然后才是态度。所以士兵们的推荐多数是对的。这是评干部。其次是评党员。公开党员，让群众来批评党员，使党真正受群众监督。第三是评战功。谁有功，群众知道得最清楚，群众来评，自然可以评得最确当，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赏罚分明。民主扩大了，纪律加强了，指挥员们说现在的部队可好带了，士兵们说指挥员的态度变好了。我们的军队不但在政治方面是民主的，而且在军事方面也有民主。我们有时甚至还准许士兵讨论作战命令。每个战斗小组都开“诸葛亮会”，取“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之意。上级命令不可能很具体，下到连队后，战斗小组就开“诸葛亮会”讨论如何具体执行，这样充分发挥了士兵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在短兵相接的今天，更是特别需要。淮海战役中，敌人的工事星罗棋布，但一夜之后，情形变了，我们的工事包围了他们的工事。士兵们设法钻过敌人的工事，破坏它，而建立起自己的工事。打仗还要靠炸药，但这些物质的死的东西要靠活人来使用。没有士兵的勇敢和智慧，炸药也就没有用处。我们的士兵又勇敢又有智慧，没有炸不了的堡垒。即便是水泥工事做得好，一斤炸药不行，就用五斤、十斤、一百斤、二百斤，终归可以

炸毁的。矿山石头都可以炸开，何况工事？敌人称这为“土飞机”。这种“土飞机”需要靠下面，单靠上面是不行的。王耀武曾问我们，为什么蒋介石飞到那里，他们那里就打败仗，毛主席天天坐在陕北，却处处打胜仗？这是因为人民觉悟了，因为我们这个部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人民大众的，是我们大家的。人民解放军今天的水平，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高。所以，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失败了。

这样一来，南京反动政府在一月一日不得不提出和平建议⁽⁴³⁶⁾。尽管建议是虚伪的，条件是不能接受的，但和平建议我们却要拿过来。人民要真和平，我们也要真和平，毛泽东同志一月十四日声明中提出的八项条件⁽⁴³⁷⁾，就是真和平的条件。蒋介石不接受，天津一解放，他只好下台⁽⁴³⁸⁾，让李宗仁⁽⁴²⁴⁾代替他，这就表示南京统治集团内部已开始分裂出一个主和派。李宗仁接受八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派私人代表团⁽⁴³⁹⁾来平，最后我们接待了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⁴⁴⁰⁾。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今天胜利局面已定，用战斗方式可以解决是毫无问题了，只是时间早迟而已。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用和平方式来达到胜利，以便使国家少受破坏，多保存一些人力物力，使将来的和平建设多一份物质力量。中国太落后，现代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只占百分之十左右⁽⁴⁴¹⁾，需要用极大的努力才能使国家现代化。中国人民在战争中已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战场上敌我的伤亡和人民群众的损失都很大。例如淮海战场上几百个村落全都毁了，现在正在进行救济。这样的损伤自然是以就此终止为最好。但是，和平需要双方同意。李宗仁既然表示愿意接受，和平总算有了可能，我们

就要抓紧，并将这一可能性加以发展。我们不但看到了人民力量的壮大，也看到了敌人的分化。我们要争取主和派力量的发展，争取他们和我们合作。美国帮助蒋介石打了三年内战，现在也承认失败了，所以他要制造某种和平局面，派代理人钻进人民国家内部来活动。这也助长了南京政府和平谈判的意愿。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大肆搜刮，刮得上海资产阶级也受不住了，他们要求和平。除此以外，国民党统治区广大的公教人员也是一个和平因素，金元券⁽⁴⁴²⁾实在弄得他们活不下去了。由于以上的各种因素，才有这次和平谈判。在谈了十多天后，我们已经将一个最后的和平方案交给南京代表团，由他们送交南京国民党政府。

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中心问题是接收和改编。南京代表团和我们固然是有距离，但他们有一个概念是好的，即国民党的失败是一定的，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是一定的，他们承认错误，承认失败，因而愿意交出政权，交出军队。不过，南京代表团虽有此认识，南京政府却还没有这个认识，至于广州、溪口⁽⁴⁴³⁾就更不用说了。

关于接收。今天的革命，决不能再如辛亥革命⁽¹⁴⁷⁾和北伐战争⁽¹²¹⁾那样，由于中途妥协而使反动派最后又得到胜利。历史经验证明，革命如不能进行到底，则一定失败。今天我们决不能再蹈此覆辙。南京代表团说，国共两党历史上的争论是兄弟之争，我们给了他们严正的批评。这不能叫做兄弟之争。难道孙中山与袁世凯之争是兄弟之争吗？不，这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我们近二十年来与国民党之争也是如此。不过，南京代表团和我们之间在为和平民主的共同基础上的争

论，还可以算是兄弟之争。在这种场合，我们必须坚持严肃的原则性，决不能混淆是非。我们之所以坚持要用人民解放军去接收，因为这是关系革命到底不到底的问题。辛亥革命后，督军等等还是一概仍旧，只是换了一面旗。大革命时，北伐军到长江下游后，连国民党都说，是“军事北伐，政治南伐”。这样，革命就变了质。张治中⁽³²⁷⁾说起“前车之鉴”，那么，这就是“前车之鉴”。如果今天也是只换一面旗，让各色反动派依然压迫人民，照样滥发金元券，则人民的痛苦如故，人民就要骂我们。这不是对人民负责的做法。不推翻旧的，就不能建立起革命的新秩序；人民解放军不去，政权的性质就不能变更，反动军队就不能改编，生产就搞不起来。但接收也不简单，需要时间和人才，我们要有组织地接收。接收将是先城市而后乡村。人才方面，单是共产党绝对不够，必须各方人士大家来做。等到渡了江，北京、六国二饭店恐怕不免就要“人去楼空”。我们兢兢业业，怕搞不好，但我们不能放弃责任。将来在联合政府中也是如此。正因为我们人力不够，有些地方一时还接收不了。苏、浙、皖、鄂、陕、陇东将最先接收，其他地方只好缓一下。南京代表团总希望我们慢一点渡江。当我把和平协定草案交给他们时，他们问我有没有渡江的条款，我说没有，他们顿觉惊喜交集。但我说，虽没有“渡江”，却有“接收”。其实，渡江根本不能算是一个条件，许多接收的地方都在江南，何况长江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阻止过中国的统一。南京和溪口还没有完全割断，即所谓“藕断丝连”。他们说要等我们去割，我们则要他们先从政治上割断，军事上可以由我们来割。南京代表团不能反对我

们过江，因为既然承认我们去接收，当然就必须承认我们渡江。但他们总希望慢一点。至于广州、溪口则希望划江而治。我们指明，慢一点渡江，无异给广州、溪口以掩护，使他们获得喘息机会。这一点，南京代表团无法反驳。

关于改编，即改编军队。不如此就不能根绝内战因素。但又不能急躁，条件要宽大。我们的改编条件，甚至比南京代表团所提出的还要宽大。例如，他们曾主张裁兵复员，我们则主张一律集中整训。毛泽东同志对这一点尤其强调。初看起来，这好象是违背民意，所以对这一点就不能不多加解释。国民党军队二百多万人，一听到裁兵，就会发生动摇，各作打算，于是不免要造成骚乱，到处危害人民。我们要采取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所以我们提出在第一阶段中，按照原人数、原编制、原番号集中整训，并且一律与解放军同等待遇（每人每日四斤半小米）。毛泽东同志还说：“你报多少就算多少。”多支付几个月的空额饷不算什么。我们不会象从前国民党对待八路军那样，对他们有所歧视。这样，应该说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中国人民没有什么对不起他们之处了。如果还要闹，就严正制止。经过集中整训，士兵有了觉悟，军官得到学习，就可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但我们不能急躁，集中后要分别对待，等待觉悟。觉悟有快有慢，相信他们大部分都会转变过来的。当然，也会有捣乱的。

有了政权的接收和军队的改编，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这就是国内和平协定中的四、八两条。

关于第一条，惩办战争罪犯，南京代表团争得厉害。我们尊重他们的意见未将战犯名单列上去，“元凶”、“首恶”等

字眼也都勾去，而且说，“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如能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准予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有人问，对蒋介石怎么办？如果他能做到这一条，那么也照这样办。

关于二、三两条，废除伪宪法、伪法统，没有多大争论。但这自然是大大不容易的。

关于五、六两条，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我们对没收官僚资本作了解释，即没收南京国民党统治时期取得的官僚资本，凡是不大的企业且与国计民生无受害者，就不没收了。若有私人股份，经查明并非官僚资本转移的，一律承认。不如此，就会牵涉太广，影响生产的进行。

关于第七条，废除卖国条约。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是很谨慎的。对外条约有的要废除，有的则要加以修改，有的还可以保持。

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向受着外国侵略者的压迫。多少先烈为了民族的解放流血牺牲，但这种压迫一直未能除去。今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扬眉吐气了！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斗的结果。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失败了，美国帝国主义也正在失败。美帝国主义固然还是强大的，但他是外强中干的。我们与美帝也交过手，文仗武仗都打过。文仗和马歇尔⁽³⁶²⁾打了一年，最后他还是失败而去。帝国主义就是纸老虎，你硬一点，他就软些，你软一点，他就骑到你的头上。在原则性的问题上我们

是不让的，决不让。对于美帝国主义，我们一定要采取严肃的态度，使他了解中国是不可欺侮的。任何国家都不能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就是为此而奋斗了一百多年！我们要自力更生，然后才能争取外援。外援如有利于中国，当然要，但不能依赖。即使对于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我们也不能有依赖之心。如果只依赖外援，那还能办什么事？蒋介石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一切依赖外援，这是“前车之鉴”。我们愿意和一切以平等待我之国家合作。我们不排除，不挑衅，但必须站稳立场，否则就只能倒在外国人的怀里。中国共产党就是带着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伟大气概开始的。虽然当时只有五十多个人，其中李大钊同志⁽¹³²⁾英勇壮烈，血洒北平。但任何新生事物在开始时都不过是一枝幼苗，一切新生事物之可贵，就因为在这新生的幼苗中，有无限的活力在成长，成长为巨人，成长为力量。这是自然的规律。一切腐朽的东西，尽管是一大堆，但必然一天一天死亡，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站稳了立场，又要很谨慎，有理有利有节地去处理问题。这和五四时代的反封建有相同之处，那时反对封建很坚决，提出打倒孔夫子、对封建家庭斗争的口号。但今天看来，孔夫子的话若是好的，我们也可引用。我们的父母来了，也还得照顾照顾。对封建要划清界限，站稳立场，同时采取分析态度，对帝国主义也要如此。

在军事上，美国军队驻在中国无论如何总是缺理的。我们叫他们退出去，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呼声。他们国家的事我们管不了，但在中国的领土上，美军若不退出，我们就有权消灭他们。美国若是大规模出兵，我们也不怕。中国是吓不

倒的。中国是古老的民族，也是勇敢的民族。中华民族有两大优点：勇敢，勤劳。这样的民族多么可爱，我们爱我们的民族（当然其他民族也有他们可爱之处，我们决不忽视这一点），这是我们自信心的泉源。美军若真敢侵略到中国来，占领我们的大城市，我们就用乡村包围城市，叫他们什么军需品（包括大便纸和冰淇淋）都必须从美国运来，还要背上大城市这样的包袱，负责供养。美国人生活程度高，他们是不愿打仗的。俄国十月革命后，美国也闹过出兵干涉，结果还不是“自动撤退”⁽⁴⁴⁴⁾？就因为吃不了苦。我们打败了日本侵略军，难道还怕美国兵？

在政治上，我们的立场仍然是民族独立，平等相待。美国国会在吵嚷承认不承认中国。其实，这有什么了不起！即使你承认我，我承认不承认你还尚待考虑。不过我们不挑衅。我们虽未与他们建立外交关系，但对侨民还是保护的。美国驻天津总领事以总领事的资格递来一封信，我们就退回去，说没有外交关系，恕不来往。后来他用铁路职员的名义写信来，我们就让他登记。其实，美国也不是不要和中国往来，司徒雷登⁽³⁸²⁾一直到处找我们拉关系。傅泾波⁽⁴⁴⁵⁾在香港老是给我和邓颖超及其他的人写信。美国人是两面做法，想用各种办法来试探，要看看中共动向如何。中共的动向是容易明白的，只要听一次报告或看几个文告就知道了。至于将来和平实现后的情形，我们会实事求是地处理，反正各国大使馆在那里，我们既不断绝，也不急于建立外交关系。如果急于要求承认，就会陷于被动。帝国主义若要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就要按平等原则进行谈判。我们在政治上不排除，在军事上不挑衅，

有理有利有节，我们又何惧之有呢？

在经济上，有买卖就做，国际贸易要开展，这是于双方都有利的。帝国主义的特权，我们不承认，但此中问题很复杂，不能遽然解决。

在文化上，帝国主义有许多侵略机构，如学校、医院及教堂等，这些都应该由中国人来办，但不能急躁，要谨慎地一步步地来。这些文化机构有坏的一面，但还有好的一面，例如协和医院，我们的人生了病还去那里就医。对于这些机构，我们可以从内部来改造，使它们变成民族的。

关于第八条，再补充一点。在联合政府成立之前，我们允许南京政府还存在一个时期。起先我们想用革命军事委员会来指挥它，南京代表团觉得不好，我们取消了这个主张，而使二者并列。若南京政府签订了和平协定，并且履行了，则我们保证负责向政协筹备会提出让他们参加新政协。当然，通得过与否，那是另一问题。

这八条二十四款，南京代表团表示可以接受。我们限定南京国民党政府在二十日以前答复，如不接受，则二十日我们一定打过江去。再不过江，连南京代表团都说，江南人民实在受不住了。所以不能再延了，再延就太对不起那里的人了。当然，打过江后，如果他们又愿意签字也可以。总之，门是开着的。南京代表团以为我们老是要和平，一定有弱点。第一，他们见我们快要当家了，以为我们很怕破坏，老鼠蹲在花瓶上，投鼠要忌器。第二，面对滔滔长江，他们以为我们一定很怕牺牲。所以，他们老是讲价钱。其实，他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和平也不免有破坏，战争也不见得就把一

一切都打碎，总有打不碎的，或者我们去得快些，他们来不及破坏。我们不过是争取愈少破坏愈好罢了。所以，这是吓不了人的。我们明白告诉他们：战，他们就要完蛋，和，他们还可以有出路，当然不是什么南北朝，而是改造。

各位朋友，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是四个阶级合作的。即使是地主，在劳动几年之后，也可以变为农民。过去因为环境不同，我们不在一起，今天既然到了统一的环境，就可以大家一起来干。非共产党人也照样能工作，甚至做得更好。共产党人不是天生的。我的先代是“绍兴师爷”⁽⁴⁴⁶⁾，什么“少有大志”，那是鬼话。

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一定要实现，不论用战斗或是用和平的方法。用和平方法比战斗还要忙，要大家帮助。希望在小组讨论或座谈会中提出意见。我们长期在农村，对城市已经很生疏了，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前进^{*}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前进的问题，对党来说，就是党与非党人士合作的问题；对青年团来说，就是团员与非团员合作的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广大人民中间，大家彼此怎样合作的问题。这是我们进行革命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今天，我们要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绝不是单靠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干部所能做到的。今天，青年团员才二十万，连党员一共也不过三百万，比起全国人口四万万七千五百万来，这个数目是很小的，还没有达到百分之一。我们要带动全国人民前进，如果不同广大党外团外的人士合作，如何能做好呢！毛泽东同志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过，不要骄傲和急躁，要谦虚谨慎；同时，要团结广大的非党人士，要同党外人士合作。这几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很难。党也好，团也好，过去都有这样一个不好的传统，就是一听说这个人 是党员，是青年团员，就放心了，什么问题也没有了；一听说是非党员非团员，马上就另眼相看。这样来划一个鸿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不管是在工人中农民中和

^{*} 这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四部分的节录。

学生中，党员和团员总是少数，少数人自己划个小圈子把自己圈起来，用中国的古话来说，就叫“画地为牢”。

有的同志以为党内的同志什么都好，其实并不如此。一个同志一旦入党，那只是他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不一定完全入党。就拿我来说，我也是团员出身，后来转为党员的。我虽然有二十七八年的党龄了，还不是犯过许多错误，每次谈起来，总觉得自己对革命有所欠缺，总觉得工作做得不很好，不能满意。党内每个人都有长处，我们应该互相学习。党外人士也有许多长处，我们也应该向人家学习。每个党员都要长期锻炼，经过千锤百炼才能成钢，不是一下子就能成功的。首先在生活上思想上作风上需要长期的考验。所以，我们入党入团以后，要很好地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样才能很好地前进。这是对党员团员起码的要求。党外团外的人，因为他们没有进党进团，当然有些事情不知道，比我们差一点，但并不是没有长处。比如在农村中，许多农民比我们勤劳勇敢，比我们有办法；在工厂中的广大工人，比我们能生产，比我们能创造；广大的劳动知识分子、学生，有的在许多方面比我们强。不过他们当中有些人觉悟得慢一点，或者一时还不愿意入党入团，我们要帮助他们，启发他们，把他们当作朋友看待，互相学习。不要因为他们不是党员团员就另眼看待，而一旦入党入团就什么都放心了，这种态度是幼稚的，这个毛病是青年人容易犯的。

我们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要在观念上，把党外凡是能够争取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士，当成党内干部一样来看待。我们先划一个最大的圈子，把亿万人民群众团结在

一起,共同对付最反动的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集团,孤立他们,反对他们,打倒他们。人民内部,当然还有不同的阶级和阶层,最跟我们接近的是工人、农民、学生和劳动知识分子,其次是小资产阶级,再次是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及其他爱国分子,我们要分别对待,争取他们,教育他们。共产党青年团要有这样的气概。我们今天是新中国的主人,不能讲起来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政权,人民民主的国家,可是做起来却是一小圈圈人,不象个领导者,反倒象个孤立主义者,做的跟说的不一样。青年人一定要非常谦虚,不要骄傲,应该觉得自己差得很,事情还做得很少;同时,我们还要团结所有能够争取的人。这就是说,对自己应该自勉自励,应该严一点,对人家应该宽一点,“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当然,这个宽不是没有原则的。我们首先是区别革命和反革命,对反革命不能存在任何幻想。我们这个大圈子,就是要把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中最反动的几万、几十万、百把万、几百万划出去。同时还要看到,这里边有许多人还可以改造,比如地富分子,一旦土地改革以后,经过三五年的教育、改造,他们是可以慢慢地改变的。当然,不是一下子能够做到,但是前途还是有希望的。我们要有步骤地去做,使他们参加生产,逐渐地改造成为新人,不是囫囵吞枣,一下子都混进来。但是,我们在精神上要有这样的气概,把他们都改造过来,领导起来。

最近我们同国民党代表团⁽⁴⁴⁰⁾谈判。有的同志说,国民党代表团就那么几个人,费这样大的功夫,多麻烦!虽然是几个人,但是他们后边有一群。在他们影响下的军队、政府、党部里边的人以及公教人员,总有几百万,加上这些人家庭里

的妻子儿女，就是千把万。对于这些人，他们讲的话比我们讲的影响更大一点。他们有代表性。争取几个头子就影响后边一批，有利于我们渡江，就是渡江以后也会发生作用。所以，对于反动营垒中可能分化出来的人物，要争取他们，教育他们，帮助他们。

这样一想，我们就看得广了，不会把自己划在一个小圈子里边了。用这样的精神去做事情，才能团结更多的人和我们一道走，同时反过来，我们还跟他们学习。我们要知道，有不同的意见的人跟我们来讨论、争论，真理才能愈辩愈明。辩证法就它的希腊字源来说，意思就是进行论战，联共党史上不是也讲了这一件事情吗⁽⁴⁴⁷⁾？在历史上，许多哲学家、政治家也喜欢争辩。圣人都喜欢辩论，何况咱们后生小子乎！为了寻求真理，就要有争辩，就不能独断。什么叫独断？就是我说的话就对，人家说的话就不对，那还辩什么呢？你的意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谁还跟你辩？即使自己有很多对的意见，但是还要听人家的意见，把人家的好意见吸取过来，思想才能更发展，辩证法就讲矛盾的统一，只有通过争辩，才能发现更多的真理。所以，青年人要学习，就要多听各方面的意见，然后加以集中。也有这样一种人，因为东听一句西听一句，把自己弄得惶惶无主，本来开始他还有主意，这样一听就失掉了主意。我们要听各方面的意见，但是还必须加以思考。一个人生着两个耳朵，能听话；生着两只眼睛，能看东西；生着两个鼻孔，能闻味。听话，能听正面的，也能听反面的；看颜色，能看白的，也能看黑的；闻味，能闻香的，也能闻臭的。所以，人体的机能也是合乎辩证规律的。我们必须听各方面的意见，辨别是非，从青年的

时候起，就培养这样的思考力。还有这样的同志，见了党内的人和团内的人不怕，可是怕见生人，就象小姑娘一样。怕什么呢！我们应该去团结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有了这样的精神，在社会上才能团结更多的人一道前进。只有经常接近广大的群众，才能增加自己的勇气。一个人坐在房子里孤陋寡闻，这样不行，应该在千军万马中敢于与人家来往，说服教育人家，向人家学习，团结最广大的人们一道斗争，这样才算有勇气，这种人叫做有大勇。我们青年很需要养成这种作风。

学习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

中国人民的大革命已经走向全国胜利，我们青年要加紧参加建设新中国的事业。我们必须有一个大家共同承认的领袖，这样的领袖能够带着我们前进。三十年革命运动的实践使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领袖，就是毛泽东。我们这次全国青年代表大会⁽⁴⁴⁸⁾的口号也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我们决心举着这面旗帜前进。在今天这个会上，我想把毛泽东同志如何值得我们尊敬和我们如何向他学习的主要的几点给大家说一说。

学习毛泽东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是有极其丰富的内容的。我们青年代表回去，要向全国广大青年——农村、工厂、城市、解放区、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宣传我们代表大会的主张，动员和争取千千万万的青年群众跟着我们一道前进。在这一点上，毛泽东的旗帜就是我们最好的号召。我们号召全国青年跟着这个旗帜走，就必须认识这个旗帜是怎样发展到今天的。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

* 这是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三部分的节录，一九七八年十月八日曾在《人民日报》发表，收入本书时根据原记录重新进行了整理。

物。在座的朋友们向全国青年宣传的时候，或者是自己学习的时候，决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如果这样，我们承认我们的领袖就成了空谈。既然是谁也不能学习，那么毛泽东不就被大家孤立起来了吗？我们不就把毛泽东当成一个孤立的神了吗？那是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所宣传的领袖。我们的领袖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是从中国近百年来和“五四”以来的革命运动、多少年革命历史的经验教训中产生的人民领袖。因此，学习毛泽东必须全面地学习，从他的历史发展来学习，不要只看今天的成就伟大而不看历史的发展。

毛主席常说，他是从农村中生长出来的孩子，开始也是迷信的，甚至某些思想是落后的。他最不同意晋察冀一个课本描写他在十岁的时候就反对迷信，说他从小就不信神。他说恰恰相反，他在小时候也是相信神的，而且信得很厉害。当他妈妈生病的时候，他去求神拜佛。你看这样还不够迷信吗？那个课本写毛主席的故事，把事情反过来，说他从小就不迷信，打破迷信，生而知之。毛主席说，这是不合事实的。而且一般地说，在那样的封建社会里，不管农民家庭出身的也好，工人家庭出身的也好，一下打破迷信是不可能的。毛主席生长在十九世纪末的农村里，不可能没有一点迷信。为什么要说明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在广大青年队伍中，不要因为有的人还迷信就认为他不可教育，就排斥他。昨天迷信的孩子可以变成今天的毛主席（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孩子都可以成毛主席）。迷信是可以打破的。早两年你还不是迷信！你

年轻时还不是有丑鼻涕！不要进步了对小孩时的丑事就不愿正视了。

毛主席常说，他也是读古书的人。读古书看你会读不会读。毛主席开始很喜欢读古书，现在做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五四”那天我看到范文澜同志⁽⁴⁴⁹⁾写的一篇文章，说五四运动前后他就专门研究汉学⁽⁴⁵⁰⁾，学习旧的东西。但是当他一旦脑子通了，对编写中国历史就有帮助，就可以运用自如。所以在我们青年中，也不要因为有一部分人喜欢读旧书、研究旧东西就认为他们不可以进步，不要因为他有旧观念就不去团结他教育他，不要因为他落后一点就不理他。只要他愿意进步，就有改造的可能。毛主席说，他自己就是这样改造过来的。

毛主席还常说，他开始研究东西也是先搞一个方面，没有通就钻进去，先把这方面搞清楚。“五四”以后，毛主席参加了革命运动，就先在城市专心致志地搞工人运动。那时陶行知先生提倡乡村运动。恽代英同志⁽²⁷⁹⁾给毛主席写信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²⁸⁰⁾到乡村里搞一搞。毛主席说，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能再去搞乡村呢？这就说明毛主席当时没有顾到另一方面。但后来毛主席很快就转到乡村，又把农民运动搞通了，使城市和乡村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以后又搞军事，都搞通了，并且全面了。这也就告诉我们，有些青年人研究问题还没有进到全面，喜欢专心致志地搞一面，我们不要去打消他的兴趣；即使他不愿参加政治活动，我们也不要排斥他，可以慢慢地教育。

我讲这三个例子是说明：毛主席也是封建社会农民家庭出身的一个孩子，也曾经迷信过，也曾经读过古书，也曾经研究问题开始只注重一个方面。他之所以伟大，在于他能够从迷信中觉悟出来，否定旧的东西；他之所以伟大，更在于他敢于承认旧的过去。我们看到在旧社会里有这样的人，乃至在人民统治的社会里也有这样的人，一旦有了进步，就觉得自己过去什么都了不起，是“天生的圣人”，把自己说得简直什么错误都没有，什么缺点都没有。人家这样说他，他也喜欢听。那就危险之至。所以对那些有迷信的青年，落后的青年，只认识片面不认识全面的青年，我们不要抛弃他们，要去教育他们。我们青年要互相学习，要让这些人跟着我们学习，同时我们也跟着他们学习。毛主席是从几千年的历史经验教训、近百年的革命运动、近三十年来的直接奋斗中生长出来的人民领袖。我们大家要从这方面来看毛主席的历史发展。这样，同志们中有了骄气就可以压下去了。毛主席都是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那一个人没有错误没有缺点？还值得骄傲？比毛主席差得远！

我们要学习毛泽东，还因为他是最能坚持原则又最能灵活运用领袖。中国的革命自从他参加领导以后，方向就一天天地端正起来。毛主席在中国革命的四个阶段都是正确的，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正确方向的。开始的时候，党中央也好，一部分革命群众也好，常常自己弄错方向，迷失方向，但是毛主席的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大革命时期毛主席的主张是对的，但是没有被当时的领导上接受。十年内战时期他是对的，当时也有一些同志搞错了，没有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抗战时

期，全党承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抗战成功了。到这次解放战争，更加证明其正确。所以毛主席的方向就是中国人民正确的方向。他不断地指出真理，坚持真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毛主席把世界革命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到中国，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成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是这样指出真理的人，坚持真理的人，发挥真理的人。在中国革命三十年中的许多历史关键时刻，他的方向都是正确的。

毛主席坚持原则之中有两点值得我们学习：一、坚持方向；二、实现方向。方向的实现，只有一个人懂或者少数人赞成是不成的，要在群众中实现。要实现原则，就要使它具体化，使它能得到多数人的同意，多数人都来执行。坚持真理是会遇到困难的。毛主席不仅指出了原则，而且还制定具体的政策、策略来实现这个原则，每个历史时期的政策都是适合这个时期的。这一点，青年们在研究《毛泽东选集》时就可以看到。大革命时期，必须使农民运动深入发展到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说明了这个真理，拥护农民提出的办法，并加以发挥，不但有理论，而且有实践的办法。不过当时共产党的领导机关没有接受，大革命失败了。内战时期，毛主席提倡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你们去研究毛主席在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决议案，今天人民解放军中所实施的政治工作就是从那时一直发展下来的。但是毛主席的主张经过多年才逐步实现，中间遇到许许多多的挫折。当时大家虽然在形式上接受了，但是要经过很长的时间，真正到实际中具体化了，大家才能懂

得它的威力。抗战中要团结蒋介石的政府来抗日，明知道他动摇、消极，但是必须推动他抗日，才能动员全民族的力量。既要团结他，又要防备他，同他的反动的一面作斗争，所谓“有团结有斗争”。用这样的策略来进行抗战，使人民自己的力量壮大，这就需要说服很多人同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就有一些人说，既然要团结就不要批评。党内也有人有这样的意见。所以要使这个原则真正实施，就要经过许多曲折的斗争。解放战争比较顺利，但也还有小的挫折和错误，譬如土地改革中，也曾发生过“左”的错误，一直等到毛主席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报告⁽⁴⁵¹⁾出来了才得到全面的纠正。这都说明，一个原则、真理、政策在实际中实施，是要费很大的力量，做许多的具体工作的。毛主席不但能够坚持真理，指示方向，而且还拟定了许多具体政策、策略来贯彻这个真理、原则。不如此就无法使革命达到胜利。所以毛主席不是空谈真理，而是使真理和实践相结合，使它具体化。这样才能有今天的胜利。我们青年人学习毛泽东，不仅要懂得毛主席指示的方向、原则、真理，还要研究他的具体的政策、策略，才能使我们的工作深入实际。我们青年人不是要空谈，而是要实行。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的革命领袖列宁也说过，“少说些漂亮话，多做些日常平凡的事情”⁽⁴⁵²⁾。这对于我们青年正是一个宝贵的教训。毛泽东思想的特点，就是把普遍真理具体化，运用到中国的土壤上。我们青年要在这上边来学习。

毛主席使普遍的真理具体化，实现在中国土壤上的时候，并不是说，定出办法来就算了，不管大家懂不懂，接受不接受，说做就由几个人孤立地去做。不是这样的。毛主席总是再三

再四地舌敝唇焦地讲，反复地讲，使这个真理为大家接受，变成了力量。所以要想把领导者的觉悟、领导者的智慧变成群众的力量，需要经过教育的过程，说服的过程，有时需要经过等待的过程，等待群众的觉悟。毛主席当着他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接受时，他就等待，有机会他就又讲，又教育，又说服。毛主席在党内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形，他的意见不为大家所接受，如我刚才说的，在十年内战的时候就是如此。我们主张打大城市，毛主席认为我们的力量小，不应该打大城市，应该集中力量建设根据地。但是毛主席的意见大多数不赞成，大家要打，他也只好跟着打。结果打败了，毛主席赶快在会议上提出：打败了证明这个办法不行，换一换吧！大家还不接受，他只好再等待，又跟着大家走。象刚才说的万里长征，就因为在江西打败了，硬拚消耗，拚到最后挡不住了，不得不退出江西。在长征路上，毛主席又提出了他的正确意见，在遵义会议上纠正了错误路线，带着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冲出了危险的局面，到达了陕北。最后证明毛主席的主张是对的，多数是错的。这都说明，正确的意见不为大家所接受的时候，怎么办？就要等待，就要说服。大多数人通过的决定，组织上还要服从。当着群众被蒙蔽的时候，不容易接受真理，等他们慢慢地觉悟起来以后，就会拥护正确的意见。所以正确的意见常常是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为大家所接受。当然这个等待过程是痛苦的。假使那时党的领导机关很早就接受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革命就不会受那么大的损失，我们的力量就会更加壮大。但是我们这个落后的中国社会，反映到党内，反映到革命团体里，正确的意见常常不容易被大家立刻认识。这样就要等待、说

服,就要经过痛苦的过程。不过,这种情形在今后的工作中遇见的会少了。因为今天共产党的中央不象当年了,绝大多数同志都承认毛泽东这个领袖,都心悦诚服地信服这个领袖;在人民中也拥护这个领袖。但是,这也仅仅在大的方向上。譬如说,今天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要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在这样大的方向上大家都同意,而在具体的政策、工作上还是会有很多争论的。所以需要学习,学习毛主席这种坚持真理,指示原则方向并将其具体化,成为人民的力量的过程。这不是急躁所能做好的,要有很大的坚持性忍耐性,不屈不挠地把革命推向前进,这样才能达到最后的胜利。我们不能认为把一个简单的口号提出来就算了,就够了;也不能行不通就失望,行得通就自满,不再前进。那就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毛主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具体化在中国土壤上,生长出来成为群众的力量,所以中国革命得到如此伟大的胜利。到今天,不仅中国共产党尊敬他,凡是得到革命胜利果实的人民,一定会逐渐心悦诚服地信服他。

毛主席在坚持真理、实现真理中还有一个经验,就是他所提出的原则总是照顾大多数,为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不错,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同时今天大家也都承认他是全国人民的领袖。从中国共产党的范围来说,他是代表无产阶级的。中国的无产阶级数量只有几百万,在全中国的人口中连百分之一还不到。代表这样一个阶级的共产党怎样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毛主席的根本着眼点就是把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用到中国,争取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来取得革命的胜利,而不是把自己缩小到最小的圈

子里来空谈革命。毛主席懂得，为把最反动的敌人消灭，就需要集合一切可能集合的力量，而不是只靠先锋队办事。无产阶级是先锋队，但不能仅靠先锋队。在大革命时，毛主席就看到农民是最广大的同盟军，不依靠农民，人民革命是不能胜利的。果然，不听他的话，革命就失败。后来我们到了农村，毛主席又看到革命不但要依靠农民，而且还要争取中小资产阶级，因为当时蒋介石反革命的恶迹更加暴露，只有买办官僚地主封建阶级才拥护他。但是在共产党内有一部分人又犯了“左”倾错误，眼光狭小得很，认为中小资产阶级都不可靠。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致使革命又受到一次挫折，走了一个两万五千里。以后，毛主席提出团结蒋介石上层分子抗战。有人就说，要团结就不要斗争。毛主席说，这些人是我们国内的敌人，为了打民族敌人，要团结他，但他并不是可靠的合作者、同盟者，还要提防他，如果不加提防，他反过头来就会咬你。当时毛主席就防止了右，防止了无条件妥协。这一次解放战争，在乡村搞土改，工作中又犯过“左”倾错误。因为要消灭地主，就不给地主土地，或者给地主坏地，使他们不能生活，或者定的封建富农、地主的数量过多。另外，在杀人问题上，本是除怙恶不悛、人人痛恨的要杀外，其他可以不杀，但是有时候在群众愤恨之下，没有加以区别，领导没有说服群众，以致杀人过多。这样就使我们阵线中的农民，首先是中农受到影响。这个错误，也是毛主席把它纠正了。从这四个革命阶段可以看出，毛主席统一战线的观点是要团结最广大的同盟军，各个击破敌人。在抗日时期，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被打走后，再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中国的反动统治。在乡村中，打倒

封建地主阶级——这是反动统治的根基。在国际上，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围绕着这些口号，把更广大的农民团结在一起，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团结在一起。所以毛主席对我们共产党的许多干部谈：你们每天写日记不要写别的，就只写一句“团结百分之九十”就行了。我想，在毛主席领导下，争取大多数，为着共同事业奋斗，消灭反动统治，这一政策的运用，是我们最大的成就。这一点我们青年要学习。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中国胜利实现，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做许多艰苦的具体工作，不屈不挠地前进，长期地奋斗，努力争取大多数的人民，争取大多数的青年群众跟着我们走，而不是靠着我们这个小队伍。

青年联合会最大的作用就是组织全国广大青年，推动与教育他们，共同学习，共同提高，共同前进。我们联合青年，不包括反动青年，不能让他们钻进来。但是，我们必须把愿意为新民主主义事业奋斗的青年完全包括在内。这些愿意为新民主主义服务的青年，思想虽然还不是一致的，但是今天他们愿意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之中有些人虽然还有迷信观念，落后观念，或单纯的技术观念和片面的观点存在着，我们也要把他们包括进来。因为我们可以教育改造他们。因此，我们提出一个学习的口号和目标，即“学习毛泽东”。这个口号和目标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不仅是进步的青年能接受，其他青年也能接受。当然，团结教育青年，并不是只给大家讲共产党的好主张，不讲共产党犯过的错误。在这个青年会议上，我们不但向同志们隐蔽共产党的错误，相反，有好多错误在今天都讲出来了。我今天讲的一些党内的

事情，你们过去是不晓得的，甚至党内有的同志也还不晓得，可是你们今天就晓得了。今天你们所代表的，不是几百万青年，而是几千万上万万青年。那就要请你们考虑，共产党不能冒昧地把他的主张压在成千成万的青年头上。这样的思想是国民党的统治的思想，人家不能接受硬叫人家接受，把帽子在人家头上一戴，象观音菩萨的紧箍咒一下子箍在孙悟空头上。学习毛泽东，我们不是用压迫的方法。这只是我们提出来的口号，这口号很响亮，能使广大青年接受。因为毛主席在今天不单单是中国青年的领袖，而且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我们的一面旗帜。

这里需要解释一个思想自由的问题。反动派常常说他们主张思想自由，蒋介石就是这样说的。大家知道这是鬼话，在蒋介石的统治下还有什么自由呢？人民普遍地受压迫受剥削，只有少数的地主官僚资本家反动分子有自由，他们可以自由地剥削、压迫、屠杀人民。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只有资产阶级的思想自由，广大工人农民没有思想自由。在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人民大众是有充分的思想自由的。只要不是反动思想，其他思想都可以存在。不仅是进步的社会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可以存在，就是相信宗教的思想也可以存在。除了反动的思想不允许宣传外，其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都是自由的。共产党认为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是最正确的，毛泽东思想是最正确的。这个当然要讲。但也不是不让这个思想以外的思想存在。我们以我们的思想教育大家，但是你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可以自由选择。这样才是一个教育的态度，领导的态度，才是一个共

同工作的态度，合作的态度。

我们提出的口号是“学习毛泽东”，但也不限于这个口号。在这个口号之下，我们青年还要分门别类地学习，比如新民主主义的建设，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知识，各种专门科学技术，都需要学习。学习，也正是毛主席的一个特点。他就是日夜不息地学习，他从来也没有感到满足过，他常常说这方面不会还要学习，那方面不会还要学习。我们要做他的学生，就要学习他这个精神。

我讲这样几点当然不是介绍毛主席的全部功绩和主要学说，我说的仅仅是毛泽东思想的很少的一部分。毛主席创建人民军队方面的成就，他在军事上的战略战术，在政治上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在经济上的一些文章，在文化上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哲学上的创造，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等等，多得很。毛主席的成就不仅广，而且专，而且精，在这里不多说了。毛主席的学习态度，他自己的口号是“实事求是”。他是最老实的，是则是，非则非。他是最反对骄傲反对急躁的。在三十年的革命运动中，他就是在反对骄傲反对急躁的斗争中成熟起来的。他的作风也是谦虚而又谨慎的。正如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所说，既有着革命的胆略，又有着求实的精神。所以我们要学习他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在态度、作风上，也就应该老实，不要沾染浮泛与骄傲急躁的习气。中国共产党在人民革命运动中有过这样的经验。我在过去也是急躁的。当然这不是青年一代很容易学成功的。我们要兢兢业业，力求少犯错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要重复错误。青年人没有

不栽几个筋斗的，没有不碰几个钉子的。碰了钉子后，不要气馁。我们在革命斗争中不知流过多少血，遭受过多少挫折，有多少人倒下去了。在最困难的时候，不要丧气，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从地下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继续前进。要有这样的志气，要有这样的勇气。我们今天即将夺取全国的胜利，光明在照耀着我们。但是我们不能因胜利而骄傲起来，觉得不可一世，而忘掉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毛主席说，夺取全国胜利才走完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还有很多很艰苦困难的工作等待我们去做。这里有两种教训值得注意：一种教训是看不起别人，脱离群众；一种教训就是蜕化了。这是我们青年的“敌人”。我们应该排除急躁、骄傲、气馁、灰心、丧气，学习毛泽东的学习作风和工作作风，老老实实，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稳步而又勇敢地前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带动上万万的青年前进，才能真正实现我们全国人民的民主解放和民族独立，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并且为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奋斗。我们的口号是：“全国青年团结起来，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

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 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一九四九年七月六日)

各位代表：让我首先向你们庆贺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⁴⁵³⁾的成功，庆贺从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来逐渐被迫分离在两个地区的文艺工作者在今天的大会师。从五四运动以后，我们的新文艺大军在跟敌人作战上，曾经取得很多的胜利。我们打败过封建文艺，二十年来我们又打败过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文艺和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汉奸文艺。在新民主主义的文艺方向下，我们建立了广泛的文艺战线。在解放区，许多文艺工作者进入了部队，进入了农村，最近又进入了工厂，深入到工农兵的群众中去为他们服务，在这方面我们已看到初步的成绩。在以前的国民党统治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坚持着自己的岗位，在敌人的压迫之下决不屈服，保持着从“五四”以来的革命的文艺传统。抗日战争期间在国民党统治区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协会⁽⁴⁵⁴⁾，也就是今天的大会发起团体之一，除了很少几个反动分子被淘汰以外，那个团体的文艺工作者几乎全部都团结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之下，并且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也几乎全部都来参加了这个大会。

对于文艺界大团结的胜利，我们不能不归功于在各方面

坚持岗位艰苦奋斗的朋友们，不能不归功于全国广大人民对于新文艺运动的支持，但是尤其不能不归功于人民解放军在军事战线上的伟大胜利。没有军事战线上的胜利，那么我们今天这样七百多人的大团结大会合，就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我的讲话的第一部分，我想向大家说说我们这三年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情况和根源，以及文艺工作所应当由此得到的教训。

一 三年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从一九四六年的七月算起，人民解放战争已经进行了整整三年。这三年的战绩，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三年以前，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国民党反动派动员了四百三十万军队来进攻。那时候我们只有一百二十万的人民解放军，与敌人相差三百一十万之多。反动分子和他们的美国主人在当时满以为一定可以打垮人民解放军。多少好心肠的朋友也曾经为我们担心。我们感谢这些朋友，但是我们坚定地告诉他们，战争的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我率领中共代表团离开当时国民党首都南京的时候，许多的新闻记者问我：“你们还回来不回来？”我说：“我们总有一天会回来的。”朋友们！我们今天果然回南京了，不过进入南京的不是我们当时的代表团，而是胜利的人民解放军！

战争的第一个年头，敌人是处于进攻阶段，但是因为受到了我们的重大打击，敌人的全面进攻很快就变成了局部的进攻或重点的进攻。第二个年头，我们开始反攻，华北和华

东的野战大军渡过黄河向南前进到长江北岸，同时东北的人民解放军也由北满向南满进攻。在战争的第三年，我们的进攻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经过一九四八年九月的济南战役⁽⁴³⁴⁾，一九四八年九月至十一月的辽沈战役⁽⁴³⁴⁾，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到今年一月初的淮海战役⁽⁴³⁴⁾，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到今年一月底的平津战役⁽⁴³⁴⁾，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就从此基本上被消灭了。因此，在今年四月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的时候，蒋介石已经不可能组织一条有实际意义的防线。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到现在的三年中，国民党的军事力量从开始的四百三十万人减到现在的一百四十九万人，这一百四十九万人当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属于机关、学校和后勤部门，战斗的部队大约只占半数。我们人民解放军却从一百二十万人增加到今天的四百万人以上。巧得很，他们少了二百八十万，我们多了二百八十万。在我们四百万以上的大军中，二百二十多万的野战部队正在前进，扫荡着已经只剩八十万并丧失了战斗力的敌人的残余部队。我们已经解放了两万万七千九百万人口，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五十九；解放了一千零六十一座城市，占全国城市百分之五十三；解放了两万一千六百多公里铁路，占全国铁路百分之八十。敌人除了在海军空军方面暂时还占有优势以外，一切方面的优势已经都属于人民了。这个情况，使我们相信人民解放战争的第四年，将是我们取得全国胜利的一年。

在这三年当中，我们的伤亡一共是一百四十三万人，而消灭的敌人是五百六十九万人，就是说我们伤亡一个人，消灭他们四个人。在敌人所损失的五百六十九万人当中，被我们俘虏的人数达到百分之七十，即四百一十五万，而俘虏中

又有二百八十万变成了解放军。三年中间，消灭了敌人正规编制的军队四百九十五个师，连非正规部队算在一起，消灭了敌人二千一百五十个团。俘虏的将级军官，加上上校级的师长，达到九百二十七人。三年中间缴获的武器，有各种炮四万四千多门，轻重机枪二十五万多挺，长短枪二百多万支，飞机一百三十四架，军舰一百二十三只，坦克车五百八十二辆，装甲车三百六十一辆，马十三万匹，步机枪子弹三万万七千多万发，炮弹三百一十一万发。我们就依靠这批由敌人手中解放过来的战士，依靠这批由敌人手中缴获过来的武器弹药，回过手来战胜了敌人。

人民解放军为什么能够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呢？当然，这首先是因为人民解放军所进行的战争乃是正义的爱国人民革命战争，因为他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利益，为全国人民的利益而战。但在这里，我们应当指出人民解放军本身的素质，这就是：人民解放军经历了二十二年的锻炼，已经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严格的纪律、坚强的战斗力、成熟的战略战术。尤其最近三年来，人民解放军又经过了一次改造。我为什么要用改造这两个字呢？因为他的绝大部分战士，不久以前还是俘虏兵，不经过改造就不能遵守解放军的纪律。最有效的改造武器，就是唤起他们的阶级觉悟，实行诉苦运动和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三查运动，评干部、评党员、评战功的三评运动，使他们感觉到大家的出身都是劳动人民，都曾经受过反动派的压迫剥削，人民解放军是劳动人民自己的军队，大家应该团结一致，为自己的利益，向曾经压迫他们、剥削他们的仇人作战。人民解放军是一个有严格纪律的军队，但是这个纪律是建筑在自

觉的基础之上的。人民解放军在部队内部实施了军事民主、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制度，在部队外部进行了瓦解敌军工作、拥政爱民工作和地方群众工作，这就使得人民解放军指挥员、战斗员得以密切地联系群众，使得他们的觉悟程度不断地提高，使得人民解放军获得无上的战斗力量。

文艺界的同志们和朋友们！你们要写作，就一定不要忘记表现这个伟大的时代的伟大的人民军队。我提议我们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政治部、共产党中央的宣传部以及所有解放军代表同志，你们应当利用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热烈招待没有看到过人民解放军的文艺家到部队里去参观，给他们调查和写作的便利。

人民解放军在作战中不是孤立的。在三年的人民战争的高潮中，两万万农民是最伟大的支持力量。一万万以上的农民进行了土地改革的斗争，分得了土地，另外一万万以上的农民正在准备着解决土地问题。在不久的将来，又会有两万万的农民将要进入到土地改革的浪潮中来。这在农业的中国是一件翻天覆地的事情。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伟大的中国农民贡献给战争的是些什么呢？他们把他们的子弟、丈夫送去参加人民解放战争，他们把生产节约的粮食供给我们的前方后方，他们当民兵，当民工，不但在后方维持秩序，并且大批地随着部队出发到前线去做种种协助战争的工作。只要那个地方的战事过去之后，那个地方就掀起了生产热潮。同志们！朋友们！我们依靠了伟大、勤劳、勇敢的中国农民，这才有今天的胜利。我们应当感谢伟大的中国农民，特别要感谢老解放区的农民。尽管农民有他们的落后的方面，要待我

们耐心地改造，然而他们的勇敢、勤劳、艰苦、朴素的本质，是值得我们歌颂的，值得我们记录和宣扬的。所以我们希望已经习惯于乡村生活的文艺工作者，继续深入乡村工作，为他们服务；同时也欢迎没有到过农村的、没有习惯于农村生活的文艺工作者，去学习农民，与农民做朋友，以便于写下他们的艰苦卓绝、英勇奋斗的业绩。

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还不能不归功于工人阶级的努力。尽管我们二十二年斗争的很大部分时间是在乡村，在农民和部队里面，但是我们的斗争是与工人阶级相联系着进行的。从政治上说，是在工人阶级通过他的先锋队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进行的。事实上就是在乡村中间，我们也不能离开工人。大规模的战争首先不能离开兵工生产。武器主要是敌人输送给我们的，但弹药还需要我们自己的补充。我们依靠工人。我们把大的锅炉从矿山从机器厂用几千人抬到太行山上，抬到五台山上，抬到沂蒙山区，在山上建设了工厂，几千万的手榴弹，几百万的迫击炮弹，几十万的山野炮弹，便这样生产出来了。到了去年下半年，我们的手榴弹、迫击炮弹、山野炮弹和炸药的生产数字，已经超过了国民党反动派。除了兵工，我们在乡村中还发展了各种小规模轻工业，供给军需民用。今天我们进入大城市以后，情况更不同了。我们必需依靠工人阶级，才能恢复和发展工业。工人阶级正在一天比一天成为中国建设事业的主要力量，也正在一天比一天成为我们的文艺创作的重要主题。

文艺工作者是精神劳动者，广义地说来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精神劳动者应该向体力劳动者学习。一般精神劳动的

特点之一是个人的劳动（当然歌咏队、剧社、电影厂等的许多活动是集体的），这就容易产生一种非集体主义的倾向。在这一个方面，文艺工作者应当特别努力向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的精神学习。

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依靠人民解放军，依靠农民、工人、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所形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但是从根本上说，造成这个胜利的最有决定性的因素，却是中国人民革命的组织者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却是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中国共产党从产生到长大，曾经经历过错误和失败，但是毛泽东同志却始终站在正确的方面。大家知道，中国革命的敌人不是一个简单的敌人，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一百年来的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集中表现为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我们应当感谢毛泽东同志，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正确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来，因而造成了伟大的力量，战胜了中国的强大敌人。我们号召大家学习毛泽东同志，把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我们同时号召一切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努力认识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已经与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形成了不可分离的联系，不认识中国共产党，也就不能够正确地认识和表现今天的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主要部分。刘少奇同志常常说，我们每一级的党委应该交几个文艺界的朋友，以便于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我们希望大家在这个目标上共同努力。

最后，我们必须指出世界人民力量对于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影响和援助。不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得到了以

苏联为首的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伟大的援助，而且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间，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也给了中国人民以伟大援助。帝国主义阵营把主要的力量放在西方，把次要的力量放在东方，这对于中国革命就是一个首先重要的有利条件。苏联的存在，人民民主国家的存在，亚洲和其他地方被压迫民族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存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反对新战争运动的存在，这一切力量的总和大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力量的总和，因而阻止了新世界战争的爆发，阻止了美帝国主义进一步武装干涉中国。

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任务之一，就是向全国人民传播这个真理。我们要分清敌我，暴露帝国主义的罪恶，打击战争贩子的叫嚣，揭穿他们的恐吓、挑拨和欺骗。这个庄严的工作，是中国民族利益所要求的，也是世界人民利益所要求的，这正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结合。

二 文艺方面的几个问题

我在讲话的第二部分，想讲几个关于文艺方面的问题。

第一，团结问题。我们现在开的是文艺界的团结大会。应当说，出席这个大会的七百五十三位代表是有很大的代表性的。现在在人民解放军四大野战军加上直属兵团，加上五大军区⁽⁴⁵⁵⁾，参加文艺工作的，包括宣传队、歌咏队在内，有两万五千人到三万人的数目。解放区的地方文艺工作者的数目，估计也有两万以上。两项合计有六万人左右。这就是解放区

的四百多代表所代表的文艺工作者。前国民党统治区的新文艺工作者的数目比较难算，大概总有一万人以上。这就是说，你们七百五十三位代表，代表着七万上下的新文艺部队，平均每一个人代表着一百个人。此外还有大量的旧艺人。希望代表们回去以后，能领导各方面的文艺工作者发扬这次大会的团结精神，并且希望大家经常地密切地联系这支广大的文艺军队，使你们真正不愧为他们的代表。

第二，为人民服务的问题。这个口号大家都赞成，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实现。我们应该首先研究一下我们熟悉什么，不熟悉什么。部队文艺工作者熟悉部队，部分地熟悉农村，但对工人和城市的情形就不熟悉。解放区地方文艺工作者熟悉农民，不完全熟悉部队，对城市情况也不熟悉。我们从新区来的朋友，过去限于环境，不可能深入广大的群众，但今天的情况变了，有了深入群众的机会了。总之，应该首先去熟悉工农兵，因为工农兵是人民的主体，而工农兵又是今天在场的绝大多数所不熟悉或不完全熟悉的，至于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思想、感情，则是你们的绝大多数所已经熟悉的。

我们首先需要熟悉工人。现在各方面的文艺工作者一般地都不熟悉工人，所以反映工人的作品还很少。我们希望能有一批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厂。自己不能到工厂去的，也应该宣传这个号召，把它变成一个运动，推动成千成万的文艺工作者向这方向走去。

这几年有一部分同志已经开始熟悉了农民和兵士，兵士基本上是拿枪的农民。应该继续熟悉他们，并帮助不熟悉的人去熟悉。熟悉工农兵的生活，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他们打

成一片，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希望已经下过农村的文艺工作者不要自满。农民是中国人口中的最大多数。中国的历史长期以来基本上是一部农民战争史，而近二十几年来乃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史，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有熟悉农民、了解战争的任务。

我们主张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然不是说文艺作品只能写工农兵。比方写工人在解放以前的情况，就要写到官僚资本家的压迫；写现在的生产，就要写到劳资两利；写封建农村的农民，就要写到地主的残暴；写人民解放战争，就要写到国民党军队里的那些无谓牺牲的士兵和那些反动军官。所以我不是说我们要熟悉社会上别的阶级，不要写别的阶级的人物，但是主要的力量应该放在那里必须弄清楚，不然就不可能反映出这个伟大的时代，不可能反映出创造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劳动人民。

第三，普及与提高的问题。现在是不是普及第一呢？还是普及第一。解放区做了一些普及工作，但是离开普及的需要还很远。至于说现在产生的普及性的文艺作品还很粗糙，需要改进，需要提高，这是事实，但是这并不是值得担心的事情。如因此而轻视普及工作，更是完全错误的。任何一个新生的东西那有不粗糙不幼稚的？我们对于新生的东西不要责备过甚，对它要爱护帮助，象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孩子需要批评教育，但是不能打骂，否则就把孩子打坏了，骂傻了。新生的事物常常大喊大叫，它要改造这个旧世界，这是一种革命气概。脱离人民的旧文艺已经是腐朽了，尽管外表如何好看，内部已经烂了，希望是属于新的方面。我们的普及性

的文艺作品虽然还不高，但它们确是为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所以我们必须重视新文艺在普及方面的生长和成就，即使是一些小的生长，小的成就。

第四，改造旧文艺的问题。我感到我们对于旧文艺的改造的重视是不够的。凡是在群众中有基础的旧文艺，都应当重视它的改造。这种改造，首先和主要的是内容的改造，但是伴随这种内容的改造而来的，对于旧形式也必须有适当的与逐步的改造，然后才能达到内容和形式的和谐与统一。使我们高兴的，就是旧文艺界许多有成就的朋友，愿意参加这个改造的工作，而且希望同新文艺界的干部团结在一起来进行这个工作。我们应当用很大的热情来欢迎他们。旧社会爱好旧内容旧形式的艺术，但是又瞧不起旧艺人，总是侮辱他们。现在是新社会新时代了，我们应当尊重一切受群众爱好的旧艺人。尊重他们方能改造他们。我们过去做了一些改造工作，但是成绩还很小。今后一定和全国一切愿意改造的旧艺人团结在一起，组织他们，领导他们，普遍地进行大规模的旧文艺改革。如果不团结广大的旧艺人，排斥他们，企图一下子代替他们，是不可能的。应该使包含几十万艺人并影响几千万观众、听众、读者的旧文艺部队的巨大力量，动员起来积极地参加这个改革运动。实在说，现在这个工作刚才开始。有些人觉得旧文艺没有什么前途，以为它总是要消灭的，因此就发生不重视它，让它自生自灭的心理。但是，今天的事实是广大的人民还在看它，听它，喜欢它，难道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应当对这样的事实视为等闲吗？旧文艺会不会消灭呢？我说这个问题应该这样回答：它是会消灭的，

它又是有前途的。旧文艺里的一切坏的部分、一切不适合于人民利益人民要求的部分一定会消灭，比如宣传封建思想和其他反革命思想的东西，就应该加以消灭；另外有一些合理的、可以发展的东西就会慢慢地提高、进步，逐渐变为新文艺的组成部分，这一部分就是有前途的，而不是被消灭的了。我们要这样看，问题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我们如果认为旧文艺什么都好，什么都保存，那样就会走到复古的路上去了；另外我们如果认为什么都不好，什么都否定，或置之不管，那样就是对于民族传统和群众感情采取错误的态度，就是违背了我们的普及第一的主张，同时也不合于我们的历史观点。改造旧文艺也跟创造新的普及文艺一样，开始也会是粗糙的。但我们不能因为粗糙就轻视它，因为你一轻视它，它就很难生长，很难壮大。这种改造工作无疑地将是长期的巨大的工作，希望一下子改造得尽善尽美，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也不能因为这是长期的巨大的工作，而不去紧张地努力。

第五，文艺界要有全局观念的问题。我们文艺界的朋友来自各方，譬如解放区的，就有一部分是从部队来的，他们是长期地在部队工作，另一部分是从解放区各地方组织来的，他们过去限于环境，工作也带局部性，现在聚会一堂，来商讨今后全国的文艺工作，那就不能不要求我们大家有全局观念。我们不只是看到我们那一个工作部门，或者只看见我们个人的工作环境，我们要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解放事业，看到我们今天全国的文艺工作，我们的工作才能安排妥当。今天全国接近于完全解放，我们的后方最重要的任务是发展生产。我们文艺工作者要了解，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初期

是一个艰难缔造的过程，尽可能要求我们的每一个部门、每一个人、每一项工作都能很快发展，同时又要求有计划地适合全局的需要与可能，各部门中的分工安排就需要我们根据轻重缓急来定了。

我们这个文艺界的团结大会，开得确实不坏。但是如果以为它一切都美满，或者以为今后的工作一切都会美满，那么一接触实际，便会有很多地方、很多工作感到不满和失望。假若我们各部门的文艺工作者都有全局的想法，能够和今天的建设联系起来，和我们的政治运动密切结合起来，我们的工作发展就会更快。比如我们的部队还要继续前进到南方、西北、西南，广大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就要向新区前进，去推广文艺的普及工作，和部队配合前进，解放尚未解放的两万万的人口，这是我们部队文艺工作的最重要的方向。因此尽管部队文艺工作者要求提高，也有可能一部分回来受训练，但是，这只是极少数，甚至开始还不可能，在这样的时候，个人要求就要服从全体的利益。解放区地方的文艺工作者也是一样，也可能从老解放区调到新区去工作，去组织那个地区的文艺部队，推广那个地区的文艺工作。这也是文艺与政治的一种结合。

今天要把事情的困难估计多一些，在什么困难条件下都能工作，那样，将来好一点当然更好了。我这样说，就是为了大家精神上有准备。

最后一个问题，是组织问题。因为这次文代会代表大家都感到要成立组织，也的确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我们要成立一个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的联合会，而且我们要象总工会的样子，下面要有各种“产业工会”，要分部门成立文学、

戏剧、电影、音乐、美术、舞蹈等协会。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便于进行工作，便于训练人材，便于推广，便于改造。这一点是大家所赞同的，现在就需要开始，因为我们不可能常开这样的大会。希望在会中或会后，就把各部门的组织成立。这是群众团体方面。

同时，新政治协商会议⁽⁴²³⁾将要产生全国性的民主联合政府，而在这个政府机构之中，也要有文艺部门的组织。这个文艺部门的组织，那就要依靠我们上面说的那些群众团体来支持，因为这个部门是为我们广大人民及群众团体服务的，也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服务。我们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民主集中制的、由下而上同时又是由上而下的人民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所以我们文艺界也要关心这一方面的工作，也要推出代表来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我们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机构里面的文艺部门，也需要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来积极参加工作。

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过去在部队里，有的一个野战军多到八千多人，有的很少。当然这是由于环境的限制，各自发展的结果。地方上也是这样，有的一个县有一个文工团，有的没有。这种不平衡的发展，今后一个时期还会继续，但是城市和乡村，部队和地方，慢慢地调整是需要的。尤其是新区，我们要派出大批的人员去。过去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朋友，各自为战，互不联系，在反动派的统治下有空隙就要钻进去，控制它一块，被压迫就藏起来。现在不同了，现在是人民的国家，要自己来安排。所以文艺工作在政府方面也好，在群众团体方面也好，我们都要来有计划地安排。这就

靠你们将要推选出来的领导机构来安排这些事情。

这是在文艺方面我想说的几件事情，提供诸位研究参考。

同志们！朋友们！这次文艺界代表大会的团结是这样一种情形的团结：是从老解放区来的与从新解放区来的两部分文艺军队的会师，也是新文艺部队的代表与赞成改造的旧文艺的代表的会师，又是在农村中的，在城市中的，在部队中的这三部分文艺军队的会师。这些情形都说明了这次团结的局面的宽广，也说明了这次团结是在新民主主义旗帜之下，在毛泽东同志新文艺方向之下的胜利的大团结，大会师。

在全国接近于最后胜利这样的局面下，我们七百多位代表能够有这样的大团结、大会师，我们应该感谢毛泽东同志，他把中国革命领导到今天这样伟大的胜利；我们应该感谢毛泽东同志，他给予了我们文艺的新方向，使文艺也能获得伟大的胜利。

恢复生产，建设中国^{*}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同志们：我们全国工会工作会议开幕了。刚才朱总司令讲了工会工作的许多问题，大家在会议中还要讨论许多具体问题，我在这方面就不多说了。我把目前的政治形势和工作重心讲一讲。

现在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基本胜利，但是还没有完全胜利；我们已经开始建设，但是还没有结束战争。革命还在向着彻底胜利前进。我们现在正是处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过渡的发展的形势当中！我们要把战争进行到底，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要打到台湾去，打到海南岛去，打到昆明去，打到新疆去。我们要赶走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同帝国主义封锁作斗争，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变为自力更生的独立的中国经济。我们的一切工作，首先要为着把战争、把革命进行到底。工会工作也必须把这个问题放在主要地位。

在目前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工会动员全体工人阶级的口号是：恢复生产，建设新中国。现在我们接收的生产机构这么大，这么多，要把生产恢复起来，要把经济调整好，是个

* 这是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艰巨的工作。原封不动地接收是比较容易的,天津、北平、南京、上海、武汉,一个城市比一个城市接收得好。进一步来管理就难得多。而且还要改革旧制度。中国的半殖民地经济结构,是服从于帝国主义的意志的,现在要把它改变过来。我们要有信心地稳步地重新组织中国经济结构。当前的问题,首先是城市与乡村的经济不协调,加上帝国主义对我们进行封锁。过去,城市工厂主要是依靠帝国主义的原料和运输来生产的,象上海的纱厂,主要是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棉花纺成纱织成布,用外国的运输工具运到外国市场去推销,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今天不同了,条件完全变了,也应该变了,应该依靠自己的原料和运输来生产了。但经济结构还是原样,是畸形的,不合理的。这就给我们带来了困难。第二是我们接收的官僚资本企业,冗员很多,原来敌伪的一套人员再加上国民党的人员组成官僚主义的管理机构,人力浪费,开支庞大。这也给我们添了很大的负担。第三是国民党统治区农村的极大破产,没办法给城市工业提供原料。拿棉花生产来说,凡是国民党统治区的棉田都减产,因为有美棉的倾销。其他原料也是这样。所以城市解放以后,我们会看到原料缺乏,生产降低,销路减少,运输困难,不少人失业。这种情况在一定时期是不能避免的。但是我们要认识,这种困难和革命失败时期的困难不同,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困难也不同。革命失败时期的困难比现在不知要大多少倍,我们还能转败为胜。帝国主义的经济困难是帝国主义的经济制度造成的,无法克服。我们的困难是革命胜利中所遇到的,是以前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官僚资本主义给我们遗留下来的,而不是新民主主义制度带来的。正是在新民主主义

制度下，我们能够克服这些困难。

我们要恢复生产，首先就得恢复农业生产。农村解放和进行土地改革以后，只要经过一年时间，农业生产就能增加。这种经验在华北、东北、西北都有过。东北去年全部解放，今年就计划增产粮食一百五十万吨，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华北今年春天全部解放，明年就可以增产。接着，华东、华中、华南都会这样发展。而且，现在我们的战争进行得很顺利，农村破坏很少，第一步先做到不减产，第二步就可以增产。农业生产提高了，原料增加了，工业生产就更有基础。第二是恢复交通运输。首要的是恢复铁路。中国两万多公里铁路，今年要恢复百分之八十，明年不仅要恢复余下的百分之二十，而且还要有新的的发展。我们要恢复生产，必须靠交通运输畅通。比如淮南的铁道恢复了，就可以使淮南的煤产量增加，保证上海工业的恢复。将来平汉、粤汉都要这样地恢复。此外就是钢铁工业、机械工业，先要为铁路制造钢轨、火车头、车厢、车皮；还要增产农业工具，如水车等，使农村得到帮助。这些，都是我们恢复生产急需要做的，当然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这些方面。

所以从全局来看，我们的事业是发展的。在局部，譬如上海，或者在某一方面，生产确实是减少了一些。大城市的那种殖民地商业，外国货充斥的商业，是会少一些的，有些买卖是会关闭一些的。特别是那些人民不需要的消费品的制造厂和商店是要关闭的。由于这些生产的减少，就会有一部分工人失业。但是，这只是生产发展中的减产，商业发展中的萧条，交通恢复中的停滞，工作增加中的失业。这是全局与局部、主流与

支流的关系。对此，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估计。

我们的革命要彻底胜利，要把帝国主义加在我们身上的锁链统统去掉，必然会遇到他们留给我们的困难，我们要准备迎接和克服这些困难。我们要继续保持和发扬长期在农村中建立起来的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现在到了一个新环境，要精兵简政，节衣缩食。接收一些机关，不要把官僚机构的坏东西也接收下来，而是要加以改造。我们现在虽然生活在城市里，但旧衣裳还是要穿，不要向剥削阶级造成的奢侈腐化的生活看齐，要向我们历来的艰苦朴素的生活看齐。这样才能节省国家的经费，使人民尤其是工人阶级生产的东西，首先用到革命当中、战争当中去。这样才能使我们有力量增加生产，克服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给我们遗留下来的困难。这是我们在恢复生产的工作中对于我们工人阶级的一个号召，也是对于我们人民的一个号召。

我们的党在农村中依靠农民，领导他们进行了八年的抗日战争，三年的解放战争，他们对国家的贡献是特别大的。在人力上，农民单是送自己的子弟、丈夫参军，先后加起来就有七百多万人。还要有多少民工支前！还要有多少民兵打游击战！在公粮的负担上，每一个农民每年平均收入大概是四百斤小米，要拿出八十斤给公家，这就是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二十。现在到了城市，我们的开支更大了。譬如上海、天津、北平三个大城市，有一千万人口，生产还没有恢复，我们要支出多少人民券？这些支出加在谁身上？还是加在我们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农民身上了。因此，我们城市工作的同志要想到农民。我们工人阶级今天也要负担同样的辛苦，起

到我们应该起的作用。

我们工人阶级要参加新中国的各种建设工作。全国总工会和各地工会都要派代表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⁴²³⁾，这样就参加了新中国的政权建设。不但工会的代表，而且我们革命的职员，从事革命工作几十年了，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的代表就是工人阶级的代表，也要来领导全国政权的建设工作。现在各个地方也正在建设地方的人民政权，工人阶级要在其中起领导作用。工人阶级还要参加今后的国防建设。过去，我们是从游击战发展到正规战，把敌人的武器缴获过来，装备自己，消灭敌人。今后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武器装备必须依靠我们自己生产，这就需要我们工人阶级作出更大的努力。工人阶级还要参加文化建设。总之，我们工人阶级要参加各种建设工作，而最基本的任务就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只要有步骤有计划有组织地把生产恢复起来，发展起来，我们就有把握建设新中国。

最后，讲一讲团结问题。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恢复生产，建设新中国，我们要团结起来。有四个方面的团结：

首先是我们工人阶级本身要团结起来。据说现在有组织的工人已经有一百万以上，如果把全国一切工人、职员、手工业工人统统组织起来，把农村的农业工人也组织起来，会达到一千万以上。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是教育工人的地方，是为工人阶级谋利益的机构，也是代表工人阶级来参加领导和参加各种建设的组织。工人阶级团结不仅要看到工人中先进的部分，还要看到落后的和中间的部分。对于落后的和中间的部分，我们要帮助他们，教育他们，把他们组

织起来，团结在一起，领导他们向前进，而不能搞关门主义，挑剔他们，冷淡他们，排斥他们。我们要有明确的团结全国工人阶级的认识，这样工人阶级的力量才是伟大的，才能担负起刚才所说的任务。

第二是公营企业中工人与职员要团结起来。工人和职员都是工人阶级，他们有的是处在管理的地位，有的是直接生产的体力劳动者，但只是分工的不同，没有阶级的对立。以前是官僚资本主义的工厂，工人对管理者有对立、反抗、斗争的情绪那是必然的。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我们要把过去旧的对立的观念和态度改变为新的团结的观念和态度。实现这种团结的最好的机构就是工厂管理委员会。我们的工厂一切管理人员，不要把旧的官僚主义那一套拿过来，要实行民主，工人代表和管理人员、工程师在一起，民主地具体地来讨论工厂中的一切问题，如关于生产的方针、计划等等，同时要给厂长以最后决定权。有民主，有集中，全体团结起来，才能把生产搞好。

第三是在私人企业中我们要团结民族资本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愿意脱离帝国主义的经济束缚来建设中国的企业，所以他们还有进步性和建设性；同时他们又是软弱的、动摇的，并且有投机破坏性，因为过去他们只有投机才能生存。今天应该把这个投机破坏性去掉，这就需要斗争；同时要承认他们的进步性，鼓励他们的建设性，这样才能够团结他们。要实现劳资两利，中心环节是要订立各行各业的集体合同，解决各行各业的劳资问题，否则两方面的斗争就不能限制，弄不好罢工也可能发生，生产就要受到

破坏。订立集体合同，双方就可以安心生产了。

第四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有了这个团结，才能制止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战争冒险。中国革命的胜利得到了世界工人阶级的欢迎和拥护，更增加了整个世界和平的力量。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起来才能够实现我们的一切任务！

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草案的特点^{*}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⁴⁵⁶⁾草案,是新政治协商会议⁽⁴²³⁾筹备会第三小组决定由中国共产党负责起草的。草案初稿写出以后,经过七次的反复讨论和修改,计由先后到达北平的政协代表五六百人分组讨论两次,第三组本身讨论了三次,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了两次,广泛地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然后将草案提交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作了基本通过,现在提交政协全体会议讨论。协商过程中着重讨论到的有如下几个问题,现在加以说明。

第一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问题。这种统一战线的发起远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提议和努力,获得了孙中山先生的同意,改组了国民党,促成了国共合作,胜利地举行了北伐⁽¹²¹⁾。后来这个统一战线被蒋介石破坏了。但是中国共产党仍然努力组织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尤其是毛泽东同志更使这个政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

*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周恩来同志受党中央委派主持起草了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并在全体会议上做了题为《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这是报告的摘要。

成功。可是国民党反动派是始终反对统一战线的，它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动三次反共高潮⁽⁴⁵⁷⁾，而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又推翻双十协议⁽³⁷³⁾和政协决议⁽³⁴⁵⁾，最后终于发动了大规模的内战。这次内战教育了人民，使广大人民逐渐地走到一致拥护人民解放军进行解放战争，消灭反动派，把革命进行到底。去年中国共产党根据历来统一战线的主张，号召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得到了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热烈的响应。发展到今天，这个号召已经实现了。大家的目的很明确，正如共同纲领草案和人民政协组织法所规定的那样，是实行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为着这个任务，我们团结国内各民主阶级、各民族和国外华侨，结成这样一个伟大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不仅是中国国民党为之奋斗了二十八年的主张，也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区域、军队、国内少数民族、国外华侨，以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所拥护和赞助的。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论文中，明确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保证了人民民主革命取得今天的胜利。所以在筹备会讨论中，大家认为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这样一个统一战线应当继续下去，而且需要在组织上形成起来，以推动它的发展。大家同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它的最好的组织形式。

在讨论中曾经出现过两种其他的想法：第一种以为等到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就再不需要人民政协这样的组织了；第二种以为由于各党派这样团结一致，推动新民主主义很快地发展，党派的存在就不会很久了。后来大家在讨论中认为

这两种想法是不恰当的，因为他们不合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和建设的需要。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固然还需要一个相当时间，就是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政协会议还将对中央政府的工作起协商、参谋和推动的作用。其次，新民主主义时代既有各阶级的存在，就会有各党派的存在。旧民主国家的统治者是资产阶级，其所属各派必然是互相排挤，争权夺利。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各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虽然各阶级的利益和意见仍有不同之处，但是在共同要求上、在主要政策上是能够求得一致的，筹备会通过共同纲领草案就是一个最明显的证明。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的不同要求和矛盾，在反帝反封建残余的斗争前面，是可以而且应该得到调节的。

第二是新民主主义的总纲问题。在讨论中，曾有一种意见，以为我们既然承认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性质的阶段，一定要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发展，因此总纲中就应该明确地把这个前途规定出来。筹备会讨论中，大家认为这个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但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而奋斗。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而且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已经规定要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

总纲中关于人民对国家的权利与义务有很明显的规定。有一个定义须要说明，就是“人民”与“国民”是有分别的。“人民”是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

及从反动阶级觉悟过来的某些爱国民主分子。而对官僚资产阶级在其财产被没收和地主阶级在其土地被分配以后，消极的是要严厉镇压他们中间的反动活动，积极的是更多地要强迫他们劳动，使他们改造成为新人。在改变以前，他们不属人民范围，但仍然是中国的一个国民，暂时不给他们享受人民的权利，却需要使他们遵守国民的义务。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这是对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团结和生产有利的。

这些反动阶级中的重要反动分子们，决不会甘心失去他们过去的特权，一定要进行阴谋破坏的。最近杨杰将军的遇害⁽⁴⁵⁸⁾，便是一个例证。人民的军队和警察将加强工作以防止他们的阴谋破坏。我们大家则须加强团结，提高警惕，以打击反动分子的各种阴谋。

第三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制度问题。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制度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它完全不同于旧民主的议会制度，而是属于以社会主义苏联为代表的代表大会制度的范畴之内的。但是也不完全同于苏联制度，苏联已经消灭了阶级⁽⁴⁵⁹⁾，而我们则是各革命阶级的联盟。我们的这个特点，就表现在中国人民政协会议的形式上。政府各部门和现在各地的人民代表会议以及将来的人民代表大会都将同样表现这个特点。从人民选举代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人民政府直到由人民政府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国家政权的这一整个过程，都是行使国家政权的民主集中的过程，而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就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

第四是军事制度问题。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

胜利和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决不是偶然的。它的特点不仅是勇敢机智善于作战，而且能正确地执行政策，并帮助人民劳动。政治工作制度是它的灵魂。这种军事制度，不仅不同于封建军阀，也不同于资产阶级的军事制度。纲领上规定将以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军事制度来统一全国的军队，这里边包括一切从国民党反动统治方面起义过来的军队。这种做法显然不同于军阀制度的吞并排挤，而是不分彼此帮助他们改造为人民的军队。

第五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问题。基本精神是照顾四面八方，就是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⁴⁶⁰⁾的构成中，国营经济是领导的成分。在逐步地实现计划经济的要求下，使全社会都能各得其所，以收分工合作之效，这是一个艰巨而必须实现的任务。筹备期中关于经济的部分讨论最多，各方面好的意见都已经集中在草案的条文里面。经济建设是百端待举，但须有缓急轻重之分，草案中已根据那些是应该做的、那些是不应该做的；那些是现在可以做的、那些是现在不能做的；那些是已经做了的、那些是尚未做的等分析规定出具体条文。

第六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政策问题。这个问题讨论不多，简单地说来，就是民族的形式，科学的内容，大众的方向。草案中规定了必须强调的几项，其他没有规定的并非不作，因为在草案第五章中已经都概括地提到了。

第七是新民主主义的民族政策问题。其基本精神是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必须反对各民

族的内部的公敌和外部的帝国主义。而在各民族的大家庭中，又必须经常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倾向。各少数民族的区域自治、武装权利及其宗教信仰之被尊重，均在条文中加以明确的规定。

第八是新民主主义的外交政策问题。草案第七章中明确地规定了保障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即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在总纲上已明白地接受了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论述的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站在一起的方针。这就是我们在外交政策上的基本态度。

注 释

- 1 当时党中央的一些文件，把军阀、官僚、洋行买办、地主土豪等统称为半封建势力。这里沿用了这一提法。——第1页。
- 2 国民党是孙中山创立的政党。一九〇五年，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联合组成中国同盟会，由孙中山任总理。同盟会领导了辛亥革命。一九一二年同盟会联合四个小党派改组为国民党，和北洋军阀袁世凯实行妥协，基本上成了官僚政客集团。一九一四年，为了反对袁世凯的统治，孙中山领导一部分国民党员组织中华革命党，一九一九年十月，又改为中国国民党（简称国民党）。一九二四年一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改组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而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并依靠这一合作进行了北伐战争。这个时期的国民党，具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的性质。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基本上变成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第1、92、112、159页。
- 3 “五卅”运动，指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惨案”激起的全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群众近万人到“公共租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遭到英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这次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广大的工人、学生、商人和农民在各地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罢市、罢课，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第2、46、57、88、117页。
- 4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国民党右派在帝国主义指使下，在广州暗杀了坚持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为了调查这一重大暗杀事件的真相，由有关方面人士组成了“廖案检查委员会”。周恩来是这一委员会的委员。——第2、117、165页。
- 5 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页。新的译文是：“共

- 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第4页。
- 6 见《国民周刊》第3期（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出版）所载范谔写的《从海康案说到农运问题》一文。这篇文章揭露和谴责了广东海康县军政当局勾结地方土豪劣绅枪杀农民运动工作人员程庚的罪行。——第5页。
 - 7 郭沫若（一八九二——一九七八），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一九二七年三月下旬，奉武汉国民政府之命从九江去上海组织总政治部分部，四月十四日到达上海。他目睹了蒋介石一手制造的九江、安庆的反革命事件。三月三十一日在南昌撰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声讨蒋介石背叛革命的罪行。——第6页。
 - 8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七日，蒋介石唆使暴徒在九江捣毁并派兵强占左派领导的国民党市党部和市总工会；同年三月二十三日，又在安庆捣毁左派领导的安徽省、安庆市国民党党部和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筹备处，打伤多人。——第6页。
 - 9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反动派在宁波捣毁了市总工会和店员工会；四月九日捣毁了左派领导的国民党市党部和《民国日报》社，逮捕了市党部常委杨眉山（共产党员）、市总工会委员长王鲲（共产党员）和《民国日报》社长庄禹梅。三月三十日蒋介石反动派在杭州袭击了市总工会，三十一日又开枪杀伤参加抗议游行的工人八十多人。四月九日蒋介石反动派在南京捣毁了左派领导的江苏省和南京市国民党党部；四月十日逮捕、殴打游行的革命群众，杀害省党部常委侯绍裘（共产党员）。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反动派在上海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从此，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完全背叛革命，公开投降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第6页。
 - 10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发动反革命政变，解除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的武装，包围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两千多人。——第6页。
 - 11 薛岳（一八九六—— ），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后来追随蒋介石积极反共。——第6页。
 - 12 严重（一八九二——一九四四），曾任黄埔军校教官、总教官，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师师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拒绝蒋介石任命的职务。抗日战争期间被国民党反动派谋害。——第6、71页。

- 13 陈调元（一八八六——一九四三），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三军团（北路）总指挥兼三十七军军长。——第6页。
- 14 中央政府，指当时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第7页。
- 15 “八七”会议，即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紧急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党的中央委员、监察委员等二十一人。瞿秋白在会上作了《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告全党党员书》和农运、工运及组织问题等决议案，改选了中央领导机构。这次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坚持革命斗争，这些都是正确的，是它的主要方面。但是，在反对右倾投降主义的时候，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恰当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因而为后来的“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第8、19、45、171页。
- 16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日在莫斯科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瞿秋白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刘伯承作了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会议通过了政治、军事、组织等问题的决议案。这次大会肯定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当时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会议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特别指出了当时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次大会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但也有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适当的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第12、14、45、56、157页。
- 17 卢冬生（一九〇八——一九四五），一九二七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担任党中央联系湘鄂西苏区的交通员。一九二九年参加湘鄂西苏区红军，历任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师政委等职。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初期任一二〇师三五八旅旅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东北松江军区司令员。——第14页。

- 18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许多地方的工农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先后建立了称为苏维埃的革命政权。广东海陆丰等地的农民,在四月、九月和十月三次举行起义,建立革命政权。海南岛的定安、琼山、万宁、乐会等地的农民,十月举行起义组成了红三师。江西的万安、延福、东固、雩都等地的农民,十二月举行起义,万安建立了革命政权,成立了游击队。湖北的黄安(今红安)、麻城、孝感等地的起义农民,十一月占领了黄安县城三十多天,建立了革命政权。湖南东部的农民,九月举行起义,占据过浏阳、平江、醴陵、株洲一带。醴陵农民一九二八年初建立过农村革命政权。——第15页。
- 19 建始与鹤峰两次战争,指贺龙领导的红军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攻下湖北省建始县城、一九二九年一月攻下湖北省鹤峰县城的两次战斗。——第15页。
- 20 杨维藩,曾是中国共产党恩(施)鹤(峰)临时特委书记,一九二九年初,因工作消极被停止党籍。鹤峰战斗后,因拖枪叛逃被处决。——第17页。
- 21 中央的两个政治通告,指一九二九年一月发布的《中央通告第二十五号——反对军阀战争和争取群众》和一九二九年二月发布的《中央通告第三十号——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党的主要路线》。——第17页。
- 22 汪铭(一九〇三——一九三一),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一九二九年被国民党逮捕,一九三一年十月就义。——第20页。
- 23 中共顺直省委,先后称北方局、顺直省委、河北省委。顺直指北京(曾名顺天府)和河北(曾名直隶省)。顺直省委曾领导河北、山西、北平(北京)、天津、察哈尔、绥远、热河、河南北部、陕北一部的党的工作。——第20页。
- 24 河东七县,指山西南部黄河以东的安邑、闻喜、夏县、解县、猗氏、绛州(即新绛)和绛县。——第22页。
- 25 彭,即彭湃;杨,即杨殷;颜,即颜昌颐;邢,即邢士贞。他们是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日在上海龙华被敌人杀害的烈士。

彭湃(一八九六——一九二九),我党最早的农民运动领袖。一九二二年七月在海丰县赤山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农会。一九二三年一月当选为海丰总农会会长。一九二四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创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一九二五年五月当选为广东省农民协会副委员长。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南昌起义失败

后,领导了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创立海陆丰苏维埃,任委员长和中共东江特委书记。一九二八年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书记。在党的第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八七”会议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第23、118页。

杨殷(一八九三——一九二九),早年参加同盟会。一九二三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是省港罢工的领导者之一。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广州起义时任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代理主席和肃清反革命委员会主席。一九二八年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常委,并任中央军事部长。——第23页。

颜昌颐(一八九八——一九二九),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在中共中央军委、湖南省委军委工作。一九二六年十月到一九二七年三月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任二十四师党代表。南昌起义失败后,和彭湃一起发动海陆丰第三次起义,创建海陆丰苏维埃,任红军党代表。一九二八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第23页。

邢士贞(?——一九二九),一九二七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当时是中共江苏省委军委干部、士兵运动负责人。——第23页。

- 26 “四一二”,指蒋介石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参见注(9)。——第23、166页。
- 27 张际春(?——一九三三),共产党员。一九二九年任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同年参加领导上海五月三十日和八月一日两次反帝大示威,八月二十四日被捕,一九三一年冬出狱。——第24页。
- 28 《布尔塞维克》杂志,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创刊,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前为周刊,后改为半月刊。现在查到的最后一期是一九三二年七月出版的第五卷第一期。

《红旗》,中共中央机关报。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创刊。共出一二六期,前二十三期是周报,后一〇三期是三日报。一九三〇年八月二日停刊,同月十五日和《上海报》合并为《红旗日报》。一九三一年二月十四日《红旗日报》改为中共中央和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同年三月九日改名《红旗周报》,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现在查到的最后一期是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出版的第六十四期。——第24页。

- 29 熊式辉(一八九三——一九七四),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师师长兼淞沪警备司令。——第25页。
- 30 《少年先锋队歌》,苏联诗人别塞勉斯基填词的革命歌曲,原名《青年近卫军》,一九二二年定为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传入中国,改称《少年先锋队歌》。——第25页。
- 31 反对派,指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出现的由一小批托洛茨基分子组成的反党小集团。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的托洛茨基分子以“左”的面目出现,不承认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张立即没收资本家的工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在组织上进行分裂党的派别活动。一九二八年八月,党中央决定开展反对托派的斗争,号召全党在思想上驳斥托派的谬论,对托派骨干分子一律清除出党,对一般分子,主要采取教育方法,争取他们放弃托派观点,回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第25、44页。
- 32 陈毅(一九〇一——一九七二),一九二三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九年六月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前敌委员会书记,八月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第29页。
- 33 蒋桂、蒋冯战争,指一九二九年三月蒋介石与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和同年五月蒋介石与西北军冯玉祥之间为争夺地盘、扩展势力进行的军阀战争。——第29、178页。
- 34 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七日,国民党政府的中国航空公司与美国航空发展公司订立航空邮务合同,允许美国公司经营南京至汉口、南京至北平、汉口至广州三条航线的航空邮政业务,给予邮件运输的专利权,并允许以后可以延长和开辟新的国内航线。——第29页。
- 35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日国民党政府与英国订立海军援助协定,英国答应帮助国民党政府训练海军。——第29页。
- 36 日本帝国主义满蒙计划,指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和内蒙地区,进而侵略全中国的计划。据当时中外报纸揭载,日本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在一九二七年给日本天皇的秘密奏折中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第29页。
- 37 中东路是一八九六年清政府与沙皇俄国签订“中俄密约”后,由俄国投资在我国东北地区修建、经营的一条铁路。一九二四年中苏协定改为两国

- 共同经营管理。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后,执行亲帝反苏的外交政策,制造了一系列反苏事件。一九二九年七月十日,国民党政府单方撕毁一九二四年的中苏协定,以武力手段夺占中东铁路,驱逐任职的苏方人员。七月十七日,苏联宣布同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十月,蒋介石命令东北军八万余人开赴绥芬河,发动对苏联的进攻。这一进攻因苏联军队的回击而失败。——第 29 页。
- 38 目前反蒋的军阀战争(或称张发奎事件),指一九二九年九月开始的国民党军第四师师长张发奎与桂系军阀、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联合反对蒋介石的战争。这次战争又称两广战争或两广冲突。——第 30、31 页。
- 39 改组派,是二十年代末期到三十年代初期的国民党派系之一。一九二七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武汉汪精卫的国民党和南京蒋介石的国民党合流。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等不满蒋介石独揽权力,一九二八年底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形成了国民党中的“改组派”。——第 30、163 页。
- 40 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国民党改组派的改良主义,主张发展“国家资本”,兴办“合作事业”,实行工人“红利制”和农村“自治”,“以反对共产党和党内外的军阀”。——第 30 页。
- 41 冯,指冯玉祥;唐,指唐生智;朱,指朱培德。——第 30 页。
- 42 阎,指阎锡山;张,指张学良。——第 31 页。
- 43 奉张内部的新旧之争,指奉系军阀张作霖部属中土匪出身的以张景惠、张作相为首的旧派与留日士官学校出身的杨宇霆、韩春麟为首的新派之间的斗争。——第 31 页。
- 44 杨,指当时东北兵工厂督办杨宇霆;常,指当时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他们是张作霖的重要部属。张作霖死后,张学良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一日枪杀了杨、常。——第 31 页。
- 45 刘和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十六师师长,驻浦口一带,一九二九年被蒋介石调往福建“围剿”红军。——第 32、67 页。
- 46 张贞,当时任国民党军暂编第一师师长。——第 32 页。
- 47 二陈冲突,指一九二九年夏天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和国民党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为争夺广东的军政大权而发生的冲突。——第 32 页。

- 48 金汉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一军军长。——第 32 页。
- 49 朱培德,国民党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兼江西省政府主席,一九二九年被蒋介石调离江西,省主席一职为鲁涤平所取代。——第 32 页。
- 50 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军军长。——第 32 页。
- 51 CY,共产主义青年团(Communist Youth League)的英文缩写。——第 41 页。
- 52 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〇),十月革命时,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在一九二二年联络过孟什维克等机会主义派别,组织八月联盟,反对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在战争、和平以及革命等基本问题上以“左”的立场反对列宁的正确方针政策。一九二三年秋集结同伙,提出反对派纲领,要求派别活动的自由。列宁逝世后,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进行反党的派别活动和破坏活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被清除出党。一九二九年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托洛茨基进行了许多分裂和破坏活动。——第 44 页。
- 53 中央的第四十四号通告,指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的通告。——第 44 页。
- 54 胡汉民(一八七九——一九三六),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代理广州大元帅府大元帅兼广东省长等职,著名的右派首领,是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同盟者。后来同蒋介石集团争权夺利,长期对立。——第 44、115、165 页。
- 55 戴季陶(一八九〇——一九四九),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歪曲孙中山学说的革命内容,散布反对共产党、反对工农运动的谬论,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进行思想上的准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继续忠实追随蒋介石。——第 44、113、151、166 页。
- 56 周佛海(一八九七——一九四八),一九二一年曾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四年叛党。蒋介石叛变后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职。抗日战争开始后随汪精卫叛国投降日本侵略者,任汪伪政府行政院长等职。——第 44 页。

- 57 《新生命》是周佛海主编的反动月刊，一九二八年在上海创刊。——第46页。
- 58 一九一九年七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第二国际，议决八月一日在瑞士卢赛恩召开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号召全世界工人在这一天举行游行，向第二国际示威。一九二九年七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决定八月一日为国际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日。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组织了反帝示威。——第46页。
- 59 惺惺惜惺惺，原意是聪慧的人爱惜聪慧的人。这里借用这句成语，形容机会主义者和反对派同类相聚。——第47页。
- 60 赤色工会，指当时我党领导下的革命工会，与国民党领导下的黄色工会相区别。——第48、181页。
- 61 钧，即项英（一八九八——一九四一），化名江钧。一九二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一九三〇年八月任长江局书记。同年十二月到江西革命根据地，历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苏区军委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原地坚持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时牺牲。——第48、201页。
- 62 周恩来在这封信中主张中国共产党人要参加黄色工会去争取群众，但沿用了当时中央文件中流行的“消灭黄色工会”的不正确提法。——第51页。
- 63 一九三〇年四月，中共湖北省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工人赤色先锋队，作为城市暴动的中心队伍，后来并未建成。——第51页。
- 64 周恩来在这封信中主要是反对“左”倾，特别提出要反对“‘左’倾会比右倾好些”的错误观点。但沿用了当时中央文件中流行的“党内主要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不正确提法。——第52页。
- 65 立三，即李立三（一八九九——一九六七），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三〇年六月至九月犯了“左”倾机会主义（即立三路线）错误。当时任中共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一九三〇年九月六届三中全会后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后来改正了自己的错误观点，在党的第七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第55、162页。
- 66 国际，指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成立于一九一九年三月，是各国共产党的

- 联合组织。一九二二年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一九四三年五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决定，宣布解散。——第 55、138、151、165、203 页。
- 67 六月十一日的决议案，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一日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这个决议否认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认为中心城市爆发的工人斗争必然形成全国革命高潮，而且中国革命必将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决议批评以农村包围城市是一种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点。决议不承认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这个决议案的通过使立三路线统治了中央的领导机关。——第 55 页。
- 68 中央七十号通告，指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六日发布的《中央七十号通告——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第 56 页。
- 69 陈韶玉，即陈绍禹（一九〇四——一九七四），又名王明，党内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主要代表。六十年代后堕落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第 56、184 页。
- 70 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占领长沙，七月二十九日宣布成立湖南省苏维埃，八月五日退出长沙。这次事件被称为长沙事件。——第 56 页。
- 71 一九二八年八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战后至一九二三年为第一时期，是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尖锐危机和无产阶级革命直接发动时期；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为第二时期，是资本主义经济相对稳定时期；一九二八年进入第三时期，即资本主义经济“稳定”结束、总危机尖锐化、“大规模阶级搏斗”的时期。——第 56 页。
- 72 国际十次大会的“决议”，指一九二九年七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的决议。——第 57 页。
- 73 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是由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起，一九三〇年五六月间在上海秘密召开的。——第 57 页。
- 74 “八一”“八三”的会，指中共中央政治局一九三〇年八月一日、八月三日在上海召开的会议。在“八一”的会上决定把党、团、工会的领导机构合并成为中央行动委员会（简称总行委）。在“八三”的会上决定举行武汉暴动、南

- 京暴动与上海总同盟罢工，规定总行委是全国暴动的最高领导机关。当时周恩来不在国内。李立三在会上错误地批评周恩来“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暴露他右倾的危险”。——第 57 页。
- 75 冯玉祥（一八八二——一九四八），北洋军阀时期曾任旅长、师长、督军、督办等职。一九二四年十月发动北京政变，并将部队改组为国民军。十一月五日取消清废帝溥仪的皇帝称号，将溥仪逐出皇宫。一九二六年九月宣布脱离北洋军阀参加国民革命。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后曾参加蒋介石、汪精卫反对共产党的活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赞成抗日。一九三三年五月同共产党合作，在察哈尔省（现在分属山西、河北和内蒙）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后，继续采取和共产党合作的立场。一九四八年初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同年九月一日在由美国回国参加新政协途中遭遇火灾逝世。——第 58、120、170、194、211、283 页。
- 76 一九三二年底蒋介石调集四五十万人的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大规模“围剿”。一九三三年二月，蒋军十二个师，采取“分进合击”的战略，分三个纵队由乐安、南城、金溪等地向广昌进攻。红军以一部伪装主力东渡抚河，将敌主力第二、第三两纵队向黎川方向吸引，主力秘密转移到敌军右翼，集中于广昌以西的东韶、洛口地区隐蔽待机。二月二十六日，敌第一纵队三个师由乐安、宜黄向广昌前进。红军先以地方部队不断阻击、袭扰、迷惑敌人，当敌右翼第五十二、第五十九两师进至宜黄南部的黄陂、大龙坪地区时，红军在二十七日拂晓突然发起猛攻，经两天激战，将其全部歼灭。敌军遭此打击后，即改变部署，三月十五日以六个师分成两个梯队由宜黄地区出发，经东陂、甘竹直扑广昌。红军放过敌人先头四个师，在二十一日晨突然向进至草台冈、东陂地区的敌人后尾两个师发起攻击，激战一日，歼敌第十一师大部和第九师一部。余敌仓惶撤退。红军两战共缴枪万余支，这次“围剿”就基本被打破了。（附略图）——第 59 页。
- 77 金溪战役，指一九三三年一月四日至八日红一方面军在江西金溪西南黄狮渡、浒湾地区进行的战役。——第 59 页。
- 78 吴、罗、周三师，指国民党军吴奇伟的第九十师、罗卓英的第十一师、周至柔的第十四师。——第 59 页。
- 79 南丰战役，指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一日至二日红一方面军在江西南丰城以东石沟墟地区进行的战役。南城战役，指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

二日红一方面军在江西南城以东礼西赵地区进行的战役。金溪战役，见注(77)。——第60页。

- 80 曾，即曾洪易，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闽浙赣军区政治委员。一九三五年叛变投敌。

邵，即邵式平（一八九八——一九六五），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闽浙赣军区政治部主任。

唐，即唐在刚（一九〇三——一九三五），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闽浙赣军区司令员。一九三五年一月，在北上抗日途中牺牲。——第61页。

- 81 宜黄、乐安战役，指一九三二年八月十六日至二十日红一方面军攻占江西乐安、宜黄的战役。——第61页。

- 82 陈诚（一八九六——一九六五），一九二二年在粤军任连长。一九三三年第四次“围剿”时任国民党军第二路军总指挥。西安事变时任国民党军政府军政部常务次长。解放战争期间任国民党军参谋总长等职。——第61、114、192、277页。

- 83 朱，即朱德（一八八六——一九七六），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

王，即王稼祥（一九〇六——一九七四），当时任中央苏区中央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第62页。

- 84 彭鳌（一九〇四——一九三三），一九二六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反“围剿”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第三师师长。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三日牺牲。——第64页。

- 85 赵观涛，当时任国民党军八路军总指挥。——第65页。

- 86 董，即董振堂（一八九五——一九三七），曾在国民党军任连长、营长、团长、师长。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同赵博生一起率部举行宁都起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第五军团第十三军军长。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军团长。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在甘肃高台战役中牺牲。

朱，即朱瑞（一九〇五——一九四八），一九二八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北方局军委书记、山东分局书记、延安炮兵学校校长等职。抗战胜利后任东北人民解

- 放军炮兵司令员等职。一九四八年十月在解放义县的战斗中牺牲。——第 68 页。
- 87 彭,即彭德怀(一八九八——一九七四),一九二八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军团长。
滕,即滕代远(一九〇四——一九七四),一九二四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政治委员。——第 69 页。
- 88 林,即林彪(一九〇七——一九七一),一九三〇年一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一纵队司令。一九三三年第四次反“围剿”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一九六六年后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企图篡党夺权,阴谋败露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叛国出逃,机毁丧命。——第 69、179、203、253 页。
- 89 聂,即聂荣臻(一八九九——),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政治委员。——第 69 页。
- 90 宋子文(一八九四——一九七一),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经济委员会主席。——第 70、193 页。
宋美龄(一九〇一——),蒋介石的妻子。——第 70 页。
蒋鼎文(一八九六——一九七四),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福建绥靖公署主任。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准备调他任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第 70、192 页。
- 91 张,即张学良(一九〇一——),东北军爱国将领。当时任国民党西北“剿总”副司令。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和杨虎城一起发动西安事变,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后被蒋介石长期扣押。——第 70、193、248 页。
- 92 杨,即杨虎城(一八九三——一九四九),西北军爱国将领。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等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和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九三七年四月,被蒋介石追令去职出国。同年十一月回国参加抗日工作,随即被蒋介石长期囚禁。一九四九年九月在重庆国民党集中营惨遭杀害。——第 70、193、248 页。
- 93 何应钦(一八八九——),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

张群(一八八九——),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

张嘉璈(一八八八——),当时任国民党政府铁道部长。

吴鼎昌(一八八四——一九五〇),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长。

陈绍宽(一八八八——一九六九),当时任国民党政府海军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第71页。

- 94 孔祥熙(一八八〇——一九六七),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代院长兼财政部长。

徐新六(一八九〇——一九三八),当时任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复旦大学校长。

颜惠庆(一八七七——一九五〇),曾任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和中国出席国联第十六届大会的首席代表。

赵戴文(一八六七——一九四三),当时任国民党山西省政府主席。

邵力子(一八八一——一九六七),当时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政务委员等职。

胡宗南(一八九六——一九六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军军长。

陈季良(一八八三——一九四四),当时任国民党政府海军部政务次长。

沈鸿烈(一八八二——一九六九),当时任国民党政府青岛市长。——第71页。

孙科(一八九一——一九七三),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长。——第71、194页。

曾养甫(一八九八——一九六九),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广州市长。

朱家骅(一八九三——一九六三),当时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长。

俞飞鹏(一八八四——一九六六),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交通部代理部长。

卢作孚(一八九四——一九五二),当时任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

张伯苓(一八七六——一九五一),当时任南开大学校长。

王世杰(一八九二——),当时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

宋庆龄,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

杜重远(一八九七——?),当时任上海进步刊物《新生周刊》主编,一九三五年五月,曾因刊登爱国文章,被国民党政府判刑。西安事变前曾帮

助张学良接受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抗日战争时期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

沈钧儒(一八七五——一九六三),当时是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要领导人之一。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与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抗日战争爆发后始出狱。一九四八年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等职。

章乃器(一八九七——一九七七),当时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粮食部长等职。——第71页。

- 95 七领袖,指当时在上海领导各界抗日救亡运动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的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七人,也称“七君子”。——第71、192、248页。

- 96 阎,指阎锡山(一八八三——一九六〇),长期统治山西的军阀。一九三七年八月起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第79、85、229、236页。

- 97 教导团的全称是山西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决死队的全称是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少先队的全称是山西少年抗敌先锋队。

一九三六年秋,中共中央北方局派薄一波等到山西开辟工作,在取得阎锡山同意后,相继组织了这些人民抗日武装,统称为山西新军。——第79页。

- 98 黄,指黄绍竑(一八九五——一九六六),国民党桂系军人。当时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政务委员等职。——第79页。

卫,指卫立煌(一八九六——一九六〇),当时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一九五五年由香港回到北京,曾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第79、200页。

- 99 刘湘(一八八九——一九三八),四川军阀。当时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第79页。

- 100 许旅,指西北军十七路军九十六军一七七师五二九旅。旅长许权中(一八九四——一九四三),共产党员。一九二八年参加陕西渭华暴动。一九三三年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中任第十八师师长。抗日战争开始后曾参加易县、曲阳阻击日军的战斗和忻口战役。一九四三年在陕西郿县被胡宗南部暗杀。

赵师，指十七路军十七师。师长赵寿山（一八九三——一九六五），西安事变后在党的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一九四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六年三月到解放区。一九四八年一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

孙军，指十七路军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一八九六——一九七九），西北军爱国将领。长期和中国共产党保持联系，同情和支持人民革命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第79页。

- 101 总动委，指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它是在共产党的组织和推动下建立的带有战时政权性质的组织，当时的工作任务是在雁北、绥远、察南战地发动和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活动。主任委员是续范亭。——第80页。
- 102 胡服，即刘少奇（一八九八——一九六九），当时任中共中央代表，领导北方局工作。——第80页。
- 103 宋任穷（一九〇九—— ），当时任第十八集团军一二九师政治部主任。——第80页。
- 104 彭真（一九〇二—— ），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第80页。
- 105 雪枫，即彭雪枫（一九〇五——一九四四），一九二七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当时任八路军太原办事处主任。一九四一年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淮北区军区司令员。一九四四年九月在河南夏邑和日伪军作战中牺牲。——第80页。
- 106 九国公约，是一九二二年二月美、英、法、日、意、比、荷、葡与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公约主要反映美、英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提出“中国门户开放”、列强在华利益“机会均等”。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在布鲁塞尔召开了“九国公约”缔约国会议，日本拒绝参加。出席会议的除原缔约国家外，还有苏联、印度等共十九个国家。由于美英对日采取绥靖政策，拒绝讨论苏联提出的集体安全原则，会议没有取得积极结果，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第81页。
- 107 据英国伦敦《标准晚报》一九三七年十月三十日报道，日本政府当时曾向蒋介石提出了六项议和停战条件：一、中国承认内蒙为独立国；二、华北五省有决定自治之权；三、上海日军占领区域改为日本租界，并须取得通海道路；四、中国沿海自山海关起至越南界止所有各岛附近之捕渔权让

- 给日本；五、中国退出国联；六、中国不得设立军用航空。——第 82 页。
- 108 华北自治政府，指当时日本侵略军正在华北制造的汉奸政权。这一傀儡政权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北平成立，称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主要头目是王克敏、王揖唐等。——第 82 页。
- 109 维持会是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在我国沦陷区利用汉奸建立的临时性的地方傀儡政权组织。——第 82 页。
- 110 一九三七年十月，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划和操纵下，蒙奸德穆楚克栋普鲁（即德王）集团把原“蒙古军政府”改组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宣称“蒙古自治”。——第 82 页。
- 111 汪，即汪精卫（一八八三——一九四四），一九二五年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主张与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副总裁。一九三八年底公开投降日本。一九四〇年在南京成立傀儡政权。——第 83、115、208 页。
- 112 特殊化，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一个策略步骤。一九三五年四月，日本策划在中国华北五省（河北、察哈尔、山西、山东、绥远）建立脱离国民党政府、听命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特殊区域。同年六月，国民党政府在华北的代表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接受了日本的要求，使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分丧失。十月，日本又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并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国民党政府则指派宋哲元等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第 83 页。
- 113 南怀化现属山西省原平县王家庄公社。——第 84 页。
- 114 这里讲的“三三制”是军队的一种编制，指每级直辖三个单位，如每团下辖三个营，每营下辖三个连，每连下辖三个排，每排下辖三个班。——第 86 页。
- 115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西洛川召开的扩大会议上提出抗战十大纲领：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抗日的民族团结。——第 87、154 页。
- 116 东北四省，指辽宁、吉林、黑龙江和热河（热河省一九五五年撤销，辖区分

- 别划归河北、辽宁二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随即派兵向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进攻。由于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仅仅百余日,辽、吉、黑三省即为日军所占领。一九三三年二月,日军又进攻热河,前后不过十天,热河全境沦陷。——第90页。
- 117 一九二二年六月曾任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背叛孙中山,被许崇智等逐出广州后退踞广东东江(惠州、潮汕一带)。东江战争指一九二三年夏至一九二四年夏,孙中山调集许崇智的粤军,谭延闿、程潜的湘军,杨希闵的滇军和刘震寰的桂军,进攻陈炯明部的战争。西江战争指一九二三年一月和五月在广东肇庆一带滇桂粤联军先后与军阀陈炯明、沈鸿英部的战争。北江战争指一九二三年五月至十一月在广东韶关一带,滇桂粤联军与军阀沈鸿英部的战争。南路战争指一九二三年九月和一九二四年七月在广东廉州、雷州等地,粤军与陈炯明部邓本殷的战争。——第92页。
- 118 黄埔军校,是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在广州黄埔创办的军官学校。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聂荣臻等在该校担任过各种职务,学员中也有很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前,这是一所国共合作的学校。——第92、114、166页。
- 119 为了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准备北伐,一九二五年二月至三月,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织的以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的革命军从广州出发东征,打败了盘踞在东江的军阀陈炯明的主力。六月回师广州,平息了盘踞广州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十月至十一月举行第二次东征,最后消灭了陈炯明的军队。——第92、117、118页。
- 120 杨,即杨希闵,当时任驻粤滇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广州革命政府委员。刘,即刘震寰,当时任驻粤桂军总司令兼广西省长、广州革命政府委员。一九二五年六月,杨、刘勾结在一起,发动叛乱,企图颠覆广州革命政府。国民革命军从东江回师广州,迅速平定了这一叛乱。——第93、117页。
- 121 一九二六年七月,为了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师北伐。由于有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和广大工农群众的积极支持,国民革命军迅速地占领了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严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第93、124、211、246、318、366页。
- 122 一九三六年二月西班牙共和国进行国会选举,西班牙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阵线获胜,成立共和政府。同年七月西班牙将军佛朗哥在德、意法西斯军

队直接参与下发动了内战。世界进步力量积极支援西班牙政府，组织国际纵队同西班牙人民并肩作战。英、法政府在“不干涉政策”名义下对西班牙共和国实行封锁。经过三年苦战，一九三九年三月首都马德里沦陷，共和国政府失败。佛朗哥夺取政权，建立了法西斯统治。——第 93 页。

123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军队的政训处大多变成了特务机构。它的任务是进行反共宣传，侦察和监视官兵的思想行动，以利于蒋介石个人对军队的控制。——第 94 页。

124 六中全会，指一九三八年十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第 102 页。

125 青帮，民间秘密团体。清初从漕运行业中发展起来，其成员主要是船工、手工业者、城市贫民、流氓无产者及破产农民等，其组织带有浓厚的宗教迷信和封建宗法制色彩。常为官僚军阀所收买和利用。但在辛亥革命中曾起过一些作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政变时，上海、武汉等地的青帮头子充当了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破坏革命的工具。

大刀会，民间秘密团体。清末产生时是白莲教支派，主要活动在山东、苏北、皖北一带，成员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曾在一些地区进行反抗封建压迫和外国传教士的斗争，并参加了义和团的反帝爱国运动。但也常被封建地主利用来镇压农民的反抗。——第 108 页。

126 董必武（一八八五——一九七五），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一九二四年任中共武汉地委书记、湖北省委委员，领导筹建了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任常务委员。——第 112 页。

127 陈潭秋（一八九六——一九四三），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一九二四年后历任中共武汉地委书记、湖北区委委员兼组织部长，曾参加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筹建工作。一九三九年任中国共产党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新疆办事处主任。一九四二年被军阀盛世才逮捕，一九四三年九月被秘密杀害。由于情况隔绝，在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第 112、185 页。

128 何叔衡（一八七五——一九三五），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当时是中共湘区委员会负责人之一，湘江中学校长，曾参加改组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工作。一九三一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监察委员、最高法院院长等职。一九三四年红军长征后留根据地坚持斗争。一九三五年二月在福建长汀突围战斗中牺牲。——第 112 页。

- 129 夏曦(一九〇〇——一九三六),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时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筹建工作,任常务委员。——第112页。
- 130 宣中华(一八九八——一九二七),一九二三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当时是中共杭州地委负责人之一,一九二四年参加筹建中国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当选为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在上海被蒋介石反动派逮捕,十二日就义。——第112页。
- 131 侯绍裘(一八九六——一九二七),一九二三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任中国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常务委员。一九二七年四月十日在南京被捕就义。——第112页。
- 132 李大钊(一八九九——一九二七),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当时是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负责人,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领导筹建国民党北京市、天津市、直隶省党部,主持国民党在北方的最高领导机关——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工作。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在北京被军阀张作霖逮捕,二十八日就义。——第112、322页。
- 133 于树德(一八九四——),一九二二年曾参加中国共产党。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现任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112页。
- 134 李永声(一八七二——一九五二),又名李锡九。一九二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在天津参加筹建中共顺直省委。一九二四年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参加筹建和领导国民党直隶省党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等职。——第112页。
- 135 于方舟(一九〇〇——一九二八),一九二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三年任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长。一九二四年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参加筹建和领导中国国民党直隶省党部。一九二七年秋领导河北玉田农民暴动时被俘,一九二八年春就义。——第112页。
- 136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孙中山从广州经上海到北京,准备同当时战胜了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府的段祺瑞、张作霖等谈判。他在北上宣言中主张对内“推倒军阀”,对外“推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并主张召集国民会议来解决这些问题。他在到达天津时已病重,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

- 日在北京逝世。——第 113 页。
- 137 一九二三年八月和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中国共产党先后两次发表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以代替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这一号召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孙中山对此采取积极支持态度。在全国范围内很快形成了一个以“召集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内容的人民运动。各地先后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一九二五年三月间，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第 113 页。
- 138 冯自由，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委员。
谢持，当时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一九二四年六月与张继等联名发出“弹劾共产党书”。一九二五年与邹鲁等发起西山会议。——第 113 页。
- 139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国民党右派邹鲁、谢持、居正、张继、林森等十余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等反动议案，在上海成立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北京成立“地方党部”。这批人被称为西山会议派。——第 113 页。
- 140 孙文主义学会，是国民党内的一批右派分子为对抗黄埔军校革命军人团体——“青年军人联合会”而建立的反动组织。主要头目有戴季陶、王柏龄、陈诚、贺衷寒、缪斌等。——第 114、155、166 页。
- 141 孙科，当时任国民政府广州市长。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曾提出弹劾共产党。——第 114 页。
- 142 五五宪草，是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宪法草案》的简称。这个“宪草”的主旨是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第 114、228、265 页。
- 143 李济深（一八八六——一九五九），早年曾任粤军第一师参谋长、师长。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留守广州，一九二七年参加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一九三三年联合十九路军在福建组织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抗日战争爆发后，支持中国共产党一致抗日的主张，联络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力量，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策。一九四八年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第 114、174、283 页。
- 144 邓铿（一八八六——一九二二），早年参加同盟会。一九一七年起任粤军参谋长、第一师师长等职。——第 114 页。
- 145 张发奎（一八九六——一九八〇），曾任粤军第一师团长，一九二五年任

-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第 114 页。
- 146 邓演达(一八九五——一九三一),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一。一九二〇年参加孙中山组织的粤军,历任营长、团长。一九二六年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北伐战争期间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等职。一九二七年三月与宋庆龄、何香凝、吴玉章等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通过了限制蒋介石权力的决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蒋介石下令通缉。汪精卫和蒋介石合流后,邓流亡苏、德等国。一九三〇年回国。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被蒋介石秘密杀害于南京。——第 114、166 页。
- 147 辛亥革命,指一九一一年(辛亥年)推翻清朝专制朝廷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年十月十日,一部分驻在湖北武昌的“新军”在革命团体策动下,发动了反对清朝统治的起义。由于各省相继响应,清政府的统治迅速瓦解。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 114、151、246、318 页。
- 148 新军,指清朝末年编练的新式陆军。辛亥革命前夕,由于革命党人的积极活动,各省新军中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倾向革命的人日益增多,新军就成为武昌和各地起义的重要力量。会党,指哥老会等旧中国的民间秘密团体。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曾利用会党举行武装起义。——第 114 页。
- 149 陈其美(一八七八——一九一六),早年参加同盟会,曾在江浙一带策动反清革命运动,同时在上海加入青帮为大头目。辛亥革命后任沪军都督。一九一二年初,指使蒋介石刺杀光复会著名领袖陶成章。——第 115、151 页。
- 150 中华革命党,参见注(2)。——第 115 页。
- 151 黄克强,即黄兴(一八七四——一九一六),一九〇四年组织反清革命团体华兴会,任会长。一九〇五年华兴会与兴中会、光复会联合组成中国同盟会,黄是同盟会中仅次于孙中山的重要领袖。一九〇七年起,多次参与或领导反清的武装起义。武昌起义后任革命军总司令。一九一二年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总长。一九一三年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第 115 页。
- 152 永丰舰,是广州革命政府的最大军舰。一九二二年陈炯明叛乱时,孙中山曾在此舰避难。孙中山逝世后改名“中山舰”。——第 115 页。
- 153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陈炯明勾结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背叛孙中山,炮击设在广州的总统府。——第 115 页。

- 154 王柏龄,当时任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积极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是“孙文主义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一九二五年代理黄埔军校教育长。——第 116 页。
- 155 王懋功,一九二五年任广州卫戍总司令,一九二六年二月被蒋介石免职。后投靠蒋介石,任国民党中央委员、江苏省政府主席、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职。——第 116、201 页。
- 156 鲁易(一九〇〇——一九三二),一九二一年参加少年共产党,一九二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历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党代表。一九三二年八月在洪湖战斗中被俘就义。——第 116 页。
- 157 青年军人联合会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领导组织的革命军人团体。成立于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以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联合粤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桂军军官学校等校的青年军人组成,主要成员有蒋先云、周逸群等。联合会积极宣传革命理论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革命力量,打击国民党右派势力,同反动的孙文主义学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后被蒋介石解散。——第 116、166 页。
- 158 一九二四年,英帝国主义用大量金钱、军火支持广州大买办陈廉伯所控制的反革命武装组织商团,企图颠覆广东革命政府。八月,广东革命政府扣留了陈廉伯为组织武装叛乱而偷运的军火。陈指使商团向孙中山请愿,并在全省各地煽动罢市。十月十日,广州群众为庆祝辛亥革命举行游行,遭到商团的射击,参加游行的十六个团体成立了“工农兵学革命大同盟”,发表宣言,坚决要求解散商团,严惩凶手。在中国共产党、广大工农群众和国民党左派的影响和支持下,孙中山采取断然措施,调集工农武装、黄埔学生及其他军队,在十五日消灭了这一反革命武装。——第 116 页。
- 159 为了声援“五卅”运动,香港工人在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九日开始举行总罢工,参加人数达二十五万;六月二十一日,广州沙面租界的中国工人也开始举行罢工。这两处反英的罢工合称为省(指省城广州)港罢工。六月二十三日,两处罢工工人合组省港罢工委员会,并成立纠察队,封锁香港和沙面租界,使英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受到严重打击。这次罢工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军占领武汉后,胜利结束。——第 116 页。

- 160 谭延闿(一八八〇——一九三〇),一九二四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一九二五年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一九二七年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武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等职。——第117、165页。
- 161 朱培德(一八八九——一九三七),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等职。——第117页。
- 162 程潜(一八八一——一九六八),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第117页。
- 163 一九二四年,彭湃创办广东省农民协会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至第五期由彭湃、阮啸仙等主办。一九二六年五月第六期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改名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由毛泽东任所长,肖楚女、彭湃、恽代英、周恩来、阮啸仙、赵自选等共产党人担任教员。这一期学员来自全国二十个省区,共三百二十七人,同年九月结业。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泽东在武昌又举办过农民运动讲习所,训练过一期学员。——第117页。
- 164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广州各界人民和黄埔学生军约十万人,为抗议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五卅”惨案,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游行队伍行经沙基时,遭到沙面租界内英法军队机枪扫射,当场被打死五十二人,重伤一百七十多人。这次事件被称为沙基惨案。——第117页。
- 165 许崇智(一八八六——一九六一),当时任粤军总司令。——第118页。
- 166 彭湃的堂哥彭汉垣,受彭湃的影响投身革命,一九二五年第一次东征后任海丰县长。一九二八年三月被捕,后在广州就义。——第118页。
- 167 陈延年(一八九八——一九二七),一九二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任中共两广区委书记。一九二七年四月在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五大”后,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一九二七年六月被捕,七月在上海龙华就义。——第118页。
- 168 鲍罗廷(一八八四——一九五一),第一次国共合作时苏联政府派到广州革命政府的代表和国民党的政治顾问。一九二三年十月来华,一九二七年“七一五”政变后回国。——第118、166页。
- 169 张国焘(一八九七——一九七九),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的第二、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在党的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一九三一年到鄂豫皖苏区第四方面军工作，任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一九三五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川西和四方面军会合后，任红军总政委。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了分裂党和红军的罪恶活动。一九三八年四月背叛革命，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随即被开除党籍。——第 119、140、159、213 页。

- 170 陈独秀（一八八〇——一九四二），一九一五年九月起主编《新青年》，一九一八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党成立以后的最初六年担任党的总书记。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其后，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否认无产阶级应继续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在党内成立小组，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后和托派组织相结合，一九三一年五月曾被自称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托派组织推为总书记。一九三二年被国民党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第 119、140、160、209 页。
- 171 加伦（一八九〇——一九三八），即布留赫尔，当时是苏联政府派到广州革命政府的军事总顾问。一九二四年来华，一九二七年“七一五”政变后回国。——第 120、170 页。
- 172 张静江（一八七七——一九五〇），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代理主席。一九二七年帮助蒋介石筹划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并促成了蒋、汪（精卫）间的反革命联合。——第 120 页。
- 173 张太雷（一八九九——一九二七），一九二〇年参加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二五年在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在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书记，并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中共两广区委常委、宣传部长。一九二七年四月在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八月出席“八七”会议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十月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兼任广东省委书记，十二月领导广州起义时牺牲。——第 120、174 页。
- 174 李福林，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军长。——第 120 页。
- 175 欧阳格，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海军总指挥、舰队司令。——第 121 页。

- 176 古应芬,一九二四年起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广东省民政厅长等职,一九二七年参与镇压广州起义。——第121、165页。
- 177 蒋先云(一九〇二——一九二七),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入黄埔军官学校,毕业后留校任政治部秘书,是青年军人联合会主要负责人之一。省港罢工时任工人纠察队总队长。一九二六年任国民革命军总部秘书、补充第五团团长、湖北省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总队长。一九二七年任第十一军二十六师七十七团团长兼党代表,五月二十八日在河南临颍战役中牺牲。——第121页。
- 178 李默庵,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党代表办公室少校干事。——第121页。
- 179 彭述之(一八九六——),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在上海大学任教并任《新青年》、《向导》编辑。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执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革命失败后,成为取消主义分子,采取了托洛茨基的反动立场,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后成为托洛茨基分子。——第123、159、216页。
- 180 陈果夫(一八九二——一九五一),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组织部代部长。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与其弟陈立夫一起组织“中央俱乐部”(即“CC”),控制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的特务系统。——第123、151、155页。
- 181 丁惟汾,当时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党务部主任;王法勤,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北京分会委员。
“大同盟”,是丁惟汾在“五四运动”以后组织的。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后,“大同盟”一度成为国民党北方执行部领导的组织。孙中山逝世后,“大同盟”逐步走上拥蒋反共的道路。——第123页。
- 182 李富春(一九〇〇——一九七五),一九二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期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第123页。
- 183 朱克靖(? ——一九四七),一九二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期间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党代表。抗日战争期间任新四军政治部顾问、苏浙行署主任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新四军联络部部长。一九四六年在我党争取郝鹏举部起义后任该部政治委员。一九四七年郝叛变时被扣,同年秋被国民党反动派在南京秘密杀害。——第123页。

- 184 罗汉,曾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在莫斯科学习时参加托派组织。——第123页。
- 185 林伯渠(一八八五——一九六〇),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期间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第123页。
- 186 一九一一年(辛亥)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取得胜利。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参议院议定将这一天作为国庆节,通称“双十节”。——第124页。
- 187 缪斌,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党代表。——第124页。
- 188 柯棣华(一九一〇——一九四二),原名德卡纳思·桑塔拉姆·柯棣,印度人。一九三六年毕业于格兰特医学院。一九三八年九月参加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华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一九三九年二月随印度援华医疗队突破国民党的阻拦到达延安。同年十二月赴晋东南抗日前线。一九四〇年八月到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学校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工作。一九四一年一月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十二月九日在河北唐县逝世。——第126页。
- 189 两岩,即红岩、曾家岩。红岩,指重庆市郊区化龙桥红岩嘴十三号,抗日战争期间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所在地。曾家岩五十号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在市内的办公地点。——第128页。
- 190 斯大林说过的三点,见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原文是:“正确领导,这就是说:第一、正确地决定问题,而要正确地决定问题,就非考虑群众的经验不可,群众能亲身体会到我们领导的结果;第二、组织对正确决定的执行,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非有群众方面的直接帮助不可;第三、组织对这种决定的执行情况的检查,要做到这一点,还是非有群众的直接帮助不可。”(《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145—146页)——第129页。
- 191 参见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139—140页)。——第131页。
- 192 参见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141页)。——第131页。
- 193 一九四〇年六月,法西斯德国侵占巴黎后,以当时法国总理贝当为首的

卖国分子向德国投降，七月一日将政府迁至维希，组织维希傀儡政府。——第 133 页。

- 194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法西斯德国片面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未经宣战向苏联发动突然进攻。苏联人民在斯大林为首的党和政府领导下，开始了卫国战争。——第 133、202 页。
- 195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晨，日本未经宣战，以海空军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主要海空军基地珍珠港，使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惨重损失。十二月八日，美英对日、德国对美正式宣战，太平洋战争从此开始。十二月十日，日本空军又在新加坡附近海面袭击英国远东舰队，使英舰队遭到重大损失。——第 133、202 页。
- 196 西班牙内战期间（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在共和国后方有许多叛徒、间谍和破坏分子进行反革命活动。一九三六年十月，西班牙叛军和德、意法西斯联合进攻西班牙共和国首都马德里时，叛军将领摩拉在广播中扬言，他的四个纵队正在进攻马德里，而第五纵队已在首都等待着。后来，第五纵队就成了帝国主义在别国进行颠覆、破坏活动时收买的叛徒和派入的间谍的通称。——第 133 页。
- 197 列宁格勒保卫战：一九四一年九月德国侵略军包围列宁格勒，苏联军民展开了英勇的列宁格勒保卫战，历时十六个月，消灭了德军及其仆从军二十五万人。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八日苏军击破德军的包围封锁，列宁格勒解围。
- 莫斯科保卫战：一九四一年九月至十一月间，德军集中七十多个师向莫斯科大举进攻。苏军以三个方面军的兵力和广大人民一起进行了顽强的防御，十二月六日转入反攻，到一九四二年一月共歼灭德军五十个师，粉碎了希特勒的“闪击战”计划。
-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七日德国侵略军开始猛攻斯大林格勒，先后使用一百五十万以上的兵力，企图占领该城，切断伏尔加河，控制高加索地区，北攻莫斯科。苏军先后以三个方面军的兵力同广大人民一起艰苦奋战，在顽强的防御战中消灭了大量敌人。十一月十九日转入反攻，二十三日包围了三十三万德军，一九四三年二月二日将其全部歼灭。这一战役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第 133 页。
- 198 大西洋宪章，指美国总统罗斯福同英国首相丘吉尔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

日在大西洋的纽芬兰海面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宣言。当时德、日法西斯的侵略已使英、美两国受到损失，中国、苏联和全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空前高涨。英、美两国在宣言中宣称：两国不追求领土或其他方面的扩张；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择其政府形式的权利；赞同摧毁德国纳粹暴政和解除侵略国家的武装等。——第 133 页。

- 199 苏英同盟，全称《苏英战时反对希特勒德国及其欧洲盟国并在战后合作互助同盟条约》，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在伦敦签订。主要内容是：苏、英两国在反对德国法西斯战争中结成互助同盟；战后采取一切措施防止德国重新侵略；双方决不参加反对另一方的任何同盟或集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英国参加了北大西洋集团和北大西洋集团成员国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签订了巴黎协定，一九五五年五月七日苏联宣布废除这个同盟条约。

苏美协定，亦称苏美贸易协定。一九三七年八月四日苏、美以互换照会的办法签订，并规定每年展延有效期。一九四二年苏、美双方达成协议，将协定的效力一直维持到它被更广泛的协定所代替或一方声明希望停止生效时为止。根据这个协定，两国在有关货物输出输入各项问题上享有无条件的和无限的最惠国待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宣布一九三七年的协定无效，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断美、苏原来的互惠贸易关系。——第 133 页。

- 200 二十六国公约，即《联合国宣言》。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波兰、印度和加拿大等二十六个参加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国家在华盛顿发表共同宣言。到一九四五年三月一日止，法国、墨西哥和菲律宾等二十一国陆续表示赞同这一宣言。宣言的主要内容：（一）签字国保证使用全部军事和经济资源，共同对抗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二）各国保证不同敌国单独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第 133 页。

- 201 一九四〇年六月，法西斯德国侵占巴黎，法国贝当政府投降后，法国共产党在国内领导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斗争，从组织总工、罢工到建立游击队进行武装斗争，至一九四四年六月，游击队已发展到二十多万人。戴高乐将军在国外组织自由法国运动，建立民族解放委员会。一九四三年一月法国共产党和民族解放委员会签订合作协定，六月三日统一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在阿尔及尔宣告成立，法共议员密台尔、法戎以个人名义参加。一九四四年四月一日民族解放委员会第二次改组，法国共产党正式派出代表参加。——第 134 页。

- 202 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旅居国外的德国人建立的反法西斯组织。一九四三年七月在莫斯科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参加的有德国反法西斯的国会议员、省议会议员、科学家、工程师和德国战俘营代表,正式成立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通过了宣言,选举出著名作家怀尔纳特为委员会主席。——第 134 页。
- 203 冈野进,即野坂参三(一八九二——)。一九四〇年三月到延安,组织和领导了“日本在华士兵反战同盟”。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国,任日共主席、名誉主席。——第 134 页。
- 204 墨索里尼(一八八三——一九四五),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法西斯主义的创始人。一九二二年用暴力夺取政权,建立了法西斯专政。一九三九年同德国缔结政治、军事同盟,次年追随德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四三年七月,由于军事失败和国内反法西斯运动的高涨,墨索里尼的独裁政权垮台;墨逃到意大利北部,充当德占区傀儡政权头子。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八日,被意大利游击队处死。——第 134 页。
- 205 一九四一年三月起,华北的日军和汉奸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对解放区进行“扫荡”,在游击区实行“大检举”,在敌占区实行保甲制度,调查户口,扩组伪军,以镇压抗日力量。——第 135 页。
- 206 吴开先是追随汪精卫投降日本侵略者的国民党官员,一九四三年五月带着日本招降蒋介石的条件,由南京到重庆,蒋介石曾亲自接见。——第 135 页。
- 207 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日本大本营报道部部长谷萩那华雄发表对蒋介石的诱降谈话,内容是:倘同意停止抵抗,参加反美、英之战线,则日军将由中国撤退,承认中国之独立。——第 135 页。
- 208 解放区的抗日民主政权,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人员的分配上,规定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简称为“三三制”。——第 136、154、161、253 页。
- 209 一九四一年一月,取得国民党当局同意由皖南北移的新四军,在安徽泾县茂林镇遭到国民党军队发动的突然围攻。经过九个昼夜的浴血战斗,叶挺团长负伤被俘,九千多名指战员大部英勇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蒋介石在一月十七日宣布新四军“叛乱”,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团长交“军法审判”。二十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任

- 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二十二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发表谈话，针锋相对地驳斥了国民党反动派对新四军的诬蔑，提出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惩办皖南事变祸首等十二条严正要求。——第 137、175、201、219、235 页。
- 210 一九四三年六月，在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期间，胡宗南从担任河防的三个军中调出两个军，准备闪击陕甘宁边区，发动内战。延安人民举行大会，动员保卫边区。毛泽东写了《质问国民党》一文，历数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罪行，揭露其进攻边区的阴谋。蒋介石被迫停止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第 137 页。
- 211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至十四日在延安举行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报告中指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经验，表明了当资产阶级追随着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的时候，革命是如何地前进了；及至无产阶级（由共产党负责）在政治上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的时候，革命又是如何地遭到失败。这种历史不应当重复了。”（《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41 页）——第 143 页。
- 212 见《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原文是：“法西斯是资本家对劳动人民大众的最猖狂的进攻；法西斯是肆无忌惮的沙文主义和侵略战争（旧的译文是：‘法西斯主义——就是横行无忌的民族侵略主义和强盗的战争’。本文引用的是旧译文——编者注）；法西斯是疯狂的反动和反革命；法西斯主义是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最恶毒的敌人！”（《季米特洛夫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 45—46 页）——第 143 页。
- 213 我国边疆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往往被称为“藩部”，历代都有职官专管或兼管民族事务，例如清代专设了理藩院，掌管蒙古、西藏、新疆等地的少数民族事务。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主要是用镇压和笼络的两手政策对待边疆各少数民族。蒋介石在民族问题上继承了这种政策，甚至否定少数民族的存在，把各少数民族称之为汉族的大小宗支。——第 144 页。
- 214 见斯大林《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 566 页。——第 144 页。
- 215 见古文《尚书·大禹谟》。这段引文是书中舜教导禹的几句话。意思是：民心很危险，危则难安；道心很幽微，幽则难明；要专心致志地研究，以掌握

其中的奥妙。——第 145 页。

- 216 见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 105 页。——第 145 页。

- 217 见《礼记·中庸》。原文是：“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

《中庸》把“诚”说成是人人具有的天赋道德，同时又是客观事物的总规律。有了诚，才会有万物的存在；如果不诚，就没有客观事物。这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文中的“无物不诚”、“有物不诚”是引申“不诚无物”一语，用唯物主义观点对蒋介石进行揭露与讽刺。蒋介石否认共产党必然存在的客观事实，妄想消灭共产党，所以说他是“无物不诚”。人民革命力量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公开承认了边区存在的客观事实，但他仍然想一手取消，所以说他是“有物不诚”。——第 145 页。

- 218 庐山谈话会，指一九三七年七月国民党政府在庐山召开的“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座谈会。——第 146、194 页。

- 219 蒋介石鼓吹的力行哲学，是割裂知行关系，孤立强调“行”的作用的主观唯心主义愚民哲学，是极端反动的法西斯主义哲学。——第 146 页。

- 220 连坐法是旧社会统治阶级残酷镇压人民的一种法律。它规定一人有罪，家属、亲友甚至邻居也连带给予治罪。《史记·商君列传》：“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蒋介石为巩固法西斯统治，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分别在地方和军队中推行连坐法。——第 146 页。

- 221 希特勒（一八八九——一九四五），德国法西斯头子。一九一九年参加德意志工人党（次年改为国社党），其后成为该党党魁。一九三三年在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支持下出任总理，次年总统兴登堡死后自称国家元首，实行法西斯统治，积极扩军备战。一九三九年九月入侵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四一年六月大举进攻苏联。一九四五年苏军解放柏林时自杀。——第 146 页。

- 222 四维八德是封建统治阶级提倡的道德规范。四维，指礼、义、廉、耻；八德，指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第 146 页。

- 223 《皇朝经世文编》，清贺长龄编，共一百二十卷，选辑清初至道光以前的官方文书、论著、奏疏、书札等，包括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部分。

陈弘谋，一作宏谋，清雍正进士，东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所编《五种

遗规》，采辑历代有关修身、治家、处世、居官、教育等方面的著作、言论和事迹，分为五类，即《养正遗规》、《训俗遗规》、《教女遗规》、《从政遗规》和《在官法戒录》。——第 147 页。

- 224 曾，即曾国藩（一八一——一八七二），晚清官僚，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主将。一八五二年为镇压太平军，开始在湖南招募、训练地主武装——团练。因士兵和将领大多用其家乡湘乡人，故名湘军。湘军自上而下有严密的封建隶属关系，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统领。中国近代军阀军队从湘军开始，以后袁世凯、段祺瑞直到蒋介石，都继承了这个传统。

胡，即胡林翼（一八一——一八六一），在贵州任知府期间镇压苗民起义，一八五四年后到湖北、江苏等地镇压太平军，是湘军中仅次于曾国藩的首领。

左，即左宗棠（一八一——一八八五），一八六〇年任湖南巡抚的幕僚时，招募人马组成左系湘军，又叫楚军，在江西、安徽镇压太平军。一八六六年后又连续镇压捻军和西北回民起义，成为著名的湘军军阀。

李，即李鸿章（一八二三——一九〇一），淮军军阀。一八六一年受曾国藩之命，回安徽原籍将淮南团练按湘军方式加以改编，组成淮军，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第 148 页。

- 225 拿破仑·波拿巴（一七六九——一八二一），即拿破仑第一，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一七九九年法国大资产阶级支持下发动雾月十八日（十一月九日）政变，自任第一执政。一八〇四年称帝，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第 148 页。

- 226 “三二〇”事变，参见本书《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一文（第 120—121 页）。——第 148、159、208 页。

- 227 “宁”，指南京政府；“汉”，指武汉政府。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迫于革命群众运动的声势，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推动下，采取了“联共反蒋”的态度。四月十七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蒋介石党籍；同日武汉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罢免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全部职务，并申讨蒋介石。四月十八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自任主席，并通过“清党”等反革命决议案，通缉共产党员，宣布武汉国民政府及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一切决议为非法。这时出现的南京与武汉两个国民政府对峙的局面，称为“宁汉分家”。

同年五月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逐步公开走上反共的道路。七

- 月十五日汪精卫举行“分共”会议，正式决定与共产党分裂，公开屠杀共产党员。从此“宁汉合作”，蒋汪反革命合流。——第 148、208 页。
- 228 《礼运》大同篇，指《礼记·礼运》篇中对于“大同”之治的论述。“大同”是儒家宣传的理想社会，是小生产者的空想。——第 150 页。
- 229 张宗昌（一八八一——一九三二），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统治山东的军阀。早年在上海陈其美部下当团长。一九一三年投靠直系军阀，后投靠奉系军阀。——第 151 页。
- 230 陶成章（一八七八——一九一二），一九〇四年在上海参加组织光复会，是该会领导人之一。一九〇六年参加同盟会。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起义后，发动上海、浙江等地的反清起义。一九一二年一月被陈其美、蒋介石暗杀于上海。——第 151 页。
- 231 《曾胡治兵语录》是蔡锷编辑的曾国藩、胡林翼关于治兵言论的小册子。——第 151 页。
- 232 西安事变，参见本书《关于西安事变的三个电报》一文的题解。——第 152、191、247、252 页。
- 233 一九三八年三月国民党在汉口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内容包括抗战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政策。这是一个两面性的纲领。一方面被迫对人民作了某些形式上的让步，如规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许诺给予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同时又继续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由于蒋介石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纲领中对人民的某些形式上的让步也成为一纸空文。——第 152、252 页。
- 234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国民党政府规定由官僚资本控制的中央、中国、交通银行（后来又加上农民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为法定的全国统流通的货币，称为法币。——第 153 页。
- 235 一九二六年“三二〇”事件后，蒋介石为加强黄埔军校学生的控制，四月解散了青年军人联合会（同时也取消了孙文主义学会），七月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自任会长。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这个同学会成为蒋介石笼络和控制嫡系军事骨干的组织。——第 155 页。
- 236 康泽（一九〇六——一九六七），原国民党特务头子。曾任国民党军委会别动队总队长、三青团中央团部组织处长等职。一九四七年任国民党军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长官，一九四八年七月在襄樊战役中被我军俘虏。一

- 九六三年被特赦后，任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第 155 页。
- 23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十六日在莫斯科举行。会上讨论了中国问题，并作出了决议。决议指出：“中国革命在目前发展阶段上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性质”。——第 158 页。
- 238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二年七月在上海召开。大会宣言明确指出：“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第 158 页。
- 239 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指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次革命的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当时，在要不要彻底推翻沙皇制度和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上，各党派之间发生了重大分歧。一贯支持沙皇政府内政外交政策的立宪民主党，欺骗工农，散布不经过革命和起义就可以实现人民所需要的制度的幻想；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内的孟什维克，主张把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反对武装起义，对沙皇政府实行妥协；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坚决反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错误路线，揭露立宪民主党维护沙皇制度的反革命实质，指出只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保证革命的彻底胜利，并号召和领导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这次革命由于阶级力量对比悬殊和没有形成巩固的工农联盟，遭到了失败，但它成为十月革命的预演。——第 158 页。
- 240 莫斯科中山大学，全称为“孙中山中国劳动者大学”，一九二五年成立于莫斯科，一九二九年改称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一九三〇年秋停办。——第 158 页。
- 24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一九二八年二月九日至二十五日在莫斯科举行。会上讨论了中国问题，并作了决议。——第 158 页。
- 242 二月革命，指俄国的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历）彼得格勒的工人举行反沙皇制度的罢工。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罢工很快转为起义，首都卫戍部队也参加了起义，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革命后，成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资产阶级则在小资产阶级妥协派支持下成立临时政府，形成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因此，布尔什维

克又领导人民为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第 158 页。

24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八日至三十日在莫斯科举行。由于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全会专门讨论了中国问题，并通过了《中国问题》的决议。——第 159 页。

244 罗易，曾是印度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七年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过中国。后来成为叛徒，一九二九年被开除出印度共产党和共产国际。

多里欧当时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候补委员，一九二七年曾来过中国。——第 159 页。

245 罗米那兹（一八九七——一九三五），苏联人。一九二七年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中国。武汉“七一五”政变后，参加中共“八七”会议的领导工作，提出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认为不经任何阶段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批判了这种错误观点。——第 160 页。

246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反击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反革命势力，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直接领导下，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占领了南昌。这次起义，打响了中国人民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参加起义的部队是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和朱德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导团等部三万余人。起义部队八月五日撤离了南昌南下广东。九月底在潮汕一带遇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保存下来的起义部队，一部分在彭湃、颜昌颐等率领下，同海陆丰起义和广州起义撤出的武装力量相会合，在东江地区继续活动；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一九二八年四月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会合，合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军。——第 160、246 页。

247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关于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等。会议否认革命处于低潮，认为“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形势”，“敌人的屠杀进攻，反而证明革命潮流之高涨”，规定党的任务是“努力鼓动各地城乡革命的高潮，创造总暴动的局面”。会议还认为“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第 160 页。

- 248 十大要求,指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十条政纲: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四、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七、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耕地归农;八、改善兵士生活,给兵士以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第 161 页。
- 249 参见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的报告》。文中说:“被剥削者苏维埃这种形式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也适用于还保有资本主义前的关系的国家,而且必须指出,在落后国家和殖民地,……只要条件允许,就应该立即设法建立劳动者苏维埃。”(《列宁全集》,第 31 卷第 213 页)——第 161 页。
- 250 两权并立是资产阶级创立的一种政治制度,即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的议会制。议会行使立法权,政府行使行政权,两者互相制约。——第 161 页。
- 251 南四行,指当时的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寄庾)、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第 163 页。
- 252 这两次屠杀,参见注(9、10)。——第 163 页。
- 253 一九二七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分子在上海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他们反对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同时也不赞成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五年第三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各党各派合作抗日、共赴国难的号召,积极参加抗日活动。一九四一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九四七年改称农工民主党。一九四九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工民主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民主党派之一。——第 163 页。
- 254 史量才(一八七八——一九三四),一九一三年起任《申报》总经理。蒋介石统治初期采取拥蒋立场,“九一八”以后政治态度逐步改变。上海“一二八”抗战时,曾捐款支持抗日,并任抗日群众组织上海地方协会会长,后来又积极支持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被蒋介石特务暗杀。
杨杏佛(一八八三——一九三三),一九二五年随孙中山北上,任秘书。后任东南大学工学院院长、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职。一九

- 三二年同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总干事，进行反蒋抗日的进步活动。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被蒋介石特务暗杀。——第164页。
- 255 孙科，一九二七年任武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第165页。
- 256 唐生智（一八八九——一九七〇），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湖南省主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第165、211页。
- 257 机器工会，原名“广东机器研究公会”，后改名为“广东机器工会”，是国民党右派利用的工具。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后，反对和破坏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一九二六年一月公开发表宣言反对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四一五”反革命政变时，协助反革命政权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同年十二月参与镇压广州起义。——第165页。
- 258 吴铁城（一八八八——一九六三），一九二四年任广东革命政府东路讨贼军第一路军司令、广东警卫军司令、国民党广州市党部执行委员，一九二六年任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十七师师长。——第165页。
- 259 马超骏（一八八六——一九七七），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是国民党控制的黄色工会头子。——第165页。
- 260 胡毅生，胡汉民堂弟。一九二五年在广州参加创办国民党右派报纸《国民新闻日报》，积极反共。廖仲恺被刺后，潜逃香港。——第165页。
- 261 参见孙中山《致蒋介石手札》（见《孙中山选集》第876页）。精卫，即汪精卫；展堂，即胡汉民。——第166页。
- 262 瞿秋白（一八九九——一九三五），一九二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主编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向导》。在中国共产党第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后，主持了八月七日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这次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的统治。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二八年春主持中央工作时，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二八年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一九三〇年九月主持召集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

- “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六届四中全会上，遭到王明等“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的打击，被排斥于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之外。此后，在上海同鲁迅合作从事革命文化运动。一九三四年到江西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教育委员。同年十月红军主力长征后，被留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一九三五年二月在福建游击区被国民党军逮捕，六月十八日在福建长汀就义。——第166页。
- 263 汪陈宣言，指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汪精卫和陈独秀在上海发表的联合宣言。这个宣言极力掩盖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活动，声称“国民党……决无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同时又表示“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错误，也不至于主张打倒自己的友党……国民党”。宣言使工人阶级解除思想上的武装，放松对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警惕。——第 166 页。
- 264 吴稚晖（一八六六——一九五三），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一贯支持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坚决反苏反共。——第 166、228 页。
- 265 中共中央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紧急会议上决定，利用当年的秋收时节在湘、鄂、粤、赣四省举行农民武装暴动。会后，在各地党组织领导下，举行了多次农民起义。参见注（18）、（275）。——第 168 页。
- 266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三日，在张太雷、苏兆征、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等领导下，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和广州工人赤卫队为主力在广州发动起义，起义部队曾占据市内绝大部分地区，一度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起义失败后，起义武装中的一部分与彭湃领导的东江农民起义武装会合；一部分转移到广西，以后参加了左、右江的农民武装起义；一部分参加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转战到了井冈山。——第 168、212 页。
- 267 布哈林（一八八八——一九三八），当时任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第 168 页。
- 268 十月革命前夕，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召开扩大会议，选出领导起义的党总部。会上中央委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起义。他们在自己的意见遭到否决后，竟在孟什维克的《新生活报》上发表声明，宣称反对布尔什维克准备起义的冒险行动，公开向敌人泄露了党中央关于在最近期间举行起义的决定。——第 169 页。
- 269 谭平山（一八八六——一九五六），一九二〇年组织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三、四、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中央委员。第一

- 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历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组织部长、农民部长和武汉国民政府委员等职。曾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以后脱离中国共产党,参加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抗日战争时期,反对蒋介石的卖国独裁政策。一九四五年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一九四八年参加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等职。——第169页。
- 270 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被国民党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解散,军校学生被改编为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第169页。
- 271 张作霖(一八七五——一九二八),北洋奉系军阀首领。曾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长期统治东北。一九二四年打败直系军阀后,他的势力伸入关内。一九二六年又联合直系军阀吴佩孚入据北京。后来和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利害冲突,一九二八年六月在退回东北的路上,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炸弹炸死。——第170页。
- 272 伍廷康(一八九三——一九五三),原名魏金斯基,苏联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一九二〇年春来中国了解情况,并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作为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代表第二次来中国。——第170页。
- 273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蒋介石、汪精卫唆使湖南的国民党反革命军官许克祥、何键等,在长沙围攻湖南省工会、省农民协会等革命群众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及革命的工农群众。这次事变是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反革命派和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反革命派公开合流的前奏。当时的文电习惯以通行的诗韵目代替日期,以诗韵第二十一韵的“马”字来代替二十一日,所以这次事变又称为“马日事变”。——第170页。
- 274 顾孟余(一八八九——一九七二),当时任武汉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第170页。
- 275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指湖南江西边界地区修水、萍乡、醴陵、平江、浏阳等县的人民武装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举行的起义。后来这次起义的工农武装和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转战到井冈山,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第172页。
- 276 一九二七年九月初,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为防贺龙、叶挺部入粤,让国民党广西省政府主席兼广州政治分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

- 黄绍竑率军驻守北江。当时统治广州的汪精卫，担心黄绍竑的势力伸展到广东，派张发奎率第四军回粤挡截黄的军队。——第 174 页。
- 277 东方大学，全称是“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一九二一年创办于莫斯科。它的任务是为苏联东方各共和国培养干部和为帝国主义殖民地、附属国培养革命干部。三十年代末停办。——第 175 页。
- 278 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指一九〇六年由沙皇政府大臣斯托雷平颁布的土地法令。主要内容是：允许农民退出村社，可以把自己的份地变成私产；富农可以用贱价收买土地。这个法令的实行，使村社瓦解，富农地位加强，少地农民和贫民的状况恶化，农民的分化加剧。——第 176 页。
- 279 恽代英（一八九五——一九三一），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三年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创办《中国青年》。一九二六年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同年三月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在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六届二中全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三〇年五月六日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在南京就义。——第 179、333 页。
- 280 陶行知（一八九一——一九四六），人民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早年留学美国。一九一六年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南京、上海郊区创办晓庄学校和山海工学团，推行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运动。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后，参加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上海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抗日战争期间，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和国民党统治区反独裁反内战的政治活动，并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一九四五年春参加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抗战胜利后在国民党统治区继续从事民主运动。——第 179、238、263、333 页。
- 281 职工国际，又称赤色工会国际。一九二一年成立，一九三七年底解散。——第 182 页。
- 282 李明瑞（一八九六——一九三一），一九二九年任国民党广西绥靖公署主任、军事特派员。同年十月下旬和一九三〇年二月，他和所属部队在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下相继举行右江、左江起义，先后成立红七军、红八军，李任两军总指挥。一九三〇年二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率红七军转战到达中央苏区，同年牺牲。——第 183 页。

- 283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参谋长赵博生(共产党员)、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等领导下,在江西宁都县举行武装起义。起义部队编为红军第五军团。——第183页。
- 284 沈泽民(一九〇二——一九三三),中共早期党员。曾在我党领导的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任教。一九三一年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长。——第184页。
- 285 向忠发,一九二八年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总书记。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被捕叛变,二十四日被国民党枪杀。——第184页。
- 286 任弼时(一九〇四——一九五〇),一九二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共青团中央总书记。——第185页。
- 287 李富春,一九二八年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代理书记、上海法南区委书记等职。——第185页。
- 288 关向应(一九〇二——一九四六),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当时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在党的第六、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第186页。
- 289 文委,指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化工作委员会。——第188页。
- 290 《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报纸。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在汉口创刊,同年十月二十五日迁到重庆继续出版。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被国民党反动派强迫停刊。——第188、200页。
- 291 延安文教大会,即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第188页。
- 292 察北同盟军,即一九三三年五月冯玉祥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察哈尔省组织的民众抗日同盟军。主要领导人还有吉鸿昌(共产党员)、方振武等。同盟军在张北、沽源等地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激烈战斗,把日伪军完全逐出察哈尔省境。由于蒋介石和日本侵略军的双重压迫,同盟军的抗战活动于同年十月失败。——第191页。
- 293 福建人民政府,是国民党内同蒋介石分裂的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在福州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这年十月,蒋光鼐、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同红军签订了抗日反蒋协定。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又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

- 签订了停战协定。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下，福建人民政府在一九三四年一月间失败。——第 191 页。
- 294 这封信指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信中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决定的反动方针，作了义正词严的批判，同时申明了中国国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准备重新实行国共合作的政策。——第 192 页。
- 295 中国共产党为了以实际行动促成全国抗日的实现，由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东渡黄河抗日，遭到了蒋介石、阎锡山的武力阻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鉴于国难当前，应以实现全国抗战为根本，不愿和阻拦我抗日去路的国民党部队进行战斗，五月五日发表回师通电，将抗日东征军撤回黄河西岸。——第 192、248 页。
- 296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爱国示威游行，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游行的学生遭到国民党政府镇压。次日，北平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十六日，学生和市民一万余人，再度举行示威游行。这次爱国运动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形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第 192、247 页。
- 297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宁夏环县山城堡，红军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一部歼灭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七十八师二三二旅全部和二三四旅两个团，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后一战。——第 192 页。
- 298 潘汉年，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六年任我党代表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同年秘密叛变，成为国民党潜藏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奸细。一九四六至一九四八年在上海、香港等地我党情报、统战部门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市副市长。一九五五年他的反革命面目被揭露。——第 192、238 页。
- 299 王以哲（一八九六——一九三七），东北军爱国将领。西安事变时任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由于张学良被蒋介石扣留，东北军内部在如何营救张的问题上发生分歧。部分少壮派军官主张用武力解决，王以哲等主张和平解决。在反动势力的挑动下，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王以哲被少壮派刺杀。——第 193 页。
- 300 这个报告，指毛泽东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所作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

时期的任务》的报告，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本文内所说毛泽东在五月代表会上作的报告，也是指这篇文章。——第193页。

301 这篇文章指《我们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一文。载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1卷第2期。——第194页。

302 王世杰，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第194页。

303 林伯渠，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八年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抗日战争期间曾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第195、253页。

304 一九三七年二月中旬至三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在西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谈判，重申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中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四项保证是：（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改编为一个军四个师，每师一万五千人），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在谈判中周恩来还提出恢复张学良的自由、复职授权等问题。因国民党的阻挠，谈判无结果，最后只达成了在西安设中共办事处的协议。

一九三七年三月西安谈判后周恩来来到杭州同蒋介石谈判，再次重申了我党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蒋介石则提出收编红军等无理要求。周恩来严正予以拒绝，同时仍坚持继续谈判。

一九三七年六月周恩来到庐山同蒋介石、宋子文谈判。在设八路军总指挥部和人事任命问题上，双方争论很久未得解决。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递送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十七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在庐山继续谈判。“八一三”以后，蒋介石被迫在九月二十二日公布上述宣言并同意八路军设立总部。——第195页。

305 顾祝同（一八九二—— ），一九三七年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主任兼西安行营主任。皖南事变时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第195、201页。

- 306 一九三七年九月间，八路军的三个师先后开抵山西抗日前线。九月二十五日，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伏击日军，歼敌板桓师团一部约三千人。这是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所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第195页。
- 307 这个协定，指一九三七年八月苏联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第197页。
- 308 徐向前（一九〇二—— ），一九三九年被中共中央派往山东，任第一纵队司令、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第198页。
- 309 鹿钟麟（一八八六——一九六六），当时任国民党政府河北省主席，在蒋介石的指令下曾和八路军进行摩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
张荫梧，当时任国民党河北省民军总指挥，不断制造摩擦，进攻八路军，一九三九年六月率部袭击河北深县八路军的后方机关，惨杀八路军干部和战士四百余人。——第198页。
- 310 朱怀冰，当时是国民党军第九十九军军长。一九四〇年二三月间，蒋介石指令其纠合庞炳勋、张荫梧、侯如墉等部，三路进攻太行区域的八路军，被八路军彻底击败。
石友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军团总司令，在河北省南部联合日军进攻八路军，摧残抗日民主政权，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第200页。
- 311 高树勋（一八九八——一九七二），当时任国民党军新八军军长。曾奉蒋介石命令在河北一带同八路军摩擦。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十日率领一个军和一个纵队在邯郸内战前线起义。一九四六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第200页。
- 312 汤恩伯（一八九八——一九五九），当时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国民党军豫鲁苏皖边区总司令，驻守河南，积极推行反共反人民政策。——第200页。
- 313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二日，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奉蒋介石的密令，派兵包围新四军设在湖南平江嘉义镇的通讯处，惨杀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六人，这就是平江惨案。——第200页。
- 314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一、十二两日，河南确山、信阳、泌阳等县的国民党反动武装一千八百余人，围攻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惨杀新四军伤员和他们的家属以及群众共二百余人，这就是竹沟惨案。——第200页。

- 315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阎锡山在蒋介石的指使下集中六个军的兵力，向驻在山西西部的的新军进攻。这次进攻被新军的反击所粉碎。同时，阎军又在山西东南部进攻新军，摧残阳城、晋城、长治、沁水等地抗日民主政府和人民团体，屠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第200页。
- 316 这次谈判是指一九四〇年六月在重庆同国民党进行的谈判。——第200页。
- 317 参看《诗经·小雅·巷伯》：“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谮，进谗言，说人的坏话；畀，给予；北，指北方寒冷的不毛之地。——第201页。
- 318 “皓电”是蒋介石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在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九日（皓）发给八路军和新四军领导人的电报。“皓电”对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大肆污蔑，强迫命令黄河以南的抗日部队限期撤到黄河以北。为了顾全大局，中共中央以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名义，在十一月九日（佳）电复何、白，除据实驳斥“皓电”的造谣以外，答应将皖南新四军部队移到长江以北。——第201页。
- 319 一九四〇年七月十六日国民党提出所谓“中央提示案”，主要内容是：取消陕甘宁边区，代以陕北行政区公署，归陕西省政府领导；缩编八路军、新四军，并限制其防地。十月十九日蒋介石以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在“皓电”中将所谓“中央提示案”以最后决定的形式向我党提出。——第201页。
- 320 两个军，指国民党军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所属苏鲁皖游击总队总指挥李明扬的部队和李守维的八十九军。——第201页。
- 321 陈毅，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六年先后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代理军长。——第201页。
- 322 日苏协定，指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苏日双方代表在莫斯科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一九四五年四月五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废除这一条约。——第202页。
- 323 新疆问题，指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间，新疆独裁统治者盛世才为了投靠蒋介石，抛弃革命伪装，大肆逮捕和杀害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反革命事件。——第202页。
- 324 张群，从一九四〇年起任国民党军成都行辕主任、四川省政府主

- 席。——第 202、266 页。
- 325 董必武，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之一。——第 202 页。
- 326 邓颖超（一九〇四——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之一。——第 202 页。
- 327 张治中（一八九〇——一九六九），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等职。一九四五年任国民党军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国共谈判的国民党代表。一九四六年代表国民党参加军事三人小组。一九四九年任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北平进行谈判，双方代表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为国民党政府拒绝后，张留住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第 203、257、319 页。
- 328 一九四四年春，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先后在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西安等地组织各种群众团体，利用报刊和集会讨论宪政，抨击国民党的法西斯专政，要求民主自由，主张开放政权，实行宪政，得到全国各界人士的广泛响应。——第 204 页。
- 329 赫尔利，美国共和党政客。一九四四年九月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身份来华，十一月间曾到延安同我党商讨和国民党成立联合政府等问题。同年底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因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政策，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离职。——第 205、254 页。
- 330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和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两次由延安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第 205 页。
- 331 民盟，是“中国民主同盟”的简称。一九四一年成立，原名“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九四四年改今名。成员主要是文教界知识分子。一九四七年被国民党政府宣布为非法团体。一九四八年一月在香港重建组织。同年五月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一九四九年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盟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民主党派之一。——第 205、259、275、283 页。
- 332 国民党政府曾决定在一九三六年召开“国民大会”。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颁布了“宪法草案”（即五五宪草），并规定自七月起选举国大代表，十一

- 月十二日开会。但这次大会没有开成。——第 206、228、243 页。
- 333 斯科比,英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驻希腊盟军司令。一九四四年十月,德军在欧陆败退,斯科比率领英军,带着流亡在伦敦的希腊反动政府进入希腊,指使并协助希腊反动政府向长期英勇抵抗德军的希腊人民解放军进攻,屠杀希腊爱国人民。——第 206 页。
- 334 陈赞贤(一八九四——一九二七),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一月被选为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和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同年三月六日在赣州被蒋介石反动派杀害。——第 209 页。
- 335 瓦窑堡会议,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在陕北子长县瓦窑堡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二十五日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这个决议全面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批判了成为当时党内主要危险的关门主义,同时也指出了在新的革命时期预防右倾机会主义复活的必要性。——第 210 页。
- 336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上海工人在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一日两次举行武装起义,均遭失败。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推翻了北洋军阀在上海的统治,建立了上海市民代表政府。——第 212 页。
- 337 这是针对王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报告中的错误观点的批评。——第 214 页。
- 338 七个统一,是王明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总结中提出的主张。——第 219 页。
- 339 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日国民党武汉卫戍司令部政治部宣布解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进步的群众组织青年救国会、蚁社。——第 219 页。
- 340 孙中山在所著《建国大纲》中,把建设民国的程序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按孙中山的设想,训政时期需由政府选派考试合格人员,协助各县筹备自治,即进行县政建设和训练民众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在达到规定的标准后,始能实行县自治。一省全数县已实行自治时,始可结束训政,实行宪政。全国过半数省份开始实行宪政时,才能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长期以训政为名,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实行法西斯统治。——第 222、227、265 页。

- 341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蒋介石给第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的命令中称：“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第 223 页。
- 342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政府向对日作战的同盟国中、苏、美、英发出照会，接洽投降。八月十二日，中国、苏联、英国政府同意美国提出的以美国太平洋陆军部队统帅麦克阿瑟为同盟国占领日本的最高统帅，中国、苏联、英国都派遣高级将领参加盟军最高统帅部，接受日本的投降。——第 223 页。
- 343 一九四五年一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政府提议：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事会议的预备会议，以便正式商讨国事会议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及其实施的步骤问题。蒋介石在三月一日的演说中，拒绝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主张。同年七月四日，中共代表与来延安的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六参政员，达成了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的建议。蒋介石在七月七日的参政会开幕词中，竟把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对国民党坚持召开独裁包办的国民大会的合理批评，诬指为“肆意攻击”。七月十九日国民党控制的参政会通过决议案，再次拒绝召开党派会议、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等要求。——第223页。
- 344 邹韬奋（一八九五——一九四四），杰出的新闻记者、政论家和出版家。从一九二六年在上海主编《生活》周刊起，毕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一九三二年创办生活书店。一九三三年初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七月被迫流亡国外。一九三五年回国，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救亡运动，先后在上海、香港主编《大众生活》周刊、《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并担任上海各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工作。一九三六年与沈钧儒等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抗日战争开始后获释，先后在上海、武汉、重庆主编《抗战》、《全民抗战》等刊物，积极参加反对蒋介石反动政策的政治斗争。皖南事变后被迫流亡香港，重新刊行《大众生活》。日军侵占香港后赴广东东江游击区，一九四二年到苏北解放区。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因病逝世。中共中央接受他遗书中的申请，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第 225、238 页。
- 345 一九四六年一月，蒋介石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压力下，被迫同意在重庆召开有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和社会贤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会议从一月十日开始，至三十一日结束，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问

- 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协议、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等五项决议，合称“政协决议”。——第 226、234、242、249、255、262、272、283、367 页。
- 346 蒋介石的四项诺言是：（一）保障人民自由；（二）保障各党派合法地位；（三）实行普选；（四）释放政治犯。——第 226、243 页。
- 347 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期间，重庆各界人民组成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每天在沧白堂集会，邀请政协代表报告会议进展情况。国民党反动派多次派遣特务捣乱会场，殴打会议主持者及与会群众，跟踪、威胁到会讲演的政协代表。——第 226 页。
- 348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重庆各界二十多个团体的群众在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国民党特务捣乱会场，打伤李公朴、郭沫若及新闻记者等六十多人，这就是较场口事件。——第 226、243 页。
- 349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国民党特务操纵重庆沙磁区部分学生举行反苏游行，并乘机捣毁《新华日报》、《民主报》（民主同盟机关报）的营业部，打伤两报工作人员多人。随后，《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也被特务捣毁。——第 226 页。
- 350 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国民党特务在西安煽惑部分学生举行反苏游行，并乘机袭扰十八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第 226 页。
- 351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北平以“河北难民还乡请愿团”名义，纠集逃亡地主、特务、流氓等千余人，举行反共游行，骚扰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第 226 页。
- 352 廖承志（一九〇八—— ），当时是中共中央委员。——第 226 页。
- 353 国民党反动派为达到一党专政的目的，在一九二八年十月公布的“训政纲领”中规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负责“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决定国民政府主席及委员、各院院长及各政务官的人选。——第 227 页。
- 354 政治协商会议规定的宪草修改原则的主要内容是：“立法院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之，其职权相当于各民主国之议会”。“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立法院对行政院有同意权与不信任权。“监察院为国家最高监察机关”，行使同意、弹劾和监察权。“省为地方自治之最高单位”，省得制定不与国宪相抵触的省宪。——第 227、234、256 页。

- 355 五权宪法是孙中山提出的实行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制度的宪法原则。——第 227 页。
- 356 建国大纲，是孙中山一九二四年提出的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纲领。见《孙中山选集》第 569—571 页。——第 228 页。
- 357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五日在政协综合小组会与宪草审议会协商小组举行的会议上，中共代表团在宪草修改原则问题上作了让步，商得了三个协议：一、无形国大改为有形国大；二、政协商定的宪草修改原则第六项第二条条文取消（这一条文是“如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但同一行政院长不得再提请解散立法院”）；三、省得制定省宪改为省得制定省自治法。——第 228 页。
- 358 为了维护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国民党二中全会通过了推翻政协商定的“宪草修改原则”的五项决议：一、“制定宪法应以建国大纲为最根本之依据”；二、“国民大会应为有形之组织，用集中开会之方法，行使建国大纲所规定之职权”；三、“立法院对行政院不应有同意权及不信任权；行政院亦不应有提请解散立法院之权”；四、“监察院不应有同意权”；五、“省无须制定省宪”。这里讲的“所增加之两点半”，指上述五项决议中的第一项、第四项和第二项的“用集中开会之方法，行使建国大纲所规定之职权”。——第 228 页。
- 359 整军方案，即国共双方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五日签订的《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全文共八条，主要内容是规定全国陆军为一百〇八师（每师不超过一万四千人），其中中共部队十八师；双方编余人员应在十二个月内全部复员；此外还对国共双方部队的统帅权、统一编制的时间、地区配置以及地方部队的组织等作了规定，并确定以军事调处执行部作为实施本方案的执行机关。——第 229、234、244、255 页。
- 360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同日下午下达了停战令。停战协定和停战令规定，双方军队应在一月十三日午夜各自位置停止军事行动。但蒋介石在下达停战令的同时，密令国民党军队“抢占战略要点”，接着又不断地调动军队，向解放区进攻。同年七月蒋介石公开撕毁了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第 229、234、242、249、255、262、272 页。
- 361 林，即林平（现名尹林平），当时任广东东江抗日纵队政治委员。
郑，即郑绍文，当时任新四军第五师江汉军区政治委员、八路军新四

军中原军区武汉办事处处长。——第 229 页。

- 362 马歇尔(一八八〇——一九五九),美国职业军人,政客。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任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驻中国特使,以“调处”为名,参与国共谈判,支持国民党政府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一九四六年八月宣布“调处”失败,一九四七年一月八日离华回国。——第 229、238、255、262、281、321 页。
- 363 三人会议又称军事三人小组会议,是一九四六年一月由国民党代表张群(后为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美国总统杜鲁门特使马歇尔参加组成的停战机构,马歇尔担任主席。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和各地执行小组都受其领导与指挥。由于蒋介石坚持内战独裁政策,蓄意破坏停战协定,美国又执行助蒋内战政策,同年六月以后三人小组会议停止活动。——第 230、244、259、266 页。
- 364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宣称:“美国竭力主张中国国内各主要政治党派的代表举行全国会议从而商定办法,使他们在国民政府内得享有公平和有效的代表权。美国政府认为此举就需要修改……一党训政制度。”——第 231、255、262 页。
- 365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二十六日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二十七日发表会议公报。公报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问题上提出:“在国民政府领导下有一团结的与民主的中国之必要,并且必须广泛地吸收国内一切民主分子到国民政府的一切(各级)机构中。”——第 231、255 页。
- 366 五方面代表,指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青年党和社会贤达五个方面的代表。——第 231 页。
- 367 王若飞、博古、叶挺、邓发、黄齐生等都是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由重庆飞返延安时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的烈士。

王若飞(一八九六——一九四六),一九一九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一年发起组织少年共产党,一九二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以后,历任中共豫陕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等职。一九二八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一九三一年回国,在绥远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狱中坚持革命斗争。一九三七年夏出狱后历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长、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中共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秘书长和中央党务研究室主任等职。一九四四年五月任中共代表参加国共谈判。在党的第五、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四六年任中共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第 233、254 页。

- 368 博古，即秦邦宪（一九〇七——一九四六），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四月任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同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为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犯过严重的“左”倾路线错误。遵义会议后任中国工农红军野战政治部主任。一九三六年同周恩来、叶剑英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参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一九三七年任党中央组织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驻南京代表。一九三八年起先后任中共长江局、南方局委员兼组织部长。一九四一年起在延安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一九四五年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四六年任中共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宪草审议委员会的代表。——第 195、233 页。
- 369 叶挺（一八九六——一九四六），字希夷，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一九二四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处长和独立团团团长。北伐战争中率部在湖北汀泗桥和贺胜桥两次战斗中获胜，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一九二六年十月任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兼武汉警备司令。一九二七年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同年十二月又参加领导广州起义，任起义军总司令。广州起义失败后出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一九三七年底到延安，后任新四军军长。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中负伤被俘。一九四六年三月四日出狱，七日由中共中央批准重新入党。——第 114、174、202、213、226、233 页。
- 370 邓发（一九〇六——一九四六），一九二二年参加香港海员大罢工。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省港罢工和东征战役。一九二七年参加广州起义。一九二八年后历任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委组织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等职。长征时任军委二纵队副司令员。一九三八年起历任中国共产党驻新疆办事处主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民运委员会书记等职。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九四五年九月代表解放区职工出席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工会代表大会。——第 233 页。
- 371 黄老先生，即黄齐生（一八七九——一九四六），教育家。清末在贵阳创办达德学校，曾参加辛亥革命。一九二一年赴法勤工俭学。回国后主办遵义中学。一九二九年后在晓庄学校任教。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为抗日运动奔走。一九四五年赴延安。一九四六年较场口事件发生后，代表延安各界赴渝慰问被殴打的民主人士。——第 233 页。

- 372 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与王若飞等同机遇难的还有八路军中校参谋李绍华,副官赵登俊、魏万吉,叶挺夫人李秀文、女儿叶扬眉、儿子阿九,女工高琼,黄齐生先生的孙子、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教员黄晓庄和美军驾驶员兰奇上尉等四人。——第 233 页。
- 373 双十国共会谈纪要,参见本书《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一文(第 252—254 页)。——第 234、252、273、367 页。
- 374 一九四六年一月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议时,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抢占东北,坚持停战协议不包括东北地区。在遭到我军的沉重打击和全国人民的反对后,蒋介石被迫同意于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在重庆签订东北停战协议。但协议签订才三天,国民党军队就在美国的援助下,向我营口、鞍山、四平街等地发动了新的进攻。——第 234、255、263 页。
- 375 一九四六年上半年,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组成了中原军区,李先念为司令员、郑位三为政治委员。六月二十六日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以三十万军队向中原军区大举进攻。为了保存力量,争取主动,中原解放军在六月底分路突围,实行战略转移,牵制了大量敌人,有力地配合了其他解放区的作战。——第 236 页。
- 376 胡宗南,解放战争期间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等职。——第 236、274 页。
- 377 李公朴(一九〇〇——一九四六),爱国民主人士。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和群众文化教育工作。一九三六年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被推为负责人之一。同年十一月与沈钧儒等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抗战开始后获释。一九四五年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第 237、239、243、263 页。
- 378 闻一多(一八九九——一九四六),爱国民主人士,著名诗人、学者。一九四三年以后,由于痛恨国民党政府的独裁和腐败,积极参加争取民主的斗争。一九四五年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长子闻立鹤为掩护闻一多也受重伤。——第 237、239、241、243、263 页。
- 379 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国民党特务捣毁西安民办报纸《秦风工商联合报》。四月逮捕并杀害该报法律顾问、民主同盟盟员王任律师。四月三十日夜,

国民党特务绑架枪杀西安民主同盟青年部长、《民众导报》主编、中共党员李敷仁(当时伤重未死,经群众抢救掩护辗转到达延安,任延安大学校长)。这就是西安血案。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八日军调部淮阴执行小组到达江苏南通,受到群众热烈欢迎,执行小组离开后,国民党反动派秘密逮捕、杀害参加欢迎的群众二十余人,随同执行小组到南通的新华社记者孙天平同时遇难,这就是南通血案。——第 237 页。

- 380 小超,即邓颖超,当时是中国共产党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第 238 页。
- 381 伍云甫(一九〇四——一九六九),一九二六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六年任解放区救济总会秘书长。——第 238 页。
- 382 司徒雷登(一八七六——一九六二),当时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第 238、259、323 页。
- 383 国民党反动派在撕毁政协协议、召开分裂的“国民大会”的前夕,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八日单方面颁布所谓“停战令”,以掩盖其政治上分裂的阴谋,推卸扩大内战的责任。——第 244 页。
- 384 云南起义,指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云南爆发的反对袁世凯称帝复辟的起义。蔡锷等在这一天通电各省,宣告云南独立,并组织护国军发动讨袁战争,随即得到贵州、广西、广东、浙江等省的响应。次年六月,袁世凯病死。——第 246 页。
- 385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日本侵略者唆使伪蒙军李守信、王英等部,配合日军向绥东(现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一带地区)进攻,为当地军民所击溃。——第 248 页。
- 386 “中美商约”即《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是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四日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政府在南京签订的大量出卖中国主权的条约。——第 249、266 页。
- 387 这个宣言,指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宣言》。“宣言”提出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的方针;针对反动派阴谋发动内战、破坏团结、压制民主的活动,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六项紧急措施,主要内容是:(一)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和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二)划定八

- 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并给与参加处置日本的一切工作的权利;(三)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救济难胞,减轻赋税;(五)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六)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筹备普选的国民大会。——第 251 页。
- 388 一九三七年四月,中国共产党起草了《国共共同纲领》,提出开放民众运动、释放政治犯、承认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等内容,建议国民党用两党名义向全国人民发布,但为国民党拒绝,没有发布。——第 252 页。
- 389 青年党是“中国青年党”的简称,其成员是一些地主、资本家、政客和知识分子。一九二三年在法国成立,初名“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九年改名为“中国青年党”,鼓吹国家主义,反对共产主义。抗日战争期间曾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后又依附国民党,参加了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一九四九年随国民党逃往台湾省。——第 253、259、262、275、284 页。
- 390 张君勱(一八八七——一九六九),当时是中国民主社会党主席。——第 253、285 页。
- 391 取消立法院对行政院的不信任权,参见注(357)。——第 258 页。
- 392 五人会议,指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蒋介石指定陈诚、王世杰、邵力子代表国民党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进行的谈判。——第 259 页。
- 393 民社党是“中国民主社会党”的简称。一九四六年由“国家社会党”与“民主宪政党”合并组成,其主要成员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参加了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一九四九年五月在香港召开常务委员会议,宣布继续追随国民党,同年随国民党逃往台湾省。——第 259、263、275、284 页。
- 394 胡政之(一八八九——一九四九),当时是《大公报》总经理。——第260页。
- 395 黄炎培(一八七八——一九六五),当时是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同盟的代表,中国民主建国会召集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院副总理等职。——第 260 页。

- 396 杜聿明(一九〇四——),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后任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副总司令,一九四九年一月淮海战役中被我军俘虏。一九五九年被特赦释放,现任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263页。
- 397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国民党军各数十人,“巡逻”到天津西北七十公里的河北香河县安平镇附近,侵入冀东八路军防地,并向当地守军攻击。守军被迫自卫。国民党反动派借此大肆煽动,竭力想把美军牵入中国内战漩涡。我党及时揭露了美军的侵略行为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活动,严正要求美国海军陆战队道歉赔偿,要求美国驻华的一切海陆空军立即撤出中国。——第266页。
- 398 航空协定,指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政府在南京签订的出卖中国领空权的“空中运输协定”。——第266页。
- 399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北平发生了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生沈崇的事件。蒋管区几十个大中城市的学生,分别成立“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举行反美反蒋的示威游行,要求美军退出中国。学生群众的这一行动得到社会各界的响应。——第269页。
- 400 一九四七年二月,国民党反动政府公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宣布“冻结生活指数”,即不管物价如何飞涨,工人工资只能维持在一月份的水平,不能相应增加。(以上海米价为例,一月初每担售伪法币六万元,同年六月已上涨到每担五十万元。)上海工人、店员在五月间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坚决反对这一反动措施。国民党政府被迫在六月宣布解除对生活指数的冻结。——第270页。
- 401 吴,即吴玉章(一八七八——一九六六),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张,即张友渔(一八九九——),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宣传部长兼新华日报社社长。——第270页。
- 402 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起,国共双方在南京举行关于结束东北冲突、恢复交通、整编军队三个问题的谈判。参加谈判的除国共双方代表徐永昌、周恩来外,还有美国政府代表马歇尔。美蒋方面对谈判毫无诚意,拒绝了我方提出的长期停战、恢复交通、整军复员、重开政协四项建议。——第273页。
- 403 这次改组政府,指蒋介石在一九四七年四月收买民社党、青年党和某些

- 无党派的政客参加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宣称,这次改组后的国民党政府是“自由主义”和“多党”的政府,用以粉饰其独裁统治。——第 275 页。
- 404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国民党控制的第四届第三次参政会开幕,蒋介石出席讲话。南京中央大学等校学生和苏州、杭州、上海赴南京学生七千多人到参政会的会址国民大会堂前游行,要求停止内战。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打伤学生百余人。——第 276 页。
- 405 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五个纵队十三万余人,从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起,强渡黄河,向大别山进军,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陈赓和谢富治领导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两个纵队一个军八万余人,在同年八月二十二日由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陈毅、粟裕领导的华东野战军八个纵队十八万人,同年九月上旬挺进鲁西南,进军豫皖苏地区。——第 278 页。
- 406 孙连仲(一八九三——),当时任国民党军保定绥靖公署主任。
傅作义(一八九四——一九七四),当时任国民党军张垣绥靖公署主任,后任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一九四九年一月率部起义,对北平和绥远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水利部和水利电力部部长等职。——第 279 页。
- 407 一九四七年九月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建屏(今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会议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同年十月十日由中共中央公布。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第 280、286 页。
- 408 美国政府给蒋介石的军事、经济援助,截止一九四九年的统计数字,抗日战争期间为十五亿六千七百八十万美元,解放战争期间为四十六亿四十四万零九千九百九十九美元。两项共计六十二亿八百二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美元。——第 281 页。
- 409 魏德迈,美国职业军人。一九四七年七月以美国总统特使的身分来华,寻求支持与控制蒋介石集团的办法。——第 281 页。
- 410 宋子文,一九四五年五月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先后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广东省政府主席。——第 281、283 页。
- 411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国民党内一部分爱国民主人士为了反对蒋介石的卖国独裁政策,先后成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等民主组织。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内各民主组织的领导人和一些爱国民主分子

先后到达香港，十一月举行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在香港正式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选出领导机构，推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何香凝、冯玉祥、李章达、谭平山、蔡廷锴、朱蕴山等为常务委员。同时发表成立宣言，明确提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独立、民主与和平”。——第 283 页。

- 412 蔡廷锴（一八九二——一九六八），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等职。——第 283 页。
- 413 这个指示，指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反对刘航琛等人的假和平阴谋的指示。当时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策动支持下，少数地方系政客、军阀及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企图发动一场假和平运动，使面临总崩溃的国民党政权取得喘息时机，使人民革命半途而废。刘航琛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中央的这个指示揭露了这一阴谋，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第 283 页。
- 414 伪宪，指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后，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非法召开的国民大会上通过的反共反人民的《中华民国宪法》。——第 284 页。
- 415 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由民族工商业者组成。一九四五年成立。一九四八年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召开“新政协”的号召。一九四九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民主党派之一。——第 285 页。
- 416 君主立宪制，是保留君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君主权力受宪法限制的政治制度。这里是指保留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只进行某些改良的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主张。——第 285 页。
- 417 这个宣言，指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公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见《毛泽东选集》第 1179—1183 页）。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基本政策。——第 286 页。
- 418 “五四指示”，即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这一指示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第 288 页。

- 419 陕甘宁边区是一九三七年九月建立的。在一九三五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陕北和陕甘两个革命根据地的工农民主政府曾领导人民先后进行了平分地主土地，废除农民债务的工作。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团结全国各党派各阶级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布暂时停止没收和平分地主的土地，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但对于农民已经从土地改革中取得的果实则坚决予以保障。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和我们工作上的一些错误，陕甘宁的部分地区出现了强迫农民交还已经分得的土地和房屋的现象。针对这种情况，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起草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见《毛泽东选集》第370页），宣布取缔这种违反团结抗日原则的破坏行为。在这以后直到一九四〇年的一个时期内，陕甘宁边区人民根据“布告”精神，坚决地进行斗争，使土地又陆续归还了农民。——第288页。
- 420 陕西省绥德县黄家川，当时属于陕甘宁边区。它的典型经验是：在已进行过土改的基础上，用抽肥补瘦、抽多补少的方法调剂土地，使土地分配更为合理，既满足了贫雇农对土地的要求，又巩固地团结了中农。——第289、299页。
- 421 河北省平山县，当时属于晋察冀解放区。平山典型经验，是指这个县在土地改革运动中，采取邀请党外群众列席党的会议整顿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经验。——第295页。
- 422 用三查与诉苦方法进行的新式整军运动，是我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结合土地改革进行的一个重要运动。“三查”和诉苦是在部队中发动广大指战员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的痛苦。——第303页。
- 423 新政治协商会议，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发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里提出的政治协商会议，当时被称为“新政协”，以区别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国民党召开的那次政治协商会议。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举行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了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一

九五四年九月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不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但仍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第 307、357、363、366 页。

- 424 李宗仁（一八九〇——一九六九），原为国民党桂系首脑。一九四八年四月任国民党政府副总统，一九四九年一月任代总统。国民党政权崩溃后去美国。一九六五年七月回到北京。——第 307、317 页。
- 425 蒋介石反动集团崩溃前夕，为了进一步搜刮人民，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主要内容为发行“金元券”，并限期以一比三百万的比价收兑法币；限期收兑民间黄金、白银、银币和外国币券，禁止任何人持有；限期登记管理民间存放在国外的外汇资产。——第 310 页。
- 426 一九四八年四月，国民党反动派成立“特种刑事法庭”，八月十七日以行政院名义发布命令，发动所谓特种刑事检举。由特务、暗探开列进步的工人、学生的“黑名单”，并自八月十九日起陆续在报上公布学生的黑名单，限令他们在名单公布的第二天到特种刑事法庭“投案”，同时进行大规模的逮捕。——第 310 页。
- 427 郑洞国（一九〇三—— ），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九日率领所部在长春放下武器。现任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第 313 页。
- 428 曾泽生（一九〇二——一九七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副司令兼六十军军长。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七日在长春率部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长、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第 313 页。
- 429 王耀武（一九〇三——一九六八），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一九四八年九月在济南战役中被我军俘虏。一九五〇年十二月被特赦释放。一九六四年任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 范汉杰（一八九五——一九七六），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一九四八年十月在锦州战役中被我军俘虏。一九六〇年十一月被特赦释放。一九六四年任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第 313 页。
- 430 吴化文（一九〇四——一九六二），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一九四八年九月在济南战役中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

国人民解放军军长等职。——第 313 页。

- 431 肖劲光(一九〇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司令员。

肖华(一九一四——)，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政治委员。——第 313 页。

- 432 陈嘉庚(一八七四——一九六一)，爱国华侨领袖。抗日战争期间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倡议组成“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并任主席，曾到延安慰劳边区抗战军民。解放战争期间积极参加反蒋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等职。——第 314 页。

- 433 张奚若(一八八九——一九七三)，爱国民主人士。从抗日战争后期起，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积极参加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等职。——第 314 页。

- 434 济南战役，是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华东野战军解放济南的战役。这次战役全部歼灭守敌(内有一个军起义)十一万人，俘虏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

辽沈战役，是指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至十一月二日东北野战军在辽宁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进行的一次巨大战役。辽沈战役迫使敌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放下武器，俘虏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兵团司令卢濬泉、廖耀湘，共歼敌四十七万人，解放了东北全境。这一胜利，连同当时其他战场上的胜利，使全国的军事形势出现了根本的变化，我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转入了优势。

淮海战役，是指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由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高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进行的一次决定性的战役。中共中央决定由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领导淮海前线我军的一切行动。这次战役毙敌兵团司令黄伯韬、邱清泉，俘虏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兵团司令黄维、兵团副司令吴绍周，共歼敌五十五万人，解放了长江以北广大地区，使蒋介石的精锐主力丧失殆尽，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上海、武汉等地，处于我军直接威胁之下。

平津战役，是指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上旬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底，由华北野战军和东北野战军在西起张家口东至塘沽、唐山，包括北平、天津地

- 区共同进行的一次巨大战役。中共中央决定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总前委，领导平津前线我军的一切行动。战役中先后歼灭新保安、张家口、天津守敌，俘敌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由于我方的努力争取，经过谈判，在敌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率领下，北平守敌接受我军改编，北平获得和平解放。全战役共歼灭和改编敌军五十二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地区。——第 315、346 页。
- 435 黄伯韬，参见注 (434)。——第 315 页。
- 436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提出愿意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虚伪建议，主张以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等事项为全国人民所不能接受的条件为和平谈判的基础。——第 317 页。
- 437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揭露了蒋介石的假和平阴谋，提出了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受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第 317 页。
- 438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天津，国民党反动统治面临全面崩溃，蒋介石一月二十一日以“因故不能视事”为名，宣布“引退”，把职务交给副总统李宗仁“代理”，自己退居幕后指挥。——第 317 页。
- 439 李宗仁代理国民党政府总统职务以后，一九四九年二月上旬在上海组织了以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为代表的“上海人民代表团”。邵力子以私人资格参加了代表团。这个代表团二月十四日到北平与我党商谈和平谈判问题，又到西柏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二月二十七日返回南京。——第 317 页。
- 440 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起，国共双方代表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的成员是：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张治中为首席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成员是：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第 317、328 页。
- 441 据国家统计局一九五九年在《伟大的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统计》一书中公布的资料，一九四九年中国现代性工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十七左右。——第 317 页。

- 442 参见注(425)。——第 318 页。
- 443 广州,当时是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所在地。溪口,在浙江省奉化县。蒋介石自宣布“引退”后,便住在溪口,幕后操纵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谈,继续与人民为敌。——第 318 页。
- 444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后,英、法、日、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对苏俄发动了武装干涉。美军曾在苏俄北部和东部登陆,侵占了阿尔汉格尔斯克、牟尔曼斯克和海参崴等地,直到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才被迫分批撤离。——第 323 页。
- 445 傅泾波,当时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第 323 页。
- 446 师爷,是旧时对官署中幕僚的称呼,如刑名师爷、钱谷师爷等。旧时绍兴人在官署中担任幕僚的较多,因有“绍兴师爷”的说法。——第 325 页。
- 447 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 117 页。——第 329 页。
- 448 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九四九年五月四日至十日在北平召开,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后改称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 331 页。
- 449 范文澜(一八九三——一九六九),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当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兼研究部主任。在党的第八、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先后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第 333 页。
- 450 汉学,亦称“朴学”,指汉儒考据训诂之学。清朝的一部分学者用汉儒的方法研究经典,注重一字一句的考订,称为汉学,以与宋儒空谈义理的“宋学”相对立。汉学对整理古籍,辨别真伪,有不少贡献,但往往流于为考据而考据的倾向。——第 333 页。
- 451 这是指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作的题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见《毛泽东选集》第 1187—1204 页)。——第 336 页。
- 452 见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17 页)。——第 336 页。
- 453 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一九四九年七月二日至十九日在北平召开。大会总结了毛泽东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的文艺工作经验,确定了新形势下文艺工作的方针和任务,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文学艺术界组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 344 页。

- 454 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即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一九三八年三月成立于汉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团结文艺界一切抗日力量的统一战线组织。周恩来被选为名誉理事,郭沫若、茅盾、老舍等四十五人为理事。“文协”广泛地开展了抗战文艺活动,出版《抗战文艺》杂志,在坚持团结抗战、争取民主进步的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一九四九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文协”是发起团体之一。——第344页。
- 455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中央军委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通令全军进行整编,实行统一的编制、番号。通令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分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游击部队。一九四九年春,各野战军先后进行了整编。西北、中原、华东、东北野战军,依次改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华北野战军的第十八、十九、二十兵团,直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改为西北军区,华北、东北、华东、中原军区番号不变。——第351页。
- 456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全文共七章六十条。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民的代表共同制订的建国纲领,是全国人民在一定时期内共同的奋斗目标和统一行动的政治基础,在我国正式颁布宪法以前起过临时宪法的作用。——第366页。
- 457 三次反共高潮,参见本书《论统一战线》一文(第200—204页)。——第367页。
- 458 杨杰(一八八八——一九四九),国民党爱国将领。解放战争期间参加反内战、反独裁活动。一九四九年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九月十九日由云南赴北平途中,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第369页。
- 459 这里指的是消灭剥削阶级。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斯大林在全苏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地主阶级已因国内战争胜利结束而完全消灭了。其它剥削阶级也遭到了与地主阶级同样的命运。在工业方面已经没有资本家阶级了。在农业方面已经没有富农阶级了。……因而,所有的剥削阶级都被消灭了。”——第369页。
- 460 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指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国家与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第370页。



周恩来选集

(下)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周恩来选集

下 卷

目 录

当前财经形势和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	1—14
国家财经计划问题	2
几种关系问题	7
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〇年六月 八日)	15—20
一 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	15
二 理论与实际一致	17
三 团结与改革	19
建设与团结(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21—30
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一九五〇年 九月三十日)	31—49
人民解放战争的大胜利	3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	34
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准备土地改革工作	37
统一财政和恢复经济	42
培养干部和提高文化	47
抗美援朝,保卫和平(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四日)	50—54
切实执行婚姻法,保护妇女合法权益 (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六日)	55—58

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59—71
一 立场问题	61
二 态度问题	68
加强老根据地的工作(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	72—80
一 下山不忘山,进城不忘乡(一九五一年十月九日)	72
二 大力扶植老根据地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76
“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一九五二年一月五日)	81—84
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一九五二年四月三十日)	85—92
关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九日)	93—103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	104—117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18
增强党的团结,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一九五四年二月十日)	119—128
为祖国锻炼身体(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129—131
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132—145
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九日)	146—157
主要发言	146
补充发言	153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 ..	158—189
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一九五六年二月八日).....	190—191

关于昆曲《十五贯》的两次讲话(一九五六年 四月、五月)	192—199
四月十九日的讲话	192
五月十七日的讲话	194
台湾的解放一定能够实现(一九五六年六月 二十八日)	200—203
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一九五六年七月 二十一日)	204—210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和第二个五年计划 的基本任务(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六日)	211—228
经济建设的几个方针性问题(一九五六年十一月 十日)	229—238
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	239—246
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一九五七年 八月四日)	247—271
一 关于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问题	247
二 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问题	253
三 关于民族繁荣和社会改革的问题	261
四 关于民族自治权利和民族化的问题	268
给程砚秋的信(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272
进一步提高军队的政治素养(一九五七年十二 月二十四日)	273—279
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	280—294
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295—299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四日、十五日)	300—312
加强调查研究(一九六一年三月、五月)	313—315
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九日)	313
关于食堂和评工记分等问题的调查(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	314
接见嵯峨浩、溥杰、溥仪等人的谈话(一九六一年六月十日)	316—322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	323—348
引言	323
一 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问题	328
二 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问题	331
三 为谁服务的问题	336
四 文艺规律问题	340
五 遗产与创造问题	343
六 领导问题	344
七 话剧问题	346
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一九六二年二月三日)	349—352
论知识分子问题(一九六二年三月二日)	353—369
一 知识分子的定义和地位	353
二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	355
三 如何团结知识分子	364
四 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	367

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和当前任务(一九六二年 三月二十八日)	370—387
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发展(一九六二年 四月十八日)	388—402
认清形势,掌握主动(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一日)	403—411
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 现代化(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412—416
学习雷锋(一九六三年三月六日)	417
反对官僚主义(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418—422
过好“五关”(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423—428
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一九六四年 一月十五日)	429—430
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一九六四年十月 十七日)	431—432
在治理黄河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十二月 十八日)	433—438
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一九六四年十二月 二十一日)	439—442
农村卫生工作和计划生育问题(一九六五年 十一月一日)	443—445
植树造林是百年大计(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446—447
发展生产,重建家园(一九六六年三月十日)	448—449
关于保护干部的若干文电 (一九六六年——一九七四年)	450—457
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	450

应当尊重宋庆龄(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	451
不应改变被批斗干部的工资(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八日)	452
一定要放出李葆华、李任之(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452
关于刘澜涛出狱问题给西北局的电报(一九六六年 十一月二十四日)	452
九大代表应包括王恩茂(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二日)	453
建议徐海东参加九大主席团(一九六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453
陶铸应送入医院治疗(一九六九年四月五日)	454
不要斗批民主党派领导人(一九六九年五月四日)	454
应给华罗庚以保护(一九七〇年三月四日)	455
关于张霖之死亡问题(一九七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455
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456
对参加国庆招待会名单的意见(一九七四年 九月二十九日)	457
关于经济工作的几则文电(一九六六年—— 一九七三年)	458—466
工人请愿不要妨碍生产(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458
藏富于民(一九六七年五月三日)	459
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460
联合起来,保护海港运输(一九六七年十月二日)	460
制止武斗措施(一九六八年)	461
合理的规章制度应该保留(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二日)	462
要把质量问题放在议事日程来解决(一九七一年 十二月十五日、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463
消除林彪一伙对经济的破坏性后果(一九七三年 二月二十六日)	463
农业生产要注意防涝抗旱(一九七三年五月十四日)	466

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一九七〇年—— 一九七三年)	467—474
不要因人废文(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七日)	467
关于外语教学的谈话(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日)	468
讲历史,多出书(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二日)	470
极左思潮破坏艺术质量的提高(一九七二年四月九日)	471
加强气象工作(一九七二年七月三十日)	472
重视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一日)	473
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上大学(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四日)	473
要学外国的长处(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474
中美友好来往的大门终于打开了(一九七二年二月 二十一日)	475—476
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代友好下去(一九七二年 九月二十五日)	477—478
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一九七五年一月 十三日)	479
注 释	480—535

当前财经形势和 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

诸位同志：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各部委分别召开了全国性的会议，一方面了解情况，一方面确定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方针和计划，这是必要的。各部委工作的总的方针在《共同纲领》⁽¹⁾中都已经规定了，可是怎样使这些方针具体化，怎样贯彻下去，就需要召开一些业务会议来解决。各部委都是草创，不可能立刻掌握全面情况，也需要通过开会或者去各地调查来了解。

诸位这次来北京开会，除了讨论本部门的业务以外，有权要求了解全面的政策，了解全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总的方针。只有这样，你们才能知道本部门的业务同总的方针怎样配合，才能有整体的观念。不然，你们业务的进行就会是孤立的、迷失方向的，成为盲目的工作。盲目不是科学的态度，不能建设新国家。我今天对同志们谈话，目的就在于使大家有个整体观念。今天要谈的是总的方面的问题。我

* 这是对参加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会议人员的讲话。

想，你们不仅对中央，就是在地方上，也有权要求负责同志在一定时期向你们做这样的报告。有人说，这是国家大事，要保守秘密，不能随便告诉别人。国家大事中有秘密的，也有不秘密的，在秘密的范围内也还要区别对待。我认为国家大事必须与闻，应该使每个人有与闻国家大事的习惯。也有人说，工作忙，完成工作任务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去与闻国家大事。这是旧社会里公务员办公事的态度。新中国的工作人员对自己的国家应有责任感，这样才能涌现出成千成万具有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工作人员。

按照刚才所说的要求，我下面讲两个问题。第一，国家财经计划问题。讲财经计划的目的在于给大家一个整体观念。现在，全国的工作已经开始从军事方面转向建设方面，财经计划就体现了在这种形势下政府采取的一些政策。比如，从国家财经计划中可以看出在总的安排上是军事为主还是建设为主，在生产上是工业为主还是农业为主，也可以看出政府在文教、外交等各方面的政策。第二，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问题。处理各方面的关系问题也是工作问题。做好工作决定于处理好各种关系，看出工作的重点所在。

国家财经计划问题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的一九五〇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是个一年的计划。为什么只订一年的计划呢？因为现在还处在战争状态中，成都附近、西藏、台湾、海南岛等地还没有解放。在这种情况下还不能制定出一个几年的计划。就

是这一年的计划也只是个大体的、不很准确的，还要在执行的过程中不断地修正，才能准确。要求一下子订出一个准确的计划是不可能的，不实际的。在中国此时此地，只能做到有个这样大体的计划，这倒是科学的，合理的。就是你们的业务计划现在也只能如此。

全国财经计划是根据什么观点、什么理由制定的呢？我提出四点来讲。

（一）承受负担。为了全国的胜利，要求人民承受必要的负担。我把这种负担叫做胜利负担。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基本的胜利，只剩下成都附近以及西藏、台湾、海南岛等地尚待解放。只有这些地方解放了，才能得到完全的胜利。因此，还要有军事上的准备，不仅要有陆军的而且要有海军、空军的准备。这样，军费在财政支出上仍要占很大的比重。军队的人数也要增加。现在是四百七十万人，因为要把被我们俘虏或者改编的国民党军队包下来，估计明年最高峰会达到五百五十万人。大家知道，去年以来，特别是今年一年，被我们俘虏或者改编的国民党军队大部分都被我们包下来了。北京解放后，我们曾把几百个国民党军官遣送回家，但是绥远⁽²⁾解放以后，又碰到了他们。现在对国民党的官兵已经再没有地方送了。假如不管他们，就会影响社会治安，所以非把他们包下来不可。武的包下来，文的也要包下来。前些时候上海实行精兵简政，裁减人员，闹得上海、南京都不安，引起了政府的注意。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是个重要的问题。根据他们的要求，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把他们全部包下来了。这样，全国公教人员要从现在的二百万增加到三百五十万。文

武加起来，就是九百万。

靠公家吃饭的人增加到这样多，是要由人民来负担的，这是件大事。但这九百万人的吃饭问题解决了，对国家的生产建设是有利的。要告诉人民，这是胜利的负担，是推不开的。包下来的几百万人并不是没有用处的，要下决心使他们变成生产的力量。我们这样说是有把握的，在抗日的时候就实行过这种方针，现在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这样做了。毛泽东同志对军队生产有个意见：首先进行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还可以搞工业生产、兵工生产等。我们相信，这样做，两三年后就会有很大的成绩。目前，公教人员是不需要三百五十万人的。我们要进行准备，使他们除做好业务工作外还参加生产和学习，成为既适应工作需要又有劳动观点和科学知识的人，成为新中国所需要的革命的工作人员。各级政府都要做好这项工作。现在的政府工作人员太多，这些人将来不一定都在机关工作，一部分人可以转到企业中去。

（二）恢复生产。国家明年的负担很大，不抓生产是不行的。毛泽东同志说，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现在不抓生产靠什么来支援战争和巩固胜利？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当前生产任务的重心是恢复而不是发展，当然也不排斥可能而且必要的发展。抗日战争以前全国粮食的最高年产量是二千八百亿斤，今年的产量比那时大概减少了百分之二十。明年计划增产一百亿斤，但距二千八百亿斤还很远。棉花生产的情况也是这样。整个说来，当前各方面首先是需要恢复，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毛泽东同志说过，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便发展。如果我们能在三五年内达到或

超过战前水平，那就很好了。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轻工业的原料，输出的产品，现在绝大部分都要依靠农业。国家计划中的经费，除去军事开支和行政开支，主要的是用于恢复生产。只有生产恢复以后，才能使几百万人转到企业中去。

（三）开源节流。这虽是老生常谈，但还是有道理的。财政收入增加了，开支才有可能增加，赤字也才能减少。我们开源主要是依靠人民：一是来自农村的负担；二是来自城市的负担；三是国家企业的收入；四是预支，即借债。

先谈农村负担。过去我们的老解放区负担相当重，负担的时间也相当长，从抗日战争开始到现在，十二年来没有得到喘息的机会。目前，全国性的胜利很快就要到来了，那么是不是可以减少老解放区的负担呢？提出这个要求是合理的，但一时还不能实现。因为战争还在进行，新解放区的一切还没有组织好，土改尚未进行，税收工作也没有就绪，所以还是老解放区要负担得多一些，不能减少。我们从抗战以来的经验中研究出一个比例：农民的负担是东北高、西北低、华北适中，农村平均每人每年的收入约四百斤粮食，交给公家八十斤，按军队每人每年开支合四千斤粮食计算，每一百个农民可以负担两个公家人。如果合乎这个比例就正好，超过就困难些。按照这个比例，我们支持了十二年。将来在一个相当的时期内，农民大概还要拿出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左右作为负担。这个事实也可以说明中国农民的伟大。

城市中的负担是税收。从前几乎全部负担靠农村，现在形势变了，也要靠城市，也要由工商业来负担。但开始的时候不

能把城市的负担提得很高，要比农村少一点。现在农村负担占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一·四，城市负担占百分之三十八·九，而实际上许多税收如盐税、货物税、屠宰税等，很多还是要转嫁到农民身上的。要求城市在目前负担很大是不对的，但城市工作人员要说服工商业家缴纳应该缴纳的负担。

国家企业收入占财政收入百分之十七·一。

以上三种收入还不够，还会有赤字，这就要发公债。一九五〇年整个预算支出的百分之八十二是靠各种收入，百分之七靠公债，其他靠发行货币。这样就可以度过明年在胜利中出现的困难。是不是可以借外债呢？我们需要外援。友邦的援助我们是欢迎的，因为它是真诚的。但中国的建设主要应靠自力更生。

开支方面，国家财经计划的安排是节约的。

第一，在整个预算中，军事费占百分之三十八·八。陆军开支每人每年仅合四千斤粮食，总共二百一十亿斤。建设海军、空军的费用除外。

第二，行政费占百分之二十一·四。我们的行政开支是不大的，实行供给制的每人每年平均一千八百斤至二千斤粮食，实行薪金制的每人每年平均四千二百斤粮食。现在还不能把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原来是薪金制的也不能改为供给制。两者比较，收入是不平等的，但我们不能不要求实行供给制的同志多忍耐些，政府知道他们的家庭困难，也正在设法解决一些必须解决的困难。

第三，经济建设和文教费用约占百分之三十。一是国营企业投资，二是文教建设，三是地方建设。其中第一项占百

分之二十三点九。

第四，总预备费约占百分之十，用于临时遇到的事项，如救灾等。

从预算的分配来看，开支主要的还是用于支援战争，解放全中国，其次是用于建设，恢复生产。财政支出总共不到六百亿斤粮食，这说明我们的开支是节约的，生活水平是低的。中华民族有勤劳勇敢的传统，我们党又有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在开始建设新中国的时候，我们要求全体工作人员保持和发扬这种传统。

(四) 掌握政策。我们一定要在上面说的总的方向下掌握政策，进行工作，这样才能避免各部门闹独立性。我们要重视重工业，但决不能把它当作唯一的工业。重工业中，钢铁业是占第一位的，但它也不是重工业的全部。农业方面，要水利与农业生产并重，水利要配合农业。交通方面，铁路的恢复最重要，恢复得也最快，预定今年恢复到一万八千公里，现已超额两千公里，明年可以全部恢复，并可新建一些。公路、航运等的恢复放在其次。

每个单位必须有整体观念，要在总的财经计划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认识自己的方向，有重点有计划地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这样才能不犯本位主义，不单纯依赖国家，并在各自的范围内做出最大的成绩。

几种关系问题

现在讲六种关系，即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工商关系、公

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上下关系。

（一）城乡关系。

在中国，城乡关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一方面，中国革命要由工人阶级领导；另一方面，要使革命取得胜利，又必须依靠农民阶级和广大乡村。要彻底解放城市，必须依靠广大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组织力量，积蓄力量，发动武装斗争，以乡村包围城市，一块一块地夺取敌人的阵地，最后解放城市；反过来，再以城市领导乡村，恢复和发展生产，进行建设。对我国城乡关系的这种辩证的处理，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我国革命问题的一个最成功的范例。

在谁领导谁的问题上，今天我们确定了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的方针。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如此，社会主义社会更是如此。从我国国民经济的构成来说，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现代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乡村比重大，城市比重小，但并不能认为因此就可以取消或减弱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的作用。城市对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刺激乡村的农业生产，城市以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供应保证和促进乡村的农业生产。

既然是集中的城市领导分散的乡村、工业领导农业，那么，是不是就可以不要依靠农业这个基础并从而忽视乡村呢？不能。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取消或忽视乡村这个广大的农业基础。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都是辩证的两方面，决不能取消或忽视任何一方面。我们强调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决不是忽视广大的农业生产对发展工业的作用。如果没有广大农业的发展，工业发展是不可能的。目前的任务首

先要恢复农业生产，然后再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明年计划增产一百亿斤粮食，经过三五年的努力就可以恢复到年产二千八百亿斤的战前最高水平。这样就可以提高四亿农民的购买力，增加他们对工业品的需要和对工业原料的供应，也就可以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今年全国棉花产量为八百多万担，明年计划增加到一千三百万担。如果没有这一千三百万担棉花，一百万纱锭就得停转。如果没有粮食，城市人民就不能生活下去。京、津、沪三地一千万人口的吃穿都要靠乡村来供应。城市离不开乡村而且要依靠乡村，工业离不开农业而且要以农业为基础。

在城乡关系问题上，必须防止两种偏向。从老解放区乡村来的干部，有一套很好的农村生产经验，懂得如何组织农业劳动，但不能因此就说农业是重心而忽视工业，否认或者忽视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的作用。不防止与纠正这种偏向，就会发生错误。农业不能作为重心，它必须在工业的领导下才能发展。必须把城市工业组织起来发挥领导作用，才能使农业现代化、机械化。党的七届二中全会⁽³⁾决定，今后党的工作的重心应该转向城市，应该把主要力量放在城市，恢复与发展工业以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也要防止另一种偏向，就是在城市中工作的同志，不能因工业领导农业、城市领导乡村而忽视农业和乡村。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农业和手工业在国民经济构成中占百分之九十左右，工业生产要顾到农村的需要。如修铁路，首先要想到这条铁路在城乡交流、工业品与农产品的交换中所能起的作用。谁忽视了农民和农业，谁就要犯错误。

我们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这个辩证的正确的方针是毛泽东思想在工农业关系、城乡关系上的运用。

（二）内外关系。

国家建设是以国内力量为主还是以国外援助为主？我们的回答是以国内力量为主，即自力更生为主。小国应该这样，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更应该这样。毫无疑问，生产建设上要自力更生，政治上要独立自主。美帝国主义封锁我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困难，但我们决不能因此就向美帝国主义屈服。我们不但要经受这些困难，并且，正因为封锁和轰炸，逼迫着我们多想些办法，建设好我们的国家。一百零九年的斗争，牺牲了多少仁人志士，经过了多少挫折和失败，中国人民终于胜利了。现在这样的局面，我们是有办法对付的，要迎接困难，“多难兴邦”。

帝国主义同我们做买卖并不可怕。过去他们侵略我们，使我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生活过不下去了，这才闹革命。现在我们当然不能依靠他们。再说中国过去同他们做买卖并不多，抗日战争以前每年只有几亿元，抗战时期每年才不过几千万元。现在同帝国主义国家也可以在有利的条件下做买卖，对此我们不拒绝，也不强求。要打破依赖帝国主义的观念。这种观念是一百多年来形成的，在一些人中间是根深蒂固的。旧中国不但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文化教育方面也是依赖帝国主义的；不但经济上受剥削，思想上也受毒化，这是很危险的。现在要清算、消除这些毒素。不要依靠他们，

也不要怕他们，这样，自力更生的基础才会巩固。我们需要的物资大部分可以自己解决，一部分可以从朋友那里解决，决不要依靠敌人。此外，我们的物资是可以找到有利的市场的。我们明年增产一百亿斤粮食，四百多万担棉花。粮食增产了，可以增加出口，换取外汇；棉花增产了，可以减少进口，少花外汇。我们欢迎友邦在平等互助基础上的帮助。这种真正的帮助，有助于我们自力更生。

（三）工商关系。

工业和商业比较，当然是以工业为主。那么，商业占多数的城市是不是要以商业为主呢？不，也要以发展工业为主。国家方面主要是经营重工业。我们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是以服务于工农业品的流通、服务于人民为主的，必须防止投机现象。对私人资本方面，要提倡、鼓励和帮助它发展工业生产。对私营商业，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也可以给予帮助。解放前夕，城市的生产几乎都破坏了，只剩下商业投机，这种情况要改变过来。

（四）公私关系。

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为了恢复和发展国家的经济，需要私人资本的帮助和合作。除了国营企业外，还允许私营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在《共同纲领》中写上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公私兼顾”的方针。私人资本的问题，在我们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是必须解决的。

在公私关系上应该确定以公为主。国营经济应该是领导的成分。虽然它在国家的经济构成中现在只占百分之五，但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它的领导能够保证中国走向社会

主义。凡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而不应该由私人操纵的企业都要归国家经营。国民党政府曾利用官僚资本垄断国家的经济。这种官僚资本不但奴役人民而且也窒息私营经济的发展，应该将它没收。但是另一方面，官僚资本垄断使得许多大的企业不断地集中，给我们的国家准备了集中的生产组织。这样，旧社会中的某些事物一旦到了人民的手中，便立刻变成了积极的力量。为了使国营经济的比重不断地增加和保证它的领导，政府把百分之二十三点九的预算支出用在国营经济上。

既然以公为主，是不是就不管私人企业了呢？不，当然要管的。现在整个工业中有一半是属于私人经营的，它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有很大帮助的。在那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政府是会帮助它的。国营企业应该起带头作用，使私人企业对我国的生产发展有利。我们允许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存在，但是要引导它不走旧资本主义的道路，而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我们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使我们的国家健全地、有步骤地、不急躁地走向社会主义。

(五) 劳资关系。

这个问题在国营企业中不存在，在私人企业中则是存在的。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确定了“劳资两利”的方针。但这并不是把劳资两个方面平列起来。人民的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在劳资关系上，我们要采取保护劳动的政策，对于资方也要给予适当的利润。我们对于私人资本采取限制政策，对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企业要鼓励它经营，对有害的则要禁止。我们对于私人资本取得利润也有两个条件：第一，不允许有非法的利润，只许可有合法的利润；第二，不

能有过分的利润，只能有合理的利润。工人不应该为了眼前的利益要求过高的工资，那样会使资方无法经营而企业倒闭，结果会弄得自己失业。我们不要为一时的利益而损害长远的利益。工人的劳动是应该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但现在一般还得工作八个多小时到十个小时。工人的生活水准应该同中国的现有情况相适应。今天的主要问题，是先做到不失业、不饥饿。劳动条件不可能一下子变得很好，只能逐步改善。工人阶级应该用自我牺牲的精神来努力生产。我们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保护劳动和限制资本。

（六）上下关系。

这里说的上下关系是指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今天的情况下，我们还不能完全做到集中和统一，但也不允许各自为政。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不是封建割据。要既利于国家统一，又利于因地制宜，这是《共同纲领》中确定了的。比如钢铁生产，就要在工业投资、矿石生产和销路等方面对各产钢地区进行统一安排。棉花生产计划的制定，也得看各地的条件。航务计划也得照顾到各个方面，不要犯本位主义，不要妨害地方的积极性。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在战略领导上抓得很紧，在战役的组织和战术的运用上就交给下面去办，因为他们最了解具体情况，只有充分发挥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打胜仗。打仗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的。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才能使各方面的工作生气勃勃，否则就死气沉沉。只有广大人民在生产中发挥了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也才能更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

上述六种关系，各个部门都会遇到，尤其是生产部门。必须正确解决这六种关系，才不会犯本位主义，才能有全局观念，才能使本部门的生产在统一计划中占有适当的地位，才能使各方面的计划掌握重心，准确地加以实施。

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〇年六月八日)

听说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开得很好。全国的教育专家会聚一堂，经过充分讨论做出的决定，我想一定是合乎实际情况的。现在，我只想根据政协《共同纲领》⁽¹⁾的文教政策，对教育方面提出三个问题和大家商讨。

一 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

《共同纲领》第一条指明了我们反对什么，主张什么。我们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同整个新民主主义的纲领是一致的，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因此，我们在教育上就要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这项任务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欲速则不达”，如果急于求成，形式上好象肃清了，而实质上仍然存在。所以，我们在原则上一定要坚持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在具体步骤上则必须一步一步地求其实现。

我们主张什么呢？《共同纲领》说得很清楚，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

我们的教育是大众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是我们教育的

方向。现在是人民的时代，我们的教育应该是有利于人民的。人民是什么？在现阶段，人民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就是我们服务的对象。我们的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所以，我们的高等教育首先就要向工农开门，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大家知道，过去如果不是封建地主或资产阶级的子弟，是很少有机会受大学教育的。即使在今天，大学学生的成份也还是没有什么变化。这种情况不符合我们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要求。但是，培养工农知识分子不是一下子就能办到的，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需要不断地努力。特别是在工农大众过去长期受剥削压迫、文盲较多的情况下，更是一件困难的事。惟其困难，更要唤起大学教育工作者的注意。我们一定要在若干年内从劳动人民中培养出大批新型的知识分子。培养这些新型知识分子，并不是为排斥原有的知识分子，而是在团结改造原有知识分子的同时，增加新的血液。

我们的教育是科学的，要有科学的内容。科学是从实际中总结出来的系统知识，是客观真理。有一种说法，中国过去没有科学。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不论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必然有它自己的客观规律。问题在于人们能不能科学地说明它。近代自然科学是从西方开始的。科学地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从马克思开始的。但是，并不能说在这以前就完全没有科学。拿中国来说，我们的国家存在了几千年，人口发展到四亿七千五百万，能够抵抗敌人的侵略，战胜各种自然灾害，这表明我们民族过去是掌握了一些客观事物的规律的，因而是有科学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很好地去发

掘它,研究它。科学理论是将实践的经验提高到理性的高度,反过来又指导实践的。劳动创造世界,科学也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产物。我们应该以科学理论作为教育的内容。这也不是一下就可以实现的,需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去做。

我们的教育是民族的,要有民族的形式。普遍真理是各民族都适用的,但在不同的民族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中国民族有自己的传统习惯,这些传统习惯总是以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具有民族形式的教育,才易于被人民所接受,为人民所热爱。教育如果不注意民族的特点和形式,就行不通。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要注意各兄弟民族的特点和形式,兄弟民族之间也要互相学习彼此的长处,这样才能将科学的内容输送到各族人民中去,把教育办好。

二 理论与实际一致

《共同纲领》规定我们的教育要采取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方法。我想把这个问题展开讲一讲。理论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又对实践加以指导。我们不能把理论当作教条,如果不顾实际情况,把理论拿来乱套一阵,总是要失败的。同时,实际工作要有理论的指导,才不会盲目乱撞。没有理论指导而盲目乱撞,虽然也会在失败中摸索出一些道理,但是太痛苦了。我们的教育不应该犯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错误,也不应该陷入没有理论指导的经验主义错误中去,这样才能使青年少走弯路,少碰钉子。这是教育者的责任。

理论有深有浅。深和浅二者不是对立的,是有联系的。理

论要由浅入深地不断发展。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也会有些知识,也会有些粗浅的理论。比如农民,虽然缺乏系统的科学知识,却懂得生产,有些抵抗天灾的办法,可见他们也掌握一些粗浅的原理原则。不过,还需要深造。我们不能否认深造的必要,否认是不对的。

对学校教育中实践应该多些或者少些的问题,看法不尽一致,有的人主张多一些,有的人主张少一些。为了速成,实践少一些是可以的,但是为了更好地掌握理论,还是要多去实践。学习理论需要反复实践,才能掌握得更准确,领会得更深刻。所以,忽视实践的一面,或者把实践和理论对立起来,都是不对的。

我们的大学是要学习理论的,但是我们所要学习的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理论,目的是要用它进一步指导实践,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样才能合乎实际工作的需要。那些认为大学不需要学比较高深理论的看法是不对的。全国高等学校都要重视实践,都要提高理论水平。

旧中国的高等教育大多是理论与实际脱节的。今天,如果说我们的大学理论与实际已经完全一致了,那也不符合事实。在座的专家都知道,我们高等学校的教学方法,就有很多是理论与实际脱节的,有许多地方需要改革。怎样使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这就需要从教材、课堂教学到实验实习,反复研讨,总结经验。

会上有人提到通才与专才的问题。通才也好,专才也好,都需要理论与实际联系。通才和专才不是对立的,只是在学识的范围与程度上有一定差别,而不是在理论与实际联系这一

原则上有什么不同。因此,在大学里反对理论与实际联系,或者主张少联系,都是不对的。另一方面,不适当地强调实践,忽视理论,把大学降低到专科学校的水平,也是不对的。大学和专科有差别。大学总是要学得广一点,深一点,理论更多一点。

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正处在恢复阶段,需要人“急”,需要才“专”,这是事实。为了便于联系实际,适应建设的需要,由企业部门举办短期训练班或专科学校是必要的合理的。但这绝不是说要将现有各大学分归各企业部门领导,教育部就不管了。为了适应需要,可以创办中等技术学校,也可以考虑在大学中缩短一部分专业的修业年限,但不能取消大学教育培养高级建设人才的方针。为了培养具有较高理论水平、能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符合长远需要的专门人才,有必要将现有的大学整顿得更好一点。目前,大学还不能大量地扩充与发展,高等教育只能根据我们经济的发展而发展。

三 团结与改革

去年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现在又开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以后还要召开中小学教育会议,还要成立全国教育工会,目的都是为了使全国教育工作者更好地团结起来,实现《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教育改革的任务。除了极少数反动分子,我们应该团结所有的教育工作者。凡是在政治上反对三大敌人、在教育上赞成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人,我们都要团结。这是肯定和不可更易的方针。

这次高等教育会议作出了若干决定,有的要马上实施,有

的要在一些学校试行,有的只供各学校参考,这样的办法很好。我们对于文化教育的改革,应该根据《共同纲领》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毛主席告诉我们要谨慎。教育改革不能漫无计划,兴之所至乱搞一气,要区别轻重缓急,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在有些问题上要善于等待。文化教育一方面是政治的先导,另一方面它的改造又要在经济、政治变革之后才能完成。所以文化教育既是“先锋”,又是“殿军”。

教育改革是比较长期的事,要有步骤地进行,但不能停止不动。有改革条件而拖延着不改革是不对的,口头上同意改革而实际上不改革也是不对的。只有在客观情况确有困难或者主观上对情况了解不够时才可以等待,但是等待并不等于拖延。另一方面,鲁莽从事,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的方法进行改革,也是不对的。比如说,在唯物论与唯心论、无神论与有神论以及教学方法等问题上,不能急性地强迫人家同意你的意见。不然的话,表面上好象同意了,实际上并没有解决问题。总之,我们对教育工作者要循循善诱,使人心悦诚服,要用这种精神来团结全国教育工作者。

在教育方面,也要“公私兼顾”。这次高等教育会议就有许多私立学校的代表参加,这是很好的。今天私立学校处于困难的境地,以前它们的经济来源大都依靠军阀、官僚资产阶级,现在没有了,学田⁽⁴⁾,土改时也分了。这些困难,政府应该照顾。教会学校在与外国断绝关系后,经费上有很大困难,政府也应该照顾。私立学校问题怎样解决,教育部要考虑。这也是学校自身的事。现在,国家经济处在恢复过程中,大家要多想办法,度过这一二年。

建设与团结

(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诸位代表, 诸位同志:

我很高兴今天能参加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在去年的筹备会上, 我曾经和在座的一些同志谈过中国科学工作者的任务与前途问题。现在我们的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 成立了科学工作者自己的领导机构, 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对于自然科学, 我是门外汉, 谈不到贡献什么意见, 主要应该向诸位学习。不过自然科学工作者也会关心另外方面的一些问题, 如自然科学工作的环境, 自然科学工作与各方面工作的联系和关系, 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岗位和前途等等。现在我就这方面的问题讲一些意见, 题目是“建设与团结”。

首先讲一讲建设问题。

先从中国自然科学家本身说起。依我看, 一般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工作的人, 或多或少都有与自然界作斗争的认识。他们在事业上下功夫、费精神, 目的是为人类扫除生存中的障碍, 改善人类的物质生活和发展精神生活。学医的想把病人治好, 学农的想把农作物病虫害消灭, 学工的想把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搞得更好, 学理的为着增加人类的科学知识, 使世界文化水平更加提高。一般地说, 科学家是不愿意利用科学知识来毒

害人类的。当然，世界上也有一些科学家不是这样，如日本的某些细菌学家研究细菌战争，做危害人类的事。但这只是极少数，而且有的是被迫这样做的，只有更少更少的人才是自觉地去做的。我相信绝大多数科学家，从他们本身学习和工作的目的来说，都是为着造福于人类的。

我为什么一开始就提出这样的问题呢？这就是说，我们今天有条件团结科学家们为中国人民服务。我们相信科学家们能够这样做，因为他们是善良的，在旧中国他们被压迫了多少年，今天已经和人民一道翻身了。

自从海禁开放⁽⁵⁾以后，西方的文化科学进入中国。可是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究竟得到多少好处？又受到多少害处？中国人自己能够掌握科学来为人民谋幸福吗？在反动政府统治下，不论是清朝、北洋军阀⁽⁶⁾或国民党反动派，都不允许我们这样做。虽然有少数科学工作者埋头从事建设工作，如铁路、水利、工程建设都有中国的工程师自己计划、设计的，不能说中国的科学家没有个别的人获得成就，但总的来说，成就是很少的。他们的工作时常遭到反动统治者的破坏。如李仪祉⁽⁷⁾先生在关中兴修水利，对关中的农业尤其是棉田有很大好处，但是后来孔祥熙⁽⁸⁾压低棉价，大大损害了棉农利益，使他们无法继续经营棉田，水利也因此受到影响。举此一端，可见全貌。

反动政府的摧残和破坏是国内的因素，而更大的破坏来自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者站在中国人民头上，利用科学作为剥削，压迫和屠杀中国人民的手段，这是大家都看到了的。帝国主义者控制了我们的经济，中国的工业生产很多是为帝国主义者服务的，农业原料也被他们掠夺了去，

加上水灾旱灾连年不断，哪里谈得到真正的建设。尤其是抗日战争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更是数不胜数。例如，花园口的决堤⁽⁹⁾造成了极大灾难，创伤至今未能平复。去年淮河有水灾，今年又有水灾，直接原因就是蒋介石在花园口决堤，黄河的泥沙流入淮河，使淮河的河床增高，洪泽湖的水位高出周围的田地，因此经常发生水灾。

由于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统治阶级的破坏，旧中国不能进行建设，科学也很难在旧中国的土壤上生长，科学家没有办法贡献自己的能力。但是有良心的中国科学家并没有放弃建设中国的志愿，不少人为中国的前途和中国的科学发展摸索道路，寻求真理。然而他们并没有成功，他们一直受着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压迫，理想不能实现，计划不能实行，工作不能开展，甚至连生活也陷入困境。这部科学家的苦难史，诸位比我了解得不知要深刻多少倍。现在情况完全改变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了，中国人民翻了身，这就给中国的科学和科学家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无限广阔的康庄大道。去年，人民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¹⁾规定了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要把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这也就是规定了中国科学家的奋斗目标。这个方向和目标是很清楚的，这正是近百年来中国科学家所寻求的。

方向和目标确定了，但道路是要我们一步一步去走的。诸位都明白，我们所接收的旧中国满目疮痍，是一个破烂摊子。要在这个破烂摊子上进行建设，首先必须医治好战争的创伤，恢复被破坏了的工业和农业。我们决不能随随便便地在破烂摊子上建设高楼大厦，那是不稳固的，必须先打好基础才

行。在科学技术方面，我们从国民党反动派手中接收了什么遗产呢？他们留给我们什么科学器材、设备和资料呢？太少了。这并不是说诸位科学家不努力，而是反动派不让我们做，不让我们有机会勘测地下的富源，不让我们有机会纪录中国人民在历史上的功绩。现在我们要进行建设，首先就要进行发掘、调查、统计和搜集材料的工作。这是准备工作，是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基础工作。目前我们的财政经济状况已开始好转，但要达到基本好转还需要经过三五年困难阶段，也就是恢复、整顿、调查和有重点地建设阶段，然后才能在全国规模上进行建设。

在国家建设计划中，站在科学家的岗位上，我们开始做些什么呢？不可能百废俱兴，要先从几件基本工作入手。

农业方面。首先是实行土改，解放生产力，然后求得发展。中国本不是缺粮的国家，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从根本上破坏了中国的农村经济。现在进行的土改⁽¹⁰⁾，就是要使农民从旧的生产关系桎梏中解放出来。这项工作需要两年左右时间。配合土改，我们要着手做以下几件工作。

第一，兴修水利。我们不能只求治标，一定要治本，要把几条主要河流，如淮河、汉水、黄河、长江等修治好。华北的永定河，实际上是“无定”的，清朝的皇帝封它为“永定”，它还是时常泛滥。不去治它，只是封它，有什么用？国民党统治时，有一个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也得不到支持，因为反动派不需要做水利工作，反动政府不是为人民办事的。我们今天必须用大力来治水。要开展这一工作，把全国的水利专家都集中起来也

不够。兴修水利，联系到动力，更需要有长远的计划。

第二，修筑铁路。以中国之大，只有二万多公里铁路，与工业先进的国家不能相比。这件事也必须在恢复工作中大力来做。铁路交通首先要保证东北的粮食能够运出，调剂关内缺粮的地区。

第三，制造化学肥料。这一点侯德榜⁽¹¹⁾先生很了解。我们要大力发展化学肥料工业，不然就要从外国进口，消耗外汇。

不说旁的事情，单说这几件大事，都需要科学家的努力。现有的专家不是太多而是不够。代表中的萨福均⁽¹²⁾先生，曾和詹天佑⁽¹³⁾先生同时修粤汉铁路，他知道中国的铁道专家也是很少的。

讲到林业，中国森林的面积，远不够一个森林国家的标准。基础太小，林政不修，森林采伐不按科学的方法，这都需要大力整顿。如东北森林地区，据调查，如果林业工作不加以改进，快则十年，慢则二十五年，就会完全毁了。不科学的采伐，没有护林和育林，森林地带也会变成象西北那样的荒山秃岭。我们需要林业专家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工业方面。据初步统计，我国有六万多台机床。其中有的没有转动，有的生产安排不当，如工厂距原料产地太远、产品并非急需等。这些机床的调整与修复，也是需要大力进行的工作。从国防观点来看，工厂不能都放在沿海。过去许多工厂是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现在要为人民利益服务，就要面向广大的内地农村。联系到动力问题，愈到内地，动力愈不够，这就需要勘测燃料资源。大家想一想，需要有多少科学家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医疗卫生方面。全国卫生会议提出普及医疗事业的问题，希望在三五年内使每一个县都有医院，每一个区都有卫生所。这就得增加九万多名医生，数十万名护士和助产士。这要用三五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培养出来。现在我国的中医人数没有统计，西医人数估计有三万上下，医生的人数是太少了。

国防工业方面。制造兵器、飞机等都需要专家，也感到人才不够。

总起来说，各种建设从恢复、整顿和调查开始，已经看出现有的专家是不够的。我去年说过，只要整理工作有了头绪，就会感到我国的科学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现在愈接触各种事实，愈使我们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今天我还不能把全国的建设计划向各位报告。全盘的计划要等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才能决定。不过现在可以肯定，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岗位是有的，他们的工作是国家急需的，问题是需要时间来合理调整。现在对科学家人数的统计很不完备。我很高兴这次会议成立了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全国性组织。有了组织，就有力量，就给我们以机会，从调查统计全国科学家人数着手开始工作。我正式提议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首先进行这个工作，政府愿给以一切物质上的帮助。中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到底有多少？他们的水准、专长、职业、资历怎样？要做一个全盘的调查。这样，我们就可能更好地把他们安排在适当的岗位上，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现在我们对这方面的情况不清楚，可能埋没了许多人才。调查统计对政府从事建设工作是有很大帮助的。调查统计之后，虽然不能人人马上都有适合自己能力和志愿的岗位，但至少可以向这

个方向努力。今天安排的岗位不适当，明天就可以安排得适当些。今年的待遇差一些，再忍耐一些时候，三年左右，情况一定会好转的。我们只会一天一天好起来，不会一天一天坏下去。在旧社会，我们在物质上精神上都受到压迫，现在精神上解放了，物质上再忍受一时的困难不算什么。我还希望现有的科学家能培养出更多的青年科学工作者，让他们跟着你们一道前进，这样，中国的科学事业才有前途。

再讲一讲团结问题。

为了有效地工作，科学家必须团结。说到团结，很容易想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道理。在阶级社会中，人类是划分为阶级的。有阶级的区分，就有阶级的斗争和阶级的团结。我们的国家是多阶级的国家，今天要打倒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要团结的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将来阶级消灭了，还需要继续与自然界作斗争，仍然需要团结。与自然界作斗争是无限的，所以团结也是长久的。自然科学家当然懂得这个道理。

现在我们内部还有破坏团结的因素存在，所以团结问题更加重要。我们必须划清界限，分清敌友。团结谁？反对谁？团结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家，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凡是承认《共同纲领》的都要团结。不论是私人开设诊所的医师，或是在私人工厂中服务的工程师，今天都是需要的。我们国家今天的财力有限，不能立刻建立那么多的医院，因此还需要私人开业的医生的帮助，他们对国家对人民是有益的。所以，只要是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家、知识分子，不管是工农出身、小资产阶级或剥削阶级出身，我们都应该团结，对他们都要尊重，目的

是要打倒共同的敌人。现在国内的敌人已经打倒了，国外的敌人还存在，尤其是帝国主义还存在，我们必须与破坏人民事业的敌人作斗争，这就是团结的前提。我们反对甘心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少数堕落的科学家，但有一些科学家是被动的、盲目的，或者是在非常不得已的条件下跟着敌人走的，我们很愿意争取他们回来，欢迎他们回来。科学家最易于接受真理，我们可以用事实说服他们。在这方面我们要进行说服工作。人民同他们没有私人的恩怨，只有对反动派的共同仇恨。

各民主阶级团结起来了，科学家一定会比其他人团结得更好。

凡是为新中国努力服务的科学家都是朋友，都应该团结。为了实现和巩固这个团结，我们必须破除门户之见。自然科学是分门别类的，大家所学的不可能一样，各人所努力的方向自然也不同，但是不能因此而有门户之见，互相歧视，如学这一门的看不起学那一门的，在同一部门中这个学派看不起那个学派。我们的自然科学，有许多是从国外学来的。学医的有德日派和英美派，彼此形成门户。同样，学数学、物理、化学、工程、农业、交通的人，也有这类门户之见。门户之见是受旧社会的影响形成的，很不利于我们的建设事业。今天我们要强调集体合作，抛弃那种旧的影响。各方面有各方面的长处，大家要彼此看到别人的长处，保持各自的长处，去掉短处，互相学习，互相切磋。当然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

中国共产党是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武装起来的，是决心为革命为人民服务的。党内同志尽管在大的方面是一致的，但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各人所处的具体环境的局限，相互间容易

产生隔阂。如长期处在农村游击环境中，这个山头那个山头互相隔离，产生了山头主义，形成了门户之见。又如在白区的革命工作者，长期处在秘密的环境中，容易产生只看到局部的倾向；而在根据地工作的同志，则习惯于一切公开，容易忽视秘密工作。中国无产阶级的人数不多，工业发展的程度不高，社会主义传统不深。在共产党内，党员的出身和成份不同，也容易产生不同的思想。因此，我们党开展了整风运动⁽¹⁴⁾。经过两三年的整风，迎来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¹⁵⁾，增强了党的团结，使我们党在日本投降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解放战争中更加显出了力量。以上是说在共产党内也还存有门户之见，需要整风。难道在共产党以外的团体，在所有的科学工作者之间，就能够一下子很理想地团结起来吗？

我们不能空想，不能凭主观，消除这些门户之见一定要经过一个自觉的过程。要面对事实，才能寻找出正确的方法来克服我们的缺点。一个科学团体中，人们来自不同的生活环境，有着不同的思想与生活方式，是很不容易聚集在一起的。共产党员过的是集体生活，在战争时期生活在同一队伍之中，而科学家是一小群甚至是极少的几个人在一起工作的，因此养成了各种不同的性格。科学家的良心、骨气是可钦佩的，但是科学家的脾气有时是很难相处的，这都是一定的生活环境造成的。我们要用唯物主义观点来看这个问题，要了解生活环境可以影响脾气，既然环境变了，脾气也是可以改的。

团结是在矛盾中形成和发展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们的智慧、才能、性格各有不同，相互之间有时是有矛盾的。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善于团结的人，就

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钢铁和水泥是性质不同的物质,把它们结合起来,就变成钢筋水泥那样强有力的东西。科学家能把自然界不同的物质组合、统一起来,难道不能把有不同见解和脾气的人统一起来吗?我们在自己的队伍中,就是要强调统一与团结。统一矛盾并不妨碍个性的发展。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说过,只有在共同的大前提下,个性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在旧社会,反动派利用知识分子的弱点,孤立他们,分裂他们,这样来操纵他们。人民的国家给大家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直到共产主义,逐步消灭一切束缚人类发展的阶级和反动势力,实现真正的进步和自由。以全人类的力量来和自然界作斗争,这是多大的自由,多大的个性发展!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个性得到正确的发展。不然,这部分人的个性发展了,就排斥和压迫另一部分人,这叫什么个性的发展?在人类几千年的阶级社会中,少数人无止境的欲望,妨碍了大多数人的生存与发展,这样的个性发展是专制主义的,个人主义的。我们集体主义者反对这种个性发展。我们要发挥集体主义的精神,打破个人主义的小圈子,群策群力,与群众结合,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努力。今天的胜利是经过几十年的斗争而得到的。我们今天抬头、翻身、开步走了,我们应该在团结上努力,携手共同前进。

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很多战乱,我们是欢迎和平的。我们有信心在这一辈子能看到光明、幸福、富强的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开步走,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打下万年根基,“其功不在禹下”。大禹⁽¹⁶⁾治水,为中华民族取得了福利,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一定会比大禹创造出更大的功绩。

为巩固和发展 人民的胜利而奋斗*

(一九五〇年九月三十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宣告成立,现在是一周年了。这是中国人民伟大胜利和迅速进步的一年。在这一年中,中国人民在国内继续解放战争的大进军,完成了除西藏、台湾以外的全国解放;在国外与苏联等十七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与苏联订立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¹⁷⁾。在这样的内外关系的巩固基础之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了全国人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进行了蓬蓬勃勃的改革和建设工作。国内外的人民都看到:经过了这一年,中国已经比过去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经历了更重要的变化;旧面貌的中国正在迅速地消失,新的人民的中国已经确定地生长起来了。

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过去的一年吧。

人民解放战争的大胜利

我们是在人民解放战争继续胜利进行的条件之下度过过

* 这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为建国一周年举行的庆祝大会上的报告,刊载于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

去的一年的。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夜已经得到了基本的胜利。但是当时国民党残余匪帮还占据着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地区，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和一些海岛。在过去一年中，人民解放军经过了衡阳——宝庆、广东、广西、平而关、海南岛各次战役和漳州——厦门战役，解放了华南全境和福建省，然后又经过西南、滇南、西昌各次战役，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西南全境。此外，人民解放军还解放了舟山群岛、东山岛和其他岛屿。在这一年中，我军消灭了敌军二百零三个整师，共约二百八十八万人。

这样，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在四年的作战中，我军就消灭了敌军八百零七万人。在我军四年作战的大量缴获中，单是各种炮就有五万四千四百三十门之多。大家知道，我们所缴获的这些炮和其他军火，除了一小部分是国民党反动派自己制造的以外，其余大部分都是美国制造了供给国民党反动派的，还有一部分是日本制造，也是在美国帮助之下由投降的日本军队交给国民党反动派的。

中国人民从全部中国大陆上消灭了美国所武装的国民党匪军，得到了这样巨大的胜利，可以给我们什么教训呢？最重要的教训就是：这样巨大的胜利决不是历史上的偶然现象，而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无数次革命斗争的必然结果。没有千千万万人民的决死支持，绝对不可能设想这样巨大这样迅速这样彻底的胜利。中国人民的这个胜利，和中国历史上有过的“统一”完全不一样。历史上有过这样那样的“统一”，但是那些“统一”者或者本来是人民的压迫者，或者本来虽不是而后来

也变成了人民的压迫者，因此他们不可能达到真正的统一，而那些“统一”不久也就瓦解了。今天出现了第一次的中国人民的统一。人民自己成了中国土地上的主人，而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就从此永远不可挽回地被推翻了。中国人民所消灭的敌人既然是由美国政府所武装，那么就可以完全确定：中国人民不但对国内敌人取得了胜利，同时也对国外敌人即美国的帝国主义干涉者取得了胜利。美国帝国主义者如果再要采取什么新的工具和新的形式来干涉和侵略中国，它就必然重复国民党所遭受的失败。

现在中国人民和国民党反动派残余的斗争还没有完结，这是因为反动派残余所盘踞的台湾，现在是在美国海军和空军的直接控制之下。人民解放军决心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并最后消灭中国反动匪徒的巢穴。人们可以看出：在解放台湾的作战中，我们的战略地位是比任何敌人要优越得多；我们是站在神圣的正义方面；我们的后方是这样近，这样大，这样巩固；我们正为取得这个最后胜利而在加倍努力。人民解放军也决心西去解放西藏人民，保卫中国边防。对于这个为祖国安全所必须的步骤，我们愿以和平谈判的方式求得实现。西藏的爱国人士对此已经表示欢迎，我们希望西藏的地方当局不再迟疑，好使问题能得到和平解决。

中国百多年来的历史特别是近二十几年的历史表明：中国一直是帝国主义侵略盗匪的重要目标，因此胜利了的中国人民不可能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来保护自己。我们必须及时地加强我们的国防建设，并且随时警惕地注视着帝国主义敌人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我们必须建立强大的人民空军和人

民海军,才能够击退从空中和海上袭来的武装盗匪,保护我们的领空领海不受侵犯。我们的人民陆军必须陆续加以强化,使它足以战胜任何侵略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明确地规定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共同纲领》⁽¹⁾上。《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在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的问题上,《共同纲领》规定:“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中央人民政府一年来的外交,就是按照这些基本原则执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波兰、蒙古、德意志、阿尔巴尼亚、缅甸、印度、越南、丹麦、瑞典、瑞士、印尼等十七个国家,已与我国相继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巴基斯坦、英国、锡兰、挪威、以色列、阿富汗、芬兰、荷兰等八国,也已经表示愿与我国建立邦交,其中,英国、挪威、荷兰、芬兰四国尚在与我国进行建交的谈判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坚决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并且与苏联建立了最亲密的兄弟关系。在毛主席访问苏联期间，中苏两国缔结了具有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由于这个条约，欧亚大陆上的近七万万伟大的人民已经结成了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亲密同盟，使两国防御由东方来的侵略的力量大为加强。在这个条约的同时或稍后，中苏两国还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的协定，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协定，关于建立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的协定，专家协定，贸易协定等。在这些协定中，我们的伟大盟邦给了在恢复战争创伤期间的中国以许多慷慨的援助。全中国的人民，由于中苏之间的条约、协定的签订和实施，感到极大的兴奋，对于苏联领袖斯大林大元帅、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的友谊，表示无限的感谢。

中国与波兰、捷克和朝鲜也已签订了关于贸易的合同和协定，与德国和匈牙利的贸易谈判正在进行。

中国与若干资本主义国家也发展了贸易关系。今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估计是可以达到并超过预定计划的。

对于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比建立贸易关系的问题要复杂。在这里可以特别提起与英国进行了长时间而还没有结果的谈判。谈判还没有结果的原因就是英国政府一方面表示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方面又同意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残余集团的所谓代表继续非法地强占联合国中的中国席位，这样，就使中英的正式外交关系难于开始。英国

在香港和其他地方对待中国居民的极端不合理的非友好态度，也不能不引起中央人民政府的严重关切。

美国政府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间始终站在中国人民的敌人方面，用一切力量援助国民党反动派进攻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美国政府对于中国人民的敌视有加无已。不顾苏联、印度和其他国家的正当指摘，美国在联合国及其各个组织中间，顽固不化地阻挠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参加，并且无耻地庇护着国民党反动派残余集团的所谓代表的席位。美国同样在阻挠中国代表参加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¹⁸⁾，并阴谋抛开中国和苏联缔结对日和约，以便决定重行武装日本和保留美国在日本的驻军和军事基地。美国为着进一步扩大在东方的侵略，故意制造了李承晚⁽¹⁹⁾傀儡集团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进攻，随即借口朝鲜的形势派遣海军空军侵略我国的台湾省，宣布所谓台湾地位问题应由美国所操纵的联合国解决，同时多次派遣侵略朝鲜的空军侵入中国辽东省⁽²⁰⁾上空，实行扫射轰炸，并派遣侵略朝鲜的海军炮击中国的航海商船。美国政府由于这些疯狂横暴的帝国主义侵略行为，已经证明了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危险的敌人。美国的侵略武力已经侵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并且随时有扩大这种侵略的可能。美国侵略台湾和朝鲜的总司令麦克阿瑟早已透露了美国政府的侵略计划，并且正在继续制造扩大侵略的新借口。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美国的侵略暴行，并决心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及其他领土。

中国人民密切地关心着朝鲜被美国侵略后的形势。朝鲜人民和人民军是坚决而勇敢的。他们在金日成首相领导之下

抵抗美国侵略者，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并且受到了世界人民的同情和声援。今后朝鲜人民在坚持长期抗战的方针下，必能克服许多困难，取得最后胜利。

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一亿二千万个中国人已经在斯德哥尔摩的庄严宣言⁽²¹⁾上签了名，这个签名运动还在中国人民中继续扩大。很明显，中国人民在解放自己的全部国土以后，需要在和平而不受威胁的环境下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工作。但是美国侵略者如果以为这是中国人民软弱的表示，那就要重犯与国民党反动派同样严重的错误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谁要是企图把中国近五万万人口排除在联合国之外，谁要是抹煞和破坏这四分之一人类的利益而妄想独断地解决与中国有直接关系的任何东方问题，那么，谁就一定要碰得头破血流。

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 准备土地改革工作

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常常过低估计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因为他们习惯于拿看待旧中国的眼光来看待解放了的新中国。他们常常忘记了中国人民已经有了自己的最有力的武器，即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人民民主专政，已经把自己的力量组织了起来，并且把反对人民的反动分子压倒了。

在过去一年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之下，全中国已经

成立了一个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和一个中央直属的自治区人民政府，四个大行政区的军政委员会，二十八个省人民政府，九个相当于省的行政区人民行政公署，十二个中央和大行政区直辖的市人民政府，六十七个省辖的市人民政府，二千零八十七个县人民政府。所有这些政权组织，都与压迫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组织在原则上根本相反，因为它们是代表各阶层人民利益、联系广大人民而仅仅压迫反动派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

在各级人民政府中，有的已经是相当的人民代表会议⁽²²⁾选举出来的。有极少数的市和县已经召集了人民代表大会。其他所有的市以及一千七百零七个县，三十六个蒙古旗，都召集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大部分的区乡和村都召集了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会议或农民代表会议。这些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对于团结人民中的各阶层、各党派、各民族，对于政府听取人民的意见及人民了解与监督政府的工作，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各级人民监察组织和工作，业已开始建立，但各级人民政府还须加强对这方面工作的领导。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在过去一年中已经证明了是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兄弟民族、各人民团体进行协商的有效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仿照这个经验，十二个省、七十三个市和很多县都组织了省、市、县的协商委员会。

有组织的人民在过去一年中的迅速增加，是使中国人民团结大大加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全国各主要产业部门和主要城市的工人基本上已经组织起来，全国工会会员已经有四

百零九万人，约占全国工人职员总数三分之一。新解放区农民协会正在普遍地建立，今年将要实行土地改革的华东和中南两区的农民协会会员已经达到两千万人以上。全国有组织的妇女在民主妇联领导下已经有三千多万人。全国有组织的青年已经有七百多万人，其中包括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三百零一万人。

过去一年的经验表明，中国各民主阶级和各民主党派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是团结一致的。为了加强这种团结，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在过去一年中，曾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骤来调节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工人阶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阶级，忽视工人阶级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无疑地是不能够容许的。但是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的中国既然有它的重要作用，那么，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使其积极地参加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事业，也就是工人阶级自己的利益。在今后，各民主阶级关系的调节，仍然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各民主党派间的关系，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和各友党之间的关系，是良好的和融洽的。各民主党派对于中央人民政府所执行的各项重要政策，都经过了充分的协商，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与合作外人士的团结合作的指示⁽²³⁾并开展整风运动⁽²⁴⁾以后，这种合作将更有进步。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的关门主义，仍然是一部分共产党员的主要倾向，必须继续注意克服，来巩固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团结。同时对违反原则的迁就倾向，也必须防止。

中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在过去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是恶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这种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内蒙成立了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成立了各民族的联合政府，汉族人在这个政府中只占少数。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实行区域自治的方针，正在有步骤地求其实现。在民族杂居区的人民政府，努力于调解民族间的历史纠纷，鼓励民族间的互让互助。中央人民政府力求促进少数民族区的卫生事业、教育事业和经济事业，而对于各民族内部的社会改革工作，却采取完全依靠各民族自觉自愿的原则，反对在这方面采取强迫命令手段。对于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其他群众性的风俗习惯，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坚持不干涉的原则。由于实行以上的政策，各民族对于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中的汉族干部，已经开始表示信任和爱戴了。但是在团结各民族方面，我们所已经做的还很少，需要做或者需要改善的地方还很多，因此我们不应当有丝毫自满的地方。

人民民主专政包括对人民的民主和对反动派的专政两个方面。对人民的民主需要继续扩大，而对反动派的专政则需要继续加强。

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虽然已经逃到台湾，但是他们在大陆上却有计划地留下了一大批土匪和特务人员。土匪最多的时候曾经达到一百多万，但是经过一年来人民解放军协同当地人民的坚决的剿匪斗争，现在已经只剩二十万人左右，还需要继续清剿，借以根绝匪祸，安定新解放区的社会秩序。人民公安机关对于特务机关的斗争也得到了巨大的胜利。一年来，

全国就捕获了特务分子一万三千七百九十七人，缴获电台一百七十五部。此外，在过去一年中，还破获了国际间谍案七起。要知道，反对特务和间谍的斗争，是不会随着反土匪斗争的结束而结束的。无论是本国或外国的敌人，在公开的武装斗争失败以后，一定会利用种种掩护进行潜伏斗争，这是中国人民所必须警惕的，也是人民政府所必须予以镇压的。

在过去一年中，中国人民司法工作在保护人民权利，惩治土匪、特务和其他犯罪分子，制订人民法律，改善诉讼制度和监狱管理等方面都有了成绩，但也有缺点。最重要的缺点是许多地方的司法工作人员在镇压反革命分子的问题上曾经发生曲解宽大政策的偏向。他们对于反革命分子只有宽大而没有镇压，以致人民群众责备他们为“宽大无边”。人民群众的这种责备是正确的。毛主席所规定的对待反革命分子的原则是“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必须完整地而不是片面地执行这个指示，使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受到坚决的镇压。这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严重任务之一。

目前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最重要任务，就是在中国新解放区实施土地改革⁽¹⁰⁾。实施土地改革，这就是保障约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基本生存权利；这就是消灭反革命活动的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地主阶级；这就是实施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任务——解放被封建生产关系所束缚的农业生产力，并从而为中国的迅速工业化准备条件。在新解放区约三万万人口中实施土地改革，这是紧接着人民解放战争而来的中国第二场最激烈的阶级斗争。为了有准备地、有步骤地、有秩序地进行这一场斗争，中央人民政府已经先后发布了

土地改革法、农民协会组织通则、人民法庭组织通则、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等项指导文件，并且决定在一九五〇年冬季只在一万万人口的地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而将其他地区留在明年或明年以后进行。

在今年冬天就要实施土地改革的地区，现在已经在宣传关于土地改革的法令文件，训练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和人民法庭工作的干部，发展或整顿农民协会的组织。这些步骤是必要的。任何剥削阶级不会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在中国有了几千年历史的地主阶级决不是例外。地主阶级中现有一些人正在制造反对土地改革和土地改革法的“理论”，对于这种“理论”应当加以坚决的驳斥；应当加强对于土地改革法各项主要内容的宣传，使之在准备土地改革的地区首先是农村中家喻户晓。还有一些地主正在非法地分散土地财产，宰杀耕畜，破坏农具、房屋、耕地和树木，对于这些不法行动，必须坚决制止和制裁。对于土地改革的最重要的准备是干部的准备，因此必须集中主要的力量来训练干部和巩固农民协会。有了纯洁可靠的农民积极分子领导下的农民协会，才能保证土地改革工作的顺利完成。

统一财政和恢复经济

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各级政权机关成立以后，在战争已经结束的地方立即遇到一个最迫切的任务，这就是扭转国民党反动派多年罪恶统治所遗留下来的财政经济的极端混乱危险的状况。中国人民所接收的城市，由于多年不断的通货膨

胀,物价高涨,差不多变成了投机商人的大赌场。为了稳定通货和物价,必须平衡财政收支和保证物资供给。而在稳定通货和物价以后,又必须按照新的条件和新的需要,调整全国的工商业,整理交通,使之为恢复生产服务。除此以外,人民政府还必须立即进行对于国民党反动统治和战争所造成的灾荒和失业的救济。一切这些,就是人民政府所面对着的巨大的困难的任务。帝国主义者再三地认定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被这些看来是无法解决的难题所压倒,而不得不向他们求救。但是一年来的经验证明:帝国主义的预言家是破产了;中国人民在经济战线上如同在军事和政治的战线上一样是胜利了。

中央人民政府在忍受了在解放战争扩大期间所不可避免的几个月的通货膨胀以后,在今年三月间决定用极大的努力来增加财政收入,减缩财政支出,使收支接近于平衡。为了保障这个计划的实现,中央人民政府迅速地完成了全国财政管理的空前未有的统一。中央人民政府的计划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这样,通货膨胀立即制止了,从今年三月以来,不但不再需要增发通货来弥补财政赤字,相反地,中国人民银行存款总额在今年九月份比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份竟增加了十六倍以上。

为了维持物价稳定,还需要保障物资供给。中国虽然是一个农业国,但是腐败的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却连中国所需要的粮食和棉花多年来也依赖外国输入,加上国内市场被官僚资本家和投机商人所操纵,以致物价无法稳定。中央人民政府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恶劣状况。由于中央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掌握了充分的粮食、花纱布、煤炭、食盐等民生必需品,并克

服了调运和贮存的严重困难，战胜了投机商人的扰乱，使全国大城市和灾区的供应问题得以顺利解决，今年三月以来的全国物价已经基本上趋于稳定。最近因为夏秋季的丰收和由外国进口的某些物资的减少，农产品和工业品的差价有些增大，中央人民政府正在设法调节，以免农民和一部分以粮食计算的工资生活者的生活受到影响。

财政收支接近平衡，物价趋于稳定，如同毛主席所指出的，还只是我国财政经济情况的开始好转，还不是它的根本好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为了达到根本好转，除了必须完成土地改革，大量地节减国家机构所需要的经费以外，还必须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使它从适应于囤积投机的活动转变为适应于生产的有计划的恢复和发展。为了从各方面解决这个问题，国家的经济行政机关、国营企业机关、私营企业机关、合作社组织和工会组织，已经在克服产销的盲目性和加强产销的计划性问题上，在向私营企业实行委托加工、订货、收购和贷款的问题上，在公私商业、金融业和合作事业的分工问题上，在解决侨汇困难的问题上，在调节劳资关系的问题上，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议和商讨，并得到了初步的结果。当然，私营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与彻底的计划性是有矛盾的。但是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第一，在一切最重要的经济部门，我们已经有了强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经济，并已开始发展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第二，私营经济是处在国家经济的各种形式的领导之下，其中还包含着日益发展的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因为这样，我们就有根据来说，可以使中国的经济一步一步地避免过去的无政府状

态,而带有更大的计划性。

在调整各种经济关系的问题上,中国合作事业的发展已经开始具有重要的意义。据今年七月的统计,全国合作社已经有了社员两千万人以上,资金五千五百余亿元⁽²⁵⁾,在今年第一季度购销业务的总值已达三万八千五百亿元。合作社的发展主要地是在东北、华北和华东的老解放区。东北合作社一九四九年采购和推销的总值,合高粱一百三十余万吨,等于东北公营贸易总额的百分之四十。目前我国最需要发展的合作社是农村中的供销合作社和城市中的消费合作社,这两种合作社的任务,就是保护小生产者和消费者少受或免受中间剥削,促进生产的发展,这是我国劳动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中央人民政府正在拟订合作社法,以便全国合作事业能够得到健全的发展,避免过去所曾发生过的错误。

从全局来说,由于长期的战争和战争还没有结束,并由于缺乏必要的准备条件,中国的经济事业现在还只是处在恢复的阶段。我们还缺少发展工业的资金,还缺乏对于实际情况的全般了解,在干部和经验方面也很不足。在一九五〇年,中央人民政府把财政开支约百分之二十三点九用于经济建设的投资,这个数字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政府的建设投资都要大,但是,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建设的全部需要来说,这个数字却是很少很少。在一九五一年,这个数字还不能希望有大的增加。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恢复将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然后才能转入有系统的发展。在这三五年内,我们应当集中力量于几个重点的发展,这种发展,应当是有益于为工业化

准备基本条件，即资金条件、国内市场条件和技术条件的，同时，对于国防建设，也需要占适当的比重。因此，中央人民政府的经济投资，将着重用在发展工农业所首先需要的水利事业、铁道事业和交通事业方面，用在农业和纺织业方面，用在一切工业所首先需要的燃料工业、钢铁工业和化学工业方面。

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在今年生产原粮二千四百亿斤，棉花一千三百万市担，现在估计都可能实现，或者还要超过。全国纱锭有五百二十二万锭，去年九月开动四百零八万锭，今年九月开动四百二十八万锭，拟争取于今年年内再开动二十万锭。全国铁路，至一九五〇年六月底止，已通车者达二万一千七百四十二公里，占全国铁路线百分之八十八，到今年年底，可达二万二千零十九公里。今年一月至八月，国营煤矿产量比去年同期增产百分之三十七，国营电厂可供电量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三十一，实际售电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五十八。

在过去的紧张的一年中，中央人民政府除了坚决制止经济上的混乱并开始了恢复工作以外，在救济灾荒和失业的工作上，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一九四九年中国遭受了严重的水灾，受灾面积达一亿二千万亩，灾民四千万人，包括情形最严重的灾民七百万人。今年在皖北和河南等地方又发生水灾，灾田仍有四千多万亩。为了直接间接地救济灾民，中央人民政府在今年一月到九月支付了二十二亿四千万斤细粮，派出了大批干部，采取了各种有效的救济的步骤，使受灾的人民得以安全地渡过了灾荒，这在一九三一年国民党反动政府处理那年的水灾使人民遭受大量的死亡一事比较起来，实有天渊之别。

中央人民政府在一九五〇年投资十几亿斤细粮，动员几百万人来兴修水利，这是今年灾荒减少并在全中国得到丰收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四十几万失业工人（其中包括一部分失业知识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全中国人民一同进行了救济。失业只是我国经济恢复工作开始时期的一个暂时的现象，这个现象在东北已经基本上消失，在其他地方，今后两三年内也将同样消失。

培养干部和提高文化

象经济一样，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在过去一年中，一方面进行了恢复工作，一方面又开始了新的创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一年，是全国人民卷入学习高潮的一年。闭塞聪明制造无知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统制被打倒了；各个阶层的人民，从工人到大学教授，甚至许多老年人，不约而同地要求用新的眼光来观察中国，观察世界，观察自己。在学习中，广大的人民迅速地认识了新的中国和新的世界，认识了劳动的光荣和为人民服务的光荣。人民政府用种种方法满足人民的学习要求。以前难得有学习机会的工人农民，现在也得到机会了。学校向工人农民和他们的子弟开了门。七十万职工已经参加了经常的业余学校，一九五一年的人数将增加一倍以上。一千多万农民已经参加了冬学，明年并将有五百万农民参加常年的农民业余学校。

新中国的建设需要大量的有充分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知识的干部。人民政府正在从三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大规

模地提高现有干部(主要是工农出身的干部,包括人民解放军的干部)的文化水平,为他们举办工农中学和工农文化补习班,或者吸收其中具有适当条件的人到各种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第二,大规模地训练旧公务人员和知识分子,使他们在较短期间抛弃旧的错误的政治观点,取得新的为人民服务的观点。第三,有步骤地改革现在的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使它们能够适应人民的需要。这几项工作在过去一年中都已经开始,并且得到了良好的效果,今后将沿着这个方向更有效地进行,以便在最近几年内可以源源不绝地向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战线输送它们需要的干部。

中央人民政府为了提高中国人民的文化生活水平,对于全国的艺术和出版事业正在进行有系统的改进和推广工作。年轻的人民中国的电影已经迅速地在市场上代替了美国电影的地位,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并正在逐步深入到部队、工厂、农村中间去。书籍、刊物和报纸的发行量和流通范围,也已经迅速地增加和扩大。

人民政府在领导人民反对愚昧的同时,领导着人民向疾病作斗争。在过去一年内,人民政府已经大规模地展开了防治疫病的斗争。人民政府决定在最近几年内在每个县和区建立起卫生工作机关,以便改进中国人民长时期的健康不良状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年,虽然还遭遇着种种困难,虽然也还有许多工作上的错误和缺点,但已经显出了自己的壮健的生命力和无限的前途。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而且已经克服了许多。工作上的错误和缺点是可以改正和弥补的,而且已经改

正和弥补了许多。人民对于自己的国家已经给予了信任。毫无疑问，人民的信任是正确的。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政府，曾经在一年内做了这么多有利于人民的工作；只有一个政府，曾经在一年内驱逐了那么多的强盗式的“军队”和“政府”，而代之以纪律严明和蔼可亲的人民军队和廉洁而讲道理的人民政府；只有一个政府，曾经在一年内剥夺了帝国主义国家的特权，消灭了可恨的特务机关，停止了无限期的通货膨胀，而给予人民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这个政府，就是中央人民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伟大的开端中所得到的成功和胜利，乃是全体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结果，乃是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天才领导的结果。

全中国人民将在自己的政府和领袖的领导之下，团结一致，努力工作，巩固和发展这些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造者和领袖毛主席万岁！

抗美援朝⁽²⁶⁾，保卫和平^{*}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四日)

朝鲜反侵略战争胜利地开始，大家看到了朝鲜人民的英勇，同时也看到了美帝国主义的残暴。

七月半以后，美帝国主义向南撤退，迅速地把军力集结在朝鲜半岛南方大邱地区，意图引诱朝鲜人民军向其进攻。年轻的朝鲜人民军是勇往直前的，要一直把美国兵赶下海去。当时的形势已表现出战争将长期化。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新的国家，朝鲜人民军是一支年轻的部队，他们战斗非常英勇，真使我们感动。敌人依仗暂时的强大，有意制造阴谋。现在朝鲜是困难的，但他们英勇地坚持着，在南方打游击，在北方抵抗，斗争仍在继续，只要坚持下去，就可以生长出新的力量来打败敌人。朝鲜地方较小，所依靠的基础是九百万人口，以这样的力量，抵抗这么强大的敌人，下了长期抵抗的决心，是难能可贵的，我们应当赞佩。

朝鲜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它同国际上的其他问题是不可分割的，朝鲜人民的长期抵抗，将更增加问题的国际性。同时，朝鲜要胜利，也必须得到国际的援助。尤其是在困难的时

* 这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十八次常务委员会上的报告。

候，更需要国际的援助。我们应该发扬革命的道义。只有朝鲜胜利了，和平阵营才不会被打开一个缺口。如果朝鲜这个缺口被打开，则其他方面要相继被打开。东方阵线门户洞开，敌人打进我们的大门来了，怎么还能谈建设？

中朝是唇齿之邦，唇亡则齿寒。朝鲜如果被美帝国主义压倒，我国东北就无法安定。我国的重工业半数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敌人轰炸威胁的范围之内。从八月二十七日到昨天这两个月间，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已侵入我国十二次。最近不仅在鸭绿江，而且已飞到宽甸来示威、侦察、扫射和轰炸。如果美帝打到鸭绿江边，我们怎么能安定生产？

我们国家的建设需要有三年五年时间先恢复生产，我们也正在进行恢复工作。最近拟定了一九五一年的经济计划，总想减少军费，增加经济建设费和文教费，把军费由今年占预算的百分之四十三减为明年占预算的百分之三十，以全部概算的百分之七十投入经济建设、文教事业等，并考虑改善公教人员的生活，收购农民的余粮，发展日用品的生产。但敌人不让我们这样做。不久以前华莱士⁽²⁷⁾给毛主席一封信，他说，愿中国造拖拉机，不要将造拖拉机的力量造了坦克车。实际是敌人不许我们建设，逼得我们不能造拖拉机。

假如我们采取消极防御的办法，那是不行的。消极防御也要花许多钱，例如改装一个飞机场就要一亿斤小米，东北修八个，关内修三个，就要十多亿斤小米，飞机场外还有许多设施，所费甚大。再有工厂搬家，许多工业无法按计划生产下去。军事上，除装备之外，还有兵力问题，鸭绿江一千多里的防线，需要多少部队！而且年复一年，不知它哪一天打进来。这样下去

怎么能安心生产建设?况且敌人如果将朝鲜侵占了,也不会就此罢手。所以,从朝鲜在东方的地位和前途的展望来说,我们不能不援助;从唇齿相依的关系来说,我们也不能不援助。这是敌人把火烧到了我们的大门口,并非我们惹火烧身。

一个月前,就是说美军在仁川登陆以前,我们曾经考虑过,美帝打到三八线⁽²⁸⁾后是否会停止,而后转为外交的谈判。在敌人占领汉城以后,尼赫鲁⁽²⁹⁾曾经对我们说,三外长会议⁽³⁰⁾已经说好,不过三八线,如要过三八线也要提到联合国来决定。但我们得到的情报是,他们要稳住中国,过三八线,过了以后,再搞中国。我们看穿了骗局,所以在九月三十日声明:对美帝侵略朝鲜我们不能置之不理⁽³¹⁾。十月一日、二日的消息是美军已过三八线,南朝鲜军则在三八线以北深入很远。我们曾找印度驻华大使指出,以上情况与尼赫鲁所说不同,我们对朝鲜问题不能不管,要他通过尼赫鲁转告贝文⁽³²⁾。过了几天,敌人的推进并不停止。不久,贝文通过尼赫鲁向我表示,过了三八线到距鸭绿江四十英里时即可停止。当时敌人已进到平壤。目前,敌人又由平壤北进。这显然是对我们第二次欺骗。如此下去,我们如坐视不救,敌人必然继续前进,咄咄逼人,直到鸭绿江边,然后再做第二步文章。

所以我们要理,要管。但如何理?如何管?要有进一步的决策。过去我们是管过理过的,例如向联合国控诉等。现在这样已经不够了,应有新的决策。美帝国主义的政策是一步步地制造并扩大战争。如果我们予以打击和斗争,它可能缩回去,否则它必然照计划继续推进。

美帝国主义在东方实行麦克阿瑟⁽³³⁾的政策,利用日本的

基地，继承日本军国主义的衣钵，沿袭着甲午战争⁽³⁴⁾以来的历史，走吞并中国必先占领东北，占领东北必先占领朝鲜的老路。不过日本帝国主义是用四十多年的时间逐步进行的，而美帝国主义则要在四五年内来完成。

历史的教训是：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我国一派主抗，一派主让，让到七七事变⁽³⁵⁾，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抵抗，还抗不起来。甲午之战也是抗，不过那是在统治者中的抵抗，由腐败的朝廷领导，没有人民的支持，结果失败了。如果是人民的国家，就不会如此。

现在对美帝如果不抵抗，一着输了，就会处处陷于被动，敌人将得寸进尺。反之，如果给以打击，让它在朝鲜陷入泥坑，敌人就无法再进攻中国，甚至会影响它派兵到西欧的计划。这样，敌人内部的矛盾也会发生。总之，如果我们让，只会缓和敌人内部的矛盾；管，则会促使敌人内部矛盾加深。只有管，才能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不过，我们过去的管法现在已经无效，只有拿出力量来管，才能起作用。

朝鲜问题对于我们来说，不单是朝鲜问题，连带的是台湾问题。美帝国主义与我为敌，它的国防线放到了台湾海峡，嘴里还说不侵略不干涉。它侵略朝鲜，我们出兵去管，从我国安全来看，从和平阵营的安全来看，我们是有理的，它是无理的。

美帝国主义用武力压迫别国人民，我们要使它压不下来，给它以挫折，让它知难而退，然后可以解决问题。我们是有节制的，假如敌人知难而退，就可以在联合国内或联合国外谈判解决问题，因为我们是要和平不要战争的。必须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外国军队必须退出朝鲜。如果解决得好，

美帝国主义受到挫折,也可以改变台湾海峡的形势和东方的形势。我们力争这种可能,使国内外人民一致起来,动员起来。

还有另一种可能,敌人愈打愈眼红,打入大陆,战争扩大。敌人孤注一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美帝有疯狂的一派,我们应该做这方面的准备。我们并不愿意战争扩大,它要扩大,也没有办法。我们这一代如果遇着第三次世界大战,为了我们的子孙,只好承担下来,让子孙永享和平。不过我们绝不挑起世界大战。我们应力争前一种前途,力争和平。但也准备应付后一种可能,应付世界大战。

既然要拿出力量来管,那么我们的力量如何?

我们的陆军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但是空军海军不足,因为我们在去年春天才开始建空军和海军。那么是否要等到我们力量强大时再抵抗呢?不行。那样敌人就会把朝鲜压了下去,气焰会更加高涨,敌我力量对比会相距更远。所以我们必须全面地发展地考虑问题,到斗争中去增强自己,在狂风暴雨中锻炼自己。革命的力量有时看起来是劣势,在斗争过程中却会变为优势。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时间,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另外,我国大陆防卫的力量也要顾到。敌人可能来轰炸,或者用蒋介石的空军来轰炸,或登陆袭扰,我们应增强防卫力量。政治上,我们有同盟国家、友好国家的支援,力争和平。方式上,我们采取志愿军的形式,无须宣战。宣传上,我们应该广泛宣传抗美援朝,保卫和平。同时,我们在国内要镇压敌特的捣乱,巩固广大人民内部的团结,经济建设不能停止,重工业要有重点地恢复,水利、铁道、纺织这几方面的建设要不动摇地进行,并且要照顾到人民生活的改善。

切实执行婚姻法， 保护妇女合法权益*

(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六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³⁶⁾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公布的国家大法之一。这一国家大法的公布施行，是中国人民在赢得革命战争胜利之后和全国范围进行土地改革⁽¹⁰⁾的同时，进一步肃清封建残余和建立新的社会生活的重大的社会改革。这一国家大法公布施行以来，已经获得广大人民的拥护，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封建压迫的旧家庭制度正在逐渐变革，平等和睦的新家庭正在不断产生。大批新中国的男女，特别是深受封建制度压迫的妇女群众，得到了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的权利，因而更积极地参加了新社会的各种政治活动和各种建设事业。

但是，由于中国社会曾经长期地受着封建主义的统治，虽然土地改革运动已经或正在从经济基础上给封建制度以根本的摧毁，而封建思想和封建婚姻制度的残余，不仅在一部分人民中，甚至在不少的干部中，依然留有深固的影响。根据各方

* 这是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署名发布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指示》，刊载于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

面的报告,许多地方带有封建思想的人仍有继续干涉男女婚姻自由、虐待妇女和虐待子女等非法行为,而一部分干部竟对此种非法行为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或者有意予以宽纵、袒护,甚至他们本身也做出直接干涉男女婚姻自由的非法行为,致使被干涉者和被虐待者得不到法律上和事实上应有的保护。因此,包办、强迫与买卖婚姻在许多地方,特别在农村中,仍然大量存在。干涉婚姻自由与侵害妇女人权的罪行时有发生,甚至严重到迫害妇女的生命,致使全国各地有不少妇女因婚姻问题而被杀或自杀。据不完全的统计,各地妇女因婚姻不能自主受家庭虐待而自杀和被杀的,中南区一年来有一万多人,山东省一年来有一千二百四十五人,苏北淮阴专区九个县在一九五〇年五月到八月间有一百一十九人。这些数字必须引起各级人民政府严重的警惕。各级人民政府对此严重情形绝对不应容忍。

最近几个月,华东军政委员会、中南军政委员会和有些省(市)人民政府已先后发布了贯彻执行婚姻法的指示,对于上述违法现象加以处理和纠正,这是十分必要的。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曾受长期封建主义统治的社会中,婚姻法的执行是一件艰巨的社会改革工作,必须经过经常的有系统的思想斗争和法律斗争才能贯彻。为此,各级人民政府一方面必须把婚姻法的贯彻执行和对于干部与人民的思想教育,当作相当长时期内经常的重大政治任务,并领导司法、民政、公安、文教等机关并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通力合作,尽可能结合当地土地改革、民主建政等中心工作切实进行;另一方面,必须对于因干涉婚姻自由而伤害、虐杀妇女或逼致妇女自杀的严重罪行,采

取严肃的法律手段予以制裁。各级人民政府对于这种已经发生的伤害、虐杀妇女或逼致妇女自杀的案件，应即进行检查。已判者，如有错误，应予查明，依法处理；未办者，必须严加追究，依法制裁，务使每个犯罪者都受到应有的惩处。干部中如有宽纵、袒护罪犯，或干涉男女婚姻自由因而促成妇女被杀或自杀者，应按责任轻重，予以应得的处分。今后如有妇女因婚姻问题得不到婚姻法所赋予的权利与保护而被杀或自杀者，区、乡、村（街）级的主要干部，首先应负一定责任。

为了保证婚姻法的正确执行与贯彻，各级人民政府首先应教育干部，尤其是区、乡、村（街）级干部和司法干部，认真地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各级司法机关与婚姻登记机关在处理婚姻事件时，必须严肃负责，遵守婚姻法的规定，并通过具体事例加强对婚姻法的宣传，批判封建主义婚姻制度的不合理，表扬按照婚姻法处理婚姻事件的典型例证，在人民中树立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的新风气，而对于有教育意义的严重案件，则应在群众中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后举行公审，以便正确而全面地教育干部和教育人民。同时，各级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的每个干部都应认识到：能否认真坚决地执行婚姻法；能否采取严肃慎重负责的态度解决婚姻案件，保护妇女的合法利益；能否积极支持群众特别是被压迫的妇女群众反对封建婚姻制度和反对封建思想的正义斗争；能否在处理自己本身的婚姻问题时以身作则地遵守婚姻法——这些，都是自己在政治上是否愿意彻底反对封建主义的严重考验，也是能否严格地遵守人民政府法令的严重考验。

本指示下达后,省(市、行署)以上各地方人民政府应即督促所属司法、民政、公安、文教等部门并邀请协商机关及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有领导有重点地组织一次关于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检查,采取有效办法发扬成绩,纠正缺点,并查处杀害妇女或逼致妇女自杀的严重违法的案件。各省、市人民政府应将此项检查结果于十二月底以前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做专题报告。本年内各级人民代表会议⁽²²⁾及其协商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在开会时,必须进行一次关于婚姻法的宣传和执行情况的报告和讨论,并将讨论结果按级上报。

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

(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北京大学教师学习会⁽³⁷⁾和马校长⁽³⁸⁾要我给他们做一个报告。我想,既然给北京大学讲,也就应该给别的大学讲。因此,我同教育部商量了一下,这个报告会就以北京大学为主,把北京、天津其他大学的教师和同学代表也请来了。

我讲什么呢?做一般的政治报告吧,也许不适合大家的要求,因为大家正在进行思想改造的学习,这样的报告不是最需要的。既然在学习,就一定要下决心改造自己。因此,我想讲一讲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

讲到改造问题,我想还是先从自己讲起。我中学毕业后,名义上进了大学一年级,但是正赶上五四运动⁽³⁹⁾,没有好好读书。我也到过日本、法国、德国,所谓留过学,但是从来没有进过这些国家的大学之门。所以,我是一个中等知识分子。今天在你们这些大知识分子、大学同学面前讲话,还有一点恐慌呢。不过,我总算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有一些体会,联系自己来谈这个问题,可能对大家有一点帮助,有一点参考作用,总不至于成为一种空论吧!

* 这是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讲话的前两个问题。

大家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改造自己。我想，凡是要求学习的人，都应该有这样一个起码的认识。当然，改造需要时间，一下子要求很高、很快，这是急躁的，不合乎实际的。应该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拿我个人来说，参加五四运动以来，已经三十多年了，也是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改造。也许有的同志会说：你现在担任了政府的领导，还要学习和改造吗？是的，我还要学习和改造。因为我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没有明白的道理也很多，所以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认识，这样才能够进步。三十年来，我尽管参加了革命，也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部门做了一些负责的工作，但也犯过很多错误，栽过筋斗，碰过钉子。可是，我从不灰心，革命的信心和革命的乐观主义鼓舞了自己。这个力量是从广大人民中间得到的。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和决心，即犯了错误，就检讨，认识错误的根源，在行动中改正错误。有了犯错误的经验，就可以少犯以至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当然不可能一次就改得好，犯了一次可能再犯，但总可以改正吧！犯了错误，不要当作包袱，要把它丢开。丢开了还不算，还应该公之于众，作自我批评。这不仅可以教育自己，同时也能帮助别人少犯这样的错误。也就是告诉别人：这类错误是可以改正的，只要认识了，同时又肯改，仍然是可以进步的。犯了错误，关起门来检讨是需要的，更需要的是到人民中去学习。一个人之所以犯错误，一方面是由于对理论、原则认识得不清楚，所以需要向进步的理论求教；另一方面是由于自己相信的那一点道理跟实际相矛盾，行不通，所以必须向广大群众求教，从实践中求得新的认识，发现新的道理。这样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有了力量，就行得通了，

也就可以不犯或者少犯错误了。

我讲这一段话,是为了使同志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建立这样一个信心:只要决心改造自己,不论你是怎么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改造好。在座的同志多数在旧社会生活过较长时间,会带来很多旧的东西,要求一下子把旧的影响肃清,这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不断的斗争中,才能求得进步。

下面讲几个大家在学习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我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一 立场问题

我们在学习和工作中,总有一个站在什么立场的问题。我们现在还不能说都已经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看待一切问题、处理一切问题了。这不仅是你们诸位,就拿我来说,几十年以前就参加了共产党,是不是进了共产党之后工人阶级立场就那么清楚了呢?也许看书学习、写文章的时候是那样,但是到实践的时候,是不是办每一件事情都合乎工人阶级立场呢?认真检查起来,还是差得很远的。工人阶级立场不是从空中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己封的,决定的关键是实践,只有实践才能证明是否合乎这样一个立场。例如,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把广大的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首先是把工人、农民、学生和一部分军队组织到革命的潮流里,革命的力量推动他们前进。但是,到了一九二七年武汉时期,有些人在陈独秀⁽⁴⁰⁾领导下,立场就很不稳了,跟着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就说明他们没有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受了当时反动阶级

的影响。类似的例子还有。所以，立场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

我国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从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不能要求他们一下子就能站到工人阶级立场上来。

我的家庭是一个破产的封建家庭。我家原籍是浙江绍兴，后来祖父到江苏淮安做县知事，家也搬到淮安。我家虽然没有买土地，只有一幢房子，但仍然是封建官僚家庭，这样的家庭不能不影响我的思想。一个人幼年所受的影响，往往在他的思想上、生活作风上长期存在，说话或者写文章，如果不经过很冷静地思考，旧的东西常常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来。

既然如此，要求知识分子一下子就有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那是困难的，一定要有一个过程。

一般的人开始最容易有一个民族观念、民族立场。因为中国是一个百年来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所以容易使我们产生爱国的民族观念。例如，我小的时候读章太炎⁽⁴¹⁾先生发表在《国粹学报》⁽⁴²⁾上的文章，当时虽然读不大懂，却启发了我的爱国的民族思想。中华民国成立以后，袁世凯⁽⁴³⁾、北洋军阀⁽⁶⁾的专横卖国，更使我增加了爱国的思想，因而积极参加了反对“二十一条”⁽⁴⁴⁾、反对中日军事协定⁽⁴⁵⁾等爱国活动。我想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过程。这是一个好的起点。知识分子有了爱国的思想、民族的思想，就可以从这个立场上前进。

当然，这里面可能有危险性。假使从民族立场发展到国家主义⁽⁴⁶⁾或狭隘的民族主义，对外侵略别的国家，对内压迫小的民族，那就走到邪路上去了。这种危险性虽然有，但是对于

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不是主要的方面。其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华民族是受外国侵略、欺凌和压迫的，所以人们首先产生的是一种民族的反抗侵略的爱国主义。在这样一个具体的环境中，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思想可以由民族思想、爱国思想发展到争取民族解放和为人民的思想。所以，知识分子初步有了这样的思想，应该受到欢迎。当然，我们也要防止产生国家主义或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危险思想。

在中国，国家主义是跟共产主义同时出现的。五四运动时的同辈们，今天在座的很多。大家知道，当时的少年中国学会⁽⁴⁷⁾分成两派：以李大钊⁽⁴⁸⁾、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一派，走向了共产主义；另外，曾琦⁽⁴⁹⁾、李璜⁽⁵⁰⁾、左舜生⁽⁵¹⁾等人又是一派，他们走向了国家主义，结果做了国民党的尾巴。这个尾巴做得也很可怜，因为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环境里，不可能出现土耳其式的基马尔主义⁽⁵²⁾。狭隘的民族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只有极少数人玩弄那种货色，在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中是生不了根的。

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和中国的买办阶级、地主阶级勾结在一起，压在中国人民头上，形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一百多年来，多少仁人志士想替中国人民找出路，如洪秀全⁽⁵³⁾和孙中山的革命，严复⁽⁵⁴⁾和康有为⁽⁵⁵⁾的改良，在当时都是想把中国往前推进，但结果都失败了。中国既没有象法国大革命⁽⁵⁶⁾那样把封建势力完全摧毁，也没有象日本那样发生了明治维新⁽⁵⁷⁾。为什么？原因很清楚，各位教授先生最近参加土改⁽¹⁰⁾工作时看到了，中

国的封建势力太大，地主和富农在中国农村中约占人口的十分之一。这些人散布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压在农民头上，帝国主义就凭借着这些人统治中国。在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中，过去有些人企图走改良主义的道路，走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但走不通，统统失败了，不能不找新的办法了。

中国人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更加觉醒了。俄国十月革命给了我们新的启示，使我们认识到要“走俄国人的路”。孙中山先生也提过“以俄为师”的口号。这样，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就组织和发动起来了。许多知识分子从民族的立场进一步认识了人民的立场，觉悟到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才能救中国，才最爱民族。因为封建经济束缚着中国广大农村的生产力，买办势力束缚着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国民党反动派集中代表了封建和买办势力，成为一种反动政治力量，他们依靠帝国主义，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所以要求得民族解放，一定要有人民的立场，而不是只有笼统的民族观念。

人民的立场，是不是进了共产党以后一下子就站稳了呢？不错，当着对敌斗争很激烈的时候，我们是很清楚的，对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是坚决斗争的，这是站在了人民的立场。但是到抗日战争时期，我们要和国民党讲联合，共同对外，这时有一部分共产党员的人民立场就不那么明确了。你们从胡乔木同志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可以看到，在抗日战争初期，毛主席坚决主张对国民党有联合有斗争，推动全面抗战，反对国民党不要人民的片面抗战，这是坚定的人民立场。但是有些共产党员，有时只注意联合的一面而忽略了斗争的一面，迁就了国民党，人民立场就不那么清楚了。一九

三八年在武汉，曾发生过这样的错误。那时联合的工作是做了，但斗争不够。后来认识了这个错误，纠正了，到重庆、南京工作时就好一点了。这就是说，人民的立场，在共产党的领导人当中也不是一下子就完全站稳了的。大家看过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那时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读了很多书，又住过延安的学校，但还是有不少人没有站在人民的立场，所以毛主席在那篇讲话中就首先提出立场问题。

现在，工人阶级有工人阶级的想法，农民阶级有农民阶级的想法，城市小资产阶级有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想法，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想法，只要各个阶级存在，他们的不同立场就会存在。我们今天要求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立场，这就是为绝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着想的人民立场。

由人民的立场再进一步站到工人阶级立场，那是更难的一件事。为什么要知识分子进一步站在工人阶级立场呢？因为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是为人民的，也是为民族的，将来要实现共产主义，使社会达到无阶级的境地。工人阶级的伟大就在于此。资产阶级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变成资本家。如果人人都当资本家，谁去做工人呢？如何积累资本呢？我参加共产党，最先就是这一句话说动了我，我也用这句话写过文章，向别人宣传过。为什么工人阶级是先进的？因为工人阶级可以使全世界的人都变成劳动者，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统一起来。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最本质的东西，是它能使全世界进到没有阶级、谁也不剥削谁的社会，别的阶级和政党都不能担当这个任务。

对阶级立场问题，在知识分子中有几种认识。一种认识

是：中国没有那么多的工人，产业工人不过三四百万，并且是从封建社会中生长起来的，或多或少地带有封建的影响，恐怕不会很强，怎么能领导全国呢？另外一种认识是：中国共产党里面，农民、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占很大的数目，怎么能代表工人阶级的立场和思想？是不是代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有一种认识是：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以后，实行党的口号、政策，他的一切就都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了，就体现工人阶级的思想了。这三种想法都是错误的。

我们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尽管人数少，而且其中还有若干人受过封建的影响，但是只要积极工作，发展生产，跟世界上的工人运动的经验和先进理论相结合，这个力量就是无穷的。它是新生的力量，一定会发展壮大。一切新生的力量都是从小到大的。”我们每一个人也是由幼年长大的，幼年的生长力是最强的。所以工人阶级在中国是有远大前途的。工人阶级能照顾全局的利益。将来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发展工商业，不仅对本阶级有好处，对农民有好处，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也有好处。为了更好地发展工商业，它要把重要的生产资料掌握在国家手里，逐步走入社会主义社会。也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根据它的思想，根据国家的物质条件和不断提高的生产能力，才可以使中国工业化，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所以不能因为它人数少而忽视这个最可靠、最有希望、最大公无私的阶级。

共产党内有大量的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他们能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吗？我认为，经过锻炼是可以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的。工人阶级并不把它的立场私有，只要真正愿意接受

它的思想,就可以站到它的立场上来。中国工人阶级也是从旧社会来的,不过跟知识分子不同,它经过现代化大生产的锻炼,体现了先进的思想和立场。知识分子的改造也要经过锻炼,经过学习,经过实践。知识分子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就是要学习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思想 and 立场。这不仅是对党外知识分子说的,也包含党内的知识分子。梁漱溟⁽⁵⁸⁾先生在一封信上说,过去认为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党员很多是农民,大概你们是农民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吧?他这话有一半道理,就是一些共产党员如果不经过改造,是会有很多农民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但经过改造就会逐渐减少,工人阶级思想就会逐渐加多。毛泽东思想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思想。即将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就是体现中国工人阶级思想的伟大著作。

做了共产党员,是不是就一切都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和思想了呢?不是的。也许我们主观上觉得是为工人阶级了,但有时我们的工作犯了错误,实行的政策有了偏差,说明我们还不是真正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这种情况是常有的。我们过去发生的右的或“左”的错误,就是离开了工人阶级立场对反动阶级迁就,或者是把自己这个阶级孤立起来。拿我个人来说,就有过多次这样的经验教训。正是因为有过这样的错误,才使自己受到更多的教育。工人阶级立场不是那么容易站稳的,需要长期地摸索、学习、锻炼。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的指南针,但是单靠这个指南针还不行,还要有自己的革命实践。毛主席常说,任何一个人不经过自己的实践,碰过钉子,摔过跤,别人的经验对他总是作用甚小。自己实践的经验是最可

宝贵的，最有用处的。所以共产党员也需要经过锻炼，而且是长期的锻炼。

从民族立场进一步到人民立场，更进一步到工人阶级立场，大体上会有这么一个发展过程。要促进这个发展过程，推动知识分子的进步，防止这个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偏差，逐步地解决立场问题。

二 态度问题

明确地认识了立场的发展过程，态度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生活在世界上，对遇到的任何事情总会有一个态度。立场不同，态度也就不同。

今天的世界上还有阶级存在，还有国家的对立。帝国主义侵略集团要统治全世界，尤其是美帝国主义，要把世界变成美国的世界。中国人民是深受美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大打内战之苦的，现在美帝国主义又侵入朝鲜，侵入我国的台湾。世界人民经过两次世界大战逐步觉醒了，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先后建立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断发展，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也在逐步觉醒。全世界人民都不愿意再受帝国主义的剥削和侵略，不愿意再遭受战争的痛苦，要求持久和平。世界分成了两个阵线，这是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对这样的世界形势，我们中国人民怎么能够不表明自己的态度呢？必须要有明确的态度。首先要分清敌我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没有这样一个区分，那你是什么

态度呢？难道你站到敌人方面去？当然，在中国还有站在敌人方面的反动分子、反革命残余分子，我们要肃清他们。但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人，站在爱国的民族立场上的人，能不表明态度吗？所以，我们在学习时必须有敌我友的观点。全世界人民包含美国人民、日本人民在内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争取他们。现在还被帝国主义欺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政府，我们应该争取他们反对战争，赞成和平，即使是暂时的朋友，我们也要争取。一切国家，一切可以争取的政府，都应该争取，即使是中立，那怕是暂时的、在一个问题上的中立，对于人民来说也有好处。我们应该分清敌我友的界限。我们的敌人就是美帝国主义和它的同盟国家、帮凶国家的反动政府。我们的朋友遍及全世界，其中包含在某一个问题上一时的朋友。这样，我们人民的力量就壮大起来了。这是在国际上。在国内呢？这个问题已经清楚了。我们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首先应该巩固工农联盟，还要团结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一切爱国分子。我们的敌人就是反动阶级，最集中地表现在国民党反动派残余集团上，还有一些反革命残余分子。在态度问题上，是不是还有保持中间的可能呢？应该说，基本上没有可能，尤其在国内更没有可能。因为胜败已经定下来了，人民已经当政了。难道今天还可能又站在蒋介石方面又站在中国人民方面吗？也许可以躲到香港去，但那是临时性的，最后态度总是要判明的。

关于态度问题，我们历来主张靠自己觉悟。我举个例子，大家会清楚的。张伯苓⁽⁵⁹⁾先生，晚年做了国民党政府的考试院长，重庆解放以后，开始有了觉悟，后悔了。以后他回到北

京，又转到天津。他和我总算是师生关系了，也很接近，但是我丝毫没有勉强他写一个东西。以后他慢慢地认识了新中国，认识了人民中国的好处，开始跟我讲了一些他最赞成、最高兴的事，但是我仍然没有请他写个东西。我觉得一个人的进步要等他自觉地认识以后才最可靠。这样一耽搁，没想到他就年老病故了。临终前他写了一个遗嘱，大家可能在报上看到了。也许这是我的一个缺点，没有及早地帮助他提高觉悟。假使我知道他身体那样差，早一点提醒他一下，他也可能多一点进步表现，使人民对他有更多的谅解。这是我抱歉的地方。我再举一个例子：翁文灏⁽⁶⁰⁾，大家也很熟悉，新华社宣布过他是战犯之一。但是他在欧洲表示愿意回到新中国来，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到美国去当教授。因为他有这样的表示，我们就欢迎他回来。他回来以后，有些朋友觉得他应该写一个声明，这样好使人民谅解他。但是我们仍然觉得不要太勉强，要他慢慢觉悟，自觉地写。

真正的中间态度，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一个时期的动摇、怀疑是有可能的。有一种人他对新生事物要怀疑一下，观察一下，我觉得应该允许。怀疑并不等于对立。对立就是敌视新中国，这不能允许。在学习中，对某一个问题的怀疑的态度是可以的，因为真理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被人们接受的。真理愈辩愈明，我们不怕怀疑。观察一下也是可以的。梁漱溟先生初到北京的时候跟我说，有些问题他要观察一下。他在这点上很直爽，我们也很尊重他，所以介绍他到各个地方去观察。他每次回来的确都有进步，这一点我们应该欢迎。他观察一个时期就提出一个新的认识，那很好嘛！观察不等于旁观，观察

的态度是积极的，旁观的态度是消极的。

还有一种态度是同情但不参加。这种人只是做到对中国革命表示同情，但是参加还要考虑考虑。这也是允许的。我们愿意等待，而且要耐心地等待。香港有许多人跟我们打过招呼，说他很同情新中国，但是他自己暂时还不能回来。我们绝不勉强。因为这里面还有客观的原因和主观的原因，我们应该谅解。

加强老根据地的工作

(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

一 下山不忘山,进城不忘乡*

(一九五一年十月九日)

各位同志:

你们从老远的地方来到了北京。南方老根据地的同志是从广东、四川、江西、湖北、安徽、浙江等省来的。北方老根据地的同志是从陕北、东北、华北等地来的。志愿军战斗英雄的代表是从朝鲜前线来的。解放军的战斗英雄是从各大军区来的。这是很不容易的事。今天借这个机会,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各大区的负责同志,都来到这里同大家见见面。

今天看到你们真是高兴。我们离别已经好些年了,有十年的,还有二十年的。中国革命进行了三十年。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毛主席带着队伍到了井冈山,在农村建立根据地,这样才使我们的力量生长起来,依靠这个力量,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都得到发展。革命由南发展到北,军队由红军、八路军和新四军发展到人民解放军,最后打垮了蒋介石,取得了全

* 这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举办的来京参加国庆节观礼的战斗英雄代表和老根据地代表联欢会上的讲话。

国性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去年我们的志愿军到了朝鲜，和朝鲜人民军一起打败了美国侵略者。这些胜利是来之不易的。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依靠大家长期的英勇奋斗，才取得今天的胜利。饮水思源，我们应该向你们致敬，向你们代表的各老根据地的人民致敬，致谢。在这三十年当中，不知牺牲了多少人，我提议，大家起立为这些烈士志哀。

同志们，你们来到北京是不容易的。你们不只看到了毛主席，看到了我们的首都，还看到了我们军队的力量，看到了人民对我们党、我们领袖的热爱。希望你们回去以后，把这些告诉广大的人民和军队，进一步增强胜利的信心。

这次中央人民政府派遣访问团到各个老根据地，听到了一些意见。有的同志说，革命胜利了，不要下了山就忘了山，进了城就忘了乡。我们应不应该下山，应不应该进城呢？应该的。假若不下山、不进城，就不能够取得今天全国性的胜利，革命就不会成功，那我们作了那么大的牺牲，付出那么多的代价，就没有意义了。有些代表大概还记得，在我们离开瑞金以后，老根据地的人民遭到白匪的残杀。假若没有今天的胜利，我们能够回去吗？同志们，山是应该下，城也应该进。我们的胜利是依靠了农村的，但今后农民生活的改善，还必须依靠城市。革命就是为了使全国人民不再过苦日子，要过上好的生活。应该下山，应该进城。但是正如老根据地的同志所说的那样，下了山不应该忘了山，进了城不应该忘了乡。如果忘了，就是忘本。中国革命过去是以农村为根据地的，如果忘了这些根据地，就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就应该受到批评。毛主席这次特别派访问团去，就是为了关心老根据地的

人民。访问不只是为了看看，而是想尽力解决一些问题，当然不可能一下子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现在战争尚未结束，志愿军还在朝鲜作战，国家还有困难。在取得全国性胜利后的今天，我们还不能够转过手来大力改善生活，还须进一步克服困难，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并加强我们军队的力量，使美帝国主义不敢发动大战。我想老根据地的同志们是会理解这一点的。

我们有些干部对改善老根据地的群众生活关心不够，应该承认错误。今后各省的省委和政府要关心老根据地的事，每省应该有一个副主席专门负责老根据地的工作，每年至少要到各地看一两次，帮助老根据地的人民解决一些困难。各级人民代表会议⁽²²⁾要有一定数量的军烈属代表参加。如果下面不这样做，你们可以给政府写信，给我写信，给党中央写信，我们一定予以答复。这样做，也会使我们声息相通，更加了解。

你们提出来的几个具体问题，如贷款、修路、兴修水利、城乡交流等，已交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讨论，帮助你们解决一些问题。

文教方面，要在老根据地增设小学、中学，还要办些工农学校，开展成人教育和干部教育。有的同志说，大干部到了北京，小干部到了省，乡下无干部。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老根据地为全国培养了干部，这是很大的光荣。现在乡下干部少了，应该很好地培养新干部，并且帮助现有干部提高政治文化水平，以适应工作的需要。

卫生工作也要作为重点。最近我看到一个报告，反映陕北

保安县的婴儿死亡率很高，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当年我们在瓦窑堡站不住脚退到了保安，保安人民为革命出了力。现在知道那个地方的婴儿死了那么多，于心何安！我们已命令卫生部派医疗队到那个地方去。象这样的事，今后是不应该发生的。

还听说在乡下轻易看不到戏和电影。我们也下了命令，先让北京的剧团十一月份到乡下去，为农民群众演出，争取大家都看一看。

在优抚方面也要规定更好的办法，不要发生“优新不优老，优生不优死”的现象。

参加人民代表会议的军烈属代表，应该在农村中由大家评选，再报上面批准。

以上这些事我们要发个文件^[61]，传达到各地。

今天是老根据地代表和战斗英雄代表两部分人联欢。没有老根据地就不会有我们的解放军，解放军是老根据地人民的子弟兵。子弟兵看见老根据地的人就象看见了自己的叔叔、伯伯、兄弟、姐妹。大家可以在一起叙叙知心话，彼此给予安慰和鼓励。

最后，希望你们象毛主席说的那样：“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62]

二 大力扶植老根据地的 经济和文化建设*

(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一)中央人民政府派遣访问团访问各老根据地并邀请各老根据地人民代表来京参加国庆节观礼,加强了中央人民政府及各级人民政府与老根据地人民的联系,表扬了老根据地人民伟大的革命功绩,提高了老根据地人民热爱祖国和建设祖国的积极性。这一收获是很大的。

老根据地人民长期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匪帮、封建地主的残酷压迫进行斗争,贡献最大,牺牲和受到的摧残也最大。解放后经过积极生产,部分地区已经恢复,有的地区甚至超过战前水平,但大部分老根据地因遭受战争创伤太重,且地处山区,交通不便,生产恢复很慢;其中若干地区又遭到水旱灾害的侵袭,特别是南方老根据地因重获解放为时较晚,荒芜现象仍多数存在,人民生活极为困难。因此,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都必须十分重视加强老根据地的工作,大力领导与扶植老根据地人民恢复与发展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

(二)加强老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加强老根据地工作的中心环节。老根据地多系山地,生产条件比较困难,应该本着解决群众当前生活困难与长期建设相结合的方针,因地制宜,

* 这是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署名发布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加强老根据地工作的指示》,刊载于一九五二年二月一日《人民日报》。

有计划地有重点地逐步恢复与发展农林畜牧与副业生产。一般地区应以农业为主,不宜耕耘的山岳地带应以林业与畜牧业为主,但均须同时极力注意利用当地一切条件发展当地有可能发展的手工业和副业,以增加群众收入。

1.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首先要补充农具,增加耕畜,养猪养羊,以克服当前缺乏农具、耕畜和肥料的困难。从长期与全局打算,山地应不再开荒,但凡能修成梯田的坡地,要尽快地逐步修成梯田,并集中力量提高现有耕地的单位面积产量。在有条件的地区,修塘,筑坝,开渠,打井,扩大灌溉面积;治河,防洪,闸山沟,修水库,做好水土保持。在粮食缺乏的地区,应提倡增种多产作物如红薯、马铃薯、南瓜等;在不缺粮食的地区应有计划地提倡栽种经济作物如棉、麻、烟等,以增加群众收入。

2.发展林业:提倡封山育林,禁止烧山燎荒,滥伐林木,挖掘树根,但必须照顾群众当前生产与生活的需要,反对机械的封死,进行合理的砍伐。在有条件地区应积极发展茶、桑、桐、橡、茶油、漆、果树等经济林木及其他用材林、薪炭林,并根据当地条件发展采集药材及竹木编制等副业。

3.发展畜牧:为增加老区人民收入,增加畜力、肥料,并供应毛纺制革原料,应大力增殖牛、羊、马、驴、骆驼、猪、鸡等。提高饲养技术,奖励繁殖。加强畜疫防治,畜种改良。为此,应有计划地建立防疫组织与繁殖场、配种站。

4.发展手工业与副业:许多老根据地农村副业收入占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三四十以上,有的甚至超过农业生产的收入。农村副业和手工业是多种多样的,必须因地制宜有计划地加

以恢复与发展,合作社和国营贸易机关应尽力帮助他们打开销路,以增加老根据地人民的收入。有些地区应特别提倡土特产与农产品的加工,如造纸浆、缫丝、烧酒、打蛋等。在兽害严重地区应组织群众打猎。

5. 开采矿产:老根据地多系山地,各种矿产如煤、铁、石灰、钨、锡等蕴藏丰富,在不破坏矿藏、不影响大规模开采的原则下,可以有计划地扶助当地群众按照开矿的规定作小型开采。

(三)正因为老根据地多系偏僻穷困的山区,要求得老根据地经济建设的迅速恢复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就必须首先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 恢复与开辟交通,这是改善老根据地人民生活的主要关键。必须分级负责,采取发动群众义务劳动为主、国家出资为辅的办法,有计划地修好老区主要的交通干线如公路、大车路、驮骡路、人行路以及河道等,利用当地一切可能利用的交通工具如大车、手推车、船筏等,并扶助群众添置这些交通工具,发展运输业。建立转运货站,把运输工作加以组织,以利推销土产和供应山区人民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

2. 增设国家贸易机构与供销合作社,组织私商上山,建立山区商业网,促进物资交流。合作社应以山区为发展重点之一,指导群众提高产品质量,进行规格教育,使当地土特产得到畅销。贸易公司、合作社应在对老根据地人民不挣钱甚至采取若干贴补办法的精神下,收购山货、土产,并解决油盐等日用必需品。

3. 大力组织合作互助。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采取多种多

样的形式,如互助组及养畜、造林、修滩等合作社,逐步把群众组织起来,有条件的地区可适当提倡农业生产合作社。

4.今后一般贷款应将老区列为重点之一。并应依据当地条件举办养牲畜、修水利、修梯田、购买农具等特殊贷款。举办贷款时应注意适当延长期限,简化手续,及时发放。这次拨给老根据地的特别救济费,应结合生产发出,或提出一部作为建设基金。

5.老根据地遭受的战争创伤深重,生产水平较低,人民生活很苦,为帮助老区人民迅速恢复元气,在负担上应以省为单位,适当加以调整。特别困难的老区,可宣布免纳一定时间的公粮。

(四)加强老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与优抚工作:

1.老根据地人民的政治水平一般较高,对文化生活的要求尤为迫切,必须提倡文化下乡,电影上山,普及社会教育,并在这些地区增办小学、中学、工农速成中学和各种技术学校,以培养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及各种专门人才。为此,应以省为单位适当调剂教育经费与教员。

2.老根据地人民的医药卫生要求也十分迫切。卫生机关应协同有关部门在老根据地大力开展卫生防疫运动,宣传卫生保育知识,设立卫生站与医院,派遣医疗队巡回治疗,开办卫生医疗人员训练班、新法接生训练班,帮助中医学习,设立中药铺,并注意供应海盐、海带等以避免粗脖子、柳拐子等病症,保护群众健康。

3.在优抚工作上,首先是收葬烈士遗骸,收集烈士事迹。老根据地烈军属多,他们缺乏劳动力,生产与生活困难最多,

过去有些地方对优抚条例⁽⁶³⁾的贯彻施行较差,今后必须切实执行优抚条例,加强对缺乏劳力的烈军属的代耕工作,保证他们的生活不低于一般农民。县、区应定期召开烈军属、革命残废军人和优抚模范的代表会议,以便检查优抚工作,交流代耕经验,进行政治教育。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也应有烈军属及革命残废军人的代表参加。

(五)老根据地的工作是一件光荣的任务,应作为有关省、专署考绩中的一项。凡辖区内老根据地的各级人民政府要把老根据地的恢复与建设工作作为一九五二年的工作重点之一,并组织专门委员会,指定得力干部经常注意老根据地的工作,及时检查、督促。开好老根据地的代表会,并将加强经济建设作为会议的主要内容。除重获解放的时间较晚、土地改革⁽¹⁰⁾尚未完成或刚刚完成不久者外,一般老根据地的县、区、乡人民代表会议均应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未建立区、乡人民代表会议者,应迅速建立区、乡人民代表会议,使富有斗争经验与政治认识的老根据地人民自己起来讨论与执行自己的事,选举自己的行政人员,发扬人民的积极性,“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必须认识老根据地的恢复工作是长期性的工作。凡辖区内老根据地的省份,应根据当地具体情况,拟定切实可行的老根据地工作计划,领导群众逐步实现,并予以必要而又可能的经济扶植,争取在三五年内改变老根据地的经济面貌,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提高老根据地人民的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的水平。

“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

(一九五二年一月五日)

目前,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正在各级政府机关、企业、学校、团体、军队、党派中紧张地进行,并需要继续深入。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毒害,在中国的阶级社会中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的。要完全地彻底地铲除这一积害,必须全社会都动员起来,特别是与贪污、浪费有密切关系的工商界要动员起来。

今天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其积极进步的一面,那就是由于他们长期受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他们中间一部分代表人物,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参加过或同情过人民解放斗争。解放后,他们逐渐参加了人民中国的建设,并在国家的领导下,发挥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其黑暗腐朽的一面,那就是由于他们与帝国主义的、封建的、官僚买办的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中国资产阶级本身也同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一样,具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因此,解放后,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正如天津工商界自己所检举的,常常以行贿、欺

^{*} 这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十四次常务委员会上的讲话要点。这个要点刊载于一九五二年一月八日《人民日报》。

诈、谋取暴利、偷税漏税等犯法行为，盗窃国家财产，危害人民利益，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以遂其少数人的私利。这种情形如果不加以打击和铲除而任其发展下去，则我们革命党派、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团体日益受着资产阶级的侵蚀，其前途将不堪设想。不错，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参加人民民主专政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是我们国家五种经济成分⁽⁶⁴⁾之一，但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在人民中国并不是可以不受限制而自由发展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是承认了这个政权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要在国家经济领导之下的。因之他们在国家、社会和经济生活中是有可为的方面，亦有不可为的方面；有被容许发展的方面，亦有被禁止发展的方面的。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经济事业，就容许发展；凡不利或有害于国计民生的私人经济事业，就不容许发展；凡能操纵国计民生的经济事业，就应由国家统一经营。这是《共同纲领》⁽¹⁾规定了。只有这样，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才能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否则，私人经济事业如果不受限制、不受领导而任其自由发展，则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将不是新民主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将不是走向社会主义而是回复到帝国主义的附属国或殖民地的经济。非如此，即如彼，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

在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第一，不能孤立地讲公私兼顾，而一定要在服从国家经济领导的条件下讲公私兼顾，就是说，要在符合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最高的和长远的利益的原则下照

顾私人利益。第二，不能抽象地讲劳资两利，而一定要在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前提下讲劳资两利，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第三，不能提倡盲目生产，而一定要逐步实现国家生产总计划的领导。无论公与私，城与乡，中央与地方，大公与小公，都必须逐步纳入计划。否则，工农业的盲目生产，就会发生过剩与不足；商业的盲目经营，就会扰乱市场，波动物价。第四，不能容许谋取暴利，而只能在国家规定的限度或议定的价格内取得合法利润。第五，不能容许行贿、欺诈、偷税漏税、盗窃、引诱等违法行为继续发生，听其侵蚀人民政权，损害国家财产，腐蚀国家工作人员。凡有犯者必须惩办，坦白自首者则从宽处理。人民政府所保护和欢迎的是那些拥护《共同纲领》、服从政府法令的工商业家，而不是那些不受领导和限制而想自由发展、盲目生产、贪图暴利的工商业家。中国的工商业家如果按《共同纲领》的方向发展，遵守国家政策法令，服从国营经济和国家生产计划的领导，那么，他们的出路是光明的，他们不但在目前时期可以充分地发展他们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而且在将来全国转入社会主义的时期，也一定可以得到工作的机会，并且可以保留他们的消费财产。相反，如果有人违背《共同纲领》和国家政策法令，抵抗国营经济和国家生产计划的领导，那是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背道而驰，无疑必将遭受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反对而归于失败。正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担任领导而资产阶级决不能担任领导，所以在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其指导思想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而资产阶级思想却不能不受到批判和改造。

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今天通过《关于展开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并决定首先号召全国社会人士特别是工商界人士参加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这是有历史意义的。我们号召全国工商界人士参加这一斗争，进行检举和坦白运动。这不仅在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和树立新的社会风气上将有所贡献，即在工商界人士的自我改造上也将有所收获，并利于他们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一道前进。

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

(一九五二年四月三十日)

一、我们的外交方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一直坚持和平的外交政策。我们坚持这一政策，相信以和平竞赛的方法来胜过帝国主义是完全可能的。当然，为防备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我们应该在和平斗争中巩固国防，加强经济力量。要使帝国主义不敢发动战争，万一它发动战争，就叫它遭到失败。

我们在执行和平政策中的一些外交方针是：

(一)“另起炉灶”。一九四九年春，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我们的一个重要外交方针是“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对于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我们把他们当作普通侨民对待，不当作外交代表对待。历史上，有在革命胜利后把旧的外交关系继承下来的，如辛亥革命后，当时的政府希望很快地得到外国承认而承袭了旧的关系。我们不这样做。毛泽东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宣告，我国同外国的外交关系要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这是一百多年来旧中国的政府所没有做

* 这是在一次我国驻外使节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到的。毛泽东同志宣告后，我们以外交部长的名义把这一公告送达各国政府，向世界各国表明了我们的态度。为了表示外交上的严肃性，我们又提出建交要经过谈判的手续。我们要看看人家是不是真正愿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在和平阵营方面，首先是苏联，然后是各人民民主国家相继承认了我们。这些国家是真诚地愿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因此，我们同它们很快地建立了外交关系。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则不能不经过谈判的手续，看一看它们是否接受我们的建交原则。我们不仅要听它们的口头表示，而且还要看它们的具体行动。例如，它们如果在联合国中不投新中国的票，而去赞成蒋介石反动政府，那我们就宁愿慢一点同它们建交；反之，如印度、缅甸等，能够真的同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那就可以在经过谈判之后同它们建交。

这一“另起炉灶”的方针，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

（二）“一边倒”。在一九四九年党的建立二十八周年纪念日，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了“一边倒”的方针，宣布了我们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之内。之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在七月七日发表了联合声明，拥护这一方针。我国在世界上明确地站在和平民主阵线一边，旗帜鲜明，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幻想。如果没有这一明确的宣布，帝国主义者就会胡思乱想地望着我们，如司徒雷登⁽⁶⁵⁾在南京时还想钻空子。“一边倒”的方

针给这种胡思乱想的人浇了一头冷水。

(三)“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想钻进来。有几个国家想同我们谈判建交。我们的方针是宁愿等一等。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它们活动的余地。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被赶走了,但帝国主义在我国百余年来经济势力还很大,特别是文化影响还很深。这种情形会使我们的独立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但是打扫要有步骤,不能性急。我们在美帝侵朝的时候,针对美帝对我国采取敌视政策并冻结我国财产的情况,先接管或冻结美帝在华资产,并接管美帝津贴的文化机关,特别是在抗美援朝运动⁽²⁶⁾中肃清亲美崇美恐美思想,这在平时恐怕要几年几十年才能做到。

(四)“礼尚往来”。资本主义国家,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针锋相对,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总是采取后发制人的办法,你来一手我也来一手。不怕它先动手,实际上它一先动手就马上陷于被动。开国后我们用“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两手,在整个战略上处于主动地位。至于在具体事情上,是可以后发制人的。

(五)“互通有无”。我们开国以来就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同外国做买卖,不能象过去那样把中国作为它们的消费品市场。美帝国主义对我搞禁运,我们就以货易货,不用结汇,这对打破禁运是极有利的。我国出口的主要是农产品,换回来的是工业装备。我国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大大增加,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也增加了,我国的出口贸易额已经超过第

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数字。我们想扭转国民党时期的入超,变为出超,这是好的,但我们当前的目标是进出口平衡。现在我们入口的东西是我们所需要的,出口的东西如鸡蛋、猪肉,是人家所需要的,这种互通有无是互利的。

(六)团结世界人民。我们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是“一边倒”的,对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也要团结争取,以巩固和发展国际的和平力量,扩大新中国的影响。

以上一系列的方针就体现了我们坚持的和平外交政策。

二、外交阵线

(一)建立什么样的外交阵线。外交是国家和国家间的关系,还是人民和人民间的关系?外交工作是以国家为对象,还是以人民为对象?我们要团结世界各国的人民,不仅兄弟国家的人民,就是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我们也都要争取。但就外交工作来说,则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外交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这是辩证的。这一点要搞清楚。

(二)要分清敌我友。在建国开始时,我们就提出过这个问题。我和友是一方面,敌又是一方面。具体地分析一下,朋友方面以国家来分有两种:第一种是基本的朋友,第二种是一时的朋友。这后一种朋友也不完全一样,有的只能在某一时期内成为朋友,有的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朋友,区别的主要关键是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从国家的性质上来说,它们是属于资本主义世界的,但对战争它们不参加,表示中立,这是可

能的。这种情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有过，那时苏联争取瑞典保持中立⁽⁶⁶⁾，这对当时的局势是有利的。假如那时挪威也被争取保持中立，对苏联会更有利，对欧洲的形势会更好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如果在同帝国主义的战争中保持中立，对我们是有利的。所以对这些国家，我们不能采取敌对态度，不要把它们挤到敌人的营垒里去，我们可以和它们做朋友。当然在战争中，问题可以看得更清楚，但在战争爆发前，我们就要有预见，努力做争取工作。在战争一旦发生时，这些国家守中立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站在和平阵营方面反对帝国主义的可能性虽然极少，但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这要看我们和平阵营力量的增长，要看敌人阵营的分化情形。

对帝国主义阵营也要有分析。追随美帝的国家毕竟是少数。在朝鲜战场，和美国在一起的虽然有十五个国家，可是万一战争发生在中国，是否也有那么多国家参加对中国作战呢？这是很值得怀疑的。敢于坚决和我们敌对并走上战场的究竟还是少数。资本主义世界并不是铁板一块，我们应该区别对待。

同我们最敌对的国家，应该对它坚决斗争。

同我国未建交、关系又较坏的国家，不能把它们看成同美帝一样。它们同美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我们应该给一些影响，使它们不过分同我敌对。

同我国正在谈判尚未建交的欧洲国家，它们不愿意同我闹翻，就悬在那里。

同我国已经建交的欧洲国家，对他们要分别对待，做好工作。

同我国已建交的东南亚国家，过去是殖民地，现在不仅形

式已经改变,有自己的国会与政府,同时人民的觉醒也使得帝国主义不能不改变过去对殖民地的一套办法,而由当地资产阶级来统治。在这种情形下,如果现在还有人说它们是殖民地,那是不切合实际的。即使是现在的日本也不能说是美国的殖民地。日本人民的主要斗争对象有时是美国帝国主义,有时是本国政府。由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才是殖民地。东南亚国家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同帝国主义有矛盾,我们要在战争时争取它们中立,在和平时争取它们同帝国主义保持距离。

伊斯兰教国家,我们同它们关系较少,影响也小。工作可以逐步进行。

我们要依靠进步,争取中间,分化顽固。这样可以使我们的外交工作更灵活一些,不是简单的两大阵营对立,没有什么工作可做。我们要这样来打开我们外交工作的局面。

三、外交工作的思想领导

我们的外交工作要绝对地接受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不能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当然更不能允许这些思想占据领导地位。我们的立场必须十分坚定,思想必须十分明确。

(一)坚持国际主义,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对这个问题,大家在理论上也懂得,但是在工作中,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就往往容易带着新中国胜利的骄傲,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大国思想。当然我们应该有民族自信心,可是如果有自大、骄傲的情绪,那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了,即使有时是不自觉的,也不好。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优点,值得我们尊重和学习。要肃清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确立国际主义思想。

(二)坚持爱国主义,反对世界主义。我们的爱国主义是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的爱国主义,不是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⁶⁷⁾。我们反对失去民族自信的、投靠大国的“世界主义”。美国所说的“世界主义”、“大国领导”,其目的是要小国永远跟它走,永远受它奴役剥削。我们的国际主义是要各国都独立平等。

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在国际主义指导下的加强民族自信的爱国主义。我们有些同志有时表现得失去立场,那是因为我们过去是半殖民地国家,羡慕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不审查其中有无毒素,盲目崇拜。说中国一切都好或一切都不好,都是不对的,应该批判地接受一切中外的文化。《大公报》有一栏叫“中国第一”。中国哪里有那么多第一,这样提就不对,后来这一栏也只好取消了。新中国当然比旧中国好,祖国是可爱的,但我们仍然必须向外国学习。

(三)坚持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外交工作是代表国家的,一切必须从集体出发,倘若从个人出发,就一定很危险。任何荣誉都是来自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和人民群众的努力,都是国家的荣誉。外交工作中不容许有个人打算,不要因为人家一说好就沾沾自喜,应该想这是人民的光荣;如果人家说坏,就要检查一下我们的工作是否做错了,要把个人完全溶化在集体当中。

(四)坚持无产阶级的纪律性,反对自由主义。我们强调高度自觉的、合乎党的利益的纪律性,丝毫不能允许自由主义存在。乱说乱搞就会出乱子。外交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外交工作的一切都必须注意事先请示、事后报告。国家同国家办事,

说了就得算数，所以多说不如少说。但是，是不是什么都不说呢？不是。已经宣布的事，已经办成功的事，已经决定了的事都可以说；尚未宣布的，经验还不成熟的不能说。因为这不是在一个党内，而是办国家同国家之间的事。在一定原则下可以有一定限度的机动，也就是临机应变，但对新的问题处理迟缓一些并不是错误。经验不足时，还是慢一些好。

(五)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官僚主义。我们大家对外交工作的经验都不多，还是要发扬民主。“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多听取大家意见是必要的，但是还要有集中。使馆内的民主一定要做到。光有集中，没有民主，就成为官僚主义了。我们应该提倡民主，才能克服官僚主义。

(六)要求有高度党性，反对政治空气稀薄。政治空气首先要求有高度的党性，锻炼同志们的思想，一切从原则出发。政治化是多方面的。把原则变成教条来背诵不是政治，轻一点说是书呆子，重一点说是教条主义者。要调查研究，分析问题。平时谈生活、谈文艺都要注意从原则出发，这样，庸俗空气就稀薄了，政治空气就浓厚了。当然，并不是说只有张口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才叫做政治空气浓厚。

(七)提倡勤俭朴素的作风，反对资产阶级的铺张浪费思想。我们的外交工作中有不少浪费，这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我们在生活享受方面处处想跟苏联比是不对的。苏联在十月革命后也是十分俭朴的。毛泽东同志主张不要去提倡那些形式的东西，因为不适合我们现时的经济情况。生活上同他们比是不对的，今天我们的生产还没有发展到他们那样的水平。

关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问题^{*}

(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九日)

三年来,由于我们进行了抗美援朝⁽²⁶⁾、土地改革⁽¹⁰⁾、镇压反革命⁽⁶⁸⁾三大运动,在国内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势力基本上肃清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内的阶级斗争就突出地表现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现在发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題。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一个特点: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它既是我们的朋友,又是要被消灭的阶级。我们共产党员必须懂得这个辩证关系。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已经讲得非常清楚,又原则,又策略。他是从共产党说起,说共产党最后要把自己消灭,全世界的共产党都要消灭。今天我们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跟资产阶级合作,最后还是要消灭资产阶级的。有一种舆论,说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可以跟我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这是错误的。前些日子王芸生⁽⁶⁹⁾在上海《大公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全篇写得很好,很动人,就是最后一句话说得不对。他写道:“我们人民民主政权的‘四友’就团结得更为亲密,共同胜利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毛主席把

^{*} 这是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上的讲话第二部分的节录。

这句话删掉后要《人民日报》转载了。在党内进行思想教育的时候，要把民族资产阶级既是朋友、又是要被消灭的阶级这两方面都说清楚，只说一方面就容易发生误会，产生“左”的或右的情绪。

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处在这样一个地位，因此它的思想也是这样的。拿资产阶级思想跟无产阶级思想来比，资产阶级思想当然是反动的落后的。但是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势力的时候，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初期，它是起了积极的进步的作用的。文艺复兴⁽⁷⁰⁾时期的资产阶级思想比起当年欧洲黑暗时期的封建思想来是进步的。美国独立战争⁽⁷¹⁾、法国大革命⁽⁵⁶⁾和美国南北战争⁽⁷²⁾的时候，资产阶级思想比起封建思想来是进步的。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个敌人时，资产阶级思想也起过进步的积极的作用。可是资产阶级思想没有把中国革命领导成功，也不可能领导成功，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不允许资产阶级发展。资产阶级可以一个时期参加革命，一个时期中立，一个时期退出，甚至向反动势力妥协。这种曲折的道路走了多次。

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长期的。它领导辛亥革命⁽⁷³⁾的时候，由于跟反动势力妥协，革命失败了，自己也被反动势力挤了下来。辛亥革命以后，它的积极性并没有完结，资本主义经济还是发展了。可是刚有了一点发展，又被买办资本和帝国主义压下去了。后来资产阶级参加了大革命，在大革命的后期，又跟反动势力妥协，最后还是被反动统治阶级挤下来了。以后资产阶级参加了抗日战争，在解放战争中多数人保持中

立或者同情革命，少数代表人物还参加了反对美蒋的斗争，建国以后，又参加了建设。所以我们说，中国资产阶级还是有积极作用的，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一员，是我们的朋友。

没收资产阶级的企业，去掉资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做法。我们中国有所不同。中国革命的时期很长，从共产党诞生到取得政权，将近三十个年头，中间经过了四个革命阶段。四个革命阶段中，民族资产阶级有时参加，有时中立，有时附和了反动。附和反动的时期很短，中立动摇的时期很长。在不同的时期都有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参加革命或对革命表示同情。

到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候，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去了台湾，但多数还是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有很大的封建力量，封建势力跟买办阶级相结合。清朝末年、北洋军阀⁽⁶⁾、国民党三个朝代，反动统治者都是依靠帝国主义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就受到限制、打击和压迫，它对此是不满的。新中国建立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发展，比那三个朝代得利还多，多数资产阶级分子觉得在新政权下有利可图。所以他们中间的多数对于新政权还是赞成的，至少不是采取积极反对的态度。他们参加全国和地方的政治协商会议，参加各级人民代表会议⁽²²⁾，成为我们的朋友。这是由历史发展而来的。

尽管中国是这样大，有这样多的人力，可以加快前进的速度，但中国的经济是落后的，要实现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还需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要

发挥资产阶级的积极性,让它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事业,使我们的经济能更快地发展。所以我们和资产阶级的联合,不仅政治上有可能,经济上也有需要。

当然,我们是为了社会主义而奋斗,这是清楚的。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一点,麻痹起来,就会发生政治性的错误,就会失掉这个前途,就会与资产阶级混同起来。丧失前途,丧失立场,混同思想,那是很危险的。如果共产党人不认识这一点,不是从基本原则上去认识问题,去实现政策和策略,用适合于团结、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方法来跟他们做朋友,把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发展起来,那就很难团结、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只有明确为社会主义而奋斗,我们才能恰当地解决资产阶级问题,这是现在国内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把封建制度消灭以后,农村中的主要矛盾就变成广大农民跟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势力的矛盾。在城市中,国民党被打倒了,反革命被肃清了,帝国主义势力被赶走了,主要矛盾就变成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这样一个矛盾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当着我们反对三大敌人的时候,说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是中间力量,那是恰当的。但是,现在不能这样说了。

在我们党内,必须把今天存在于城市和乡村的这样两个对立的方面说清楚,只说一面就不完全。如果只说交朋友,“五反”⁽⁷⁴⁾斗争就会轻轻过去,将来“五毒”⁽⁷⁵⁾又会严重起来,又要进行“五反”。反过来,如果只说阶级矛盾、思想矛盾、对立、限制,现在就要把资产阶级打倒,就会发生“左”倾。因此,应该全面地说。现在反对他们的“五毒”,联合与改造他们,都是为了

将来便于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为消灭资产阶级准备条件。这是很辩证的。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同志，一定要非常坚决又非常稳当地掌握方针政策。

这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如果不从思想上搞清楚，我们做工作很容易碰到这样两种情况。一种是急躁地把前途当作今天要实行的政策，超越现阶段的政策，这就会发生“左”倾冒险情绪。另一种就是忘掉前途，忘掉坚定的方针，盲目地只顾眼前的利益，同化于人家，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下，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我们要防止这两种倾向。

在“五反”中，有些同志曾经在资产阶级两面性的问题上发生过摇摆，这是不对的。刚才我从历史根源上讲了它的两面性，现在它仍然有两面性。我在一月五日讲到这些，《人民日报》用纪要的形式发表了⁽⁷⁶⁾。讲话中有一段说到资产阶级分子自我改造的问题，就是和两面性的问题有联系的。

要讲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也要讲它的本质。资产阶级的本质就是唯利是图，就是剥削工人榨取剩余价值。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当然要反对这种本质。尤其在“三反”⁽⁷⁷⁾“五反”运动中，必须明确地把它的本质揭露出来。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如果不把资产阶级的本质揭露出来，不把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指出来，的确会跑到另一方面去。我们是反对资产阶级的腐朽黑暗面的。如果不把“五毒”去掉，腐朽黑暗的一面不但会在资产阶级本身发展，还会侵入国家工作人员中，侵入共产党内部，侵蚀整个社会，毒害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毒害人民民主政权。

关于“五毒”，毛泽东同志在提出“五反”的时候就确定了

这样五项,这是具体化而又集中化了的。说得过多就不利。比如对于资产阶级的限制问题就是这样。一方面,在新民主主义的方针下,不是资本主义自由经济,而是节制资本。公私兼顾是在国家领导下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是在中国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劳资两利;生产要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反对盲目发展;规定合法利润,反对暴利。这些原则还是必须坚持的。另一方面,什么是合法利润?什么是暴利?还要经过经济改组,经过工商业恰当地发展,才能逐步规定。在这次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代表会议上,陈云⁽⁷⁸⁾同志可能讲一讲合法利润的大致范围,但不是最后确定,最后确定还要摸索一点经验。合法利润还不能明确规定,暴利的范围也就很难确定。所以这次“五反”就没有提出反对资产阶级的暴利,如果提出就会把经济弄乱。暴利思想要反对,但反对“五毒”没有把暴利问题规定为一条,原因就在这里。否则,我们对资产阶级算帐就会很苛。又比如买房子这件事情。我们公家需要很多房子,鼓动人家卖,人家不愿意,就抬高房价,结果出了很高的价钱,“五反”来了又算人家的暴利,说人家抬高房价。我们不能这样干。现在还是实行自由贸易的原则,不是强迫的方式,何况还是你要求人家卖的。那么高的房价,谁叫你买呀!再如银行利息高,工业利润低的问题,这也说明我们的社会经济还没有改组,还很乱。今后对于利润范围也要有一个规定,使银行利息压低,工业利润逐渐提高。但这需要一个过程。

资产阶级还有积极的进步的一面,我们还要尽量地利用它的积极性进步性。从经济上来说,今天我们的国营经济还不能完全代替它。如果中国工业化了,国营经济能够代替资本主

义经济,私人的经营范围就不会这样大。私人的经营范围这样大,就说明国营经济的比重还不够大,还不能代替它。这就一定要发挥它的积极性。发挥积极性一定要符合我们的《共同纲领》^①,遵循新民主主义的发展轨道。但是从资产阶级的本质来说,它是不愿意遵循这个轨道的,它只要得到一定的发展,就会突破这个轨道,要求自由发展,追逐利润。其实,资产阶级分子哪有那么循规蹈矩的,你要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投机取巧,这三句话概括了资产阶级的本质。他们是要按照这个方向发展的,因此,必须进行长期的斗争。

斗争就是改造,就是要把“五毒”去掉。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再犯再去,再犯再去,长期斗争,用改造的方法来解决。

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够强调改造,是因为今天有人民民主政权,有共产党的领导,有工农联盟的广大基础,资产阶级在数量上不过是一个很小的数目。在城市中,所有工商业者加上他们家庭的人口,也不过两百多万。而资产阶级的家庭已经起了变化,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很多。在全国约五十万工商户中,还有一部分是独立劳动者。我们能够改造地主分子,那么,为什么不能够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呢?何况资产阶级还跟我们共同走过一段建设的道路,而封建地主阶级除少数开明绅士外却根本没有跟我们一同走过。

有些外国朋友听说我们改造地主就摇头。“地主还能改造?”这种怀疑是有道理的。他们那里的封建主跟中国的地主不同,多是大贵族、大封建主,人数也很少,可以把他们赶到外国去。中国的地主人数上千万,有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那么

多,而且分散得很,你把他们赶到哪里去呢?只有改造他们。能不能改造呢?在农村人口中,农民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如果说农村人口是四亿的话,农民有三亿六千万以上,占绝对优势,而我们又经过了长期的革命教育。有这样大的一个基础,怎么不能监督和改造地主呢?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对象,跟我们有过近三十年的生死斗争,对地主都可以改造,那么,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一般说来是中立的,有一部分同情革命,有一部分还参加革命,资本主义经济在新中国又是五种经济成分⁽⁶⁴⁾之一,他们还有利可图,而我们还有政权,有军队、法庭,有无产阶级强大的领导力量,为什么不能够改造他们呢?当然在改造中会有少数人走向反动,甚至会有个别的分子勾结国外敌人企图造反,但可以肯定地说,这总是少数。如果工作做得好,即使世界大战打起来了,多数还是能够跟着我们走的,或者是观望动摇的。当然也会有少数人没有改造好,这就需要我们加紧做工作。

要把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什么样子呢?就是要使他们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办事,以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要求,适合于新民主主义政治的要求,适合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要求。所谓改造,在经济上,就是要使他们的经济发展受到限制,但又要使他们有利可图,有适当的发展;在政治上,要吸收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并使他们在政治上受到影响;在文化上,要对他们加强思想教育,逐步地改造他们的思想,以至改造他们的家庭。改造的结果,就会使他们走上《共同纲领》规定的轨道。

我们要给他们指出广阔的前途,不要向他们隐讳社会主

义的前途。《共同纲领》没有写社会主义前途，是因为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虽然把这个前途写出来他们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有点强加于他们，所以我们采取等待的政策，没有把社会主义前途写进去。但是这个前途是肯定了的。我们要向他们指出，在这个前途中，他们也是有份的，当然不是指他们那个阶级，而是指资产阶级分子说的。根据刘少奇同志去年讲的一些意见，我在一月五日的讲话里说了，经过改造，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前途，并且在将来还可以保留他们的消费财产。有人说，这样一来，资本家就不把钱投资到事业上来，就要全部变成消费财产了。这是片面的说法。如果他们想到在社会主义社会还能够有前途，那么今天也就会好好经营，培养经营的本事和能力，这样的本事和能力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还用得着。所以资产阶级分子是可以改造的。

资产阶级的思想本质是唯利是图、投机取巧、损人利己，当然不好。但就他们取得利润来说，中间还包括国家的利益。这次黄炎培⁽⁷⁹⁾先生打算在全国工商联代表会议的致词中传达毛泽东同志的一段话，这是毛泽东同志面告他的。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会议上说过“四马分肥”，就是把利润分成四份，其中国家一份，就是税收；工人一份，就是福利费；还有一份是公积金，作为再生产之用；第四份就是私人应该得到的纯利。实际上，资本家得到的是一份多一些，因为公积金在将来发展生产中的所得又可分成四份，在四份中他又得到了一份。资本家得的利润如果是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就是合法的利润。我们要鼓励他们这样去取得利润。

当然，如果说资产阶级是“为崇高的目的奋斗”，那也是骗

人的。资产阶级分子经过改造，许多人是可以走向社会主义的，但是今天还是要唯利是图，否则他们就不是资产阶级了。这个合法利润是应该承认的，并且要鼓励他们取得这个利润。在这一点上，过去没有向他们解释清楚。毛泽东同志给黄炎培讲了这样一个道理之后，他很高兴。所以我们是应该向他们解释的。

我看了一个同志的发言，他好象认为跟资产阶级做统一战线工作就是讲“外交”、应付、说空话。这是不对的。难道毛泽东同志是在那里闲着没事做，把黄炎培找去聊天讲闲话吗？大家晓得，毛泽东同志没有这样的闲工夫。他找一个人去总是有目的的。毛泽东同志向黄炎培讲清道理后，黄炎培就给资产阶级写信，首先是给上海资产阶级写信，用他自己的口气向资产阶级传达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这有什么不好呢？当然有时候跟他们应酬是免不了的，但是这个应酬一定是要有要求的，有政策的，有思想的。毫无目的，毫无政策，毫无要求，简单地应酬一番，吃饭、跳舞，那是不对的，那就是混同于资产阶级。如果是有目的地应酬，有目的地团结，那是必要的。经过他们把党的政策传达到他们所代表的那一部分人民中去，这是很有效的。

为什么说黄炎培是进步分子呢？有的人还不大懂。我们说他是资产阶级的进步分子，就是因为他跟资产阶级有来往有交情，能够把他们的话说出来，又能够把我们的话经过他说给资产阶级。当然在说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说得不完全，这也不奇怪，他又不是共产党员。在政务会议上，常常有一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映资产阶级的思想。他们讲出来之后，我们

觉得有错的，适当地加以批评，他们能够听取并接受我们的意见，这就是进步分子。为什么政务会议每个星期要开一次呢？难道我也是闲着没事干，高兴每个星期开一次会吗？不是的。这是有好处的。那个会不象我们开会那样，意见都差不多，一个人发言之后，顶多有一点补充。在那样的会议上有的是不同的意见，有资产阶级的话，有开明士绅的话，也有小资产阶级的话；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我们听到这些话就能够启发思想。毛泽东同志常常讲“兼听则明，偏信则暗”⁽⁸⁰⁾，正是这样一个道理。我们管理着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就要注意听取各种意见。对我们共产党员来说，就是要分辨出哪些意见是对的，哪些意见是不对的。这对于我们也是一个锻炼、教育和学习。所以说对资产阶级采取敷衍的态度是错误的。

还有一些同志不大愿意见党外人士，象毛泽东同志说的有些羞羞答答。这是不大好的。我们总是跟自己的同志在一起，所说的话都是相同的，有点团塞。而跟党外人士接触，则可以听到各方面的意见。当然这对你也是一个考验，如果你的立场不稳，思想不清，人家说什么都是对的，那就要受资产阶级的影响，甚至要被糖衣炮弹击中。统一战线工作就是这样，要学习，要考验自己，要发展党的政策，又可以使自己进步。当然不能说在工作中就毫无错误，但是我们不要怕，要在工作中好好学习。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团结改造的政策，所以，在工作中不要采取畏惧的态度，不要采取草率的态度，也不要采取消极敷衍的态度，而是应该采取坚定的、稳健的、谨慎的态度。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

我今天谈谈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题目是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

这个问题本来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我们就认定新民主主义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共同纲领》^{〔1〕}中虽然没有写社会主义的前途，但这是因为考虑到当时写上去还不成熟。所谓不成熟，不是说在领导分子中间还不了解，而是说还要经过对广大群众的宣传教育。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把它更加明确起来，使它具体化。

关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主席近来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以后又在全国财经会议上，都曾讲过。他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

* 这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十九次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⁸¹⁾

在过渡时期，对国家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都还只是基本上实现，而不是完全实现；只要是基本上实现了，过渡时期就算结束了。

所谓相当长的时期，究竟多少年，不可能说得那么准。毛主席说，要经过几个五年计划。过渡时期的长短，决定于是否基本上完成了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要看我们的努力。

离开了总路线，就要犯大错误。我们在工作中犯一些小错误，发生一些偏差，是难免的。但如果犯了大错误，离开了这条总路线，那就很危险，就会走上另外一条道路，即资本主义的道路。犯这种错误不仅不应该，而且是不容许的。

现在谈几个问题：

第一，什么叫做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就是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取消了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归国家所有了，就是农业、手工业集体化了。完成这个任务要经过相当长的过渡时期。

在我们的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中，不是要等到那么一天，由国家宣布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而在这一天以前，一切都原封不动毫无变化。这是不可能的。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曾宣布把雇工若干人以上的企业收归国有，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在战后几年也曾宣布把几十个工人以上的工厂收归国有。我国根据国际条件尤其是国内各阶级联盟和

经济发展的情况,不采取这种激烈的突然变革的办法,而采取温和的逐步过渡的办法。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虽然是一场革命,但可以采取逐步的和平转变的办法,而不是在一天早晨突然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在过渡时期中,要使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一天一天地增加。过去我曾与盛丕华⁽⁸²⁾先生说过,将来是“阶级消灭,个人愉快”。就是说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做到“水到渠成”。

当然,过渡并不是没有困难,但应看到有利条件。首先是肯定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是领导的经济,其他各种经济都要受国营经济的领导。这是在《共同纲领》中规定了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国营经济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其中国营经济部分是处于领导地位的。

在过渡时期要把各种经济纳入国家的总计划中。这在《共同纲领》第三十三条里也早有规定。当然,做到这点是不容易的。把国营经济纳入计划就不容易,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现在还没有制定出来,我们还只能边计划、边执行、边修正。至于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纳入计划就更困难。因此,使各种经济在国营经济领导下逐步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是一个相当长时期的过程。

第二,为什么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有人说,因为朝鲜停战⁽²⁶⁾了。这个说法有一部分道理。如果朝鲜战争还在打,我们的军费开支就不能保证没有变动。现在朝鲜问题虽然还没有彻底解决,但战争已经停下来了。毛主席指导工作有一个原则,当一个任务完成了的时候,就要赶快提出新的任务,以免松懈下来。我们现在就应该提出新的任务。从这方面说,强调

朝鲜停战这个原因是有一部分道理的。但是这不完全。现在提出这个问题,还有国际国内的各种条件。

从国际方面看,当前世界形势的特点是:新世界诞生了三十六年,世界和平民主阵营更加巩固和扩大了;旧世界尽管叫嚣扩军备战,但困难重重。形式上是两个阵营的对立,但矛盾的焦点是在旧世界的内部。这种矛盾,有和平与战争的矛盾,有民主与反民主的矛盾。

旧世界的矛盾,无论在东方与西方,是一天一天地在增长。中朝人民在朝鲜战争中的胜利把美国企图挑起世界大战的时间推迟了,这就不仅有利于促进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矛盾的增长,有利于和平民主阵营的巩固和扩大,有利于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中民族民主运动力量的增长,有利于世界人民的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我国进行建设工作。

从国内方面看,开国快四年了,人民民主专政更加巩固,国防力量愈益增强,各种社会改革也已基本上完成。尤其是这四年来,财政经济状况已经基本好转,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一天一天增加,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一天一天加强,人民的积极性也更加发挥出来了。

工业生产方面,总产值如以一九四九年为一百,一九五二年则为二百四十五。今年生产如能完成或超过计划,就可达三百零四以上。农业生产方面,总产值如以一九四九年为一百,一九五二年则为一百四十八。今年的农业生产,由于去冬受冻,今年又有霜灾和虫灾,加上南旱北涝,按原定计划增产百分之六已不可能,估计可稳定在去年的水平或者略少于去年,也可能略多于去年。

关于我国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一九四九年，机器工业占百分之十七点四，工场手工业占百分之七，个体手工业占百分之六点八，农业及副业占百分之六十八点八。一九五二年，机器工业占百分之二十七点八，工场手工业占百分之六，个体手工业占百分之六，农业及副业约占百分之六十。这些数字表明，工业比重已经大大增加，今年还会有所增长。

关于工商业中的公私比重。工业方面（包括现代工业与工场手工业，不包括个体手工业）：一九四九年，国营占百分之三十三点九，私营占百分之六十二点七，公私合营占百分之二点四，合作社占百分之一；一九五二年，国营约占百分之五十，私营约占百分之四十二，公私合营约占百分之五，合作社占百分之二点六。从相对数字看，国营的比重上升，私营的比重下降，但从绝对数字看，则国营私营都有增加。商业方面：按商品流转总额计，一九五二年国营已占百分之五十，今年还会增加；按零售计，一九五二年国营与合作社占百分之三十二。

以上情况说明：现在开始五年计划经济建设，国际国内形势都是有利的；提出过渡时期的问题，也是适时的。

但必须承认还有困难。我们的经济遗产落后，发展不平衡，还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大多在沿海。我们的文化也是落后的，科学水准、技术水准都很低。例如地质专家很少，自己不能设计大的工厂，文盲相当多。这些落后状况会使经济建设发生困难。我们还有五种经济⁽⁶⁴⁾并存，要使其能够均衡发展，并在新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关系非常复杂。不估计到这些困难，就会产生盲目冒进情绪；另一方面，如不估计到有利条件，就会产生保守倾向。

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是一件极大的工作。毛主席说，对私营工商业改造，只要把问题说通了，还是比较容易的，更繁重的还是农业和手工业问题。对于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进行改造，需要用不同的形式和速度。农业和手工业是走合作化的道路，私营工商业是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我们既然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相信自己的力量能够完成这个重要的任务。

二

我们要在总路线的指引下，确定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

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培养技术人才，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扩大商业；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作用。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重工业是国家工业化的基础。我们虽然还有一点重工业的底子，但是作为工业化的基础，是很不够的。因此，不能不首先集中主要力量来发展重工业。苏联在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开始时，重工业的基础比我们大，但他们仍然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我们更需要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因为我们

的底子不行。国防工业是要在重工业的基础上发展的。我们现在还不能制造坦克、飞机、汽车、拖拉机和高级的炮。苏联从一九二八年开始计划建设，当时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还把机器卖给苏联，国际形势还不象后来那样紧张，希特勒还没有上台，还可以按部就班地做。我们现在的情况与苏联当时的情况不同，更要加速发展重工业以加强国防。当然，我们说“集中主要力量”，并不等于冒进。

培养技术人才是我们国家建设的关键。我们的技术人才还远远不够，培养人才是一个重大的任务。要从各方面培养人才。除各种专门学校外，还要在工厂中培养技术工人，要使干部学习业务，学习技术。

交通运输是建设中一种先行部门，不发展交通运输业，工业也无法有大的发展。当前特别是要把西南、西北和华北之间的铁路线连结起来。

相应地发展轻工业是为了保证需要。现在人民的购买力在逐步提高，人口的增长也很快，一年增加一千万，我们要设法逐步满足人民的需要。发展轻工业也有利于国家积累资金。当然，应该是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来做，首先要注意急需的产品，如棉纱、布匹等。如果我们只看到重工业而不看到轻工业，那就会犯错误。

必须相应地发展农业，否则无法增产粮食。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感到粮食不足。所谓不足，不是和过去的水平比较，而是从逐步提高人民生活的水平来要求。我们的农业早已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但要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则必须随时注意粮食问题，不能疏忽。国家对粮食的管理应该继续加

强。发展农业要稳步前进，不能要求太急，因为耕地面积有一定的限度，开垦荒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农业发展的速度要与工业发展相适应，首先要在原有基础上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我国农业生产的手工技术很高，这是可贵的条件。我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还不能自制拖拉机。将来对拖拉机的使用，也要考虑到不同地区不同情况，如山地即不便使用。现在还用不着顾虑使用拖拉机以后劳动力过剩的问题。粮食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农业人口需要粮食，工矿区和经济作物区的发展也会增加对粮食的需要。此外，还要备荒，还要出口一部分粮食用来平衡对外贸易。

必须相应地扩大商业，否则也要犯错误。

对于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要有步骤地进行。

总之，要使各个方面都能全面地有配合地向前发展，才能保证我们计划建设的胜利。

三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在过渡时期中，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都要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种改造，在当前还不是最后的改造，而是逐步过渡中的改造。最后的改造是取消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把它变成国家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而逐步过渡中的改造，是使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受到限制，成为不完全的私人所有制。这种限制是在《共同纲领》中规定了的。孙中山先生提出过“节制资本”，也

就是限制私人资本主义，使它不能无限制地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是唯利是图的。在中国，私人资本主义也有黑暗的一面，如搞“五毒”⁽⁷⁵⁾。对于这一面，我们必须反对。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是要受到限制的，但限制私人所有制并不是取消私人所有制，并不是取消利润。利润分配是“四马分肥”⁽⁸³⁾，资本家还有一份。农业也有同样情况。农业生产合作社⁽⁸⁴⁾是土地入股，可以分红，但要提公积金，也是不完全的私人所有制。手工业合作社也是如此。这些都不是最后的改造，而是逐步纳入总路线的轨道，逐步引导到社会主义。这样的逐步改造，要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以达到“水到渠成”的地步。

毛主席说：“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改造。”⁽⁸⁵⁾关于国家资本主义，是在《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中规定了的。三年多来，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因忙于三大运动⁽⁸⁶⁾、“三反”⁽⁷⁷⁾“五反”⁽⁷⁴⁾和思想改造⁽⁸⁷⁾，这方面还用力不多。忙于其他方面的工作也是必要的，不然就不能为社会主义改造打下基础。过去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比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现在进入计划建设时期，应该将这个方针和办法进一步明确化并具体化。首先要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以及各党派、团体的领导人物的头脑中明确起来，承认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这一点无论在共产党员或民主人士中都还没有明确起来。这次财经会议对这个问题又好好研究了一下，现在要在政协和政府委员会中提出讨论。首先要在领导人物中讲清楚；

在共产党内，也是先要在各级领导机构中搞清楚。不要忙于在社会上作广泛的宣传。因为“社会主义改造”、“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话，如果不讲清楚，很容易被误会为马上要实行社会主义。我们进行工作时要稳步前进，不能急躁。毛主席说，把社会主义改造看成遥遥无期而停止不进是不许可的，盲目冒进也是不许可的。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在工业方面，高级的形式是公私合营，即企业中有公股参加，公私共同管理，公方处于领导地位，私人所有制是被承认的，但已经受到限制。中级的形式是加工订货，即原料由国家供给，产品由国家收购，由私人进行生产，私人所有制也受到限制，不能到自由市场去购买原料和销售产品了。低级的形式，一般是原料主要由私人购买，由私人进行生产，国家收购其产品的大部分，私人还能保留一小部分自销。现在已有这三种形式，将来也许还会有别的形式。

商业方面有没有国家资本主义？毛主席说，对私营商业不能简单地以“代替”或“排除”了事。当然，对私营商业中投机倒把、有害于国计民生的部分应该排除。但我们认为，商业方面也有可能实现国家资本主义。如对国计民生确有作用的大的私营商业公司，可以实行公私合营，利用其合理的经营管理，改革其不合理的部分，使其能为国家服务。此外，私营商业可以依照国家规定的价格替国家批发，或代购代销。私营商业的数量很大，从大的公司到小的摊贩有几百万户，我们必须带着它们前进。至于采取什么具体形式，这方面的经验较少，还要研究。

我们要使全国私营工商业走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毛主席说：“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⁸⁵⁾。这还不是最后的改造。这样做，在领导人物中应该不会发生震动和不安了。

目前私营工商业的比重还不小，在工业中占百分之四十二，在零售商业中占百分之六十八，在私营工商业（不包括手工业和夫妻商店）中的工人和店员约有三百八十万（在国营工厂和商业中的工人和店员是四百二十万人）。这是国家的一大财富，对国计民生还有很大的作用。毛主席说：“私营工商业不仅对国家供给产品，而且可以为国家积累资金，可以为国家训练干部。”⁽⁸⁵⁾因此，我们应该重视它，加以领导，国家建设工作应该把它计算在内。

我们还应该看到两种现象。第一，有些工商业家对国家还保持着很大的距离，没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不允许唯利是图的，对此必须限制。第二，在工人群众中，有些人也没有看清楚这个问题，前进得太快了，他们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这样就不好了。毛主席说：“我们应向这两方面的人们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地（争取尽可能快些）适合国家的方针政策”⁽⁸⁵⁾。要使他们认识到，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如能按照国家的方针政策办事，就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部分地为资本家谋利，这样就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了。关于利润分配问题，最近毛主席找在工会工作的同志和在大城市工作的同志进行了研究，如将赢利作为百分之一百，比较合理的分配是：所得税占百分之三十四点五，工人福利占百分之十五，公积金占百分之三十，资本家的所得占百分之二十点五。

关于资本家的所得，还可以再多一些，如能达到百分之二十五上下就更合适一些。所谓“四马分肥”，实际上是“三马”，因为公积金是三方面的。如果能这样做，不论是否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也就是基本上为国计民生服务，部分地为资本家谋利。当然如果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就能更好地实现这种分配。我们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既不同于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更不同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是中国型的国家资本主义。

要对工人和资本家两方面进行教育。在工会方面，今年五月间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⁸⁸⁾，刘少奇同志讲了话，会议讨论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对工人在资本主义工商业中的工作问题也进行了讨论。我们这一次会，邀请了各地的工商业家来参加，目的就是要使工商业家也能了解这个问题。我们要在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中培养核心分子，团结起来为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改造而奋斗。毛主席说：“需要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⁸⁵⁾

大部分资本家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还有一部分会抵抗，对这点必须估计到。毛主席说：“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⁸⁵⁾。要区别强制与自愿，对反动阶级要强制，对民主阶级内部的事情要根据自愿，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当然，也要造成一种有利的形势，要“因势利导”。现在的劳动生产率以国营企业为最高，公私合营的次之，加工订货的又次之，这说明

国营工业的优势和优越性；另一方面，还应该使私营企业有利利润，使资本家对其私人所得完全可以自由支配。毛主席说：“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在过去几年中已有很大的进步，相信再有三年至五年，这种进步将更大，所以三年至五年内基本上完成将私营工商业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是有可能的。”⁽⁸⁵⁾

有人问，财经会议开了两个月之久，不知道做了什么文章，会不会搞“小五反”？毛主席说，没有所谓“小五反”。现在不需要搞“小五反”。上海偷税漏税的事有十六万件，其中以中小的为多。偷税、漏税性质也有不同，税制上也有毛病，这些都要整顿处理，但并不需要搞“小五反”。现在要大家商量一个办法，政府来做，大家支持。文章就是一篇——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总结起来说，至少要三年到五年，才能基本上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这并不是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还要几个五年计划，两者不可混同。一方面，我们反对把社会主义改造看成遥遥无期、停止不前。现在不动将来就要痛，现在向前将来就会愉快。另一方面，急躁冒进，想一步登天，也是错误的。

国营经济是领导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被领导的，这点必须确定。国营经济不谋私利，只谋公利，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而私人资本主义还要谋一部分私利。所以，不能在一切问题上一律对待，要有所不同。另一方面，私人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所以又要一视同仁。这就说服工人，和国营企业一样，实行增产节约、劳动竞赛、提

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的数量质量等等。这样就会使工人感到，不论在国营企业或私营企业中，工作都是光荣的。资本家按照国家的方针政策办事，不投机倒把，不搞“五毒”，其任务也是光荣的。这样两方面就能合作了，就能实行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公私兼顾、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劳资两利了。

现在这样做，还不是多数人都懂得的，我们要做很多的教育工作，把这些道理说清楚。共产党当然首先要担负起这个责任，同时还要动员工会、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工商业家，大家来做这件工作。政府部门也准备设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管理私营工商业方面的事情，使这方面的工作更加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中印两国的谈判在今天,十二月的最后一天,开始了。我们说过要在一九五三年开始这一谈判,现在实现了。

我们相信,中印两国的关系会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某些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一定会顺利地解决的。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

两个大国之间,特别是象中印这样两个接壤的大国之间,一定会有某些问题。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

* 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在北京举行了谈判。这是周恩来同志在谈判开始时同印度政府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这五项原则后来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一九五四年六月下旬,周恩来同志访问了印度、缅甸。在中印和中缅会谈联合声明中,中印、中缅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增强党的团结， 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日）

同志们：

我完全同意刘少奇同志的报告⁽⁸⁹⁾。我提议四中全会批准这个报告，并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向全党敲起警钟，反对任何共产党员由满腔热忱地、勤勤恳恳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刘少奇同志在报告中指出：“只要党内出现了个人主义的骄傲的人们，只要这种

* 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进行了反对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增强了党的团结。本文是周恩来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节录。同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同志又在关于高岗问题座谈会上发言，历数了高岗散布“军党论”（“党是军队创造的”、“枪杆子上出党”）的谬论和进行宗派活动，大搞独立王国等罪行，严肃指出：“从高岗的事件中应该吸取的教训是：一切骄傲情绪、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宗派情绪、小团体习气、分散主义、地方主义、本位主义都应受到批判。‘军党论’的荒谬思想必须肃清。个人主义野心家必须防止。党内非法活动必须禁止。派别性的干部政策必须反对。独立王国的思想必须消灭。党的统一领导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必须坚持。党内民主及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发展，党内任何干部必须无例外地受到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必须确立。马列主义的教育必须加强。”

人的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党的坚决的制止，他就会一步一步地在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活动，直至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我认为敲起这种警钟是适时的，绝对必要的，哪怕只发现了这种危险状况的萌芽。

为什么把问题提得这样严重呢？这是由于中央政治局考虑到如决议草案和少奇同志报告中所提到的党内党外的各种状况，并从苏联共产党、各国共产党乃至我们党自己的历史中吸取教训而得出的结论。如果不把问题提得这样严重，全党、首先是高级干部便不会认识这种状况的危险性，甚至还会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听任这种危险的萌芽蔓延滋长，这样，必致贻害全党。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的党已是胜利的党、执政的党，因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正确，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的威信又是这样高，所以个人主义的反党活动已不甚可能以公开面目反对党的领导，而会是躲藏在党的正确路线的旗帜下，利用某些领导同志的缺点和个别错误以及党内某些不同的意见，进行暗中挑拨和散布流言，有时更假借名义，进行非法活动，以便达到个人企图。如果我们嗅觉不灵，就大有上当的可能。因此，中央政治局指出这一危险，重申党的纪律，作了六条规定⁽⁹⁰⁾，以保证党的团结的增强。

这样做，大家都遵守六条规定，是不是要损害我们党内政治生活的生气勃勃、上下通气的优良传统，而变成死气沉沉、闭塞言路的官僚主义呢？不会的，也不应该的。我们所反对的是那种不利于党的团结和损害中央威信的言论和行动，我们

并不反对干部中间进行有关增强党的团结和提高中央威信的意见的酝酿和交换。最近有这样一种意见，认为既然要防止挑拨，防止流言，那就什么话也不敢讲了，也不敢听了。这对对不对呢？不对的。因为这样又犯了毛泽东同志在《反对自由主义》中所说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一条的错误了，变成旁观者了。这不是共产党员应该采取的态度。同时，我们反对的是避开中央和各级党的组织进行个人和小集团的非法活动，我们并不反对全党高级干部直接向中央、毛泽东同志或者经过自己所属的党组织提出个人的政治意见或积极的建议。可以这样说，我们反对个人主义的反党的言论和行动，正是使党内的政治生活更加健康起来，利于党的团结。

这样做，大家都遵守六条规定，是不是要缩小我们党内民主及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呢？不会的，也不应该的。我们所反对的是“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的个人攻击，而不是反对“为了团结，为了进步，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确的意见斗争和争论”。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反对自由主义》中指出来的。这一次《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在省、市委以上的各级党组织中进行了普遍的讨论，反应很迅速，和这次四中全会上各同志发言中充满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就足以证明我们党内的民主不是缩小，而是发展。今后我们要发扬这种精神，特别是要在高级领导同志中间加强集体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保证我们党的团结。这样也就可以竭力避免给个人主义野心家以利用和挑拨的机会。

我们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做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反对分散主义、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等

等,反对这些,决不会影响中央政治局过去对六个大行政区的中央局在执行党中央的路线上是正确的、是有很大成绩的这个估计,并不取消这个估计。这次各大区负责同志的发言,一般也说明自我批评的精神是好的,对上述这种倾向是一致反对的。中央党、政、军各部门的分散主义,经过一年多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会议上的亲自检查和批判,也多有了改正。但所有这些,仍不能丝毫减弱我们反对分散主义、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的严重任务,因为这些错误是与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的统一领导和集体领导原则完全不相容的。

我们之所以特别着重地反对党内一部分干部中首先是高级干部中滋长着的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是因其如不受到严厉的批评和纠正,这样的干部就会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家,或者被这种野心家所利用。个人主义可以有各种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表现,但是个人主义总是与集体主义对立的;不管你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或者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它的思想根源都是从属于资产阶级的。当着我们党正处在过渡时期,与城乡资产阶级分子又联合又斗争并须对他们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紧要关头,这种阶级斗争将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党内思想斗争上来。而小资产阶级还象汪洋大海似地包围着我们,党内有着占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小资产阶级如不接受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就必然要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因此,我们党内目前主要的危险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而党内干部中首先是高级干部中的骄傲情绪,正好是这种思想滋生的温床。

骄傲的起因，多由于在工作中有了一些成绩就沾沾自喜，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我们高级干部中若有这种骄傲情绪，又不加以制止，其危险性就最大，因为就他的地位、权力、威信、影响来说，最容易生长出个人主义野心，对党、对共产主义的事业也就危害最大。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全国的胜利局势已定、进入城市前夕召开的二中全会⁽³⁾上，特别提出力戒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这正是一种防微杜渐的警告。毛泽东同志又常常告诫我们：要在捧场、鼓掌、喊万岁的声浪中听出不满意和反对的声音；要常常从反面听一听、想一想，要常常听一些逆耳之言，不要只听顺耳之言。可惜这些告诫常常被一些同志遗忘了。在七大前整风⁽¹⁴⁾时，毛泽东同志特别推荐了郭沫若著的《甲申三百年祭》⁽⁹¹⁾。那个历史教训离现在三百多年了，对我们今天来说也值得重新温习一下。犯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严重错误的同志，只能听好的，不能听坏的，成绩既冲昏了头脑，利欲就必定会熏心，蒙蔽了共产主义的良知，这是最危险不过的事了。面对着这种危险，在座的同志们都应该引起注意，提高警惕，增强团结，动员全党首先是我们高级干部来不断克服这种最容易蔓延滋长的骄傲情绪，以缩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市场，并要求和帮助犯有这种严重错误的同志迅速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这是在我们国家实行总路线并进行有计划建设的过渡时期，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的事业都具有决定意义的。

综上所述，我们要区别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与

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前一种是错误的，甚至是非法的，应受到批评和斗争；后一种是正确的、必须的和合法的，应受到欢迎和提倡。我们又要区别流言蜚语、个人攻击与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前一种，那些话是见不得人的，是拿不到桌面上来的；后一种，应该是言行一致的，表里如一的。这中间的界限就是我上边说的，属于后一种的，不管当面也好，背后也好，会里也好，会外也好，这一个地区也好，那一个地区也好，这一群人也好，那一群人也好，都是可以说的，因为都是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嘛！批评和自我批评嘛！前一种就不同了，那些话不都是可以到处说的，只可以在背后说，在会外说，在一群人说，在一个地区说，这就有了见不得人、拿不到桌面上来的短处了。这一种当然就是错误的，甚至是非法的。区别就在这里。这显然不是说，同志们以后就不要议论了。不是的，议论的标准应该是有利于党的团结，有利于维护党中央的威信。可以提出意见，也可以提出批评，但是这些议论一定要能提到组织上来，拿到桌面上来，拿到会场上来。如果说有些意见是属于机密性质的，那就直接向中央或主席报告好了，至少你的意见要见得中央或主席嘛！同时，我们要区别破坏团结的非法活动与一般性的自由主义。当然自由主义也不好，从它的思想根源来说，也是从属于资产阶级的，不过它是一般性的。毛泽东同志在《反对自由主义》里头所讲的有许多是属于一般性的。我们也要区别严重的个人主义与一般的骄傲情绪。我刚才说，有了一点点成绩就沾沾自喜，这样的骄傲情绪在我们党里是相当普遍的，那跟严重的个人主义要有区别。当然，一般的自由主义和骄傲情绪可以为个

人主义的非法活动所利用，并且可以发展成为严重的个人主义。这中间有没有界限呢？有的，决定的界限就是有没有发展到了个人野心，争夺权位，破坏党的纪律，进行反党活动。认识了和弄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干部的觉悟、警惕性和战斗力将会大大地提高。所以不仅是个人主义，就是连自由主义和骄傲情绪在内，都应受到全党首先是高级干部的反对和不断纠正。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刚才说的是一般性问题，我在底下说一说特殊性问题。

在这次四中全会上，根据毛泽东同志所提议的方针，大家充分开展了自我批评，对报告和决议草案中所提出的破坏党的团结的危险状况已给了严肃的原则批判，并一致要求犯这种严重错误的同志迅速彻底改正，不要错上加错。这是七大⁽¹⁵⁾以来党的领导干部的觉悟水平的极大提高，党的团结首先是高级干部的团结必将因而极大地增强。这是四中全会的最大收获。

我现在先对犯了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严重错误的同志提一些意见。他们的初步检讨是值得欢迎的，但应该指出：还不完全，还不深刻。我们希望他们能诚恳坦率地继续反省，来满足大家对他们迅速彻底改正错误的要求。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以为犯这种错误的同志应该端正自己检讨错误的态度。根据我自己的经验，首先，应该依靠党。要相信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党不仅能发觉我们的错误，而且更能指导我们如何认识和改正错误。我们每一个人，不管过去做了多少工作，现在担任什么职务，没有党和人民，就既不会有过去的成绩，也不会有今天的职务。党和人民是伟大的，我们个人是渺小的。想通

了这一点，还有什么错误不能在党的面前承认和改悔呢？从遵义会议^[92]以来，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党，确定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挽救了多少犯错误的同志，我就是其中的一个，难道还不足以相信吗？

其次，应该求教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次全会印发的《列宁、斯大林论党的团结》，《毛泽东选集》中的整风报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这次《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以及刘少奇同志的《论党》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都值得好好重新学习一番，从检查自己的党性来认识自己的错误。

第三，应该努力反省。自己做错的事，自己总是知道的。有些话，有些事，一时想不起来，多回忆几次，重要的总会记起来的，同志们也可以帮助对出来的。自己反省，一定要用党的尺度来衡量，并且要准备经过一个认识、斗争和痛苦的过程。属于思想觉悟方面，可能因为认识的关系，一个时候将“是”当成“非”，或者挖得不深，等到认识进步了，自然允许修正或者改变。这在我们检讨当中是常有的事。例如认为错误路线是对的，批评了正确的同志，一旦认识自己是错了，当然很痛苦，但应该勇敢地承认错误，改正过去的看法。所以思想觉悟会有一个过程，认识上的是与非、深与浅会有改变的。可是，若属于思想本质的问题，则不能容许把有当成无，把黑的当成白的，这是一想一看就知道的啊！因为抵赖和造谣是资产阶级思想本质的反映，不是我们无产阶级的思想本质。所以等待觉悟与实事求是应该结合起来。没有想通的可以等待，但事实俱在，人证俱全，就不应该否认。只有这样，才能一步一步地向党靠拢，

向党公开，去掉抵抗和隐瞒的情绪。

第四，应该靠同志们的帮助。共产党人是靠集体生活的，一个人如果平常批评不得，或者不将心事告人，这个人的短处或弱点就很难在平时得到补救。这种人不犯错误则已，一犯就会摔大跤，犯大错误，而他的短处或弱点也正在这个时候才会彻底暴露。这次犯错误的同志恰恰就是这种情况。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如果欢迎同志们的帮助，就要承受得起同志们的彻底的尖锐的批评，要认识只有这样的同志才是良师益友。推动和鼓励是需要的，掩饰和隐瞒是有害的。经过同志们的帮助，揭露出更多的错误，在政治上会更加健康起来，而不是更加衰弱。应该欢迎同志们开刀治病，不应该仇恨医生。真正的共产党员不能见病不治，更不能讳疾忌医。有些同志有过某些自由主义的毛病，现在认识了就力图改正。在这次全会上有的同志已进行了自我批评，并帮助犯严重错误的同志去改正错误，这是共产党员应具有的品质。发现了错误就自己承认，并帮助犯更严重的不同性质错误的同志去改正错误，这是共产党内需要的朋友。共产党人要这样的朋友，不要那种拉拉扯扯、打掩护、打埋伏的朋友，那是资产阶级的朋友，不是无产阶级的朋友。拿我来说，我过去对于犯这种不利于党的团结的错误的同志也是很尊重的，而且把他们估计高了，一旦发现这样的人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我站在中央工作岗位上也觉得自己有失察之咎，因此，就要更加努力批判和帮助犯这种严重错误的同志，要求他们改正错误，来补救这个损失。犯这种严重错误的同志，如果想赖掉一些，隐瞒一些，那是不可设想的。在党的面前，怎能这样设想呢？要彻底承认和改

正错误,就必须坚决抛弃阻塞自己觉悟的那种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的思想。打破了这一关,就会有共产党人的勇气,向党揭露自己也认为是最丑恶的最本质的东西而不气馁。因为丢掉的是错误,留下的是正确,就是说去掉毒疮,留下健康。为革命奋斗的历史,别人是抹煞不了的,除非自己毁掉它。

四中全会本着毛泽东同志的“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方针,等待犯严重错误的同志更进一步地觉悟,以利党的团结。我要求犯严重错误的同志不要辜负这种期望。

为祖国锻炼身体^{*}

(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体育运动委员会成立一年多来,做了很多工作,全国体育运动的情况起了变化。为了实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增强人民的体质。我国人民的体质弱,是由于封建制度和帝国主义长期的束缚和压迫造成的。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要增强人民体质。我们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前进,每个人要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均衡发展。不均衡地发展,一定会有缺陷,不仅影响个人能力的发挥,对国家也不利。均衡发展是要思想和身体都健康。思想健康和身体健康是相互影响的。

目前的任务是要发展生产、加强国防,这都需要我们有健康的身体。实践表明,工业越发展,越需要高度的技术,而技术越高,速度越快,越需要劳动者既灵巧又有耐力。我国人民灵巧是有的,耐力则不够。同样,要掌握现代化的武器如飞机、坦克等,也必须有健康的身体。所以,开展“劳卫制”⁽⁹³⁾运动不只是为了个人的身体健康,而且是为了保卫祖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政治任务。

* 这是在政务院第二百零五次政务会议上的讲话。

人民体质的增强虽然不容易,但总是可以做到的。只要坚持开展体育运动,五年、十年、十五年,中国人民的体质就会大大改变。我问过专家,他们也说五年至十年左右就可以了。先天体质弱可以锻炼。我自己在未进学校以前,受封建家庭的束缚,身体很弱,进了学校以后就改变了。青年人的体质是可以改变的。我们最大的希望是三十岁以下的青年,他们在国防和生产战线上都是一支重要的力量,掌握高度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武器,主要是依靠他们。要在工厂、学校和农村中提倡和开展体育运动,工作做得好,经过五年时间,人民的体质会起变化。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三好”,把身体好放在前面,只有身体好才能学习好、工作好,才能均衡地发展。我们一定要把体育运动和国家前途连结起来,这是一个伟大的改造。年纪大一点的人也要锻炼,当然比青年要困难一些。身体健康了,能够多活些年,看看社会主义不是更好吗?中国人民的体质增强了,有了健康的身体,能够掌握现代化的武器,有了这样的国防,帝国主义还敢不敢侵略我们?它就得考虑。所以,健康的身体是建设和保卫祖国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样看问题,就可以促进体育运动的发展。

当前体育运动的方针是要普及和经常化。在普及的基础上才能提高,经常化了才会出人才。我们的国家大,人口多,要普及比较困难,但如能普及到几千万人,肯定会出很多人才。只要体育运动做到普及和经常化并加以正确的指导,人民的体质一定会大大增强。今后两三年内,我们不可能在国际比赛中得到多少冠军,因为没有经常锻炼的基础。吴传玉⁽⁹⁴⁾是个华侨,他是经过长期锻炼才取得成功的,没有长期的锻炼是不

会得到冠军的。后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我们不要希望参加太多的项目。我们的体育运动如果发展得当，六年以后，到一九六〇年，一定会出现许多好选手。我们的体育运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我们的体育运动是有群众基础的，是有远大前途的。

实现上面这个方针，关键在于领导，不仅是体委，两个教育部⁽⁹⁵⁾、各个行政部门也有责任。政务院可考虑发个通知，提倡早操和工间操，先在北京的中央各机关试行。今天会议的精神，两个教育部、工青妇各团体都要传达。做工作要上下结合，由上而下，由下而上。今天的会议是由上而下。由下而上是群众监督。还要授权体委进行检查，检查出哪个机关妨碍体育运动，就提出来“将他一军”。检查不仅是看他们开展体育工作有无缺点，而且要配合卫生部门检查健康状况，看效果如何。机关干部的身体好坏，部门行政领导起码是办公厅主任要负责任。在体育运动普遍开展的基础上，还可以进行业余比赛。看打球虽好，但主要的是自己参加体育锻炼。宣传也很重要，从政治上到技术上都要广泛宣传。

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 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我国伟大的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面,最后也从资本主义的束缚和小生产的限制下面,解放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得到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并且巩固我们国家的独立和安全。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中央人民政府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¹⁾的规定,先后完成了全国大陆的统一,完成了土地制度的改革⁽¹⁰⁾,进行了广泛的和深入的镇压反革命运动⁽⁶⁸⁾和各种民主改革运动,恢复了遭受长期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着重地发展了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和各种类型的合作社经济,初步地调整了公私营工商业之间的关系,这一切都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和逐步过渡到

^{*} 这是在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的国内工作部分的要点。

社会主义社会准备了必要的条件。随后，从一九五三年起，我国就开始了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着手有系统地逐步地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济建设工作在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

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全部工作现在还没有最后完成，对于计划的许多细节还在进行补充和修订。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针是大家已经知道的，这就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同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第一个五年计划所以要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即冶金工业、燃料工业、动力工业、机械制造工业和化学工业，是因为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证整个工业的发展，才能保证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才能保证现代化国防力量的发展，并且归根结底，也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证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当然，重工业需要的资金比较多，建设时间比较长，赢利比较慢，产品大部分不能直接供给人民的消费，因此在国家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的期间，虽然轻工业和农业也将有相应的发展，人民还是不能不暂时忍受生活上的某些困难和不便。但是我们究竟是忍受某些暂时的困难和不便，换取长远的繁荣幸福好呢，还是贪图

眼前的小利，结果永远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好呢？我们相信，大家一定会认为第一个主意好，第二个主意不好。

我国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迅速地完成了工业恢复的任务，在恢复期间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三十六点九。在建设期间，工业发展的速度当然低些，但是一九五三年工业总产值仍然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三。一九五四年预计现代工业的总产值将等于一九四九年的四点二倍，如果再加上农业和手工业，那么今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将等于一九四九年的二点二倍。这样的发展速度，在旧中国是不能够设想的。

在工业的发展中应当指出三个值得特别注意的地方。第一是现代工业的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迅速上升。在一九四九年，这个比重大约是百分之十七，而在一九五四年预计将近百分之三十三。第二是生产资料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迅速上升。一九五四年消费资料的生产预计将等于一九四九年的三点一倍左右，而生产资料的产值却将等于一九四九年的五点七倍左右。生产资料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在一九五四年预计将由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二十八点八上升为百分之四十二点三。第三是国营、合作社营和公私合营工业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迅速上升。由于国营工业和合作社营工业一年一年壮大，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开始成批地转为公私合营工业，这一比重在一九五四年预计将由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三十七上升为百分之七十一左右。这就是说，没有转为公私合营的资本主义工业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将只占百分之二十九左右了。

这些统计表明我们的国家正在向着工业化的目标前进，正在向着社会主义的目标前进。

我们原有工业的基础虽然薄弱，却是目前我国工业产品、工业利润和工业人才的主要来源，忽视这个基础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原有的工业基地和工业企业，发挥它们的潜在力量，增加生产品的产量和品种，使它们在国家建设中发挥重大的作用，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培养人才和供应设备，并且供应人民的需要。但是我国原有的工业究竟是非常落后的、零散的、不平衡的，因此，为了实现我国的工业化，就必须主要地依靠新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建设。

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新建和改建的重大工业建设项目约有六百个，大家知道的苏联协助我国建设的一百四十一个项目就是其中的骨干。这些建设项目的完成将使我国的工业生产水平和技术水平大大地提高一步，使我们可以自己生产冶金设备、发电设备、采油设备、锻压设备，自己生产汽车、火车头、拖拉机、飞机，并且将使我们有新的工业区域和工业基地，使我国目前工业分布上的不合理状态开始发生变化。这些项目的大部分将在一九五八年完成，其余部分需要将近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根据上述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逐步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规定，关于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使生产力不断提高的规定，关于优先发展国营经济、鼓励和引导资本主义经济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定，并不是空谈，而是我们正在实现着的活生生的事实。全国的劳动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英

勇奋斗，迅速地改变着我们的祖国的面貌。我们一定可以经过几个五年计划，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

有计划的工业生产和工业建设对于我们是一个完全新的课题，我们必须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从最近几年的事实看来，我们的工作和学习是有进步的。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自满。我们既然是在开始学习，必然要遇到许多困难，而且已经遇到不少困难。我们还必须克服许多工作上的缺点。

目前工业方面的重要问题之一是计划性不足。我们现在还有许多计划不够准确，不够完整，常常互相脱节，并且常常变动。很明显，这里有很多客观的困难不容易在短时期内克服。但是毕竟有不少供应、生产、销售之间的不平衡，不少产品的品种、规格的不合需要，不少建设工作中的勘探、设计、施工的不能衔接，不少交通运输、工业城市规划和工业建设的不相配合，是由于主观努力的不足和工作中的错误而来的。这方面的状况必须尽可能改善，以减少国家的损失。

工业方面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由于许多部门和企业不重视节约资金、不重视管理财务成本而形成的巨大的浪费。为了增加国家资金的积累，为了消灭浪费，一切国营企业和建设单位必须全面地完成和争取超额完成国家的计划，贯彻经济核算制，建立严格的节约制度，力求降低成本。

技术力量的不足和技术管理的不善，也是工业方面的重要问题。没有现代化的技术，就没有现代化的工业。我国工业中原有的技术力量很弱。我们现有的高等学校所能培养出来的技术干部，在数量上、门类上和质量上都还不能在短时期内

满足工业和基本建设的需要。在这个情况下必须更加合理地有效地使用和提高现有的技术人才，加强技术组织工作和在企业中培养技术人才的工作，以便提高现有的技术水平和企业管理的水平，提高产品质量，增加新产品的品种和数量，并保证完成现代化的新企业的建设和掌握这些新建企业的生产技术。

加强计划工作，加强节约，加强技术管理，这些就是工业部门的迫切任务，也是交通运输业、邮电业、水利、林业和各个进行基本建设的部门的迫切任务。这些任务，大部分也是商业部门和国营农业的管理机关所必须注意实现的。

我国的农业在土地改革以后有了新的发展。一九五二年粮食和棉花的产量都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预计今年的粮食产量可以等于一九四九年的一点五倍，棉花产量可以等于一九四九年的二点八倍。

农业的发展对于工业的发展有多方面的影响。许多工业特别是纺织业和食品工业的原料是由农业供给的。工业人口和其他城市人口所需要的粮食、油类和其他副食品都依靠农业。工业所需要进口的机器大部分需要用出口农产品去交换。许多工业产品的主要市场是农村。因此，中央人民政府历年都用很大的力量在经济方面、水利方面和技术方面帮助农业的发展，而农民也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发展互助合作，努力增产粮食和各种技术作物，并且踊跃地把他们的产品供应给国家。我国在过去两年内不但战胜了灾害，而且农业生产能继续有所发展，市场能继续保持稳定，在这方面，我们不能不向全国五万万农民表示感谢。

但是农业的发展显然还赶不上人民和国家对于农产品的需要。为了使农业能够更快地和更有计划地发展,必须逐步实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是逐步改变农业中的落后的个体经营,按自愿的原则用互助组和合作社的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集体的生产。

为了保证增加农业的产量以适应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还必须在发展合作化的同时有系统地推广新式农具,推广抽水机和水车,推广良种,改进农作技术,增施肥料,防治病虫害,并且尽可能扩大耕地面积。必须适当地增加棉花和油料作物的播种面积,使棉花的生产能够赶上工业需要,油料的生产能够迅速达到和超过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

为了解决耕畜役畜不足、肉食供应不足和肥料不足的困难,并且为了扩大皮毛的生产,必须努力发展畜牧业和饲养业。对捕鱼养鱼事业,也应当注意发展。

在水利方面,国家在过去几年内修建了很多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对减轻水旱灾害、保障农业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今年的防汛斗争中的作用更为显著。对自然灾害的斗争是我国人民的一个长期的艰苦的任务,我们在水利方面必须作更多更大的努力。

林业对供应建设事业所需木材和防止水旱风沙灾害都有重大的意义。我国的森林资源是不足的,除了必须加强国家的造林事业和森林工业、有计划有节制地采伐木材和使用木材以外,还必须在全国有效地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护林造林运动。

手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有重要的作用。同农民一样,手

工业者也正在迅速地组织生产合作社。这样的合作社今后应当更有计划地积极发展。

交通运输业和邮电业在过去五年内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不断提高运输能力以适应国民经济迅速增长的需要，是交通运输业的主要任务之一。

五年以来，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有了巨大的发展。国营商业已经可以掌握有关国计民生的主要商品的全部或大部，并且管制了全部对外贸易。目前，国营和合作社营商业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已占百分之五十左右，在批发总额中的比重已占百分之八十左右。

由于人民消费力增长的速度超过了消费品生产发展的速度，形成了供应和需要之间的不平衡。中央人民政府先后实行了粮食、油料、棉布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以及棉花的计划收购，以便调节供需关系，稳定市场物价，保障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建设。这些措施完全是必要的、适时的。这些措施既保障了广大城乡消费者的利益，也保障了广大农业生产者的利益，仅仅对于少数投机者不利，因此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

对于重要消费品的计划供应，在消费品生产没有充分发展的一个时期内，不但需要继续实行，而且品种和范围还可能扩大；对于重要产品的计划收购，更将随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当然，这是极其复杂的工作，也是人民生活中和社会经济中的巨大的变化；在开始实行的时候，工作中难免发生暂时的缺点，而人民也难免感觉暂时的不便。但是，如果我们希望不再受奸商投机倒把所形成的物价飞涨和生产停顿的痛苦，希望用合理保证供应全国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商业来代

替资本主义的投机商业,那么,我们就会承认,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是国家所必须采取的办法了。

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工作的发展以及加工、订货、包销、收购的发展,根本改变了国营商业的地位。国营商业在过去几年只占了国内市场的一小部分,现在已经占了主要部分,成为全国商业活动各方面的领导力量了。商业部门现在必须担负起计划和安排全部国内市场的责任,必须根据社会购买力和社会商品之间的平衡,根据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私营商业的经营比重和相互关系,决定社会商品的流转计划,决定对整个私营商业的改造和安排的步骤。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国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个重要部分。经过几年来的工作,资本主义工业的主要部分现在已转变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根据客观的发展来看,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主要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公私合营来进行。但是中级形式的加工、订货和包销可以替公私合营准备有利的条件,所以也是很重要的。这方面已经得到了更大的发展。随着粮食、油料、棉布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实施,大批私营的粮食店、食油店和棉布店已经改为国营商业的代销店和经销店,使私营商业中的国家资本主义成分得到迅速的增长,并且开辟了逐行逐业改造资本主义商业的道路。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一个斗争和教育的过程。为了做好这个工作,还需要积累更多的经验。在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把对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这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改造资本主义企业使它们最后

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企业；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改造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的思想，尽可能使他们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起积极的有益的作用。

五年以来，国家的财政状况有了显著的变化。我们不但很快地改变了收入不敷支出的不利情况，实现了财政的收支平衡，每年还保持有一定的结余以充实国家的信贷基金。国家财政的收支平衡，是在收入和支出都有了很大增长的情况下取得的。同时，财政收入的来源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四年，农民缴纳的税款所占的比重从百分之二十九点六降低到百分之十三点四，而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和合作社缴纳的税款和利润所占的比重却从百分之三十四点一增加到百分之六十六点一。财政支出随着收入的增加也有了很大的增加。一九五四年预算中经济建设的支出等于一九五〇年的六倍半；经济建设费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也从一九五〇年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五增加到一九五四年预算的百分之四十五点四。五年来国家财政用于经济建设的经费共达三百二十八万亿元，其中在一九五三和一九五四两年合计就有二百万亿元。这说明我们依靠全国人民的支持，已经为工业化事业积累了必要的资金，那些幸灾乐祸地断定我们不能克服财政困难的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是完全破产了。

财政工作中的迫切任务，是继续贯彻合理的税收政策，鼓励人民以多余的资金存款、储蓄和购买公债，加强企业的财务管理，节约国家的行政经费，加强财政监督和财政纪律，保证建设时期所必需的后备，总之，就是努力为国家工业化事业积累更多的资金，并更合理地使用这些资金。为了完成这些任

务,我们还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斗争。我们的财政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人民的财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有监督我们的财政收支的权力和责任。我们希望各位代表监督政府工作人员并同政府工作人员合作来反对浪费资金的现象,反对机构庞大的现象,反对违反财政制度的现象,反对不爱护国家财产、不严格节约和不努力增加资金积累的现象,反对偷税漏税和盗窃国家资财的行为,反对贪污的行为。反对这些现象和行为,也就是拥护社会主义,争取社会主义社会的早日实现。

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都是为着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改善。大家都看到,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有成绩的。

过去几年来我们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的一个重大收获,是稳定了金融和物价,保证了广大人民生活的稳定。今后国家应该继续努力,保持物价稳定,使人民生活继续得到改善。

由于国家建设的需要和生产的发展,劳动就业的人数逐年增加。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严重失业现象已经大大减轻。人民政府不但对于原来的国民党政府机关中的人员和官僚资本企业中的职工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避免了失业现象的增加,而且大力地进行了帮助失业者就业的工作。但是,由于我国生产还不发达而又人口众多,劳动就业的问题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还是会存在的。我们将在今后继续执行过去几年来行之有效的政策,使这个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几年来,职工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职工的劳动条件和福利设施也有重大的改善。由于国家用了很大的资金改进工矿

企业的安全卫生设备，职工因工伤亡率正在逐年减少。

很明显，在我们的国家里，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不能不是互相一致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充分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又必须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从任何一方面把这两件事对立起来都是错误的：或者不顾目前生产水平，把工资和福利提得过高过快，违反了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这是一种经济主义的表现；或者对于职工福利甚至职工安全漠不关心，不注意或者不愿意解决那些必需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一种官僚主义的表现。我们应当同时反对这两种错误。

工资制度在过去几年内有了一些改进，但是目前仍然相当混乱，而且平均主义现象还没有克服。平均主义是一种鼓励落后、阻碍进步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同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毫无共同之点。平均主义妨害职工学习技术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积极性，对于发展经济建设很有害，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平均主义。企业中的奖励制度现在也很混乱，必须加以整顿。同时，在政府机关和某些国营企业中，同工资制并存的还有供给制的待遇办法，这种办法在革命战争时期曾经起过重大的作用，但是它同按劳付酬原则和经济核算制是矛盾的，在今天已经是害多利少了。因此，必须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订出妥当的方案，争取在几年内使全国工资制度和奖励制度达到基本上统一合理，并且把供给制逐步改变为工资制。

几年来，由于土地改革的完成，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国家对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农业税法的改进,农业贷款的增加和农村信用合作的发展,广大农民的生活在衣食住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改善。

各位代表!如上所说,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们的经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务。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当然是不够的,必须继续加强。但是我们在目前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首先把它同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联系起来。大家知道,我国原来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现在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这是一个很伟大而艰巨的任务。毫无疑问,为了实现这个任务,无论在经济方面或者财政方面,都是有很多困难的,我们决不能够轻视这些困难。什么是我们克服困难的道路呢?从最根本的方面说来,这就是要依靠我们全国人民同心协力,艰苦奋斗。当目前国家需要集中主要力量建设重工业、奠定社会主义基础的时候,我们全国人民都必须把注意的重点放在长远利益上面。我们不能够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忽视了长远的利益。为着我们子子孙孙的幸福,我们不能不暂时把许多困难担当起来。我们是有充分的信心来克服一切艰难困苦的。我们必须用全力来实现宪法所规定的我们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这里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人人都要关心提高我们国家的生产力。我们必须了解,增加生产对于我们全体人民,对于我们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只有生产不断地增加,不断地扩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们人民的贫困,才能巩固我们革命的胜利,才能有我们将来的幸福。一切破坏经济纪律、劳动纪律、财政纪律和损害公共财产、浪费国家资

金的现象，在我们这里都是不能容许的；一切只顾个人不顾社会、只顾局部不顾全体、只顾眼前不顾将来、只顾权利不顾义务、只顾消费不顾生产的观点和行为，都是必须反对的。因为这些都损害我们国家的生产发展，因而也就是损害我们将来的幸福。

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九日)

主 要 发 言

主席、各位代表先生：

举世瞩目的亚非会议⁽⁹⁶⁾已经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能同与会的各国代表团一起在这个会议上讨论我们亚非国家的共同问题，感到非常高兴。我们能够在这里会晤，首先要感谢缅甸、锡兰、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个发起国家的倡议和努力，我们还应当感谢这次会议的主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为会议作了很好的安排。

亚非两洲有这么多的国家在一起举行会议，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我们亚非两洲的土地上生活着全世界半数以上的人民。亚非人民曾经创造过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对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近代以来，亚非两洲的大多数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遭受了殖民主义的掠夺和压迫，以致被迫处于贫困和落后的停滞状态。我们的呼声受到抑制，我们的愿望受到摧残，我们的命运被旁人摆布，因此我们不得不起而反对殖民主

* 这两个发言分别刊载于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日、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义。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受到的灾难和为了同样的目的而进行的斗争,使我们亚非各国人民容易互相了解,并在长期以来就深切地互相同情和关怀。

现在亚非地区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亚非国家摆脱了或正在摆脱着殖民主义的束缚。殖民国家已经不能用过去那样的方式来进行掠夺和压迫。今天的亚洲和非洲已经不是昨天的亚洲和非洲。亚非两洲的许多国家,经过长期的努力,已经把他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的会议反映了这一深刻的历史变化。

虽然如此,殖民主义在这个地区的统治并没有结束,而且新的殖民主义者正在谋取旧的殖民主义者的地位而代之。不少亚非人民还在过着殖民地的奴隶生活,不少亚非人民还在受着种族歧视,他们的人权遭受着摧残。

我们亚非各国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过程是不同的;但是,我们争取和巩固各自的自由和独立的意志是一致的。不管我们每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如何不同,我们大多数国家都需要克服殖民主义统治所造成的落后状态,我们都应该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按照我们各国人民的意志,使我们各自的国家获得独立的发展。

亚非人民曾经长期遭受侵略和战争的苦难。许多亚非地区的人民曾经被殖民主义者强迫充当进行侵略战争的炮灰。亚非人民不能不痛恨侵略战争。他们知道,新的战争威胁不仅危害到他们国家的独立发展,而且还要加强殖民主义的奴役。因此,我们亚非人民更加深切地感觉到世界和平和民族独立的可贵。

基于这些情况，保障世界和平、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并为此目的而促进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就不能不是亚非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接着朝鲜停战⁽²⁶⁾之后，日内瓦会议⁽⁹⁷⁾曾经在尊重民族独立的基础上，得到科伦坡五国会议⁽⁹⁸⁾的支持，达成了印度支那的停战⁽⁹⁹⁾。当时，国际的紧张局势确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给全世界人民特别是亚洲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但是，跟着而来的国际形势的发展却和人民的希望相反。无论在东方和西方，战争危机都在增加。朝鲜人民和德国人民要求和平统一的愿望受到阻挠。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协议⁽¹⁰⁰⁾有被破坏的危险。美国在台湾地区继续制造紧张局势。亚非以外国家在亚非地区建立的军事基地越来越多。他们公开鼓吹原子武器是常规武器，准备原子战争。亚洲人民不能忘记第一颗原子弹是落在亚洲的土地上⁽¹⁰¹⁾，第一个死在氢弹试验下的是亚洲人⁽¹⁰²⁾。亚非各国人民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一样，不能不关切日益增长的战争威胁。

但是进行侵略、准备战争的人究竟是极少数。世界上不论是生活在哪一种社会制度中的绝大多数人民都要求和平，反对战争。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运动有了更加广泛和深入的发展。他们要求终止扩军备战的竞赛，首先各大国应该就裁减军备达成协议。他们要求禁止原子武器和一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他们要求将原子能用于和平用途，为人类创造幸福。他们的呼声已经不能被忽视，侵略和战争的政策已经日益不得人心。战争策划者日益频繁地诉之于战争威胁，作为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但是，战争威胁是吓不倒任何具有抵抗决心的人

的，它只能使威胁者自己陷于更加孤立和更加混乱的地位。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同世界上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决心维护和平，和平是有可能维护得住的。

我们大多数亚非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由于殖民主义的长期统治，经济上还很落后。因此，我们不仅要求政治上的独立，同时还要求经济上的独立。当然，我们要求政治独立并不是要对亚非地区以外的国家采取排斥的政策。但是，西方国家控制我们命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亚非国家的命运应该由亚非各国人民自己掌握。我们要努力实现各国的经济独立，这也并不是要排斥同亚非地区以外的国家的经济合作。但是，我们要求改变西方殖民国家对东方落后国家的剥削状态，我们要求发展亚非各国独立自主的经济。争取完全独立是我们大多数亚非国家和人民长期奋斗的目标。

在中国，自从人民作了自己国家的主人以后，我们的一切努力就是要消除长期的半殖民地社会遗留下来的落后状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国家。五年以来，我们恢复了遭受长期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并且从一九五三年起开始了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这些努力，我们在各个主要生产部门，例如钢铁、棉布、粮食的生产量，都已经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水平。但是，这些成就比之于我们的实际需要还微小得很，比之于工业高度发展的国家，我们还落后得很。正象其他的亚洲国家一样，我们迫切地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我国独立自主的经济。

反对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的亚非国家更加珍视自己的民族权利。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在国际关系中都应该享有平

等的权利，它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而不应受到侵犯。所有附属国人民都应该享有民族自决的权利，而不应遭受迫害和屠杀。各族人民不分种族和肤色都应该享有基本人权，而不应该受到任何虐待和歧视。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对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其他争取独立的附属国人民的暴力镇压还没有停止；在南非联邦和其他地区进行着的种族歧视和种族主义的迫害还没有制止；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难民问题还没有解决。

现在，应该说，反对种族歧视、要求基本人权，反对殖民主义、要求民族独立，坚决维护自己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已经是觉醒了的亚非国家和人民的共同要求。埃及人民为收复苏伊士运河地区的主权和伊朗人民为收复石油主权而进行的斗争，印度对果阿和印度尼西亚对西伊里安岛恢复领土权利的要求，获得了亚非地区许多国家的同情。同样，中国解放自己领土台湾的要求也获得了亚非地区一切具有正义感的人民的支持。这证明我们亚非各国人民是互相了解、互相同情和互相关切的。

只有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和平才有保障。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主权和领土的侵犯，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内政的干涉，都不可避免地要危及和平。如果各国保证互不侵犯，就可以在各国的关系中创造和平共处的条件。如果各国保证互不干涉内政，各国人民就有可能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选择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就是在有关各方保证尊重印度支那各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并对其内政不予任何干涉的基础上达成的。

据此,日内瓦会议并规定,印度支那各国不参加军事同盟和建立外国军事基地。这就是为什么日内瓦会议能够为建立和平地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在日内瓦会议之后,我们却看到了一种相反的情况在发展,这是不利于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利益的,也是不利于和平的。我们认为,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应该严格地和忠实地予以履行,任何方面不得加以干涉和阻挠。朝鲜的和平统一问题也应该按照同样的原则予以解决。

我们亚非国家需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合作,以便有助于消除我们在殖民主义的长期掠夺和压迫下所造成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我们亚非国家之间的合作应该以平等互利为基础,而不应该附有任何特权条件。我们相互之间的贸易来往和经济合作应该以促进各国独立经济发展为目的,而不应该使任何一方单纯地成为原料产地和消费品的销售市场。我们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应该尊重各国民族文化的发展,而不抹煞任何一国的特长和优点,以便互相学习和观摩。

在我们亚非地区的各国人民日益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今天,即使我们在目前经济和文化的合作规模还不可能很大,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这种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合作是有远大的发展前途的。我们深信,随着我们亚非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各国间贸易关系中人为的外来的障碍的消除,我们亚非各国间的贸易来往和经济合作将会日益增进,文化交流也将日益频繁。

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原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是可以实现和平共

处的。在保证实施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国际间的争端没有理由不能够协商解决。

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我们处境大致相同的亚非国家首先应该友好合作，实现和平共处。过去殖民统治在亚非国家间所造成的不和和隔阂，不应该继续存在。我们应该互相尊重，消除互相间可能存在的疑虑和恐惧。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完全同意南亚五国总理在茂物会议⁽¹⁰³⁾联合公报中所确定的关于亚非会议的目的。我们并认为，为了对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作出贡献，亚非各国应该首先根据共同的利益，谋求相互间的亲善和合作，建立友好和睦邻的关系。印度、缅甸和中国曾经确定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¹⁰⁴⁾作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原则。这些原则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支持。本着这些原则，中国同印度尼西亚关于两国侨民国籍问题的初步谈判已经取得了良好的结果。在日内瓦会议时，中国也曾表示愿意在这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印度支那各国发展友好的关系。根据这五项原则，中国同泰国、菲律宾等邻国的关系没有理由不能获得改善。中国愿以严格遵守这些原则作为它同亚非其他国家建立正常关系的基础，并愿促进中国和日本关系的正常化。为了增进我们亚非各国间的相互了解和合作，我们建议亚非各国的政府、国会和民间团体实行互相的友好访问。

主席，各位先生，任意摆布亚非人民命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相信，如果我们决心维护世界和平，就没有人能够把我们拖入战争；如果我们决心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就没有人能够继续奴役我们；如果我们决心友好合作，就没有人

能够分裂我们。

我们亚非国家所需要的是和平和独立，我们并无意于使亚非国家同其他地区的国家对立，我们同样需要同其他地区的国家建立和平合作的关系。

我们的会晤是难得的。尽管我们中间存在着许多不同意见，但是这不应该影响我们所具有的共同愿望。我们的会议应该对于我们的共同愿望有所表示，使它成为亚非历史值得珍贵的一页。同时，我们在这次会议中建立起来的接触应该继续保持，以便我们对于世界和平能够作出更大的贡献。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加诺阁下说得对，我们亚非人民必须团结起来。

让我们预祝会议成功。

补 充 发 言

主席，各位代表：

我的主要发言现在印发给大家了。在听到了许多代表团团长的一些发言之后，我愿补充说几句话。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

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意五国总理茂物会议所宣布的关于亚非会议的四项目的,而不另提建议。

本来,对于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如同苏联所提出的召开国际会议谋求解决的议案,请求会议加以讨论。中国人民解放自己领土台湾和沿海岛屿的要求是正义的,这完全是内政和行使自己的主权,并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我们也很可以提议会议讨论承认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问题。去年,科伦坡五国总理会议,还有亚非其他国家,都曾经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地位。而且,中国在联合国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也可以在这里提出批评。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

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

现在,我首先谈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我们应该承认,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第二次大战后,亚非两洲兴起了许多独立国家,一类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一类是民族

主义者领导的国家。前一类国家并不多。但是某些人所不喜欢的,就是六万万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政治制度,而不再为帝国主义所统治了。后一类国家很多,象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和亚非许多国家都是。我们这两类国家都是从殖民主义的统治下独立起来的,并且还在继续为完全独立而奋斗。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呢?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在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我们亚非国家,中国也在内,不论在经济上或文化上都很落后。我们亚非会议既然不要排斥任何人,为什么我们自己反倒不能互相了解、不能友好合作呢?

次之,我要谈有无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宗教信仰自由是近代国家所共同承认的原则。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们希望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应该尊重无宗教信仰的人。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它不仅拥有七百万共产党员,并且还有以千万计的回教徒和佛教徒,以百万计的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中国代表团中就有虔诚的伊斯兰教的阿訇。这些情况并不妨碍中国内部的团结,为什么在亚非国家的大家庭中不能将有宗教信仰的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团结在一起呢?挑起宗教纷争的时代应该过去了,因为从挑起那种纷争中得到利益的并不是我们中间的人。

第三,我要谈所谓颠覆活动的问题。中国人民为反对殖民主义所进行的斗争超过一百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也经历了近三十年的艰难困苦的过程,才终于达到了成功。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蒋介石统治下所

受的苦难是数也数不尽的，最后才选择了这个国家制度和现在的政府。中国革命是依靠中国人民的努力取得胜利的，决不是从外输入的，这一点连不喜欢中国革命胜利的人也不能否认。中国古语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会去干涉别人的内政呢？有人说，中国在国外有一千多万华侨，可能利用他们的双重国籍来进行颠覆活动。但是，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蒋介石至今还在利用极少数的华侨进行对所在国的破坏活动。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却准备与有关各国政府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又有人说，在中国境内有傣族自治区威胁了别人。中国境内有几十种少数民族共四千多万人，其中傣族和相同系统的壮族将近千万人。他们既然存在，我们就必须给他们自治权利。好象缅甸有掸族自治邦一样，在中国境内各个少数民族都有他们的自治区。中国少数民族在中国境内实行自治权利，如何能说威胁邻邦呢？我们现在准备在坚守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乃至世界各国，首先是我们的邻邦，建立正常关系。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去颠覆别人的政府，倒是有人在中国的周围建立进行颠覆中国政府的据点。比如在缅甸边境就存在着蒋介石集团的残余武装分子，对中缅两国进行破坏。因为中缅友好，我们一直尊重缅甸的主权，信任缅甸政府去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人民选择和拥护自己的政府，中国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决无颠覆邻邦政府的意图。相反的，中国正在受着美国政府公言不讳地进行颠覆活动的害处。大家如果不信，可亲自或派人到中国去看。我们是容许不知真相的人怀疑的。中国俗

语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

十六万万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

同志们：

为着加强党对于知识分子的领导，加强党对于整个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中央决定召集一次会议讨论知识分子问题。

中央的这个决定，是中央领导全党反对保守思想、努力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整个斗争的一部分。

大家知道，在一九五五年内，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倡议，党中央曾经对于党内的右倾保守思想，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这一系列的斗争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在机关内在社会上都有步骤地彻底展开，预计今后两年内将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就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在群众觉悟迅速增长的基础上突飞猛进，今年将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并且正在向着全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发展；就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迅速发展，今年也很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就是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整个地将要提前和超额完成，预计某些生产部门可以在一九五六年完成一九五七年的生产计划，其他各部

* 这是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刊载于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

门也都有可能提前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

所有这些巨大的动人的成就，在一年以前还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不展开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那么这些成就，到现在也还是不可能获得的。由此可见，右倾保守思想在我们党内的危害是多么严重。

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的基本要求，是应该更加巩固和发展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提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超额完成国家工业发展计划和加速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这个斗争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在我们六亿人口的大国中，能够提前完成和加速进行这些任务，把这些任务完成和进行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就将使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得到更快更大的加强，就将更有利于我们阻止新的战争的爆发，而如果疯狂的侵略者敢于发动新的战争，我们也将处于更有力的地位。因此，党中央决定，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作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要求全党在一切工作部门中展开这个斗争。

知识分子问题，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知识分子问题，同我们目前的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归根结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增长，不断地改善。因此，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

利用科学知识。因此，我们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比方说，我们要找矿，就得有一批地质专家，带上大批大学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到各处的荒山僻野去进行测量、普查、详查和钻探。我们要建设矿山、工厂、铁路和水利工程，就得有一批工程师和一大批技术员来勘测、设计、建筑和安装。工厂要生产，生产中从产品设计到成品检验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一定数量和一定水平的技术力量。工业和商业的管理，愈来愈需要各种专门的知识。要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就需要各种科学专家。没有教师和医生，我们就不能有学校和医院。没有文化艺术工作者，我们就不能有文化生活。在农村里，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以后，固然需要有大批的农业机器工程师、电站工程师、农学家、会计师等等；就在目前，为着实现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¹⁰⁵⁾中的许多马上就要着手的项目，例如为着生产新式畜力农具、化学肥料和抽水机，消灭主要的病虫害，消灭严重的人类疾病和畜疫，也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工作者、植物保护学者、医务工作者和兽医的积极参加。因此，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而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也就成为我们努力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个重要条件。我们党的各个部门，党的各级组织，都

应该重视这个问题。

什么是当前的知识分子问题呢？当前的根本问题，就是我们的知识分子的力量，无论在数量方面，业务水平方面，政治觉悟方面，都不足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急速发展的需要；而我们目前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待遇中的某些不合理现象，特别是一部分同志对于党外知识分子的某些宗派主义情绪，更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知识分子现有力量的充分发挥。我们必须加强领导，克服缺点，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现有的知识分子的力量，不断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大规模地培养新生力量来扩大他们的队伍，并且尽可能迅速地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以适应国家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断增长的需要。这就是我们党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根本任务。



为了讨论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任务，我们首先要把目前知识分子的情况考察一下。

我们党向来是重视知识分子问题的。还在一九三九年，党中央就通过了毛泽东同志所起草的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¹⁰⁶⁾，并且在各个抗日根据地有效地实施了。全国解放以后，党在全国范围内对于知识分子实行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党中央认定：革命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吸收知识分子。特别是由于解放前的我国是一个文化落后科学落后的国家，我们就更必须善于充分地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

的这批知识分子的历史遗产，使他们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党中央又认定：我国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在过去虽然受了帝国主义和反动阶级的种种影响，但是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同时也受着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压迫，因而一部分参加了革命，一部分同情于革命，多数对于革命抱着中立的观望的态度，反革命分子只占极少数。事实日益给中国知识分子提出证明：他们除了同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一道，并没有什么别的出路。因此，团结知识分子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从这个认识出发，党中央对于旧时代的知识分子采取了“包下来”的方针，绝大多数都继续给以适当的工作，其中一部分还分配了负责的工作；对于原来失业的知识分子也努力帮助他们就业，或者给以其他的适当的安排。在政治方面，党给了许多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以应有的地位。党中央认为：对于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必须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使他们抛弃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为了这个目的，党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骤。党组织他们去参加土地改革⁽¹⁰⁾、镇压反革命⁽⁶⁸⁾、抗美援朝⁽²⁶⁾、“三反”⁽⁷⁷⁾“五反”⁽⁷⁴⁾的斗争，参观工厂和农村，访问苏联，参加各种国际活动，领导他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批判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观点，进行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¹⁰⁷⁾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并且在学习的基础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业务方面，党也采取了许多步骤，帮助他们改进工作方法，提高业务能力。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团结、教育、改造旧知识分子的同时，党又用了很大的力量来培养大量的新的知识

分子，其中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劳动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由于这一切，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关于知识分子的目前的政治状况，许多单位作了统计。这些统计表明：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积极拥护社会主义、积极为人民服务的进步分子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般能够完成任务，但是在政治上不够积极的中间分子也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以上两部分合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在这百分之八十左右以外，缺乏政治觉悟或者在思想上反对社会主义的落后分子约占百分之十几，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约占百分之几。

同解放初期比较起来，这个变化是很快的。例如，根据北京、天津、青岛四所高等学校对于一百四十一个教师的统计，过去六年中，进步分子由百分之十八增为百分之四十一，落后分子由百分之二十八减为百分之十五。许多知识分子在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面前，不能不日益受到强烈的影响，并且从中国的新生中看到全民族和他们自己的互相关联的命运。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同他们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的变化并不是完全相适应的。许多进步分子也还有程度不同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更不要说中间分子了。此外，有不少单位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其中比较落后的部分的变化很慢，也反映我们在他们中间做的工作很少。

知识分子的队伍在过去六年中在数量上也有了很快的扩

大。目前全国在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卫生、文化艺术和其他方面的高级知识分子根据估计约为十万人，其中在解放以后增加的数字，根据一部分材料统计，约占三分之一左右。有些部门增加得特别快。例如，地质工作人员在解放初期不满二百人，而在一九五五年，根据地质、重工业、石油工业、煤炭工业等四个部的统计，只是工程师就已经增加到四百九十七人，而高等学校毕业的技术员就达到三千四百四十人。

解放以后六年中，全国高等学校毕业生已经达到二十一万七千九百人。他们虽然并不都合乎我们所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标准，但是他们是知识界的新生力量，并且是专家的后备军。而且必须指出，有许多青年虽然在等级上还不是专家，却已经担任了专家的工作，并且一般地担任得不坏。在高等学校的四万二千教学人员中，教授和副教授只占百分之十七点八，讲师占百分之二十四，助教占百分之五十八点二，而一部分助教现在已经参加了教课的工作。在工程界也是一样。全国各级工程师只有三万一千多人，而高等学校毕业的各级技术员却有六万三千六百人，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实际上是担任着工程师的工作，其中有些人早已应该被提升为工程师了。除此以外，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后备军的，还有其他知识分子的广大队伍，他们正在实际工作和业余自学的过程中不断地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

所谓高级知识分子和一般知识分子，中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现在就已经有统计数目的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卫生、文化艺术五个方面的知识分子来看，共有三百八十四万人。他们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支伟大的力量。正确地估

计和使用这些知识分子,有计划地帮助他们在政治上和业务上不断进步,是党和国家的极其重要的任务。在我的报告中,虽然着重地讨论有关高级知识分子的问题,但是大部分原则同样地适用于一般知识分子。

如上所说,我国知识分子现在已经成为一支很大的队伍。但是,我们的国家是这样地大,我们的建设事业发展得这样地快,今后还要发展得更快,因此,我们不能不更快地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的队伍,以满足社会主义建设的迫切需要。应该承认,我们培养和提拔新生力量的工作也还有很多缺点,这些缺点阻碍着知识分子队伍的更快的扩大。

我国知识分子的业务水平在过去六年中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全国的高等学校进行了教学改革,新设了许多以前全国所没有的系和专业,新编和翻译了大量的教材,提高了教学的质量。全国的科学技术界在地质勘探方面、基本建设设计和施工方面、新产品设计和试制方面,都进行了巨大的工作,得到了显著的成就。由于努力向苏联学习的结果,我国工程界现在已经学会了许多现代化的工厂、矿井、桥梁、水利建设的设计和施工,在设计大型机械、机车、轮船方面的能力也有很大的提高。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五年试制成功的新的机械产品,已经有三千五百种左右,少数已经达到世界水平。在冶金方面,我国能够冶炼的优质钢和合金钢,已经有二百四十多种;我国高炉和平炉的利用系数已经达到苏联一九五二年的水平。在理论科学方面,我国在数学、物理学、有机化学、生物学的若干部门中的成就,也受到了世界科学界的重视,其中一部分已经

对生产的实践有了贡献。

但是整个说来,我国的科学和技术的状况仍然是很落后的。不但世界科学的很多最新成就,我们还没有能够掌握和利用,而且就是目前我国建设中的许多复杂的技术问题,我们也还不能离开苏联专家而独立解决。可是直到最近以前,我们对于提高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问题,还没有作出全面规划;甚至现有的力量,也还没有完全有效地利用。技术科学上的落后同理论科学基础的薄弱是分不开的,而正是在科学研究方面,我们投入的力量最少。

从以上的简单叙述可以看出:我们的成绩很大,但是还有不少缺点。

那么,我们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应该采取怎样的方针呢?应该防止和纠正什么倾向呢?

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但是同时也存在着麻痹迁就的倾向。前一种倾向是:低估了知识界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的巨大进步,低估了他们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不认识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认为反正生产依靠工人,技术依靠苏联专家,因而不认真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认真研究和解决有关知识分子方面的问题;对于怎样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怎样进一步改造知识分子、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提高知识分子的业务能力等迫切问题,漠不关心。后一种倾向是:只看到知识界的进步而不看到他们的缺点,对他们过高地估计,不加区别地盲目信任,甚至对坏分子也不加警惕,因而不去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工作,或者虽然看到他们的缺点,但是由于存在着各

种不应有的顾虑，因而不敢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工作。这两种倾向在形式上是相反的，而实际的结果却都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都是放弃领导，缺乏积极的斗争精神，都妨碍着我们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和科学文化问题，都妨碍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我们必须同时反对这两种不正确的倾向。我们既不能对知识界的现有力量加以忽略，更不能认为可以满足；既不能无限期地依赖苏联专家，更不能放松对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最有效的学习。我们所应该采取的唯一正确的方针，就是为了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行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必须尽一切努力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现有力量，同时尽一切努力尽可能迅速地给以进一步的改造、扩大和提高，使这种改造、扩大和提高的速度和规模能够真正符合我们国家的各方面伟大发展的巨人式的步伐。

二

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现有力量，不但是我国目前紧张的建设事业所必需的，而且也是对知识界加以进一步的改造、扩大和提高的前提。

一般地说，知识分子是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被大量地动员起来了。要不然，我们前面说的知识分子的巨大进步和他们对于国家的巨大贡献，就都是不可思议的了。我们必须首先肯定这一点，这是事物的主要方面。

但是在我们的工作中，也的确存在着不少缺点，包含一些

严重的缺点。在目前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高潮当中，需要我们加强领导，迅速地克服这些缺点，才能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

为了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

在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方面，我们在大多数的情形下都做得不坏。许多知识分子已经在国家建设中负担了很多很重大的任务，而他们的能力在实践中也不断地得到了提高。

但是究竟不能说，我们已经把知识分子使用和安排得都恰当了，而没有闲置任何力量。例如在许多机关里，因为工作分配得不适当，或者工作组织得不好，也还有使少数知识分子“闲得发慌”的情形，而这些知识分子往往正是因为有某种专门知识，才被分配到这些机关里来的。这种浪费国家最宝贵的财产的情形，必须加以消灭。又如在全国高等学校里，还有极少数教师没有开课。这些人里面有一些并不是不能开课，或者只需要组织他们学习一下就可以开课，这就应该让他们开课；如果确实不能开课，也应该设法分配给他们所能担任的工作，例如编译工作、出版工作、图书馆工作等，而不应该让他们闲着。又如在社会上也还有极少数失业而还有相当劳动能力的知识分子，也应该根据情况，由地方或者由中央给他们分配一定的工作。

有些地方，在对知识分子的安排和使用上，用非所学的情形也还存在。有一部分科学家，本人愿意作科学研究工作，也以做科学研究工作对国家最有利，却被分配做机关行政工作

或者学校行政工作。还有一部分专家，由于工作分配中的错误，完全没有理由地被指定担任他们所没有学过的工作，有时今天叫干这个，明天又叫干那个，可是就不让他们调回本行。根据国务院第四办公室就轻工业部的所属五个单位统计，这种用非所学的情况，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就约占百分之十，这是多么严重的损失！我们必须采取坚决的步骤，来纠正这种对待人才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本位主义的错误，以便把专门人才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为了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第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

知识分子对于我们所给予的信任和支持，一般地是满意的，但是我们仍然应该看到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在对于知识分子的信任问题上，如前所说，一种倾向是在政治上和业务上不加区别地过分地信任，以至把一些国家的机密没有必要地告诉给一些不相干的人或者泄露给一些不可靠的人，或者对于完全不称职的人加以重用，使工作遭到损失。这种情形是存在的，必须加以纠正。另一种倾向是没有给他们应有的信任，例如可以去的工厂不让他们去，可以看的资料不让他们看。这种情形也是存在的，也必须加以纠正。国家的机密必须无条件地保守，任何放松都是不允许的；问题是在正确地划清机密的界限，而不要任意地扩大机密的范围，使工作受到损失，使工作人员遇到困难。同时，对于知识分子的历史要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和了解，以免一部分人由于“历史复杂”而受到长时期的不应有的怀疑。现在的高级知识分子中许多人历史是比

较复杂的,这并不奇怪。但是只有少数人有政治问题,只有极少数人有现行的政治问题。不少有历史问题没有作出结论的知识分子,是由于领导同志没有认真负责、实事求是地弄清他们的问题,因而使问题长期迁延不决。应该集中比较强的力量,分别轻重缓急,尽可能迅速地清理他们的悬案,以利于今后对他们的使用。

党外的知识分子除了需要应得的信任,还需要应得的支持。这就是说,应该让他们有职有权,应该尊重他们的意见,应该重视他们的业务研究和工作成果,应该提倡和发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学术讨论,应该使他们的创造和发明能够得到试验和推广的机会。有少数党团员不尊重他们上级的党外知识分子的领导,这种情形,我们应该负责加以纠正。

对于一部分知识分子信任和支持不够,这是我们有些同志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宗派主义的主要表现。不少的同志还不习惯于同党外知识分子遇事商量,并在事前给以及时的指导和帮助。有的同志对于党外知识分子甚至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这样,彼此既缺乏了解,也就容易形成隔膜。但是,他们是我们国家的重要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好坏直接地影响着国家的建设,所以我们有责任学会用同志的态度去接近他们,正确地了解他们,从而给他们以指导和帮助,使他们能够在工作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为了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

知识分子目前的工作条件和待遇,比解放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也象前面所说的一样,这一方面也还有一些急

待解决的问题。

在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方面,目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不能最有效地支配自己的工作时间。许多知识分子深感他们用在非业务性会议和行政事务上的时间太多,这些会议和有许多事务本来是可以不要他们参加的。差不多愈是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被各种会议、事务和社会活动所占去的时间愈多,这是我国文化战线上的一个严重现象。中央认为,必须保证他们至少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即每周四十小时)用在自己的业务上,其余的时间可以用在政治学习、必要的会议和社会活动方面。这个要求,应该坚决贯彻实现。知识分子参加社会活动是有益的,目前的缺点是这些活动往往集中在少数人身上。今后应该加以调整,尽可能使多数人可以参加,对于大家不成为负担。有不少专家兼职太多,也应该迅速地加以调整。

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工作中感觉缺乏必要的图书资料和工作设备,或者缺乏适当的助手,以致工作效率很低。这种情形确实是存在的。例如许多拥有大量图书资料的单位,没有充分重视这些宝贵财产,没有派适当干部去进行整理,因而使一些专家不能够利用这些图书资料进行研究。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对于他们的需要不熟悉,或者虽然听说了多次,而没有负责地给以解决。有些工作人员不愿意为这些“小事情”麻烦,这是错误的。这不是“小事情”,我们应该迅速地认真地解决这些问题。

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一般地说比解放以前已经有了改善,但是为了使高级知识分子能够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工作,他

们的生活待遇应该适当地提高。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为了日常生活琐事,往往不必要地费去太多的时间,这应该看作是国家劳动力的损失。有些高级知识分子的居住条件太差,在北京和其他人口增加特别快的城市,都有一家几口合住一间小屋的情形。他们的休闲娱乐生活也组织得不好。所有这些问题,都应该由主管的部门认真地加以解决。

为了更好地解决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问题,主要地需要从三方面着手:第一,应该教育各有关单位的行政管理人员从思想上重视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特别是要打破那种只注意行政负责人的生活,而对于知识分子就觉得“你有什么值得照顾,我为什么要侍候你”一类的错误观念。只要这样,问题就可以差不多解决一半。第二,应该教育各有关单位的工会组织和消费合作社组织努力扩大为本单位的知识分子服务。工会的会费应该在很大的程度上用于本单位的文化活动和物质福利事业。工会的工作人员应该深入群众,用顽强的精神为本单位的会员解决各种生活困难,这应该是各种知识分子工会的一项重要任务。第三,应该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适当地调整知识分子的工资,使他们所得的工资多少同他们对于国家所作的贡献大小相适应,消除工资制度中的平均主义倾向和其他不合理现象。此外,有少数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知识分子,例如一部分戏曲艺人、国画家和中医,目前收入比较少,这种问题也应该由主管部门另行设法解决。

有关知识分子生活待遇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升级制度。我们现在的升级制度有很多不合理的方面:等级多而等距小;高等学校毕业生的等级太低;没有确定的升级办法和升级标

准；许多单位几年不评级，因此也就有一部分人没有能够升级。这种不合理的升级制度，大大地妨碍了知识分子在业务上的上进心，特别是妨碍了新生力量的培养和一般知识分子的提拔。这个制度必须迅速地加以修改。此外，关于学位、学衔、知识界的荣誉称号、发明创造和优秀著作奖励等制度，也是鼓励知识分子上进和刺激科学文化进步的一个重要方法。这些制度正在由有关部门拟定，应该在最近期间确定公布。

对于知识分子的政治待遇，也有一些地方需要加以改善。这里的主要问题，是要消除许多单位对于知识分子的政治生活的不关心。有些知识分子埋怨我们一个长报告要他们听好几次，但是更多的知识分子埋怨我们一年不让他们听一次报告。同样，有许多社会活动，有人觉得参加太多，但是更多的人认为，如果他们能够得到参加一次的机会，他们将感到很大的鼓舞。这些方面，我们都应该注意加以适当的调整。此外，我们还应该在工作人员进行教育，让他们懂得怎样正确地对待知识分子，而不要在无意之间伤害了他们的正当的自尊心，这种自尊心是任何一个正直的劳动者都应该有的。

以上所说的，是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力量的一些必要的条件。当然，为了这个目的，还需要给他们以教育和改造，给他们以政治上和业务上的领导，这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但是，无论如何，以上所说的这些条件都是必不可少的。有了这些条件，才便于更充分地动员知识分子在伟大的祖国建设事业中发挥力量，也才便于推动他们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的进步。

三

继续帮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是党在过渡时期的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

我国现在正处在过渡时期,这是最深刻的社会改造的时期。几千年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要一变而成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几千年的剥削制度,要从此永远消灭;所有的人们,都要变成不同类型的劳动者。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能不在我国社会生活和思想领域的各个方面,引起激烈的反应。因此,这个时期的一切社会问题,其中也包括知识分子问题,都不能离开阶级斗争来观察。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各种分野和变化,正是阶级斗争的进展在知识分子队伍中的反映。我们已经看到,在目前的知识分子中,还有百分之几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例如骗子和流氓),这些人是需要从知识分子队伍中清除的。除此以外,还有少数思想上反对社会主义和完全不了解社会主义的人们。对于这些人,应该批评他们的错误思想,并且尽可能争取他们转变到社会主义方面来。

肃清暗藏在知识界中的反革命分子的工作,在过去一年中已经得到巨大的成绩。我们应该继续努力,争取在今后两年内达到基本上肃清反革命分子的目的。

在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时候,不要把只同反革命分子有过普通社会关系的人牵连在一起,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知识分子中这样的人是很多的。过去如果曾经不正确地把他们同反革命分子混淆在一起,应该向他们解释清楚。对于只在

历史上同反革命组织有过关系，解放以后确实已经改变立场的人，在他们作了适当的交代以后，也应该同普通的人一样看待。

我们在前面说到，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同我们党之间，还存在着某种隔膜。我们必须主动地努力消除这种隔膜。但是这种隔膜常常是从两方面来的：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同志没有去接近他们，了解他们；而另一方面，却是由于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采取了保留态度甚至反对态度。在我们的企业、学校、机关里，在社会上，都还有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之间不分敌我；他们不满意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和措施，留恋资本主义甚至留恋封建主义；他们反对苏联，不愿意学习苏联；他们拒绝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诋毁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轻视劳动人民出身的干部，不愿意同工人农民和工农干部接近；他们不愿意看见新生力量的生长，认为进步分子是投机；他们不但常常在知识分子和党之间制造纠纷和对立，而且也在知识分子中间制造纠纷和对立；他们妄自尊大，自以为天下第一，不能够接受任何人的领导和任何人的批评；他们否认人民的利益、社会的利益，看一切问题都从个人的利益出发，合乎自己利益的就赞成，不合乎自己利益的就反对。当然，所有这些错误一应俱全的人，在现在的知识分子中是极少数；但是有上述一种或者几种错误的人，就不是极少数。不但落后分子，就是一部分中间分子，也常有以上所说的某一些错误观点。胸怀狭窄、高傲自大、看问题从个人的利益出发的毛病，在进步分子中也还不少。这样的知

识分子如果不改变立场,即使我们努力同他们接近,他们同我们之间也还是会有隔膜的。

因此,我们不但应该改造落后分子,而且对于中间分子也应该尽可能地教育他们脱离中间状态,变为进步分子;对于进步分子,也必须帮助他们继续进步,帮助他们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扫除他们思想上的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影响。我们应该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培养出大批的坚决为社会主义奋斗的红色专家。目前有些高级知识分子已经成为红色专家,还有很多人具有这种愿望。我们应该热情地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实现他们的这种愿望,任何排斥和歧视他们的态度都是错误的。

总起来说,彻底肃清暗藏在知识界中的反革命分子,使落后分子减少到最低限度,使中间分子尽可能地变为进步分子,使进步分子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这就是我们在目前阶段继续改造知识分子的斗争纲领。

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我们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和巨大的成绩。因此,关于知识分子能否改造的问题,已经不需要详细的讨论了。我们现在的任务,是总结过去的经验,克服过去工作中的某些缺点,使今后的工作能够进行得更有计划。我们既然看到知识分子中的各种政治的分野,就应该大体上按照这种状况,分别地定出教育进步分子、中间分子、落后分子的计划,采取各种已经证明有效的办法,加以实施。

知识分子的改造通常经过三条道路:一条是经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一条是经过他们自己的业务的实践;一条是经过一般的理论的学习。这三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的,一个人的

思想的转变常常在三方面都受了影响。但是一般地说来，社会生活的教育作用最为广泛和直接。大家知道，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都是从参加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开始的。近几年对于工厂农村的参观，也极有力地帮助了知识分子获得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但是我们还没有有系统地组织这个工作，特别是许多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常常没有放在我们的计划之内。在今后，应该把组织知识分子参观社会主义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加以通盘的安排，使凡是没参观过的人在最近几年中都得到参观的机会。

业务的实践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也有重大的作用。过去几年中，教学方法的改革和苏联教材的采用，使许多原来不相信苏联和不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师改变了认识。同样，我国工农群众在生产技术上的创造，苏联科学技术在我国的推广，苏联专家的实际示范，也使很多科学技术人员信服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今后应该继续发展这一方面的经验。但是在学习苏联的问题上，过去也有过于急躁、生硬和机械照搬的缺点，有的同志甚至武断地否定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成果。这些缺点今后应该避免。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对于确立知识分子的革命的人生观和科学的世界观，具有决定的意义。但是现在有些地方这种学习组织得不好，或者是指导的人水平太低，或者是学习的计划和方法不合于高级知识分子的需要。今后应该克服这些缺点，按照自愿和联系业务的原则，规定一些必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课程，着重采取自学、夜大学、函授学校、科学讨论会等方法，来帮助知识分子学习理论。

知识分子的改造既然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这个改造过程本身就不可能没有相当的斗争。首先，我们必须要求所有的知识分子站在爱国的立场上，遵守宪法，分清敌我的界限。如果一个人违反爱国的立场，违反宪法，在言论和行为上混淆敌我，那么，人们不同这样的人进行斗争是不可想象的。其次，在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资本主义的思想、唯物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思想之间，也不可能没有尖锐的斗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过程，同知识界思想斗争的发展是分不开的。解放以来，党所领导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对于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对于知识分子的进步产生了很大的效果。在思想斗争中应该注意的是，一个人的思想的转变，必须通过他本人的自觉。用粗暴的方法进行思想改造，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但是用粗暴的方法对待科学家和科学问题的现象，最近还有发现，各地必须注意纠正。此外，有的人虽然在思想上坚持自己的错误，但是只要他并不在言论和行动上反对人民，甚至还愿意用自己的知识和精力为人民工作，那么，我们在批判他的错误思想的同时，就还要善于耐心地等待和帮助他逐步地觉悟起来。

为了帮助知识分子求得进步，党的领导者同他们进行直接的接触有重要的意义。很多知识分子期望我们能够在思想上政治上多给他们以帮助和批评，并且觉得我们给的这种帮助太少了。有不少的知识分子，不但很难接触到地方党委的领导同志，甚至同本单位的党委委员住在一起，也很难有机会谈话。他们说我们对他们是“使用多，帮助少”，或者是“只使用，不帮助”。还有人说，我们的工作人员只在三件事上找他们：

(一)调动工作；(二)交代历史；(三)犯了错误。这些批评是尖锐的，应该引起我们注意。我们应该把同他们进行思想上政治上的谈话，对他们进行同志式的批评，定在改造知识分子的计划以内。组织一些座谈会同他们交换意见，这是他们所欢迎的，以后应该经常举行。此外，还应该按照具体情况，吸收一些党外的知识分子列席一定的党组会和支部会，让他们进一步了解党的意图，接受党的教育。

为了帮助知识分子的进步，除了依靠共产党员以外，还要组织已经占知识分子中百分之四十左右的进步分子参加工作。青年团、工会和各民主党派在过去几年中，在这一方面作了不少工作，今后应该更有计划地使用他们的力量。

由于我们在改造知识分子方面已经有了更多的经验，又有了进步力量的支持，而一般知识分子在祖国的突飞猛进的建设中，又愈来愈深刻地受着社会主义的教育，他们的进步必然会比过去几年更快。只要全国每一个单位对于知识分子改造都作出计划，包括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的七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坚持地实行起来，那么，我们一定可以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末，使积极为社会主义奋斗并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观点的进步分子，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占到四分之三以上，而使落后分子降到百分之五左右。

关于在知识分子中吸收党员的工作，也应该作出计划。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进步的分子要求入党。例如，重工业部有色冶金设计院的工程技术人员共有一千九百二十人，申请入党的有六百零五人，占百分之三十一。天津六所高等学校讲师以上教师二百九十一人，申请入党的有一百零六人，

占百分之三十六点四。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一百三十一人，申请入党的有五十三人，占百分之四十。但是，过去几年中我们很少在他们中间吸收党员，这是一种关门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必须纠正。当然，必须注意严格按照党员条件接收党员，但是可以相信，在这些申请入党的人中间，合乎党员条件的是不少的。估计到高级知识分子中进步力量的增大，估计到新生力量不断地加入高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我们认为，计划在一九六二年做到党员占高级知识分子总数三分之一左右，是适当的。

实现以上的规划，我国知识界的思想政治状况就将有进一步的根本变化。我们将有可能在我国过渡时期基本上完成改造知识分子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任务。在那个时候以后，知识分子同所有的人一样，仍然要在学习和实践中不断地改造自己，并且要在新的水平上，向更高的进步的标准前进。但是，那是一种经常性质的任务了。

四

为着适应国家建设的急速发展的需要，我们的知识分子队伍必须在数量上加以扩大，在业务水平上加以提高。

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目前是比苏联和其他世界大国小得多，同时在质量上也要低得多，这是同我们六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的需要很不相称的。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们党和全国知识界、全国人民的一

个伟大的战斗任务。

我们经常说我国科学文化落后,但是并不经常去研究究竟落后在哪些地方。同志们!我想在这里稍微多说一点科学方面的事情,这不但因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而且因为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

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生产过程正在逐步地实现全盘机械化、全盘自动化和远距离操纵,从而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到空前未有的水平。各种高温、高压、高速和超高温、超高压、超高速的机器正在设计和生产出来。陆上、水上和空中的运输机器的航程和速率日益提高,高速飞机已经超过音速。技术上的这些进步,要求各种具备新的特殊性能的材料,因而各种新的金属和合金材料,以及用化学方法人工合成的材料,正在不断地生产出来,以满足这些新的需要。各个生产部门的生产技术和工艺规程,正在日新月异地变革,保证了生产过程的进一步加速和强化,资源的有用成分的最充分利用,原材料的最大节约和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

科学技术新发展中的最高峰是原子能的利用。原子能给人类提供了无比强大的新的动力泉源,给科学的各个部门开辟了革新的远大前途。同时,由于电子学和其他科学的进步而产生的电子自动控制机器,已经可以开始有条件地代替一部分特定的脑力劳动,就象其他机器代替体力劳动一样,从而大大提高了自动化技术的水平。这些最新的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这个革命,正如布尔加

宁⁽¹⁰⁸⁾同志所说过的，“就它的意义来说，远远超过蒸汽和电的出现而产生的工业革命”。

我们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科学水平。我们要记着，当我们向前赶的时候，别人也在继续迅速地前进。因此我们必须在这个方面付出最紧张的劳动。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才能有充分的条件同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在一起，无论在和平的竞赛中或者在敌人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战胜帝国主义国家。

现在还很难确切地估计，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使我们的科学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我们现在就必须提出这样一个任务，就是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使外国的最新成就，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很快地就可以达到。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解决赶上世界水平的问题。

为了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我们必须首先打破那种缺乏民族自信心的依赖思想。“中国在科学方面的落后反正不能马上改变，反正需要靠苏联的援助。”不错，我们需要靠苏联的援助来改变我们的落后。但是我们应该用什么办法来利用这种援助呢？一种办法是没有全面规划，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碰到什么问题就去请教苏联。派到苏联去学习的，不是科学家，而大部分是中学毕业生。其结果是一辈子不能脱离依赖和模仿的状态，是无限期地加重苏联科学界的负担，是妨害了我国科学的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也就是影响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科学力量、经济力量、防卫力量增长的速度。另一种办法是作

出全面规划,分清缓急本末,有系统地利用苏联科学的最新成果,尽可能迅速地赶上苏联水平。这就是说,除了紧迫任务请求苏联援助,并从苏联援助中学习技术以外,对于凡是我国科学上需要向苏联学习的部门,都应有计划地派出比较成熟的科学人才向苏联学习,或者请苏联专家来我国帮助我们建立科学研究的基础,务求最短期间可以在苏联已经达到的水平上,在国内展开继续研究和培养干部的工作。这样,就可以最有效最合理地利用苏联的援助,促进我国科学的有计划的发展,使两国科学事业有可能比较快地建立互相协作的关系,也就是促进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科学力量、经济力量、防卫力量的增长。后一种办法是中苏两国科学家所多次建议的、也是我们所应该采取的唯一正确的办法。

为了有系统地提高我国科学水平,还必须打破近视的倾向,在理论工作和技术工作之间,在长远需要和目前需要之间,分配的力量应该保持适当的比例,并且形成正确的分工和合作,以免有所偏废。在过去几年中间,我国的各种工作都在开始,我们在目前需要和技术工作方面多投一些力量,而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方面注意得比较少,这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了现在,如果我们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但是理论力量的生长,总是要比技术力量的生长慢一些,而理论工作的效果一般也是间接的,不容易一下子就看出来。正因为这样,有许多同志现在还有一种近视的倾向,他们不肯在科学研究方面拿出必要的力量,并

且经常要求科学家给他们解决比较简单的技术应用和生产操作方面的问题。当然，理论决不可以脱离实际，任何脱离实际的“理论研究”都是我们所必须反对的，但是目前的主要倾向，却是对于理论研究的忽视。这种情况不但表现在自然科学方面，同样地也表现在社会科学方面。目前我们在社会科学方面分配的力量，比在自然科学方面分配的力量，按照我们国家的需要说来，更加薄弱得不相称。例如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是一百七十二个人，目前实际上能用大部分时间进行科学工作的有半数以上；在社会科学方面是五十一个人，目前实际上能用大部分时间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却只有几个人！

上述的这两种倾向是互为因果、互相结合的。我们必须彻底纠正这些不正确的倾向，改变这些不利于科学发展的状况。

国务院现在已经委托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会同各有关部门，在三个月内制定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计划。在制定这个远景计划的时候，必须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的科学部门、国防部门、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中来，把我国科学界所最短缺而又是国家建设所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使十二年后，我国这些门类的科学和技术水平可以接近苏联和其他世界大国。

什么是最迅速最有效地达到这个目的的道路呢？

这样的道路就是：第一，按照我们所最急需的门类，最迅速地派遣若干组专家、优秀的科学工作人员和优秀的大学毕

业生到苏联和其他国家去作一年到两年的实习,或者当研究生,回国以后立即在科学院和政府各部分别建立发展这些科学和技术的基础,并且大量培养新的干部。同时,按照需要,每年陆续派人去实习和研究。第二,对于一部分学科,向苏联和其他有关的国家聘请若干组专家,请他们负责在最短期内帮助我们在科学院和有关各部门建立科学研究机构,培养干部,或者同我国科学界进行全面的合作。第三,有计划地组织大批科学工作人员和技术人员向现在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学习,把他们当作导师来利用,而不要当作普通工作人员来利用。在苏联援助我国建设的一百五十六项企业的建设和生产过程中,有系统地组织大批技术人员研究和掌握其中的新的技术原理,并且加以迅速的传授。第四,集中最优秀的科学力量和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到科学研究方面。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第五,各个高等学校中的科学力量,占全国科学力量的绝大部分,必须在全国科学发展计划的指导之下,大力发展科学研究工作,并且大量地培养合乎现代水平的科学和技术的新生力量。第六,政府各部,特别是地质、工业、农业、水利、运输、国防、卫生各部门,应该迅速地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同科学院进行合理的分工和合作,共同扩大科学界的队伍,并且负责把世界科学的最新成就,有计划地、有系统地介绍到实际应用中去,以便尽可能迅速地用世界最新的技术把我们国家的各方面装备起来。

为了认真地而不是空谈地向现代科学进军,我们必须抓紧时间。一年的时间是很容易在空谈和拖延不决中间浪费了

的。因此，党中央要求：在今年四月底以前，必须确定科学发展的远景计划，适合于这个远景计划的今明两年的具体计划，以及为了实现这个远景计划和今明两年计划需要马上调集的第一批科学力量（包括需要派遣出国的科学人员的名单，需要聘请苏联专家的人数，需要由其他岗位调到科学研究岗位的人数和主要人员名单等），并且尽一切可能，争取在今年六月底以前实现派遣和调动的计划。关于在全国高等学校中扩大科学研究工作和扩大培养科学力量的计划，必须在今年暑假以后，就着手加以实现。

为了实现向科学进军的计划，我们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在这里，具有首要意义的是要使科学家得到必要的图书、档案资料、技术资料和其他工作条件。必须增加各个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的图书费并加以合理的使用，加强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的工作，极大地改善外国书刊的进口工作，并且使现有的书刊得到合理的分配。必须扩大外国语的教学，并且扩大外国重要书籍的翻译工作。

以上所说的原则，一般地也同样适用于文化教育的其他部门。一切文化教育部门都应该作出从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的发展规划，并且采取最有效的措施加以实现。

我们的发展科学文化力量的计划，必须是一个既提高而又扩大的计划，因为不但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大国，必须有一定的数量才能适应各方面的需要，而且质量一般地也只能在一定的数量的基础上产生。

为了扩大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首先必须按计划增加高等学校学生的名额，还必须注意培养现有的一般知识分子，不

断地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他们不但是高级知识分子极为重要的后备军和合作者，而且如前所说，在数量上比高级知识分子多得多；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区和各个工作部门中，对于国家建设担负着巨大的责任。中央各个部门和各省市必须分别定出专门的计划，帮助他们的进修，使他们的业务能力得到迅速的增长，并且把他们中间的优秀分子提拔到高级知识分子队伍中去。

五

我们党正在胜利地解决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的问题，并且正在胜利地解决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问题。全党和全国劳动人民，正在为着提前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努力。全国人民充满着胜利的信心和斗争的积极性。随着汹涌澎湃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高潮而来的，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在这个时候，我们把关于知识分子的一系列问题加以全面的解决，这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在我们所提出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任务中，不能说没有一些困难。但是这些困难不会比我们改造五亿农民和改造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更加困难，不会比我们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更加困难。我们党在过去六年中，在领导知识分子和领导科学文化事业方面，已经得到了巨大的成就。现在我们是比过去更有经验更有办法了，在过去的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党一定能够领导知识分子在科学文化事业中取得新的更大的胜

利。那种认为党不能够领导知识分子进行科学文化建设的想法,是毫无根据的。

问题是在善于学习。无论中央各部门或各地区都必须学会更好地领导知识分子和领导科学文化事业。我们不应该设想,既然我们是共产党员,我们就天然地会领导知识分子进行文化建设,我们就天然地不会犯错误。这是一种很危险的想法。而在有些地方,我们有一些同志正是因为抱着这种狂妄的态度,使党的工作遭到了损失。我们对待任何问题,都必须坚持“知之为之,不知为不知”的老实态度,不懂决不要装懂,但是必须由不懂变为懂。我们党必须培养出一大批精通科学和文化各部门知识的干部。只要我们认真地钻进去,我们就一定可以学会。

在报告里提到的各项任务,许多是需要由中央统一解决的。关于这些问题,我们提议作如下的分工:

关于对待知识分子的各种行政性质的问题,因为需要作一些统一的规定和管理,国务院准备设一个中国专家局来负责处理。但是在这个机构成立以前,各有关部门就应该根据中央的指示,立即着手解决知识分子方面的各项问题。在这个机构成立以后,各个部门也不能减轻他们所应负的直接处理的责任,因为专家局一般地只负责解决那些不便于由一个部门单独处理的问题。专家局在关于高级知识分子的各项行政性质的问题上,负有统一计划、统一调整、统一检查督促的责任。对于各部门在高级知识分子问题上处理不当的地方,专家局有权按照一定的程序加以纠正。

关于对待知识分子的各种政治性质的问题,关于在知识

分子中继续进行思想改造和处理有关反革命分子的问题，也由各个有关部门直接负责，而由中央宣传部负责进行统一的监督。中央宣传部应该经常检查各部门各地区执行中央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状况，检查他们的工作计划和执行计划的状况，克服他们的工作中的缺点，传播他们的工作中的先进经验，并且及时地向中央提出问题和建议。

在知识分子中吸收党员的工作由中央组织部负责。知识分子中的民主党派工作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负责。知识分子中的工会工作由全国总工会负责。但是在解决这些工作中的重要问题的时候，应该同中央宣传部联系。

为了加强领导，处理和检查有关知识分子的问题，各级党委和各个部门都应该分别指定适当的机构担负经常的责任，并且要定期地召集一些专门的会议，经常地交流经验，不断地争取工作状况的改善。

同志们！我们相信，经过我们的工作，知识分子将更进一步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并且在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中更积极地贡献他们的力量。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事业中所形成的联盟，将随着我们的工作的发展，而一天比一天更巩固，更强大。依靠这个联盟，我们一定可以在不很长的时间内，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一定可以在不很长的时间内，实现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号召——“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¹⁰⁹⁾。

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

(一九五六年二月八日)

商业部、手工业合作总社、供销合作总社等单位应重视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改造工作。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毛主席说：“大约再有三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¹¹⁰⁾这只是讲大体上完成，如少数民族地区，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改造都可能拖长一些。所以不论从地区或从部门看，都会有不少尾巴，彻底实行民主改革的工作也还很多，条件不成熟的等一下不要紧，因为政权在我们手中，这是很大的保证。我们要使条件成熟，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有什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

* 这是在国务院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讨论《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草案)》时的发言。

地努力。要真正巩固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成果，必须实现工业化才行。如果没有工业化，农业即使合作化了，也不巩固。手工业也是如此。

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当然反对右倾保守是主要的，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关于昆曲《十五贯》的两次讲话^{*}

(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月)

四月十九日的讲话

你们浙江做了一件好事，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十五贯》⁽¹¹⁾有丰富的人民性和相当高的艺术性。

我们不但要歌颂劳动人民，揭露反动的统治阶级，也需要象《十五贯》这样的戏。不要以为只有描写了劳动人民才有人民性。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中也有一些比较进步的人物。人民在那个环境中，没有办法摆脱困难，有时就把希望寄托在这些人物身上。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历史上的事情，正如我们现在所做的一些事，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看起来也是很可笑的，但是我们现在还是需要做的。比如打仗，到那时人们看起来会感到很奇怪，可是我们现在有时还得打仗。

我们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犹如小孩从母体中生产出来一样。我们还或多或少地带有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官僚主义就是这种残余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有的官僚

* 这是观看浙江省昆苏剧团演出《十五贯》后的两次讲话：第一次是四月十九日看完演出后对剧团同志的讲话，第二次是五月十七日在关于《十五贯》的座谈会上的讲话。

主义者比戏中的巡抚⁽¹¹²⁾还严重,这巡抚是我们的镜子。《十五贯》中《见都》一场那面堂鼓就很好嘛。你要见他,他官僚主义,不见你;你一击鼓,他就只好出来了。虽然这并不完全是事实,但是反映了人民群众的一种愿望。我们现在有些官僚主义者甚至在“击鼓”后还不出来,我们有的官僚主义者恐怕连这个巡抚都不如呢!这很危险。况钟⁽¹¹³⁾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这是符合于唯物主义思想的。

毛主席说的百花齐放,并不是要荷花离开水池到外边去开,而是要因地制宜。有的剧种一时还不适应演现代戏的,可以先多演些古装戏、历史戏。不要以为只有演现代戏才是进步的。昆曲的一些保留剧目和曲牌不要轻易改动,不要急,凡适合于目前演的要多演,熟悉了以后再改。改,也要先在内部试改,不要乱改,不要听到一些意见就改。

老演员年岁大了就要走下坡路了。我们希望下一代比我们好,要好好教他们。我们犯过的错误,不要让他们再犯。青年的热情很可贵,但没有经验,有时象一阵风。舵还得要老同志把。

演员学习文化很重要。主要学语文,结合学些历史、地理、数学等。

昆曲的表演艺术很高,只要你们好好努力,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五月十七日的讲话

《十五贯》轰动了全国，是有它的历史原因的。昆曲受过长期的压抑，但是经过艺人们的努力奋斗，使得这株兰花更加芬芳了。由于它土生土长，到底还是经得起风吹霜打的，现在又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应该承认，“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提出后，我们还没有圆满地执行，昆曲在解放后多年来受轻视，就是一例。这说明我们的成见还很多。北京有两个著名的北昆演员，我们虽也叫这些老艺人教徒弟，但没有提倡昆曲。浙江昆苏剧团是自己奋斗出来的。在解放前，他们为了继承发扬昆曲艺术，曾组织了个小剧团，到处流浪。解放后，他们继续奋斗，终于受到了重视。这也说明一个道理：只要奋斗，就有出路；不奋斗，就无法生存。在我们的新社会，只要你在正确的道路上奋斗，是会产生成果的。决定性条件是自己奋斗。当然，基本的大前提是现在社会变了，但主要还得靠自己努力。粤剧也是受了批评以后奋斗出来的。广东粤剧团代表在中南区会演时受了批评，参加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后，回去就革新。一九五四年我看了粤剧，演得比较好，有很大进步。现在行家马师曾回来了，气象就更不同了，更提高了。粤剧也有它自身的发展历史。过去我们只看到它的缺点，要求过高，对粤剧的艺术性和人民性忽视了。现在他们埋头苦干，不怕受挫，和老艺人结合搞改革，局面立即改观，使粤剧发出了新的光彩。两个剧种的成绩，都是奋斗不息的结果。《十

五贯》和《搜书院》在政协礼堂演出很受欢迎，剧场加座了，真是公道在人心。昆曲是江南兰花，粤剧是南国红豆，都应受到重视。

昆曲的改革可以推动全国其他剧种的改革。你们的奋斗可以转变社会的风气。《十五贯》的演出复活了昆曲，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奠定了基础。全国戏曲观摩演出有收获，但这次演出更有典型性，应该庆贺和传播，在报纸上多加宣传，予以表扬。这是第一点。

第二，《十五贯》是从传统剧目的基础上改编的，改得切合了历史主义的要求。它改得恰当，没有把不符合历史思想和现代词句硬加进去。原来的本子从“熊氏二难”⁽¹¹⁴⁾写起，改编后发展了。况钟、周忱在历史上是有的。周忱写得到家，况钟的实事求是合乎历史，过于执也写得恰当。剧本的水准很高，文化部评价低了。《十五贯》有着丰富的人民性，相当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它不仅使古典的昆曲艺术放出新的光彩，而且说明了历史剧同样可以很好地起现实的教育作用。有人认为，历史题材教育意义小，现代题材教育意义大。我看不见得，要看剧本如何。现代戏如果写得不好，教育意义也不会大。比如最近演的一个话剧，写得很实际，但严格要求，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还不够高。有的戏过了一个时候再看，就不那么动人了，不能持久。这说明加工修改的重要，要继续丰富和提高。同样，《十五贯》还可以再改，但大体上水平是高的。《十五贯》一针见血地讽刺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是成功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现在不是个别的。现代戏还没有一个能这样深刻地批判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这个戏，公安人员看后感动极

了,对党政各级干部,对广大群众都有教育意义。

第三,《十五贯》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使人们更加重视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这个戏的表演、音乐等,既值得戏曲界学习,也值得话剧界学习。我们的话剧总不如民族戏曲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有些外国朋友认为,中国话剧还没有吸收民族戏曲的特点。现在有些话剧团准备演《十五贯》,这是好的。中国话剧的好处是生活气息浓,但不够成熟,话剧台词就象把现在的说话搬上了舞台。演员要注意基本训练和艺术修养。戏曲要能听,还要能看,这才算全面。演戏曲要有很好的修养。要有领导。要集中人才。现在有些老演员不演戏了,但仍要尊重他们。要有“种子”,每个剧团有三几个好演员。主角可将配角带动,传淞、传瑛⁽¹¹⁵⁾是这样做的。我们提倡集体性、统一性,演出要互相配合,个人与集体结合起来,在集体中发挥个人作用。过去的宫廷供奉只是个人表演,是最糟糕的。

第四,《十五贯》为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树立了良好榜样。这个剧本是改编古典剧本的成功典型。它不只在昆苏剧团可以采用,在有条件的时候,其他剧种也可以采用,但不要勉强。如果真的所有剧团都来演,也就没有人看了。可以先后不同地试试,能演则演,也可修改。老舍⁽¹¹⁶⁾已经改了,可以试一下。不能说昆苏的就是标准本,各种版本都许可。这个戏在国外也有影响,有些国家的大使和政法专家也来要剧本。可以出国去演,首先是昆苏剧团,其他剧团也可以去。

古今中外都有好东西,都要学,不要排斥。不要认为古的东西没有演头。昆曲有很多剧目,要整理改革。很多民族财富

要好好发掘、继承，不能埋没。只要大体好，有些缺点也无妨。首先要有人民性，要站在同情广大人民的方面。我们把历史的东西搬出来，是否就背离了现实呢？要看作品的内容。封建制度是坏的，但统治阶级中也不是一无好人，尽管他们对人民的同情是有局限性的，但是那时的人民对这些人还是歌颂的。况钟是官，但同情人民，这就难能可贵。林冲逼上梁山，延安时称赞了这出戏。革命是逼出来的，从统治阶级营垒中背叛出来的人更是逼出来的，这有什么奇怪呢？写历史题材，不一定光写劳动人民。

历史剧总是塑造典型，不是照搬历史上的真人。况钟在历史上实有其人，但戏里的况钟是典型的，没有受真人真事约束。正史上的周忱是好的，但戏中的周忱有些不同。人们可以根据传说进行修改。批判戏里的周忱是对的。不一定完全符合历史，还是要塑造典型。宋景诗⁽¹¹⁷⁾也是如此，人民对他的看法和史书上的记载并不完全相同。我们不能拘泥于历史。迁就事实塑造不出典型。剧本受事实束缚，就难以写好。现代革命斗争的史实，不一定都照搬到舞台上和银幕上，这有困难，写出典型就行了。《十五贯》没有受这种束缚。

我们搞艺术，不要只是搞一种单调的东西，要善于吸收，对外国的也是这样。一个民族和国家，其所以能够存在，总有它一些长处。尽管以往的社会制度一再改变，但人民是永生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民总是有自己的优秀的东西。我们要学习别人的东西，但要防止盲目性。只有学到了家，才能说是吸收。昆曲和其他剧种都要保持和发扬自己的特点，也要把别人的长处吸收过来。要把人家的化为自己的，化得使人家不

觉得。出国访问是个学习的好机会。以前常出国的只是京剧，以后其他许多剧种经过努力也可出去。出国剧目不能光是那几个。几十个国家都来邀请我们，我们的外交也要靠文化和贸易，这是件重要任务。

第五，《十五贯》的思想性很强，反对主观主义，也反对官僚主义。封建时代的官僚主义是很坏的，主观主义也草菅人命。今天干部的主观主义也很误事，性质是一样的，思想方法差不多。主观主义需要官僚主义的庇护，如没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不能这么厉害。巡抚是个官僚主义者，代表了朝廷。戏通过两相对照，称赞了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作风，正义的作风。提倡实事求是，是戏的一条主线。这个戏还批判了旧社会的五毒（赌、嫖、偷、杀、骗）恶习。娄阿鼠是很毒的，我们不须问他的出身。这种人在破落地主中往往更多些。五毒恶习尽管更多地存在在剥削阶级中，但在一些劳动人民身上也是有的，这是受了剥削阶级的影响。不能说凡是坏人都是封建剥削阶级出身。所以，娄阿鼠的家谱可以不交代。这个戏还赞扬了群众公论和社会同情的力量。群众本质上是实事求是的，但有时也会被大浪压下去。所以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个戏也批判了酗酒等坏习气。油葫芦的性格写得好，他乱开玩笑，闹出了乱子。

正义的线贯串在人民身上。在旧社会，劳动人民身上有不少好东西，但在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身上也有好的东西。尽管我们对整个封建的剥削制度是否定的，但他们有些制约的办法也还有可取之处。如戏中这样表现，况钟去见周忱，周忱不见，况钟击鼓，他就不敢不见了。我们国务院，人民群众要见我

们,有的也难见。况钟把金印拿出来,周忱不敢接受。击鼓、退印,就是况钟对付周忱的办法。现在有个风气,对领导不称首长就会有人怪。目前我们所谓保卫首长的某些办法是有缺点的,老百姓想见做“官”的是多难啊!我们也需要一套制约的办法。《十五贯》教育我们做“官”的人,让我们想一想,是不是真正在为人民服务。

最后,希望你们这次成功不要带来了骄傲,要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引下继续前进。希望各个剧种都能发展,在世界的文艺花园里增添我们的花朵。

台湾的解放一定能够实现^{*}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是我国六万万人民不可动摇的共同意志。

我国政府曾经再三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毫无疑问,如果台湾能够和平解放,那么,对于我们国家,对于我们全体中国人民,对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都将是最为有利的。

现在,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正在增长。这首先是因为目前国际形势肯定地趋向和缓,美国使用武力侵占台湾和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遭到了越来越多的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反对。从国内形势说,我们伟大的祖国是更加壮大和巩固了,它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使所有爱国的中国人感到自豪。现在,不但具有革命传统的台湾同胞,已经不愿意继续过那痛苦的奴隶生活,而希望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就是在那些从大陆上跑到台湾去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当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只有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才是他们的唯一出路。自从

^{*} 这是在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的第三部分。报告全文刊载于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

我们发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号召⁽¹¹⁸⁾以后,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中,已经有不少人表示了他们的爱国愿望。我们相信,愿意促成台湾和平解放和祖国完全统一的人,必然会一天比一天增加,这将是不可抗拒的趋势。

大势非常清楚,台湾当局追随美国苟延残喘的局面是决不能持久的。他们所追随的外国势力,决不是什么可以指靠的力量;相反地,引狼入室的结果,不但会使他们失掉自己所有的一切,并且随时有被人暗算和遗弃的可能。人们可以从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会谈⁽¹¹⁹⁾的不同态度中,得出重要的教训。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只有中美两国在台湾地区的国际争端,才能由中美两国讨论和解决;至于台湾回到祖国的问题,不论采取什么方式,都只能而且完全可以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处理,决不容外国干涉。可是,美国在谈判中却完全采取另外一种态度。它把台湾当作自己的殖民地,同中国讨价还价。人们还可以看到,现在美国不但侵占了台湾,把它的势力渗透到台湾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并且还在施展它所惯用的分裂阴谋,在台湾内部制造猜疑倾轧,企图加强控制,从中渔利。但是,美国侵略势力的这种愚弄中国人民、干涉中国内政和分裂中国民族团结的行为,已经引起了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愈来愈强烈的不满。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已经表示再也不能忍受那种寄人篱下、随人俯仰的生活。他们要求提高民族自尊心,维护民族尊严,摆脱美国控制,并且要以独立自主的精神,处理自己的内部问题。我们欢迎他们的这种爱国主张。

我们是一贯主张全民族团结、一致对外的。为了我们伟大

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曾经两度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我们也曾经努力争取实现国内的和平。中国人民即使在被迫拿起武器进行国内解放战争期间，甚至在大陆解放以后，也没有放弃和平谈判的努力。尽管这些年来，由于美国的武装干涉，我们和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是，只要大家以民族和祖国的利益为重，我们仍然可以重新携手团结起来。我们相信，我们久经忧患的伟大民族一定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现在，我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为了团结一切爱国力量早日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我愿意在这里再一次宣布，我们对于一切爱国的人们，不论他们参加爱国行列的先后，也不论他们过去犯了多大罪过，都本着“爱国一家”的原则，采取既往不咎的态度，欢迎他们为和平解放台湾建立功勋，并且还将按照他们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和适当的安置。

台湾的同胞从来就是中国人民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我们不但时时刻刻关怀着他们，从各方面支持他们反抗外国统治的斗争，而且随时准备欢迎他们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共享我们民族的荣誉。

我们了解一切家在大陆、身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处境，希望他们能够早日实现同家人团聚的愿望。他们可以同

大陆上的亲友通讯，他们也可以回到大陆来作短期的省亲会友，我们准备给以各种方便和协助。

我们希望台湾的国民党军政负责人员，在和平解放台湾的事业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只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他们将来的地位就会得到肯定的保证。如果他们还有疑问的话，他们可以通过大陆上的亲友得到解释，或者派人来大陆考查，我们保证他们来去自由。

我们希望台湾的国民党军队人员积极地促成台湾的和平解放。如果这样做，他们就一定能够得到祖国和人民的信赖和照顾。过去在大陆上和平起义的将士所得到的待遇，可以作为先例。

我们也同样希望一切身在海外其他地方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为促进和平解放台湾而努力。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使自己免于流落异乡、受人轻视的命运。

我们重视海外广大的爱国侨胞在推动和平解放台湾的事业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我们希望曾经或者还在对祖国采取对立态度的少数海外华侨，认清是非，省察大势，跟广大的爱国侨胞站在一起，为促进和平解放台湾的爱国事业作出贡献。

祖国的大门对于所有的爱国分子都永远是敞开着。任何一个中国人对于祖国统一的神圣事业都有权利和义务作出自己的贡献。依靠全民族的团结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台湾的解放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

（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我们的国家政权是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有民主和专政两个方面。对谁民主，对谁专政，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革命胜利后，专政问题首先是肃清反革命的问题。我们在农村中进行了清匪反霸斗争⁽¹²⁰⁾，然后在全国城乡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⁶⁸⁾，清除五种反革命分子。国内形势的变化，使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余地越来越小了，也就是说专政的威力把反革命打垮了。现在，虽然反革命残余分子还存在，今后也还会新产生一些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但是比起解放初期的情况来是大大不同了。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估计，必须认识到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性。

根据这样的形势，今后处理反革命分子，在政策上会比从前更宽一点，而不是更严一点。我们在解放后第一次镇压反革命时，用杀、关、管、放四种办法处理反革命分子。对那些站在人民头上直接压迫人民，有血债，民愤很大又拒不坦白的，实行严厉镇压。在严厉镇压的同时，又执行了改造的方针，用徒

* 这是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节录。

刑、劳动改造等办法处理的人，大大多于处死刑的人。对罪行轻微又已经坦白的，从宽释放，对劳动改造中表现好的也提前释放。从去年开始的机关肃反和社会肃反⁽¹²¹⁾，在政策上比上一次镇反运动更宽一些。机关肃反工作，中央与省市两级已基本结束，正向专县、厂矿发展。由于我们有了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机关肃反、审干⁽¹²²⁾和解放后社会镇反的经验，这次就比以前做得好一点。我们要肯定成绩，同时也要承认还有缺点错误。我们的肃反工作是在党领导下走群众路线的，有了错误可以及时纠正。毛泽东同志提出：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就是说，进行肃反运动，先要引起注意，提高警惕；运动开展后，可能出现某些偏差，有了偏差就纠正。我们遵守这样的原则，一个没杀，大部分没有捉，这样就使机关肃反能够比较健康地进行下去。

关于社会肃反，这一次跟上一次镇反不同。上一次是大张旗鼓地镇压五种公开活动的历史上有严重罪行的反革命分子，这一次主要是清查过去没有发现的，隐瞒历史罪行的，或者新钻进来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从去年到今年的工作来看，情况比上一次好，反革命分子的数目少了，自首坦白的多了。这也说明，我们的专政更加巩固了，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进行社会肃反的有利条件更多了，我们应该更有秩序、更有步骤、更有准备地把它做完做好。在处理反革命分子从严从宽的问题上要解决得更确当。从严从宽是两方面，两方面都要有，但在从宽方面要比较多一些，这样可以使反革命分子中接受改造的人更多，不可救药、无法改造的只是极少数。这对于我们的社会改造是有利的。不仅对于这些反革命分子，

就是对于现在关押着的战犯,包括日本战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以及伪满皇帝溥仪等,我们也准备逐步采取宽大的办法。对他们宽一些,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祖国的完全统一,有利于争取日本人民走同中国友好的道路。

专政的另一方面是对剥削阶级。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对地主阶级,我们采用专政的办法,直接没收他们的土地分给农民,这在彻底实行民主革命的步骤中已经实现了。现在,地主分子经过了劳动改造,可以吸收他们加入合作社,或者做个候补社员观察一个时期,或者管制他们进行生产。对另一个剥削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情况就不同了,因为在民主革命阶段,特别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对革命采取同情、中立或合作的态度,这与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解放后,他们又进一步同我们合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经过合作来实现改造,就是通过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经济,通过改造资产阶级分子,来达到消灭这个阶级的目的。所以从实行人民民主专政而言,对资产阶级的改造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对于阶级的消灭来说是专政;另一方面,对企业改造、所有权的转移,一直到对个人的改造、个人的安排,都是用民主的形式来进行的。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了人民政权,从政协到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里都有他们的代表。在经济组织、文教组织及其他各种组织中,我们都跟他们合作,这都是民主。对民族资产阶级有专政、有民主,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一个特点。至于对城乡小资产阶级的改造,那是另外一回事。这种改造是民主的,因为他们不是剥削阶级,而是劳动阶级,我们只能采取

民主的改造方式。

现在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应该是：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从国内来说，残余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完全肃清，从国外来说，帝国主义还敌视着我们，因此，我们的专政应该继续。但是，由于我们的专政更加巩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更加强大了，所以我们的民主就应该更扩大，而不应该缩小。这一方面是形势许可，另一方面是从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中得来的经验。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消灭剥削阶级。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使民主扩大。比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我们现在还不是普遍实行直接的、秘密的选举，全国的经济和文化水平还没有发展到具备这样的条件。但是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些方面来扩大民主，例如：

第一，使人大代表经常去接触人民。我们的人大代表，还有政协委员，每年应有两次到人民中去直接视察工作。他们可以从与政府不同的角度去接触广大人民，接触实际，看我们的工作是否做得恰当，做错了没有，有什么缺点，有什么偏差。就是说可以去找岔子。我们不要怕，我们有信心，不仅敢让党员，还敢让非党员、民主人士和资产阶级代表看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偏差。只要不是恶意的，即使看错一点看偏一点也不要紧。这种方式已采用一年半了，要继续坚持下去。

第二，今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开了一个先例，就是把所有代表的发言，包括批评政府工作的发言，不管对的、部分对的甚至错的都发表出来。这就在人民中揭露了政府工作的缺点。我们不怕揭露，即使揭露错了一点也不要紧，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有好处。政府应该让人民代表批评自己的错误，承认应该承认的错误。明年还准备进一步允许辩论，当然现在也允许辩论，小组会上就辩论得很热烈，将来在大会上也可以辩论。就是说，人民代表提出的意见，政府要出来回答。回答对了，人民满意；不对，就可以起来争论。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那是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允许唱“对台戏”，当然这是社会主义的“戏”。我们共产党人相信真理越辩越清楚。我们共产党人要有勇气面对真实，面对错误，有错误就不怕揭露，就勇于承认和改正。

第三，我们还要进一步使人大代表参加对政府工作的检查，一直到检查公安、司法工作。应该承认，我们的工作基本上是有利于人民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二十年来，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的事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不过我们也有缺点错误，必须经常检查我们的工作，发现了缺点错误就要改正。在检查工作中，即使有的人看法有偏差，有资产阶级观点，但是从那个观点也许会发现一些我们还没有发现的问题。

不仅这样，中央与地方也要互相影响。中央包括党中央和国务院，处在领导地位，可以比较全面地看到大局的发展，但也比较容易忽视某些实际问题、局部利益和群众的眼前利益，

而在这方面地方是处在有利地位的。地方比较容易接触群众，接近实际，能更多地看到实际问题、局部问题和群众的眼前利益，这正好弥补中央的不足。单靠一方面不能够很好地实行领导，必须双方合作，互相影响，才能很好地领导。因此，中央与地方尽管是上下关系，必要时也要唱“对台戏”。比如我们在北京坐久了，政治的语言就是“北京话”，没有地方话，到上海来听一听，也学了一些“上海话”，知道了一些地方上所了解的情况。我来了两天就得到不少知识，坐在北京就得不到。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要经常出来，坐在北京的人一年总要集中或分散出来一两个月。两方面多接触，对问题就比较容易看得全面一点。如果在中央呆久了，又不接触群众和实际，就会比地方容易犯官僚主义。因此，中央与地方要相互影响，相互监督，不要以为只是上面对下面监督，下面同样要监督上面，起制约的作用。唱“对台戏”就是从两个方面看问题，来完成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央的同志要常到地方来看，有时要邀请地方同志到中央开会，还要摸典型。这样做能够推动我们的工作，减少官僚主义。要使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实行得更好，必须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经常反对官僚主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求在中央工作的同志以及省、地、县、区的各级领导，思想上一定要警惕，要接触实际，接触群众。官僚主义不是能够一下子彻底反掉的，今天反掉了，明天它又来了。你掌握政权，总有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时就会有偏向。特别是因为我们搞社会主义，为最大多数人民谋最大利益，集中最大权力，做最大的好事，人民比较满意，在这样的情况下做错了一点事情，容易为人民谅解，这就使我们很容

易忽视发扬民主而犯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今天在座的同志，一级一级算下去，都是做领导工作的，区的工作、支部的工作也都是领导工作，大家要经常警惕这一点。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 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六日)

—

我在说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以前,要说一说关于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情况。

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由于全国人民首先是劳动人民的努力,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都取得了比预想还要快还要大的胜利。我们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在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需要我们努力加以克服。

在基本建设方面。预计到一九五七年底,全国基本建设的投资额,有可能比原计划超额完成百分之十以上。计划所规定的限额⁽¹²³⁾以上的建设单位,除了少数的以外,都有可能如期完成或者提前完成建设进度,而且在各个年度中又增加

* 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第一、二部分。报告全文最先刊载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了一些新开工的建设单位。到一九五七年底，预计大约有五百个新建和改建的限额以上的工业企业建设完工，这样，就会提高我国的工业生产能力，为我国的工业创立某些新的部门和在一定程度上革新某些原有的部门，从而开始改变我国工业原来极端落后的面貌。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我国以鞍山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就会大为加强，在内蒙古、西北、华北各地，就会开始出现许多新的工业城市。五年内新建和恢复的铁路将达到五千五百公里左右，重要的干线如集宁到二连、宝鸡到成都等线都已经修通，鹰潭到厦门的铁路也将要修通，兰州到新疆的铁路已经修到玉门以西。重要的公路如康藏线和青藏线等也都已经全部通车。这些铁路和公路的建成，加强了我国西北、西南广大地区同全国各地区的联系。关于水利建设，我们正在继续根治淮河，开始兴建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并且举办了其他一些大型和很多中、小型的水利工程。许多建设完工的水利工程，对于防御洪水和灌溉田地已经开始发挥一定的作用。这几年来，地质工作也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保证了我国基本建设的需要。如上所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建设，从投资额和多数重要建设单位的进度说，将有可能达到我们预定的要求。但是也应该指出，某些部门有可能完不成原定的投资额计划，少数重要建设单位的部分工程，也有可能完不成原定的进度计划。这些部门和这些建设单位，在今后一年多的时间内，应该加强工作，尽可能地争取完成原定的计划。同时还应该指出，有一些建设单位只注意赶进度，忽视质量和安全，以致工程质量低劣，事故很多，并且造成浪费，这是应该引以为戒的。

在工业生产方面。工业总产值(包括现代工业和手工业的产值在内,按一九五二年的不变价格计算,下同)历年都超额完成了年度计划,一九五六年,将达到五年计划规定的一九五七年的水平;到一九五七年,将有可能比原计划超额完成百分之十五左右。从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说,到一九五七年,绝大多数产品都将超过原定的计划指标。例如钢将达到五百五十万吨,发电量将达到一百八十亿度,煤将达到一亿二千万吨,金属切削机床将达到三万台,发电设备将达到三十四万千瓦,原木将达到二千四百万立方米,棉纱将达到五百六十万件,机制糖将达到八十万吨,机制纸将达到八十万吨。从重要的工业新产品说,我国过去不能够制造的某些发电设备、冶金设备、采矿设备和新型号金属切削机床,现在已经能够制造了;我国过去不能够制造的汽车和喷气式飞机,现在已经能够开始制造了;我国过去不能够生产的大型钢材和合金优质钢,现在也已经开始部分生产了。但是,也有几种产品,如石油、硫化青、食用植物油、卷烟、火柴等,由于原料不足、销路不畅或者技术的原因,可能完不成原定的产量计划。

在农业生产方面。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四年,我国许多地区受到了较大的自然灾害,这两年的农业生产计划都没有全部完成,但是粮食产量仍比丰收的一九五二年有所增加。一九五五年我国农产品丰收,粮食产量(不包括大豆,下同)达到三千四百九十六亿斤,棉花产量达到三千零三十六万担,其他农产品的产量也都有增加。一九五六年许多地区遭受了洪水、内涝、台风和干旱的严重灾害,某些农作物特别是棉花受了一定的损失。但是由于全国农村正处在合作化的高潮中,没有遭受

灾害的地区将会增加生产，一九五六年全国的粮食总产量，仍然有可能达到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一九五七年的水平。只要今后一年多的时间内不发生特大的自然灾害，一九五七年主要的粮食作物和某些经济作物的产量，就有可能超额完成原定的计划。但是大豆、花生、油菜籽、黄麻、洋麻的产量和某些牲畜的数量，有可能完不成原定的计划，我们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加强这些薄弱的环节。

在运输和邮电方面。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基本建设规模的扩大，运输量和邮电业务量每年都有增长。预计到一九五七年，主要运输部门的货物运输周转量计划，都有可能超额完成。但是由于某些原有线路和设备的技术改造没有完成计划，某些线路和交通枢纽目前发生了运输紧张甚至堵塞的现象，这种情况正在努力加以改善。

在商业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商业的日益发展，一个有计划有组织的市场已经在国内形成，它的领导地位已经日益巩固。一九五六年比一九五二年，国内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将增长百分之六十六点三，对外贸易的进出口总值将增长百分之六十五。预计到一九五七年，国内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和多数商品销售量的计划，对外贸易的出口和进口的计划，都有可能完成，有的可以超额完成。几年来，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扩大了国内商品的流转额，并且对于最主要的几种生活必需品，实行了统购统销的政策，保证了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因而基本上保持了物价的稳定，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目前商业工作中的缺点，主要是商品供应的组织工作做得不好和经营管理不善，因而发生商品有时积压有时

脱销的现象。

在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和保健事业方面。这几年来,这些事业都有相当大的发展。预计到一九五七年,除了个别的以外,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科学研究、新闻、出版、广播、文学、艺术、电影、体育和卫生医疗等事业,都有可能超额完成原定的计划。例如,到一九五七年,高等学校在校学生将达到四十七万人左右,超过原定指标约百分之九;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机构将达到六十八所,比原定指标多十七所。

在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方面。到一九五六年六月底为止,全国已经组织起九十九万二千个农业生产合作社⁽⁸⁴⁾,入社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一.七,其中加入高级社的占全国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二.六。组织起来的手工业者,约占手工业者总数的百分之九十。我们预计,再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即到一九五七年底,在全国范围内,除了个别边疆地区以外,可以基本上实现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

在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到一九五六年六月底为止,在资本主义工业中,已经有占产值百分之九十九和占职工人数百分之九十八的企业实现了公私合营;在私营商业和饮食业中,转变为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的,已经占总户数的百分之六十八,占从业人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定息⁽¹²⁴⁾制度,就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准备了条件。

这里,我还要简略地叙述一下人民物质生活改善的状况。

这几年里面,从总的情况看,职工工资的增长速度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基本上是相适应的。但是有一段时间,工

资的增长速度过分地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例如，一九五五年比一九五四年，工业部门（不包括私营工业）的劳动生产率，约提高了百分之十，而职工的平均工资只提高了百分之零点六。其他部门也有类似的情况。这个工作中的错误，我们在一九五五年底发现以后，就着手纠正。从一九五六年四月份起，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工资制度的改革，并且确定一九五六年职工的平均工资比一九五五年提高百分之十三左右。这样，一九五六年职工的平均工资，就比一九五二年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三点五，超过了五年计划规定的五年内工资增长百分之三十三的指标。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将超过原定的计划，例如，在国营工业部门，一九五六年将比一九五二年提高百分之七十四点四，超过五年计划规定的五年内劳动生产率增长百分之六十四的指标。

这几年里面，我们稳定了农民的农业税负担，并且适当地提高了粮食的收购价格，因而使农民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了生活。但是我们也犯过错误，在一九五四年，由于我们没有完全弄清楚全国粮食产量的情况，向农民多购了一些粮食，引起了一部分农民的不满。在一九五五年，我们实行了定产、定购、定销⁽¹²⁵⁾的粮食政策，从而安定了农民的情绪和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现在预计，五年内农民的全部收入有可能增长百分之三十左右。

由上面列举的情况可以看出，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定能够胜利完成的。只要我们加紧努力，并且今后不发生特大的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大多数指标都可以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和它的超额完成，已经使

并且将继续使我国国民经济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工农业的生产水平有很大的提高。预计到一九五七年，工农业总产值（包括现代工业、手工业和农业的产值在内）将比一九五二年增加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总产值（包括手工业的产值在内）的比重将达到百分之五十左右，而在工业总产值中，生产资料工业产值的比重将达到百分之四十以上，这就加强了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作用。由于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无论在工业、农业、运输业和商业中，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都已经处于绝对统治的地位。目前，我国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都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的事业，也正在进入一个繁荣时期，因而也就为人民生活水平的继续提高创造了条件。

应该指出，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和一切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团结一致，对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表现的积极性和热情，是我们取得上述伟大成就的基础和保证。

还应该指出，在我国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伟大的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给了我们巨大的援助。在这期间，苏联给予我国以优惠的贷款，帮助我国设计二百零五项工业企业和供应大部分设备，派来了大批的优秀专家，并且给了其他方面的许多技术援助。各人民民主国家在设备、材料和技术力量等方面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援助。在我国工作的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专家，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们愿意乘这个机会，对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这种真诚的兄弟般的援助，表示深切的感谢。

我们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取得了不少的经验和教训。吸取这些经验和教训,就使我们有可能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做得更好。现在,我只就近年来我们在领导经济工作中所感到的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提出一些意见。

第一,应该根据需求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由于在编制长期计划的时候,难以完全预计到在执行计划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新的情况和问题,因此,应该把长期计划的指标定得比较可靠,而由年度计划加以调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各项指标,基本上是正确的,过去四个年度计划的安排,大体上也是符合于当时的具体情况的,因而有可能保证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但是应该指出,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的计划,部分地发生了偏低或者偏高的缺点,造成了工作上的一些困难。

我们在制定一九五五年计划的时候,由于前两年农业歉收,把基本建设的规模定得比较小了一些,而且在当年的节约运动中,又不适当地削减了某些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的投资。同时,还由于基本建设计划变动的次数多,下达迟,因而计划完成得比较差。结果,不但在财政上出现了过多的结余,并且在重要的建筑材料方面,如钢材、水泥、木材等,也出现了一时的虚假的过剩现象。如果我们能够更早地准备一些预备项目,及时地扩大建设规模,或者有计划地增加某些物资的储备,物资一时积压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可是我们对以后发展的情况估计不足,把一时的物资过剩当作一个比较长期的趋势,因而用出口的办法来解决钢材和水泥一时多余的

困难。显然,这是不恰当的。

当我们制定一九五六年计划的时候,由于上年度农业丰收,社会主义改造又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因而有必要也有可能把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定得比较高些。但是我们没有很好地对于基本建设规模和物资供应能力进行适当的平衡,因而把基本建设的规模定得大了一些。同时,国民经济的某些部门也出现了齐头并进和急于求成的倾向。结果,不但财政上比较紧张,而且引起了钢材、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的现象,从而过多地动用了国家的物资储备,并且造成国民经济各方面相当紧张的局面。

经验证明,我们在编制长期计划的时候,应该按照我们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根本要求和国家物力、财力、人力的可能条件,实事求是地规定各项指标,同时,还应该保留一定的后备力量,使计划比较可靠。而在编制年度计划的时候,就应该根据当年和以后年度的可能的发展条件,积极地发挥潜在力量,以保证长期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经验还证明,我们在编制年度计划的时候,在有利的情况下,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某些不利的因素,不要急躁冒进;相反地,在不利的情况下,又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许多有利的因素,不要裹足不前。这就是说,我们应该对客观情况作全面的分析,同时尽可能地把本年度和下年度的主要指标作统一的安排,以便使每个年度都能够互相衔接和比较均衡地向前发展。

第二,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在优先发展重

工业的同时,采取了加速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来促进农业的增产,并且相应地发展了轻工业的生产,这就使国民经济的几个主要部门在发展中避免了互相脱节的危险。

但是我们在处理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这个关系的时候,也曾经部分地犯过错误。例如,在一九五三年,有些部门和有些地方,在建设工作中曾经发生过到处铺开、百废俱兴、不顾条件、盲目冒进的偏向,结果,影响到国家的重点建设,并且造成了财政上的困难和人力、物力的浪费。在一九五六年初,当《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¹⁰⁵⁾公布以后,又一次发生了这样的偏向。有些部门和有些地方,急于求成,企图把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才能够做完的事情,在三年、五年甚至一年、二年内做完。这些偏向,都被党中央及时地发现和纠正了。

在这个时期中间,也曾经出现了另一种偏向,就是某些重要工作过分突出,以致同有关方面脱节。例如,在一九五六年初,我们为着加速发展农业,曾经过高地估计了双轮双铧犁和锅驼机的当年需要量,制定了过高的生产计划,虽然这两种产品的计划经过一再修改,压缩产量,但是计划仍然过高,结果不但消耗了过多的钢材,造成一九五六年钢材供应更加紧张的情况,而且使某些机械工厂发生了一时赶工增产、一时闲工减产的现象。又例如,在我们的建设中,某种工业企业由于前进过快,所需要的原材料无法全部供应,因而发生了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发挥的困难。当然,在我们开始进行工业建设的时期,这种情况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预料到这样的困难而更加妥善地进行安排,也并不是不可能的。

这几年来，我们在建设事业中，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近海地区和内地的关系，也作了大体适当的安排，但是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有缺点的。有一段时间，我们重视了中央建设事业的发展，而对地方建设事业的发展注意得不够；我们重视了内地建设事业的发展，而对近海地区建设事业的发展注意得不够。今后，我们应该经常地注意调整上述的关系，避免发生片面性。

以上说明，我们强调重点建设，并不是说可以孤立地发展重点，而不要全面安排；我们要求全面安排，也不是说可以齐头并进，而不要保证重点建设。我们在制定计划和安排工作的时候，必须把重点和全面很好地结合起来。

第三，应该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不平衡的现象是经常会出现的，这就必须保持必要的物资、财政、矿产资源、生产能力等的后备力量，特别要增加国家的物资储备，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年度计划的顺利执行，并且应付可能遇到的意外的困难。今后若干年内，我国农业生产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还会是很大的，为了应付歉收，就必须有粮食和主要经济作物的储备；为了满足我国建设和生产的规模日益扩大的需要，就必须有器材和原料的储备。此外，我们计划工作还缺乏经验，计划常常有不全和不准的缺点，即使计划当时订得比较准确，也可能由于难以预料的因素又产生新的不平衡。例如，一九五六年由于采用新技术，提高了平炉和高炉的利用效率，矿石和焦炭便供应不足。为了消除或者减少在执行计划中可能发生各种不平衡现象，也必须保留必要的后备力量。

这几年来，国家储备的物资虽然还不很多，可是对于保证生产和基本建设的需要曾经起了一定的作用，对于一九五六年的物资供应的紧张状况也曾经起了一定的缓和作用。但是应该指出，我们过去对于物资储备的重要性还认识不够。正象我们在前面说过的那样，当一九五五年某些物资略有多余的时候，就不适当地出口了一部分；到了一九五六年，由于基本建设规模的扩大，又感到这些物资的严重不足。

必须认识，象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落后人口众多的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各种物资的缺乏是经常的现象，而物资的多余是暂时的现象。这就需要我们更加注意增加后备力量，建立物资储备制度，由国家储备必要的物资，特别是比较缺乏的重要物资。同时，各个国营企业也应该有适当的储备。当然，不论是国家的或者是国营企业的物资储备，都应该加强计划性，规定合理的定额，逐步增加，不能要求一下子增加很多，以免妨碍当前的生产和建设。并且，我们也要反对把由于盲目生产所造成的产品积压，当做国家的物资储备，因为这种做法，必然会造成国家资金的积压和浪费，也是对生产和建设不利的。

第四，应该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多年来的经验是：我们的财政收入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我们的财政支出也必须首先保证经济的发展。因此，应该首先考虑经济、特别是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计划，然后根据它来制定财政计划，用财政计划保证经济计划的圆满执行。不根据经济发展的情况开辟财政来源，把财政收入计算得过少，或者单从节约财政开支着想，保留过多的后备力量，都将限制经济建设的充分

发展,这是不对的。

我们在制定财政收入计划的时候,必须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可能性,考虑到积累和消费之间正确的比例关系,避免把收入定得过分紧张。在制定财政支出计划的时候,除了必须根据保证重点建设和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要求、进行正确的分配以外,还必须考虑到建设规模和物资供应之间的平衡,考虑到意外的需要而留出一定数量的预备费,避免把支出定得过分紧张。如果只顾建设的要求,不顾财政的可能,不顾设备、器材和技术力量是否能够供应,而提出过高过大的拨款和批资的计划,显然也是不对的。

同志们常常喜欢争论应该不应该有“财政框框”的问题。我们的意见是,不考虑经济发展的需要,主观地定出一个“财政框框”来限制经济的发展,这当然是错误的,应该反对这样的“财政框框”。但是,如果财政计划符合于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体现着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正确关系,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之间的正确关系,那末这样的财政计划,无疑地应该严格执行,决不能够当作“财政框框”盲目反对。

在这里还要指出,我们在工作中所发生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有许多是同领导上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分不开的。有些领导同志高高在上,不接近群众,不了解实际情况,主观地处理问题和布置工作,因而所作的决定就很难正确,甚至发生错误。而上级的官僚主义,又助长了下级的命令主义。

现在国务院各部门机构大,层次多,因而公文多,电报多,表格多,弄得下级机关疲于奔命。而有的部门的领导同志,甚至还不知道自己的部门发了些什么指示,作了些什么规定。这

样的官僚主义的现象，必须迅速加以纠正。

在我们政府的工作中，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决不容许我们有丝毫的骄傲自满。应该看到，我国的国民经济正在迅速发展，情况的变化很快也很多，随时随地都有新的问题出现，许多问题又是错综复杂地联系着。因此，我们就必须经常地接近群众，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掌握情况的变化，对有利的条件和不利的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对顺利的方面和困难的方面都要有足够的估计，以便及时地做出决定，调节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方面的活动，避免发生互相脱节或者互相冲突的现象。在我们这样一个地区广阔、情况复杂并且经济上正在剧烈变革的国家里，任何疏忽大意，都可能发生重大的错误，造成重大的损失。因此，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对我们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二

党中央委员会认为，编制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应该以第一个五年计划可能达到的成就作为出发点，联系到大约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我国要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这个基本要求，实事求是地估计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内外的各种条件，进行全面的规划。这样，才有可能使计划既积极而又稳妥可靠。

党中央委员会提出，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应该是：（1）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

固基础；(2)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巩固和扩大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3)在发展基本建设和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发展工业、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和商业；(4)努力培养建设人才，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5)在工业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强国防力量，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要要求，就是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样的工业体系，能够生产各种主要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基本上满足我国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需要。同时，它也能够生产各种消费品，适当地满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

有人问：既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日益发展，并且在社会主义各国之间出现了经济和技术的广泛合作的可能性，我国是否还有必要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呢？我们认为，我国目前的情况虽然同苏联建国初期在经济上处于孤立无援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极有利的条件，但是象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较富、需要很大的国家，仍然有必要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是因为，从国内的要求来说，我们必须迅速改变国民经济长期的落后状态；从国际的要求来说，我国建立起强大的工业，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各国经济的共同高涨，并且可以增强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因此，那种以为不必建立我国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专门靠国际援

助的依赖思想,是错误的。

另一种关起门来建设的想法也是错误的。不用说,我国要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在长时期内还需要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同时也需要同其他国家发展和扩大经济、技术、文化的交流。而且即使我们在将来建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国之后,也不可能设想,我们就可以关起门来万事不求人了。事实表明,不仅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经济和技术的协作范围将不断地扩大,而且由于各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的力量日益强大,国际局势日益趋于和缓,我国同世界各国在经济上、技术上、文化上的联系,必然会一天比一天发展。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孤立思想,也是错误的。

为了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继续扩大冶金工业的建设,大力推进机器制造工业的建设,加强电力工业、煤炭工业和建筑材料工业的建设,积极进行工业中的落后部门——石油工业、化学工业和无线电工业的建设。同时,还必须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首先是进行工业的技术改造,以提高我国工业的技术水平。

经验证明,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是不能够也不应该孤立地进行的,它必须有各个方面的配合,特别是农业的配合。农业是工业发展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延缓农业的发展,不仅直接地影响轻工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而且也将极大地影响重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工农联盟的巩固。因此,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应该继续努力发展农业,求得农业和工业的发展互相配合。为了使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和各个方面按比例地互相协调地发

展,我们又应该妥善地安排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的关系,工农业生产和运输、商品流转之间的关系,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之间的关系;同时,还应该进一步地安排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近海地区和内地之间的关系,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以便把一切积极的因素和有用的力量都组织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来。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的基本建设和工农业生产将有可能继续保持比较快的发展速度。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财政收入增加的基础上,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在全部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将由第一个五年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增加到百分之四十左右,因而第二个五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就将比第一个五年增长一倍左右。在工农业生产方面,初步计算,一九六二年比一九五七年,工业总产值将增长一倍左右,其中,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的产值都会有很大的增长,但是生产资料产值增长的速度将会更快一些;农业总产值将增长百分之三十五左右。到一九六二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将比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一九五七年的数字增长百分之七十五左右。

这里应该加以说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所列举的增长百分数,都是以第一个五年的计划数字作为基数进行比较的,并没有把可能超额完成的因素计算进去,因而增长的百分数就显得高些;等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以后,如果以一九五七年实际达到的数字作为基数,那末现在建议中的增长百分数将有可能相对地下降一些。例如:在建议中提出的我国的钢产量,一九六二年计划达到一千零五十万吨到一千二百万

吨,这个数字同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一九五七年的产量四百一十二万吨作比较,将增长一点五倍到一点九倍,但是,如果同现在预计的一九五七年产量五百五十万吨作比较,那么就增长将近一倍到一点二倍。

上述关于基本建设的规模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我们认为是适当的,是积极而又稳妥可靠的。应该相信,只要我们善于依靠群众,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就能够取得伟大的力量,克服在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象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胜利地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任务。

经济建设的几个方针性问题^{*}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

八大⁽¹²⁶⁾以后,对明年的计划数字已经修改多次。明年是很难安排的一年。必须早一点把明年计划的方针定下来,取得全会同意。今天,我想讲一讲几个方针性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根据刚才少奇同志的政治报告,我们从国际事件中所取得的教训,联系到我们的建设,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点,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犯而且有的已经犯了沙文主义⁽⁶⁷⁾的错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分析,这种错误,就是对外的大国主义,对内的大民族主义,对人民的专制主义。这样的错误在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产生,那么,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不是也可能产生呢?当然可能避免,而且应该尽力避免,但是也有可能产生,并且有些萌芽在过去的工作中已经发现。例如,对周围兄弟国家的大国主义的个别事件,对兄弟民族还有大汉族主义倾向,也产生过领导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利益的事情,我们领导者的生活和工作制度有些特殊化官僚化。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在建设中时常注意这些问题。

* 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做的关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节录。

第二点，也就是刚才少奇同志说的，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个原则是对的，但是在发展中忽视了人民的当前利益。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轻视这两者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就会发生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毛泽东同志在这几个月常说，我们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这样结合起来，优先发展重工业才有基础。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为了保卫人民的福利和社会主义成果，必须依靠人民。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所以，这一条经验也值得我们在建设中经常想到。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值得我们引为教训。

此外，在中国还有中国的特点，那就是封建性很大。我们尽管打倒了封建主义，但封建官僚的习俗在社会上还存在着。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生活特殊，讲究排场，中国的统治阶级过去是这样的，我们也很容易这样做。从上到下，凡叫“长”的，就容易被人家看得特殊一点。所以，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土壤上实现以后，如果不有意识地经常地排除某些旧的社会习俗，它就会经常来侵蚀我们。

要重工业，又要人民。人民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人口众多，这有它的好处；但是人口众多也有一个困难，人多消费需要的量就大。衣食住行，首先是食。我国人口现在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左右，每年增加一千多万人，这是一个可观的数

目，而我们的粮食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三左右，增长量并不大。农业合作化可以使我们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复种面积。今年这么大的灾荒，我们的收成还是比去年增加了，这就是合作化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可是我们也要看到，耕地面积、粮食产量总是增加得慢。不能把这方面的工作看得那么容易。昨天我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了，要提倡节育。这个问题的发明权本来是邓小平同志的，后来邵力子⁽¹²⁷⁾先生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讲了。我们的党和青年团要用一定的力量宣传这个问题。这实际上是广大人民所需要的，首先是城市人民所需要的。现在看得很清楚，我们在短时期内还不可能使大家都就业，工资的增长也不可能使职工养活很多的家庭人口。我觉得甚至提倡晚婚也是有好处的。

第二个问题，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十大关系⁽¹²⁸⁾是党的八大的指导方针。在三大改造⁽¹²⁹⁾高潮出现以后，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各部门、各省市向中央提出了各种报告和要求。毛泽东同志到各地同各省市的同志接触，少奇同志在北京跟各部的同志接触，以后毛泽东同志又跟各部的同志谈话，觉得需要正确地解决这十大关系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能够安排得更恰当。这些关系的许多方面在八大报告中都提到了。但是我们要认识，这十大关系问题并不是一提出来就能解决得了的，具体的解决还需要今后在实践中、在采取具体措施中、在反对错误的倾向中不断努力。前五种关系直接联系到建设。比如农、轻、重的比例究竟如何才恰当？现在还不可能回答得很完满，必须经过多次反复摸索，才能使这三者的比例安排得比较恰当。一个时候恰当了，过一个时候

还要修改。

第三个问题，八大规定的建设方针是，“为了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我们必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个方针，把过去的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的提法具体化了，提出了建设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的要求。我们的工业化，就是要使自己有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任何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总要有一点独立的能力，更不用说象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太小的国家，原料很缺，不可能不靠旁的国家。而我们这样的大国，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不然一旦风吹草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支援我们完全解决问题。我们所说的在我国建立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主要是说：自己能够生产足够的主要的原材料；能够独立地制造机器，不仅能够制造一般的机器，还要能够制造重型机器和精密机器，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象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还要有相应的化学工业、动力工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等等。但是，应该指出，基本上完整并不是说一切都完全自足。就是大国也不可能什么都有。美国算是一个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大国吧，但是有的东西它也没有，橡胶就没有。苏联也有它没有的东西。另外，所谓完整的工业体系，是不是一定要有很高的产量呢？当然，产量是要高一点，但是不一定很高，这个任务的实现是决定于东西的有无，不决定于是否有很高的产量。从这样的要求来看，我们觉得八大的决议上写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是恰当的。现在看，时间可能要长一点。

过去设想的远景规划,发展速度是不是可以放慢一点?经过八大前后的研究,我们觉得可以放慢一点。比如,原来设想钢产量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要达到年产三千万吨,肯定地说,照现在这个速度是不可能实现的。八大的建议已经把要求改变了。我们设想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定在二千万到二千五百万吨上,将来如果执行得好,有可能超过,但是现在不能定到三千万吨。因为定到三千万吨,其他就都要跟上去。那就会象我们常说的,把两脚悬空了,底下都乱了,不好布局,农业、轻工业也会受影响,结果还得退下来。要达到原来远景规划设想的生产指标,肯定时间要更长一些,有可能要四个五年计划,或者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陈云⁽⁷⁸⁾同志曾经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既然达不到,就应该允许在三个五年计划以外再加两年。我说,甚至可以设想加两年不够再增加一两年。这样一个大国,数量上的增长稍微慢一点,并不妨碍我们实现工业化和建立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样,我们的计划就好安排了。不然,讨论起来,远景规划的几个数字就把自己框住了。

此外,还有两点也想提出来请大家考虑:

第一是关于八大建议的数字。这只是个建议,有某些达不到的指标是不是可以修改?我觉得是可以的。过去说计划就是法律,这实际上行不通。当然,计划成为废纸也不对。计划不合实际就得修改,实际超过了计划也得承认,计划不能一成不变。建议中有些数字当时觉得是恰当的,现在发现还有矛盾需要解决,那就应该解决,我想这是许可的。

第二是关于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也是一个建议,是一

个草案。在草案提出的时候毛泽东同志说，有些东西在实际执行中还要修改。实际上，某些数字已经勾掉了。草案现在执行快一年了，事实证明有些是需要重新研究的，这些并不是不可以修改的。比如扩大耕地面积，要求十二年内开垦一亿四千万亩显然是有困难的。如果每年开垦一千万亩，就要投资五亿元。这五亿元的投资，明年度无论如何也挤不出来，今后也不是每年都可以挤出来的。至于其他的组织工作、动员工作、各种条件的配合，还不去说它。

八大的建议和农业四十条，是规定了每年进度指标的。这两个文件经过我们研究以后觉得可以修改。上不去，就不能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钱也浪费了，最后还得退下来。凡是不合实际的都可以修改，这样就把我们的思想解脱了，不然自己圈住了自己。

第四个问题，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估计。八大已经作了简单的估计，在制定明年计划的时候，大家又很容易联想到究竟应该怎样估计第一个五年计划。经过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次讨论，大家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上是正确的，成绩很大，但是错误不少。这好象也是老套子了，但从实际中摸索到最后，觉得还是这样说好。

第一，从生产指标方面看，今年的多数指标都接近了五年计划的指标。到明年，四十六种工业指标中有三十九种一定会超额完成预定的计划，估计只有七种完不成，实际上，真正完不成的就是石油。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生产指标，这不就是一个成绩吗？当然，农业比工业差一点，值得我们重视。但是，尽管有两年特大的灾害，粮食和棉花还是可以完成计划

的。八种农产品中主要是麻、大豆、油料作物不能完成，这是我们没有安排好。同工业相比，我们对农业的重视和安排不够，农业量大面广，有时也不容易考虑得很恰当。

第二，从基本建设方面看，投资超过了计划数字。设计项目中，苏联设计的主要项目多数是完成了，我们自己设计的主要项目多数也都完成了。苏联设计的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主要是国防工业，我们推迟了，当然也有其他的项目。至于自己设计的项目，有些是不应该设计那么多的，这是我们工作上有错误。但总起来说，在这方面基本上也是有成绩的。

第三，从预算上看，我们打得比较更稳当一点。财政支出超过得不多。

所以，整个看起来，第一个五年计划大体上是正确的，成绩很大，这方面不多说了。

另一方面应该承认，错误也不少。这一点，我想多说几句。第一次制定五年计划，不可能一下子制定得很恰当。一九五二年提出的五年计划是粗线条的，然后一九五三年、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五年不断地修改，而且每年的年度计划还要修改。计划不那么准确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缺乏经验和知识，是在不断地发现错误、修正错误的过程中前进的。一九五三年小冒了一下，今年就大冒了一下。去年的基本建设搞得少了一点，还有一点余力，结果是多余的器材减价出卖，钢材出口，水泥减产，木料也减价出卖了。这当然是不恰当的，是比较大的错误。至于小错误，各个部门都会有的。计划问题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就是到现在提出明年年度计划的时候，也不能说我们的缺点就都发现了。希望在全会分组讨论的时候，大家能

揭发出更多的错误缺点，这对明年度的计划和今后的建设工作有好处。明年的计划到执行的时候，还会发现有些订得不恰当，还要在摸索中不断地改正。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做全面总结的时候，就可以得出更多的经验教训，就会比八大时的认识更完全更深入。

现在看来，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一些变化，有的是由于形势的变化而需要修改，有的是由于经验和知识不足而犯了错误。我觉得这两点值得谈一谈。

首先是形势的变化。当我们开始订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朝鲜战争⁽²⁶⁾还在进行，那时候设想，应该加紧发展的不仅是重工业，国防工业也要平行发展。一九五三年停战以后，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五年又出现台湾海峡局势的紧张，整个世界局势怎样还要看一看。直到日内瓦会议⁽⁹⁷⁾、万隆会议⁽⁹⁶⁾以后，到去年年终和今年年初，才慢慢感到国际局势是缓和下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设想今年、明年把国防工业步子放慢，有些生产规模可以缩小。这也是很自然的。毛泽东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现在把国防工业步子放慢，重点加强冶金工业、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把底子打好；另一方面，把原子弹、导弹、遥控装置、远程飞机搞起来，其他的可以少搞，比如炮，有一个厂也行，现在先打底子，将来再发展数量。设想可能有一个和平时期，容许我们把完整的工业体系建设起来，这是最好的，我们把方针摆在这上面。但是我们还要准备另外一种可能，即发生战争，这决定于敌人是否要冒险。如果今后十二年内发生了战争，那怎么样呢？那不是我们犯了错误吗？到时候打起来军火少了，后备力量动员起来又没有军火，大家就哇

哇叫了。可以设想一下，战争就是来了，敌人也不能马上解决问题。敌人打来了我们会先受一点损失，但他们爬上大陆以后，还是要打长期战争的。我们顶多犯那样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把这个问题提到政治局，我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说法，把它提到中央全会，大家也想一想这个问题。如果算错误，我们大家一道犯，到那时候将功折罪，戴罪图功。只有这个办法，不然就徘徊歧路，东边走几步又回到西边走。把器材、资金统统集中搞国防工业，别的生产少了，人民的生活也不能改善，各方面紧张，而武器制造出来，仗又不打，炮不能吃，枪也不能吃，子弹生产多了还不利。所以非下决心不可。中央政治局谈到明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就下了这个决心。这是由于形势的变化，我们有的步子加快了，有的步子放慢了。

第二是由于我们的经验和知识不够，在有些项目上犯了错误。现在看起来有些错误犯得有点可笑，但是当时的确没有弄清楚。比如说，请苏联设计的项目，以为能够提早给我们设备、提早一两年完成总是好的，而没有分清哪几种快对我们有好处，哪几种快会给我们背上包袱，凡是各部提出要加快的，报到国务院，报到中央，总觉得应该批准。象汽车厂就加快了，明年度可以生产一万八千辆到两万辆，可是这就要有很多的器材进口，同时要供应很多的汽油，这就要花外汇。现在汽油没有那么多，就得减少汽车产量。减少生产，劳动力就要闲置。外国朋友参观长春汽车厂时说，你们生产能力多了，一定要闲置。内行人一看就懂。原来还打算建设第二个汽车厂，现在要推迟了。再比如铝加工厂和机械厂，军工部门有的，民

用工业部门可以搞,可以结合起来共用,现在和平时期可以用作普通的民用的机械生产。过去没有很好地考虑,这样就闲置了一些资金。

因此,第一个五年计划尽管成绩很大,可是应该承认,缺点错误也不少。缺点错误已经知道的固然不少,但可能还有我们不知道或者没有揭露出来的,希望参加这次会议的同志在这方面多提一些意见。

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

(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

各位代表：

中缅边界问题是我国在国际关系方面的一个重要问题，同时也是我国人民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因此，政府认为有必要就这个问题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专门报告。

在我国和许多邻国之间，都存在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未定界问题，而中缅两国之间的未定界问题特别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是由于英国在过去统治缅甸的时期在中缅边界问题上制造了长期的纠纷，而近几年来，帝国主义势力又经常利用中缅边界问题，挑拨中缅关系，企图造成紧张局势。

我国政府一贯主张，我国和其他国家之间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应该通过和平协商的途径，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由来已久，问题本身也很复杂，因此，政府从着手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就采取了审慎从事的态度，有准

* 这是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會議上的報告，刊載於一九五七年七月十日《人民日報》。根據這個報告中所提出的建議，經過我國政府和緬甸政府的不懈努力，雙方在一九六〇年奈溫總理訪華時於一月二十八日簽訂了《關於兩國邊界問題的協定》，並在同年吳努總理和奈溫總參謀長訪華時，於十月一日簽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緬甸聯邦邊界條約》。

备、有步骤地寻求这个问题的解决。

在我们国家成立的最初几年，政府需要把全部力量用来处理国内国外一系列重大而迫切的事务，因此不可能同时为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进行全面的和有系统的准备工作。但是，自从中缅两国总理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的会谈公报中提出“在适当时机内，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解决中缅未定界问题以后，我国政府就为解决这个问题进行必要的准备。政府的各有关部门会同云南省当局，对有关的历史文献和实际情况进行了系统的和详细的调查研究。

在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当中缅双方为边界问题的解决分别地积极进行准备的时候，在两国的边境上，双方的前哨部队由于误会曾经发生过一次不幸的武装冲突事件。这次事件，经过中缅双方的努力，得到了适当的处理，同时也使中缅两国政府体会到及早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必要。

从一九五六年年初起，中缅两国政府就中缅边界问题开始了频繁的接触。同年十一月，缅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吴努主席应邀来北京同我国政府商谈。我国政府根据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对中缅边界问题调查研究的结果，通过吴努主席向缅甸政府提出了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原则性建议。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五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第五十次会议同意了这项建议。

中缅两国的边界大部分已经划定，但是有三段还存在着未决问题。我国政府针对这三段边界提出了原则性的建议，并且认为建议中的各点应该作为一个整体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现在，我说明一下政府提出的这项建议的内容。

第一是关于在阿佤山区的一段。中英两国在一八九四年和一八九七年签订的两个关于中缅边界的条约中,对于这一段边界都曾经有明文规定。但是,由于有关的条文自相矛盾,这一段边界长期没有划定。为了造成既成事实,英国在一九三四年初派遣军队进攻班洪部落和班老部落所管辖的地区,遭到了当地佤族人民的英勇抵抗,这就是有名的“班洪事件”。一九四一年,英国乘当时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所面临的危急情况,以封闭滇缅公路作为压力,同国民党政府于六月十八日用换文的方式在阿佤山区划定了一条对它片面有利的边界。这就是所谓“一九四一年线”。由于不久就发生了太平洋战争⁽¹³⁰⁾,在这条线上并没有树立界桩。一九五六年,在中缅两国政府就中缅边界问题进行商谈的过程中,缅甸的领导人员曾经表示能够理解中国人民对于一九四一年线的不满情绪,但是鉴于这段边界已经通过当时负责的中英政府以换文划定,因此要求我国政府予以承认,并且要求我国政府把在一九五二年由于追剿国民党残余部队而进入一九四一年线以西地区的中国军队撤回。我国政府认为,在边界问题上,根据正式条约而提出来的要求,应该按照一般国际惯例予以尊重,但是这并不排除两个友好国家的政府通过和平商谈求得对双方都是公平合理的解决。为了促进这种公平合理的解决,为了替这种解决创造良好的气氛,我国政府在向缅甸政府提出的原则性建议中表示准备把中国军队撤出一九四一年线以西的地区。同时,我国政府要求,在中缅两国政府没有对一九四一年线问题取得最后协议并且树立界桩以前,缅甸军队不进驻中国军队自一九四一年线以西所撤出的地区,但是缅甸政府的工作

人员可以进入这一地区。

第二是关于在南畹河和瑞丽江汇合处的勐卯三角地区，又名南畹三角地区，面积约二百五十平方公里。这个地区是中国的领土，过去英国在条约中也明文承认了这一点。但是，在一八九四年中英两国签订有关中缅边界的条约以前，英国就不经中国的同意，强行通过这个地区兴修由八莫到南坎的公路。到一八九七年，中英两国再一次签订有关中缅边界条约的时候，英国又以“永租”的名义取得了对中国的这块领土的管辖权。缅甸独立以后承继了对这个地区的“永租”关系。我国政府在向缅甸政府提出的原则性建议中指出，由缅甸继续对中国的一块领土保持“永租”的关系，是同中缅两国目前的平等友好关系不相称的。我国政府表示愿意同缅甸政府商定如何废除对勐卯三角地“永租”关系的具体步骤。

第三是关于尖高山以北的一段。这一段边界过去始终没有划定。英国曾经在这个地区不断地制造纠纷，借机扩大它的殖民领域。最严重的就是一九一一年初英国对片马地区的武装侵占。“片马事件”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义愤，全国各地都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抗议运动。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也不得不在一九一一年四月十日给当时中国政府的照会中正式承认，片马、岗房、古浪三处各寨是属于中国的，但是却毫无道理地继续侵占这个地区。根据对历史事实和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的結果，我国政府对于这一段边界的划定，向缅甸政府提出以下的建议：从伊索拉希山口以北到底富出口的部分，可以按照习惯边界线划界；从伊索拉希山口到尖高山的一段，除片马、岗房、古浪地区应该归还中国以外，原则上可以按怒江、瑞

丽江(又名龙川江)、太平江为一方和恩梅开江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划定边界。我国政府同时要求,在中国军队撤出一九四一年线以西地区的同一时期内,缅甸政府也把军队从片马、岗房、古浪撤出。在这一段最后划界以前,缅甸政府可以保留在片马、岗房、古浪地区的行政管理,而中国政府保证,在这一段边界最后划定以前,中国军队将不进驻这个地区。

在我国政府提出了以上的建议以后,吴努主席表示这是照顾双方利益的公平合理的建议。在吴努主席同我国政府领导人员会谈后发表的联合新闻公报中又宣布,中缅两国政府取得谅解,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底到一九五六年年底,中国军队撤出一九四一年线以西地区,缅甸军队撤出片马、岗房、古浪。在一九五六年年底以前,中缅两国政府分别完成了撤军的工作。这就为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去年十二月在仰光和今年三月在昆明,中缅两国政府的领导人员又有机会对两国边界问题继续进行友好的商谈,进一步澄清了彼此的观点,在总的方面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全国各界人士都很关心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为了广泛地征求国内各方面的意见,我曾经代表政府在今年三月中旬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作了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在北京的人大代表、政府成员和特邀的专家也出席了那次会议。今年三月底,我又在昆明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召集的由云南省各界和各兄弟民族代表参加的会议作了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在这两次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会议上,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使政府有机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且对有关问题作了解答,这就进一步

统一了全国各方面在中缅边界问题上的看法。

以上是我国政府到目前为止处理中缅边界问题的大致经过。现在，我要说明一下政府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中所遵循的基本政策。

我们的国家自从开国以来在国际事务中一贯奉行的政策，就是争取世界局势的和缓，争取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同我们的邻国和平共处。这个政策有利于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也符合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我国政府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时所根据的，也正是这个基本的和平外交政策。

中缅两国之间的边界问题，正象其他亚非国家之间的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一样，都是帝国主义长期侵略政策所造成的。现在，中缅两国都已经取得独立，都在努力为本国的和平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缅两国又是同印度一起首先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¹⁰⁴⁾的国家，我们都珍视自己的民族独立和民族利益，我们都深刻地认识到，只有通过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才能更好地维护我们各自的民族独立和民族利益。但是，帝国主义者却从来没有停止利用亚非国家的分歧在这些国家之间制造紧张和不和，竭力企图重新对这些国家实行“分而治之”的侵略政策。针对这样的情况，我国政府在同缅甸政府商谈中缅边界问题的过程中，一向强调双方相见以诚，按照五项原则友好协商，求得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这样，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不仅会使中缅两国的友好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而且还将有利于亚非国家的团结。我国政府在解决中缅边界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是从维护我国的民族利益出发的，同时也是从促进中缅友谊和亚非各国团结的

利益出发的。

中缅边界问题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因此,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的时候如何对待历史资料,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在封建王朝统治时期,正象封建时代的许多国家一样,四至疆界是不十分明确的。中国历代的封建王朝同边沿地区各个民族的关系也有各种性质和程度的不同。因此,要确定中国封建帝国的疆界线,几乎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近六十多年来,国内和国外出版的地图中,先后出现了对中缅未定界的许多很不同的画法。这些情况不能不在广大的范围内引起了对中缅未定界的混乱看法。政府认为,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的时候,必须认真地对待历史资料,必须以正确的立场和观点对历史资料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判断,把可以作为法理依据的历史资料同由于情况变化只有参考价值的历史资料加以区别。同时,更要注意到中缅两国已经发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根本变化,那就是,中国和缅甸已经分别摆脱了原来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地位,成为独立的和互相友好的国家。缅甸政府继承了原来受英国统治的地区,不同民族的自治邦同缅甸本部组成了缅甸联邦。我国政府接管了国民党政府所管辖的地区。在处理中缅边界问题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这些历史变化,同时也要按照一般国际惯例来对待过去签订的有关中缅边界的条约。只有把以上各点结合起来考虑,才能够正确地运用历史资料,求得中缅边界问题的公平合理的解决。

中缅边界问题直接地关系到聚居在中缅边境的各民族的利益。因此,在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时候,就特别需要照顾这些民族的利益。我们知道,两国之间的边界把聚居在边境的同

一民族划分为二，是常见的事。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在中缅已定界的各段，在我国和许多其他邻国的边界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同一个民族分居边界两旁的情况。我们在解决中缅未定界问题的时候必须事先估计到，有关民族被边界线分隔是难以避免的。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就更加需要同缅甸政府协商采取措施，使将来划定的边界成为和平友好的边界，进一步发展两国边民之间的亲密联系。

各位代表，中缅两国政府根据友好的精神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对中缅边界问题进行了多次的接触和商谈以后，已经在总的方面取得一致意见。我们相信，通过继续的协商，把双方在具体问题上的意见加以协调以后，中缅边界问题就将得到全面的和公平合理的解决。

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

(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

各位同志：

听说民族工作座谈会开得很好，大家交换了许多意见，也提出了许多问题，有些问题已得到了解决。我想讲一讲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原则性的问题，和大家交换意见。一、关于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问题，就是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和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问题；二、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问题；三、关于民族繁荣和社会改革的问题；四、关于民族自治权利和民族化的问题。

一 关于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问题

我们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就是既反对大民族主义（在中国主要是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特别要注意反对大汉族主义。这两种民族主义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表现。一方面，如果在汉族中还有大汉族主义的错误态度的话，发展下去就会产生民族歧视的错误；另一方面，如果在兄

* 这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召开的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弟民族中存在地方民族主义的错误态度的话,发展下去就会产生民族分裂的倾向。总之,这两种错误态度、两种倾向,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不仅不利于我们民族间的团结,而且会造成我们各民族间的对立,甚至于分裂。这个问题怎样解决呢?我们认为,除了极少数人的问题以外,在民族问题上的这两种错误态度、两种倾向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应当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来解决,就是运用毛主席提出的公式,从民族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我们各民族间进一步的团结。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从民族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要在一个什么新的基础上,达到我们各民族间进一步的团结呢?我想对这个问题多讲一讲。

这个新的基础,就是我们各民族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建设这样的祖国,就是我们各族人民团结的共同基础。我们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共同目的,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大家庭,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哪一个民族所专有,而是我们五十多个民族所共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所共有。

全国解放后,经过八年来的努力,我们把全国各民族都团结在一起。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各民族所共同遵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规定我们要把独立了的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就是要把我们拥有五十多个民族、六亿人口的大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强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代表六亿人民意志的大宪章,我们必

须同心协力，努力奋斗，争取实现宪法的要求。我们各民族必须在为了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这个新的基础上来达到新的团结。因此，我们就必须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是妨碍我们在新的基础上加强民族间的团结的。

我们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必须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这个共同目标出发。如果没有这个共同目标，就反对不了这两种民族主义。比如说，站在人口最多的汉族方面批评兄弟民族中的地方民族主义倾向时，如果不想到这个共同目标，就很容易发生一些民族歧视的错误。因为兄弟民族多数是处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状态，汉族同志在批评时，就容易去指责这些客观存在的落后现象，这就变成民族歧视了。如果从为着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共同目标出发，就会想到那些落后状况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是什么错误的倾向，而是经济、文化不发达的现象。应该去帮助各兄弟民族实现经济文化的发展，不能把这些客观现象当成兄弟民族中的地方民族主义倾向。就是有一些地方民族主义的倾向，也要研究它的来源，其中很多是有客观原因的，如果把这些客观原因改变了，这些倾向就会不存在了。比如说，处在边远地区的兄弟民族，他们对内地的情况不了解，对一些进步和发展的现象不认识，因而发生一些怀疑，不晓得汉族到底对兄弟民族的态度怎样。尤其是因为历史上汉族的反动统治者压迫少数民族，剥削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免不了带着怀疑的眼光看汉族，这是很自然的。因此，不能把这些由于历史、社会、经济的原因而产生的一些怀疑和不信任，都说成是地方民族主义倾向。不应该简单地

批评某些地方民族主义倾向,而是应该诚恳地帮助兄弟民族了解产生这些倾向的根源,去掉他们的怀疑。当然,要去掉产生这些倾向的历史的、社会的、经济的根源,不是一天就能做到的。要在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共同目标下,经过长期努力,发展全国各民族的经济、文化,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去掉这种怀疑。这需要时间,需要工作,而不应该简单地不加分析地批评,只是简单的没有分析的批评,有时甚至会引起误会,造成错误。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站在少数民族方面批评汉族中的大汉族主义时,如果不从共同目标出发,也容易造成对立。因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经济、文化方面事实上的不平等今天还存在,历史上反动统治压迫的后果也还存在。少数民族如果对汉族只注意这些历史痕迹,就很容易在少数民族中产生民族对立的倾向:我不信任你,你人口多,总是对我们不利,因为你是多数,经济、文化发展一些,总是会利用发展的优势继续过去的歧视和压迫。这样,怀疑的心理就增加了,甚至觉得和过去差不太多,这就容易助长民族分裂、不团结的倾向。因此,我们希望少数民族的同志也一定要在共同目标下批评汉族中的大汉族主义。就是说,要把我国各民族经济、文化事实上不平等的现状逐步加以改变,为共同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努力,这就需要各民族互相团结,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来批评。汉族同志中如果确实有大汉族主义倾向和民族歧视的错误,就批评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而不要简单地、不加分析地指责,不要对汉族的整体产生怀疑、不信任。不然就会助长民族分裂的倾向,不能达到民族间的团结。

我们的国家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在古代又是不完全统一的,甚至各民族彼此作战,不是你侵犯我,就是我侵犯你。民族间的互相侵犯,在我国的历史记载上是很很多的。在各民族互相侵犯中,如果算总帐,汉族侵犯兄弟民族的次数多、时间长。虽然历史上汉族也被一些兄弟民族多次侵犯过,被统治的时间也不算短,如:北朝、辽、金、元、清。但从整个历史来看,还是汉族侵犯兄弟民族的时候多。站在兄弟民族的地位来想,总会想到历史上的这些痕迹。因为汉族在历史上经济、文化发展一些,就有条件向各方面发展,以致兄弟民族被挤到边远寒苦地区,生活就更困难,经济、文化也就更不容易发展。这种历史痕迹在兄弟民族中的印象是很深的。各个兄弟民族如果不想到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共同目标,就很容易产生地方民族主义倾向,这对民族间的团结不利,对祖国的统一和发展不利。因此,各兄弟民族也必须想一想,尽管历史给我们遗留下这些痕迹,但这总是过去的事情了。这些事情在新中国诞生以前是存在着的。而在新中国诞生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我们的宪法上,在国家的政策中,规定了民族平等。在平等友爱的民族大家庭中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的祖国,这是大家的共同目的。为着这个目的,我们要把历史上的痕迹消除掉,要把各民族在经济、文化方面事实上的不平等状况逐步消除掉。当然这不是短时间所能做得到的,需要共同努力。

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若不强大起来,不建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就要受帝国主义的欺侮。当然,解放以来,我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不受欺侮了,但是,这并不能保证我

们永远不受欺侮，必须把社会主义祖国真正建设强大了才有保证。处于帝国主义现在还存在的世界上，虽然我们社会主义的事业发展了，但是帝国主义还不死心。它一有机会还要用各种办法来捣乱。这就要求我们提高警惕，更要着重强调我们各民族间的团结，以利于共同努力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不如此，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站起来以后，还会栽跟头，还会是一个落后的、贫困的、受欺侮的国家。

应该认识清楚，如果不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能摆脱贫困落后的状态的。要摆脱这种状态，只有我们五十多个民族，大家合作起来，共同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要建设这样的国家，不能单靠汉族。汉族人口多，经济、文化比较发展，但是可开垦的土地已经不多，地下资源也不如兄弟民族地区丰富。兄弟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是祖国工业化的有力后盾。但是，兄弟民族地区的资源还没有开发，劳动力少，技术不够，没有各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帮助，也不可能单独发展。因此，各个民族必须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在共同发展的目标下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这样，两种民族主义错误才会逐步减少，民族歧视的倾向和民族分裂的倾向也才会减少。举个例子，要把包头建设成为中国的一个工业基地，就必须把那里的铁和大同的煤结合起来。现在包钢已经开始建设了，将来会成为很大的工业中心。这就必须各个民族共同努力，首先是蒙古族和汉族共同努力。在这个共同目的之下，在积极的建设当中，即使有大汉族主义倾向，或者地方民族主义倾向，也可以逐步地减少。有了共同的、积极的发展目标，就可以克服那些消极的、不满的

对立情绪。当然,我不是说有了积极的目标,就不要注意克服消极的因素了,那还是需要克服的。我是说,有了积极的目标,消极的因素才会被积极的因素所代替。同样也可以设想,要在新疆建立起包括克拉玛依油田和乌鲁木齐地区的将来的工业中心,如果没有新疆各民族和内地汉族的共同努力,就搞不成功。首先铁路就修不成。铁路通了,劳动力不够,资金不够,也没有办法来开发。这就必须用全国的力量去支援。我只举这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得出其他了。为着一个伟大的共同发展的目的,我们就必须把由于各民族之间的偏见所产生的偏向,逐步地减少下去。

我们想到将来强大的祖国,就必须在今天强调各民族的团结,为建设社会主义共同努力。为了实现这个共同的目的,对妨碍我们团结的、妨碍我们共同努力的两种民族主义错误,都应当批判。我们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进行批判,以消除或减少民族歧视的错误和民族分裂的倾向。应该把这个问题提到新的认识上来,不要避讳这种批判,而是要从正面指出这个问题。两种错误的倾向都是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为了祖国的伟大的建设,我们就应当自觉地克服大汉族主义错误和地方民族主义错误。

二 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问题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我们解放以后在民族问题上的一个根本性的政策。这是我国宪法上规定了的。我国为什么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没有实行民族自治共和国那样的制度

呢？自治的形式在我国叫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还有民族乡，在苏联叫自治共和国、自治省、民族州。这不单是名称的不同，制度本身也有一些不同，也就是实质上有一些不同。不同的地方，不是在自治不自治的问题上。苏联的自治共和国是给民族以自治权利，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也是给民族以自治权利。不同的地方，在于苏联的区域划分与我国有很大的不同，苏联的自治共和国的权利、权限的规定也与我国有些不同。这些不同，是从两国的历史发展的不同而来的，部分地也是由于中国和当年十月革命时代的形势不同而来的。

俄罗斯在十九世纪已经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虽然还有很大的封建性。一方面，它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另一方面，它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拥有殖民地。那个时候，在俄罗斯周围的一些民族，都是被沙皇这个俄罗斯政权统治着。这是一种殖民统治。而且，当时俄国的各民族多数都是一个一个地各自聚居在一块。

中国的历史同当时俄国的情况却完全不同。中国的民族发展在地区上是互相交叉的，内地更是如此。汉族曾经长时期统治中原，向兄弟民族地区扩张；可是，也有不少的兄弟民族进入过内地，统治过中原。这样就形成各民族杂居的现象，而一个民族完全聚居在一个地方的比较少，甚至极少。我们常说，新疆是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地方，但是新疆也不是一个民族，而是十三个民族。西藏比较单一一些，但这指的是现在的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管辖地区，而在其他地区，藏族也是和其他民族杂居的。我国历史的发展，使我们的民族大家庭形成许多民族杂居的状态。由于我国各民族交叉的时代很多，互相

影响就很多，甚至于互相同化也很多。汉族所以人数这样多，就是因为它吸收了别的民族。再如满族，从长白山发源，进入中原的时候，只有几十万人，到清朝最盛时，差不多有四五百万人。清朝亡了以后，满族还是存在的。满族采纳了汉族的文化，首先是文字，以后又逐渐采用了汉族的语言，把自己的语言文字丢了，好象跟汉族没有区别了，实际上还是两个民族。在清朝时候，对汉、满通婚也不是绝对限制的。到辛亥革命⁽⁷³⁾以后，通婚的更多了，民族间的界限也就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了。解放以后，承认了满族。在普选进行人口调查时，填表承认是满族的有二百四十万。看来比过去少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因为有些人和汉族通婚，又算汉族，又算满族，填表就不填满族了。其实，那就看怎样填法了。这是一种同化的现象。如果同化是一个民族用暴力摧残另一个民族，那是反动的。如果同化是各民族自然融合起来走向繁荣，那是进步的。这种同化本身就有推动进步的意义。现在满族和汉族，语言文字相同，就更容易合作。满族同胞是不是主张恢复满族话呢？我看不会的，因为三四百万人从头学满族话，那不太麻烦吗？有些满族话，汉族吸收了没有？我看是有的。有许多满族语汇转为汉语，丰富了汉语。穿衣服也是这样，汉族的妇女在辛亥革命以后穿起旗袍，这还不是满族的服装？汉族吸收满族的文化很多，这也可以说是带点同化的性质。

还可以谈一谈回族的情况。回族是从阿拉伯、小亚细亚来的，并且时代并不太远，据说到现在不过一千多年，可是人口发展到三百五十多万。回族来中国有两条路，一条是从海上来的，一条是从阿富汗来的，要经过南疆，这样就不可能来很多

人。但是,现在回族散布到全国,没有一个省没有回族,几乎没有一个县没有,可靠的是三分之二以上的县都有。回族所以这样多,就是因为他能把别的民族成分吸收进去,吸收了就壮大了,这有什么不好?这不也是同化吗?回族聚居的地区在甘肃省的有吴忠、陇东、银川、陇西等地,其他地方也有聚居的。这次成立回族自治区,包括了吴忠、银川和固原等地,但大多数回民还是分布在全国。

汉族同化别的民族,别的民族也同化汉族,回族是这样,满族是这样,其他民族也是这样。这种情况,越向内地越多。历史的发展使中国各民族多数是杂居的,互相同化,互相影响。中国民族多,而又互相杂居,这样的民族分布情况,就不可能设想采取如同苏联那样的民族共和国办法。因为要构成一个民族共和国,需要构成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绝大多数的民族人口要聚居。

历史的发展使我们的民族大家庭需要采取与苏联不同的另一种形式。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历史发展情况,不能照抄别人的。采取民族区域自治的办法对于我们是完全适宜的。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仅可以在这个地方有这个民族的自治区,在另一个地方还可以有这个民族的自治州、自治县、民族乡。例如内蒙古自治区虽然地区很大,那里的蒙古族只占它本民族人口的三分之二左右,即一百四十万人中的一百多万人,另外占三分之一弱的几十万蒙古族人就分在各地,比如在东北、青海、新疆还有蒙古族的自治州或自治县。即将建立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那里的回族人口只有五十七万,占自治区一百七十二万人口的三分之一,只是全国回族三百五十多万的零头,就

全国来说也是少数。还有三百万分散在全国各地，怎么办呢？当然还是在各地方设自治州、自治县和民族乡。藏族也是这样。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所管辖的地区，藏族只有一百多万，可是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族自治州、自治县还有一百多万藏族人口，这些地方和所在省的经济关系更密切，便于合作。在成立壮族自治区的问题上，我们也正是用同样的理由说服了汉族的。到底是成立桂西壮族自治区有利，还是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利？单一的壮族自治区是不可能有的。因为即使把广西壮族聚居的地方，再加上云南、贵州的壮族地区，划在一起，作为一个壮族自治区，它内部还有一百多万汉族人，而且其中的两个瑶族自治县也有四十多万人，汉族、瑶族合起来有一两百万，所以也不可能是纯粹单一的民族自治区。如果这样划分，壮族自治区就很孤立了，不利于发展经济。在交通上，铁路要和广西汉族地区分割；经济上，把东边的农业和西边的工矿业分开。这是很不利于共同发展的，而合起来就很便利了。所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也是一个民族合作的自治区。

从以上几个大的自治区来看，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在中国适宜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宜于建立也无法建立民族共和国。历史发展没有给我们造成这样的条件，我们就不能采取这样的办法。历史发展给我们造成了另一种条件，就是中国各民族杂居的条件，这种条件适宜于民族合作，适宜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一个民族不仅可以在一个地区实行自治，成立自治区，而且可以分别在很多地方实行自治，成立自治州、自治县和民族乡。回族是最典型的例子。这没有什么不好，而是很

好。我们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种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正确结合,是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正确结合,不仅使聚居的民族能够享受到自治权利,而且使杂居的民族也能够享受到自治权利。从人口多的民族到人口少的民族,从大聚居的民族到小聚居的民族,几乎都成了相当的自治单位,充分享受了民族自治权利。这样的制度是史无前例的创举。

十月革命时,俄国无产阶级是首先在城市中起义取得了政权,然后才普及到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俄国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时候打这个擂台是不容易的。同时,它又是在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里进行革命的,所以必须摧毁旧有的殖民地关系。为了把各民族反对沙皇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同无产阶级、农民反对资产阶级、地主的斗争联合起来,列宁当时强调民族自决权这个口号,并且承认各民族有分立的权利,你愿意成为独立的共和国也可以,你愿意参加到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来也可以。当时要使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站住脚,就必须强调民族自决权这个口号,允许民族分立。这样才能把过去那种帝国主义政治关系摆脱,而使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社会主义国家站住脚。当时的具体情况要求俄国无产阶级这样做。

中国是处在另一种历史情况之下。旧中国虽然有北洋军阀⁽⁶⁾和后来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压迫劳动人民,压迫兄弟民族,但是整个中国则是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成为半殖民地,部分地区则成为殖民地。我们是从这种情况下解放出来的。革命的发展情况也和苏联不同。我们不是首先在大城市

起义或者在工业发达的地方起义取得政权，而是主要在农村中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行长期奋斗，经过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才得到了解放。因此，我国各民族的密切联系，在革命战争中就建立了起来。例如，在内蒙也有革命根据地，在新疆也有过反对国民党的革命运动，在我党领导的西南游击区也有各兄弟民族参加，内地许多兄弟民族都参加了解放军，红军长征经过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时，留下了革命的影响，并且在少数民族中吸收了干部。总之，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对外曾是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内部是各民族在革命战争中同甘苦结成了战斗友谊，使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得到了解放。我们这种内部、外部的关系，使我们不需要采取十月革命时俄国所强调的实行民族自决、允许民族分立的政策。

历史发展给了我们民族合作的条件，革命运动的发展也给了我们合作的基础。因此，解放后我们采取的是适合我国情况的有利于民族合作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我们不去强调民族分立。现在若要强调民族可以分立，帝国主义就正好来利用。即使它不会成功，也会增加各民族合作中的麻烦。例如新疆，在解放前，有些反动分子进行东土耳其斯坦⁽¹³¹⁾之类的分裂活动，就是被帝国主义利用了。有鉴于此，在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时，我们没有赞成采用维吾尔斯坦这个名称。新疆不仅有维吾尔一个民族，还有其他十二个民族，也不能把十三个民族搞成十三个斯坦。党和政府最后确定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的同志也同意。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帽子”还是戴的维吾尔民族，因为维吾尔族在新疆是主体民族，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他民族也共同戴这个帽子。至于“新

疆”二字，意思是新的土地，没有侵略的意思，跟“绥远”⁽²⁾二字的意思不同。西藏、内蒙的名称是双关的，又是地名，又是族名。名称问题好象是次要的，但在中国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上却是很重要的，这里有一个民族合作的意思在里面。要讲清楚这个问题。

以上这些都说明，我们是根据中国民族历史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和革命的发展，采取了最适当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而不采取民族共和国的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单一体的多民族的国家，而不是联邦国家，也无法采取联邦制度。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分别情况，成立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或者民族乡，使所有少数民族不论聚居或者杂居都能实行真正的自治。这就有利于少数民族普遍行使自治权利，也有利于民族之间的合作互助。我国各民族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也是从历史上来的，经济基础是这样，上层建筑也是这样。要想趋向平衡，就要各民族合作互助，不能孤立地讲发展。以新疆来说，那里有石油资源，有各种有色金属资源，有可以开垦的农田，适宜种植棉花，但这只是好的条件，不要忘记那里还有困难。新疆水利不够，要大大地改善水利系统，才能够开发。交通也很困难，不仅要修通从兰州到新疆的铁路，而且要修通北疆到南疆的铁路，才能开发。要开矿、垦田，可以用机械，但最根本的有两个问题：一是要有资金，一是要有人力。即使有了机械，也还要有人力、财力才能得到发展。仅仅依靠新疆一个自治区的五百万人口，不可能积累多少资金，而且人力也不够。必须要靠全国的力量，国家的力量，中央的力量，把我们计划经济中能够积累的资金拿出一部分投资

到新疆增加财力，从内地动员一部分人力到新疆增加劳动力，这样才能使新疆大发展。这就必须民族合作。不能设想，新疆孤立地只靠现有的人力、物力，就可以解决问题。

在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中，我们采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为了经过民族合作、民族互助，求得共同的发展、共同的繁荣。中国的民族宜合不宜分。我们应当强调民族合作，民族互助；反对民族分裂，民族“单干”。我们民族大家庭采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利于我们普遍地实行民族的自治，有利于我们发展民族合作、民族互助。我们不要想民族分立，更不应该想民族“单干”。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在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建立起我们宪法上所要求的各民族真正平等友爱的大家庭。

三 关于民族繁荣和社会改革的问题

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要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在民族繁荣的基础上前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够有民族繁荣，所以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比封建主义更优越。历史证明，过去许多兄弟民族不是走向繁荣，而是走向衰亡。为什么？就是因为过去的反动统治者采取歧视兄弟民族，以至削弱和消灭兄弟民族的政策。两千年来历史上有记载的兄弟民族，有些现在不见了，其中有的可能向远方迁移了，有的可能和汉族或者和其他民族融合起来了。这些变化的情况，还有待历史学家的研究。

上面讲过，满族从几十万人变成了几百万人，吸收了汉族

的文化。满族建立的清朝政权，统治了中国近三百年。清朝以前，不管是明、宋、唐、汉各朝，都没有清朝那样统一。清朝起了统一的作用。另一件事就是繁荣了人口。中国人口的增长，在清朝是相当大的。这是它有功的一面。但是，它不是繁荣所有民族的人口。例如在清朝统治下，汉族人口增长了。可是对某些兄弟民族，它的政策则是削弱。如蒙古和藏这两个民族，在清朝的时候人口是减少了的。蒙古民族在最盛的时候据说有四五百万人口，但是到了清朝就减少了。藏民族在唐朝时是很强大的，有很大的发展，曾到过陕西的关中北部、长安附近，到过甘肃的南部，还到过四川、云南，人口据说有四五百万。现在蒙族人口合起来不到三百万。这两个民族，显然是在清代削弱了。这说明，封建主义的民族政策是要削弱别的民族的。

帝国主义更是如此。帝国主义统治殖民地，总是把当地的民族搞得很穷困，穷困以后就要衰弱了。大家知道，帝国主义是从西方来的，起初主要是英国和法国，以后是美国。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对任何殖民地的原有民族，都是采取削弱的政策。例如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到美洲殖民，把原来占当地人口多数的印地安人削弱成了少数。又如英国人、法国人、比利时人到非洲殖民，也是这样做的，他们力图削弱非洲的黑人民族。只有不甘心于做殖民地奴隶、奋起反抗取得胜利的民族才慢慢好了，如埃及、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等。所以，从世界史上可以看出来，不管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都是削弱被压迫民族的。反动统治者不仅压迫本民族的劳动阶级，也削弱它统治的其他民族。东方各民族的经济文化比西

方落后，曾长期处于被压迫被削弱的地位。只有争得民族独立，他们才能免于被削弱。在民族政策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跟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根本不同。我们要帮助各兄弟民族的繁荣，必要的时候对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民族也给予帮助。我们对各民族既要平等，又要使大家繁荣。各民族繁荣是我们社会主义在民族政策上的根本立场。绝不能说这个民族是优越的，那个民族是劣等的，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种族主义的想法。德国法西斯认为日尔曼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说德国日尔曼血统是最好的血统，这是极端反动的思想。我们认为，所有的民族都是优秀的、勤劳的、有智慧的，只要给他们发展的机会；所有的民族都是勇敢的、有力量的，只要给他们锻炼的机会。世界上所以有些民族比较落后，这是环境造成的，是因为没有给他们发展和锻炼的机会。我们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就是要使所有的民族得到发展，得到繁荣。所以，我们国家的民族政策，是繁荣各民族的政策。在这个问题上，各民族是完全平等的，不能有任何歧视。我们的根本政策是要达到各民族的繁荣。以往的历史发展使有的民族削弱了，人口减少了，有的很落后，生活水平很低，这是反动统治遗留下来的后果。我在前面讲了清朝对西藏的政策，如果讲到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时代，那就更反动了。尽管孙中山先生提倡五族共和⁽¹³²⁾，到了蒋介石，首先就不承认回族，把他们叫做生活习惯特殊的人。国民党连民族都不承认⁽¹³³⁾，更谈不到帮助各民族发展了。这种对待各民族的反动统治、反动政策，我们历来是反对的。

历史遗留给我们的，是对民族繁荣的很多不利的条件。我

们必须把这些不利的条件逐步地去掉。要去掉这些不利于民族繁荣的条件，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于社会改革。各个少数民族过去由于处在反动统治下面，被反动统治者所压迫，经济得不到发展，人口得不到增长，生活得不到改善，使这些兄弟民族不能够发展。我们新中国就是要帮助各民族发展，这就必须实行一个根本性的措施，就是进行社会改革。社会改革是我们中国各民族的共同性的问题。汉族也要经过改革才能够发展。我们所说的社会改革，最根本的是经济改革。为什么要改革？因为要建设社会主义，要人民生活富裕起来。要富裕就要有工业，一个民族没有工业不可能富裕起来。因此，我们中国要工业化，没有工业化，就不可能使生产发展。而要工业化，就得首先在农业上实行改革，把农业上的封建制度、奴隶制度废除。农民得到了解放，才能够使农业经济得到发展，才能有工业发展的基础。农业能够大量增产，才可能积累资金，才可能供给工业原料，才可能解放劳动力参加工业生产。只有建立起工业基地来，这个民族才有发展的基础。所以每个民族都不可避免地要经过经济改革。现在，各兄弟民族地区绝大多数实行了土地改革⁽¹⁰⁾，有不少兄弟民族进一步实现了农业上的社会主义改造，组织了农业合作社⁽⁸⁴⁾，这就一定会使农民的生产力得到解放，能够在合作社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基础上大大增产，这样才能够促进工业的发展。可是还有不少兄弟民族，经济改革或者还没有开始，或者还没有完成。经济改革分两步，第一步是民主改革，即土地改革，第二步是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如果不进行经济改革，维持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多数的人民还是奴隶、农奴和封建制农民，生产力

就不能够解放。生产的東西大部分被剝削去了，劳动者本身还是穷困的，他们就不可能有增产的积极性。在我们新中国这个社会里，许多地方不但封建制度不存在了，连个体经济制度都不存在了，进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了，有些少数民族地区还孤立地处在奴隶制度、封建制度的统治之下，这怎么可能存在下去呢！它是一定要受到外界的影响的。例如，凉山彝族地区的改革，就是受了外界的影响。奴隶娃子起来了，他们要求改革。现在凉山彝族的一些头人也同意改革，愿意放弃剝削。改革以后，他们还可以得到政府很好的待遇，生活得到保障。如果他们不赞成改革，就要被奴隶娃子推翻，什么也得不到。周围环境的影响是很大的。西昌坝子实行了土地改革，就不能不影响凉山。大家都是在同一个民族大家庭里，土地改革也好，社会主义改造也好，浪潮起来了，都会互相影响。不可能设想，某一个地方能够长期地永远地孤立在一个地方“单干”。我们要对现在还处在剝削者地位的兄弟民族上层分子说清楚这个问题：如果他放弃剝削，他所得到的好处，比反对这个改革所得到的要多得多；如果他抗拒改革，被群众起来推翻了，他就得不到好处，或者得到的少了。如果他赞成改革，国家和政府会照顾他，群众可以对他宽大些。这是一点。另一点，如果从长远来看，他继续长期剝削，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孤独地搞下去，终归要失败，而且剝削越维持得久，他将来失掉的越多。谁要幻想在中国这个社会里长期地保留他的剝削，甚至于过那种极度豪华的生活，那是绝对办不到的。全中国都不那么豪华，少数人要那样豪华是不能允许的。我们主张，各个兄弟民族的人民，包括他们的上层分子，觉悟到需

要改革的时候，再去改革。某些地方推迟改革，是为了将来更好地改革，更和平地改革，更有准备地改革，但总是要改革。一定要把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改革成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所以改革只是一个先后问题，缓急问题，而不是改革不改革的问题。不改革，民族就要贫穷。我们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是要大家幸福，包括兄弟民族上层分子也要得到真正的幸福。改革就是使大家都幸福，不是少数人幸福。当然我们也要承认，改革后的一个时候，上层分子不能象过去那样生活便当，用钱也不那样方便了，因为收入是有一定数额的了。但是，前途是有保障了。将来工业更发展了，他们的生活水平也会更提高。这一点，我们要对所有兄弟民族的上层分子也讲清楚。

前面已经讲过，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是任何民族都不能例外的。我们不能设想，只有汉族地区工业高度发展，让西藏长期落后下去，让维吾尔自治区长期落后下去，让内蒙古牧区长期落后下去，这样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要所有的兄弟民族地区、区域自治的地区都现代化。全中国的现代化一定要全面地发展起来。我们有这样一个气概，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真正平等友爱的气概。我们不能使落后的地方永远落后下去，如果让落后的地方永远落后下去，这就是不平等，就是错误。

这种改革，不仅是经济制度的改革，也会影响到别的方面。因为经济基础变动了，上层建筑也要受影响，就是说，政治上、思想上也要受影响。政治上的制度要适合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要改革，要改革成为民主集中制。又有民主，又有集

中；又有自由，又有纪律；又有个性的发展，又有统一意志。思想也要适合这个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大家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爱护社会主义制度。

有的宗教界朋友担心，既然经济基础的改革会影响到思想方面，那么，是否也会影响到宗教呢？经济基础的改革对思想方面有影响是必然的。但是，思想方面的变化，不会象政治制度的改革那样发展。思想变化的过程是最慢的。信仰宗教的人，不仅现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有，就是将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是不是就完全没有了？现在还不能说得那么死。现在我们只把宗教信仰肯定为人民的思想信仰问题，而不涉及政治问题。不管是无神论者，还是有神论者，不管是唯物论者，还是唯心论者，大家一样地能够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共产党内有很多农民党员，他们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参加合作社，干得很积极。他们的经济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在组织上是按合作社的章程办事，并且许多人是乡政权的干部。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都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要求，但是，一到了晚上，有的就怕鬼。你说所有的共产党员都不怕鬼，我就不相信。人的思想有各种各样，只要他不妨碍政治生活，不妨碍经济生产，我们就不要干涉。宗教是会长期存在的，至于将来发展如何，要看将来的情况。但是，只要人们还有一些不能从思想上解释和解决的问题，就难以避免会有宗教信仰现象。有的信仰具有宗教形式。有的信仰没有宗教形式。宗教界的朋友们不必担心宗教能不能存在。按照唯物论的观点，当社会还没有发展到使宗教赖以存在的条件完全消失的时候，宗教是会存在的。现在应该担心的不是宗教能不能存在，

而是民族能不能繁荣。

民族繁荣是我们各民族的事业，对此不能有任何轻视。只有改革才能使民族繁荣。经济改革是各民族必须走的路。走这条路才能工业化、现代化。工业化、现代化了，经济生活才能富裕，民族才能繁荣，各族人民才能幸福。这里要顺便说一下，就是有些兄弟民族还需要增加人口，但汉族人口增加得太快了，所以汉族地方要提倡节制生育。

四 关于民族自治权利 和民族化的问题

肯定地说，民族自治权利必须受到尊重。凡是宪法上规定的民族自治权利，以及根据宪法制定的有关民族自治权利的各种法规、法令，统统应该受到尊重。在这方面，从中央政府一直到地方政府，有的时候是注意不够的。我们应该多检查，多批评。同时，在这方面，因为汉族人数多，容易忽视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大汉族主义的缺点也是比较容易发生的。忽视民族自治权利的倾向，多半是从大汉族主义来的，应该批判。

另一个问题，就是民族化问题。既然承认各民族的存在，而我们又是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化问题就必须重视。因为经过民族化，民族自治权利才会被尊重。例如，民族的语言文字，就要尊重它。没有文字的，要按照本民族的意愿帮助他们创造文字。在民族自治地方，主要民族的文字应该成为第一种文字。

既然是民族自治,就要培养民族干部。既然承认民族,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就要受到尊重。这些就是民族化。如果不重视这些民族化的问题,就不符合我们建立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使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政策。

对以上两个问题,国家、行政机关、汉族应当负更多的责任,因为最容易忽视。关于干部方面的民族化,就是民族干部应当有一定的比例。在汉族人多的地方,容易忽略少数民族干部的一定比例。即使少数民族人口少,也必须照顾这一点。所以民族自治权利问题、民族化问题,政府机关要多注意。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行政机构,是不是一定要跟省、专区、县一样?这个问题还值得研究。过去太求同了,不那么妥当。各省之间都不应当完全一样,自治区与省,自治州与专区,自治县与县,就更不应当一样,应当因地制宜。

在每个民族自治地方,民族干部应该做负责工作。当然不是所有的负责人都不能由汉族干部担任,但是民族干部总要负更多的责任。因此,就应当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培养民族干部,要派好的干部到中央、省来学习,也要多把好的干部派回去,这才有利。这一方面,以后中央和省应当多注意些。另一方面,也应当派汉族干部去帮助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工作。有些地方汉族多,更不能不要汉族干部。象内蒙,汉族那样多,在人民代表大会、政府机关、企业机构,当然要有汉族干部。广西也是这样。将来宁夏回族自治区也是这样。就是少数民族占多数的地方,象新疆、西藏,也不可能没有汉族干部。在那些兄弟民族占多数的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派汉族干部应当少而精,就是要派好的、得力的干部,不能多

而滥。领导干部很关重要，不论是党的还是政府的，都要照顾双方面，要力求合作。如果干部问题解决不好，一切政策就都没有人实施。如果干部闹对立、包办、单干、歧视、分裂，则一切都搞不好。

我们的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在中国存在有宗教信仰的人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就是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这两类人应该彼此相处得很好。我们从来不象有些国家那样在宗教问题上争执得那么厉害，甚至被帝国主义者挑拨引起战争。信仰各种宗教的人，本来是可以合作的。我国信佛教的最多，第二是信伊斯兰教的，第三是信天主教的，第四是信基督教的。我国信仰各种宗教的人，向来就是合作的。不信仰宗教的人应当尊重信仰宗教的人，信仰宗教的人也应当尊重不信仰宗教的人。不信仰宗教的人和信仰宗教的人都可以合作。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也可以合作。这对我们民族大家庭的团结互助合作是有利的。

民族的风俗习惯比宗教信仰还要广泛，因为一个民族不一定都信仰一种宗教。有很多民族是信仰多种宗教的，也有几个民族是信仰同一种宗教的，如回族和新疆几个民族是信仰同一种宗教的，蒙古族和藏族也是信仰同一种宗教的，但风俗习惯常常是一个民族一种，因此，风俗习惯也同样应该受到尊重。如果不尊重，就很容易刺激感情。比如我们对回族和新疆的各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不吃猪肉的风俗习惯就要尊重。另一方面，对于反映在文化方面的风俗习惯，不要随便加以修改。现在有些文工团到兄弟民族地区学习音乐舞蹈，特别是舞蹈，常常拿汉族的想法来修改，兄弟民族对此很不高

兴。这是强加于人，不尊重人家的风俗习惯。有些汉族人总觉得他自己的都是好的，人家的是落后的，这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人家的风俗习惯是建立在自己的生活条件的基础上的。风俗习惯的改革，要依靠民族经济基础本身的发展，不要乱改。

以上我一共讲了四个问题。这些问题还要继续研究，今天我只是把原则性的问题讲一讲，供大家参考。

给程砚秋⁽¹³⁴⁾的信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砚秋同志：

我在你的入党志愿书上，写了这样一段意见：

程砚秋同志在旧社会经过个人的奋斗，在艺术上获得相当高的成就，在政治上坚持民族气节，这都是难能可贵的。解放后，他接受党的领导，努力为人民服务，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这就具备了入党的基本条件。他的入党申请，如得到党组织批准，今后对他的要求，就应该更加严格。我曾经对他说，在他被批准为预备党员期间，他应该努力学习，积极参加集体生活，力图与劳动群众相结合，好继续克服个人主义思想作风，并且热心传授和推广自己艺术上的成就，以便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发扬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精神。

现在把它抄送给你，作为我这个介绍人对你的认识和希望的表现。

周 恩 来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进一步提高军队的政治素养^{*}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建立以来,经过了多年革命战争的锻炼,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从一九五三年朝鲜停战⁽²⁶⁾到现在的四年半中,情况起了变化,我们已不是在战争中进行锻炼,而是在保卫和平、保卫建设、保卫祖国边防的和平环境中进行锻炼。这对于二十多年来天天拿着武器和敌人作战的解放军来说,是个新的情况。当然我们已经在政治工作、党的组织等方面做了不少的精神准备。但是,对一种新情况的认识和适应,总要经过本身的体验,要有个摸索的过程。四年多来,我们做了一些新的部队建设工作,如实行了兵役制度、军衔制度,颁布了各种条令等,这些都促使我们的军队在正规化方面前进了一步。同时,经过朝鲜战争的锻炼,我们的军事装备逐渐走向现代化,部队的军事素养也得到新的提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在另一个最重要的最基本的方面,也就是说要在军队的政治素养方面,在现有的基础上更加提高,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更为加强。这四年多,我过问军事工作比较少了,但也看了一些报告,知道在这方面有进步的地方也有减弱的地方,因

* 这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上海陆海空军军官大会上的讲话。

此我今天想讲一讲进一步提高军队政治素养的问题。

第一，加强敌情观念。因为我们是军队，战时要打仗，平时就应该进行战斗准备，眼睛对着敌人，思想上警惕着敌人，准备战争。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多，经过整整三十年，锻炼成为这样一支坚强的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的军队。我们可以说，三十年中，有二十五年多都在打仗。现在情况有了变化，但我们还必须经常加强敌情观念。如果丧失了对敌人的警惕，就不能成为一个军人，尤其不能成为一个革命的军人。我们今天还处在两个制度对立、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斗争的时代。毛泽东同志说“东风压倒西风”⁽¹³⁵⁾，但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坐等全世界共产主义的胜利。胜利是要用斗争夺取的。帝国主义不会等待死亡，甘心死亡，它还要挣扎。帝国主义存在一天，战争的土壤也就存在一天，总会有一部分战争狂人要冒险。所以我们革命军人就要时刻警惕着敌人，军人如果丧失了敌情观念，那就要犯很严重的错误。

我们是主张和平的，但和平必须通过斗争去争取。比如说，我们的外交工作是和平斗争，军事工作是武装斗争，这两种斗争是互相配合的。外交斗争需要有后盾，这主要是军事力量。没有这样一个后盾，日内瓦会议⁽⁹⁷⁾也好，万隆会议⁽⁹⁶⁾也好，我们就起不了那样的作用。当然，力量的源泉是人民，归根到底，一切胜利的取得是依靠人民的力量。由人民中的一部分优秀分子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成一支武装，这就是我们的人民解放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这个力量丝毫不能懈怠，只有这样，敌人才不敢为所欲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

会主义取得的一系列胜利，都是由于社会主义力量的强大、团结和巩固。朝鲜停战，印度支那停战⁽⁹⁹⁾，不是敌人不想打下去，而是敌人不敢或不能打下去。所以说，力量是重要因素，只有我们的力量强大，不怕威胁，敌人才会知难而退，和平运动才能不断高涨。因此我们军人必须要有牢固的敌情观念。有国家，就需要有军队保护；帝国主义存在一天，军队的任务就一天也不会轻松。特别是你们处在祖国的东南前线，更应该加强敌情观念，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

最近我了解了一下情况，我们的军队在这方面有一些弱点。有些同志的敌情观念不那么强了，工作也有些松懈。这是不应该的。当然我们不制造人为的紧张，也不被敌人制造的紧张所吓倒，但是应该紧张工作的时候还是要紧张地工作。大家知道，最近敌机乘隙窜入我们的上空，盘旋很长时间，一直到接近我们的首都。我还听总参的同志说，有些单位的军纪比较松懈，这很不应该。我们是拿武器来保卫和平建设的，必须有严格的纪律。

近年来，我们军队基层的情况改变了。实行了义务兵役制，战士都是新兵，基层骨干也很新。他们年轻力壮精神饱满，但没有经过战争锻炼，象暖室里培养的花朵，没有经过风霜。他们不仅没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经验，就连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也没有。如果我们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不去教育他们，他们就会松懈。松懈是不允许的，因为帝国主义还存在，我们要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如果帝国主义不存在了，那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但在我们这一辈子不可能如此，所以我们就必须随时准备着。尽管现在整个形势是“东风

压倒西风”，和平的可能性更大了，战争推迟的可能性更大了，可是我们不能不警惕突然事变。这是你们的主要任务，是根本任务。爆发突然事变的可能性不论有多大，百分之十也好，百分之二十、三十也好，你们都要保持警惕，要准备坏的那一面。在和平时期要警惕坏的情况的到来。不论什么时候都要记住，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这是我们政治工作的责任，是首要的一课。

我们军队中基层干部的战斗经验也不是那么丰富了。营长以下的干部恐怕很多都是解放战争胜利后提拔起来的，有的参加过朝鲜战争，有的就没有参加过。时光过得很快，和平的时间已经不短了，从一九四九年算起已经八年，如果从朝鲜停战算起，也有四年半了，再争取五年、十年的和平时间，那就更长了。和平的时间越长，战争的警惕性就越容易松懈。我们现在处于建设的时期，和平生活惯了，是会有惰性的。在过去战争年代，几个月不打仗手就发痒，那时我们多少干部和战士到了后方医院，住不久总是急于回到前方。现在不同了，整个环境象后方似的，空气也变了。不仅有军队内部的影响，而且还有军队外部的影响，所以就更要加强战斗准备。我们的政治工作者、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应该经常讲这个问题，讲敌情观念问题，要教育部队时刻警惕着敌人的挑衅，经常加强战斗准备。这是我们保卫和平的首要问题。

第二，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我们的军队是党领导的。三十年来，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们建立了这样一支战斗的部队，胜利的部队。在取得革命胜利以后，这支部队又执行着保卫祖国、保卫和平的历史任务。这几年来，我们党更多

地注意了建设工作,注意了阶级斗争,对军队工作管得少了些,这是个缺点。对这一点,你们可以给我们提意见。党一定要管军队。当然是管大事,不是管小事。毛泽东同志说,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如果什么事情都要中央政治局去管,那就要变成包办代替,就会形成小权多揽,大权不揽,把大的事情丢掉了。地方党委要管所在地区军队的事情,也应该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上海市委应该讨论上海部队的重大问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军队的同志也要参加上海市委,出席重要会议。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要了解党的大政方针和重要政策。如果你不了解党的方针政策,怎么会知道整个国家的发展呢!因此,对两方面都要有要求,党要管军队的重大问题,军队的负责人也要参加党的重大事情的决定。不仅上海一地如此,各地都应该这样。在这一方面,我们还要规定一些更具体的办法。但是你们不要等待,现在不是要整改吗,能改的就要先改起来。

我们军队如果没有党的领导,要使它成为一支既有高度军事素养又有高度政治觉悟的革命军队是不可能的,因此一定要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

第三,加强军政联系。我们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是保卫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因此对国家建设和人民政府的各项措施都应该关心,有的要争取直接参加。关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情况,我在上海市党代表大会上讲过了,大概你们的负责同志已经向你们作了传达,这里不详细讲了。我们国家的工业建设已经有相当的规模了,很值得看一看,应该组织起来去参观一下。

军队和地方的界限不要分得太清了。界限分明，互不相干，这对我们国家的建设非常不利。

军队应该关心国家建设，过去这方面做得不够。就拿国防建设来说，我看校级以上的军官也不一定都完全清楚，可能军事工程学院的同志知道一些，旁的人就不大了解了。你们有多少同志知道飞机是怎样制造的？坦克是怎样制造的？我看你们就不大了解。我们不是讲现代化吗，对现代化装备不仅要懂得运用，还要懂得它的性能、原理。尤其是在座的中级指挥员，年轻得很嘛，你们应该懂得这些，学会它，一旦有事，你们就能指挥。至于高级指挥员，如大将、上将、中将等，就更应该懂得这些。可以组织起来到各地去参观，政府方面给你们一些方便。当然，加强军政关系不只是关心社会主义建设一项，我只举此一端加以说明。其他的如征集兵员、复员转业、工程建设、义务劳动等等，许多事情都要双方协作。军队过去帮助地方发展生产，做了许多工作，这种精神应该发扬，今后更要多做些。

第四，改进军内关系。主要是改进上下关系、左右关系、官兵关系。相互之间，不要因为实行了军衔制度、规定了礼节等而拘束起来。我们的军队是革命的军队，应该保持与发扬上下一致、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工作、打仗要强调按级服从，平时互相交往应该有同志式的友爱，象兄弟一样，不必过分拘泥于形式。我们军队的纪律是自觉的纪律，从井冈山时期以来，毛泽东同志就一再强调这一点。军队内部生活近年来有些呆板，讲求形式的东西多了，应该讨论改进。军队的民主是我们的优点，应该发扬这个光荣传统，进一步增强

军内团结。

第五,密切军民关系。近几年,军队与人民的关系有些疏远了。我们回想一下,在革命战争年代,人民完全把我们当作自己的子弟兵。解放战争胜利时,全国人民对我们解放军那真是衷心拥护,军民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但是近几年来,我们有了营房,有了严格的军事勤务以后,军队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就比较疏远了,这是要注意改进的。我们是从人民中来的,我们过去的胜利都是在人民的支援下取得的,不能忘本。今后一定要进一步加强军民之间的联系,要结合整风整顿军民关系。

军队也要进行劳动锻炼。军队工作本身当然也是一种艰苦劳动,体力劳动很多,但总不同于工厂和农村的生产劳动。同时,部队的指战员虽然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出身,但也有不少知识分子。即使是劳动人民出身的,几年不参加生产劳动,也就生疏了,也需要通过劳动锻炼,进一步加强劳动观念和群众观念。因此要多组织义务劳动,帮助人民群众生产,使人民看到今天的解放军还是当年的子弟兵,还是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最可爱的人。我们军队要永远保持人民子弟兵的光荣称号,永远保持最可爱的人的光荣称号,永远保持同人民的血肉联系。

上面讲的这五个问题,我们应该根据形势和军队的任务,在整风中认真加以解决。

最后说一下,现在提倡勤俭持家,许多军官动员家属回到乡下去,回到生产中去,这是好事情,值得称赞。我在北京看到北京部队军官家属回乡的数目很大,我相信其他地方也会做得很好。

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

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第一是简化汉字。《汉字简化方案》是一九五六年一月由国务院公布的。这个方案包含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即汉字简化第一表，包含二百三十个简字，从方案公布的时候起即已通用。第二部分即汉字简化第二表，包含二百八十五个简字，其中的九十五个简字已从一九五六年六月起开始试用。第三部分即汉字偏旁简化表，包含五十四个简化偏旁，已有三十个根据这个表类推出来的简字从方案公布的时候起开始试用。以上三项合计，现在报刊上使用的简字一共有三百五十五个⁽¹³⁶⁾。方案公布后，两年来，简字已经在报纸、刊物、课本和一般书籍上普遍采用，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大家称便，特别是对初学文字的儿童和成人确做了一件很大的好事。河南一位老师向小学生介绍简字，说“丰收”的“丰”字今后可以简写

* 这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报告会上的报告，最先发表于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

成三横一竖的“丰”字，孩子们高兴得鼓掌欢呼。天津一个工人说，“尽、边、办”这三字学了半年了，总记不住，这回简化成“尽、边、办”，一下就记住了。李凤莲⁽¹³⁷⁾同志有个弟弟，在家乡种地，写信给李凤莲同志诉苦，说农民普遍感到汉字难学。农民常用的一些字，象“农民”的“农”，“穀子”的“穀”，“面粉”的“面”，“麦子”的“麦”，还有“杂粮”这两个字，这一类字都不好写。李凤莲同志给他弟弟寄了一本简化汉字的书去，他弟弟高兴极了，回信说“这些新字好学得多”，还埋怨他姐姐为什么不早些给他寄去。简体字是要比繁体字好学好写，因此包括工人、农民、小学生和教师在内的广大群众热烈欢迎简字，这是很自然的事。

至于象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跟汉字已经打了几十年的交道，当初写了别字给老师责备甚至打手心的事在记忆中已经渐渐淡薄，因此觉得繁体简体都无所谓，对于简字不热心，甚至还觉得不顺眼，思想上有抵触。在这一点上，我很赞成李烛尘⁽¹³⁸⁾先生的看法。李先生给《文字改革》月刊写了一篇文章。他说：“一提到汉字改革，总有些人提出这样那样的理由，不同意甚至坚决反对。如有人说，‘汉字并不难’。我看这样的人和‘好了疮疤忘了痛’的人一样，忘记了当年初学《三字经》、《千字文》时的痛苦了。我想这些人如果能回想一下当年自己学习汉字的痛苦，再设身处地为儿童和文盲的利益着想，也许不至于不同意或者坚决反对。”李烛老又在他的文章中批评了那些反对汉字简化的人。他说：《汉字简化方案》公布后，有人说什么“快变成文盲了”。他认为这种感叹和顾虑是多余的。简字中有很多字是人们早就熟悉的。这怎么会“变成文盲”？当

然,有些字比较生疏,但是只要稍微动动脑筋,问题也就解决了,决不至于“变成文盲”。为了广大的劳动人民和千千万万的儿童,知识分子应该动动脑筋。因此,李烛老不仅赞成把“烛”字简化成“燭”,而且赞成把“尘”字简化为“尘”。我看问题确实是这样。汉字简化既然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我们知识分子就应该积极支持这个工作,而不是消极对待。我们应该从六亿人口出发来考虑文字改革的问题,而不是从个人的习惯和一时的方便来看这个问题。我们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首先应该把汉字简化这项工作肯定下来。汉字简化是符合群众利益并且受到群众热烈欢迎的好事,两年来的试用也证明是有成效的,应该给以坚决支持。

那么是不是说汉字简化工作就没有缺点呢?是不是说《汉字简化方案》中的简字就没有不合适的呢?不是的。应该指出:汉字简化工作所采取的方针“约定俗成,稳步前进”是正确的,已为两年来的经验所证明,但是在具体工作中还有考虑得不周到的地方。实践证明,少数简字在应用上还不够妥善,或者可能发生误解。这些少数简化得不恰当、在使用中证明有缺点的简字,应该另行规定它们的简体,或者保留原来的繁体。一九五六年一月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中,除了汉字简化第一表中的二百三十个简字公布推行以外,第二表中的二百八十五个简字和第三表中的五十四个简化偏旁尚在征求意见,本来还没有定案。就是第一表中的二百三十个简字,如果的确有不适当的,也可以作必要的修改。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现在正在征求各方意见,进行简字的整理和修订工作,大家对简字有什么意见,可以向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提出,请他们考

虑,然后再进一步定案。

目前社会上使用简字,还存在一些分歧现象。有些人任意自造简字,除了他自己认识以外,几乎没有别人认识,这种现象自然不好,应该加以适当的控制。一个人记笔记,或者写私信,他写的是什么样的字,谁也无法管。但是写布告或者通知,是叫大家看的,就应该遵守统一的规范。特别是在印刷物和打字的文件上,必须防止滥用简字。希望新闻出版方面和文书工作方面加以注意。使用简字方面存在一些分歧,人们往往以此指责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不错,我们可以批评文字改革委员会,说它对简化汉字的宣传工作做得不够,对简字的分歧现象控制得不好。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承认,这种新造简字的现象,是历来就存在的,现在大家公认了的简字,最初也是少数人新造的,今后这个过程也无法停止,而且还会发展。

我们从汉字的历史上来看,一字多体是从甲骨文起就一直存在的。要说是混乱,那么这种混乱是“古已有之”,顶多不过“于今为烈”罢了。这个“于今为烈”的主要原因,在于今天广大群众正在开始掌握文字并且迫切要求改革文字,这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所没有的。汉字字形演变的总的趋势是简化。由于汉字难写,人民群众不断创造了许多简字。尽管历代的统治者不承认,说它们是“别字”“俗字”,简字还是在民间流行,并且受到群众的欢迎。因此,我们应该说,远在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之前,人民群众早已在改革文字,而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工作,无非是搜集、整理群众的创造,并且经过各方的讨论加以推广罢了。同时,我们也采用了某些日本简化了的

汉字。可见使用简字方面存在的一些分歧并不是汉字简化工作引起的，而《汉字简化方案》的制定，目的正在于把这种分歧引导到一个统一的规范。只有在汉字简化工作方面采取积极的措施，才能逐渐转变这种分歧现象。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汉字简化会不会妨碍我国书法的流传和爱好呢？我想是不会的。书法是一种艺术，当然可以不受汉字简化的限制。简字本来主要是用在印刷上的，我们不可能强制大家必须按照《汉字简化方案》写字。因此汉字简化不会对我国的书法艺术有什么不利的影响。同时我们也应当欢迎书法家按照简化汉字书写，以提高简字的艺术水平。

二

第二是推广普通话。我国汉民族的语言还存在着很严重的方言分歧。其中大量的是语音方面的问题。不同地区的人，如果各说各的方言，往往不容易互相了解。甚至在同一个省里，例如闽南人跟闽北人，苏南人跟苏北人，交谈就发生困难。这种方言的分歧，对于我国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都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北方的干部有时要调到南方去，南方的大学生有时要分配到北方来，沿海城市的工人要去支援内地的工业建设——如果没有一种共同的语言，我们的建设工作就会遭到一定的困难。常常有这样的事情：一个重要的报告，一门重要的课程，由于方言的作梗，大大妨碍了听讲的人的理解。广播和电影是我们的重要的宣传工具，但是由于普通话还没有普及，它们的功效在方言地区不能不受到一定的限制。解放

以来,我国实现了历史上空前的统一,全国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共同目标而奋斗,人们就越来越感觉到使用一种共同语言的迫切需要。因此,在我国汉族人民中努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就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自从一九五五年十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以来,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已经收到了一些成效。到一九五七年年底为止,全国中小学和师范学校语文教师中已经有七十二万一千人受过普通话的语音训练。全国中小学校中,有很大一部分已经开始用普通话进行教学。全国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普通话语音教学广播讲座的在二百万人以上。据教育部张奚若部长说,他去西安视察,发现西安的一些小学生能说一口很好的普通话。这就说明了只要大家重视这个工作,认真地加以推广,就能够收到成效。我们希望各地教育部门,能在较短期间把中小学语文教师全部训练完毕,好使全国所有的中小学校普遍开始教学普通话。

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并非要求全体汉族人民都能说得象北京人一样,这样既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北京语音是个标准,有个标准就有了个方向,大家好向它看齐。但是在具体推广和教学工作中,对不同对象应有不同的要求。比方对广播员、电影和话剧演员、师范学校的语文教师就应该要求严些,对一般人就可以要求宽些,对中年以上的人就可以不必有此一般要求。这样,才能减少推广普通话的阻力,提高大家对学习普通话的信心和兴趣。在什么地方推广普通话?我看首先应该在学校里,在儿童和青年中努力推广。

我们推广普通话,是为的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推广普通话是不是要禁止或者消灭方言?自然不是的。方言是会长期存在的。方言不能用行政命令来禁止,也不能用人办的办法来消灭。推广普通话,要区别老年和青年,要区别全国性活动和地方性活动,要区别今天和明天,不能一概而论。相反地,只会说普通话的人,也要学点各地方言,才能深入各个方言区的劳动群众。

要把六亿汉族人民的方言逐渐统一起来,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必须作长期不懈的努力,才能实现。究竟要多长?就要看交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和我们的工作,但是只要我们不断地认真地工作,这个任务是一定可以实现的。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我希望大家多做一些宣传工作,造成有利于推广普通话的社会风气。我们还应该随时举办一些普通话演说竞赛,对于普通话说得好的学生、教得好的教师给以奖励。总之,要多用一些办法来宣传鼓励,来改变社会风气,使它有利于普通话的推广工作。

三

第三是制定和推广汉语拼音方案。首先,应该说清楚,汉语拼音方案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它并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汉语拼音方案的第一个用处,就是给汉字注音。汉字难不难学呢?究竟要不要用拼音字母来帮助学习呢?关于这个问题还有些不同的意见。有人说,“拼音文字并不容易,外国文也有难学的”。这个问题,本民族只能跟本

民族比。我们有了拼音字母给汉字注音，自然比没有拼音字母注音容易。至于外国文，我们学了几十年汉字，再学外国文，自然觉得外国文比汉字难。学别一个民族的文字，总比学本民族的文字要难。俄文比较难学，但是俄国人觉得俄文比英文、德文还容易。拼音文字难易问题，跟本国学外国文的难易问题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我看应该承认，汉字是难读难写的，因而也就难记。不要说初学汉字的儿童，就是学了多年的成人，对于不少的汉字也还是不认识，或者要读错。现在我们一方面简化汉字的笔画，另一方面给它注上拼音，目的在于减少汉字的读和写的困难，让它容易为广大群众掌握。利用拼音可以提高汉字的教学效率，这一点已经为过去的速成识字法以及现在小学的先教注音字母⁽¹³⁹⁾的经验所证明。希望拼音方案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之后，小学语文课本和北方话区的扫盲课本上就能用来给汉字注音，小学识字教育和文盲扫除工作将得到极大的便利，这是可以断言的。

其次，汉语拼音方案还可以用来拼写普通话，作为教学普通话的有效工具。学习普通话光靠耳朵和嘴巴是不够的，学了容易忘记，必须有一套标音符号，用来编印拼音的读物和注音的字典，供学的人随时查考，不断校正自己的发音，收效才大。过去我们没有一种普遍流行的较为满意的拼音工具，这对于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是个很大的阻碍。现在因为拼音方案尚未定案，还在使用注音字母。可是注音字母虽然已有四十来年的历史，过去的政府也曾经在小学推行过，但是大多数人学过之后就丢了，至今懂得的人很少。今后我们采用拉丁字母的汉语

拼音字母,这套字母是科学、技术等方面广泛使用的,大家使用和接触的机会很多,学过之后就不容易忘记。因此,采用这套字母,对于推广普通话的工作会有很大的好处。

第三,汉语拼音方案可以作为各少数民族创造和改革文字的共同基础。我国共有五十多个民族,其中有许多民族还没有自己的文字,另外一些民族虽然有文字,但是也需要改进。已有文字的民族中,除汉族用汉字以外,有用藏字母的,有用蒙字母的,有用阿拉伯字母的,有用朝鲜字母的,还有用其他各种字母的。这些兄弟民族创造和改革文字的时候,应该采用什么字母作为基础呢?能不能就用汉字作为各民族文字的共同基础呢?过去曾经有人这样试过,没有成功,证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如果几十个民族大家各搞一套字母,这不仅对于各族人民之间的互相学习和交流经验是个障碍,而且印刷、打字、电报的设备势必各搞一套,对于各民族今后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发展极其不利。许多兄弟民族都表示这样的愿望,就是要同汉族在字母上取得一致,以便于交流文化、学习汉语和吸收汉语的名词术语。前几年,汉语采用什么字母还有些举棋不定,使一些兄弟民族创造和改革文字的工作也受了影响。现在西南地区已经有十几个民族创造了拉丁字母的民族文字,但是他们还是不大放心,因为我们的方案还没有最后定案。因此,汉语拼音方案再不能拖延下去了,否则还要耽误人家的事情。汉语现在既然决定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拼音字母,那就应该确定这样一条原则:今后各民族创造或者改革文字的时候,原则上应该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并且应该在字母的读音和用法上尽量跟汉语拼音方案取得一致。

可以预料，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对于各兄弟民族的创造和改革文字，以及今后各族人民之间的互相学习和沟通，将有极大的利益。

第四，汉语拼音方案可以帮助外国人学习汉语，以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由于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在许多国家中，首先是在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亚非友好国家中，愿意学习汉语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他们遭到的最大困难就是汉字，因此常有望洋兴叹之感。现在我们有了汉语拼音方案，就可以用这套字母来编印供各国人民学习汉语的课本、词典和读物，来帮助他们解除这个困难。北京大学的外国留学生专修班采用了汉语拼音方案的第一个草案进行教学，很有成效，说明汉语拼音方案在这方面有很大的优越性，汉字和注音字母是远不能跟它相比的。外国朋友学会了汉语之后，可以仍然依靠这套拼音字母作为注音工具，再进而学习汉字汉文，也一定可以比没有拼音字母容易得多。这是汉语拼音方案在促进国际文化交流方面的功用。

此外，汉语拼音方案还有其他方面的各种用处，例如可以用来音译外国的人名地名和科学技术术语，可以在对外的文件、书报中音译中国的人名地名，可以用来编索引，等等。

从汉语拼音方案的上述各项功用看来，我们说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是中国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不算夸大的。

中国文字从甲骨文算起，到现在已经有三千四五百年的历史。三千多年来，汉字曾经经历过许多变迁：字形简化了，新字增加了，一部分旧字被淘汰了。初期的汉字是象形字，之后

产生了许多形声字,或称谐声字——我们现在使用的字,大多是形声字。但是由于古今语音的演变,许多形声字的声符已经失去了标音的作用,例如“江”、“河”,已经不念“工”、“可”。因此,正如鲁迅所说,汉字变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不十分谐声的谐声字”⁽¹⁴⁰⁾。既然字面上不容易看出它的音,就不得不另行设法补救。一种办法是“直音”,就是用甲字来注乙字的音,也就是用同音字互相注音。这个办法常常会碰到困难:有时候一个字就没有跟它同音的字,或者虽然有同音的字,这个字恰巧是个冷僻字,注了等于不注。另外一个办法是“反切”,就是用两个字来拼切一个音:上字取声,下字取韵。反切的发明可以说是拼音的萌芽。但是由于我国各地语音出入甚大,常常两个字在甲地读音相同,在乙地就有不同的读音,这种情况就更增加了直音和反切发生分歧差错的机会。尤其是无论直音或者反切,都须先认识不少字,因此对于初学文字的儿童和成人都是很难掌握的。辛亥革命⁽⁷³⁾之后,产生了注音字母,这是中国第一套由国家正式公布并且在中小学校普遍推行过的拼音字母。注音字母对于识字教育和读音统一有过一定的贡献。尽管今天看来,注音字母还有不少缺点(例如,作为各少数民族文字的共同基础和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工具,注音字母显然远不如拉丁字母),但是注音字母在历史上的功绩,我们应该加以肯定。对于近四十年来的拼音字母运动,注音字母也起了开创的作用。现在这个汉语拼音方案,它的主要功用之一是为汉字注音,在这个意义上,汉语拼音方案正是继承了直音、反切和注音字母的传统,在它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汉语拼音方案历史发展的另外一个方面,即:采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已经经历了三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一六〇五年,来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最初用拉丁字母来给汉字注音。一六二五年,另外一个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又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办法著了一部《西儒耳目资》。他们的目的是为适应外国人学习汉语汉文的需要。鸦片战争⁽¹⁴¹⁾以后,帝国主义国家派来中国的商人和传教士愈来愈多。他们为了学习汉语和传播宗教的需要,拟订了许多不同的汉语拼音方案,其中影响最大的有所谓邮政式⁽¹⁴²⁾和威妥玛式⁽¹⁴³⁾。他们还用拉丁字母拟订了我国各地方言的拼音方案,其中如闽南的白话字(即厦门话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影响最大,曾经出版过许多书籍。据说至今厦门一带还有很多人懂得这个方案,许多侨眷还用这套拉丁字母跟海外的亲属通信。从一八九二年卢懋章的切音新字⁽¹⁴⁴⁾开始,当时我国的许多爱国人士也都积极提倡文字改革,并且创制各种拼音方案。一九二六年产生了由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制订的国语罗马字⁽¹⁴⁵⁾,至一九二八年由当时南京的大学院正式公布。接着,一九三一年产生了由瞿秋白、吴玉章等制订的拉丁化新文字⁽¹⁴⁶⁾。拉丁化新文字和国语罗马字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拉丁字母式的汉语拼音方案中比较完善的两个方案。在谈到现在的拼音方案的时候,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功劳。

现在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是在过去的直音、反切以及各种拼音方案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从采用拉丁字母来说,它的历史渊源远则可以一直追溯到三百五十多年以前,近则可以说是总结了六十年来我国人民创制汉语拼音方案的经

验。这个方案，比起历史上存在过的以及目前还在沿用的各种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来，确实更加完善。自从一九五六年二月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了第一个草案以后，曾经经过全国政协和各地政协委员会所组织的各方面人士的广泛讨论，又经国务院成立的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反复审议和多次修订，去年十月间复经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讨论，才于十一月一日由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六十次会议通过，并决定登报公布，准备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讨论和批准。人们从这里不难看出，政府对于这个问题是采取了负责的和慎重的态度的，决不是少数人关起门来搞的。

汉语拼音方案采用了拉丁字母，这是不是会跟我国人民的爱国感情相抵触呢？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创一套字母或者就沿用注音字母呢？从一九五二年起，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曾经用了近三年的功夫从事于自创字母（包括修订注音字母）的工作，没有能够得到满意的结果，最后才决定放弃，采用拉丁字母。现在世界上有六十多个国家采用拉丁字母来作为书写语言的符号。例如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丹麦、瑞典、挪威、阿尔巴尼亚、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越南、印度尼西亚以及苏联的三个加盟共和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都是用的拉丁字母。他们接受了拉丁字母之后，都对它作了必要的调整或者加工，使它适应本民族语言的需要，因此都已经成为各个民族自己的字母了。另一方面，拉丁字母也因此确实可以说不是哪一个国家专有的字母，而是国际公用的符号。我们不能说法国人用的是英文字母，正象不能说英国人用的是法文字母一样。我们只能说：法国人用

的是法文字母,英国人用的是英文字母。同样,我们采用了拉丁字母,经过我们的调整使它适应了汉语的需要之后,它已经成为我们自己的汉语拼音字母,已不再是古拉丁文的字母,更不是任何一个外国的字母了。字母是拼写语音的工具,我们用它来为我们服务,正象我们采用火车、轮船、汽车、飞机(从来源来说,这些东西也都是外来的)来为我们服务一样,正如我们采用阿拉伯数字来计算,采用公历来纪年,采用公里来表示距离,采用公斤来表示重量一样。因此,这是不会使我们的爱国感情受到任何损害的。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大家都关心的,就是汉字的前途究属如何的问题。汉字在历史上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的意见都是一致的。至于汉字的前途,它是不是千秋万岁永远不变呢?还是要变呢?它是向着汉字自己的形体变化呢?还是被拼音文字代替呢?它是为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还是为另一种形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呢?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不忙作出结论。但是文字总是要变化的,拿汉字过去的变化就可以证明。将来总要变化的。而且可以说,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字形式将来总有一天会逐渐统一,甚至语言最后也会逐渐统一。人类的语言文字发展的最后趋势是逐渐接近,到最后也许就没有多大区别了。这种理想不是坏的,而是好的。至于用什么方案,现在不忙把它肯定。关于汉字的前途问题,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争鸣,我在这里不打算多谈,因为这不属于当前文字改革任务的范围。

* * *

以上所说是政府所推行的当前文字改革工作的三项任

务。我们希望,当前文字改革的工作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文字改革是关系到全国人民的一件大事,政府对它采取的步骤是很慎重的。我们愿意尽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好集思广益,大家一起来努力做好这项工作。工作中如果有缺点,我们就改正,这是我们党和政府进行各项工作的方针,对于文字改革工作也是这样。关于文字改革,过去的宣传工作做得很差,因此有许多人还不了解,甚至有不少误解。希望大家来做宣传,消除这种误解。希望大家积极支持文字改革工作,促进这一工作而不要“促退”这一工作,好使中国文字能够稳步地而又积极地得到改革,以适应六亿人民摆脱文化落后状态的需要,以适应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

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这是个别开生面的会，只请了年满六十岁的政协委员参加。陈毅和彭真两位副主席例外，他们是“候补老人”。我也只有到今年才敢召开这个会，因为今年刚过六十岁。陈毅同志喜欢用《秋江》里的一句台词，说过了六十岁又是一个新花甲。老道理新解，很好。

这几天我参加了政协分组会，见大家精神很饱满，在新中国大家都获得了新生。现在六十岁以上的委员有三百八十三人，占全体委员的三分之一还多。老年人占的比例很大也证明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扩大了。老年人得到了新生是可喜的事，但也要辩证地看问题。按照自然规律，人满了六十岁，今后的日子总是比中青年人少一点了。有些人不服老，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有时熬夜多了就会出点小毛病。陈叔老⁽¹⁴⁷⁾也不服老，最近得了流行性感冒以后，才说服老了。老年人不能和充满生命力的年轻人比，但要做到人老精神不老。据说过去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不超过四十岁。现在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改善了，医疗卫生条件也比旧社会好得多，大家精神愉

* 这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举行的茶话会上的讲话。

快,长寿的人也越来越多。希望大家在新社会多活几年,多做些事,即使多看几年也是好的。

在分组会上听了几位老先生的发言,很有感触,觉得有必要和大家谈谈工作安排的问题,希望过了六十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这是从已故的程砚秋⁽¹³⁴⁾同志那里得到的启示。程砚秋同志的艺术修养很高,解放后在政治上和作风上也有很大进步,但总还是有点孤僻。在旧社会,他是孤身奋斗出来的,养成了洁身自好的习气,不大收徒弟,因此他的唱腔也就流传不广。解放以后,我曾劝他收徒弟。今年纪念他逝世一周年时,算了一下,他的徒弟不过十几个。程派唱腔又难学,徒弟们还没有学得好,他就去世了,录下来的唱片也不多。从这个问题联想到,凡有一技之长的老年人,总是多给社会留下一些东西好。

在座的委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具体工作岗位的,担任着科学、医药、工程、教育等方面的工作。这部分同志很忙,有的连写东西的时间也没有。老舍⁽¹¹⁶⁾同志有一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将”了我一“军”,要求给他安排些时间搞业务。对这部分同志要加以照顾,不要弄得太紧张。高龄的委员精力集中使用,工作的年头可以更长一些。到各地视察既是政协委员的权利,也是他们的义务,但是要量力而行,有的可以不去,也可以就近视察。这次张文白⁽¹⁴⁸⁾先生提出在北京附近视察,我们就赞成。以后,可以把老年人组织在一起视察,少看多休息,不能和年轻人一样对待。另一种是年老体弱没有具体工作岗位的,但他们都有一定的知识和经验。过去这方面的工作组织得不好,没有能使他们的力量发挥出来。许多人在历史、科技、文

化、艺术或其他方面是有研究的，如果自己不能动笔，可以带徒弟写点东西。

我们都是过六十岁的人了，至少是戊戌年出生的。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记载下来。在座的都经历过四个朝代：清朝、北洋军阀政府⁽⁶⁾、国民党政府和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史料很值得收集。时间过得很快，开国至今已经十年了，如果不抓紧，有些史料就收集不到了。五四运动⁽³⁹⁾距今才四十年，那时候的事情现在的青年们已经不大了解了，对甲午战争⁽³⁴⁾、戊戌变法⁽¹⁴⁹⁾的情况他们就更不熟悉了。现在当然首先要研究现实问题，反映新的情况，但对过去的东西也需要研究，新的东西总是从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过去编的府志、县志，保留了许多有用的史料。收集旧社会的典型事迹也很有价值，如近百年来有代表性的人物、家庭和家族的情况就值得研究，看看他们是如何产生、发展和衰亡的。那些典型人物，他们所代表的那个社会虽然灭亡了，有的本人也死亡了，但事迹可以作为史料记载下来。我国大小凉山有过半奴隶制，现在已经进行了民主改革。西藏是农奴制，再过几年也要改革的。有些东西不赶快记载下来就会消失。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载下来。要勇于暴露旧的东西，五四时代就提倡叛逆精神。一个人的转变不是偶然的。我如果有时间，也愿意写点东西暴露自己的封建家庭。对袁世凯⁽⁴³⁾我不熟悉，谁要写蒋介石的历史，我还可以供给一些资料，两次国共合作我和他来往不少。暴露旧的东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割断历史。人们都赞扬我国的古代文化，其中就包括很丰富的历史记

载，不仅有正史，还有野史、笔记等。汉文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要把自己所掌握的历史遗产贡献出来。

顾颉刚⁽¹⁵⁰⁾先生说他想做些考据，但是政治运动很多，虽然有所得，却把时间都占了，在考据方面的贡献就少了。做考据工作只靠个人不行，要组织起来，也可以带点徒弟。

写东西不一定只限于文化史。在座的有搞军事的，可以写军事史，如从八旗⁽¹⁵¹⁾、绿营⁽¹⁵²⁾、湘军⁽¹⁵³⁾、淮军⁽¹⁵⁴⁾、新军⁽¹⁵⁵⁾一直到国民党军队的发展史，都可以写。在座的还有不少工商业者，可以写我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也可以写其中的一个行业，如银行、纺织业等。其他如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也都可以写。

政协是联系各方面的，要注意组织这项工作。全国政协要开常委会，成立工作组，其中有收集历史资料的组。各位委员回去，可以利用地方政协和文史馆两个机构做做这项工作。在具体做法上要从容一点，不要象青年人那样，喜欢放“卫星”⁽¹⁵⁶⁾，也不要规定一个月写多少字，有精力的时候可以多做些。收集史料的工作一定要从容一点。

昨天有两个黄埔军校⁽¹⁵⁷⁾的朋友讲起三二〇事变⁽¹⁵⁸⁾和皖南事变⁽¹⁵⁹⁾，听起来很有味，但我因有事只听了一个半小时就告辞了。有些朋友的观点不一定正确，那可以共同研究，但先要把史料记载下来。例如昨天两个朋友讲的三二〇事变的情况就可以补充已有史料的不足。他们说，在事变发生前一星期蒋介石想走。乍一听不容易理解，这次事变是蒋介石向共产党的进攻，怎么他又想跑走呢？青年人听了根本不会相信，但根据蒋介石一贯的作风来看，这是可能的。蒋介石在陈炯明⁽¹⁶⁰⁾、

孙中山手下时都曾拂袖而去。在黄埔军校时他同苏联顾问闹翻了，也是走了又请回来的。他当权后，这种事又有过三次：一九二七年下野去日本，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前躲回奉化，一九四九年和平谈判时退居幕后要李宗仁代总统。他常以退为进。三二〇事变前他可能想走，等到摸清我们毫无戒备的时候，就大举进攻。历史是曲折的。我早说过蒋介石是最好的反面教员。蒋介石这一集团是很有些东西可写的，在座的不少人熟悉这方面的情况。

今天梁思成⁽¹⁶¹⁾先生没有来，康同璧⁽¹⁶²⁾先生来了，他们二位如果对维新派⁽¹⁶³⁾有兴趣也可以写。去年学术界对戊戌变法作了评价⁽¹⁶⁴⁾，也还可以重新估量。国外有专门研究戊戌变法的，但我国研究这个问题的人很少。

现在先提一提这件事，大家好作安排，具体的组织工作由政协常委会秘书处与各方面联系。

上面这些话可能对六十岁以上的人有些用，所以耽误大家不少时间。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四日、十五日)

中央常委要我讲一下国际关系,主要是共产国际⁽¹⁶⁵⁾和我们党的关系。

我先概括地讲六点看法:

一、共产国际的成立和解散,都是必要的。共产国际从成立到解散共存在二十四年(一九一九——一九四三),三个八年。毛泽东同志说它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共产国际的成立,当然是必要的。它对各国党的建立和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各国党成长了,成熟了,共产国际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共产国际在建立的初期,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推动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那时,尽管列宁有那么高的威望,但共产国际是民主集中地决定问题的,各国党的代表可以纷纷议论,各抒所见,非常活跃。共产国际划清了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界限,也批判了“左”派幼稚病,发扬了国际主义精神,动员了各国革命人民拥护苏联,支持了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民族革命运动。

* 这是在中共中央于北戴河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委书记会议上所做报告的节录。

共产国际的解散也很适时。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作了一个决议，说对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不要去干涉，以后也的确放手了一些。但是这时，共产国际的存在还需要，它在反法西斯和建立统一战线的斗争中起了积极的作用。苏德战争爆发之后，到了一九四三年六月，共产国际就解散了。

共产国际的缺点和错误，特别在中期的缺点和错误，概括地说是：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布置代替了原则的指导，变成了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使各国党不能独立自主，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

这是对共产国际的一个粗浅的总评。

二、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人民自己的实践。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补充和发展。要在实践中总结自己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中国党的经验很丰富。中国党虽然犯过几次“左”的和右的路线错误，但也有很重要的正面的经验。

三、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党自己独立思考。只有独立思考，才有可能避免国际的坏的经验在本国重犯，使国际的好的经验在本国得以发展。据我所了解，不独立思考、盲从迷信的人是很多的，破除迷信、独立思考是很不容易的。当然独立思考并不等于狂妄自大，唯心武断，拒绝国际提出的好的意见。陈独秀⁽⁴⁰⁾是狂妄自大、唯心武断的。李立三⁽¹⁶⁶⁾同志也是这样，他提出夺取武汉，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一省数省的胜利就是全国胜利的开始；打下武汉再和共产国际算帐；中国革命起来了，要苏联出兵；中国革命胜利，英、美、法等

国的资产阶级都要濒于末日，世界革命就会起来。现在立三同志看一看这些话，他自己也会发笑的。

四、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自己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毛泽东同志说，两个大国的革命胜利，即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都是在没有共产国际的时候取得的。在现在的情况下，成立国际组织，相互间总是不容易做到平等。不仅在政治上，就是在经济上也是如此。

五、研究国际的经验，要全面地看问题。斯大林管事的时间长，缺点错误多一些，但是在斯大林那个时期也并不都是不好的。就是在共产国际中期和斯大林的晚年，他也是支持革命的多，不许革命的少。我们顶一顶，他还是可以接受一点意见，也可以含蓄地承认一点错误。他的怀疑一经实践证明不对，看法也可以改变。例如他怀疑我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怀疑我们对于帝国主义不斗争，一到抗美援朝⁽²⁶⁾，他的看法就改变了。斯大林还是讲理的。当然，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有错误，但中国革命中的错误主要应该由中国同志负责，犯不犯错误主要还是决定于我们自己。我们过去犯的错误已经认识了，纠正了，革命已经胜利了。

六、团结高于一切，国际主义万岁。这是原则，过去如此，现在也应该如此。所谓团结，是在原则基础上的团结。有分歧，我们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同时批评要注意场合，要心平气和，摆事实，讲道理。如果批评或斗争都不生效，也需要等待，需要时间。中国党在这方面有很丰富的经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八年中犯了三次“左”倾错误⁽¹⁶⁷⁾，从遵义会议⁽⁹²⁾开

始到七大⁽¹⁵⁾，经过十年之久才解决了问题。一个党如此，何况国际？我们要举团结的旗帜。这主要是对于苏联千百万党员、两亿人民，各兄弟党的党员，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要革命的人民。

下面分几个时期讲一讲共产国际和我们党的关系。

(一) 共产国际的初期（一九一九年三月——一九二七年七月）。

这个时期，共产国际的工作对于中国革命，还是有益的多。当然，也有个别的原则问题的错误。

一九一九年三月共产国际成立后，就派人到各国访贤，做工作。在中国，他们不仅找了陈独秀、李大钊⁽⁴⁸⁾，还找过江亢虎⁽¹⁶⁸⁾、黄介民⁽¹⁶⁹⁾和戴季陶⁽¹⁷⁰⁾；在北方找过吴佩孚⁽¹⁷¹⁾，在南方找了孙中山。中国有五四运动⁽³⁹⁾的基础，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推动下，很快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党很快地走到了群众斗争中去。这时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问题的次数也逐渐多起来了。一九二〇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一年的第三次代表大会，都讨论了东方革命问题。一九二二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认真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以后就大量吸收中国的知识分子到莫斯科去学习。一九二三年共产国际作了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同时共产党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还讨论了中国搞土地革命的问题，并发来了指示。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召开三大⁽¹⁷²⁾。当时党内有“左”的和右的两种思想：一种以陈独秀为代表，认为中国现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种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只是帮忙，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

根本没有提；一种以张国焘⁽¹⁷³⁾为代表，认为中国共产党员只能少数人加入国民党，工人不能参加。实际上，这两种思想都是不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党的四大的决议对这两种思想都批评了，但是并没有解决问题。现在看来，批评也没有重点。当时群众斗争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但是在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领导下，在关键问题上掌不好舵。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国民党内的右派已经比过去嚣张得多，如西山会议派⁽¹⁷⁴⁾。但在此以前广东打商团⁽¹⁷⁵⁾，东征陈炯明⁽¹⁶⁰⁾等等，左派力量大大发展。当时的政策应该是支持左派，排斥右派，这是有可能实现的。但陈独秀却要让右派回去，并且要保证他们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结果右派的气焰高涨。在军事上，我们也让步。蒋介石进攻，我们党没有警惕，他制造了三月二十日的中山舰事件⁽¹⁵⁸⁾，把我们党在军队中的力量搞掉了一部分。当时我们并不是没有力量，应该反击，但是没有反击。结果使我们党在军队中的力量仅仅留下了一个独立团⁽¹⁷⁶⁾，这个团到了武汉发展成两个师。北伐的时候，我们应该争取群众，争取军队。可是，这边北伐，那边上海的《向导》反映陈独秀的主张，反对北伐，说现在是军阀战争，广东不应该北伐，应该防御，应该搞群众斗争。我们党放弃了对北伐战争的领导。土地革命轰轰烈烈起来了，毛泽东同志的文章⁽¹⁷⁷⁾出来了，但是党中央不支持。当时，陈独秀的确是有点怕革命，怕群众。当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对中国问题作了一些不正确的分析，六、七、八三次会议对我国阶级力量的分析都有错误。特别是一九二七年五月第八次会议，认为资产阶级都叛变了。到了武汉政府叛变⁽¹⁷⁸⁾之后，共产国际又认为，小资产阶级也离开

革命了。在领导权问题上，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的时候，无产阶级的领导已经有了雏形，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共产党已经起了领导作用。本来我们应该在广东革命政权的时候就抓军队，而且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党中央在那个时候放弃了领导权。这时列宁去世了，斯大林跟他们党内的反对派斗争很激烈，对中国革命的情况不大了解，方针也不大明确。当时我国革命的中心在广东，党的中心也应该在广东才好领导。但是党的中心在上海。请陈独秀到广东去，他也不去。两个中心常常发生矛盾。直到打下武汉很久，党的中心才移到武汉。所以，第一个时期还是中国党的领导人应负更多的责任。那时，毛泽东同志的威信还没有建立，也不可能建立。当时党的领导人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也不高，还有各种派别性，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更助长了派别性，这就影响了党在政治、思想上的发展。

(二) 共产国际的中期（一九二七年七月——一九三五年七月）。

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基本上是错误的，对我们中国党影响最大。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汉政府叛变革命，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破产。在这样一个紧要关头，七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央来信。这封信强调了革命的前途，而对革命的动力和阶级关系分析得不正确，说中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叛变了。对革命的任务，提出了七条：第一，退出武汉政府；第二，发表宣言；第三，不要退出国民党，在国民党内搞左派；第四，工人斗争；第五，武装工农；第六，党可能转入地下；第七，反机会主义。这七条，对搞军队、搞地方政权和深入土地革命

没有重视，而当时恰恰应该是搞军队、搞地方政权和深入土地革命。

反对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联系到组织问题。共产国际派来的鲍罗廷⁽¹⁷⁹⁾直接干涉中国党的内部事务，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组织了一个临时中央常委。这是仓促通过的。七月十三日中央有个声明，只提了退出武汉政府。当时我们党还有一点武装力量，如叶挺的部队⁽¹⁸⁰⁾，所以决定举行南昌起义⁽¹⁸¹⁾。南昌起义的目的是南进汕头，占领海口，然后到广州。南昌起义本身是正确的，但在领导思想上有错误：单纯军事行动，中心是城市观点，没有跟当地农民结合起来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当时，共产国际派了几个人来，在罗米那兹⁽¹⁸²⁾的指导下，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¹⁸³⁾。八七会议在反对机会主义这一点上是痛快淋漓的，但在怎样跟土地革命结合起来，深入群众斗争，建立军队、政权、根据地这些重要问题上没有作出正确的总结和指示，没有提出明确的任务。张太雷⁽¹⁸⁴⁾到汕头给我们传达八七会议，只批评了机会主义，没有提出如何做的问题。我自己当时是城市观点，没有从上海起义和南昌起义中取得经验，上山搞农村斗争。

中国革命失败，反对派攻击斯大林更凶。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连写了几篇文章⁽¹⁸⁵⁾驳反对派，其中对中国革命的理论的分析，形势的估计，许多是不合实际的。他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先后都离开革命阵营了，但是中国的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来，并且有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势。在共产国际、斯大林的理论分析和形势估计的影响下，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扩大会议就搞了盲动主义，号召到处暴动，认为

革命形势还是高潮。在组织上，处分了不少人，最主要的是开除谭平山⁽¹⁸⁶⁾，对毛泽东同志和我们这些人都有处分。十一月中央会议决定组织广州暴动⁽¹⁸⁷⁾，也没有明确的方向。参与指导广州暴动的有一个德国人，还有一个苏联人。广州暴动失败，太雷同志牺牲后，中央把立三同志派到香港去领导广东的工作，这时是盲动主义的最高峰。盲动主义在广东搞得最厉害，广东干部牺牲得最多。当时的路线，根本没有接受上海、南昌、广州暴动的教训，仍然要到处搞暴动，结果使革命力量特别是白区革命力量受到了很大损失。当时在组织上还搞了一条，叫作领导干部工人化，使领导机关更加混乱，宗派性增加了。这个根也是从共产国际的指示来的。

现在讲一下中共六大⁽¹⁸⁸⁾。六大是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的决议召开的。中共有一个代表团，其中有向忠发⁽¹⁸⁹⁾等人，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六大的召开，首先去的代表就有问题。当时强调工人化，在七十五个代表中，有四十一个工人，后来叛变的十六个代表中，有十四个工人。当时共产国际指导六大工作的人，一个是布哈林⁽¹⁹⁰⁾，还有一个法国同志，还有陶里亚蒂⁽¹⁹¹⁾，但做实际工作的是米夫⁽¹⁹²⁾。在选举中央委员的时候，只强调工人成份，中央委员二十几个人中，很多是工人，而当时党内真正有威信同志有些没有被选入。会后，瞿秋白⁽¹⁹³⁾、张国焘留莫斯科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六大的决议，对中国革命的性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任务（反帝反封建）等的分析是正确的，但是对于阶级关系等问题则作了不正确的分析，认为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都叛变革命了。在土地问题上，只提了没收地主阶级的土

地交农民代表会议处理；对军事问题没有强调指出。六大后，中山大学里以王明⁽¹⁹⁴⁾为首的宗派，集中力量反对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中山大学是一九二五年在莫斯科创办的，米夫做副校长，吸收了大革命时期党的一些干部和青年去学习，其中有王明这么一些人，还吸收了国民党的一些左派。在中山大学内，宗派斗争很厉害。六大后，中山大学的宗派斗争继续发展。王明宗派反对中国代表团，实质是反对党中央，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央不行了，要换人。到了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再加上联共（布）清党的影响，就搞得更混乱了，对有一点可疑的就开除，还流放了一部分。

六大以后，共产国际派了一个波兰同志和一个德国同志来中国。到了一九二九年，共产国际陆续来了四封信。第一封信的内容是反右倾，第二封信的内容是反对联合富农，第三封信的内容是赤色工会公开，第四封信的内容是反改组派（汪精卫、陈公博）⁽¹⁹⁵⁾和第三种力量。这四封信，对立三路线都有影响。第四封信就号召中国搞政治罢工，准备革命，说直接革命形势快到了。

我一九三〇年三月动身去共产国际。七月，我见了斯大林，斯大林对在中国进行的军事斗争很重视。当时产生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共产国际的决议还附了东方部的六个决议⁽¹⁹⁶⁾。斯大林说，这么多决议拿到中国太多了，作为草案拿去吧。国内，六月十一日产生了立三路线。立三路线提出，要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一省数省的胜利就是全国革命的开始。同时在全国布置暴动，并提出夺取武汉、南昌、长沙等大城市的计划。后来打下了长沙，于是

在八月一日、三日，在上海连着开了两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立三说，打下武汉再和共产国际算帐。立三路线持续时间只有三四个月，但使很多地方的党组织受到很大损失，所以，九月就开了三中全会。三中全会还有“左”的东西，因为三中全会是传达共产国际上述决议案的。会上，向忠发和我做了报告，秋白做了结论，立三发了言。会上对立三的批评很尖锐，不过后来在会议决议上写的并不那么尖锐。三中全会在组织上也有些错误，例如批评了何孟雄⁽¹⁹⁷⁾，也批评了陈绍禹（王明），这些批评，也有对的，也有错的。三中全会补了一批中央委员，就是没有补何孟雄，其实那个时候他的意见还是对的居多。向各地派“钦差大臣”，从三中全会就开始了。当时，共产国际说中共中央不重视苏区，所以中央就往苏区派了不少人，使苏区受到了影响。

一九三〇年十月共产国际来信，说中央不对，是调和路线。王明他们就闹起来了。米夫一来，更造成了党内的危机。王明写了小册子⁽¹⁹⁸⁾，要求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撤换中央的领导。所以，召开了四中全会。四中全会，我们起草了决议，不被采用，米夫自己起草了决议。三中全会是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的。四中全会也是根据这个决议案的，再加上国际的信，用极左反对立三路线的“左”，作了决议。四中全会后，王明的小册子更加发挥了作用。他站在更“左”的立场来反对立三的“右倾”和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形成了更“左”的路线，再加上中央几个负责人叛变，使我们党受到了很大的破坏。

一九三一年八月，米夫回去了。共产国际的八月决议批评

了三中全会，说四中全会后，中国党更加健全了。实际上，四中全会后，中国党更加混乱了。四中全会把我保留在政治局，把秋白去掉了。以后，王明到了共产国际，张国焘、陈昌浩⁽¹⁹⁹⁾到了鄂豫皖苏区，我到了中央苏区。当时，中央只留少数人，多数派到各地去，抓各地的权。在上海组织了一个临时中央。这个临时中央，共产国际是批准了的。临时中央有一个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一月又有一个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当时要求争取一省数省的首要胜利，要求攻打中心城市，对于正确的同志，如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指责他们“右倾”。宁都会议⁽²⁰⁰⁾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军队的领导被取消了。一九三三年又反对罗明路线⁽²⁰¹⁾，反对邓、毛、谢、古⁽²⁰²⁾，正确的同志都受到打击。搞得最凶的是江西，因为临时中央一九三三年初到了江西，执行国际路线。结果使党在白区的力量几乎损失百分之百，苏区的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当时在军事上有个李德⁽²⁰³⁾，他虽然是个顾问，却成了太上皇，他说了算。他和博古⁽²⁰⁴⁾的军事路线相合，一直搞到遵义会议。当时的军事路线执行的结果是退出江西，被迫长征。现在看来，当时不退出江西是不可能的。到了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才在军事上纠正了错误路线，挽救了中国革命。没有遵义会议，中国革命不知道要推迟多久。有了遵义会议，虽然长征中受了损失，又遇到了张国焘分裂党另立“中央”，但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战胜了狂风巨浪，克服了党内的危机。

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指导在中期是有很大错误的。中国党在这个时期犯了那么多错误，使中国革命受到了那么大的

损失，我们中国人当然要负责，但与共产国际有很大的关系。

（三）共产国际的后期（一九三五年——一九四三年）。

这个时期，中国党与共产国际联系少了。一九三五年七八月，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斯大林更多地注意国内问题，共产国际由季米特洛夫⁽²⁰⁵⁾领导。当时通过了一个决议，说国际执委会要把工作重心转到规定国际工人运动基本政治路线及策略路线方面去，一般不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当时，共产国际搞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中国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合。西安事变⁽²⁰⁶⁾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抓起来，共产国际公开说张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抓蒋介石是适应日本的要求。这个判断是完全错误的。西安事变，我们处理得还是比较好的。

这个时期，中国党由毛泽东同志当家了，但是共产国际对我们中国党还有影响。主要的问题是第二次王明路线⁽²⁰⁷⁾。一九三七年年底王明从共产国际回来，说他跟斯大林谈过话。他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说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中国优秀青年的总汇。王明回来后，主持了长江局，蒙蔽了一批人，搞了第二次王明路线。第二次王明路线虽然时间不长，但对北方，对新四军，对上海，都有影响。第二次王明路线与共产国际不无关系。斯大林信任王明，季米特洛夫和王明的关系也好。后来我去莫斯科对季米特洛夫谈王明的错误，季米特洛夫听了还表示惊讶。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在我们党内形成了一个新的局面。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王明，很多干部逐渐觉悟了，王明就逐步地孤立了。当时蒋介石也不要王明，连个部长都没有给他当。毛泽东同志说，

要是给他一个部长当，也许情形更坏。

一九三九年，希特勒德国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了，由于苏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资本主义各国党处境很不利，思想也很混乱。毛泽东同志九月一日有个《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²⁰⁸⁾，我把它带到共产国际，发给各兄弟党。共产国际很称赞，说中国党领导正确，给了他们很大支持。

在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对我们党的内部事务还是有些干涉，甚至在组织上也还有些干涉。但这个时期比共产国际初期对我们党的干涉少，比中期就更少。后来战争打起来，对我们党的干涉就很少了。我们中国党这时已经成熟，和共产国际的来往不多了。到了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就解散了。

加强调查研究

(一九六一年三月、五月)

调查研究, 实事求是*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九日)

毛泽东同志这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²⁰⁹⁾, 讲的是世界观, 也是方法论。我们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读它。这篇文章现在读起来, 还是对症下药的。毛泽东同志一向提倡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从延安整风⁽¹⁴⁾到七大⁽¹⁵⁾, 到全国解放, 我们发扬了这种精神, 取得了全国胜利。进城以后, 特别是这几年来, 我们调查研究较少, 实事求是也差, 因而“五风”⁽²¹⁰⁾刮起来就不容易一下子得到纠正。

毛泽东同志最近几次讲到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讲究实事求是; 又说, 右要反, “左”也要反, 有“左”就反“左”, 有右就反右。是好是坏, 要从客观存在出发, 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进行调查研究, 必须实事求是。我们下去调查, 必须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和比较。事物总存在内在的矛盾, 要分别主次; 总有几个侧面, 要进行解剖。各人所处的环境总有局限性, 要从多

* 这是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南、华北小组会上的讲话节录。

方面观察问题；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不同的意见，这样才利于综合。事物总是发展的，有进步和落后，有一般和特殊，有真和假，要进行比较，才能看透。下去调查，要敢于正视困难，解决困难。一个困难问题解决了，新的困难问题又来了。共产党人就是为不断克服困难，继续前进而存在的。畏难苟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

我们下去调查要坚守毛泽东同志的三条原则：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就是民主集中，它不但是组织原则，也是工作原则。智慧是从群众中来的，但对群众的意见领导方面还要加工，然后回到群众中去考验，在这基础上再加工。脱离我们的基本阶级群众，就会丧失党的基础。尾巴主义，随着群众跑，就会放弃党的领导。目前的毛病，还是我们发号施令太多，走群众路线太少。

关于食堂和评工记分等问题的调查^{*}

（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

主席给李井泉和陈正人同志的信⁽²¹¹⁾ 六日早上我就看到了。我到邯郸之后，听了三天汇报，就到武安县伯延公社，现在已经有五天了。五天中，我找了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群众谈了话，开了座谈会。现在有下面四个问题简要地向主席汇报一下。

* 这是在河北省邯郸地区农村调查期间给毛泽东的电话汇报记录。

(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我正在一个食堂搞试点,解决如何把食堂散好和如何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

(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²¹²⁾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现在社员正在展开讨论。

(三)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⁸⁴⁾时评工记分的办法,但是已有发展。办法是:包产到生产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因此,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四)邯郸专区旱灾严重,看来麦子产量很低,甚至有的颗粒不收,棉花和秋季作物还有希望。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

我明天还要看一个食堂,八日返回北京,帮助陈总⁽²¹³⁾解决出席日内瓦会议⁽²¹⁴⁾的一些问题。以后再给主席写报告。问题解决了之后,我还要返回邯郸。

我到邯郸之前,已经派许明⁽²¹⁵⁾同志带领一个工作组在这里工作了二十天。

接见嵯峨浩⁽²¹⁶⁾、溥杰⁽²¹⁷⁾、 溥仪⁽²¹⁸⁾等人的谈话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日)

听说嵯峨尚子⁽²¹⁹⁾夫人同宫下明治⁽²²⁰⁾先生后天就要走了,本来想晚一点见你们,这样就不能不提前。

欢迎你们到中国来!你们在日本可能听说中国的生活很困难,其实也没有什么。两年来的灾荒,是带来些困难,粮食少了一些,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商品比以前少一些,但是经过两年来的努力,恢复了不少。

听说媯生⁽²²¹⁾来后讲中国人面孔黑。溥仪先生、溥杰先生的面孔的确比过去黑了一些,身体也结实了一些。黑是健康的表现,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黄种人,被称为有色人种,不会变成白种人。世界上有黑种人、黄种人、白种人和棕种人。不管是哪种人,相互间都应该是平等的。但现在还有差别,还存在着种族歧视。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最黑的人最受压迫,最有前途,最有希望。非洲有两亿多人口,是未开发的处女地,资源很丰富,现在经济发展不如欧洲,但后来居上,将来会赶上的。世界上开发较早的地方是欧洲,但很多资源快开发完了。开发最少的地方是非洲,非洲有煤、铁砂、石油和稀有金属等,很丰富。北美的加拿大也开发了不少,美国的石油开发早,浪费也

大。亚洲和拉丁美洲则是半开发的地区。这些未开发和半开发的地区，民族独立了，外国不能干涉了，自己管理自己了，是统统要开发的，所以说是后来居上。到那一天，我们的态度仍然是平等待人，有无相通。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肤色，四海之内皆兄弟。到那时帝国主义不存在了，世界大同了，不过这大概要到二十一世纪以后才可以看到。我是看不到了，载涛⁽²²²⁾先生你大概也看不到了，老舍⁽¹¹⁶⁾先生与我同年，大概也看不到了，年轻的人有希望看见。我们共产党的目的就是要把世界搞得美好，使大家都能活下去，而且过得好。

今天在座的有过去的皇帝、皇族，现在都生活在一起，这有一个条件，大家平等。以前日本也有贵族，比如西园寺⁽²²³⁾就是公爵的后代，但他不愿意要这个爵位了。尚子夫人、浩夫人、干子⁽²²⁴⁾夫人都是侯爵的后代。载涛是贝勒⁽²²⁵⁾，他是光绪的弟弟，宣统的叔叔。溥仪先生是皇帝，“满洲国”⁽²²⁶⁾我们不承认，但宣统我们是承认的。溥杰是皇帝的弟弟，嫪生是日本贵族的外甥女，又是中国皇族的女儿。溥仪、溥杰的弟弟妹妹过去也都是皇族。现在变化了。溥仪先生研究热带植物，还能劳动，自愿参加劳动，对劳动有兴趣。溥杰先生在景山公园研究园艺，半天工作，你还要照顾一下你的家庭。弟弟妹妹的情况，那是你们都知道的了。三妹是东城区的政协委员，我是全国政协的主席，从这一点说，我们还是同事。五妹曾做过服务员，现在做会计，她完全是自我奋斗，过去我们不知道。六妹是画家，字写得很好，现在是艺术家了。七妹是小学校的教导主任，模范工作者。你们在街上走，谁能认出来是过去的皇族呢？妹夫们也都有了变化。过去这些皇族、官僚、贵族，今天

都变化了，当了工人、职员或教员。

现在介绍一下满族的杰出人物老舍先生。他是一位名作家。辛亥革命⁽⁷³⁾后，若讲自己是满族人就会受欺侮，受歧视，所以他就不愿意讲。他有许多著名作品，如《骆驼祥子》、《龙须沟》等等。老舍夫人是位画家，中年学画，拜齐白石⁽²²⁷⁾为师，现在和陈半丁⁽²²⁸⁾、于非闇⁽²²⁹⁾等画家合作绘巨幅的国画。

再介绍一下，这是程砚秋夫人。程砚秋⁽¹³⁴⁾是中国著名的京剧演员，也是满族人。解放后他非常努力，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七年我和贺龙⁽²³⁰⁾元帅介绍他入了党，可惜第二年他就去世了。浩夫人你有听唱片的爱好吗？（浩：很喜欢。）我可以送几张程砚秋的唱片给你，我很喜欢听他的唱片，睡不好觉时，就听一听。旧社会他们被叫作戏子，受人歧视，我们称他们是艺术家，都是平等的。

我还介绍一位照顾我们夫妻的护士，她也是满族人，自己不说，被我认出来了。在座的汉族同志很多，就不一一介绍了。中国旧社会，等级森严，不平等。清朝时我们这些人要见溥仪非下跪不可，也根本见不到。辛亥革命后就变了，但只变了一点，推翻了清政府的压迫，代之以少数汉人的统治，而且更凶。北洋军阀⁽⁶⁾是年年打仗，国民党统治也是战争不断，搞得民不聊生。只有中国革命胜利了，社会才变了，全中国人民都平等了。中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是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自己奋斗出来的，不是外来力量强加的。我们觉得这样做很心安，很高兴。请大家想想，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在推翻了封建制度、建立了共和国以后，以前的皇帝还能存在，还给以平等地位？例如英国的查理一世⁽²³¹⁾、法国的路易十

六⁽²³²⁾、德国的威廉二世⁽²³³⁾、埃及的王室⁽²³⁴⁾等等，他们哪里去了呢？可以比较一下。（溥仪：世界有史以来没有过。）这是我们国家的政策，当然也要本人努力争取，大家合作。浩夫人请放心，我们不会歧视你的，尚子夫人和宫下先生回国以后请告诉日本朋友，浩夫人是不会受到歧视的。（尚子：在总理的帮助之下，浩才能到中国来，非常感谢。）这不是我个人的帮助，这是国家的政策。（对嵯峨浩）你的死去的女儿慧生给我写过信，我同意她和她父亲通信。她是一个很勇敢的青年，是否有她的照片，送给我一张作纪念。

现在谈谈满族的问题。满族统治阶级入关统治中国近三百年，奴役各族人民，虽然曾使中国一度强盛，但最终还是衰败了，这应由清朝的皇帝和少数贵族负责，满族人民是不用负责的，他们也同样受到灾难。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是对的。溥仪先生当时才几岁，他也不能负责。载涛先生当时是大臣，要负一部分责任。至于“满洲国”时代，溥仪、溥杰都应该负责，当然更大的责任应由日本军国主义来负。溥仪、溥杰合作的书⁽²³⁵⁾揭露了这一点。你们的书应该修改一下再出版，书里自我批评太多了。那些事情都过去了。新中国成立十一年啦，中国人民对清朝的残酷统治和压迫，印象已经淡了，记得的人也不多了，但历史还是要按照事实来写。清朝亡了，说明它不好，这一点历史已经做了结论。

现在的问题，是要恢复满族应有的地位。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政府歧视满族，满人不敢承认自己是满族，几乎完全和汉人同化了，分不清了。民族将来是要互相同化的，这是自然发展的结果，但不能歧视，不能强制。因

此现在还要把满族恢复起来，事实上一九四九年以后已开始这样做了。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它做了许多坏事，所以灭亡了。但也做了几件好事：第一件，把中国许多兄弟民族联在一起，把中国的版图确定下来了，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第二件，清朝为了要长期统治，减低了田赋，使农民能够休养生息，增加了人口，发展到四万万人，给现在的六亿五千万人口打下了基础。第三件，清朝同时采用满文和汉文，使两种文化逐渐融合接近，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清朝在确定版图、增加人口、发展文化这三方面做了好事。康熙懂得天文、地理、数学，很有学问。俄国彼得大帝和康熙是同时代的人，因为俄国地处欧洲，手工业比较发达，他汲取了西欧的经验，发展了工商业。中国当时封建经济的统治比较稳固，工商业不发达，康熙只致力于发展封建文化。清朝所做的坏事，历史已经做了结论，用不着多提，做的好事是应该讲一下的。汉族是个大民族，也做了很多好事，这就不用提了。这个思想不是我的，是毛主席多次讲过的。我说这些话的意思，是要说明就是和满族人结婚了也用不着自卑；我称赞了清朝做的好事，也不要骄傲。

浩夫人是日本人，同中国人结了婚，现在已经是中国人了，我欢迎你做中国人，参加中国的社会活动。

我讲的这样多，浩夫人还要再看一看，看一年、三年、五年、十年，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哪一年觉得不适宜了，什么时候都可以回去。如果回到日本，比较一下，觉得中国好，还可以再来。来去自由，我可以保证，我可以签字，我相信你不会要我签字的。媪生愿意回去，可以让她回去，不要勉强她留下。青

年人变化多，以后想来，随时都可以申请护照。如果不来中国，同日本人结婚，又有什么不好？唐太宗把公主嫁给西藏王，汉藏通婚。嵯峨家把女儿嫁给爱新觉罗家。爱新觉罗家的女儿又嫁给日本人，有什么不好呢？

现在再来谈谈日本问题吧。浩夫人想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其实，你和中国人结婚，今天又到中国来，这就是中日友好的象征。日本军国主义从一八九四年至一九四五年，损害了中国人民。日本经过明治维新⁽⁵⁷⁾前进了一步，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搞明治维新的人物是有功劳的。日本比中国前进了一步，但是日本的资产阶级还有封建尾巴，后来逐步发展到军国主义，侵略朝鲜、中国，向外扩张，这是坏事。一八九四年⁽²³⁶⁾、九一八⁽²³⁷⁾、七七⁽³⁵⁾，再加上“满洲国”，使中国人民受到很大损害。最近以大谷莹润⁽²³⁸⁾为首的代表团把中国在日本殉难的烈士名单送来，我们很感谢。解放十年来，有上万的日本朋友见到毛主席、刘主席和我，表示谢罪。我们说这已经过去了，中日两国有近两千年的来往，发展了经济文化交流，同近两千年比起来，五十年的时间是很短暂的，而且已经成为过去。我们应该往前看，应该努力促进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恢复邦交，发展经济文化交流。我们并不总盯着过去的事情。毛主席说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是一件坏事，但它唤起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日本军国主义者认为中国人民是蠢才，是可欺侮的。事实并不如此。中国人民觉醒了，掀起了抗日运动，进行了抗日战争，一盘散沙团结起来了，睡狮觉醒了。这就是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团结组织起来了。土肥原⁽²³⁹⁾、冈村宁次⁽²⁴⁰⁾、东条英机⁽²⁴¹⁾、板垣征四

郎⁽²⁴²⁾等都不能破坏中国人民的团结,中国人民从来没有这样团结过。我们对日本人民毫无怨恨,日本人民也同样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皇族、华族⁽²⁴³⁾也好,资产阶级也好,劳动人民也好,只要愿意同中国友好,我们都和他友好。参加过日本侵略政府的成员,只要他们赞成中日友好,我们仍然欢迎他们,如远藤三郎⁽²⁴⁴⁾先生、辻政信⁽²⁴⁵⁾先生、高碓达之助⁽²⁴⁶⁾先生和久原房之助⁽²⁴⁷⁾先生,我们都欢迎过他们。日本朋友来中国的,左、中、右都有,我们对日本朋友是门户开放的。我们不但欢迎共产党、社会党,就是为日本政府做情报工作的人,我们也让他来。

浩夫人回来了,愿意做个中国人,愿意为促进中日两国友好、恢复邦交而努力,我很欢迎。关于你回来的问题,你的丈夫和溥仪是踌躇的,他们担心中国目前有困难,比日本的生活水平低,但是少数人的生活是可以照顾的。你刚从生活水平高的日本来,还不习惯,需要照顾,将来习惯了,就不用照顾了。西园寺先生是贵族,但他不愿意过贵族生活,愿意到生活水平低的中国来,这还不是为了和平吗?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 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

引 言

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现在却有好多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想，总还是想的，主要是不敢说不敢做，少了两个“敢”字。为什么会这样呢？毛主席一九五八年在南宁会议上就提出敢想敢说敢做，八大二次会议更正式提出，敢想敢说敢做要同求实精神结合，建立在科学预见之上。但是，事实上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想得、说得、做得偏了一些是难免的，这并不要紧，只要允许批评自由，就可以得到纠正。只许一人言，不许众人言，岂不成了“一言堂”么？“一言堂”从何而来？是和领导有关的，所以，我们要造成一种民主风气。我首先声明，今天我的讲话允许大家思考、讨论、批判、否定、肯定。“一言堂”，说出一句话来就是百分之百正确，天下没有这种事情。人们不仅在犯错误的时候要讲出不正确的话，即使在正确的时候也会有些话讲得不恰当，过火一些，这就要允许批评。一

个人不要给自己打保票。奉劝作家同志，你们也不要企图一挥而就。伟大的政治家、艺术家对自己作品的修改工作都是非常严肃的。毛主席经常说，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都是精心修改的。毛主席自己也是这样，他写的东西很多是几易其稿的。所以，我们要造成一种风气，我们所发表的意见，都允许大家讨论、商榷。

我在一九五九年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方针的谈话^[248]，从今天水平来看，也不一定都是对的，里面也会有过头或不足的地方。使我难过的是，讲了以后得不到反应，打入“冷宫”，这就叫人不免有点情绪了。这次你们要求谈一次，我就谈一谈。心有所感，言之为快。但不可能什么都讲对了，有些问题是可以商榷、批判的，主要是引起同志们的共同讨论。我们要造成民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的作风；改变干部的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我们常常同文艺界朋友接触，如果我们发表的意见不允许怀疑、商量，那还有什么研究、商讨呢？我们的讲话又不是党正式批准的。即使是党已经研究通过的东西，也允许提意见。中央工作会议正式通过的东西都允许讨论，允许提意见，加以修改，为什么我个人的意见就不能讨论修改呢？我们要造成风气，大家都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探讨问题，为了把文艺工作搞好，把文艺政策执行好。在这些方面各有所见，为什么不能讨论呢？我今天的讲话，你们做了记录带回去，希望你们谈谈，把意见寄来。但是如果你们寄来的意见都是“完全同意”、“完全拥护”、“指示正确”之类，我就不看。这并不是说你们讲假话，而是因为看了没意思。如

果你们有不同的见解，有提出商量的问题，就写信寄来。

民主作风必须从我们这些人做起，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象我今天的讲话，只有两天时间考虑，是不成熟的。当然，讲话里有些是关于党的方针政策、关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但不少是根据你们所反映的问题做准备的。如果把这次讲话比作人形，那就只是一个胎儿，甚至是不足月的胎儿，能不能长大成人，现在还不知道。你们提出意见来，就可以使我在下一个场合讲得好一些。我们要学习毛主席。毛主席对每一个问题总要反复讲多次，我们常常听他反复讲一个问题，而每次都有新的发展。他希望我们提出意见，吸收我们的意见进行修改。毛主席这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作风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学习毛主席，就要学习他的这种作风。在我们的工作中要允许别人提出不同意见，才能树立好风气。总之，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允许有不同的意见，这才是社会主义的自由，才有心情舒畅，实现毛主席所说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我希望经过这次会议能够造成这样一种空气，收到这样一种效果。

三年来，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结果反而束缚思想。其实人家也还在想，只是不敢说不敢做。人又不是石头，哪有不思想的道理。现在我们要使人们把所想的都说出来做出来。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首先是有个框子，非要人家这样说这样做不可，不合的就不行。有了一个主观的框子就据以去抓辫子，一切从他的主观主义、片面性、形而上学出

发，也不经过调查，他主观上以为“右倾”，就断定是“右倾”。对《达吉和她的父亲》，认为是“温情主义”，先立下这个框子，问题就来了，就要反对作者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感谢上海的同志，你们建议我看《达吉和她的父亲》，我看了，小说和电影都看了，这是一个好作品。可是有一个框子定在那里，小说上写到汉族老人找到女儿要回女儿，有人便说这是“人性论”。赵丹同志和黄宗英同志看电影时流了泪，我昨天看电影也几乎流泪，但没有流下来。为什么没有流下来呢？因为导演的手法使你想哭而哭不出来，把你的感情限制住了。例如女儿要离开彝族老汉时，我们激动得要哭，而银幕上的人却别转身子，用手蒙住脸，不让观众看到她在流泪。思想上的束缚到了这种程度，我们要哭了，他却不让我们哭出来，无产阶级感情也不是这样的嘛！听说导演提心吊胆，直到有的同志说了好，他才放下心来。导演在那个地方不敢放开手。这不是批评王家乙同志，而是说这里有框子，“父女相会哭出来就是人性论”，于是导演的处理就不敢让他们哭。一切都套上“人性论”，不好。其实关于人性论的问题早在二十年前就解决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就说，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可是现在还有人在那里定框子，一个框子把什么都框住了，人家所说所做不合他的框子，就给戴帽子，“人性论”、“人类之爱”、“温情主义”等等都戴上去了。先是抓辫子，抓住辫子就从思想上政治上给戴帽子，从组织上打棍子，而这些都是从主观的框子出发的，是从定义出发的，那种定义又是错误的，并不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有挖根子。一是联系历史。不论讲了几句什么话，都要

联系历史检查,这叫人怎样办呢?二是联系家庭,挖出身的根子。我们认为动机与效果是统一的,不能不问效果而只从动机上去推测。追根子,联系历史是可以的,但主要应该看今天的表现;联系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也是可以的,但主要应该看本人。历史和出身可以作连带的研究,因为我们从旧社会来,旧社会使我们身上带有旧的东西,有毛病,这必须承认,但不能随便联系,主要应根据今天的表现、本人的表现去判断。先定一个框子,拿框子去套,接着是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那就不好了。

马克思主义是有框子的。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框子,我们有的的是大框子。我们要改造整个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个框子该有多大!我们还要改造自然,这又是多么大的框子!无产阶级世界观是最科学、最伟大的世界观,拿过去的种种世界观同它比较,都渺小得很。只有我们才能改造整个社会、整个世界,揭示未来。我们有的的是最伟大的框子。把这个伟大的框子改变成为形而上学、主观主义的小框子,是错误的。我们也不一般地反对抓辫子,我们要抓大辫子,抓那种政治上反动的大辫子,那种“白发三千丈”的辫子。例如一九五七年对于资产阶级右派,他们猖狂进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云压城城欲摧”,于是抓住辫子予以反击⁽²⁴⁹⁾。对于根子也不是不要研究,上面已经分析过,应当对历史和出身作连带的研究,但主要还是看本人、看今天。戴帽子,如果确是右派,就要戴帽子,只是不可乱戴。现在的问题正是乱戴帽子,把一句话的错误、一种想法的错误,甚至把那种本来是允许的、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各种说法想法,也都看成毒草、邪道,那就不对

了。打棍子就更加要慎重。即使他错了，只要他愿意改也还要允许他改，一时改不过来的还要等待，不能随便开除党籍，那是不慎重的做法。我们还是要“一看二帮”嘛！所以，我不是主张无产阶级可以不要框子，不抓辫子，不联系出身、历史，应该戴的帽子也不戴，应该执行处分的也不处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那种错误的、不适当的东西在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一来就“五子登科”⁽²⁵⁰⁾，这种风气不好。现在要把这种风气反过来，但反过来并不能推翻那些大框子、大辫子之类的问题。比如出身、历史，就应当交代，使大家知道。大家帮助自己改正错误，错误的东西光靠个人在那里想，是不容易改掉的，要靠众人帮助。所以，那些大的原则还是应该坚持的。只有把那种坏的、不好的偏向去掉，正风才能建立起来，才能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我希望这次会议能够收到这样的效果，首先从我们领导者改起，提倡这种正确的风气。

以上是开场白，是引言，下面讲六个问题，如果时间来得及，最后还讲一讲关于话剧的一些意见。

一 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问题

物质生产的某些规律，同样适用于精神生产。搞得过头，精神生产也会受到损害，甚至损害更大。一九五九年我曾讲过，不能老去催作家，叫他赶写稿子。当然，有些稿子也要赶，例如报纸的社论，为了适应瞬息万变的国际斗争形势，必

须赶写,以便配合斗争。但是我们也有一个传统,如果写得不好,宁肯晚一天见报,也要把它改好。所以外国人常说我们发表意见晚。连国际斗争方面都可以这样做,国内的精神生产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搞指标、订计划、保证完成、一催再催,这对于精神生产者是苦恼的事。我说过,在文艺工作方面我有过一个错误,就是提倡大拍艺术性纪录片。艺术性纪录片是可以拍的,但提倡太过也不行。我们提出一九五八年拍八十部,结果下面就搞出了一百零三部,其中就有粗制滥造、浪费劳动力、占用材料的,当然也有拍得好的。总之,要求得过多,就违背了多快好省的辩证结合。多快好省,要算总帐,算大帐,不能从每个人来提要求。比如张水华同志,你拍影片习惯于慢一点搞,应当允许慢一点,不必要求很快拍出来。又如做诗,我们的领导人中,陈毅⁽²¹³⁾同志喜欢写诗,写得很快,是多产作家,是捷才。毛主席则不同,他要孕育得很成熟才写出来,写得较少,而气魄雄伟、诗意盎然。当然,陈毅同志的诗也很有诗意。我们不能要求毛主席一天写一首诗,也不必干涉陈毅同志,叫他少写。精神生产是不能划一化地要求的。但是把全国的精神生产加在一起,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仍是丰富多采的。国画,象展出的江苏国画家《山河新貌》画展,就是很丰富的。我不赞成说只有江苏的国画好,虽然我是江苏人。应该说全国各地都有很好的国画。精神生产是不能限时间限数量的。要从全国作综合的计算,而且要集中力量,以求搞出更好的东西来。这方面的问题应该讲清楚。过高的指标,过严的要求,有时反而束缚了精神产品的生产。

有的同志提出,在精神上、物质上部有退赔问题,我支持

这个意见。当然，怎么退赔还有待各部门的研究。例如，人家的意见是对的，你说他错了，批判了他，使人家的的心情很不舒畅，难道不应该检讨一下吗？又如献稿费问题，人家本来是按照规定的标准领的稿费，但你却规定要献出百分之几十，这个规定又没有经过批准，而且，即使批准了，也不一定就合适。比如农村，农民手里的粮食，可以提出若干作为公社、大队的储备粮，也可以出售一部分，但出售的收入应该按工分分给农民，这是他的劳动所得。当然，也要有不同对待，如果是占用工作时间，影响本身工作的质量而写出的，就要有所不同。业余时间写作所得，就不能无偿占有。据说有人说，究竟谁的稿费归了公已经查不清了，不好退赔。这种话是领导者的话，是找出借口来不想退赔。实际上人家心里是有数的。所以还是应当退赔，退赔多少则可以公议。又如平调了作家的房子，为什么不应该退还给本人住呢？

文艺部门也有个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问题。过去搞得多了，不合乎巩固、提高的精神。文教队伍搞大了，事业搞多了，包括教育、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就应该同样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我们要求中央文教部门搞一个规划，提请地方同志们讨论，加以约束。据说，有些地方、有些方面不愿意退下来。我看还是要从实际情形出发，要区别情况，有的是群众的爱好和自愿，有的是领导的要求。群众自己爱好，愿意保留一个流动剧团，大家出股子养活一个剧团，在社队之间巡回演出，这样的剧团就可以保留下来。我们允许集体所有制，为什么剧团都要全民所有呢？当然，集体所有制的剧团，应该防止旧势力复活，不能让班主、把头拿高薪。

剧团工作是精神劳动，应该是主要演员、艺术水平真正高的人多劳多得。要允许他们搞合作社性质的剧团，而由地方党委和文化行政部门加以指导。这是一种，是根据群众的需要、为群众服务的。另外有一种，中央各部、地县领导机关，一定要搞一个戏班子，为少数人服务，这就要干涉，不允许保留。保留这种剧团是搞干部特殊化。剧团主要是为群众服务的，虽然也可以作些内部演出，但是应当有个界限。文化部门应在党委宣传部门指导之下订一个规划，脱离物质生产专搞精神生产的人不能太多。至于业余的，群众自己办，又不影响生产和工作，应该允许办。我们普及文化，主要还是靠业余活动来实现。

总之，三年来的工作中出了一些毛病，需要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精神生产方面也不例外，同样需要规划一下。

二 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问题

说明一下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曲折。党在七届二中全会⁽³⁾时就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解放以后，经过“三反”⁽⁷⁷⁾“五反”⁽⁷⁴⁾，证明了这一点。合作化后一个时期，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来势很猛、很广，可能认为我们改造旧社会所收到的成效很大，对阶级斗争在程度上有所忽视。毛主席预见到这个问题，一九五六年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其中就讲到革命与反革命、统一战线等问题；一九五七年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阐

述更清楚了。果然，不出毛主席所料，右派猖狂进攻，证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阶级斗争的面也许缩小了，但有时斗争还会很尖锐。阶级敌人在我们有困难、有缺点、有弱点时，就会猖狂进攻。但我们不能因为有阶级斗争就忽略统一战线，对资产阶级没有分析，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有所动摇，或有所偏颇。

阶级斗争有政治上的和思想上的，还有旧社会的习惯势力方面的。

属于政治性质的，敌视社会主义、要乘机复辟的，就要坚决反对，如右派猖狂进攻。去年农村中个别地区反革命分子篡夺领导权，企图复辟；或者待机而动，有时暗藏，有时公开，有时隐蔽活动，到一定阶段猖狂地复辟。当然这只是一小部分地区。由于全国人民政权的巩固，他们是挑不起大事来的。这一类阶级斗争是敌我矛盾性质的，要警惕，麻痹了就会上当。这种问题在全国任何方面都存在，但为数极少。我们要站在人民立场上随时警惕，特别是当我们有困难、有缺点错误时，更要注意。

思想斗争是长期任务。对于思想上作风上的问题，搞精神生产的文艺工作者要尤其注意。肃清旧的思想、作风是长期的。我们从旧社会来，受过旧学校的教育，今天的青年也会受家庭、社会旧思想残余的影响，所以旧思想旧作风在人们的脑子里或多或少地存在。思想是先驱，但真正肃清旧思想残余，要在新的基础全部完成之后才有可能。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要慢慢改造，不能急，对于搞自然科学工作的人更是如此。拿医生来说，我曾遇到过这样的医生，技术是第一流的，是为社

会主义服务的,但脑子里有上帝,这并不妨碍他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我们家中有的老人也信鬼神,也还可以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嘛!这是可以允许存在的,是无法勉强的。有些老人终其生而无法改变,带着迷信思想进棺材,但他活着的时候仍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思想影响他的作风,由于信上帝就要去教堂,或到吃饭时要默祷一下,有些同志对此也看不惯,斗他一下,造成了社会上不必要的紧张和不安。当然,作为教师、作家,以此去教育青年,或搬上舞台影响青年,那就不好了。但要他们彻底改造,是不容易的。就以我们来说,是否对辩证唯物主义就认识得那么清楚了?思想上是否一点旧的东西都没有了?很难说,也要不断改造。前面所讲到的缺点与错误,还不都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所引起的?但你能说我们的党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我们的干部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吗?人总是有缺点的。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但从我们个人来说,还是不成熟、不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还会如此,如何能责备一般的非党朋友呢?自己虚心一些,帮助别人就好办一些。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新社会,哪能一下子就改造好?

习惯势力,是指从旧社会带来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从小做惯了,不以为是不对的。例如我们领导同志走到哪里,就把众人拦住,为我们让路,你要平等待人,就不行,有些人一定要把你搞得很特殊。我也不反对必要的警惕性,但本来是坐在一起的,为什么要隔开来?我看这就是一种习惯势力,是封建的,有时不自觉地就出来了。习惯势力在中国很多,如农村中急起来打人,就是一种习惯势力。这是从旧社会带来

的，现在还有人用这种方法来对待群众。戏里还有打板子的。《十五贯》⁽¹¹⁾很好，把打板子放到幕后去了。对于反革命分子，毛主席一贯强调反对用刑。对反革命尚且要教育，何况人民内部呢！但习惯势力常常是不自觉的，还要打人。最近知道有许多戏被禁演，也是按习惯势力去看问题，例如《秦香莲》，有人认为也不能演，真是岂有此理！批判陈士美杀妻灭子，他的行为是很恶毒的，为何不能演？这与离婚再娶有什么关系？这就是封建思想的影响。许多戏对男女关系问题总是骂女的，对男人总是原谅的。我认为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把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习惯改掉嘛！不要以为干部就没有封建思想，这不是封建思想是什么？讲起道理，大家都同意，但一遇到具体事情，习惯势力就来了。不要以为我们这一代可以肃清，到二十一世纪也许能创造出新的习惯来，但在这一世纪，不要指望全部肃清旧的习惯势力。这里涉及阶级斗争问题。我们有时话说得不恰当，或开玩笑把话说错了，这是常有的。如果把这种情况都当作严重的政治问题斗争，人家就不能活了。所以，要区别何为政治问题，何为思想问题，何为习惯势力，不能不分清问题性质事事斗争。有的已形成习惯，要长期才能改变。新风气不树立起来，旧习惯势力去不了。总之，对阶级斗争要具体分析，不要把对反革命的警惕性和人民内部的思想改造混同起来。否则，毛主席所说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就不能形成。

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任务。这里所说的改造，是从团结出发，并且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不要怕听改造这两个

字。改造,包括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习惯势力的改造。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以为自己改造完成了,不需要再改造了,他就不是好的共产党员。我常说,改造没个完,一直到死,那时也不能说改造够了,只是比现在好一点。改造是好事,不是坏事,是为了更便于团结,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除阶级敌人外,全国人民大团结。至于思想上是否有唯心主义、旧习惯势力,那是人民内部的问题,这些人都在我们团结之内。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是个相当长的时期,有人却估计只要四年零八十天。从一九四九年算起就是十三年。我看几个十三年也不止,也许更长,现在不好“算命”。思想改造的目的,是为了使我们的事业发展得更好,把文艺工作做得更好,为了文艺工作者的团结,而不是“五子登科”,使大家很紧张。进行这项工作要和风细雨。毛主席讲:凡是思想改造学习,都要和风细雨,采取神仙会的形式漫谈。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很多,从领导到文艺队伍,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些问题不是一次会议能够完全解决的,大家回去还要去漫谈,不能性急,不能又出一个新框子,要长期做下去,要有耐心,才能心情愉快。

一方面要进行阶级斗争,一方面要巩固统一战线。党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团结合作,就是统一战线。不仅民主革命时期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如此。李维汉⁽²⁵¹⁾同志在这方面已经发表了文章,在此不再多说。有一个时期好象觉得一九五六年关于知识分子的那些问题可以不讲了,不是的,那些原则仍然存在,只是三年来由于忙,这方面有所疏忽,讲得少了些。现在经过反右派,有了三年大跃进⁽²⁵²⁾的

经验,彼此更了解了。三年大跃进有顺利的经验,也有困难的经验,要更团结,更有信心,统一战线应更扩大、更深入,而不是更缩小、更淡漠。这一点要肯定下来。要使得我们的经济、文化得到更好的发展,就要一方面在政治上提高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警惕性,一方面更加扩大和加强内部的团结。

三 为谁服务的问题

为谁服务是个政治标准,任何文艺都有个为谁服务的问题。毛主席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就是我们的政治标准。为工农兵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人民大众服务,这只是文艺的政治标准。政治标准不等于一切,还有艺术标准,还有个如何服务的问题。服务是用文艺去服务,要通过文艺的形式。文艺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能框起来。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肯定的,至于表现形式,是多样的。文艺形式至少象周扬⁽²⁵³⁾同志报告中说的,有文学、戏剧、音乐、美术、舞蹈、电影、曲艺、摄影等方面,细分还不止,如戏曲中就有很多剧种。文艺为政治服务,要通过形象,通过形象思维才能把思想表现出来。无论是音乐语言,还是绘画语言,都要通过形象、典型来表现,没有了形象,文艺本身就不存在,本身都没有了,还谈什么为政治服务呢?标语口号不是文艺。象我今天的讲话,只能叫漫谈,就不能叫艺术。既然如此,文艺要好好为人民服务,就要通过实践,到群众中去考验。你这个形象是否站得住,是否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不是领导批准可以算数的。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回

答,而不是由领导回答;可是目前领导决定多于群众批准。当然,如果有政治错误,反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言,不能任其自由泛滥,但这终究是少数。我看到四川一个材料。文化部一位副部长到四川说:川剧落后。得罪了四川人。当时一位同志回答:落后不落后要由四川七千万人去回答、去决定。我看这位同志很勇敢,回答得好!人民喜闻乐见,你不喜欢,你算老几?上海人喜爱评弹、淮剧、越剧,要你北京人去批准干什么?领导人可以有喜好,有人爱看戏,有人爱看画,有人爱古董,这有什么关系?我们看了戏说好,不一定就好,我们的话靠不住,各人有各人的爱好,怎能作为标准?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只要人民爱好,就有价值;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就许可存在,没有权力去禁演。艺术家要面对人民,而不是只面对领导。这是不是主张反对领导呢?不是的。领导在政治上有权提意见,要政治挂帅,但政治挂帅主要是看它是香花还是毒草,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政治上的敏锐要放在这个方面。至于艺术方面,我们懂得很少。

我们懂得少,发言权很少,不要过多干涉。在座的同志都是做领导的人,希望你们干涉少些,当然不是要你们不负责任。第一,要负责任;第二,要干涉少些。负责任主要指政治上,不要放任毒草,放任修正主义。但是一定要区分清楚,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是修正主义。有人问我:文艺的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是不是统一的?是辩证的统一。群众看戏、看电影是要从中得到娱乐和休息,你通过典型化的形象表演,教育寓于其中,寓于娱乐之中。当然要多样化,不能老是打仗。朱德同志说,我打了一辈子仗,想看点不打仗的片子。如果天天让人家看打

仗的片子，人家就不爱看，就要去看香港片，这只能说明电影局的工作没做好；反之，一个打仗的片子也没有，让青年丧失战斗性，也不好。现代片多少，历史片多少，要大体上有个比例。至于题材，完全可以允许作者自由选择。古代没有社会主义，但有中国人民优良的传统，人民创造了许多他们理想的人物，如武松、穆桂英等，还有不少神话，都可以写。我们要有个比例，这种比例在不同地区、不同剧种中也要有所不同。有的剧种只宜于演抒情戏，打仗戏只能偶尔演之，如越剧团都是女同志，演《红楼梦》很舒服，演《追鱼》也还可以，演武打戏如《泗州城》就有困难。越剧是嵊县“的笃班”⁽²⁵⁴⁾发展而来的，后来又吸收了绍兴大班⁽²⁵⁵⁾的一些东西。原来有男演员或全是男演员，后来都变成女演员演，现在既允许有男女同台的，也允许全是女演员的。由于剧种不同，要因地因时制宜，在安排剧目时必须考虑群众的需要。又如电影，农村、工厂宜于看什么片子，要不同对待，但总要对生活有所调剂，一方面要歌颂劳动光荣，一方面也必须有些抒情的、轻松的东西。对于青年，要告诉他们革命之甘苦，社会主义来之不易，表现革命斗争艰难困苦的戏要多演，使他们不要忘本。创作题材要有个大体的比例，文化部在这方面要多做些工作，但决不能强迫命令和干涉过多。听上海的同志讲，有几个作者对党委领导工作根本不熟悉，硬要他去写党委领导，结果天天对他讲党委挂帅如何重要，还是写不出来，不如让他写写别的，发挥所长。本来是各显所长，百花齐放，结果成了一花独放，拿一个政治框子，把大家束缚住了。陈云同志关于曲艺的意见⁽²⁵⁶⁾是有道理的。他身体很弱，很疲劳，需要另一种生活

环境来休息，听听评弹，以便为党做更多的工作。评弹也有教育作用，艺术上很有特点，一个人表演很多角色，做多方面的表演。我过去对评弹不懂，现在觉得比北方大鼓还好，当然各有千秋。但我仍愿意听北方曲艺，因为听评弹的苏州口音比较费力，所以不如陈云同志热心。不能一定要我和陈云同志一样，也不能因而说我不赞成评弹，各取所需嘛！观众看戏看电影就是各取所需的。又如，我愿看散文、短篇，看长篇小说就没有时间。有时想看看不费脑筋的戏剧和电影，借以休息，但是不行，还是要想，要提意见，其实这是多余的，今后要解放一下，反正专家很多嘛！我们看了戏之后，受不受感染呢？也是受感染的。《达吉和她的父亲》，小说和电影我都看了，各有所长。小说比较粗犷，表现了彝族人民的性格，但粗糙些。电影加工较小说好，但到后来该哭时不敢哭，受了束缚，大概是怕“温情主义”。我们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人性，为什么有顾虑？是有一种压力。把“人性论”、“人类之爱”、“人道主义”、“功利主义”都弄乱了。这些问题，毛主席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时就回答了。我们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我们讲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人性、友爱和人道主义。现在的搞法，不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和阶级观点来看问题，而是用唯心主义观点来看问题。以政治代替文艺，就没有文艺了，还有什么看头呢！

还有，搞文化工作要研究经济基础。如周扬同志所说，思想是先行，但文化建设高潮要在经济高潮之后。文化事业的发展不能漫无边际。文化事业、大专学校太多，超过经济发展的水平，就会使基础、使生产受到影响。说是为生产服务，结果适得其反，成为生产为文化服务，为文化而文化，最后消灭了文

化。普及与提高,普及就要开展群众业余活动,在此基础上提高。现在我们做过头了,文化事业搞多了,队伍搞大了,占用了劳力,影响了生产,所以要缩短战线,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四 文艺规律问题

文艺同工农业生产一样,有它客观的发展规律。当然,文艺是精神生产,它是头脑的产物,更带复杂性,更难掌握。周扬同志讲,文艺的特点是通过形象思维反映生活。毛主席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实现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我觉得现在在这方面存在如下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1. 数量和质的问题。几年来,文艺作品在数量方面搞得很多,质量不高。文艺的队伍搞得很大,水平不高。同一个剧目,到处学着上演,路子很窄。同一个题材,各地都写,大同小异。用同样的语言歌颂同一事物,把质量降低了。虽然目前文艺的数量离普及还有距离,但是当前主要的不是继续发展数量,而是要提高质量。提高质量是一件细致的工作,不能要求太急。成功的作品不是人人都能创造出来的,也不是天天都有的。优秀的作家、优秀的作品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并不很多的。当然我们要超过他们;但是也不能“人人做诗,人

人画画”，每县出一个郭沫若。这种口号是不对的。数量和质量是辩证地发展的，数量总是超过质量，好作品总是少数。但是现在质量高的东西太少了。文艺要求思想性和艺术性辩证的结合，创作好作品需要更多的准备。《社会主义好》是一首好歌，但是歌词太简单了。在大革命时有一首歌，名叫《打倒列强》，群众很爱唱。一共只有八句词：“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更简单，等于标语口号。但是那是一九二四年写的。现在过了三十七年，还是那么简单，就不好了。《社会主义好》的作词者不要紧张，我在这里不是怪作家；这是由于领导要求太急，所以只能是急就章。现在《洪湖水，浪打浪》更受群众欢迎，因为它既有革命的内容，又抒情，质量较高。这就是群众的批评，群众的选择。现在应当允许作家的写作时间多一点，不要催得太急。剧团也不要演那么多场，使演员能够劳逸结合。

2. 原料和加工的问题。普通的实际生活总是要经过加工才能成为艺术作品。作家掌握了原料以后，必须经过加工，才能写成作品。现在应当更加着重加工这一方面，因此要多给点时间。《杨门女将》这出戏如果能由梅兰芳⁽²⁵⁷⁾同志加工，可能更好些。

3. 思想和业务的问题。思想很重要，是指导，必须加强思想学习。你们是“灵魂工程师”，思想总要高些。思想水平不提高，作品不可能写好。但是除了提高思想水平以外，还要精通业务，否则思想如何表现出来呢？只懂政治，不精通业务，写出来的东西势必是标语口号，不能感人。只懂政治不

精通业务，可以去做别的工作，例如做宣传工作，不能成为艺术家。当然，宣传工作也要求有鲜明性，生动性。要精通业务，没有基本训练是不行的。作为一个艺术家，要有经验和才能，必须有很好的修养，其中包括训练，否则就不能成为一个艺术家，也不能成为评论家。我今天的讲话就只能是漫谈，而不能算作评论。因此，一定要积累经验和才能，要不断实践，在实践中接受群众的考验。我们的艺术团体到国外去，人家对我们的艺术家受到国家的重视和培养非常羡慕。我国的艺术家有广阔的发展天地，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受人赞美，就更要提高，更往上发展，所以要重视经验和才能，要重视技巧。现在不敢谈经验和才能，不敢谈技巧，有人一谈技巧，就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思想，这显然是错误的。

与此相联，红与专，论与史，文与道，都不能偏废。这些问题周扬同志在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上都讲过了。现在“白专道路”这个口号很流行。这个口号不是我们提的。

聂荣臻⁽²⁵⁸⁾同志一定要我再讲讲这个问题。什么叫做“白”呢？一个人只要在社会主义土壤上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虽然政治上学习得少，不能算“白”。只有打起白旗，反对社会主义，才是“白”。例如有个外科医生，开刀开得很好，治好了很多病人，只是政治上不大开展，因此就说他是“白专道路”，岂不是荒谬？再如有一个人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政治上懂得少一些，但是两年把导弹搞出来了，对国家很有贡献；另外一个人，天天谈政治，搞了五年也没有把导弹搞出来。你投票赞成哪一个人？我投票赞成第一个人。第二个人只好请他去当政治教员，他不能在导弹部门工作，他只能在导弹部门“捣

蛋”。毛主席说过：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我们要讲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这两个人中的第一个人对我们是有利的，对社会主义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是有利的。不讲革命的功利主义，空谈政治，不好。当然，学习政治我赞成，但是要精通业务，不能占用钻研业务的时间。

4. 批评和讨论的问题。文艺作品要容许别人批评，既有发表作品的自由，也要有批评的自由；同样，既有批评的自由，就要有讨论的自由。不论哪一方面都不能独霸文坛。我们提倡批评，也提倡百家争鸣、自由讨论。只要是在社会主义大框框中争论，你说好，我说坏，都可以。光允许批评，不允许讨论，人家就会说，还是批评家好当。

五 遗产与创造问题

毛主席说，我们应当厚今薄古。我们相信一代胜过一代。历史的发展总是今胜于古，但是古代总有一些好的东西值得继承。所以毛主席要我们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的一切有益的东西，“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使它发扬光大，一代胜过一代，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就更加发扬光大。

在中外关系上，我们是中国人，总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但是也不能排外，闭关自守，如果那样就是复古主义了。外国好的东西也要加以吸收，使它溶化在我们民族的文化里。我们的民族从来是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的。我们吸收了印度文化和朝鲜、越南、蒙古、日本的文化，也吸收了西欧的文化。但要“以我为主”，首先要把我们民族的东西搞通。学习外

国的东西要加以溶化，不要硬加。《小刀会》是一个很好的舞剧，在上海演出时，其中的《弓舞》没有女的站在男的身上那些芭蕾动作，在北京演出时加上了。事实上在太平天国时代⁽²⁵⁹⁾怎么能有这种动作呢？它同太平天国的历史背景不符合。《宝莲灯》也是如此。中国古代神话怎么能够那样演呢？也许他们考据出什么东西作为根据。一些器乐也是如此，总要点西方情调，听来不和谐。在这方面，也许我有些保守。我是主张先把本民族的东西搞通，吸收外国的东西要加以溶化，要使它们不知不觉地和我们民族的文化溶合在一起。这种溶合是化学的化合，不是物理的混合，不是把中国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焊接在一起。

不论学习古代的东西还是学习外国的东西，都是为了今天的创造，都要把它们溶化在我们的创作中。文艺总要有独创精神。也许《小刀会》中的《弓舞》，让女的蹬在男的腿上是一种创造，这可以争鸣。我认为把古代的、外国的东西吸收溶化在创作里，应该注意时代背景。写古代题材，女人不可能站在男人身上，写现代生活就不同些。据说安徽的《花鼓灯》是女人站在男人的肩膀上。但是我记得年轻时看群众跳这种舞是男扮女装的，从前根本不允许女的站在男的肩上。当然你们也可以驳我。我讲这一部分就是准备引起讨论的。

六 领导问题

三年来，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部分的。如何改正这些缺点和错误？中心问题在于领导，

在于教育，在于深入群众，总起来一句话，要实行调查研究。毛主席的工作方法论就是调查研究。做调查研究的是领导者，领导者要有自我批评精神，不是层层对下批评。

最近听周扬同志说的一句话很顺耳。他说，统一战线工作不仅统战部要做，宣传部也应当做。这话很对。本来宣传部应当广为招徕，门户洞开，但是现在党外人士不到中宣部来，可见门户不是那么洞开。统战工作不只是统战部的工作，而是全党的工作，不仅文化部、宣传部要做，组织部也要做，许多部门都要做。毛主席每年都要找章行老⁽²⁶⁰⁾谈谈教育工作。我也还要对溥仪⁽²¹⁸⁾做工作。既然把他放出来了，总要让他做点工作，发挥他的作用。改造末代皇帝，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嘛！否则为什么放他出来呢？

缺点和错误的改正要从领导做起，首先领导上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问题总是同上面有关系的。希望你们回去也这样做。文艺团体的领导也要自我批评。这样就可以解除包袱，框框就只有大的，没有小的了，辫子就不会乱抓了，根子就不会乱挖了，帽子就不会乱戴了，棍子就不会乱打了。就可以使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意气风发，使社会主义文艺更加繁荣。

光有自我批评还不行，还要深入群众。只有深入群众，才能知道自己的意见对不对。怎么办？要实行调查研究。我还要说一句，我们要进行自我批评，但是你们也不能封锁消息。不能认为这是我的工作，你不能管——“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²⁶¹⁾，这样就无法合作了！任何问题公之于众总是有好处的。这样，可以得到大家的帮助，有什么不好呢？当然，调查研

究不能成灾，事前应当有准备，应当写好提纲；还要自带粮票，注意节约。调查研究要实事求是，不能乱搞。别人的成绩，应当加以肯定。对问题要做出恰当的估计。各个地区、各个部门的情况会有所不同，有的地方是整个领导错误，有的地方是个别错误，有的地方则很好，要实事求是，分别对待。

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教育干部。毛主席说，十一年来忙于建设，对干部的教育注意不够。我今天讲这么多话，也为了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要造成一种风气，使大家敢于讲话。只要是对社会主义有利，即使思想不一致，也要说出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样，我们的干部就可以得到教育，健康的风气才能造成，社会主义的文艺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活动的天地就可以非常广阔。

七 话剧问题

最后，我还想讲一讲话剧问题。

话剧几年来有进步，但是比起其他方面来要弱一点。什么道理呢？是由于不承认基本规律，不搞基本训练，似乎演话剧很容易，只要会说话就行。话剧是一种综合艺术，它包括剧本、表演、布景、灯光、道具等等。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是语言的艺术化，话剧要通过语言打动人。话剧界的同志要我向毛主席做工作，请毛主席看话剧。我说，你们什么时候把话剧演得不象普通人说话，毛主席就会来看了。

话剧演员不仅要会说话，而且要会唱、会做，因此基本训

练的内容是很多的。但是现在不大讲基本训练，忽视话剧艺术的基本规律。话剧团体的演出任务很重，一年将近三百六十五场，弄得大家很累，没有时间钻研艺术，使话剧不能被人接受。演话剧也要有别的修养，琴棋书画都要会一点，要成为通才。演《雷雨》，不熟悉封建社会的生活，演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家庭，就不象了。

任何艺术不掌握规律，不进行基本训练，不掌握技术，是不行的。我看艺术应当苦练，这虽是从话剧讲起，但应适用于各个艺术部门。要进行基本训练，就要有时间。文化部在这方面应当有一个规划，定出一个恰当的比例。

解放以来，我们培养出很多人才，但是从发展观点来看，还是不够的。杨秋玲在香港被称为“小梅兰芳”，但是实际上她离梅兰芳还远得很。如果不给她时间加强训练，过几年也会垮的。我们培养人才不能起一个垮一个。国家培养人才也要讲“成本”，当然，不是说要搞经济核算，但是要注意这个问题。

要掌握基本规律，加强基本训练。这是第一点。

第二，演话剧要目中无人，心中有人。又无人，又有人。演员在舞台上看到台下千百双眼睛，就有些战战兢兢，当然演不好戏。因此要“目中无人”。现在剧场观众席是黑的，是为了让演员看不见观众。但是往往又产生另一种偏向：演员的心里也没有观众了。演员在台上背着观众说话，我们竖着耳朵都听不见。他们根本忘了话是要说给观众听的，戏是要给观众看的。所以演员要心中有人。

第三，对舞台，既要藐视，又要重视。所谓藐视，就是要敢

于什么角色都演，好人、坏人都演。年纪大的人演小孩也可以。《以革命的名义》中演瓦夏和别佳这两个孩子的女同志年纪都很大了，演得很好。但是光藐视不行，还要重视。舞台虽小，下面却有成千成百的人看着你，稍有疏忽，观众都会看出来的。所以要象毛主席所说的那样，把战略上藐视和战术上重视统一起来。

第四，演员自己要做到客观逼真，主观认真。象斯坦尼斯拉夫斯基⁽²⁶²⁾所说的那样完全变成角色，是不可能的。只能做到逼真。但是主观上要认真地演，演武松要象武松，演曹操要象曹操。应当是又象又不象，二者辩证地统一起来。

总之，各种事物都有它的客观规律，艺术也一样。要认真地加以研究，加以摸索，许多经验要认真加以总结。希望在这次会后，大家都来研究规律，但也不要又搞出许多框框来。

我今天所说的这些话不一定对，我是树个“的”，让大家来射，树个活靶子，让大家来攻攻。

说真话, 鼓真劲, 办实事, 收实效^{*}

(一九六二年二月三日)

我们检讨的目的, 是为了增强团结。这里, 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讲的实事求是, 也就是说真话, 鼓真劲, 办实事, 收实效。

这几年来, 党风不纯, 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要大家讲真话, 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 反对说假话。如果你乱压任务, 结果象同志们所说的, 他就会准备两本帐, 揣摩一下才讲, 看你喜欢听什么再讲什么。这的确是一个党风问题。大家都说假话, 看领导的颜色说话, 那不就同旧社会的官场习气一样了吗? 你们反映的情况我听起来觉得很痛心。你们说假话当然不对,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压你们。从现在起, 不要乱压任务、乱戴帽子了。要提倡讲真话, 即使是讲过了火的也要听。唐代皇帝李世民, 能听魏征⁽²⁶³⁾的反对意见, “兼听则明”, 把唐朝搞得兴盛起来。他们是君臣关系, 还能做到这样, 我们是同志关系, 就更应该能听真话了。

* 这是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福建组会上讲话的第四个问题: 检讨的目的。

鼓真劲。有的劲就不是真劲。象你们所说的两个工厂，一个厂踏踏实实地干，说他“没劲”，“冷冷清清”，一个厂在那里造假，却说他是“轰轰烈烈”。这是庸俗地理解了毛泽东同志讲话的精神。毛泽东同志说，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因为有上游，你才争上游。主观能动性要和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我们提倡鼓干劲，不是鼓假劲，而是鼓真劲。鼓干劲也要实事求是，有的就是鼓假劲。比如有的提倡苦干几天几夜，过年也不休息。你在那里鼓劲，他就苦战，你走了，劲也没有了，他照样休息，照样过年。

做实事。做了实事，就有实效，否则强迫命令，就会搞一些不实在的东西。这几年《人民日报》宣传了许多不恰当的口号，如拔白旗⁽²⁶⁴⁾等，他们已经做了检讨。我在这几年也开过几次大会，发了不少奖状，如果表扬的事迹是假的，你就把“奖状”摔掉。我们要做实实在在的事，做实事，收实效，才会对人民有利。

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一句成语，毛泽东同志做了新的解释，它代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根本思想。这四个字，话虽简单，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如何做到实事求是？首先要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要调查研究得好确实是不容易的，因为现在已经有四年的浮夸风气，不易一下子改变过来。少奇同志去年回湖南家乡，开始群众不敢讲真话，有人封锁了真相。我也曾到一个地方搞调查，去之前，先派了办公室的同志去，后来发现反映的材料与实际情况还是有出入。你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在战争年代，我们与老百姓住在

一起，天天见面，不分彼此，和群众的关系很密切。现在就不一样了。比如我参加你们这个会议，一进会场，你们就站起来鼓掌，我就不舒服，但是又不好阻止你们。昨天下午你们没有鼓掌，我心里就很舒畅。因为有了那么一些形式，就显得不那么亲切，不是平起平坐，而是隔了一层。当然这一层不是一道墙，是一张纸。你们也都是老革命了，参加革命都有十几年、二十几年了，为什么还会产生这个隔阂呢？我想就是因为国家大了，“官”大了，和根据地情况不一样了。所以你们鼓掌，我心里就不安。现在造成的这种形势，一定要改变，下决心改变。要搞好调查研究，就要真正联系群众。

我们要发扬民主，恢复和加强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在战争年代，军队讲民主，就能打胜仗。规模最大的是解放战争，那时军队也最讲民主，仗怎么打法，作战方案怎么定，允许连队讨论，提出意见。这是毛泽东同志的创造，也是全军的创造。军队能够讲民主，为什么党内不能讲民主呢？我以为要按党章办事。少奇同志在七大做的修改党章报告，小平同志在八大做的修改党章报告，都讲到党内民主生活问题，但这几年有的同志把它搁到一边去了。当然有些事情是中央带的头。比如开电话会议，是中央先开的，以后一层一层开下去，电话会议又无法讨论，只能层层下压，这是不对的。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的修改党章报告，对党内民主生活都有过说明。乱斗争行吗？不行。随便撤职，随便开除党籍，随便捕人、打人，都是不行的。当然有些是属于违法乱纪性质的，这不只是党内问题了。违犯了国家法律的，要按国法处理。

我们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要尽快恢复起来，毛泽东同志

的建党思想要恢复起来，现在被搁在一边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通通都要恢复起来。党内要有正常的民主生活，要实事求是，要按照党章办事。

论知识分子问题^{*}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日)

这几年，特别是近两年，从事科学工作和戏剧创作的同志很勤劳，很辛苦。虽然生活供应差，工作条件受到限制，甚至精神上也有些不愉快，但在科学工作、戏剧创作方面仍然取得了显著成绩，值得庆贺。我特别要向你们致敬。

今天能有机会和全国高级的优秀的有成就的科学工作者、戏剧写作者聚在一起谈一谈，对我个人来说是很高兴的事。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谈一个问题：知识分子问题。这个问题也包括我在内，我也是知识分子出身，谈起来会更亲切些。

一 知识分子的定义和地位

这个问题在党内部分干部中常常有不同的解释，在知识分子中也有些疑惑。现在尽我的能力作个初步解释，不能担

* 这是对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等会议代表的讲话。同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周恩来同志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做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阐明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地位和作用，明确肯定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保今天讲的都是成熟的，如讲得不恰当就改正。

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而是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一般地说，这个阶层的绝大部分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是附属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并为其服务的。在奴隶社会为奴隶主服务，在封建社会为地主阶级服务，在资本主义社会为资产阶级服务。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时，知识分子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出身于劳动人民的很少；只有剥削阶级才有条件求得知识，求得更高的知识。当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常常容易接受并传播剥削阶级的旧观点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尽管也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但总是唯心主义占上风。在旧社会，也会有一小部分知识分子能预见到真理，敢于反抗当时反动阶级的黑暗统治和压迫，为新兴的进步的阶级说话，成为革命的知识分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生长在资本主义社会，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敢于反抗当时的统治阶级，投入到新的阶级队伍中来，为新的阶级说话。他们背叛了原来的阶级，投降了进步的阶级。欧洲文艺复兴⁽⁷⁰⁾时期，中国从鸦片战争⁽¹⁴¹⁾到辛亥革命⁽⁷³⁾，都有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传播新的思想、新的学说。这些知识分子同样也遭到反动统治阶级的迫害，遭受反动知识分子的歧视和压迫。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已经处在统治地位，知识分子才转变到为人民服务。一方面旧的知识分子得到了改造，一方面又培养出了新的知识分子，两者结成社会主义的知识界。现在还存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差别。将来到共产主义社会，阶级和党派消灭了，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差别消灭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差别

也就不存在了。

以上讲的是一般情况，是从整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说的。

资本主义后期产生了殖民主义体系和帝国主义的统治。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成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个广大地区的知识分子，同帝国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相比，有很大的特殊性。他们大多数站在民族立场上，反对外国殖民者和本国的卖国贼、民族叛徒以及帝国主义直接或间接豢养的走狗，成为革命的、爱国的知识分子。就连受外国欺压的民族资产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也或先或后地站到了反帝爱国的立场上。所以毛主席再三地说，我们要团结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来反对帝国主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具体地说，是指工人、农民、进步的知识分子、进步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进步的民主人士（有一些还是封建阶级出身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就属于这种特定范围的社会阶层。

二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

中国什么时候有知识分子？讲起来很远，远在奴隶社会就有。这是属于郭老^[265]、范文澜^[266]等历史学家们研究的问题。我只讲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

（一）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无疑地都受到帝国主义、反动统治阶级的种种影响。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是封建家庭出身，头上留过辫子。存在决定意识，怎么能没有影响？

（二）我们曾为旧社会服务，纵然不是为北洋军阀^[6]或国民党直接服务，也是为旧社会服务，不能说没有受旧社会的

影响。

(三)我们都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甚至一部分人还受过封建教育,如上塾馆,拜过“天地君亲师”⁽²⁶⁷⁾,磕过头,手心挨过打,罚过跪,封建教育嘛!不过现在也还有些用处,知道些诗云子曰。解放后我去天津,回到曾读过书的南开中学,第一句话就说:“我在这里受过资产阶级的教育,但是也要感谢,当时对我有启蒙作用。”受到资产阶级教育,不能光说不好,它对我也有启发。这样说才全面一点。

这三条是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根”,这种“根”,不能否认。

还是以我为例。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我说原籍绍兴,生在淮安,江浙人。为什么这样罗嗦呢?因为我的亲兄弟、堂兄弟都是绍兴人,我不能不说原籍是绍兴,否则就有企图摆脱这种关系的嫌疑。我生在淮安,祖父当过淮安县知事,外祖父是淮阴县知事,现在还有家属在淮安,如果我不说生在淮安,和他们的历史关系也无法交代清楚。一个人的历史关系要交代清楚,这样没有坏处。不管现在情况如何,不能抹掉过去的历史。我经过革命锻炼,现在当然不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说是革命知识分子了,但写历史不能把过去那一段抹掉。毛主席很不满意有人写他的传记时,说他从小就懂得很多,什么都知道。毛主席说他小时候还烧过香。我小时候也迷信过菩萨,后来还相信过无政府主义⁽²⁶⁸⁾。五四运动⁽³⁹⁾,时,我们组织了觉悟社⁽²⁶⁹⁾。后来有人问邓颖超⁽²⁷⁰⁾:那时你们是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她回答说:还不能称为共产主义小组,是研究新思潮的一个组织。我们的社员有研究无政

府主义的，有研究基尔特社会主义⁽²⁷¹⁾的，也有研究共产主义的。以后有不少人加入了共青团和共产党。青年人不了解，以为这样说太谦虚了，其实历史是发展的，个人也是发展的。一九二〇年我到法国，还对费边社会主义⁽²⁷²⁾有过兴趣，但很快就抛弃了。我感谢刘清扬⁽²⁷³⁾和张申府⁽²⁷⁴⁾，是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的。张申府的思想很杂，研究罗素⁽²⁷⁵⁾哲学着了迷，他想把孔子、罗素、马克思、弗洛伊德⁽²⁷⁶⁾、爱因斯坦⁽²⁷⁷⁾的思想熔于一炉。

总之，有一点要肯定，大家是从旧社会来的，不管现在如何，过去都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类型。

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应该看到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压迫，因而有一部分人参加了革命，一部分人同情革命，多数人开始时对革命观望、中立，以后逐渐靠近革命。反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直接为清朝、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服务，真正成为他们的工具压迫人民的只是少数。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是如此，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如此。从鸦片战争到现在一百二十多年的历史事实证明，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都是没有前途的。溥杰⁽²¹⁷⁾过去到日本留学过，有什么作为？还是新中国改造了他，才有了用。他的叔父载涛⁽²²²⁾过去做过军谥大臣，不如现在当人大代表，可以为人民服务。在我们这里有不同等第的人，沈衡老⁽²⁷⁸⁾是进士公，黄任老⁽⁷⁹⁾是举人公，董老⁽²⁷⁹⁾是秀才公，还有翰林公⁽¹⁴⁷⁾。秀才、举人、进士、翰林都有。过去想做点事业，可是做不成，有什么办法？北洋军阀时代的李根源⁽²⁸⁰⁾是

我的“同行”，当过国务总理，能为国家民族做什么有益的事？国民党时代的行政院长翁文灏⁽⁶⁰⁾回来了，也是高级知识分子，当时跟他们走有什么出路？死心塌地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胡适⁽²⁸¹⁾，直到了结生命，还是没有出路。反过来，历史的发展证明，知识分子只有同无产阶级，同劳动人民，同共产党一道前进才有出路。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证明了这一点。

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解放前，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讲过。解放后，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上也讲过，他说：“无产阶级只有同广大的可以接受社会主义的群众结成联盟，才能形成最大多数人对于反动阶级的专政。”我们是团结全国的最大多数人，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集中，是最大多数人对少数人实行专政。人民民主专政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奴隶社会的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剥削阶级对劳动阶级的专政。他还引用列宁的话：“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是为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而成立的联盟。”⁽²⁸²⁾列宁在对“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的说明中包括了知识分子。这是讲的无产阶级同其他劳动者的联盟。中国又扩大了联盟，一直扩大到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任务，要同民族资产阶级保持政治上的联盟。同民族资产阶

级的联盟是无产阶级同非劳动者的联盟。坚持这两种联盟是我们的战略方针和长期的历史任务,在我国的统一战线中将长期起作用。对知识分子的估计要以这个为纲。这一点,党内不少干部常常不注意,解释不清楚。无产阶级根据这个既要同其他劳动者结成联盟又要同非劳动者结成联盟的方针,就提出了一个改造的任务。

(一)无产阶级首先要进行自我改造。天下没有完人,觉悟程度是逐步提高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因此要经常进行自我改造。无产阶级有自己的阶级本性,反抗剥削压迫,思想先进,但要发展成为有高度觉悟性、战斗性、组织性的阶级,也要进行自我改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生活在一个社会里,不能不受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习惯势力的影响,而且还有封建的影响。所以,无产阶级、共产党要不断消除自己队伍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把旧的东西剔除掉。只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别人。在延安整风⁽¹⁴⁾时,毛主席就首先要求党内进行学习和改造。

(二)无产阶级对其他劳动者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这主要是对农民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说的。改造什么呢?改造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习惯势力,使他们接受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观点。要求农民同农村中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影响作斗争,要求知识分子改造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习惯势力。这样,才能使他们和无产阶级一道建设社会主义,将来还要建设共产主义。

(三)无产阶级对民族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在经济上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利用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

面,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从加工定货到定股⁽²⁸³⁾定息⁽¹²⁴⁾,进而取消定息,消灭其阶级的经济基础。在政治上思想上则要改变其阶级立场和观点。这要经过长期的工作。这种工作的目的是要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人。当然,民族资产阶级也是我们的同盟者,但是属于另外一个方面的同盟者。

总起来说,无产阶级对其他劳动者或非劳动者的改造,是为了最后消灭阶级和阶层。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共产主义。到那时,工农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都不存在了。这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中间要经过许多阶段。

两种联盟的矛盾性质不一样。无产阶级同其他劳动者之间不存在对抗性的矛盾,同非劳动者之间还存在着对抗性矛盾的一面。无产阶级要消灭资产阶级,不是对抗性的吗?但我们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采取的是赎买的政策,而不是没收的办法。对农民则是逐步引导他们从个体所有制进入集体所有制,这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解决非对抗性的矛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采取说服、教育、示范、提高的办法。同样,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也要经过长期的过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通过互相学习,逐步接近,才能逐步消除的。这样看,我们同知识分子的联盟与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有根本区别的。

由于中国知识分子有上述的发展过程,使得他们也有两重性:一方面是脑力劳动者,可以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又与旧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党和国家有必要与可能对他们采取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知识分子也有必要与可能摆脱旧社会的影响,成为适应新社会需要的知识分子。所

以说，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根本政策，也是知识分子本身的根本任务。

根据这样的方针和自我改造的任务，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一九五六年我曾作过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对知识分子的状况作了初步估计。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上也说，“知识界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到一九五七年六月才发表，那时已有右派进攻⁽²⁴⁹⁾，但并不因此而改变原来的分析。他说：“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过去七年中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他们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在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这部分人目前虽然还是少数，但是正在逐渐增多。当然，知识分子中间有一些人现在仍然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这部分人只占少数。”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估计，是很清楚的。

从一九五七年到现在，知识分子受到了锻炼和考验，特别是最近两年，全国人民除少数反动分子外都经住了这种考验。我们一方面在建设中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另一方面在工作中也出现了偏差和错误，加上三年来农村灾荒，粮食和经济作物减产，城市工业生产也有些下降，市场物资供应减少，物价部分上涨，实际工资有所下降。这种情况还要持续一个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同工人、农民一样经得起考验。我们不能说没有人对这种情况有意见，意见是应该有的，大多数人是出

于关心提出改进意见，希望情况有所改善。只有极少数人幸灾乐祸。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热爱祖国的。科学工作会议的《简报》我都看了。《简报》上反映了这样的情况，大家努力工作，生活上克服困难，甚至遇到心情不怎么舒畅的事情还能克制自己。你们热爱祖国，使我们很受感动。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中国人民是从民族苦难的日子里熬出来的。在座的有的是经过几个朝代的人，看到了民族解放，人民胜利了，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经受了困难，对前途充满了信心。

从《简报》中还看到大家提出了一些善意的批评，不能不使我高兴。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知识分子队伍壮大了，从老一辈知识分子手里培养出了新一代知识分子，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都培养出了新的力量。饮水思源，是党的政治思想工作起了作用，也是知识界共同努力的结果。青年人的成长是老一辈亲手培养的，这一点要很好地向青年人讲清楚。从老知识分子身上找毛病是很容易的，但要看主导方面，要看到各有所长。比如我讲话可能不如青年人讲得流利，但是谈问题、论经验则比他们深些。如果说要互相尊重，首先要教育青年知识分子尊重老年知识分子。老年知识分子中许多人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些人加入了党，这是可喜的现象。

但是，十二年当中，甚至很长时期内，总有一小部分人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保持原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拒绝改造甚至进行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这些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是右派。毛主席对民主党派领导人曾经讲过，

现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消灭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要做“梁上君子”⁽²⁸⁴⁾，这部分知识分子应该投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承认共产党的领导，这才有出路。这话是有所指的，是在一九五七年五一前后说的，但是到六月，右派还是进攻。当时反击是必要的，但这决不会动摇我们党在整个历史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根本政策和战略方针，决不会改变无产阶级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对这些认识不清楚。

在知识分子内，也和党内一样有左、中、右。任何党派、社会团体内都有左、中、右，这是规律，是客观存在。左、中、右或者说进步、中间、保守，他们之间也会相互转化，保守可以转向进步、中间，中间、进步也会变成保守。但是有些部门和机关用左、中、右去排队就不好了。人的思想状态是会变化的，政治思想、主张经常有变化，特别是对科学上生产上许多问题的看法不同，不属于政治思想上的分野，更不能用左、中、右去划分。如在建设工作中，有个时期说高指标是正确的，低指标是保守的，这是不对的。现在钢的产量定在一千万吨以下，这不是保守，不是右倾，这样可以搞得扎实些，对建设更为有利。指标能高就高，该低就低，不能拿这些来作政治分野。

就是对一小部分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不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我们在政治上还是把他们算在联盟之内，对他们进行教育。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则作别论，那就是反革命，就是犯法了。对右派，还要给他们工作，还要容纳在统一战线之内，有的还在政协嘛。我们要团结最大多数的人，能改造的改造过来，不能改造的孤立

起来。

这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发展过程应有的认识。党没有低估知识分子的作用，党的政策是明确的。知识分子也应心安理得地知道自己的作用。

三 如何团结知识分子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我们有许多同志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用生硬的态度对待他们，不尊重他们的劳动，在科学文化工作中不适当地干预那些不应当干预的事务。所有这些缺点必须加以克服。”现在看来，毛主席这段话仍然是击中要害的，完全适合当前的情况。如何团结知识分子，应该根据毛主席的这段话去做。

首先谈一谈我们党能否领导一切。一九五七年以后，党对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进一步确立了。知识分子承认和接受党的领导，是党和人民的胜利，也是知识分子的光荣。必须肯定，党应该领导一切，党能够领导一切。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领导一切？什么是一切？这个问题正在逐步解决。我们已经制定科学工作十四条⁽²⁸⁵⁾、高等教育六十条⁽²⁸⁶⁾、工矿企业七十条⁽²⁸⁷⁾，文艺方面也提出了几个初稿⁽²⁸⁸⁾。关于党如何进行领导，存在着各种想法。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在中央领导下提出一套办法

来,征求党外朋友的意见。

下面我谈谈关于党的领导方面的问题。

第一,党的领导范围。我们说党领导一切,是说党要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是说党对各部门都可以领导,不是说一切事情都要党去管。至于具体业务,党不要干涉。人家熟悉,要信任他们。如果他们做不好,可以检查,有意见可以讲,但党委的意见不一定是对的。如果什么都管,连发戏票、导演戏都去管,结果忙得很,反而把大事丢掉了。小权过多,大权旁落,党委势必成为官僚主义、事务主义的机构。

第二,党的领导不是党员个人领导。党是一个集体,是有组织的。党的领导是组织领导,不是个人领导。党员个人怎么能领导?一个单位的个别党员,怎么能说他就是党的领导?党章没有规定党员有这样的权利,实际上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本事。尤其是一些年轻党员,应该向有经验的知识分子学习。我们过去在广州搞革命时,少年气盛,有点“乱指挥”,这种不好的传统不要学。要学毛主席好的传统——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个人没有权力领导一切,不管是谁。如果把我下放到剧团,虽然我也曾演过戏,现在必定是个蹩脚的演员,只有向人家虚心学习,哪能领导?我们到下层单位最怕听“请指示”。就有这样的党员,人家请他指示,他就俨然以领导者自居,摆出领导者姿态,发号施令。这是最坏的官僚主义者。要平等待人才是好勤务员,才不是官僚主义者。

第三,上下级要有区别。例如一个学校,党的领导是指学校党委领导,有些事情学校党委也不能解决,要请示上级党委决定。至于支部,如系支部、剧团支部、车间支部,只是起保证

监督作用，不是指挥，下命令还得要行政首长才行。

第四，党委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书记个人领导。没有经过党委讨论的大事，书记不能随便决定。行政上的事由行政决定，书记也无必要去干涉。

第五，外行领导内行要有个范围。以前我们讲过外行能领导内行，这是讲的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领导。党委书记、委员有些不懂专业，但可以超脱专业，看到全局，通过党委集体研究作出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决定或贯彻上级指示的决议。我们说外行能够领导内行，不是要外行去干涉业务，对业务确实不懂嘛。外行变成内行，要经过学习，就是学会了，也要尊重专家，尊重群众意见。有些同志说，科学研究要走群众路线，不要搞群众运动，这个说法比较恰当。科学研究不是靠突击和群众运动能解决问题的。

关于如何正确对待知识分子，我以为有六个问题要解决好：

第一，信任他们。他们承认和接受党的领导，愿为社会主义服务，愿意自我改造，党就要信任他们。你信任他，他也就信任你，彼此有了信任，就可以团结在一起工作。

第二，帮助他们。知识分子所处的环境需要党的帮助，以诚心诚意的态度去帮助他们，对工作才有好处。

第三，改善关系。过去关系不好的，应该改善，先从党委、党员方面做起，先检查自己，不能只责备人家。检查了自己就能引起共鸣。党的具体政策你在执行中有偏差和错误的，要作检查。党团结知识分子的政策，要通过党员和党组织实现。

党内有些术语不合适，每次看到心里就不安，如在一些登

记表上分“党员”、“群众”。这两个词不是同一组概念，党员、非党员才是同一组的概念。党员也是群众中的一员，包括领导人在内，不能自居于群众之上。“党员”、“群众”的分类，使党员居于群众之外、群众之上。我们犯官僚主义，一方面由于自己脱离群众忙于事务，另一方面是别人把我们封锁起来。我们也很苦。希望领导同志要自觉，不要把自己置于群众之外，不要被封锁。

第四，要解决问题。不解决问题使人感到诚意不够。问题能够解决的，一定要解决。现在问题成堆，不能一下都解决。科学工作会议的《简报》，快出到五十期了，其中提到的有些问题不可能马上都解决。但要负起责任来，力求逐步解决。

第五，一定要承认过去有错误。对于党与非党的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上级与下级的关系、各部门之间的协作关系，会上有些意见批评得很对。各级领导要以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过去对同志们批评错了的、多了的、过了的，应该道歉。党内我已道过歉，现在利用这个机会，再作个总的道歉。

第六，承认了错误还要改。只承认错误，不去改正，还是空话。凡是党和政府方面犯的的错误都要改正。改要有实际行动。

以上六个问题要解决好。

四 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

(一) 所有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在内都要自我改造。改造有

性质上和程度上的不同。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改造，是带有强迫性的，这与人民内部通过劳动、生产、学习进行的改造有性质上的不同。人民内部的改造，只有程度上的不同，没有性质上的不同。旧东西多的多改，旧东西少的少改，去掉坏的影响。

(二)思想改造是长期的。把资产阶级世界观转变为无产阶级世界观，需要有一个过程。首先是爱祖国，进一步愿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更进一步接受党的领导，逐步改变旧的立场和思想体系。就是长期在党内锻炼的同志，无产阶级世界观也不见得那么巩固。

(三)改造靠自觉。自我改造的程度如何主要决定于自觉性。

(四)改造的方法要和风细雨，不能粗暴。这样气才能顺，心情才能舒畅，才能接受帮助。帮助人不能给人“上大课”，知识分子最怕别人给他“上大课”，要促膝谈心。

(五)改造要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没有人是专门改造别人的。自居于领导，自居于改造别人的人，其实自己首先需要改造。要对这种人大声疾呼：“请你自己先改造！”任何共产党员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人生有限，知识无限，到死也学不完，改造不完。帮助人家，首先要学习人家的长处。

(六)人总有缺点的，世界上没有完人，永远不会有完人。事物总是有矛盾的，有矛盾就能促进事物发展，如果停止发展，就会灭亡。

自我改造是为了进步，是光荣的事情。现在大家肚里有

气,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帮助不够,要把这个扣子解开。毛主席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过去科学、文艺工作方面成绩是主要的,希望今后要不断改进,取得更大的成就。

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 和当前任务*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中共中央在一九六〇年下半年,对国民经济工作提出了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个方针,是在当前的条件下,具体贯彻执行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²⁸⁹⁾的方针,是一个既从当前实际情况出发、又为长远打算的积极的方针。它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主要的是,要适当地调整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相互关系,生产和基本建设的相互关系,经济事业和文教事业、国防事业的相互关系,积累和消费的相互关系,以及财政、信贷和物资的相互关系。各个经济部门和文教部门的内部,也要进行适当的调整。

在社会主义建设经过了一个非常大的发展以后,进行全面调整是十分必要的。在我国前几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发展中,出现了许多不协调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不协调的现象,为了巩固已有的成绩,为了给以后的国民经济的新的大发展创造条件,就必须用一个较长的时间,即用几年的时间,通

* 这是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内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部分的第二节。

过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

在当前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是一个中心环节。我国国民经济中出现的不协调现象,农业生产下降的影响最大。没有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多年来的经验完全证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工业为主导,而以农业为基础。我国有广大的农业,农业现在的生产水平又是很低的。在这种情况下,工业的发展不能不受农业的限制,也就是说,工业的发展规模,绝不能超过农业提供商品粮食、工业原料和其他农副产品的可能性,也绝不能挤掉农业所需要的劳动力。只有当农业生产提高以后,我国工业的发展才能得到更有利的条件。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进农业的生产条件,适当地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加强各方面、特别是重工业对农业的支援。这样,农业生产就能够逐步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能够逐步地提高。所以,我们必须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把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要地位,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次序来安排经济计划。重工业必须为农业提供越来越多的各种农具、农业机械、化学肥料、木材、燃料等等,来不断地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使农业能够为工业和城市提供越来越多的粮食、原料和其他农副产品。轻工业必须尽可能为农村提供越来越多的日用品,以利于发展城乡交流,逐步改善城乡人民的生活,增加国家建设资金的积累。

一九五八年以后几年,重工业有了巨大的发展,这是大家感到高兴的事。但是,重工业内部各行各业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在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为了

适当地发展轻工业,为了协调重工业内部各行各业的关系,我们必须放慢重工业的发展速度,有些重工业部门的生产指标,必须大幅度地下降。这样做,是十分必要的。这是因为:第一,如果继续采取过去那样高的速度发展重工业,势必妨害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妨害轻工业的发展,这不但对人民的生活不利,而且重工业本身也不可能继续高速度发展。第二,重工业内部的填平补齐,要花很大的力量,只有把那些过分突出部分的生产指标降下来,才能加强那些薄弱的部分。第三,某些产品产量的下降,是为了提高它的质量和增加它的品种。质量提高了,品种增加了,即使数量较少,也会得用得更多。例如钢材,就是这样。第四,维修好国民经济各部门急需维修的设备,是目前的一项重要工作。而要维修好设备,也必须适当减少某些产品的生产,以便腾出一些材料和生产能力,生产必要的部件、配件和零件。所以,我们在一段时间内降低重工业的某些生产指标,正是为了使整个国民经济在长远时期内能够更好地前进,使现有的生产能力真正发挥它的作用。

这几年,我们施工的建设项目很多,有些已经建成和部分建成,有些已经停建,有些还在施工。即使那些已经建成和部分建成的项目,有许多还没有建立必要的协作关系,或者设备还不配套,或者还缺乏原料、材料,都需要有一个较长的时间,进行大量的工作,才能逐步地发挥作用。因此,现在一般地不应该再增加新的项目,而且,对还在施工的项目必须逐个地进行审查,坚决地停建一切应该停建的项目,推迟一切应该推迟的项目,以便集中力量,建成那些十分必要的重要项目,并且使那些已经建成和部分建成的项目配起套来,逐步地发挥作

用。今后几年内,我们都要根据这个方针来安排基本建设,这是调整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随着农业、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调整,商业方面,财政金融方面,文化教育事业方面,也都必须进行一系列的调整工作。

一九六〇年以来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进行的情况,大体如下。

在农业方面,一九六〇年下半年,我们除了在改进农村人民公社的工作方面,进行了巨大的努力以外,还采取了一些支援农业生产第一线的有效措施。一九六一年,我们继续进行这些方面的工作,并且从城市动员了约一千万人下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最近几年从农村到城市来的,他们回去以后,加强了农业生产战线。由于贯彻执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六十条⁽²⁹⁰⁾,由于实行以生产队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农村的形势就开始好转。虽然由于自然灾害,一九六一年的夏收很差,但是全年的粮食产量比上一年要多一些。在许多地方,家禽、家畜的数量,目前正在逐渐上升。

工业的调整工作是从一九六一年开始的。我们在这一较大幅度地减少了重工业的生产任务,缩小了基本建设规模。我们努力增加日用品的生产,恢复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中共中央制订的国营工业企业和手工业的工作条例草案⁽²⁹¹⁾,对于改进工业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对于改进手工业生产,有着重要的作用。目前,工业生产下降的情况已经基本停止,产量开始稳定,有的开始上升,不少产品的质量有所提高,品种有所

增加。

这几年，我国职工人数增加了很多，就业面扩大了，使一部分家庭增加了收入。但是，职工人数和城市人口增加过多，工资总额增长过快，而农业和轻工业又减产很多。这样，商品供求之间就出现了差额，城乡供应都比较紧张，职工的实际工资有所下降，人民生活发生困难。

在商品不足的情况下，国营商业部门和有关部门做了不少的工作，加强了农副产品和工业日用品的收购；在灾区和非灾区之间组织了某些生活必需品的调剂；压缩了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学校、部队的集团购买力，腾出了一部分商品供应市场；基本上保证了城镇居民最必需的粮食、蔬菜、食油、食盐、煤炭、日用品等的定量供应。定量供应城乡居民的商品，价格基本上是稳定的。

由于连续三年灾荒，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一年，我们减少了粮食的征购数量。一九六一年我们从国际市场进口了五百万吨粮食。大家知道，全国解放以后，我国不仅不再进口粮食，而且每年有一定数量的粮食出口。现在进口粮食，虽然一时是必要的，但是，这种状况必须尽快地努力加以改变。

一九六〇年冬天，各地方有计划、有领导地开放了农村集市贸易，这对于促进农副业生产发展，活跃农村经济，起了一定的作用。现在，各地方正在根据这一段时间的经验，加强对农村集市贸易的管理。一九六一年，许多地方又恢复了农村中的供销合作社。

一九六一年，在城市中，国营商业除了平价供应的商品以外，开始出售糖果、糕点等少数几种高价商品。这是在物

资不足、购买力和商品供应量之间差额过大的情况下的一种临时性措施。

随着经济各部门调整工作的逐步展开,我们对教育、科学和其他文化事业也进行了必要的调整,适当地降低了它们的发展指标。在科学研究、高等教育方面,由于试行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规定草案⁽²⁸⁵⁾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²⁸⁶⁾,工作开始有了改进。

应该指出,我们对于调整工作的认识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在中共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以后,政府虽然做了许多工作,但是,在有些方面贯彻不力,调整不够全面,没有迅速地在应该后退的地方退够,没有迅速地在应该加强的地方充分地加强。现在,经过一段时间调整工作的实践,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了调整工作的必要性和应该采取的措施、步骤。

在一九六二年,我们必须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切实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这样的次序,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合理安排,以便集中主要力量,逐步地解决人民的吃、穿、用方面的最迫切的问题,并且逐步地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建立新的平衡。当然,这并不是说,全部调整工作今年就可以做好。我们应该在今后几年中,把调整作为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但是,今年的工作做好了,就能够为以后的调整工作打下可靠的基础,就有可能争取较快地完成调整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九六二年是调整国民经济的极关紧要的一年。

当一九六〇年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一九六二年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指标的时候,国家计划委员会即着手拟

订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由于在一九六一年继续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而且灾情更重,由于在调整工作的过程中,发生了许多新的问题,还有许多情况没有摸清楚,需要进一步研究,所以,我们编制两年调整计划的工作,还没有全部完成。国务院请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意:国务院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确定以后,把这个计划连同财政预算,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人民代表大会授权常委会审议批准。

这里要说一说当前调整工作的任务。这些任务,是在一九六二年要做的事,其中有些也是在一九六二年以后还要继续进行的。

为了做好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国务院要求各级政府机关、各行政部门的全体干部,加强调查研究,继续摸清情况,按照中共中央既定的方针、政策,在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下,扎扎实实地进行工作,特别要抓紧完成增产节约、精兵简政、稳定市场、改善供应这几个方面的任务。具体说来,有下列十项。

第一,争取农业增产,首先是争取粮食、棉花、油料的增产。

一九六一年,我国农业生产的情况已经开始好转,但是,好转的情况,在全国各地是很不平衡的。有一部分地区生产上升,大部分地区生产已经稳定下来,还有一部分灾情特别严重的地区,生产情况仍然不好。从现在的条件看,全国大多数地区要恢复到原来最高的生产水平,还需要作艰巨的努力。我们应该用一切可能的力量,争取一九六二年有一个比较好

的收成。

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首先必须增产粮食。有了粮食,才能比较迅速地恢复经济作物的生产,才能保护和增殖耕畜,发展家畜和家禽。在努力增产粮食的同时,要适当安排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保证它们逐年有所增产,以便逐步增加城乡人民的布匹、食油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合理安排种植面积和人力、畜力,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各级政府和农村人民公社,在安排的时候,要很好地同生产队商量。

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要继续贯彻执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规定,更好地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要把一切可以利用的零星小块的土地尽量利用起来,力争多种多收。要抓紧水利、积肥、选种、修补中小农具、田间管理和防治病虫害等工作,尽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要切实保护好耕畜,做好牲畜的配种繁殖和兽疫的防治工作。农村人民公社的各级干部,都要正确地领导生产,在推行各种增产措施的时候,一定要根据当时当地的条件,吸取群众的经验。

国营农场必须加强管理工作,严格实行经济核算,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农、牧业产品的商品率,完成和争取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应该注意保护林木,努力植树造林。应该努力发展畜牧业和渔业。

各级政府应该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加强对农业的支援。对于农业所急需的生产资料,特别是制造和维修中小型农具、车、船的材料,制造化肥、农药的原料,要尽可能优先保证

供应。

各级政府在安排农产品征购任务的时候，要同时安排好群众的生活。

第二，合理安排轻重工业生产，尽一切可能多增产日用品。

为了适当满足城乡人民生活的需要，扩大城乡之间的商品交换，改善市场供应的状况，我们在安排工业生产的时候，应该首先注意安排日用品的生产。轻工业部门和手工业部门，当然要努力增产日用品；重工业部门，凡是有条件的，也应该尽可能地增产适合市场需要的日用品。

由于农产品原料不足，在日用品的生产中，应该尽可能利用重工业部门生产的原料、材料。有些轻工业和重工业都需要的原料、材料，在分配的时候，应该先照顾轻工业的需要。轻工业部门和手工业部门，应该使那些原料、材料消耗低而产品质量高、品种多的企业，能够优先得到供应。

一切轻工业企业和手工业单位，一切重工业企业，都要厉行节约，争取用较少的原料、材料，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对于一切可以利用的废气、废物，应该注意回收，充分利用。

重工业部门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增产更多的化肥和农药，增产更多的中小型农具和适合需要的、质量更好的农业机械。同时，还应该为轻工业多提供原料、材料。重工业部门应该努力增产目前特别感到不足的原料、材料和燃料，并且要根据国民经济各部门设备维修和配套的需要，有计划地安排急需的备品、配件、零件和必要的辅机、主机的生产。

重工业各部门应该根据上述任务和可能条件,进行调整工作。对于那些不是当前急需、原料材料供应不足的产品,应该降低它们的生产指标,并且对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进行必要的裁并。对于那些当前各方面急需、而又供应不足的产品,应该努力增产。对于煤炭、木材等,为了保证它们能够在一定水平上持续生产,应该妥善安排它们所必需的材料、设备和投资。重工业各部门在调整工作中,都必须注意生产能力的填平补齐、成龙配套。

工业部门对于国防建设所必需的材料和设备,要注意组织生产。

一九六二年工业方面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切实按照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改进企业的经营管理。一切工业企业,都要加强责任制,加强技术管理,加强经济核算,加强劳动保护,在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这几个方面,做出显著的成绩。

交通运输部门,应该进一步整顿好运输秩序,并且切实安排好短途运输。对于车、船和铁路、公路、航路,要做好维护的工作。

第三,进一步缩短基本建设战线。

目前基本建设战线仍然过长的情况,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是不利的,我们计划再减少一些不是十分必需的基本建设项目。这样做,不仅可以腾出一定数量的材料、设备和人力,用到最急需的方面,特别是农业生产方面,而且可以集中力量,使那些最重要的建设项目,能够建成投入生产,发挥作用。

鉴于过去对基本建设项目和投资的管理不严而造成战线过长的教训，今后，一切基本建设项目和投资，都要列入国家计划。基本建设项目，都要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逐项地分级地审查、批准；没有经过审查、批准的，一律不准动工。列入国家计划的项目，各部门、各地方也要根据设备制造情况、需要的缓急和施工技术力量，进行排队，依序完成，并且保证质量。

过去两年中，我们已经停建了一些基本建设项目，今年又将停建一些项目。建设项目中途停建，是会造成一些损失的。但是，如果应该停建的还不停下来，就势必分散力量，使许多重要的工程不能迅速发挥投资效果，就会造成经济上更大的损失。当然，对于那些中途停建的项目，必须切实做好维护工作，避免损失。一切停建项目的设备和材料，必须由国家统一调剂使用。

第四，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

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这是调整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目前的城镇人口仍然过多，农业可能提供的商品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供养现有的城镇人口还有困难。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指标降低以后，现有的职工人数也还显得过多。我们的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仍然存在着机构庞大、人浮于事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计划在一九六二年继续压缩城镇人口和精简职工。

动员城镇的人口和职工，首先是动员从农村来的职工，回到农村参加生产，不仅可以加强农业生产战线，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机关的工作效率，而且可以减轻城市供应的困难，

节省国家的开支。各个部门、各个单位，应该做好动员工作和组织工作，城镇乡村密切配合，妥善安置精简下来的人员。我们希望到农村去的职工，在农业生产和建设的光荣岗位上，为国家做出新的贡献。

现在有些企业、有些部门的负责人，还没有从全局利益出发，下最大的决心精简职工。他们总想把一些以后可能有用的人力都保留下来。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当然，企业在精简职工的时候，要注意保留必要的技术骨干，但是，有些技术工人，如果目前没有适当的工作，也应该动员他们回到农村去，农村很需要他们。将来企业单位技术力量不足的时候，还可以把他们调回来参加工业生产。

在城镇和人口密度大的农村，要认真地提倡节制生育。

第五，彻底清理仓库，重新核定资金。

目前物资不足，给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不少的困难，但是，许多地方、部门、企业、事业单位中还积压着大量的属于全民所有制的物资，不能统一调度，合理使用。为了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况，国务院已经决定，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次清理仓库、调剂物资的工作。所有的企业、事业、机关、学校、部队各单位的仓库，都要进行一次彻底清理。清查出来的物资，由有关部门按照国家的统一规定，分别处理。企业的流动资金，将根据新的情况，由国家财政机关重新核定；多余的资金，一律收归国库。这样，就可以使积压的物资和资金活动起来，用在当前调整工作最必需的方面。根据初步统计，仅积压的钢材一项，至少有一百多万吨。这些积压的物资，只要我们统一调剂使用，就会逐步地发挥作用。

第六,改善市场的供应状况。

各级商业部门和商业企业,在稳定市场方面担负着艰巨的任务。在一九六二年,必须切实做好商品的收购工作和供应工作,扩大城乡物资交流,使市场供应的状况有所改善。

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对于农副产品和三类物资⁽²⁹²⁾的收购,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利益,恰当地规定购留比例,并且努力改进收购办法。国营商业对于日用工业品,要及时地进行收购,按照国家的规定统一调度。国营商业对于一部分日用工业品,合作社商业对于一部分手工业品,可以采取加工、定货的办法,增加货源。

在商品不足的情况下,合理地分配商品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国营商业部门要尽可能多地组织切合农村需要的工业品下乡,凡是农村急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应该优先供应农村,以适当满足农民的生产 and 生活的需要,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并且多换回一些农副产品,供应城市居民的需要。在城市中,要改善商品的供应办法。为了尽可能挤出更多的商品供应市场,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学校、部队要进一步节约行政开支和事业费用,压缩集团购买力。

为了适应工业生产多方面的需要,改变某些企业之间以物易物和采购人员过多的现象,国务院确定恢复和加强一些专业公司的业务,统一组织有关物资、特别是三类物资的供应。

一切国营商店、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合作商店,都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切切实实地为城乡人民的生活服务,为农业和工业的生产服务。所有的商品,都要按照正常的商业

途径出售，彻底纠正和防止开“后门”的现象。

国营商业应该切实改善经营管理工作，加强对整个市场的领导，使农村中的供销合作社、城市中的消费合作社和合作商店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国营商业今年要把一部分人员，包括原来的小商小贩，转到合作商店；对于他们要加以妥善安排。

商业部门和税收机关必须加强对农村集市贸易的管理，并且同投机倒把现象作斗争。

第七，保证完成对外贸易任务，偿还外债，努力承担国际义务。

建国以后，苏联给予我们的贷款，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这一部分贷款，我们已经偿还了大部分，还有一小部分没有偿还。最近几年，我们在同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中，对他们又有一部分欠款。所有这些外债，我们将争取在几年内逐步还完。今后，我们应该继续发展同各兄弟国家的互助合作。同时，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贸易。

胜利了的中国人民，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还要根据可能的条件，给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以援助，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国际义务。事实上，并不光是我们援助他们，他们也援助了我们。我们对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的援助，现在还不是很多，但是，这种援助，是他们所需要的。他们的建设工作做好了，他们的反帝国主义的力量增强了，这就是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支持。

为了有计划地偿还外债，承担必须承担和可能承担的国

际义务,为了换取我国所需要的进口物资,尽管国内工农业产品不足,我们还是应该挤出一些来出口。各地方、各有关部门,都必须努力按质、按量、按时地完成国家规定的出口商品的生产任务和收购任务。

第八,提高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卫生等工作的质量。

为了使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卫生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同经济建设的发展相适应,这些部门,也应该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且以调整为中心,来安排自己的工作。

一九六二年,各级学校都要努力提高教学的质量。全国的高等学校,凡是具备条件的,都应该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

科学研究部门,应该适当调整现有的机构和研究人员,充实重点的科学研究单位,并且加强各个科学研究单位之间的协作。

卫生事业方面,要切实改进医疗工作,加强疾病的预防,增产中西药品,增加城乡药品的供应。

文艺、新闻、出版、广播、体育等事业,也都要进行适当的调整,提高质量,更好地为国家建设和为人民服务。

第九,节约支出,增加收入,加强现金管理,保证财政收支平衡。

保证财政收支和信贷的平衡,是政府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所有的经济部门和企业单位,都要改进经营管理,加强经济核算,加强财务管理,努力降低生产成本,努力降低商品流通过费用,尽可能增加收入,减少支出。

现金管理不严的情况,应该彻底改变。一切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都要严格遵守国家的现金管理制度、信贷管理制度和财政管理制度。企业从银行借的款,应该按期归还。企业的流动资金,只能用于生产周转和商品流通的需要,不能用于基本建设、弥补亏损和其他财政性开支。一些企业的亏损现象,应该迅速改变。财政金融部门应该加强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财政监督。

各部门,各地方,各企业、事业单位,各机关、团体,都应该继续坚决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反对铺张浪费,努力节约开支。

第十,进一步改进计划工作。

为了适应国民经济调整的需要,国务院责成政府的各级计划机关,把主要的注意力,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和市场方面来,切实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次序和调整的具体任务,安排国民经济计划。

计划机关在拟订国家计划的过程中,应该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根据准确的资料,集中各部门、各地方的初步计划,精打细算,不留缺口,做好综合平衡,力求使国家计划指标符合实际,并且适当留有余地,保持必要的后备。

我们的计划工作必须走群众路线,倾听群众的意见,吸取各方面的专家、科学家们的意见。

各部门、各地方,都应该及时地如实地提供情况和统计数字,提出关键性的问题,拟订有可靠根据的计划草案,帮助国家计划委员会制订切实可行的国家计划。在国家计划确定以后,都要严格执行,保证实现,不得随意改变。对于计划的执行

情况,要严格检查。

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目前,我国国民经济还有相当大的困难,人民吃的东西、穿的东西、用的东西,都还不足。这种情况,需要一个时间的艰苦努力,才能够根本改变。在实现调整任务的过程中,我们还可能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新的困难。对于这些,都应该有足够的估计。但是,困难从来没有吓倒过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我们有着战胜困难的许多有利条件。这些条件主要的是:

第一,我们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巩固的工农联盟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全国各族人民同党和政府密切合作,这是战胜困难的最大的保证。

第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已经进一步发展和完备起来,这对于促进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思想统一和行动统一,有重大的意义。

第三,在过去几年的伟大实践中,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取得的丰富的经验,包括许多正面的经验和一些反面的经验,使我们有可能进一步地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把工作做得更好。

第四,农业生产正在逐渐上升,农村形势正在开始好转,这对于克服目前的困难,对于活跃整个国民经济,对于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都有重要的作用。

第五,这几年扩大了的工业生产能力和新增加的农田水利建设,正在逐步地越来越大地发挥作用。这是我们克服困难的重要的物质条件。

只要我们能够充分地运用这些有利条件,善于依靠群众,

同群众商量办事，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一定能够一步一步地战胜我们面前的困难，胜利地完成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

我国人民民主 统一战线的新发展*

(一九六二年四月十八日)

今天,讲一讲我们国内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任务和新发展。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取得了全国的胜利,而且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继续取得了胜利,现在面临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任务。因此,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个组织、这个力量面前又提出了新的任务,它又要有新的发展。前天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上也说了,对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认识的过程,我们的统一战线也是一样。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统一战线由建立、扩大、缩小、再扩大,一直到胜利,在这中间,我们就有反复的经验。革命胜利以后,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起了作用的,动员了社会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参加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得比较顺利、比较快。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任务就更重了,就要负起新的任务(当然,同时还有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要有新的发展。就是说,它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

* 这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果的基础上,现在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更多可以动员的因素,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扩大我们的民主生活。这就是我们的新任务。不要把我们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看成只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它的作用,不但表现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而且表现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们要把建设的任务担当起来。

为着更好地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首先要扩大和发扬民主生活,这也是我们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要担当的任务。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间,不能说一切参加的成员和所动员起来的力量对我们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都是同意的,会有一部分人不同意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如果有人违背了毛主席所说的“六条标准”⁽²⁹³⁾,站在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立场,甚至进行破坏活动,那么,他就是自外于人民,变成非人民内部矛盾了,当然不能把他当作人民内部的问题来对待了。“六条标准”更集中地说就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愿意进行自我改造。如果采取了这样的立场和态度,在具体政策上持有不同的意见,与其说应该允许,毋宁说我们欢迎。在人民内部有一些对立面的意见,这对我们的进步是有好处的。我们不可能设想,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铁板一块,大家都是一个想法,对任何问题的看法都一样。如果我们的统一战线是这样,它就不能发展,就会停止不前,甚至要后退。不要说一个组织、一个团体、一群人不能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一个人的头脑里面,也不能有这样的情况。每天的客观存在,反映到人的头脑里面,在思维的过程中,经常有不同的意见产生。自己肯定了的东西,后来自己又否定

了。这样看对了，那样看又不对了，几个侧面看完全了，才掌握了全面。原来没有认识到的，后来认识到了，以后又有了更加新的认识。这样，一个人的思想才能发展，一个党的政策也才能完备，一个团体的工作也才能在这个过程中间得到改进。我们的统一战线组织也要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间前进。所以我们说，毛主席提出的两类矛盾，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是会长期存在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指导我们统一战线民主生活的原则。因此，我们应该肯定统一战线的任务是加重了，有了新的发展。同时，我们应该在统一战线的内部，提倡在“六条标准”的原则下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彼此讨论、研究、切磋，以求得更好的认识，求得更符合于真理，不断推动我们的事业前进。从这一点上看，我们这一次的会议，可以说是初步反映了这个要求，是一个开端。

这一次我们开了二十多天的会，有二百多位委员发言，提了四百多件提案。我们不能说，大家的意见都说完了，要说的都说出来了。如果这样看，就把问题看死了。不可能的，还会有一些保留的意见没有说出来，先说一点看看，看党和政府机关能不能接受。这样的想法是允许的，也很自然。因为过去一个时期说得少，批评得少。现在我们大开言路，开了以后，是否会发生问题呢？有这种想法的人，我们应当允许他们保留意见，应当等待。的确，我们也得看看。大家提了这么多的意见，其中有的是好的，有的是要斟酌的，有的是不能成立的。党和政府机关是否真正采纳？提案审查委员会提出来的审查意见，交到有关机关去，它是否做？我想，应该观察一个时期。比如昨天胡先骕⁽²⁹⁴⁾先生的讲话，我当时就把他的讲

话稿送到科学技术委员会去了，请聂荣臻副总理去研究办理。我也要保留一点意见，也要看一个时期，晓得科委是否真正研究照办呀！所以，不仅是发言人本身要看看，就是我们主持事务的人也要看看。当然，不是所有的意见都能够马上做的，有的还要斟酌，有的还要准备条件，但都要认真进行研究。我们这个统一战线，要动员广大的力量来发扬民主生活，参加建设。不单是政协应该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族、各方面都要把它所联系的人们动员起来参加，这才是把统一战线的全部成员动员起来了。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开端。我希望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根据这样一个认识，我想分别说说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有关政协的工作问题。

今后政协的工作，责任更重了。政协过去的工作，应该说做得不错。这一次陈叔通副主席关于政协工作的报告，内容就比过去更丰富，说明我们各方面工作更发展了。但是，我们觉得还不够，还要求更好地发展。首先，政协要多组织一些调查研究工作。要使我们的建设搞得更好，首先就要实地调查，才能知道实际情况，如实反映情况，才有具体材料、具体经验可供讨论和研究。不要面临政协开会了，才到下面去视察访问，平常也可以分期去，比如说一年下去几次，不一定都要同时去。现在是调整阶段，更需要多知道实际情况。政协这个机构，应该参加这个工作，到农村和城市去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再回到政协里面来时，就可以交换意见了。不管中央的、全国的、地方的，都可以交换意见，交换经验。这样，我们的座谈会、报告会就有生动的事例来讨论，就能够产生一些提案、意见和建

议,使得各方面的力量都动员起来。其次,政协过去的工作,偏重于政治学习、国际活动和文史资料的收集,今后要多开展学术性的报告和讨论,要有意识地多邀请学术界的朋友参加。这一次会议反映这方面的意见多起来了,发言的同志在这方面也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从建设的要求来看,我们也需要发展这方面的工作。过去一个短时期里,全国政协也曾经组织过学术性的报告会,但是做得不多。今后除去政治学习和文史资料的收集工作还应继续进行外,应该更多地进行学术性的报告和讨论。我们是政协机关,可以同时提出各种不同的意见,争论的结果,不一定得出一致的结论,可将不同的意见提交有关方面,如政府机关、科学研究机关、教育机关或者其他学术团体。这些不同意见的提出,表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这里的贯彻。多有些不同的意见,就使执行机关能从多方面去考虑,利于选择比较更恰当的方案来执行。

第二,共产党在政协的责任。

大家都承认共产党是领导党,共产党的领导是指党的集体领导,党的中央和党的各级领导机构(省、市、县委员会等)的领导。起着领导作用的,主要是党的方针政策,而不是个人。个人都是平等的,如果从工作上说,大家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彼此平等地交换意见,决不能个人自居于领导地位。个人离开了集体,就无从起领导作用。个人的意见不能代表政策,必须制定成政策,才能算为集体的意见、领导的意见。所以,个人平常讲点意见,包括我今天在这里的讲话,是个人的意见。不能说今天我所讲的每段话,都经党中央集体讨论过,当然

有些是讨论过的，但有些只是个人的意见，只能作为建议供大家参考研究。所以，共产党员必须首先把这个界限划清楚。在政协里边，在我们个人的来往当中，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只有领导机关和政策才是代表领导的。不然的话，我们的民主生活、民主风气就不能够发扬，我们之间就有隔阂，中间本来没有墙，就会有一座精神的墙隔着，妨碍民主集中制的贯彻。其次，要实现民主生活，还要求共产党员多交党外的朋友。既然我们扩大了统一战线，共产党又在这里起领导作用，我们党员应该把许多党外的意见集中起来，集中到党的领导机关来。这就要和党外的朋友来往，就要听到一些不同的意见。共产党员在一起也会有不同的意见，但是由于工作环境相同，政治生活相同，这些人的意见总是比较容易接近。因此，所反映的总不会那么全面，一定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才能全面。同样，党外朋友如果听不到共产党的意见，也会想得不那么全面。所以，党内外应该相互多交朋友，特别是共产党员应该主动多交党外的朋友。每个共产党员都得有几个党外朋友来往，可以多交新朋友，也可以有些固定的朋友，能够反映一些意见，敢于提出意见的。陈毅副总理昨天谈到，要有畏友。就是说，他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批评对方的短处，习惯了就不是畏友而是诤友了。我们共产党员要多听不同的意见，才能多知道各方面的意见。不同的意见不一定都对，但你要听了才有比较。当然，在不同的意见中，更重要的是广大群众的意见，就是在公社、工厂等基层组织里从事生产活动的广大群众的意见，还有学校里的群众的意见。这些直接从群众中来的意见更加宝贵。我们共产党员既然参加了政协，那就要

特别注意多接触自己不熟悉的事情和不熟悉的人物。你既然不熟悉,就证明你在这方面有缺陷,你去接触了,才能认识,才能了解,才会得到有益的东西,即使是反面的意见,甚至不对的意见,你也可以作比较。习惯于只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只喜欢听相同的意见,听不到不同的意见,对不熟悉的事也不愿意去熟悉,把自己局限起来,这样工作就会越做越窄了。所以,我们首先要求党员多交朋友,希望参加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员回去后将上述的精神向在地方政协的党员传达。这次会议上,有朋友说,希望共产党员多和党外人士接触。我想这个要求是合理的,你们有权利提出这个要求,因为每次会议相隔一年,这次更长,有一年多不会面,有这么个机会,朋友们当然有权利要求同共产党员多接触,多交换意见,多谈心。

总之,党员要承认我们有很多事情还不知道,知识还有限。我们的确是要做到老学到老,改造无止境。有这样的精神,才能有进步。我们难道都改造好了吗?不可能的,总有些渣滓,总有点需要改造的,有自觉我们才能进步。这方面要求共产党员应该严一些。如果说“严于责己,宽于责人”,对共产党员就应该要求严些。党外的同志们也应该责备我们严一点。我想责备严是好事,是统一战线中的好朋友。当然这是为了把国家搞好,把社会主义事业搞好,而不是对个人的攻击。

第三,各民主党派的责任。

各民主党派在统一战线中的责任,应该说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有不少朋友参加了最高国务会议,说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刘主席说:责任在共产党,在共产党中央,民主党派没有责任,或者很少责任。毛主席也这么说。而民主党派的

许多朋友说：民主党派也有一定的责任。我看这样说法很好，把责任引为己任。那么，好了，过去的已经过去，我们取得了教训。今后要把事情搞得更好，大家要共同负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民主党派要负起监督的责任。我们把事情报告出来，也作了初步的经验总结，今后根据大家同意的方针和任务去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民主党派要进行监督、提意见。所以我们说：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责任是更重了，而不是轻了。各民主党派都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本身就锻炼各党派和他们的成员。各党派的成员中总是有进步、中间和落后的，正如共产党员一样也有进步、中间和落后的。各党派就要在组织中不断地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标准，把自己的成员锻炼成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不断地推动他们进步，使中间状态的转向进步，摆脱落后。除原有的成员外，一个组织总还有新的成分进来，党派总还有发展，吸收进来的也有进步、中间和落后的，所以党派本身就具有不断改造不断推进的作用。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由于存在的各个阶级、阶层的状况比较复杂，不能设想得太容易。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设想得太容易一点，以为经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¹²⁹⁾，我们的社会不是属于全民所有制就是属于集体所有制，好象社会主义改造很快就能完成。不仅农村，城市都得进入人民公社，把街道里弄都改造过来，成员都改造过来。而且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很快地就能从集体所有制转到全民所有制。现在看来这些想法是不恰当的。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人口这么多，地区这么辽阔，民族这么多，尽管民主革命进行得彻底，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得顺利，

但是,整个社会的改造是不可能一下子就完成的。因为它的经济水平比较低,在这样的经济水平的基础上,上层建筑不可能那样快地完整地改造好,总是参差不齐,不平衡现象总是长期存在的。社会主义改造要随着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才能相应地完成。如果说我们中国实现现代化需要几十年的时间,那么,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建成,就得花更长时间,然后才能向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前进。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比较长期的想法,认识社会主义改造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因为不仅是经济,而且各种旧的政治影响和习惯势力,对我们仍有影响,虽然占统治地位的旧东西被打倒了,但一些旧的政治影响也还是依靠旧的习惯势力而存在着,至于思想作风上的问题就更多了,这种改造就要更长时期。广大的劳动人民尽管从本质上说是有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的,但旧的习惯、思想作风在他们的头脑里还起影响,也要进行改造。何况我们的社会存在着各界、各阶层的分子,更加需要努力改造。因此,各党派要动员所代表的方面,不仅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努力改造。各党派代表的方面不一定相同,在比较接近的那一方面多做工作,就更可以促进社会主义的改造,使整个社会主义改造的发展更健康一些。这就是说,不仅从建设的意义上,而且从改造的意义上,也需要各党派的合作,根据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来进行工作。

第四,工会的作用。

工会是统一战线中的人民团体,是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他不仅要把自己的成员教育好,还要影响其他阶级阶层;不仅自己的组织要健全,还要影响其他方

面。现在我们面临着调整的任务，首先在工人队伍本身就要进行一些人员调整。工会要在调整中对它的成员做工作。工业、交通、基本建设系统和各种企业事业、国营农场，都是工会活动的范围，都要搞好增产节约。工人生活现在有一定的困难，如何保证生活供应，如何帮助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工会负有很大的责任。因此，在国家任务面前，工会今天的责任更重大更复杂，要做的事比以前更多而不是更少。工会要配合党和政府去进行工作，因为工会是党的主要助手，统一战线的主力军。工会不仅要注意解决工人生活困难问题，而且要把生活问题提到政府面前。中央和地方上的精简工作如果做不好，工会有权把问题提出来，要起监督作用。当然不是与政府对立，是协助政府办事。政府没做好的事，工会可提意见。党派互相监督，工会也可以同其他方面互相监督，这要作为任务，大家一条心，朝着一个方向，把工作做好。

第五，青年团的作用。

青年团任务也加重了。别的不说，就拿青年学生的教育，我前天在人大会议上讲了，我们今年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要少招生，因此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就会有一部分不能升学。在这方面，青年团就有工作可做，可以在城市和农村组织和推动补习教育，使青少年不至于因无学校可上而到处乱转。帮助他们自修自学，也可以培养出一批人才。不一定人人都是从正规学校毕业才能到社会劳动，有一部分没有进大学的也可以一样做事。我们同辈党员中有很多专家并没有进过正规的大学。我们这一代是如此，后一代是不是一定都要在大学或高中毕业？我看在目前经济情况下还不可能要求这么高。将

来要求人人至少达到中学毕业,但现在还不可能实现。这就需要青年团在这方面进行教育,提倡自修自学,帮助补习,不仅可以公办,也可以自办。一个人在家开业帮助几个青年补习功课,收点学费是允许的。这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以外的一种辅助的方式。甚至于某些手工业者、文艺家收几个徒弟学习,也是许可的。我们应该开这方面的路。

还有,在城里征兵,去年是第一年实行,有成效,打算今年还继续实行,特别是在大、中城市。青年团要在这方面好好宣传。我们提倡“好男当兵,四海为家”,社会主义社会培养教育出来的有了选举权的青年要积极报名入伍,造成一种空气。特别是干部子弟更要做模范,要带头入伍,入伍后也不要因为是干部子弟就要求受优待。

第六,妇女组织的作用。

妇联在一些方面也要负责任。例如,要在居民委员会和农村中提倡补习教育。要帮助做母亲的鼓励成年的儿子入伍。有时候,干部子弟入伍,做母亲的反而更舍不得,当然这是个别现象,但是也值得提出来。我前天讲到,在城市和人口密度大的农村中,要提倡节制生育。希望妇联也来提倡一下。过去做过,证明是有效的。

第七,工商联的工作。

工商联的责任也加重了。一方面,我们对工商业者的定息⁽¹²⁴⁾,延长三年,到时再议。另一方面,工商业者也面临着调整的情况。工商业者里面有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小业主等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也有小商小贩,其中一部分要回到集体经营或者是个体经营的商业中去,一部分还保留在国营的企业、事

业单位里面,也有一部分年老的可以实行退休制度。这些人如何安置,政府要负责,但是工商联可以协助政府来进行工作,调查这方面的情况。我觉得目前的情况,不但全国的工商管理总局要加强,省、市的工商管理总局也要加强,好跟工商联联系。对工商业者的安置要适当,例如有些人不适合到农村去,家又在城市,就不能勉强,应该在城市里面安置。在这一方面,问题比较多。工商业者中间也有一些生活困难的,工商联可以从定息中抽取一定的比例作互助金,如果不够,政府也可以协助。我跟陈叔老⁽¹⁴⁷⁾谈过这个问题,要在这方面研究一些具体的办法。工商联协助政府在工商业者的改造、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生活安置等各方面做工作,更要加紧,不要放松,事情会更多,不会更少。

第八,文教科学团体。

在这次会议上,大家的提案和发言讲得最多的是这一方面的问题,从数量上和质量上来看都很重要。陈毅⁽²¹³⁾同志昨天在发言中答复了很多,我不想在这里再多说了。总之,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拿出自己的力量来,这就需要使文教、科学队伍更加强、更发展,质量更提高,教学制度搞得更好。这方面的工作,过去一个时期注意得不够。今后不仅要从政府系统、教育系统、科学研究系统和生产系统来加强,就是政协系统,也要来加强。要使我们的文教科学事业的发展适应经济建设的要求,把过去的追求数量转到重视质量、重视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真正使我们在文教科学方面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能够做得更好,不仅是形式,而且是有内容的。拿政协来说,担任副主席的各位,从文教出身的就占多数。昨

天陈毅同志自告奋勇,这一方面如果有意见可以向他反映。不仅陈毅同志,我们管科学、管文教的其他同志也在这里,希望这一方面被重视起来。

至于思想上拔白旗、插红旗⁽²⁶⁴⁾的问题,昨天陈毅同志讲得很好。思想上怎么来拔白旗?红旗怎么能插进去呢?解决思想问题,这需要逐步提高认识,通过自我学习、自我认识、自我改造的过程,才能办到。昨天陈毅同志说,中共中央对这一提法没有责任,是下边搞的。我要给他改正一下,他可能忘记了。昨天文教办公室的张际春⁽²⁹⁵⁾同志给我写了一个条子,他说中央有一个文件上面有这么一句话。我今天查了一下,果然是这样。中共中央应该承担这个责任。这个话说得很生硬,可以作几种解释。属于头脑中的事情,怎么能一下子拔白旗、插红旗呢?这样是插不进去的。有时候对一种估计或者一种情况,随便一说,文字上没有注意,就会引起不好的后果。我们应该承认这种缺点错误。

第九, 兄弟民族的关系问题。

这一点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回答了。关于民族自治区的一些问题,需要在会后经过政府的程序来解决,还可以在政协的民族组来讨论,人大的民族委员会和政府的民族事务委员会还准备合起来开会讨论。有一些需要政府执行的,一定尊重各个兄弟民族的代表人物所提出的好的意见,经过考虑和研究来执行。例如过去在行政编制上、民族干部问题上,有许多处理是有缺点错误需要改正的,这里就不去多说了。

第十, 宗教问题。

政协里有宗教单位。过去一个时期,这方面的工作有些缺

点错误，一些宗教界的朋友提出来批评，有许多好的意见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我们把宗教信仰问题常常看得太简单了，拿共产党员马列主义的认识来要求所有的人，要求所有人的人生观、世界观都一样，这是不可能的。思想认识是逐步改变的，而且思想认识问题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就宗教信仰来说，更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我们只是希望，爱国的宗教界人士，热爱祖国，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也愿意努力学习。这样，他们思想上还有宗教信仰，这并不妨碍我们整个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团结，并不妨碍我们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第十一，华侨问题。

这一次参加人大、政协会议的华侨代表，都是在国内工作的。政协只有几位委员在港澳工作，人大只有两位代表在香港工作。联系华侨要通过我们的华侨事务委员会。华侨工作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侨居在国外的；一个方面是他的眷属在国内，或者回国来工作、学习的。党和国家有关这一方面的政策，已经讲过多次。目前也发生了一些问题。例如照顾眷属的问题，华侨干部在城市工作怎样下放的问题。有很多人原来在城市，适合于在城市安置。这些问题，我们的华侨事务委员会应该注意，政协的华侨组也可以研究。

政协所包含的还有其他的方面，我就不一一去说了。

总之，我们政协包含各个党派、各个人民团体，是由这些单位的成员组成的，通过这些单位的成员，联系全国的各个方面，联系全国的人民，以至联系到海外的侨胞。通过这次会议，使得我们的统一战线更扩大、更深入了，工作更加重了。人大所批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我们的方针任务，通过我们政协，

向国内的广大人民讲清楚，我相信是会收到我们预期的效果的，正如《人民日报》在昨天的社论中所号召的：“团结奋斗争取新胜利”。我们肯定了成绩，批评了缺点错误，也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针任务，这样就可以增强我们建设的信心，保证我们能够克服面临的困难。我们团结奋斗，争取新的胜利，是有把握的，是有信心的。

认清形势，掌握主动^{*}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一日）

刘少奇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²⁹⁶⁾的报告中分析了全国的形势。他说，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基本度过了，但目前还处在一个严重困难的时期。对于这一点，我在那次会上作了分析。现在看来，总的情况还是那样，但需要作进一步的说明。

为什么说我们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从总的方面看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基本度过了呢？

在政治上，全党全国人民的绝大多数，党外人士的绝大部分，高举三面红旗⁽²⁹⁷⁾，取得了成绩，经历了困难。经过这次考验，大家是团结的，这在和平建设时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同时，这几年对各项具体政策，我们也在逐步补充和完备。

在经济方面，我们开始高举三面红旗前进的时候，对于新的事物缺乏经验，在执行中犯了很多错误，有很多缺点，而且有很多是原则性的、很严重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从正面反面初步总结了经验，逐步地认识和掌握了新情况下的发

* 这是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第一部分的节录。

展规律，不象过去那样懵里懵懂了。从这一点说，我们比过去也清楚了一些。

现在，农村中连续三年灾荒造成的困难正在克服中，农业生产下降的趋势，除部分地区还在继续外，大多数地方已经停止并开始回升。这四年，工业和基本建设的计划指标本身就没有综合平衡，结果一面是跃进，一面又被迫地大调整，被迫地后退。年终的产量跟年初的计划数字差得很大。工业问题，可以说是在逐渐认清形势，逐步掌握主动。现在，我们主动地调整指标，大家在数字上基本没有争论了。前几年如果提出今年这样的调整指标，是不可设想的。这就说明，现在大家的认识比较一致了。

所以，从总的方面说，不论政治形势或经济形势，最困难的时期的确是度过了。如果现在还是懵里懵懂，后果还要严重。当然，现在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但我们总是能够预见发展趋势了。

为什么说目前情况还很严重呢？因为我们主观上的失误造成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后果，不是短时期能够消除的，只能逐步解决。经济工作千头万绪，毛泽东同志说要越做越细，而我们在这个时期恰恰是越做越粗，过去几年甚至可以说是越做越乱。工作上造成这样的后果，影响就比较长远，直到现在还没有结束。灾荒的后果也是严重的，虽然我们克服了许多困难，但是受灾面积这样大，影响这样深，也不是一时能够扭转过来的。

有些地区和部门的情况还很严重。部分地区工作中的错误还没有纠正过来，或者灾荒还很严重。工业、基建部门过去

工作中的错误所造成的后果还继续存在，并影响到其他部门，现在在调整中就看出来了。当然，这些地区和部门绝大多数也在纠正中，只有个别的还没有纠正。

要做好工作，应该情况明，决心大，办法对。要做到这样是很不容易的。

首先是情况明。这是毛泽东同志提出调查研究的时候特别强调的。目前我们对困难的情况是不是看得够了？我想要有分析。困难的发展趋势我们是看出来来了。前年经济调整的时候，觉得很快就可以调整过来了，去年也还是这样想。今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在西楼开会⁽²⁹⁸⁾，陈云⁽⁷⁸⁾同志讲了话，少奇同志作了结论，毛泽东同志也同意，就是说，调整时期要成为一个阶段，主要的内容就是恢复。不仅农业要恢复，工业也要恢复。因为不仅农业生产力被破坏了，工业也是这样，有些生产设备被破坏了，部分的生产秩序弄乱了，规章制度也不存在了，都要重新恢复起来。教育方面也有这个问题。现在看，这个调整时期要相当长。一般设想，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恐怕就是个调整阶段，甚至于还不够。把这个时期看得长一些，现在大家争论不大了，看法比较一致了。

是不是我们现在对困难的情况都弄清了呢？还不能这样说。趋势是看清了，调整的时期会长一些也看清了，但是具体情况常常是由极复杂的因素形成的，往往是现象发生了我们才看到。这类事情很多。例如三门峡的水利枢纽工程到底利多，害多大，利害相比究竟如何，现在还不能作结论。原来泥沙多有问题，现在水清了也有问题。水清了，冲刷下游河床，乱改道，堤防都巩固不住了。上游清水灌溉，盐碱就不能统

统洗刷掉。洪水出乱子，清水也出乱子。这个事情，本来我们的老祖宗有一套经验，但是我们对祖宗的经验也不注意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既要防洪，又要灌溉，又要发电，又要运输，综合利用。修三门峡的方针是对的，但是办法不对，现在不能发电，泥沙又淤塞，还要大调整。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所以，我们不能认为现在对困难的情况都估计够了。每个部门，每个地区，大家都要警惕这一点。

少奇同志说，把困难说多一点有什么坏处呢？领导上把困难指出来，然后找出办法来克服，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懵里懵懂，怕说困难，一听说困难就泄气，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革命就是要认识困难，摆出困难，提出办法，克服困难。共产党就是在克服困难中取得胜利的。革命战争是这样，社会主义改造是这样，社会主义建设也应该是这样。不管哪一个问题，都是千头万绪。姚依林⁽²⁹⁹⁾同志讲了物价政策，他是经过一番研究的，但那只是一个设想。情况复杂得很，还会出现购买力超过商品供应量、财政赤字、货币难以回笼等情况。教育、政法方面，都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我们宁可承认对困难估计得还不大够，多看一看，这不仅不会使我们在困难面前低头泄气，反而会使我们团结起来，依靠群众，克服困难。

这两年的调整中，我们觉得，我们总是对困难估计不够，总是希望好一点，好得快一点。我个人经手的事情几乎没有一件不是如此。你说我愿意慢一点呀？总还想快一点的。当年搞钢铁，别的让路，也是我在那里督战的，结果把大家搞垮了，现在回过头来，钢铁只好让路。这还不是自己的错误？当然，有外在的因素，但外在的因素不能成为借口，还是我们不冷

静。钢的产量要求达到一千八百万吨，现在退到六百万吨。你总不能说那个一千八百万吨是对的。问题不在于后悔不后悔。不怨天，不尤人，主要是要得到经验教训。我们主观上想快一点，是好心肠，争取快，但是要准备慢。毛泽东同志说，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经验还不够，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从必然王国飞跃到自由王国，要有一个过程。

现在我们领导的意见接近一致了，但这还不行，还要把我们的意见传达到广大的干部中去，并且适当地向群众说清楚。当然，领导是起决定作用的，可是要把领导的意见变为群众的行动，说服群众和我们一道去做，那就需要做艰苦的工作，要经过群众的体验。现在省一级同志的意见大概跟我们比较接近了，地委就差一点，县、社、队，厂矿、各种事业单位就更差。这不能怪下面，还是七千人大会上说的，责任首先在中央，因为许多错误的东西是我们发起和创议的。当然，有的是他们做过了头，做走了样子，但这样做也是上面逼的。所以，上下认识的接近，需要一个过程，必须做艰苦的工作，不能希望很快。调整的具体工作要有步骤，要通气。党内的七千干部通了气，通过人大、政协，也跟党外人士初步通了气，但是还没有全部通气。要全部通气，也需要有个过程。

其次是决心大。现在我们决心大不大？我想，基本上是大。当然，去年已经是下大决心了，一千多万人下乡，八百七十万职工精简下来，这是一个大决心。但是去年我们还不能设想关这么多厂，拆这么多“庙”，精简这么多人。这件事情，在中国，没有哪个政权能够这样做，只有我们才有这样做的群众基础。去年没有出大乱子，今年会做得更好一些。原

来不敢下那么大决心，觉得去年下了那么多人，今年再下那么多人，不大可能。我对这个问题，一方面主张多下人，可是如何下法，要走一步看一步。所以，最初决定下七百万城市人口，其中包括五百万职工。后来许多地方要求一步走，就提出一千三百万城市人口下乡，其中包括九百多万职工。现在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下了更大的决心，就是下乡职工超过一千万人，下乡城市人口相应地可能争取超过二千万人。这个决心，的确也是逐步酝酿出来的，去年不可能，前年更不可能。现在下这个决心，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的经济生活来一个大幅度的调整，使它新的基础上来一个大改组。这是领导的决心，也是全民族的决心，几乎要震动我们全民的生活，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再次是办法对。办法现在只能有那么多，更多的办法还要依靠群众创造。革命战争是如此，建设也是如此。大家来想办法，一定有出路。各地各部门的领导同志不要怕把话说多了，不要怕我们的干部知道。你把问题说清楚了，他们的办法会比我们还多。你不说清楚，他们不晓得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反而互相猜疑，议论纷纷。我们现在把决心传达到下面去，就可以找出办法来，经过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就能在初步调整的基础上前进。时机紧迫，不应该犹豫了。可是另一方面，今天的情况又是千头万绪，动一根头发就要牵动全身，稍一不慎就会出乱子，我们应该有准备。一方面是力争不出乱子，另一方面也要有准备，万一出了乱子也没有什么可怕。我们只要把情况跟干部、群众讲清楚，大乱子可以克服，可是办事不能急躁，不能草率，必须谨慎从事。

在目前形势下，关键是如何处理好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农轻重关系、城乡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现在的农业基础没有办法负担这样规模的工业。工业本身也不平衡，没有办法继续均衡生产，也没有办法支援农业，支援市场，兼顾国防，比例的失调极其严重。城乡比例也失调。现在我们农业生产的各种因素，劳力、畜力、地力、水利、肥料、种子、农具、运输工具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削弱或减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农业的恢复要有一个相当的时间。拿粮食来说，总要三五年，少的三年，多的五年，有一部分地区也许要超过五年。至于农业的全面恢复，包括经济作物，农、林、牧、副、渔，那要超过五年。所以，我们首先就应该抓住农轻重关系、城乡关系这个关键来调整。调整不是今年一年就可以就绪的。工业也存在这个情况，工业和基本建设三年调整，就必然影响以后的三年。因为基本建设三年踏步，重点又放在支援农业上，那么，工业的后备力量，扩大再生产的能力，比如煤炭、木材、有色金属、化工材料的生长都不会很大，这就必然影响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后三年。我们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出的指标，还是尽量压下来的，但是现在看来，那些指标还高了。一九六七年钢产量一千八百万吨，煤三亿五千万吨，看来都达不到。粮食产量一九六七年能不能达到三千七百亿斤，还要看两年。棉花产量一九六七年显然到不了三千七百万担。现在我们应该更冷静地看问题。我们对新的发展，总的规模，还没有完全摸清楚，要承认自己不行。

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

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

目前的中心工作，还是我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出的四句话：精兵简政，增产节约，保证市场，整顿秩序。

要增产，首先农业要增产，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如果不把农业这个基础恢复起来，现在这个工业基础也站不住，城市就是减了二千万人口也站不住。这个经济形势，大家看得很清楚。

抓粮食要抓两头，一头是商品粮食基地，一头是灾区。还要真抓棉花。棉花产量不能再减了，每年总要增产才好。每人每年供应三尺布的情况不能再继续了。棉花生产的恢复比粮食还要慢。除国家注意棉花集中产区以外，地方上还可以提倡在自留地上种点棉花。自留地种的棉花不要收购。返销农村的粮食，首先要照顾棉农。

在这样的农业基础上，工业必须有一个大幅度的调整。现在工业的秩序是乱的，有些产品的指标很高，很不平衡，这种情况是难以为继的。我们的方针是按照短线平衡，不留缺口，并且留有余地。这个方针不可能一步实现，但是必须坚持，要逐步实现。至于缺口，那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的，任何国家都有些缺口短线，都要互通有无，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当然，万一世界各国都封锁我们，那我们就要搞一部分代用品，有些就要停止生产。直到现在，合金钢材、橡胶我们还是缺口，靠进口。我们国内能够生产成套设备的，就不要只生产出主机，没有副机，不配套，积压起来。到去年年底，设备积压接近一百亿元，这是一个最大的浪费。

我们现在调整工业的政策是采取关厂、并厂、缩小规模、改变任务、转业这样五个办法。全国六万多个工业企业，可能关掉一半以上。这好象是消极的，实际上，这样就可以把原材料、电力、煤炭集中到消耗少、质量好、品种多、成本低、劳动生产率高的工厂去使用。从全国来看，一个时候产量会低一些，但最后会使工业品的数量多起来，质量好起来，有一部分还可以增加出口。当然，这要经过调整，要有一个过程。

我们调整的目的，就是为了精兵简政，增产节约，保证市场，整顿秩序。缩短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战线，相应地缩短其他方面的战线，精兵简政，减少城市人口，减少职工，达到增加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目的，这是一个积极的方针，是一个经过调整、改组，然后前进的方针。

建成社会主义强国， 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我对自然科学是外行。这次来到上海，碰到各位正在讨论制定十年科学规划，借这个机会我谈谈下面几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正确认识科学技术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意义。

我国过去的科学基础很差。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主要要求是：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相互促进，迎头赶上。前两点是指要有科学的态度。毛主席在一九四二年整风⁽¹⁴⁾时就提出了实事求是，这同样适用于自然科学。我国是一个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仅要实事求是，循序渐进，还要有雄心壮志，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要同时并进，相互促进，不能等工业现代化以后再来进行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我们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我们有先进经验可以学

* 这是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习，有最新科学技术成果可以利用，这样可以扩大我们的眼界，所以我们前进的步伐可以加快。当然不会一点弯路不走，但总可以少走弯路。我们应该迎头赶上，也可以赶上。我们不应该跟在别人后面把所有的程序都走一遍，那样，我们将永远落在后面。只有把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和相互促进、迎头赶上统一起来，才能使我们科学技术的发展适应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要求，比较快地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第二，我们要看到我们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各方面的有利条件。

我们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指导。我们不是以主观唯心主义作指导，也不是以机械唯物主义作指导，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指导。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客观规律，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

我们有广大的人力和丰富的资源做基础。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天然给我们带来的任务是：对祖国、对人类应该做出较大的贡献。历史上，我们的祖先有过许多发明，为什么到现代就不能有所发明呢？后来居上，我们是应该超过自己的祖先的。

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做保证。在旧社会，某些科学家赤手空拳，单枪匹马，也还能做出一些贡献；在新社会，社会制度有了根本变化，生产力解放了，人们思想解放了，单枪匹马变为群策群力，科学家有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广大的自由天地。当然这要有一个过程。另外，把集体需要与个人自由辩证地结合起来，也需要有一个实践和认识的过程。我们在座的一些同志，经过清末、北洋军阀政府⁽⁶⁾、蒋介石反动统治和社

会主义四个时期,比较一下四个时期的情况,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我们已经有了了一支比旧中国大许多倍的知识分子队伍和科学技术力量。从清末派出留学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为止,全国一共只有二十多万大学生。新中国建立后到去年为止,我们有了九十六万大学毕业生,几百万中级知识分子。再过十年,我们又会有了一百多万大学毕业生。这是旧时代所不能比拟的。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支不小的技术力量和一批科学研究机构,这是国家的宝贝。

我们现在有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一般设备和原材料绝大部分自己能够制造或生产。这就为我们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只要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把这些条件运用好,群策群力,自力更生,就一定能够后来居上,做出超过前人的贡献。

第三,如何多快好省地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要求,我讲几点具体意见:

一、加强科技界人士的主人翁责任感。就是要做到接受党的领导,为社会主义服务,自愿地坚持自我改造。我们应该做到老、学到老。只有认识到自己需要不断地学习和改造,才会愉快。不自满,有了缺点就改,就会进步;如果自满了,那就要退步。人总是要不断地前进。大家要互相勉励,共同进步。

二、集中和加强科学技术力量。科学研究部门、教育部门和工厂要密切结合,有分工有合作,而不是把力量全部集中在科学研究部门,也不是全部集中在教育部门或工厂。如上海要集中力量突破半导体技术,别的地方如有这方面的力量就可以调来。

三、改进各方面的关系。首先是党群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我这里讲的领导是指集体而言，不是讲党员个人。当然，党员个人的讲话有些时候是根据党的指示，传达党的意见。但是，人总是有个性的，某个人在某一方面兴趣大一些，因此在传达党的意见时，在某一方面多讲一些，发挥一些，这是有可能的。领导者讲话也有不是指示性的，如果一讲话就是指示，那么这日子如何过？所以我总是不大赞成讲“指示”。传达党的意见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党群之间的融洽相处。还有青老关系、师徒关系。应该把老放在前面，是老青关系，不过这样讲不顺口。带路的是老的，但青年人活力，能够推动事业进步。还要正确处理理论和实践、任务和学科的关系，认真实现领导、专家和群众的三结合，以及科学研究机关、学校和生产部门的紧密协作。安排好这些关系是科委的责任。加强思想工作，组织科技力量，调整各方面的关系，是科委要做的事。

四、适当改善科学技术研究的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国家科委和政府有关部门应该给大家便利。研究和教学要有实验室，生产要有车间。上海有些设备不够，必不可少的要补充，需要进口就进口一些吧，总要相当满足你们的要求。关于原材料，可以相互支援，图书也可以相互支援。订购外国书刊，开始时掌握得松了一些，因此重复的很多，但后来又太紧了。必要的图书资料还是要订。必要的交换刊物要给人家，否则人家也不给你。关于助手、技术工人的问题，上海是能解决的，需要从别处调的，个别的可以支持。总之，条件有利，就能创造出新的成绩来。

关于工作环境问题,真正的科学家在生活方面的要求并不高,但生活问题、居住问题也不能完全不考虑,如有的科学家住得太远,就要给予便利。有些科研项目需要协作完成,所以集体活动是必要的,但不要因此而排除个人钻研。科学家专业外的事情应该少一些,这是科委要安排的,每个单位也要注意。我们过去习惯于搞突击工作,对于经常的工作不是安排得很好,大家可以提意见。

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订出很好的十年科学规划。

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心情是愉快的;责任是重大的,精神是饱满的。上海,作为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和科学技术的重要基地,我们对上海科学技术界寄予深切的期望。希望上海的科学技术界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做出应有的成绩。

学 习 雷 锋^{*}

(一九六三年三月六日)

向雷锋⁽³⁰⁰⁾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 这个题词刊载于一九六三年三月六日《解放军报》。

反对官僚主义^{*}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

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长期统治的遗产。中国长期是封建社会，一百年来又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官僚主义更是有深远的影响。

官僚主义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命令主义、事务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宗派主义，都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反对官僚主义，也就必须联系到反对这些主义。当然，不单单是这七种，但这七种特别突出。

官僚主义有各种表现，我现在把它分开来说。

第一种，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调查研究，不抓具体政策，不做政治思想工作，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一旦发号施令，必将误国误民。这是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党的路线、政策再好，如果执行的业务部门给阻塞住了，那就是把党和群众隔开了。所以我把这种官僚主义列为第一种。这种官僚主义是领导者尤其是高级领导者必须时时警惕

* 这是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关于反对官僚主义部分的要点。

的。

第二种，狂妄自大，骄傲自满；主观片面，粗枝大叶；不抓业务，空谈政治；不听人言，蛮横专断；不顾实际，胡乱指挥。这是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

一个人站在领导地位，不虚心，不平易近人，自以为了不起、什么都懂，只要有这种思想并且在作风中表现出来，就危险了。这种人大概总是不去抓业务，觉得我是领导政治的，人家的话听不进去，觉得琐碎，也不研究人家讲话的内容，结果就蛮横专断，瞎乱指挥。

第三种，从早到晚，忙忙碌碌，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对事情没有调查，对人员没有考察；发言无准备，工作无计划；既不研究政策，又不依靠群众，盲目单干，不辨方向。这是无头脑的、迷失方向的、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

常有人说：“我做个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好象这种官僚主义还能容许似的。我看，这种官僚主义也要批判。如果是个普通干部，忙忙碌碌，有时方向不大清楚，那还可以谅解。如果是个领导干部，怎么能容许他是个事务主义者呢？

第四种，官气熏天，不可向迳；唯我独尊，使人望而生畏；颐指气使，不以平等待人；作风粗暴，动辄破口骂人。这是老爷式的官僚主义。

第五种，不学无术，耻于下问；浮夸谎报，瞒哄中央；弄虚作假，文过饰非；功则归己，过则归人。这是不老实的官僚主义。

第六种，遇事推诿，怕负责任；承担任务，讨价还价；办事拖拉，长期不决；麻木不仁，失掉警惕。这是不负责任的

官僚主义。

第七种，遇事敷衍，与人无争；老于世故，巧于应付；上捧下拉，面面俱圆。这是做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

第八种，学政治不成，钻业务不进；语言无味，领导无方；尸位素餐，滥竽充数。这是颞颥无能的官僚主义。

第九种，糊糊涂涂，混混沌沌，人云亦云，得过且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一问三不知，一曝十日寒。这是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

第十种，文件要人代读，边听边睡，不看就批，错了怪人；对事情心中无数，又不愿跟人商量，推来推去，不了了之；对上则支支吾吾，唯唯诺诺，对下则不懂装懂，指手划脚，对同级则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这是懒汉式的官僚主义。

第十一种，机构庞杂，人浮于事，重床叠屋，团团转转，人多事乱，不务正业，浪费资财，破坏制度。这是机关式的官僚主义。

凡是机关大而人多的地方，必定要出官僚主义，这几乎成为规律了。那里的领导人即使精明强干，也会有官僚主义。因为那个机关本来不需要那么大，机构搞得那么臃肿，一定会有很多人不办事情，吵吵嚷嚷，很多事情在那里兜圈子，办不出去。把机关搞小，有事情一商量就解决了。

第十二种，指示多，不看；报告多，不批；表报多，不用；会议多，不传；来往多，不谈。这是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

第十三种，图享受，怕艰苦；好伸手，走后门；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请客送礼，置装添私；苦乐不

均,内外不一。这是特殊化的官僚主义。

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如果图享受,怕艰苦,甚至走后门,特殊化,那是会引起群众公愤的。

第十四种,“官”越做越大,脾气越来越坏,生活要求越来越高,房子越大越好,装饰越贵越好,供应越多越好;领导干部这样,必定引起周围的人铺张浪费,左右的人上下其手。这是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

第十五种,假公济私,移私作公;监守自盗,执法犯法;多吃多占,不退不还。这是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

第十六种,伸手向党要名誉,要地位,不给还不满意;对工作挑肥拣瘦,对待遇斤斤计较;对同事拉拉扯扯,对群众漠不关心。这是争名夺利的官僚主义。

第十七种,多头领导,互不团结;政出多门,工作散乱;互相排挤,上下隔阂;既不集中,也无民主。这是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

第十八种,目无组织,任用私人,结党营私,互相包庇;封建关系,派别利益;个人超越一切,小公损害大公。这是宗派性的官僚主义。

第十九种,革命意志衰退,政治生活蜕化;靠老资格,摆官架子;大吃大喝,好逸恶劳,游山玩水,走马观花;既不用脑,也不动手;不注意国家利益,不关心群众生活。这是蜕化变质的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发展到这个程度,就严重得很了。一个干部、一个共产党员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有革命的热情,要有朝

气、有干劲。革命热情一衰退，政治上就要蜕化了。

第二十种，助长歪风邪气，纵容坏人坏事；打击报复，违法乱纪，压制民主，欺凌群众；直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作奸犯科，害党害国。这是走上非常危险道路的官僚主义。

我举了这么多种官僚主义，分析不一定很科学，也不是说在一个机关中所有各种官僚主义都已经发生。但是，必须看到，官僚主义在我们执政的党内，在我们的国家机关内，的确是十分有害、非常危险的。在我们领导干部中，官僚主义严重的虽然是少数，然而，正如党中央三月一日的指示⁽³⁰¹⁾上所说，官僚主义的态度和作风已经给我们的工作造成许多损失，如果听其发展，不坚决加以克服，必将造成更大的危害。我们绝不能容许官僚主义再继续发展下去。

过好“五关”^{*}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我现在讲一讲领导干部过“五关”的问题。过“五关”，就是过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

第一，过思想关。过思想关就是我们常说的思想改造，是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也就是要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学会运用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和最近讲的认识论^[302]。这是一辈子的事。我们知道，时代是不断前进的，思想改造就是要求我们的思想不落伍，跟得上时代，时时前进。事物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因此我们的思想改造也就没有止境。一万年后，在人们的头脑里，还会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新和旧的矛盾，个人和集体的矛盾，还会有思想改造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怎么能说到哪一年哪一月思想改造就完成了？没有这样的事。即使参加革命多年的同志，如果忽视了改造，革命意志衰退了，还是要落伍的。所以，我们要把思想改造看成是长期的无止境的工作。这样认识问题，大家的心胸就开阔

* 这是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的报告的一部分。关于过“五关”问题，周恩来同志还对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亲属多次讲过。

了。既然一万年后还有思想上的矛盾，还要改造，为什么现在就觉得自己的思想改造已经完成了，就满足了呢？我们永远不能满足。

过思想关要联系到自身的阶级关系，还要看我们现在工作周围环境的阶级关系怎么样，接触事物中的阶级关系怎么样。比如说，你的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很好，历史上也是革命的，可是现在把你派到香港去工作，你就要想一想周围环境的问题了。不到香港，就在北京做外交工作，跟外国人打交道，或者做外贸工作，跟外国商人打交道，那么你对接触的人和事就要研究研究了。我们跟资本主义国家做的买卖很多，现在又要引进成套设备，有的同志总是跟外国商人打交道。接触的是这些人，你就要研究呀。我也常常接触这些人，我也得想一想呀。总之，阶级关系是要注意的。还是以我为例吧。我出身于一个封建家庭，我个人受过资产阶级教育，不过经过改造现在是个革命知识分子了。历史上我做过统一战线工作，跟蒋介石打过多次交道，跟美国的马歇尔⁽³⁰³⁾也打过交道，在台湾有那么多的国民党同学和朋友，在美国也有很多朋友，我的关系可复杂了。从周围的环境看，我接触党内外的人和事很多，也接触外国人，有时候要出国访问，还到资本主义国家，跟那些国家的领导人打交道。这么一个复杂的情况，我就得注意自己的思想。我今年六十五岁了，是不是已经修养得很好不必改造了？我不敢这样说。廖鲁言⁽³⁰⁴⁾同志用了我的话，他说，周总理都要思想改造，何况我们？他的这句话是句好话，我很欣赏。我的确常说我也要改造这句话，现在还在改造中。我愿意带头。我希望大家承认思想改造的重要性。要承认各种关系各种事

物都会影响个人的思想。要经常反省,与同志们交换意见,经常“洗澡”。要把思想改造看成象空气一样,非有不可。不然,你的思想就会生锈,就会受到腐蚀。每个党员从加入共产党起,就应该有这么一个认识:准备改造思想,一直改造到老。还没有加入党的朋友,凡是参加革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也应该这样。

第二,过政治关。最重要的是立场问题。不要以为我们是干革命的,立场就一定是稳的。立场是抽象的,要在具体斗争中才能看出你的立场站得稳不稳。可能在这个斗争中站得稳,在那个斗争中又站不稳了。所以,立场究竟稳不稳,一定要在长期斗争中才能考验出来。同时还要看我们的工作态度、政策水平、群众关系,看我们的党性,没有入党的看是不是把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的阶级,接受它的思想领导。特别是看我们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是不是知过能改。可见,过政治关不是简单的事,不能认为只要参加了革命,打了多少年的仗,过去有过功绩,立场就可以保险了。没有这样的事。为什么陈独秀⁽⁴⁰⁾、王明⁽¹⁹⁴⁾的立场不保险,高岗⁽³⁰⁵⁾的立场也不保险?在陈独秀身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就极少,更没有成为他的指导思想。王明直到现在对自己的错误还不认帐。所以,我们要认真对待立场问题,过好政治关。

第三,过社会关。一般总是讲思想、政治两关,我特别提出后三关,是因为中国这个社会极其复杂,我们还有改造社会的任务。在这个社会里,旧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习惯势力,很容易影响你,沾染你,侵蚀你,如果失去警惕,这些东西就会乘虚而入。所以改造社会的任务是很艰巨的,处在领导地位的同

志担子更重。旧社会的习惯势力不是一下子就会消除的，改造是长期的，哪能一次改造就成功呢？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于各个角落里，各种机关团体都有。一个北京城，你只要去看一看，到处可以看到旧的习气。要把北京这个社会改造好，需要几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看，在座的六十岁以上的人恐怕不容易看到了。所以，过社会关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你能把社会改造好，自己也就得到改造了。不然，是你影响它，还是它影响你？《霓虹灯下的哨兵》中说，是资产阶级改造我们，还是我们改造资产阶级？这段剧词说得好。你改造了它，它又影响了你，互相改造，这是个长期的反复的斗争。而且，你在这个地方过好了社会关，换一个环境，那个地方的旧势力、旧习惯又影响你。你在国内过好了社会关，到了香港或是到外国去又变化了。所以过社会关要有精神准备，要有长期奋斗的决心。

第四，过亲属关。不只是直系亲属，还有本家，还有亲戚。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你不能影响他，他倒可能影响你。我看，解决亲属问题的最好办法主要是依靠社会，由社会去锻炼他，改造他。要相信社会的力量。过亲属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天天跟你生活在一起的总有这么几口子。特别是干部子弟，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我呼吁我们的领导干部，首先是我也在内的这四百零七个人⁽³⁰⁶⁾应该做出一点表率来。不要造出一批少爷。老爷固然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代。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不象封建社会和资本

主义社会那样,但是历史也可以借鉴。秦始皇能够统一中国,可是他溺爱秦二世,结果秦王朝就亡在秦二世。我们决不能使自己的子弟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包袱,阻碍我们的事业前进。对于干部子弟,要求高、责备严是应该的,这样有好处,可以督促他们进步。

第五,过生活关。生活关分两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这样,我们就会心情舒畅,才能在个人身上节约,给集体增加福利,为国家增加积累,才能把我们的国家更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精神生活方面,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当然,我们不是说一天到晚只搞政治斗争,只干工作。人的生活要丰富一点,精神更要舒畅一点。文艺生活总是要有的,但是,我们的文艺生活是为了活跃人的思想,提高人的修养,把教育寓于文化娱乐之中。我们的文艺节目要有教育意义。那种庸俗低级的、野蛮恐怖的、堕落腐化的东西,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产物,我们应该坚决批判,坚决反对,不能用官僚主义态度对待它,容忍它。这些东西不仅对我们不利,对青年一代的成长更为不利。还应该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文艺思潮和文艺作品是颓废的没落的,决不能让那些糟粕影响我们的干部,影响我们的青年一代。我们要在这方面加以整顿。上一次我在文联谈过这个问题,要整顿我们的文艺队伍,加强我们文艺界

的思想改造。

总之,对个人来说,这“五关”不是一次就能过了的,而是长期的。我们的领导干部要认真对待,严格要求自己,一步一步地过好“五关”。

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五日)

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时候,严格遵守以下八项原则:

第一,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

第二,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

第三,中国政府以无息或者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

第四,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第五,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

第六,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

* 这是在访问加纳共和国时答加纳通讯社记者问的节录。同月二十一日发表的中国同马里共和国两国政府的联合公报中正式写入了这八项原则。

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

第七,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

第八,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七日)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中国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同日,中国政府就这一事件发表声明,详细地阐明了中国对于核武器问题的立场。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中国掌握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的核威胁。

中国政府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中国政府继续争取通过国际协商,实现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并且为此,在自己的声明中,提出了以下建议,即:

“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作为第一步,各国首脑会议应当达成协议,即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很快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义务,保证不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区使用核武器,彼此也不使用核武器。”

* 这是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名义发出的致世界各国政府首脑的电报,刊载于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人民日报》。

防止核战争,消灭核武器,是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国政府真诚地希望,中国政府的上述建议将得到贵国政府的有利考虑和积极响应。

在治理黄河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这次会议是国务院召开的,我本来想用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去现场看看,由于临时有国际活动,回国后又忙于准备三届人大,离不开北京。

对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改建问题,要下决心,要开始动工,不然泥沙问题更不好解决。当然,有了改建工程也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改建也是临时性的,但改建后情况总会好些。

治理黄河规划和三门峡枢纽工程,做得是全对还是全不对,是对的多还是对的少,这个问题有争论,还得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观察才能看清楚,不宜过早下结论。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能使黄河水土为民兴利除弊,各种不同的意见都是允许发表的。旧中国不能治理好黄河,我们总要逐步摸索规律,认识规律,掌握规律,不断地解决矛盾,总有一天可以把黄河治理好。我们要有这样的雄心壮志。

黄河治理从一九五〇年开始到现在将近十五年了。但是我们的认识还有限,经验也不足,因此,不能说对黄河的规律已经都认识和掌握了。我们承认现在的经验比十五年前是多了,比修建三门峡枢纽工程时也多了,但将来还会有更多的未知数要我们去解答。不管持哪种意见的同志,都不要自满,

要谦虚一些，多想想，多研究资料，多到现场去看看，不要急于下结论。

改建规模不要太大，因为现在还没有考虑成熟。总的战略是要把黄河治理好，把水土结合起来解决，使水土资源在黄河上中下游都发挥作用，让黄河成为一条有利于生产的河。这个总设想和方针是不会错的，但是水土如何结合起来用，这不仅是战术性的问题，而且是带有战略性的问题。比如说，泥沙究竟是留在上中游，还是留在下游，或是上中下游都留些？全河究竟如何分担，如何部署？现在大家所说的大多是发挥自己所着重的一部分，不能综合全局来看问题。任何经济建设总会有些未被认识的规律和未被认识的领域，这就是恩格斯说的，有很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必须不断地去认识，认识了一个，解决一个，还有新的未被认识。自然界中未被认识的事物多过人们已经认识了的。即使有那么多有关黄河的历史资料，当时也许看着比较好，现在再看就不够了，因为情况变了，沧海桑田，要变嘛！即使古书都查了，水文资料积累更多了，也还不能说我们对治理黄河的经验已经够了。这样说是不是永远无法做结论呢？那也不是。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内掌握得比较全面、比较成熟的东西，能够做结论的先做，其他未被认识的或未掌握好的，经验不成熟的，可以等一等，可以推迟一些时间解决。推迟是为了更慎重，更多地吸收各方面的意见，有利于今后的规划工作。

治理黄河规划即使过去觉得很好，现在看到不够了，也要修改。农村工作六十条⁽²⁹⁰⁾要修改，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¹⁰⁵⁾也要改。象这些摸熟的东西还要不断地改，何况黄河自然情况这

样复杂，哪能说治理黄河规划就那么好，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不可能！因此，希望所有行政领导同志、专家要和群众相结合，做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允许大家继续收集资料，到下面去观察、蹲点、研究。大家可以分工从各方面用力。观察问题总要和全局联系起来，要有全局观点。谦虚一些，谨慎一些，不要自己看到一点就要别人一定同意。个人的看法总有不完全的地方，别人就有理由也有必要批评补充。要破也要立。不要急躁，慢一点做结论。这是不是调和的意见呢？当然不是。而是集中对的，去掉不对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样，才能不断前进。

基于这个原因，我们对治理黄河规划和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既没有全面肯定，也没有全面否定。至于设想，可以大胆些。我曾经说过，可以设想万一没有办法，只好把三门峡大坝炸掉，因为水库淤满泥沙后遇上大水就要淹没关中平原，使工业区受到危害。我这样说，是为了让大家敢于大胆地设想，并不是主张炸坝。因为我不这样说，别人不敢大胆地想。花了这么多投资又要炸掉，这不是胡闹吗！我的意思是连炸坝都可以想一想。不过不要因为我说了，就不反对，就认为可以炸了。毫无此意。我也是冒叫一声，让人家想一想。如果想出理由来，驳倒它，就把它取消，不必顾虑。专门性的问题，就是要大家互相发现矛盾，解决矛盾，有的放矢，这样，才能找出规律，发现真理。

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原来苏联专家是按正常高水位三百六十米设计的。我们把大坝高程和运用水位都压低了，施工时大坝高程改按三百五十米，初期蓄水位不超过三百三十五

米。三百三十五米以下库容原为九十六亿立米，现在已经淤了五十亿吨泥沙，只经过五年，已经淤了一半。仅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四年两年就淤积了三十多亿吨。如果再经过一个五年，又遇上两场大水，加上平常年度的淤积，三百三十五米以下库容即将淤满。到那时，回水不影响渭河、洛河是不可能的。过去我们曾设想三门峡水库堆沙年限至少维持二十多年到三十年，在这个时期内，大搞水土保持等各种措施。但是，五年已淤成这个样子，如不改建，再过五年，水库淤满后遇上洪水，毫无问题对关中平原会有很大影响。关中平原不仅是农业基地，而且是工业基地。不能只顾下游不看中游；更不能说为了救下游，宁肯淹关中。这不是辩证的说法。做不好，上下游都受害怎么办？为什么不从另一方面想想？如果三门峡水库淤满了，来了洪水，淹了上游，洪水还要下来，遇上伊、洛、沁河洪水，能不能保证下游不决口？即使不决口也有危险。我们看问题要有全局观点，要进行比较。

有的同志主张维持原状。但是，五年之内能不能把上中游水土保持住？绝不可能！要求在五年内把西北高原上的水土保持住，我看砍了头也没办法。要叫我去，也不能接受这个任务，因为这是不可能办到的。因此，三门峡工程总要改建。

当前的关键问题在泥沙。眼前五年十年内这一关怎么过？即使二洞四管的方案⁽³⁰⁷⁾批准后就施工，也要到一九六八年或一九六九年才能生效，而且四管只能泄一千秒立米，排沙有限。如果在这期间遇上象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四年的情况，库区再淤上三十亿吨，怎么办？这是燃眉之急，不能等。

布来三门峡工程改建的事，请计委批准就可以了，可是有

些意见出入比较大，不征求大家的意见还不安心，因此挤出时间来参加这次会。听了大家的意见以后，情况清楚了。现在，大家都认为增加二洞四管还是需要的，对三门峡工程改建问题的争论少了。个别同志反对这个方案，主张上游修三个拦泥库，只拦泥，不综合利用。我看光靠上游建拦泥库来不及，而且拦泥库工程还要勘测试点，所以这个意见不能解决问题。即使说过去水土保持做得不好，上游勘察工作做得不好，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利电力部工作上都有错误，但是眼前的这个病怎么治？要回答五年内怎么办这个问题。反对改建的同志为什么只看到下游河道发生冲刷的好现象，而不看中游发生了坏现象呢？如果影响西安工业基地，损失就绝不是几千万元的事。对西安和库区同志的担心又怎样回答呢？实施水土保持和拦泥库的方案还遥远得很，五年之内国家哪有那么多投资来搞水土保持和拦泥库，哪能完成那么多的工程。那样，上游动不了，下游又不动，还有什么出路！希望多从全局想想。我也承认三门峡二洞四管的改建工程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而是在想不出好办法的情况下的救急办法。改建有利于解决问题，不动就没法解决问题。改建投资可能多一些，但即使需要八九千万元，也不能不花，哪能看着问题不去解决！看问题要有全局观点，要看到变动的情况。三门峡工程二洞四管的改建方案可以批准，时机不能再等，必须下决心。

今天，我只能解决第一步增建问题，其他问题我还要负责继续解决，不是光注意了中游，不注意上游，更不是不注意下游。绝无此意。现在成熟的方案只有这一个，其他的事情还要继续做。

再补充一点，一切问题都要到现场去实践，通过实践，不断总结，取得经验，然后再实践再总结。到现在我还担心二洞四管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不要把事情想得太满，还可能会遇到困难，还可能发生预料不到的新问题。设计方面要多研究，施工时要和工人多商量，要兢兢业业地做。如果发现问题，一定要提出来，随时给北京打电话，哪一点不行，赶快研究。不要因为中央决定了，国家计委批准了，就不管了。因为决定也常会出偏差，会有毛病，技术上发生问题的可能性更多。我再重复一句，决定二洞四管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既然决定了，就要担负起责任。大家要时常多想想。因为，黄河的许多规律还没有被完全认识。这一点要承认。我还要再三说一下，不要知道一点就以为自己对其他都了解了。当时决定三门峡工程就急了点。头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太重视另一面，不能辩证地看问题。原因就是认识不够。认识不够，自然就重视不够，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一九五九年水电部修建了三百多座大型水库，这几年下马了一些，现在还有将近二百座，很大一部分工程没有完成，遗留问题很大。修水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几年的教训是应该深刻吸取的。

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实现上述第一步任务的一个关键时期。这个时期的工作做好了,再经过大约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就可以有把握地使我国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我们在今后发展国民经济中,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是顺利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重要保证。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应该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

^{*} 这是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第一部分中的一段话。

必须更好地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工业的发展规模，要同农业可能提供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相适应。各行各业都应该面向农村，为农业服务。重工业部门应该首先为农业提供越来越多的机械、化学肥料、农药、燃料、电力、水利灌溉设备和建筑材料，同时为轻工业提供越来越多的原料、材料和设备。为了实现这个要求，进一步加快重工业首先是基础工业的发展，是完全必要的。

农业的发展，一方面要国家给以必要而又可能的财力、物力的支援，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依靠人民公社的集体力量。

第二，正确处理自力更生同国际合作的关系。自力更生是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基本立足点。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从本国的具体情况出发，依靠本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来进行建设，才能比较迅速地发展本国的经济，从而增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威力。

各国人民之间的援助，从来不是单方面的，而是互助互利的。那种以“经济互助”为名，把别国的经济变成附庸，是大国沙文主义⁽⁶⁷⁾的作法。国际合作必须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一个国家只有自力更生地进行建设，才能更有力量去支援别国。而在援助别国的时候，又必须促进受援国家实现自力更生。

自力更生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方针。中国人民不是懒汉懦夫，过去没有、今后也决不会依赖别人过活。我们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体系。同时，我们仍然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认真地加强对

外援助,努力做出更大的国际主义贡献。

第三,实行技术革命。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亚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么?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³⁰⁸⁾。

要采用先进技术,必须发挥我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大搞科学试验。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神相结合。采用新技术必须同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相结合。必须实行科学研究、教学同生产相结合。

第四,实行集中领导同大搞群众运动相结合。我们党在革命斗争中领导群众运动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开展群众运动,也取得了成功的经验。这就是:要把任务

交给群众讨论；开展比学赶帮竞赛；实行领导干部、专家、群众三结合；既要提倡敢想敢说敢做的革命精神，又要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既要干劲十足，又要劳逸结合；对于群众的各种创造，必须经过试验，逐步推广；必须坚持党的阶级路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各种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农村卫生工作和计划生育问题^{*}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一日)

这是林大夫⁽³⁰⁹⁾和傅连璋⁽³¹⁰⁾会长给我出的难题。你们讨论妇产科专门问题,我完全是外行。我讲什么呢?我讲讲卫生工作面向农村和计划生育的问题吧。

我国农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七八,城市人口只不过占百分之十二三。如果我们的卫生工作不把重点放到农村,那怎么为劳动人民服务啊?为绝大多数劳动人民服务的口号等于没有兑现嘛。这个问题直到毛主席再三提出来,才引起卫生部门的注意。当然我们政府要负责,我做国务院总理的首先要负责。虽然有时也说过,但提得不那么着重,不那么尖锐。毛主席这么一提,卫生部门就具体订计划了,现在已经有了初步规划。

在五年之内真正把农村中三种卫生人员培养起来,这是一个艰巨而伟大的任务。一种是不脱离生产的卫生员,每个生产队有一名,全国有五百多万生产队,就要训练五百多万卫生员,五年能不能做到,现在还说不定,也许需要十年。要培养这样多不脱离生产的卫生员,使他们成为多面手,既能治一般的

* 这是接见中华医学会第一届全国妇产科学术会议代表时的讲话。

病,又能治妇科病,还会接生。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你们在座的都有责任,不要把它看得容易了。卫生员不脱离生产,又有一定的本领,生产队非常欢迎。当然不能保证培养这样的人都是百分之百地合格,不合格就再培养,再进修嘛。第二种是在生产大队和一部分公社能够有半脱产的卫生员,治病时给他记工分,不治病时也去参加体力劳动,这些人由公社或大队管。对他们的本事要求高一点,不仅能治一般的头痛、伤风,还能治一些比较难治的病。全国有八十多万个生产大队,一个大队培养一个人就是八十多万个,有的大队还可能不只一个人。第三种是为公社或区里培养脱离生产的专职医生。全国有七万多个公社,每个公社培养三至五人,总共就要培养大约三十万人。这些人基本上脱离生产,在一年里有些时间能参加一些体力劳动也好。应该说明医务人员的工作也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的。林大夫过去忙的时候,一星期要做好几次手术。年轻的大夫每天在手术室做手术一站几个小时,手术前还要做准备,这是脑力劳动,也是体力劳动,是脑力和体力结合的劳动。护士也是一样。除去医生和护士外,还有医院的其他技术人员也都是半脑力劳动半体力劳动。

怎样才能帮助农村培养出这三种人,这是个大问题。现在整个卫生队伍除行政人员外,还不到一百万人,要训练这三级卫生人员六百万到七百万人,我看五年不可能实现,也许十年才能实现,可能还要扫尾。计划可以打得宽一些,工作要抓紧,如果不到十年完成当然更好。在座的女同志应该负更多的责任,因为培养上述三种人中人数最多的不脱产的卫生员一级,可能大多数是女同志,六七百万各级卫生人员半数以上是女

同志,任务很艰巨。你们如何去培养呢?如何入手呢?一定要组织大中城市、工矿企业、机关、学校以及军队的医务人员,分期分批组成医疗队,到农村去,主要做两件事,一是治病,一是培养医务人员。只要真正为农民治病,为他们培训医务人员,农民就欢迎得不得了。对一部分年老体弱的大夫不能勉强他们去,年纪太大了,走路都要人扶,还不如留在城里。象蒲老,蒲辅周⁽³¹¹⁾先生,是很有名的中医,如果到农村去,受了风寒,反而把他的服务期限缩短了。这样的医生就要留下,他们可以教学生,也可以写点东西,把丰富的经验留下来,对人类对人民都有贡献。城市也不能不管。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二三,有一亿多人,将来也许更多,要做好他们的医疗保健工作。要改革医疗制度,还要培养人,这也是很重要的任务。

另外,我讲讲计划生育问题。对计划生育要进行宣传教育。一方面要有一些规定,如在工资、住房、供应等方面,对实行计划生育的,要给予优待,一方面要自觉自愿,绝对不能强迫命令。又要自觉自愿又要有所约束。要用各种办法帮助人们避孕。怎样使我国人口能有计划地生育,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现在全国有七亿人,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人口增长得太快,生产就跟不上,这是一个大问题。要使全社会都能够按照计划生育的要求,在二十世纪以内把人口年纯增率控制在百分之一,这就很了不起。总之,计划生育是一件长期的事情。上述这个要求并不高,如果能够提前做到当然很好了。

植树造林是百年大计*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林业工作要面向全国,依靠全党全民,要两条腿走路。林业部过去只注意林区采伐,我看主要任务还是造林⁽³¹²⁾。工业犯了错误,一二年就可能转过来,林业和水利上犯了错误,多少年也翻不过身来。我最担心的,一个是治水治错了,一个是林子砍多了。治水治错了,树砍多了,下一代人也要说你。我国森林覆盖率只有百分之十多一点。十六年来,全国砍多于造,是亏了。二十世纪还剩下三十几年,再亏下去不得了。造林是百年大计,要好好搞。

造林也要两条腿走路,要依靠六亿农民。四旁⁽³¹³⁾植树也是个大工作。兵团要搞试点。用剃光头的办法采伐森林,采光了就走,修一条林区铁路废一条,这怎么得了!营林是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不能吃光了就算,当败家子⁽³¹⁴⁾。过去林业部长梁老⁽³¹⁵⁾经常讲这个问题。现在抓紧造林还不晚。

林业部要把主要力量放在南北方造林上。要调查公社的造林办法,总结推广经验。

国营与群众营林,重点放在群众;伐木与育林,重点放在

* 这是同出席全国林业工作会议的西北各省、自治区林业厅(局)长和西北林业建设兵团、林业部负责同志的谈话。

育林；前方与后方⁽³¹⁶⁾，重点放在前方。重点放对了，才能用得少，造得多。总得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摸出一套林业工作的经验来。

北方八省⁽³¹⁷⁾地区大，人口多，树林少，造林工作搞起来能很快发展。南方各省条件好，更要做好。南方本来有林，现在一些地方也有水土流失的现象。南方造林、护林、用林都很重要。

林业部到处提倡植树，可是在眼睛鼻子底下，就是到北京机场这一段路好，北京到天津的路上最难看了。十多年了，要你们在铁路两旁植树，就是不种，可难看了！有人讲公路上好一些，可是我从火车上看公路，也是一样。树本来是容易种的，与公社结合，委托给他们，分段负责，就能种好管好。

西北地区造林要集中在黄河泥沙主要来源地区，不要孤零零地分散搞。分散了，投资很大，功效很小，起不了多大作用。

西北黄土高原搞了多少年造林啦？劳大功小，要很好总结经验。陕北防沙林带有人烟，地下水浅，就可以造林。靖边、定边高原上水位低，不容易成林。要有选择、有阵地地前进。面对黄河流域二十八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区，只要有雄心壮志，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就能战胜它。黄土高原是我们祖宗的摇篮地，是民族文化的发源地，但是这个地方的森林被破坏了。我们不仅要恢复森林面貌，而且要发展得更好。

西北局要搞一个领导小组，管农垦、水土保持。农林互相支援有好处。植树造林是百年大计，总得坚持到二十一世纪。华北大有可为，西北更是大有可为。

发展生产, 重建家园^{*}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日)

同志们, 乡亲们:

你们受了灾, 损失很大, 党中央和政府非常关心你们, 毛主席让来看望大家, 慰问大家。昨天夜里我到了隆尧县城, 听了地委、县委的汇报, 今天又来到这里。

这次地震来得很突然。你们这个地方从邢家湾到耿庄桥是地震的中心。二十年前, 在抗日战争中, 你们也受了损失, 那是和民族敌人作斗争。这次是和地底下的“敌人”作斗争。每个村庄、每个家庭都有很大损失。付出了代价, 也取得了经验。

听到地震的消息后, 解放军立刻赶来了, 地方上的工作队和医疗队也来了。重伤的得到抢救, 轻伤的得到治疗, 牺牲的也掩埋起来了。他们牺牲了, 我们要继承他们的事业。我们要和地球“打仗”。你们这个地方是洼地, 过去改造得不错, 现在要战胜地震灾害, 重建家园。重建家园光靠你们的力量还不够。你们县西部有好多没有受灾的庄子, 巨鹿、宁晋、任县都有些没有受灾的庄子, 可以来帮助你们。互相支援, 过去

* 一九六六年三月八日, 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三月九日, 周恩来同志到达灾区。这是在隆尧县白家寨慰问灾区人民大会上的讲话。

打日本就是这样。重建庄子要建得分散一点，房子要矮一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要带头抗震救灾。你们组织起来，办法一定会有的。国家当然要支援你们。你们这个地区有三十个公社、三十四万人受灾，现在已开进解放军两万多人，地方上的工作队和医疗队一万多人，共三万多人，十个人就有一个人帮助。真是一人有困难，大家来相帮，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你们不是学过《愚公移山》吗？愚公能够移山，我们对现在的困难也一定能够战胜。死了人当然难过，但是不要低头。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团结就是力量！老年人家里没有人，我们要照顾他们，娃娃没有人带，我们要帮着带，这些都要靠青年壮年去做。

我不能到每个庄子去了，请你们庄子做代表，你们要把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和我讲的这些话传给别的庄子。中国人民是有志气的。你们要学习毛主席著作，把劲头鼓起来，用七八天的时间把生活组织起来，过几天还要搞生产。隆尧要和巨鹿、宁晋比嘛！恢复了生产，恢复了力量，就对得起死去的人。现在大家一起呼口号：

奋发图强！

自力更生！

发展生产！

重建家园！

重建家园后，再来看你们。

关于保护干部的若干文电^{*}

(一九六六年——一九七四年)

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

宋庆龄 郭沫若 章士钊 程潜 何香凝
傅作义 张治中 邵力子 蒋光鼐 蔡廷锴
沙千里 张奚若⁽³¹⁸⁾

- (1) 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副主席
- (2) 部长、副部长
- (3) 政副
- (4) 国副

-
- *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达到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残酷迫害党内外干部，制造大批冤假错案。周恩来同志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为保护干部作了极大的努力。这里辑的是有关文电的一小部分。
- **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夜，某校红卫兵抄查章士钊先生的住宅。三十日晨，章写信给毛泽东主席。毛泽东同志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恩来同志严厉批评了有关人员，责令当即送回抄走的全部书籍，并派人前往保护章宅。同时写下了这份名单。九月一日，又命三〇一医院准备接收章士钊、程潜、傅作义、蔡廷锴、李宗仁等先生入院，对他们加以保护。

(5) 各民主党派负责人

(6) 两高⁽³¹⁹⁾

(李宗仁⁽³²⁰⁾)

应当尊重宋庆龄*

(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她年纪很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她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³²¹⁾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住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

* 这是对首都红卫兵的讲话节录。

不应改变被批斗干部的工资^{*}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八日)

吉林省委九月十六日电悉。对被批判斗争对象的工资处理意见：即使已定性的，也暂不改变；如本人少领工资，或捐献一部分工资作党费，听其自愿，但不强求，也不许其由减少用费而致病。凡未定性的，工资仍照旧。

一定要放出李葆华⁽³²²⁾、李任之^{(323)**}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请陶铸⁽³²⁴⁾同志以电话找安徽省委一谈。如情况属实，请找八·二七造反团负责人以电话交涉，无论如何要放出李葆华、李任之两同志，让他们回家休息。

关于刘澜涛出狱问题⁽³²⁵⁾

给西北局的电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二十三日电悉。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

* 这是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中共吉林省委并告各中央局的电报节录。

** 这是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中共安徽省委两位书记被连续批斗的情况反映上的批示。

*** “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等人制造了“六十一人”案件，诬陷一大批老干部。为保护这批干部，周恩来同志写信给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刘澜涛同志等出狱“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并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西北局的这份电报。

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九大⁽³²⁶⁾代表应包括王恩茂⁽³²⁷⁾ * (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二日)

新疆自治区出席九大的代表应包括王恩茂同志在内。你们已为此做了不少工作，并为他留出名额。现在你们正面临新的困难。如说服党员干部和党内外革命群众需要时间才能选出，可先将王恩茂同志全家送来北京，以便继续工作。

你们意见如何，望告！

建议徐海东⁽³²⁸⁾参加九大主席团^{**} (一九六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今晚与主席团预选成员和军队主要负责同志协商徐海东同志为九大代表。如取得大家同意，拟同时提议徐也参加主席团，然后由各组召集人回到各组征求全体代表同意。徐海东同志既已当代表，就以参加主席团为好，我和军委办事组各同志商量都同意。请示主席批准。

* 这是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电报。

** 这是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

陶铸⁽³²⁴⁾应送入医院治疗*

(一九六九年四月五日)

拟同意送入三〇二医院，进行保密治疗。即呈主席批阅。我是看了四月三日警卫局的报告才知陶的病状较重，经追问后，送来这一报告。

不要斗批民主党派的领导人**

(一九六九年五月四日)

派往各民主党派机关的军代表不知已否派去？如已派去，可与他们谈谈政策。

机关革命造反派的任务是清理机关干部的队伍，而不要去斗批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即他们的中央委员、省市党部委员。如他们中间出现了现行的反革命分子，自当别论，但也需先报告军管代表，得中央或省、市革委会同意后，方能采取行动。

机关干部也要在清理队伍时，按具体情况区别对待，不能以中共党内标准要求。

附上邓初民⁽³²⁹⁾先生一信，请加注意。

* 这是在《关于陶铸的病情报告》上的批示，经毛泽东同志圈阅过。

** 这是给当时国务院直属口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转人大、政协军代表的信。

应给华罗庚⁽³³⁰⁾以保护*

(一九七〇年三月四日)

首先,应给华罗庚以保护,防止坏人害他。

次之,应追查他的手稿被盗线索,力求破案。

再次,科学院数学所封存他的文物,请西尧⁽³³¹⁾查清,有无被盗痕迹,并考虑在有保证的情况下,发还他。

第四,华的生活已不适合再随科大去“五七”干校⁽³³²⁾或迁外地,最好以人大常委身份留他住京,试验他所主张的数学统筹方法。

此事请你们三位办好后告我。

关于张霖之⁽³³³⁾死亡问题**

(一九七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国务院业务组于一九七〇年七月三十一日会议,审查了煤炭部军代表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和七月三十一日两次报告,以及首都驻北京矿业学院工、军宣队⁽³³⁴⁾专案组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七日的报告,同时,并阅看了反革命分子戚本禹⁽³³⁵⁾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矿院的公开演说。大家一致认

* 这是就华罗庚同志要求追查被盗手稿的来信,给当时国务院直属口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负责人和周恩来同志派到科学院的联络员的批示。

** 这是为国务院起草的给煤炭工业部的通知节录。

为：张霖之同志的历史是清楚的。张霖之同志在矿院全校广播中听到成本禹反革命分子这种威胁和煽动的语言，而身体已受到重伤，自不能不陷入极度紧张状态，因此，致张在武斗和逼供的混乱中死去。

根据当时情况，矿院专案组的报告只涉及各项经过的表面现象，还需要依照煤炭工业部所掌握的全面材料，认真地予以澄清。

兹决定，张霖之同志的死亡，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张霖之同志家属和他的子女不受任何牵连，应按革命干部家属看待。

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请你们联合起来办三件事。

一、将刘建章⁽³³⁶⁾保外就医。按他身体病状，或送阜外医院，或送工农兵医院，并通知其妻刘淑清及其子女家属去看望刘。

二、将刘建章全案结论抽出送国务院先念⁽³³⁷⁾、登奎⁽³³⁸⁾同志批。

三、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我在国务院当面提出过的要

* 一九七二年，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刘淑清同志写信给毛泽东同志，反映刘建章同志无辜被捕及在狱中受到迫害。毛泽东同志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周恩来同志立即给公安部、交通部和国务院办公厅负责人写了这封信。

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再在年内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

各事办好，请分别报来。附去主席批示件，请随第三事办好退回。

对参加国庆招待会名单的意见*

(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昨晚你交我国庆节招待会拟见报的名单，并告我已经主席一一听过，主席当即提出要加肖华⁽³³⁹⁾、李力群⁽³⁴⁰⁾、侯宝林⁽³⁴¹⁾三人，又问及商震⁽³⁴²⁾是否列入。经政治局昨晚讨论，你告我遵照主席精神，又加刘志坚⁽³⁴³⁾一人。昨夜我匆匆看过名单，便想到齐燕铭⁽³⁴⁴⁾。

今晚又将两千多见报名单细细翻阅。在第十七类爱国人士方面，据统战部提出起义将领四夫人韩权华（卫立煌⁽³⁴⁵⁾夫人）、郭翼青（程潜夫人）、洪希厚（张治中夫人）、刘芸生（傅作义夫人）及张学铭⁽³⁴⁶⁾（张学良⁽³⁴⁷⁾之弟、张学思⁽³⁴⁸⁾之兄，因吕案解案⁽³⁴⁹⁾被禁多年，去年已无罪释放）五人。我看，四夫人对国内外影响也不小。至于张学铭，则因林彪利用东北军一案大搞东北民主人士，现吕正操同志已平反，张学思已死（此案亦应弄清），故邀张学铭出席有此必要。

* 这是写给王洪文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封信的节录。当时，周恩来同志病重住院，政治局日常工作由王洪文主持。

关于经济工作的几则文电^{*}

(一九六六年——一九七三年)

工人请愿不要妨碍生产^{**}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欢迎你们派代表(小厂一人,大厂二至三人,总数请不要超过三百人)来北京商谈。

请你们认真考虑:成千的工人同志来北京请愿,既不便于接待和会谈,也会影响你们工厂的生产。如果另一方面工人同志也照样来京,那将更影响生产。

我们希望:在省、市委和厂矿企业的领导方面,要保证不得解雇工人,不得扣工资,不得打击报复,不得用党籍、团籍来威胁工人;在工人同志方面,要保证安排好生产,不要妨碍生产和交通运输。

你们来京人数确定后望告,以便通知铁道部配车,车费由

-
- *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全国各地煽动派性,挑动武斗,破坏生产,中断交通,使国民经济遭到巨大损失。周恩来同志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尽力促进职工队伍的团结,稳定局面,维持生产,减少损失。这里选辑的是有关这一方面工作的几则文电。
 - ** 这是由周恩来同志修改和审定以国务院名义发给成都拟来北京请愿工人的电报。

所属厂矿解决。廖志高⁽³⁵⁰⁾同志也同你们的代表一道来京。

藏 富 于 民^{*}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日)

毛主席说过，农民以多报少是藏富于民。粮食多了百分之十，只有好处，农民是不会乱吃掉的，藏在农民家里比国家收购起来还好。你们不要产生错觉，这不是提倡不老实，毛主席讲这句话的意思是整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者不下去，不调查，一九六一年以前实行高指标、高征购，整了农民，现在他们就多报少。城市也是这样，多报人口，口粮就多算了。

土地以多报少，粮食以多报少，人口以少报多，灾情以少报多。两个以多报少，两个以少报多，这是对付官僚主义的办法。如果我们实事求是，依靠贫下中农，他们就会说真话。

必要的奖励政策不能叫物质刺激。过去实行奖励政策是需要的。对产棉花地区要给些化肥和粮食，使他们的生产恢复得快些。我们出口一吨大米可以换回一点七吨小麦或两吨玉米，换回来外汇，很有利嘛！

粮食工作也有错误。以前有过大进大出。征购多了，必然返销，造成假象，徒劳往返。毛主席主张能少购就少购一点，藏富于民是好事。战争打起来还是藏富于民好，特别是要消灭敌人在国境内，这就更有必要了。

* 这是接见十四个省、市夏季粮油征购会议代表时的谈话节录。

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送上铁路中断情况电讯八份,请阅。今午在主席处,已说明铁路轮船关系到全国交通命脉,决不能中断。下午曾约集富春⁽³⁵¹⁾、先念⁽³³⁷⁾、剑英⁽³⁵²⁾、肖华⁽³³⁹⁾、成武⁽³⁵³⁾、谷牧⁽³⁵⁴⁾、秋里⁽³⁵⁵⁾各同志会商此事,除已报请批发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命令外,并拟将全国十八个铁路管理局分给附近驻军实行军管包干,将沿海沿江轮运交海军军管包干,均与当地军分区、武装部分开,不再介入地方支左⁽³⁵⁶⁾工作,以便统一全国铁路轮船运输,免受干扰。这一计划正由总参草拟,明日当可订出送审。

此外,拟为此事再发一告铁路轮船职工书,定稿后再送阅。

联合起来,保护海港运输^{**}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日)

据说,由于厦门海关和港务局各分两派,无人检查,致英国商船到来后无法靠岸,而该船有三病号,吃喝均成问题。这种违犯国法、影响祖国信誉的行动,是极端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望厦门军管会、调查组接此电话后立即向两派组织

* 这是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信。

** 这是给厦门军管会的电话稿。

号召：对外、对业务必须采取联合行动，如果哪一派响应中央、主席号召并见于行动，中央将通报表扬，如拒不执行，中央定予以揭露，并命令军管会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海港检查、靠岸装卸。哪一派破坏这一行动，军管会应按《六六通令》⁽³⁵⁷⁾ 惩处该派的主使人和肇事头头。

制止武斗措施*

(一九六八年)

取消武斗专业队。

按系统归口接受革命大联合三结合。

不许重拉队伍另立山头，革委会、军管代表要保证任何工人职员不得被赶离本生产工作岗位。凡自动脱离不回厂者要限期回厂，逾期不归的扣发工资，半年不回的开除。

凡回厂者要由革委会、军管代表保护，被打的，要追查凶手，送院治疗，按期送工资。

停止脱离生产和工作岗位的自由串连。

不容再运再抢武器弹药。

不许攻夺建筑物，建立据点。

不许抢夺任何公家仓库商品物资。

更不许杀人放火。

* 这是周恩来同志的手稿。

合理的规章制度应该保留^{*}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二日)

飞机因质量事故影响到战备和援外，影响到安全。你们都是空军来的，怎么能对同志的性命这样不负责呢？一个军事工厂搞得这样怎么行？四一〇厂取消了检验制度你们是不是知道？报告了没有？你们为什么不敢抓？为什么不下命令恢复？你们就是怕事，怕群众。我是早上看到报告的，看后非常难过，军事工厂哪能搞成这样！你们现在还说检验制度正在逐步恢复。什么逐步恢复？你们怎么能这样说话，怎么能用这样的词句？不是逐步恢复，而是应当马上恢复！对的、合理的要马上恢复，不对的不恢复。检验是不能放松的。你们应当下命令嘛！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合理的还是要保留，一概取消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不尊重科学的。不能违背科学。应该相信工人阶级，只要把道理给他们讲清，他们是不会同意取消这些合理的规章制度的。有些人要把一切制度砸烂，这是极左思潮。对西北、西南、东北都要派人去检查。二十年来，毛主席的红线还是主要的，不能否定一切，要一分为二，不然二十年的工业生产怎么能发展起来呢！

^{*} 这是在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解决飞机生产质量事故问题时的谈话节录。

要把质量问题放在 议事日程来解决*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一

“歼六”四十架，原说是为援外装配的。一经检查，便有七架不能交付，占全数百分之十七点五。只此一端，就可看出我们飞机生产质量下降到什么程度，还不够我们提起警惕么！

二

请秋里⁽³⁵⁵⁾象剑英同志一样，把长汽、二汽、重汽、南汽⁽³⁵⁸⁾抓一抓。质量这样下降，如何援外，如何备战？这是路线问题，要在这个月内放在议事日程来解决！

消除林彪一伙对经济的破坏性后果**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一九六九年以后，在经济管理上瞎指挥盛行。南昌把飞机厂最好的工人放下了。景德镇陶瓷窑也给炸了。林彪一伙一直破坏到“九一三”⁽³⁵⁹⁾，影响到一九七三年，恶果逐步暴露出

* 这是关于飞机、汽车生产质量问题的两件批示。

** 这是在国家计划委员会汇报一九七三年计划和《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的草稿时的插话。

来了。应把九大⁽³²⁶⁾以来林彪一伙破坏经济计划的情况编个材料，供大家批判。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

工业生产指标，煤增长最少，电也少啊！这样，生产怎么能上去。国民经济要按比例发展，但现在根本没有比例！

经济协作区问题怎么提法？到处搞独立经济体系是不行的。

基本建设战线为什么长？一是中央各部的项目多了，一是地方项目也多了，原因就在这里。中央和地方，首先中央收缩一下。中央、地方都不许扩大建设规模，中央先下一些，给地方留点余地。

基本建设要经常检查，全年抓。一九七〇年基本建设大膨胀，一九七二年没有抓，鉴于这个教训，以后要全年抓。该停的停，停得不合适的再建。

基本建设中的问题，还要说一条，有人在基建中顺手牵羊，搞非生产性建设。当然必要的可以建，如宿舍、商店、学校要建。但是有很多建筑不是这方面的，要指出来。

地方五小工业⁽³⁶⁰⁾要整顿的问题说得不够。搞五小工业也要有原料、材料和设备的保证。没有原料也搞，同大厂争原料，变成自由发展了。整顿的方针要写清楚。发展五小工业要有个范围，要对农业有利，破坏计划的无论如何不能发展。

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售量三项都突破了计划数字。去年我讲了这个问题，但没有抓。确实没有“王法”了。

不只三个突破，货币发行也突破了。这不是那么舒服的。

资本主义有经济危机，我们与他们根本不同，但也不那么舒服。商品有差额，货币回笼不了。职工人数多了，工资多了，货币流通量也一定多了。多是一定要多的，但现在超过了实际需要，要研究这个问题。今年市场平衡有三十亿元的商品差额，票子发多了。

林彪一伙破坏经济所造成的恶果这两年表现出来了。票子发多了，到了最大警戒线。三个突破不如这一个突破。你们管财政、银行的也不叫，要随时提醒，这是个寒暑表嘛！湖北货币大投放，去年第四季度预支今年的，安徽、江苏也投放。这样大胆地开支，过去是少有的哩！

全国职工总数突破五千万人，一下子达到五千六百多万人。你们要抓一下。民工好减，五小工业工人、临时工要动员回去，现在就要进行工作。

钢那么多，钢材怎么样？前后左右不衔接，出了钢不能轧材，白白消耗了热能。还是十年前存在的问题，一前一后，前后左右总是个大问题。运输能力也不行，进出口拥挤不堪。这些不建设，光搞大品种不行。

按劳分配的问题，现在是四个一样⁽³⁶¹⁾嘛！还有干难干易一个样。“不利于调动职工积极性，也不利于控制职工人数的增加”，这句话说得对！

必要的奖励制度是可以的。

农业生产要注意防涝抗旱*

(一九七三年五月十四日)

请你们好好读一下五月十四日的《参考消息》(五二五一期)四版下栏关于世界气象变化的两篇报道,并要气象局好好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今年我们可能还会遇到南涝北旱的局面,请告农林部多多提醒各地坚持实行防涝抗旱的措施,不要丝毫松懈。

* 这是给李先念等同志的信。

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

(一九七〇年——一九七三年)

不要因人废文^{**}

(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七日)

王云五^[362]编的四角号码字典为什么不能用?不要因人废文。一个人有问题,书就不能用了?它总有可取之处嘛!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是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这三个来源还不是资产阶级的或受唯心史观限制的学说吗?可是它们都含有合理的因素。任何思想的发展都不是无根的,新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剥削阶级的出身不能改,思想却是可以改造的。这就叫历史唯物主义。要有点辩证法,不要一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就气炸了,那叫形而上学、片面性。

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就不能要了?那样做,不叫为群众服务。青年一代着急没有书看,他们没有好书看,就看坏书。毛

*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乘机煽动极左思潮,使文教、科技、出版等方面的工作遭到严重破坏。这一组文件,部分地反映了周恩来同志在这几个方面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作的斗争。

** 这是同文化教育部门一些负责人的谈话节录。

主席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讲，要学哲学，要反对唯心主义。同志们要好好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

要懂得水有源树有根。毛泽东思想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新华字典》也是从《康熙字典》发展来的嘛！编字典可以有创造，但创造也要有基础。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新的出不了，旧的又不能用，怎么办？芭蕾舞是洋的，能说是我们创造的吗？我们编的芭蕾舞剧，基础是原来的，内容却是新的，形式又有了改造，这就叫做洋为中用。芭蕾舞还要发展。你们文化部门的同志要好好读几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知道一点根嘛！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可以先学《实践论》，要通过实践来提高我们的认识。

关于外语教学的谈话*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日）

你们要研究一下，外语师资短训班的效果到底如何？学的能巩固吗？落实的有多少？也许个别人学得快，多数人是平平或较差，个别人不行。如果五十天效果很差，可以向主管部门提出建议，延长一些时间。要抱着对学员负责的态度，否则误人子弟。师资培训不好，将来学生也教不好。短训班质量不行，人家会骂你草草了事。

* 这是接见北京大学、北京外语学院等校师生代表时的谈话节录。

学外语要天天练。天天练的时间不要仅限于一个小时。如果硬性规定一小时，其他时间就不许练，这种办法一定要脱离群众的。他们是学外语的，将来要做外语工作。外语教师也好，外事工作人员也好，总是要练，要允许人家抽空练。人家自己挤点时间练，不要去干涉！所以天天练不要限于一小时。别的活动多的时候也不要取消练外语。时间允许的话可以增到两三个小时。

苦练，应当成为原则，毛主席就强调这一点。写字也要苦练才能写得好。要把语言这个工具用得纯熟，还是要苦练。要看一些新的资料，光看课本不够。

翻译工作不是那么好做的。不仅要有现场经验，还要掌握材料，了解背景，真正翻译得恰当是不容易的。

现在有的中学英语课本，只有政治词汇，没有生活词汇，实在不适用，应当修改。政治语言和生活语言可以一并学，实际上也不能分。北大英语教材有一个问句：“你出身工人家庭吗？”这个问题局限性太大，难道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出身？

外语教学有个基本功问题。比如京戏有基本功，唱腔、道白、武打等，这都是京戏艺术的基本功。而且，京戏的基本功不限于京戏艺术本身，还有政治、历史、地理等知识。学外语也是如此，不光是要掌握外语的语音、词汇、语法，做好听、说、读、写、译五个字，还要懂得历史、地理。不仅要读中国地理、历史，还要读世界地理、历史。自然科学也要懂一些。马克思、恩格斯懂得很多自然科学知识。毛主席也知道得很多。你不懂这些知识，做翻译时就译不出来。搞翻译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懂几句外国话就行的。不但要有政治水平，同时要有较高

的文化水平。没有基本功和丰富的知识不行。基本功包括三个方面：政治思想、语言本身和各种文化知识。

外语教学要造就什么人材？第一是师资，有了好的师资，中学生把外语学好了，进大学或以后自学就有了基础。第二是培养懂外文的干部、技术人员，要使他们能够读外文资料。第三是外事工作人员。这三方面的需要都很急迫，需要量最大的是师资，最急需的是外事人员。因此，要认真搞好外语教学。俄文为什么丢掉呢？一旦需要，量是很大的。

讲历史，多出书^{*}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二日）

你们管出版的，要印一些历史书。我们要讲历史，没有一点历史知识不行。你们的出版计划中有没有历史书籍？现在书店里中国和外国历史书都没有。不出历史、地理书籍，是个大缺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都是从资产阶级的或受唯心史观限制的学说发展来的。不讲历史、割断历史怎么行呢？中国人不讲中国历史总差点劲。毛主席的著作还有不少篇幅是讲历史的嘛！读毛主席的著作也得懂历史。

同志们说，有的地方把封存的图书都烧了，我看烧的结果就是后悔。应该选择一些旧的书籍给青少年批判地读，使他们知道历史是怎么发展来的。都读新的，哪有那么多？要有组织地给他们读一点书，总不能把历史割断吧！否定一切，

* 这是在接见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成员时的谈话节录。

不一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不是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那些把书都烧了的，还不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不一分为二，就是极左思潮。

《鲁迅全集》封起来干什么？这不是滑稽得很吗！普列汉诺夫⁽³⁶³⁾前期是马克思主义者，有好的著作。把有点问题的书都封起来，只有少数人能看，只相信自己不会受影响，其他人就都会受影响？群众总是比我们个人知道得多，他们是能够作出判断的。一面说青年没书读，一面又不给他们书读，就是不相信青年人能判断。无怪现在没有书读了，这完全是思想垄断，不是社会主义民主。

我看现在要出一批书，要广开言路。读马克思、列宁的书和毛主席的书是主要的，但也要读历史、地理，读哲学。有些青年连世界地理位置、重大历史事件都搞不清楚，知识面越来越狭窄，这不行，这样是不可能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毛泽东思想不是孤立产生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伟大的实践产生的伟大的知识。

极左思潮破坏艺术质量的提高*

(一九七二年四月九日)

你们报幕的同志，为什么不报独唱、伴奏人员的名字？看来你们的极左思潮还没有肃清。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艺术

* 这是在广州观看部队文艺演出时的谈话。

质量的提高。

你们的歌越唱越快，越唱越尖，越唱越高。

革命激情要和革命抒情结合，要有点地方的色彩。

加强气象工作*

(一九七二年七月三十日)

请你们乘此由国务院业务组将气象局业务抓起来，体制暂时不管。

总参、海军、空军哪一位管气象？请剑、春、德⁽³⁶⁴⁾三位指定专人参加国务院业务组会议，整顿气象局全国布局。收听国际气象预报和预测，不知地面卫星站能否通过空中卫星收听更多情报，请打听一下，如行，立即办。凡属空白地区、海岸都要分类补上，对北线西线寒流、东线南线暖流也要管。人不够，要从“五七”干校⁽³³²⁾调回，或者将转业或遣散走的调回。要打破军民界限，共同协力，军民两用。预防各种气象变化，特别要防气流、大风突变转向。总结经验，并且要考虑到空气中有无新的因素、元素增变。

妥否，请酌。

* 这是针对“文化大革命”中各单位业务工作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在中央气象局《关于今年第三号台风预报的初步检查报告》上写给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的批语。

重视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一日)

文裕⁽³⁶⁵⁾同志交来二机部四〇一所一部十八位同志一信⁽³⁶⁶⁾，已由郭老⁽²⁶⁵⁾、西尧⁽³³¹⁾同志处转到。看了很高兴，正是月初我们同见巴基斯坦那位科学家⁽³⁶⁷⁾时所说的话。

现在请文裕同志将你们今年四月送给二机部和科学院那份报告⁽³⁶⁸⁾转给我一看。西尧同志请朱光亚⁽³⁶⁹⁾同志召集有关方面一议事，请不要等我批，先议出办法，供大家讨论采用。

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将理论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所见可能有错，请你们研告。

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上大学^{**}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四日)

我们小学和中学的学制究竟是十年还是十二年，还没有确定。过去是十二年，是不是要这么长，现在还在研究。对学

* 这是给张文裕、朱光亚同志的信。同年七月，周恩来同志曾指出，要把综合大学的理科办好，提高基础理论水平，并强调有什么障碍就要拔除。八月，他还对当时的科教组和科学院负责同志指出，要“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

** 这是会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博士时的谈话节录。

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当然这总是少数，大多数人要参加劳动，不一定升学。至少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不可能所有的人都进大学，国家没有这个力量。中学毕业后马上进大学的总是少数，大量的要在生产实践中提高。劳动几年后，有升学机会的当然还可以深造。

要学外国的长处^{*}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最近我们出去了两个代表团。一个医学代表团在国外看了回来，不敢做报告。他们要做报告，有一个军代表说，不要把我们说得一团漆黑。这么老大，随便给人家戴帽子，结果他们不敢讲了。这种风气不好。出去花了不少钱，回来连报告也不敢做。科学家代表团出国回来后，连一个报告都没有写出来，不敢谈人家的长处，也不敢谈我们的短处，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有些人自己不懂，又随便给人家戴帽子。出国参观、考察，就是为了学习人家的长处。

^{*} 这是在国家计划委员会汇报一九七三年计划和《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的草稿时的谈话节录。

中美友好来往的大门 终于打开了*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首先,我高兴地代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政府向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以及其他的美国客人们表示欢迎。

同时,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代表中国人民向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民致以亲切的问候。

尼克松总统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前来我国访问,使两国领导人有机会直接会晤,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是符合中美两国人民愿望的积极行动,这在中美两国关系史上是一个创举。

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中断了二十多年。现在,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友好来往的大门终于打开了。目前,促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争取和缓紧张局势,已成为中美两国人民强烈的愿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相信,我们两国人民这种共同愿望,总有一天是要实现的。

* 这是在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宴会上的祝酒词,刊载于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应当妨碍中美两国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更不应该导致战争。中国政府早在一九五五年就公开声明,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坐下来同美国政府谈判,这是我们一贯奉行的方针。我们注意到尼克松总统在来华前的讲话中也谈到,“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是寻找某种办法使我们可以有分歧而又不成为战争中的敌人”。我们希望,通过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两国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

中日两国人民 应该世代友好下去*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日本首相田中角荣阁下应邀来我国访问，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我们感到高兴。我代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政府，对田中首相以及其他日本贵宾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田中首相来我国访问，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在我们两国的历史上，有着两千年的友好来往和文化交流，两国人民结成了深厚友谊，值得我们珍视。但是，自从一八九四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中国人民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教导，严格区分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的日本人民。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尽管两国间战争状态没有宣告结束，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来往和贸易关系不但没有中断，而且不断发展。最近几年来，每年来中国访问的日本朋友人数超过其他国家朋友，中国同日本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贸易额也高过其他国家。这就为中日关系正常化创造

* 这是在欢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宴会上的祝酒词，刊载于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了有利条件。

当前,世界形势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田中首相就任以后,毅然提出新的对华政策,声明要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表示能够充分理解中国方面提出的复交三原则⁽³⁷⁰⁾,并且为此采取了实际步骤。中国政府本着一贯的立场,作出了积极的响应。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现在是我们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的时候了。

首相阁下,你来华前说,两国会谈能够达成协议,也必须达成协议。我深信,经过我们双方的努力,充分协商,求大同,存小异,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定能够实现。

中日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但这不应该成为我们两国平等友好相处的障碍。恢复中日邦交,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04)的基础上建立友好睦邻关系,将为进一步发展我们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扩大两国经济和文化交流,开辟广阔的前景。中日友好不是排他的,它将为和缓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中国和日本都是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勤劳勇敢的人民。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代友好下去。在这里,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向日本人民致意,并衷心祝愿日本人民在前进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今天,中日两国领导人已开始就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进行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谈。我们期望,我们的会谈将取得圆满的成功。

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我们要在一九七五年完成和超额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这样就可以为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实现上述的第一步设想打下更牢固的基础。从国内国际的形势看，今后的十年，是实现上述两步设想的关键的十年。在这个时期内，我们不仅要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要向实现第二步设想的宏伟目标前进。国务院将按照这个目标制订十年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国务院各部、委，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直到工矿企业和生产队等基层单位，都要发动群众，经过充分讨论，制订自己的计划，争取提前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

^{*} 这是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段话。报告全文刊载于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注 释

- 1 《共同纲领》即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确定了当时我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外交等各方面的基本政策。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民的代表共同制订的建国纲领，是全国人民在一定时期内共同的奋斗目标和统一行动的政治基础。一九五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以前，它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第 1、15、23、34、82、99、104、132 页。
- 2 绥远 是旧省名。这两个字原有安抚平定边远地区的意思。一九四九年一月北京和平解放后，同年九月绥远和平解放。一九五四年该省撤销，其辖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第 3、260 页。
- 3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即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向全会做了报告。会议讨论了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的问题。同时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全会号召，全党在胜利面前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第 9、123、331 页。
- 4 学田 是中国旧时属于学校的田地，一般为乡绅所把持。学校以学田的收入作为教师的薪俸和学生的补助等费用。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中规定废除学校的土地所有权。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三日，政务院通过的《关于处理老解放区市郊农业土地问题的指示》中又明确规定学田应一律收归国有，对依靠学田收入维持的学校，应拟具妥善的办法，解决其经费问题。一九五〇年六月中央人民政

- 府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也作了类似的规定。——第 20 页。
- 5 清朝初年，因郑成功等在东南沿海领导反清的武装斗争，清政府厉行海禁，严禁人民出海，严格限制对外贸易。一六八三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后，才允许商民造船出海，并于一六八五年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为通商口岸，允许外商来华贸易。一七五七年，由于英国等殖民者在中国沿海进行非法活动，清政府又下令只准在广州通商，并制定了许多外商来华贸易的禁例，继续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六〇年，英、法等国家先后发动两次鸦片战争，迫使清王朝签订许多不平等条约，开辟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天津、喀什噶尔等地为商埠，并剥夺了中国关税自主权，取得了深入内地贸易、自由传教和招募华工出国等项特权。这样，它们用炮火打破了清王朝闭关锁国的局面。后来，人们把鸦片战争以后出现的这种形势，称为“海禁大开”或“海禁开放”。——第 22 页。
- 6 北洋军阀是清末袁世凯在北方几省首先建立起来的封建军阀集团。一八九五年清政府命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归北洋大臣节制。一九〇一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后，培植党羽，自成派系。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组织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第一个北洋军阀政府。一九一六年袁死后，这个集团分别在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支持下分化为直、皖、奉三系，为争权夺利彼此间进行过多次混战。一九二六年皖系军阀段祺瑞下台，一九二七年直系军阀被国民革命军消灭，一九二八年奉系军阀政府垮台。至此，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时期结束。——第 22、62、95、258、297、318、355、413 页。
- 7 李仪祉（一八八二——一九三八），陕西蒲城人，水利专家。一九二二年起，历任陕西省水利局局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曾提出很多治理黄河的意见，主办过陕西省泾惠、洛惠、渭惠和织女渠等灌溉工程。——第 22 页。
- 8 孔祥熙（一八八〇——一九六七），山西太谷人。曾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部长、行政院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总裁，长期控制国民党政府的财权。一九三八年他在任行政院长时，颁行“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实行所谓战时经济管制政策，大幅度压低棉花价格，对农民进行公开的掠

- 夺。据统计,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陕西每市担棉花所能换取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只相当于抗日战争前的百分之四十左右。——第 22 页。
- 9 花园口的决堤 指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炸开黄河大堤的事件。一九三八年五月,日本侵略军攻占徐州,随即沿陇海路西进。六月初,蒋介石下令炸开郑州以北花园口黄河大堤,企图以黄河之水阻止日军西犯。结果不仅未能阻住日军进攻,反而给人民造成空前灾难。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四十余县被淹,数十万人溺死,一千多万人流离失所。大水过后,留下了一片连年灾荒的黄泛区。——第 23 页。
- 10 土改这里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运动。一九五〇年六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冬起,在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一九五二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三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第 24、41、55、63、80、93、132、162、264 页。
- 11 侯德榜(一八九〇——一九七四),福建闽侯人,化学家。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四年先后创办塘沽永利碱厂和南京永利硫酸铁厂,一九三九年发明联合制碱的生产技术,称为侯氏制碱法。一九五〇年时是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总经理。一九五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任化学工业部副部长。——第 25 页。
- 12 萨福均(一八八六——一九五五),福建福州人,铁路工程专家。曾参加修建粤汉铁路。一九五〇年时是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副部长兼西南铁路工程局副局长。——第 25 页。
- 13 詹天佑(一八六一——一九一九),广东南海人,铁路工程专家。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九年主持修建我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今京包线的北京至张家口段),后又主持修建粤汉铁路。——第 25 页。
- 14 整风运动指中国共产党自一九四二年起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经过这个运动,全党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第 29、123、313、359、412 页。

- 15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举行。毛泽东做《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做《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做《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做《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大会总结了我国民主革命二十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的认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达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这次大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第 29、125、303、313 页。
- 16 大禹是传说中我国古代部落联盟领袖。他率领群众用疏通江河的办法治平水患。——第 30 页。
- 17 指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莫斯科签订，同年四月十一日起生效，有效期三十年。一九七九年四月三日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鉴于国际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决定条约期满后不延长。——第 31 页。
- 18 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盟国驻日占领军最高统帅的咨询机构。它根据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的协议在东京设立，由中、苏、美三国代表各一人和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四国联合代表一人组成。其主要任务是实现《波茨坦公告》的规定，完全解除日本的武装，并使其走向民主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在该机构的席位仍由蒋介石集团的代表非法占据着。一九五二年四月该机构由美国单方面宣布解散。——第 36 页。
- 19 李承晚（一八七五——一九六五），当时是南朝鲜“总统”。——第 36 页。
- 20 辽东省，一九四九年设置，辖今辽宁省东部。一九五四年撤销，其大部分地区 and 当时的辽西省合并为辽宁省，部分地区划归吉林省。——第 36 页。
- 21 斯德哥尔摩宣言是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于一九五〇年三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通过发表的。宣言要求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并号召全世界一切善良的人们在这个宣言上签名。随后，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个签名运动。——第 37 页。
- 22 人民代表会议即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解放初期人民参政的一种形式。其代表由推选、邀请、商定及选举等方式产生。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召

- 开之前,它先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传达政策、联系群众的协议机关,后曾代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休会期间,设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协助人民政府实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以及负责筹备下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 38、58、74、95 页。
- 23 指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全党学习〈斯大林、毛泽东论共产党员要善于和非党群众团结合作〉的指示》。指示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与非党员亲密团结这一工作上,是有很大成绩的。但是,有一部分党员,特别是负相当领导责任的党员,仍然犯着向党外群众摆党员架子,摆革命老资格,不愿或不善于和党外群众与民主人士合作的关门主义的毛病。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全体党员认真学习《斯大林、毛泽东论共产党员要善于和非党群众团结合作》这一文件,以加强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及广大非党群众的团结合作。——第 39 页。
- 24 这里指一九五〇年在中国共产党内进行的整风运动。这年五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全国胜利后新党员大量增加,其中很多人思想作风不纯;在老党员中,也有很多人滋长了骄傲自满、命令主义作风,少数人甚至贪污腐化,违法乱纪。指示要求全党在和工作任务密切地结合而不是相分离的条件下,用阅读若干指定文件,总结工作,分析情况,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等项方法,进行一次整风运动,以整顿全党首先是干部的作风。——第 39 页。
- 25 这里指当时流通的旧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按规定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币一万元。——第 45 页。
- 26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同时派军队侵略我国领土台湾。九月十五日又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派兵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随后越过“三八线”大举北犯,并且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抗美援朝、保卫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响应毛泽东主席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组织了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军。十一月四日,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坚决支持志愿军的正义行动。全国人民以增产节约、报名参加志愿军、捐献武器等各种方式全力支援朝鲜前线的作战。在中

- 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帝国主义连遭失败，被迫于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朝鲜停战实现，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第 50、87、93、106、148、162、236、273、302 页。
- 27 华莱士（一八八八——一九六五），原为美国共和党人，后加入民主党，在罗斯福任总统期间，曾任农业部长、商务部长和副总统。一九四六年加入美国进步党。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参加总统竞选失败后，在纽约州经营农业。一九五〇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一方面支持美国政府的侵朝战争政策，另一方面又在九月二十九日以农人身份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什么“如果新中国在学会制造卡车和拖拉机之前先学会了制造坦克，这将是一个世界的悲剧”。——第 51 页。
- 28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时，美、苏两国商定在朝鲜国土上以北纬 38°线作为两国接受日军投降的临时分界线，分界线以北为苏军受降区，以南为美军受降区。这条线通称三八线。朝鲜战争爆发时，朝鲜人民已在这条线以北地区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条线以南地区还在美帝国主义扶植的李承晚集团统治下。——第 52 页。
- 29 尼赫鲁（一八八九——一九六四），当时任印度总理。——第 52 页。
- 30 这里指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在美国纽约召开的美、英、法三国外长会议。——第 52 页。
- 31 见本书第 37 页。——第 52 页。
- 32 贝文（一八八一——一九五一），英国工党首领之一。一九五〇年时是英国工党内阁外交大臣。当时我国同美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在关于朝鲜战争问题上同美国政府的一些交涉，是通过与我国已建立外交关系的印度，再由印度通过英国来进行的。——第 52 页。
- 33 麦克阿瑟（一八八〇——一九六四），美国职业军人。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任盟国驻日占领军总司令，执行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的任务。一九五〇年六月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指挥侵朝战争。——第 52 页。
- 34 甲午战争是一八九四年（甲午年）中国和日本发生的战争。这次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蓄意挑起的。日本军队先向朝鲜发动侵略并对中国的陆海军进行挑衅，继即大举侵入中国的东北。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中国方面在陆

- 上和海上都遭到失败，被迫于一八九五年签订了《马关条约》。——第 53、297 页。
- 35 七七事变也称芦沟桥事变。芦沟桥距北京城十余公里，是北京西南的门户。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在这里向中国驻军进攻。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的影响下，中国驻军奋起抵抗。中国人民英勇的八年抗战，从此开始。——第 53、321 页。
- 36 这里指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三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五月一日由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全文共八章二十七条。主要内容是：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婚姻制度。——第 55 页。
- 37 一九五一年九月起，北京、天津各高等学校的教师进行了有系统的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为了统一领导这一运动，教育部成立了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北京大学教师学习会是这个学习委员会的分会。——第 59 页。
- 38 马校长指马寅初（一八八二——一九八二），浙江嵊县人，经济学家。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第 59 页。
- 39 五四运动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发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英、美、法、日、意等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对德和会，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中国是参加对德宣战的战胜国之一，但北洋军阀政府却准备接受这个决定。五月四日，北京学生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的这一无理决定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妥协。这次运动迅速地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响应，到六月三日以后，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大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也是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以一九一五年《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创刊为起点的新文化运动，竖起“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五四运动中的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使新文化运动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他们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第 59、297、303、356 页。
- 40 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怀宁人。一九一五年九月起主编《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八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

文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其后,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后公开进行托派组织活动。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故于四川江津。——第 61、301、425 页。

- 41 章太炎即章炳麟(一八六九——一九三六),浙江余杭人。早年参加戊戌维新运动,一九〇四年和蔡元培等发起成立光复会,一九〇六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前,他先后在《苏报》、《国粹学报》、《民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革命思想,公开提出推翻清朝统治。——第 62 页。
- 42 《国粹学报》是一九〇四年成立的学术团体国学保存会的机关刊物,一九〇五年二月在上海创刊。它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爱国保种,存学救世”为宗旨,是一个阐发民族学术传统、宣传反清思想但有复古主义倾向的刊物。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后停刊。——第 62 页。
- 43 袁世凯(一八五九——一九一六),河南项城人。清末曾任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等职,成为北洋军阀首领。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出任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一九一二年在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支持下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组织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第一个北洋军阀政府,对内专制独裁,对外投降卖国。一九一五年五月接受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同年十二月称帝,一九一六年三月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下被迫取消帝制。——第 62、297 页。
- 44 “二十一条”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机在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的旨在独占中国的秘密条款。这些条款共有五号,分为二十一条。主要内容是:一、由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所掠夺的权利,并加以扩大;二、承认日本在南满洲和内蒙古东部享有各种特权;三、将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四、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让予或租予第三国;五、由日本控制中国的政治、财政、警察、军事大权,允许日本在湖北、江西、浙江、广东各省之间修筑重要铁路,并承认日本在福建享有投资修筑铁路、开采矿山、整顿海口等优先权。五月七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五月九日,袁世凯政府对日本的这些要求,除声明第五号要求的一部分“容日后协商”外,一概加以承认。后来,因为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以及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利益上存在

- 矛盾,日本的这些要求没有全部实现。——第 62 页。
- 45 中日军事协定指一九一八年五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政府在北京先后秘密签订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协定以“共同防敌”为由,保证日本军队可以在共同进行反苏战争的名义下进入中国境内,并支配中国的有关军队。——第 62 页。
- 46 国家主义是以抽象的国家概念来掩盖国家的阶级本质的一种资产阶级思想。十九世纪开始在欧洲流行。它标榜“国家至上”,主张放弃阶级斗争,效忠于剥削阶级的国家;有些国家主义者还鼓吹“民族优越论”,制造民族间的矛盾对立,并用保卫祖国的名义鼓动侵略战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些政治代表,组织了奉行国家主义的中国青年党,进行反对共产党和反对苏联的活动。——第 62 页。
- 47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建立的一个社团。由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一九一九年七月在北京正式成立。这个学会兼容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版刊物有《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等。由于会员思想的分化日趋明显,一九二五年底停止活动。——第 63 页。
- 48 李大钊(一八八九——一九二七),河北乐亭人。曾任《新青年》杂志编辑,并与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是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之一。一九一八年参加筹组少年中国学会。一九二〇年在北京组织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第 63、303 页。
- 49 曾琦(一八九二——一九五一),四川隆昌人。一九一八年参加发起筹组少年中国学会。一九二三年在法国留学期间与李璜等建立中国青年党。一九二四年回国,创办《醒狮》周报,鼓吹国家主义。一九二六年任中国青年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一九四五年任该党主席。解放战争时期参加国民党一手操纵的国民大会,并任国民党政府委员、总统府资政等职。——第 63 页。
- 50 李璜,一八九五年生,四川成都人。曾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一九二三年在法国留学期间与曾琦等建立中国青年党。一九二六年任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一九四八年任该党代理主席。——第 63 页。
- 51 左舜生(一八九三——一九六九),湖南长沙人。曾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青年党。一九二六年任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一九

- 二五年任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解放战争时期参加国民党一手操纵的国民大会，曾任国民党政府农林部部长。——第 63 页。
- 52 基马尔（一八八一——一九三八）是土耳其民族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一九一九年起领导土耳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九二三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为第一任总统。基马尔主义是以基马尔为代表的、主张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思潮。中国一些资产阶级分子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曾高唱基马尔主义，企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第 63 页。
- 53 洪秀全（一八一四——一八六四），广东花县人，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的领袖。一八五一年，他和杨秀清等领导群众在广西桂平县的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同清朝的封建统治坚持斗争十四年之久。——第 63 页。
- 54 严复（一八五四——一九二一），福建闽侯人。曾在英国海军学校留学。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后，主张君主立宪，变法维新。曾译赫胥黎《天演论》、亚当·斯密《原富》、穆勒《名学》和孟德斯鸠《法意》等书，传播了欧洲资产阶级的思想。——第 63 页。
- 55 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广东南海人。一八九五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帝国主义打败后，他联合一千三百多个在北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联名向光绪皇帝上“万言书”，要求“变法维新”。他主张改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一八九八年光绪皇帝任用他和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参预政事，试图变法。后来顽固派的代表慈禧太后重揽政权，维新运动遂告失败。康、梁逃亡海外，组织保国会，和孙中山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相对立，成为反动的政治派别。康有为的著作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第 63 页。
- 56 法国大革命指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四年在法国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是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一次规模最大、最彻底的革命。——第 63、94 页。
- 57 明治是日本天皇睦仁的年号。明治维新是从一八六八年起在日本明治年间发生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运动。这次改革虽未彻底消灭封建制度，但废除了封建割据的幕府制度，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并通过一系列措施发展资本主义，使日本很快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第 63、321 页。
- 58 梁漱溟，一八九三年生，广西桂林人。当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

- 员会委员。——第 67 页。
- 59 张伯苓(一八七六——一九五一),天津人,教育家。一九〇四年在天津创办敬业中学堂(一九〇七年改名南开学校)。一九一九年任南开大学校长。一九四五年后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致电周恩来总理表示祝贺。——第 69 页。
- 60 翁文灏(一八八九——一九七一),浙江鄞县人,地质学家。一九四八年曾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不久辞职赴法。一九五一年回国,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委员。——第 70、358 页。
- 61 这是指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总理署名发布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加强老根据地工作的指示》,即本文第二部分:《大力扶植老根据地的经济和文化建设》。——第 75 页。
- 62 这是毛泽东给老根据地人民的题词,载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一日《人民日报》。——第 75 页。
- 63 这里指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一日公布的《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优待暂行条例》、《革命残废军人优待抚恤暂行条例》等。——第 80 页。
- 64 指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第 82、100、108 页。
- 65 司徒雷登(一八七六——一九六二),美国人,生于中国杭州。一九四六年七月出任美国驻中国国民党政府大使。一九四九年四月南京解放后,仍然留在那里观望。同年八月离开中国。——第 86 页。
- 66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苏联与芬兰因边界问题发生战争,为此,英、法两国在美国支持下组织了一支远征军拟经瑞典进攻社会主义苏联。苏联政府警告瑞典政府,希望它不要违反中立政策,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瑞典政府决定同苏联保持正常关系。一九四〇年四月初,希特勒军队占领丹麦和挪威后,瑞典面临被希特勒占领的威胁。十三日,苏联政府向德国驻苏大使发表声明说,苏联不能让德国破坏瑞典中立。这个声明引起了德国政府的重视。瑞典政府对苏联这一行动表示感谢。——第 89 页。
- 67 沙文主义原指资产阶级反动的本民族至上主义。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产生于法国,因法国士兵沙文狂热拥护拿破仑一世的侵略扩张政策,主张用暴

- 力建立法兰西帝国而得名。它宣扬本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主张征服和奴役其他民族。在帝国主义时代，沙文主义成为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侵略其他国家和压迫其他民族的思想工具。——第 91、229、440 页。
- 68 镇压反革命指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三年在全国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全国各地残存着大量的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反革命分子。他们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危害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为了迅速建立和巩固革命秩序，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和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全国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这次运动沉重打击了反革命残余势力，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第 93、132、162、204 页。
- 69 王芸生（一九〇一——一九八〇），天津静海人。曾任天津《商报》总编辑、上海《大公报》总编辑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一九五二年二月九日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了《资产阶级有没有猖狂进攻？是我们“制造阶级斗争”吗？》一文。此文经毛泽东作了个别修改后，同年二月十三日为《人民日报》转载。——第 93 页。
- 70 文艺复兴是十四世纪至十六世纪欧洲部分国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形成的条件下，思想和文化范围内发生的反映新兴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大变革。十六世纪资产阶级史学家认为它是古代希腊、罗马文化艺术的复兴，所以称为“文艺复兴”。这个时期表现在科学、哲学、文学、艺术、教育方面的人文主义思想，提倡人性，反对神性；提倡人权，反对神权；提倡个性自由，反对中古的宗教桎梏，冲击了腐朽的封建文化，在当时历史上起了很大的进步作用。文艺复兴为近代文学、艺术、教育、哲学和实验科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第 94、354 页。
- 71 美国独立战争也称北美独立战争。一七七五年起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的人民先后进行推翻英国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资产阶级革命战争。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发表了《独立宣言》，正式宣告脱离英国。英国战败后，被迫在一七八三年签订《巴黎和约》，承认美国独立。——第 94 页。
- 72 南北战争也称美国内战，是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由美国南部种植园主奴隶制与北部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制之间的矛盾所引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争。在战争过程中，代表北部资产阶级利益的联邦政府总统林肯颁布了

- 《宅地法》和《解放黑奴宣言》，并采取其他民主措施，激发了工人、农民和黑人的革命斗志，因而联邦政府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经过这次战争，美国的资本主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第94页。
- 73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所领导的推翻清朝专制王朝的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十月十日，革命党人发动新军在湖北武昌举行起义。接着，各省热烈响应，外国帝国主义所支持的清朝反动统治迅速瓦解。一九二二年一月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帝制从此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很弱，并具有妥协性，没有能力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比较彻底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辛亥革命的成果迅即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中国仍然没有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第94、255、290、318、354页。
- 74 “五反”指一九五二年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第96、112、162、331页。
- 75 “五毒”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一些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经济情报的五种违法行为。——第96、112页。
- 76 一九五二年一月五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报告了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斗争和思想改造运动的情况，号召工商界人士积极参加这一运动，进行自我改造。这个报告的要点即本书《“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一文。——第97页。
- 77 “三反”指一九五一年底至一九五二年十月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中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第97、112、162、331页。
- 78 陈云，一九〇五年生，上海青浦人。一九五二年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和一九六二年时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第98、233、405页。
- 79 黄炎培(一八七八——一九六五)，字任之，上海川沙人。清末曾考中举人。早

- 年加入同盟会。一九一七年在上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一九四〇年底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九四五年底发起建立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第 101、357 页。
- 80 这是唐代初期政治家魏征说过的话，见《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二年》。毛泽东在《矛盾论》等著作中，曾多次引用过这句话。——第 103 页。
- 81 毛泽东在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三年多次表述过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这里引用的是毛泽东审阅周恩来一九五三年八月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结论时对过渡时期总路线所作的表述。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经毛泽东修改和审订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这个提纲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准确的表述，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第 105 页。
- 82 盛丕华（一八八二——一九六一），浙江宁波人。当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等职。——第 106 页。
- 83 “四马分肥”是当时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分配形式的形象的说法，指企业利润按国家所得税金、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奖金和资方的股息红利四部分分配（参见本书第 101 页）。一九五六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后，资方的股息红利被定息代替。——第 112 页。
- 84 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当时我国劳动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愿联合组成的集体经济组织。按照集体化程度的不同，分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收益按土地和劳力比例分配；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入股，也取得合理的代价。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土地取消了报酬，归集体所有，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作价入

- 社,完全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第 112、215、264、315 页。
- 85 见毛泽东《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毛泽东选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98—100 页)。——第 112、114、115、116 页。
- 86 三大运动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参见本书注 26、10、68。——第 112 页。
- 87 思想改造指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二年在我国知识分子中开展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这次运动的主要内容是:组织知识分子学习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学习《共同纲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清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想影响,划清敌我界限,建立为劳动人民服务的观点。——第 112 页。
- 88 指一九五三年五月二日至十一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总结了一九四八年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以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全国工会工作的经验,确定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的工会的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积极地完成国家经济建设计划,为逐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第 115 页。
- 89 指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刘少奇受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托向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所作的报告。——第 119 页。
- 90 指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中提出的、要求全党高级干部遵守的六条规定。原文如下:“(一)党的团结的利益高于一切,因此应当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论和行动的标准,即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不做。(二)党是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统一的集中的组织,党的团结的唯一中心是党的中央,因此,必须把任何地区、任何部门的党的组织及其工作看作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整个党及其工作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派别思想、小团体习气、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反对任何妨碍中央统一领导、损害中央的团结和威信的言论和行动。(三)党的团结的重要保证之一是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严格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因此必须坚决反对分散主义和个人主义,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作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反对不适当地过分地强调个人的作用,反对骄傲情绪和个人崇拜。

（四）全党高级干部的重要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意见应该经常向所属的党的组织报告和反映，其关系特别重大者则应直接向党中央的政治局、书记处或中央主席报告和反映；如果避开党组织和避开中央来进行个人的或小集团的政治活动，避开党的组织和避开中央来散布个人的或小集团的政治意见，这在党内就是一种非法活动，就是违反党的纪律、破坏党的团结的活动，就必须加以反对和禁止。（五）全党高级干部应根据增强党的团结的原则来检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凡是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都必须改正。（六）对于任何有损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应当进行批评和斗争。”——第120页。

- 91 《甲申三百年祭》是郭沫若一九四四年三月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的著名史论著作。文中叙述了一六四四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以后，它的一些首领因为胜利而骄傲起来，生活腐化，进行宗派斗争，以致使这次起义在一六四五年陷于失败。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902页）——第123页。
- 92 遵义会议指一九三五年一月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和纠正了军事上的错误，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第126、302页。
- 93 “劳卫制”这里指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一日政务院政务会议批准，同年五月至一九五八年十月在全国推行的“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它规定了当时全国统一的体育锻炼项目和考核标准。——第129页。
- 94 吴传玉（一九二八——一九五四），祖籍福建石美（今属龙海县），生于印度尼西亚，中国优秀的游泳运动员。一九五一年回国。一九五三年八月在第一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上获得百米仰泳的第一名，在国际比赛中第一次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一九五四年赴匈牙利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第130页。
- 95 两个教育部指当时的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高等教育部的职掌范围是分管全国除高等师范学校、民族学院以外的高等学校；除师范学校以外的中等专业学校，工农速成中学及有关留学生派遣、接受等事项。教育部的职掌范围是分管全国高等师范学校、民族学院、师范学校、中学、小学、幼儿园、成

- 人初等学校、盲哑学校等。——第131页。
- 96 亚非会议也称万隆会议，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参加会议的有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个发起国，以及阿富汗、柬埔寨、中华人民共和国、埃及等二十九个亚非国家。会议广泛讨论了民族主权、反殖民主义斗争、世界和平以及与会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合作等问题，发表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提出了著名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十项原则。——第146、236、274页。
- 97 日内瓦会议指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二十一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中、苏、美、英、法五国参加所有两项议题的讨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及英、美、法以外的其余十二个侵朝国家参加了朝鲜问题的讨论，越南民主共和国、老挝、柬埔寨和南越保大政权参加了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关于朝鲜问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停战。——第148、236、274页。
- 98 科伦坡五国会议指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二日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印度尼西亚和锡兰（今斯里兰卡）五国总理在锡兰首都科伦坡举行的会议。会议发表公报呼吁立即在印度支那实行停火，欢迎日内瓦会议通过谈判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并提出了召开亚非会议的问题。——第148页。
- 99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法国为在印度支那重建殖民统治，先后侵入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发动了印度支那战争。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经过八年多的英勇抗战，迫使侵略者在一九五四年七月签订停战协定。同年八月实现了印度支那停战。——第148、275页。
- 100 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协议指一九五四年七月在日内瓦会议上达成的《关于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关于在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关于在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和《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等文件。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与会国尊重越南、老挝、柬埔寨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它们的内政；上述三国交战双方同时、全面停火；三国不参加任何军事同盟，不容许外国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法国从印度支那撤军等。但美国没有在《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上签字，只声明美国政府将不使

- 用武力去妨碍日内瓦协议的实施。后来美国背弃了自己的诺言,使这一协议遭到了破坏。——第 148 页。
- 101 指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美国第一次使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广岛。——第 148 页。
- 102 指一九五四年三月美国在中太平洋的比基尼岛附近的公海上进行氢弹试验时,使日本船员久保山爱吉得“原子病”致死。——第 148 页。
- 103 茂物会议是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国总理继科伦坡五国会议后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在印度尼西亚的茂物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会议发表了联合公报,决定联合发起在一九五五年召开亚非会议。公报申明:召开亚非会议的目的,在于促进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和睦邻的关系;讨论与会各国的社会、经济与文化问题和关系;讨论对亚非各国人民具有特别利害关系的问题,例如有关民族主权的问题、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问题;讨论亚非国家和它们的人民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它们对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所能作出的贡献。——第 152 页。
- 104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参见本书《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文及题解。——第 152、244、478 页。
- 105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提出的,一九五六年一月公布。一九五七年十月公布修正草案。一九六〇年四月经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并作为正式文件颁发。纲要全文共四十条,提出了我国农业、畜牧业、林业、渔业、副业以及农村商业、信贷、交通、邮电、广播、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发展规划。关于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纲要规定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十二年内,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要达到四百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要达到五百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要达到八百斤。——第 160、220、434 页。
- 106 即毛泽东《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581—583 页)。——第 161 页。
- 107 胡风,一九〇二年生,湖北蕲春人,文艺理论家和诗人。一九三三年七月在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

- 事、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一九五五年胡风等人被错定为“反革命集团”，一九六五年胡风被判刑。一九八〇年九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并经过法律程序，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和胡风本人平反。一九八一年胡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等职。——第 162 页。
- 108 布尔加宁（一八九五——一九七五），当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下面引用布尔加宁的话，是一九五五年七月四日他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所做《关于在工业的进一步高涨、技术的进步和生产组织的改进方面的任务》的报告中说的。——第 182 页。
- 109 见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毛泽东选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6 页）。——第 189 页。
- 110 这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一段话，见同年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第 190 页。
- 111 《十五贯》是根据清初戏剧家朱素臣的传奇剧本《十五贯》（又称《双熊梦》）改编的昆曲剧目。主要情节是：赌徒娄阿鼠图财杀死屠户尤葫芦，窃去铜钱十五贯，反嫁祸于尤之养女苏戍娟及身带十五贯钱的路人熊友兰；无锡知县过于执主观地断定熊、苏二人通奸杀人，将熊、苏判处死刑。苏州知府况钟奉命监斩时发现疑点，连夜去见巡抚周忱，请求缓刑复查。况亲赴现场和民间查访，终于查明了真凶，平反了冤狱。——第 192、334 页。
- 112 指剧中人物江南巡抚周忱。历史上的周忱（一三八一——一四五三），明宣德年间以工部右侍郎巡抚江南。为官清廉，兴利除弊，曾与况钟一起奏请减免江南重赋。——第 193 页。
- 113 这里指剧中人物苏州知府况钟。历史上的况钟（一三八三——一四四三），明宣德年间任苏州知府。任内抑制豪强，严惩贪污官吏。曾与周忱一起奏请减免江南重赋。——第 193 页。
- 114 “熊氏二难”指朱素臣著《十五贯》中所写熊家二兄弟相继遭难的情节。剧本写熊友兰、熊友蕙兄弟都为十五贯钱引起的误会而遭祸获罪，苏州知府况钟梦见双熊，疑为冤狱，后亲自查访，终于为二熊昭雪。昆曲《十五贯》在改编时，删去了有关熊友蕙的情节，剔除了梦见双熊等封建性糟粕，突出了况钟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注重调查研究的作风。——第 195 页。
- 115 传淞即王传淞，昆剧演员。当时是浙江昆苏剧团副团长，在《十五贯》中扮演

- 娄阿鼠。传瑛即周传瑛，昆剧演员。当时是浙江昆苏剧团团长，在《十五贯》中扮演况钟。——第 196 页。
- 116 老舍（一八九九——一九六六），北京人，作家。当时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曾将《十五贯》改编为京剧。——第 196、296、317 页。
- 117 宋景诗（一八二四——？），山东堂邑（今聊城西）人。一八六〇年参加鲁西农民抗粮斗争，次年捻军进入山东时，参加白莲教起义，率领黑旗军，转战直隶（今河北）、山东边界一带。不久被清军包围，投降清钦差大臣胜保。后脱离清军，回到山东家乡一带，重举义旗。一八六五年曾参加围歼清军僧格林沁部的曹州大战，后来下落不明。根据宋景诗的事迹创作的文艺作品有京剧《宋景诗》、电影《宋景诗》。——第 197 页。
- 118 和平解放台湾的号召指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的号召。他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宣布：“凡是愿意回到大陆省亲会友的，都可以回到大陆上来。凡是愿意回到大陆来参观和学习的，也都可以到大陆上来。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究既往。凡是在和平解放台湾这个行动中立了功的，中国人民都将按照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凡是通过和平途径投向祖国的，中国人民都将在工作上给以适当的安置。”——第 201 页。
- 119 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会谈指中国和美国一九五五年八月开始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大使级会谈。双方商定会谈包括两项议程：一是双方平民回国问题，二是双方有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前项议程在同年九月十日达成协议，后项议程一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一九五八年九月至一九七〇年二月，中美大使级会谈改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第 201 页。
- 120 解放战争后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新解放的地区，为了彻底打垮封建势力，巩固革命秩序，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军民开展了大规模的肃清土匪、特务，反对恶霸地主的斗争。一方面展开军事活动，清剿土匪，掩护群众工作；一方面发动群众，进行反恶霸斗争，摧毁反革命统治势力，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动员群众力量支援剿匪的军事行动。清匪反霸斗争为以后农村进行土地改革，作好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第 204 页。
- 121 为了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自一九五五年六月起至一九五六年底，在

全国开展了肃反运动。党政机关、团体、工矿企业、部队和学校开展的肃反运动，称作机关肃反或内部肃反；农村、街道和私营企业等方面开展的肃反运动，称作社会肃反。——第 205 页。

- 122 一九四三年四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进行一次普遍的审查干部的运动。在这次审干中，一度掀起了所谓“抢救运动”，发生了反特扩大化的严重错误。这一年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总结了这次审干运动的经验。这个决定提出了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等九条方针，反对“逼、供、信”的主观主义的错误方针。十月九日，毛泽东指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这样，就及时纠正了反特扩大化的严重错误。——第 205 页。
- 123 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为了便于各级主管机关对建设项目的计划、设计、施工等工作实行分级管理，按基本建设项目总投资的多少确定一个数额，这个数额称为限额。如一九五四年规定钢铁工业的投资限额为一千万元，纺织工业的投资限额为五百万元，其他各项轻工业的投资限额为三百万元至四百万元。限额以上项目，一般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第 211 页。
- 124 定息是我国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对民族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进行赎买的一种形式，即不论企业盈亏，统一由国家每年按照资本额发给资本家固定的利息（一般是年息百分之五）。定息从一九五六年起支付，一九六六年九月停止支付。——第 215、360、398 页。
- 125 定产、定购、定销又称粮食“三定”，是我国政府在一九五五年为了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增产，保证国家和人民对粮食的需要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定产就是根据田地质量和自然条件，结合经营条件，按正常年景下的单位面积常年产量评定农户的粮食产量，这是计算国家向农户购销粮食的依据。定购是从定产数量中按规定标准扣除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等用粮和实缴公粮后，对剩下的余粮按百分之八十至九十计算收购数量。一九五五年分户核定的余粮户粮食交售任务，在正常的年景下，自同年起三年不变，增产不增购。定销是对各类缺粮地区按规定标准确定统销数量。——第 216 页。
- 126 八大即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

- 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作了重要发言。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建议》，并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八大制定了正确的路线，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第 229 页。
- 127 邵力子（一八八二——一九六七），浙江绍兴人。当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第 231 页。
- 128 十大关系指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论十大关系》中论述的十个问题：一、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四、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六、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七、党和非党的关系；八、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九、是非关系；十、中国和外国关系。——第 231 页。
- 129 三大改造指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的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 231、395 页。
- 130 太平洋战争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法西斯联盟国家与日本在太平洋地区进行的战争。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晨，日本未经宣战，以强大的海、空军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主要海、空军基地珍珠港，使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惨重损失。十二月八日，美、英对日宣战。同日，德、意对美宣战。日本军队先后侵占了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以及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屿，后来在太平洋地区各反法西斯国家武装力量的沉重打击下，不断遭到失败。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战争结束。——第 241 页。
- 131 东土耳其斯坦指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策动新疆大伊斯兰主义分子萨比提大毛拉在喀什成立的“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这个政权因分裂祖国，投靠帝国主义，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反对，一九三四年二月瓦解。——第 259 页。
- 132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提出改政体为五族共和。孙中山曾经宣传过这种思想，主张汉、满、蒙、回、藏五族一家，立于平等地位，通过五大民

- 族平等参与国家政权,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统一。——第 263 页。
- 133 一九四三年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认为从民族成长的历史来说,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各地的宗族,同源于一个始祖,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它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生活的互相依赖、文化的交流和累世的婚姻关系,逐渐同化、融和为一个“中华大民族”。蒋介石在这里实质上只承认有汉族,否定少数民族的存在,把各少数民族称之为汉族的大小宗支。——第 263 页。
- 134 程砚秋(一九〇四——一九五八),北京人,京剧表演艺术家、京剧“程派”艺术的创立者。抗日战争期间拒绝为日伪演出,致力于戏曲理论的研究和戏曲教学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一九五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 272、296、318 页。
- 135 这是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对中国留苏学生讲话中的一句话,意思是社会主义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力量。见同年十一月二十日《人民日报》所刊载的通讯《毛主席会见留苏学生》。——第 274 页。
- 136 《汉字简化方案》中的简化字从一九五六年二月一日到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五日分四批推行。一九六四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根据国务院的批示编印了《简化字总表》,应用扩大后的简化偏旁又类推简化了一部分汉字,使简化字的总数增加到二千二百三十八个。——第 280 页。
- 137 李凤莲抗日战争时期是延安的被服厂工人、劳动模范。一九五八年时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第 281 页。
- 138 李烛尘(一八八一——一九六八),湖南永顺人。当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第 281 页。
- 139 注音字母是标注汉字读音的一套音标。一九一三年由读音统一会制定,一九一八年由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后来国民党政府把它改名为注音符号。——第 287 页。
- 140 见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 6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90 页)。——第 290 页。
- 141 鸦片战争是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四二年资本主义的英国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从十八世纪末期起,英国把大量鸦片走私输入中国,毒害中国人民,并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一八三八年底清政府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去广州禁烟。

- 一八三九年六月林则徐下令当众销毁从英、美等国不法商人手中缴获的鸦片二百三十多万斤。一八四〇年，英国借口保护通商，发动侵华战争。清政府在战争中动摇妥协，只有部分军队和人民群众奋起抵抗侵略者。英军除先后在广东、福建、浙江沿海骚扰并入侵外，又攻占吴淞，闯进长江，直逼南京，迫使清政府在一八四二年八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第 291、354 页。
- 142 清末我国邮政由英国人掌管。邮政式指英国人在邮政业务中用拉丁字母拼写中国地名时习用的一套拼写法。——第 291 页。
- 143 威妥玛式指英国驻中国使馆中文秘书威妥玛在一八六七年发表的汉语官话的拉丁字母拼写法。——第 291 页。
- 144 卢懋章（一八五四——一九二八），福建同安人，中国文字改革运动最早的提倡者之一。一八九二年发表《一目了然初阶》，提出一种拼切汉字读音的设计方案，他把这种方案称为“中国切音新字”。——第 291 页。
- 145 国语罗马字即“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是用罗马字母（也叫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方案。由“国语罗马字研究委员会”成员钱玄同、黎锦熙（当时均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元任（当时是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教授）等人制订。一九二六年由国语统一筹备会发表，一九二八年经国民党政府大学院（教育部）正式公布。——第 291 页。
- 146 拉丁化新文字是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方案。瞿秋白在一九二八年起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期间，经常与当时在苏联学习的吴玉章、林伯渠等人研究中国文字改革问题，并写成了《中国拉丁化字母》的小册子。瞿秋白一九三〇年回国后，吴玉章、林伯渠以原有研究成果为基础，和一些苏联语言学家一起研究制订了中国北方话拉丁化方案。一九三一年九月，旅苏华侨在海参崴召开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根据上述研究成果制订的《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的方案。这一方案于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间传到国内，被称为“拉丁化新文字”。——第 291 页。
- 147 陈叔老即陈叔通（一八七六——一九六六），浙江杭州人。曾是清末翰林。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一九二七年后担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抗日战争时期，支持抗日救亡活动。抗战胜利后，参加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从事反蒋民主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 主任委员等职。——第 295、357、399 页。
- 148 张文白即张治中(一八九〇——一九六九),安徽巢县人。当时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 296 页。
- 149 戊戌变法是一八九八年(戊戌年)发生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维新运动。当时,中国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严重危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清朝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逐步地在中国推行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统治的君主立宪制度,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以挽救民族危亡。但是,当时还没有强有力的资产阶级,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坚决反对变法维新。在宣布变法三个多月以后,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幽禁光绪皇帝,杀害谭嗣同等六人,变法遭到失败。——第 297 页。
- 150 顾颉刚(一八九三——一九八〇),江苏吴县人,历史学家。当时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第 298 页。
- 151 八旗这里指八旗兵。清代常备军之一。它是分别以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军旗为标志的八支军队的统称。每旗设都统一人、副都统二人为正副统帅。八旗兵后又分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第 298 页。
- 152 绿营指绿营兵,也称绿旗兵。它是清朝政府按明代军队建制建立的常备军。因这些由汉人组成的军队使用绿色军旗,所以称绿营。——第 298 页。
- 153 湘军是曾国藩为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于一八五二年在其家乡湖南招募、训练的封建军阀武装。因士兵和将领多是湘乡人,所以称湘军。——第 298 页。
- 154 淮军是李鸿章为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在曾国藩的支持下,于一八六一年将其家乡安徽的地主武装按湘军的组织形式加以改编组成的封建军阀武装。因士兵多是淮南一带人,所以称淮军。——第 298 页。
- 155 新军指一八九四年(甲午年)中日战争后清朝政府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军制编练的新式陆军。——第 298 页。
- 156 一九五七年十月,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是当时世界上最新的科学成就。我国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运动中,有人用放“卫星”来比喻各行各业出现的“高产指标”和“最新成就”。但是当时在浮夸风的影响下,不少部

- 门和单位宣布的“高产指标”和“新技术”、“新产品”是不切实际和不符合标准的。——第 298 页。
- 157 黄埔军校指设在广州黄埔的陆军军官学校，它是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创办的。中国共产党曾派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聂荣臻、熊雄等到该校工作。学员中有很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前，这是一所国共合作的学校。——第 298 页。
- 158 三二〇事变即中山舰事件，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为排挤共产党人而制造的反共阴谋事件。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蒋介石指使其亲信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向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当时是共产党员）传达命令，要他调中山舰到黄埔待命。当中山舰抵达黄埔后，他们又造谣说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军校、共产党要赶走蒋介石。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借口共产党阴谋暴动，逮捕了李之龙，扣留了中山舰，并派兵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随后又强迫共产党员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以及黄埔军校中撤出。由于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张国焘等人妥协退让，不敢反击蒋介石，遂使他的阴谋得逞。——第 298、304 页。
- 159 一九四〇年十月，国民党军事当局强令长江南北和黄河以南坚持抗日的新四军、八路军全部开赴黄河以北。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驳斥这一无理要求，一方面从维护抗日大局出发答应将安徽南部的新一军部队调到江北。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的新四军九千余人，取得国民党当局的同意，向江北转移。部队行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遭到七八万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经七昼夜浴血奋战，弹尽粮绝，除小部分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遇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第 298 页。
- 160 陈炯明（一八七八——一九三三），广东海丰人。一九一七年护法军政府成立后，任援闽粤军总司令。一九二〇年，任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一九二二年发动反对孙中山的军事政变。一九二五年二月至三月，为了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国共合作组织的以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的革命军从广州出发东征陈炯明，打败了盘踞在东江的陈炯明部的主力。同年十月至十一月，革命军再次东征，最后消灭了陈炯明的军队。——第 299、304 页。
- 161 梁思成（一九〇一——一九七二），广东新会人，建筑学家。清末维新派著名人物梁启超之子。当时任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主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 299 页。

- 162 康同璧（一八八一——一九六九），广东南海人，清末维新派著名人物康有为之女。当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第299页。
- 163 维新派指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主张向西方学习、实行维新变法的资产阶级政治派别，主要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第299页。
- 164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国史学会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北京联合举行学术讨论会，纪念戊戌变法六十周年。会议由范文澜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北京的史学工作者和吴玉章、李济深、黄炎培、陈叔通、陈垣、潘梓年、章士钊、康同璧、梁思成等六十余人。参加会议的同志在发言中谈到，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是改良主义运动，但在当时代表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具有进步的意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第299页。
- 165 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一九二二年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一九四三年五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定，提议解散共产国际，同年六月共产国际正式宣布解散。——第300页。
- 166 李立三（一八九九——一九六七），湖南醴陵人。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在担负中共中央领导工作期间，于一九三〇年六月至九月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来他接受了党对他所犯错误的批评，认识和改正了错误，在党的第七次、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第301页。
- 167 三次“左”倾错误指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三〇年六月至九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第302页。
- 168 江亢虎（一八八三——一九五四），江西弋阳人。早年游历日本和欧洲。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他标榜社会主义，在上海创办中国社会党。一九一三年，该党被袁世凯政府解散。一九二一年六月他以社会党人身份列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一九二四年，他为了投靠北洋军阀，重新组织中国社会党，次年又改组为中国新社会民主党。一九二七年，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时，他不得不把这个党解散。抗日战争时期，他投身敌伪政府，堕落后为汉

- 奸。——第 303 页。
- 169 黄介民（一八八三——一九五六），江西清江人。早年加入同盟会。一九一九年在上海任中华工业协会总干事，参加过反帝爱国活动。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后，他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辞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候补监委等职务，从事司法和教育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江西省人民政府监察厅副厅长。——第 303 页。
- 170 戴季陶（一八九一——一九四九），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五四运动期间，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周刊，对社会主义和劳工问题作过一些研究。一九二四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歪曲孙中山学说的革命内容，反对共产党，反对工农运动，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进行思想上的准备。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后，继续追随蒋介石，历任国民党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等职。——第 303 页。
- 171 吴佩孚（一八七四——一九三九），山东蓬莱人，北洋军阀直系首领之一。一九一八年反对皖系首领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主张南北议和。五四运动时，曾以“爱国军人”姿态，通电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一九二〇年联合奉系推翻段祺瑞政府，随后曾与苏俄政府建立联系。一九二二年将奉系逐出关外后，支持曹锟控制北京政府。一九二三年残酷镇压京汉铁路工人运动。一九二六年所部在湖北被北伐军击溃。——第 303 页。
- 172 三大指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大会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民主主义的立场，以及使国民党改造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可能性，批评了怀疑国共合作的“左”倾观点和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观点，并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这次大会为国共合作进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作了必要的准备。——第 303 页。
- 173 张国焘（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江西萍乡人。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内曾先后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一年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

- 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他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十二月到达陕北。一九三八年四月背叛革命，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随即被开除党籍。一九七九年死于加拿大。——第304页。
- 174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右派公开进行反革命分裂活动。十一月二十三日，邹鲁、谢持、林森等十余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会议，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通过反共、反苏、反对国共合作等议案。随后，他们在上海另立“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北京等地设立地方党部，从事反共反人民活动。这批人被称为西山会议派。——第304页。
- 175 一九二四年，英帝国主义用大量金钱、军火支持广州大买办陈廉伯所控制的反革命武装组织商团，企图颠覆广东革命政府。八月，广东革命政府扣留了陈廉伯为组织武装叛乱而偷运的军火。陈指使商团向孙中山请愿，并在全省各地煽动罢市。十月十日，广州群众为庆祝辛亥革命举行游行，遭到商团枪击。参加游行的十六个团体成立了“工农兵学革命大同盟”，发表宣言，坚决要求解散商团，严惩凶手。在中国共产党、广大工农群众和国民党左派的影响和支持下，孙中山采取措施，调集黄埔学生军、工农武装及其他军队，在十五日消灭了这一反革命武装。——第304页。
- 176 独立团指一九二五年冬在广东肇庆成立的以共产党人叶挺为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该团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在北伐战争中，英勇善战，战功卓著。——第304页。
- 177 指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一九二七年二月，毛泽东曾将这篇文章送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但是陈独秀等右倾领导者不予发表。三月五日，这篇文章的一部分首先发表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第35、36期合刊上，其余部分在第38、39期上续登。三月十二日，《向导》发表了此文的一部分，当时在党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瞿秋白主张全文刊完，被陈独秀等拒绝。四月，瞿秋白将此文交中共在武汉开办的长江书局以《湖南农民革命》为书名出版单行本，并为此书写了序言。——第304页。
- 178 指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的反革命政变。这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也日趋反动。六月十日，汪精卫同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策划反共；十九日，冯又

- 同蒋介石举行徐州会议，密谋蒋汪合作，共同反共。中国共产党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对国民党的阴谋不加戒备，没有准备应付突然事变。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公开与共产党决裂，随后封闭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大批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至此，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第 304 页。
- 179 鲍罗廷（一八八四——一九五一），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是苏联政府派到广州革命政府的代表和国民党的政治顾问。一九二三年十月到广州，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汉政府叛变后回国。——第 306 页。
- 180 叶挺（一八九六——一九四六），广东惠阳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叶挺的部队指南昌起义前以独立团为基础组成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和由独立团一部分骨干编成的第四军二十五师。叶挺当时任第二十四师师长。——第 306 页。
- 181 南昌起义是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为了反击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反革命势力而在江西南昌发动的武装起义。起义部队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经过激烈战斗，占领了南昌城。这次起义打响了中国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后南下广东。十月初在潮汕一带遇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保存下来的起义部队，一部分到达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移到湘南，发动了湘南起义，一九二八年四月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合。——第 306 页。
- 182 罗米那兹（一八九八——一九三四），苏联人。一九二七年七月下旬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中国。此时，武汉政府已经叛变革命，他参加了中共八七会议的领导工作。——第 306 页。
- 183 八七会议指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时党的最主要的任务。但是，这次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不认识应当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组织恰当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并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因而为后来的“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关于对八七会议的分析，参见周恩来

- 《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71—172 页）。——第 306 页。
- 184 张太雷（一八九八——一九二七），江苏常州人。一九二〇年在北京参加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二五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并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和宣传部长。一九二七年五月在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八月出席党的八七会议，被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十二月领导广州起义时牺牲。——第 306 页。
- 185 指斯大林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在苏联《真理报》上发表的《时事问题简评》、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九日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演说以及九月二十七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演说等。见《斯大林全集》第 9 卷，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298—325 页；《斯大林全集》第 10 卷，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3—84 页、第 132—143 页。——第 306 页。
- 186 谭平山（一八八六——一九五六），广东高明人。一九二〇年组织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三、第四、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历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组织部长、农民部长和武汉国民政府委员等职。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时，是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同年十一月，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当时的“左”倾领导者开除党籍，后参与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抗日战争时期，反对蒋介石的卖国独裁政策。一九四八年参与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第 307 页。
- 187 广州暴动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发动的反击国民党反革命势力的武装起义。十二月十一日，在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下，驻广州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联合广州工人、市郊农民，经过激战，占领了市内绝大部分地区。起义胜利后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十二日，国民党反动军队在帝国主义战舰炮火的掩护下，向广州反扑。张太雷在战斗中壮烈牺牲。起义部队十三日被迫撤出广州。撤出的起义部队，分别与东江、湖南一带的革命武装结合，继续坚持武装斗争。——第 307 页。
- 188 六大指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

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瞿秋白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刘伯承作了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会议通过了政治、军事、组织等问题的决议案，选举了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这次大会肯定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当时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会议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特别指出了当时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次大会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但也有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适当的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第 307 页。

- 189 向忠发（一八七九——一九三一），湖北汉川人。一九二七年七月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一九二八年党的六大后，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被捕叛变，二十四日被国民党枪杀。——第 307 页。
- 190 布哈林（一八八八——一九三八），一九〇六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曾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撤销其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一九三七年被开除党籍，次年被处死。——第 307 页。
- 191 陶里亚蒂（一八九三——一九六四），曾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一九二八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第 307 页。
- 192 米夫（一九〇一——一九三八），苏联人。一九二八年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兼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一九三〇年冬到上海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由于他的支持，王明掌握了党的最高领导权。——第 307 页。
- 193 瞿秋白（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江苏常州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主持召开八七会议。会后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三〇年九月主持召开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的打

- 击,被排斥于党中央领导机关之外。此后,在上海同鲁迅合作从事革命文化运动。一九三四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一九三五年二月从江西往福建转移途中被国民党逮捕,六月十八日在福建长汀就义。——第 307 页。
- 194 王明即陈绍禹(一九〇四——一九七四),安徽金寨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长江局书记。他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抗日战争初期,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长期拒绝党的批评和帮助。六十年代后堕落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第 308、425 页。
- 195 改组派是二十年代末期到三十年代初期国民党内部的一个派系。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汉政府实行反共后,武汉汪精卫的国民党和南京蒋介石的国民党合流。后来,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等不满蒋介石独揽权力,于一九二八年底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形成了国民党中的“改组派”。——第 308 页。
- 196 指一九三〇年共产国际东方部作出的《中国共产党的最近组织任务》、《中国共产党在职工运动中的任务(草案)》、《关于中国农民问题》、《关于中国苏维埃问题》、《关于中国苏区土地农民问题(草案)》、《关于中国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草案)》等六项决议案。——第 308 页。
- 197 何孟雄(一八九八——一九三一),湖南酃县人。中国早期北方职工运动的组织者之一,曾创建京绥铁路工会。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曾任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员会委员、省委农民运动委员会秘书,抵制过李立三和王明的“左”倾错误。一九三一年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牺牲于龙华。——第 309 页。
- 198 指一九三〇年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以后王明写的《两条路线》。这是一本宣扬“左”倾教条主义的小册子,一九三一年二月在上海出版,一九三二年在莫斯科再版,书名改作《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第 309 页。
- 199 陈昌浩(一九〇六——一九六七),湖北汉阳人。当时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第 310 页。
- 200 宁都会议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一九三二年十月在江西宁都召开的会议。这次会议错误地批评了毛泽东等提出的向敌人统治力量较弱、党和群众力量较

- 强的赣东北发展的正确主张，而要求红军去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会后，调毛泽东做政府工作，接着又撤销了他的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第 310 页。
- 201 罗明，一九〇一年生，广东大埔人。一九三三年任中国共产党福建省委代理书记时，认为党在闽西上杭、永定等边缘地区的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当时党内“左”倾错误领导者把这种意见说成是“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并开展了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第 310 页。
- 202 邓指邓小平，一九〇四年生，四川广安人。当时任中共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毛指毛泽覃（一九〇五——一九三五），湖南湘潭人。当时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谢指谢唯俊（一九〇七——一九三五），湖南耒阳人。当时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江西省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乐安中心县委书记等职。古指古柏（一九〇六——一九三五），江西寻乌人。当时任总前委秘书长、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等职。他们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执行正确的防御路线，被党内“左”倾错误领导者指斥为“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受到了错误的打击。——第 310 页。
- 203 李德（一九〇〇——一九七四），又名华夫，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一九三二年，受共产国际派遣来中国。一九三三年十月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实际上掌握红军的最高指挥权。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他同当时党内“左”倾错误领导者在军事指挥上实行了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遵义会议前夕，他被取消了红军的最高指挥权。一九三九年，李德离开中国。——第 310 页。
- 204 博古即秦邦宪（一九〇七——一九四六），江苏无锡人。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曾是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自一九三三年九月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起，掌握了红军的最高领导权，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错误，使红军受到极大损失。遵义会议后，被撤销了红军的最高领导权。抗日战争初期，在党中央的长江局、南方局工作。一九四一年以后，在延安创办和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一九四五年，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四六年四月因飞机失事遇难。——第 310 页。
- 205 季米特洛夫（一八八二——一九四九），保加利亚人。一九二一年任工会国际中央理事会理事，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三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

- 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回国后，任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第 311 页。
- 206 西安事变也称“双十二事变”。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的危急形势下，以张学良将军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将军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拒绝了这个要求，并亲自赶到西安积极部署“剿共”。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杨联合行动，在西安附近的临潼扣押了蒋介石，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准备乘机发动大规模内战，牺牲蒋介石以便取而代之。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经过中共代表周恩来以及博古（秦邦宪）、叶剑英等的艰苦工作，终于同张学良、杨虎城等一道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第 311 页。
- 207 第二次王明路线指抗日战争初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系统地提出了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随后，在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时，又擅自发表一些包含有原则错误的意见、宣言、决议和文章。他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让步，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放手发展人民军队，不敢在日本占领区扩大抗日根据地，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已经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王明的这些错误只在部分地区一度得到推行。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立了全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和政策。——第 311 页。
- 208 见《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543—548 页。——第 312 页。
- 209 毛泽东这篇文章原题为《调查工作》，写于一九三〇年五月，一九六一年三月曾在中国共产党内印发。一九六四年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时，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第 313 页。
- 210 “五风”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第 313 页。
- 211 指毛泽东主席一九六一年五月六日在上海写给李井泉和陈正人的信（见《毛

- 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580—581 页）。信中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在半个月内，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调查研究工作。李井泉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陈正人当时任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农业机械工业部部长，在四川作农村调查。——第 314 页。
- 212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对农村中缺乏劳动力、生活没有依靠的鳏寡孤独的社员，生产队在生活上给以适当的照顾，做到保吃、保穿、保烧（燃料）、保教（儿童和少年）、保葬。享受这“五保”的社员户，称为五保户。——第 315 页。
- 213 陈总即陈毅（一九〇一——一九七二），四川乐至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一九六一年出席扩大的日内瓦会议，任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第 315、329、399 页。
- 214 日内瓦会议这里指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举行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后，美国违反日内瓦协议，对老挝进行干涉和侵略，并在一九六〇年挑起老挝内战。为了和平解决老挝问题，中、苏、美、英、法、老挝、柬埔寨、越南民主共和国、南越（以上为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参加者）、印度、缅甸、加拿大、波兰和泰国举行了这次会议。会议最后签署了《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的议定书》，确认尊重老挝的主权、独立、中立、统一、领土完整和不干涉其内政的原则。——第 315 页。
- 215 许明（一九一九——一九六六），河北沧县人。当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第 315 页。
- 216 嵯峨浩，一九一四年生，原籍日本，溥杰的夫人。——第 316 页。
- 217 溥杰即爱新觉罗·溥杰，一九〇七年生，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胞弟。一九三〇年至一九四四年先后三次留学日本，曾任伪满宫廷侍从武官等职。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被苏军俘虏，一九五〇年八月被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被特赦释放。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第 316、357 页。
- 218 溥仪即爱新觉罗·溥仪（一九〇六——一九六七），清朝末代皇帝。一九一

- 二年中华民国建立后被迫退位。一九三二年任日本帝国主义一手策划的伪满洲国“执政”，一九三四年改称“满洲帝国皇帝”。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被苏军俘虏，一九五〇年八月被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被特赦释放。一九六四年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第316、345页。
- 219 嵯峨尚子，日本人，嵯峨浩的母亲。——第316页。
- 220 宫下明治，日本人。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前，曾是清东陵守备队的守备人员。嵯峨尚子访华时，他是随行人员。——第316页。
- 221 生是溥杰和嵯峨浩的女儿，已入日本籍。——第316页。
- 222 载涛（一八八七——一九七〇），清末曾任军谕大臣。一九六一年时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第317、357页。
- 223 西园寺即西园寺公一，一九〇六年生，日本政界元老西园寺公望公爵之孙。曾任日本参议员、《日曜新闻》编辑、维也纳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书记。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七〇年任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副秘书长，常驻中国。——第317页。
- 224 千子即町田千子，嵯峨浩的妹妹。——第317页。
- 225 贝勒是清代皇室的封爵称号。清代的爵位分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国公、将军六级。——第317页。
- 226 “满洲国”是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扶植的傀儡政权。一九三二年三月在长春成立，一九三四年三月改称“满洲帝国”。一九四五年随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而被摧毁。——第317页。
- 227 齐白石（一八六四——一九五七），湖南湘潭人，画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北京中国画院名誉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第318页。
- 228 陈半丁（一八七六——一九七〇），浙江绍兴人，画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北京中国画院副院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第318页。
- 229 于非（一八八九——一九五九），北京人，画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画研究会副会长、北京中国画院副院长。——第318页。
- 230 贺龙（一八九六——一九六九），湖南桑植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 国务院副总理兼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第 318 页。
- 231 查理一世（一六〇〇——一六四九），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国王。一六四〇年爆发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一六四二年起他发动内战，两度战败。一六四九年被国会判处死刑。——第 318 页。
- 232 路易十六（一七五四——一七九三），法国国王。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他表面上接受立宪政体，暗地勾结外敌，纠集王党，企图镇压革命。一七九二年被废黜，次年一月被处死。——第 318 页。
- 233 威廉二世（一八五九——一九四一），德意志帝国皇帝、普鲁士国王。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国革命爆发后逃亡荷兰。——第 319 页。
- 234 埃及的王室指埃及法鲁克王朝。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埃及爆发了由自由军官组织发动的革命。二十六日国王法鲁克被废黜，当天他逃往国外。——第 319 页。
- 235 指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一书。这本书溥杰曾帮助整理过。——第 319 页。
- 236 这里指一八九四年所发生的中日战争，也称甲午战争。见本书注 34。——第 321 页。
- 237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境内的关东军进攻沈阳。这次事件被称为九一八事变。随后，日军向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面进犯。驻守沈阳和东北其他地方的中国军队，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的命令，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了这三个省。——第 321 页。
- 238 大谷莹润（一八九〇——一九七三），曾任日本众议院议员、参议院议员、法务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三年起任中国人在日殉难者慰灵实行委员会委员长，一九六一年五月率领日本“中国殉难烈士名单捧持代表团”访问中国。——第 321 页。
- 239 土肥原即土肥原贤二（一八八三——一九四八），日本战犯。早年被派到中国进行特务活动。曾任日本在沈阳的特务机关长，参与策动日本侵占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和策划建立伪满洲国的阴谋活动。其后任日本航空总监、驻新加坡的第七方面军司令官和日本军事训练总监。日本投降后被捕，一九四八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第 321 页。
- 240 冈村宁次（一八八四——一九六六），一九三二年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

- 长，参加侵犯上海的战争。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历任日军侵华第十一军、华北方面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延安公布的日本战犯名单中，被列为首要战犯。解放战争期间曾充当蒋介石的秘密军事顾问。一九四九年一月被国民党政府宣判“无罪”，释放回国。——第 321 页。
- 241 东条英机（一八八四——一九四八），日本战犯。九一八事变后历任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官、关东军参谋长。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一年任日本陆军大臣，积极主张扩大侵华战争和准备对美英的战争。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担任内阁首相期间，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使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范围从中国扩大到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日本投降后被捕，一九四八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第 321 页。
- 242 板垣征四郎（一八八五——一九四八），日本战犯。曾参与策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历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陆军大臣、中国派遣军参谋长、驻朝鲜日军司令官、驻新加坡的日本第七方面军司令官。日本投降后被捕，一九四八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第 321 页。
- 243 华族指除皇族外有爵位的日本贵族。——第 322 页。
- 244 远藤三郎，一八九三年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陆军航空本部总务部长。自五十年代起，曾多次访华。——第 322 页。
- 245 政信，一九〇二年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在我国东北、马来亚、菲律宾、缅甸、泰国指挥日本侵略军作战。战后曾当选为众议员和参议员。一九五七年曾来华访问。一九六一年四月由泰国至老挝考察途中失踪。——第 322 页。
- 246 高 达之助（一八八五——一九六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伪满洲国政府经济顾问、满洲重工业开发公司总裁。战后多次当选为众议员和参议员，并先后任国务大臣和通商产业大臣。他积极推进中日两国民间贸易，曾任日中综合贸易联合协议会会长，一九六二年同我国廖承志签订发展日中两国民间贸易的备忘录。——第 322 页。
- 247 久原房之助（一八六九——一九六五），曾任日本邮政大臣，政友会总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日中邦交调整国民会议代表积极参加恢复中日邦交活动。一九五五年任日本“恢复日中、日苏邦交国民会议”会长，并率代表团访问我国。——第 322 页。

- 248 指一九五九年五月三日周恩来邀请文艺界中的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以及北京的一部分文艺界人士,在中南海紫光阁座谈时所作的《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的讲话。见周恩来《关于文艺工作的三次讲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页。——第324页。
- 249 指一九五七年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六月,党中央发出指示,决定对右派进攻实行反击。当时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在斗争中犯了严重的扩大化的错误。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复查,把错划的改正过来。——第327、361页。
- 250 “五子登科”原指五代后周人窦禹钧五个儿子相继都考中进士(参见《宋史·窦仪传》)。这里借用这个词来说明当时在文艺工作中存在的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等错误做法。——第328页。
- 251 李维汉(一八九六—一九八四),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他在一九六一年第十一期《红旗》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争取胜利的一个法宝》的文章。——第335页。
- 252 参见本书注297。——第335页。
- 253 周扬,一九〇八年生,湖南益阳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第336页。
- 254 “的笃班”是越剧形成初期的表演形式。它是清末在浙江嵊县一带的山歌小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演唱时用一个竹节笃鼓、一副檀板伴奏,几个人帮腔伴唱。因角色从“的、笃”声中出场,所以有这个称呼。——第338页。
- 255 绍兴大班是绍剧的旧称,又称“绍兴乱弹”。明末清初形成于浙江绍兴,后流行于浙江、上海一带。——第338页。
- 256 陈云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一年六月对评弹和其他曲艺发表过多次谈话(现已收入《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一书中),指出当时的曲艺创作和演出存在着强调了政治一面,忽略了文化娱乐一面的偏向。他还指出广大群众在劳动之后喜欢听一些轻松愉快的东西,思想教育的目的要通过艺术手段来达到。——第338页。

- 257 梅兰芳（一八九四——一九六一），原籍江苏泰州，生于北京，京剧表演艺术家，京剧“梅派”艺术的创立者。当时任中国京剧院院长、中国戏曲学院院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一九五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341页。
- 258 聂荣臻，一八九九年生，四川江津人。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第342页。
- 259 太平天国时代指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六四年洪秀全、杨秀清等人领导的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农民革命战争的时代。——第344页。
- 260 章行老即章士钊（一八八一——一九七三），字行严，湖南长沙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第345页。
- 261 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太祖开宝八年》。——第345页。
- 262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八六三——一九三八），苏联演员、导演和戏剧理论家。著有《我的艺术生活》和《演员自我修养》等。他的戏剧理论概称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第348页。
- 263 魏征（五八〇——六四三），唐初政治家。唐太宗在位时，任谏议大夫和秘书监等职。他敢于直言进谏，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第349页。
- 264 在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大跃进”过程中，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曾把一些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的人，以及一些所谓具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人都作为“右倾保守思想”的反面人物，作为“资产阶级白旗”加以批判、斗争甚至处分。当时把这种作法叫做“拔白旗”。一九六二年四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为在“拔白旗”、“反右倾”等运动中被错误地批判和处分的人进行甄别平反。——第350、400页。
- 265 郭老即郭沫若（一八九二——一九七八），四川乐山人。当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等职。——第355、473页。
- 266 范文澜（一八九三——一九六九），浙江绍兴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第355页。

- 267 我国封建社会传统教育以“天地君亲师”五者为人类至尊，所以并举表示崇敬的意思。——第 356 页。
- 268 无政府主义是十九世纪中叶出现于欧洲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蒲鲁东、俄国的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等。它否认任何国家和政权，否认任何权力和权威，鼓吹绝对自由、极端民主，主张建立一个“无命令、无权力、无服从、无制裁”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中国青年中曾有过较大的影响。一些地方先后出现了无政府主义的小团体。最初它们也表现过某些反帝反封建的意愿，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些曾经具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青年转而信奉科学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团体则愈来愈趋于反动。——第 356 页。
- 269 觉悟社是一九一九年九月周恩来等在天津组织的进步青年学生团体。成员有邓颖超、郭隆真、马骏、刘清扬等二十余人。主要活动是出版《觉悟》杂志，讨论研究新思潮，抨击孔孟之道，积极领导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一九二〇年冬，觉悟社社员分散各地，社的活动无形停顿。以后，它的主要成员大部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 356 页。
- 270 邓颖超，一九〇四年生，河南光山人。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在天津和周恩来等一起组织觉悟社。下面引用邓颖超的一段话，是一九四九年她回答《中国青年》杂志记者提问时说的。参见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国青年》第七期上的邓颖超《五四运动的回忆》一文。——第 356 页。
- 271 基尔特社会主义也称行会社会主义（基尔特是英文“行会”一词的音译），是二十世纪初英国工人运动中出现的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主要代表人物是潘蒂、柯尔等。他们主张一个社会应设立两个平行的组织：一个是由工人、工程师等按行业联合组成的产业基尔特，领导和管理生产，一个是作为消费者的组织的国家，负责产品分配和保证全民消费。他们幻想等到基尔特发展到包括全体人民时，就可以和平地代替资本主义国家，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第 357 页。
- 272 费边社会主义是以英国费边社的主张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费边社是英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八八四年创立的团体，以善于等待时机、实行拖延缓进战术著称的古罗马统帅费边命名。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维伯夫妇、肖伯纳等。他们以为用温和缓进的办法，通过细小的改良就能使资本主义制度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第 357 页。

- 273 刘清扬（一八九四——一九七七），天津人。一九二一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脱离共产党。一九三一年后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一九四四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一九四八年进入华北解放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一九六一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第 357 页。
- 274 张申府，一八九三年生，河北献县人。一九二〇年去法国、德国留学。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任广东大学教授兼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一九二五年脱离共产党。一九四二年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九四四年改称中国民主同盟），任常务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图书馆研究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第 357 页。
- 275 罗素（一八七二——一九七〇），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逻辑学家。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曾来中国讲学，在旧中国学术界有相当影响。——第 357 页。
- 276 弗洛伊德（一八五六——一九三九），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第 357 页。
- 277 爱因斯坦（一八七九——一九五五），犹太人，出生于德国乌尔姆城，是著名的物理学家。他创建的相对论是现代物理学的理论基础之一。——第 357 页。
- 278 沈衡老即沈钧儒（一八七五——一九六三），号衡山，浙江嘉兴人。清末曾考中进士。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后在上海任律师。抗战前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抗战期间，倡议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任中国人民救国会主席，积极参加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第 357 页。
- 279 董老即董必武（一八八六——一九七五），湖北黄安（今红安）人。清末曾考中秀才。他早年是同盟会会员，参加了辛亥革命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之后，积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出席

-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六二年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第 357 页。
- 280 李根源（一八七九——一九六五），云南腾越（今腾冲）人。一九〇五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云南省军政府军政部总长兼参议院议长，在一九一八年护法战争中被推为驻粤滇军总司令。一九二三年在北洋政府农商总长任内兼署过国务总理。——第 358 页。
- 281 胡适（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安徽绩溪人。早年留学美国。一九一七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宣扬实用主义哲学。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主张文学改革，提倡白话文。一九一九年七月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随后追随蒋介石，反对人民革命运动。一九三八年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一九四六年任北京大学校长。一九四九年去美国，后到台湾。——第 358 页。
- 282 见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列宁全集》第 29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343—344 页）。——第 358 页。
- 283 定股是指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时，对原来私营企业的资产和负债，根据公平合理、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清理、估价，以核定私股股额。——第 360 页。
- 284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和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中以及后来的一些场合讲到知识分子问题时，曾引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参见《左传·僖公十四年》）和“梁上君子”（参见《后汉书·陈寔传》）作比喻，说明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所依附的经济基础那张旧“皮”已经不存在了，因此他们不能不依附在公有制这张新“皮”上，即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不能象“梁上君子”（原意指躲藏在梁上的小偷，这里是借用）那样，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第 363 页。
- 285 科学工作十四条即一九六一年六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提出、同年七月中共中央批准试行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中央批准这个草案的批语中指出：“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很关紧要。”“近几年来，有不少的同志，在对待知识、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有一些片面的认识，简单粗暴的现象也有所滋长，必须引起严重的注意，以端正方向，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草案就正确理解对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与专的要求，正确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理

- 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明确科学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出成果，出人才），保持科学研究工作的相对稳定，保证科学研究工作的时间，改进研究机构中党的领导方法等问题，作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规定。中央认为这个文件的精神对于一切有知识分子工作的部门和单位都是适用的。——第 364、375 页。
- 286 高等教育六十条指一九六一年九月中共中央原则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全文共六十条。条例草案总结了一九五八年后三年多高等教育工作的经验和教训，针对当时学校教学质量降低，忽视知识分子作用以及劳动过多等主要问题，规定了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做好总务工作，保证教学和生活的物质条件；以及改进党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第 364、375 页。
- 287 工矿企业七十条即一九六一年九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全文共有七十条。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后，由于许多企业没有实行严格的责任制，不讲究经济核算，工资、奖励制度上存在平均主义，以及党委包揽企业的日常行政事务等等，相当普遍地出现了生产秩序混乱，瞎指挥、乱操作，设备损坏严重，经济效果很差等问题。针对这些情况，工业七十条草案明确规定了国营工业企业的性质和基本任务，要求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强调计划管理、按劳分配、企业经济效果和职工物质利益等项原则。这个条例草案的讨论和试行，对于总结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的经验，贯彻执行当时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促进我国工业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第 364 页。
- 288 文艺方面也提出了几个初稿，指《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八条”）的初稿及《关于剧院（团）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剧院（团）十条”）、《关于加强电影艺术片创作和生产领导的意见（草案）》（简称“电影三十二条”）。从五十年代后期起，在政治、经济领域“左”倾错误的影响下，文艺工作也产生了不少缺点和错误，一些文艺领导部门、文艺工作单位和领导文艺工作的党员干部，没有正确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没有很好地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一些文学创作和艺术活动进行了简单粗暴的批评、限制和不适当的干涉。为纠正这些偏向，在党中央以及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和全国文联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由中宣部起草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

见《草案》(简称“文艺十条”),文化部起草了“剧院(团)十条”和“电影三十二条”。“文艺十条”经过充分讨论修改,最后改定为“文艺八条”,于一九六二年四月三十日由中共中央批转,以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名义正式下达全国。文艺八条的主要内容是: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努力提高创作质量;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保证创作时间,注意劳逸结合;培养优秀人才,奖励优秀作品;加强团结,继续改造;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剧院(团)十条”和“电影三十二条”没有形成正式文件,只作为草案,分别于一九六一年八月八日和十一月十三日印发各省、市、自治区文化局及有关艺术单位征求意见并先予试行。这三个文艺文件的贯彻,对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健康发展起了积极作用。——第 364 页。

289 参见本书注 297。——第 370 页。

290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六十条指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全文共六十条。条例草案针对人民公社内部严重存在的队与队、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在纠正社、队规模偏大,公社对下级管得太多太死,民主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等方面,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同年五六月间,中共中央又对这个草案作了修改,制定了供讨论和试行用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进一步规定取消分配上的供给制部分,停办公共食堂。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人民公社六十条的贯彻执行,对恢复农村经济起了重要的作用。——第 373、434 页。

291 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参见本书注 287。手工业工作条例草案指一九六一年六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全文共三十五条。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后,由于手工业盲目过渡到国营工业和公社工业,并改变生产方向,造成大批手工业者改行转业,许多日用小商品减产、停产,供应十分紧张。针对这种情况,草案规定我国手工业应有全民、集体和个体三种所有制,以集体所有制为主;手工业者必须归队;生产经营方式要灵活多样;工资制度应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原则,以及供产销要统筹安排等。——第 373 页。

292 为了加强对物资的管理,做好物资供需的平衡,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和市场稳定,国家按各种物资对国计民生的重要程度,分三类管理,即由国家

统一分配的物资、中央各主管部门分配的物资和地方管理的物资。根据商品对国计民生的重要程度，国家把商品也分一、二、三类管理。地方管理的物资和第三类商品称三类物资。这类物资品种繁多，生产分散，使用面广，主要是通过市场调节产、供、销之间的关系。——第 382 页。

- 293 “六条标准”是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原文是：“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第 389 页。
- 294 胡先（一八九四——一九六八），江西新建人，植物学家。当时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应邀列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 390 页。
- 295 张际春（一九〇〇——一九六八），湖南宜章人。当时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第 400 页。
- 296 这里指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党委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所以又称七千人大会。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报告，初步总结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分析了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指出全党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做好调整工作。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着重指出要健全民主集中制，在党内、党外充分发扬民主；要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对前几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第 403 页。
- 297 三面红旗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

- 遍愿望，但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总路线提出后，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轻率地在全国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打乱了正常的经济建设秩序，浪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资源，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这是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的主要原因。当时由于党还没有从根本的指导思想上总结经验教训，所以党的文件中都还使用“高举三面红旗”的提法。——第 403 页。
- 298 指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在北京中南海西楼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讨论了财政、金融、市场以及整个经济形势的问题，认为当时财政经济的困难很严重，估计当年的国家预算有很大的赤字。陈云在会上作了关于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会议一致同意陈云讲话的精神，认为在国民经济的调整阶段主要是恢复经济，要全党集中力量增加农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这次会议对扭转当时财政经济状况的被动局面起了重要作用。——第 405 页。
- 299 姚依林，一九一七年生，安徽贵池人。当时任商业部部长、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第 406 页。
- 300 雷锋（一九四〇——一九六二），湖南长沙县简家塘（今属望城）人。一九六〇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六一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工程兵某部运输连班长。一九六二年因公殉职。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卓越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九六三年三月五日，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随后在全国广泛开展了学习雷锋的群众运动。——第 417 页。
- 301 指一九六三年三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第 422 页。
- 302 指毛泽东一九六三年五月在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中写的一段话。一九六五年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时，题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第 423 页。
- 303 马歇尔（一八八〇——一九五九），美国民主党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美国陆军参谋长。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被美国总统杜鲁门派任驻华特使，一

- 一九四六年一月同国民党代表张群（后为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组成军事三人小组，他以“调处”为名，参与国共谈判，力图维护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地位。一九四六年八月宣布“调处”失败，不久返回美国。——第424页。
- 304 廖鲁言（一九一三——一九七二），江苏南京人。一九六三年时是农业部部长。——第424页。
- 305 高岗（一九〇五——一九五四），陕西横山人。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九五三年调中央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后，积极进行反党分裂活动。一九五四年被揭露。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他的党籍。——第425页。
- 306 指当时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及国务院七十三个直属机关的主要领导干部。——第426页。
- 307 一九六〇年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大坝建成蓄水后，发现泥沙淤积严重，威胁上游一些地方及水库本身的安全。为了增加枢纽工程的泄流排沙能力，减轻水库淤积，有关部门提议：在大坝左岸打两条泄流排沙隧洞，把八条发电引水钢管中的四条改成泄流排沙道。这就是后来被批准实施的二洞四管方案。——第436页。
- 308 从“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起的这一段话是毛泽东在修改周恩来这个报告的草稿时增写的。——第441页。
- 309 林大夫即林巧稚（一九〇一——一九八三），福建厦门人，妇产科专家。当时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443页。
- 310 傅连（一八九四——一九六八），福建长汀人。当时任卫生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443页。
- 311 蒲辅周（一八八八——一九七五），四川梓潼人。当时任中医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445页。
- 312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谈到林业问题时提出：“林业的经营一定要越伐越多，越多越伐，青山常在，永续作业。”后来，他这一思想发展为以营林为基础，采育结合，实现青山常在，永续利用，越采越多，越采越好的林业建设的指导思想。——第446页。

- 313 四旁指村旁、宅旁、路旁、水旁。——第 446 页。
- 314 从六十年代初起，周恩来针对林业生产中重采伐、轻育林的错误作法多次指出，长此下去，林业生产在几十年后就要出现生产中断的危险，我们将会犯“吃祖宗饭、造子孙孽”的历史错误。——第 446 页。
- 315 梁老指梁希（一八八三——一九五八），浙江吴兴（今湖州）人，林学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林业部部长。——第 446 页。
- 316 前方指林区和林业生产第一线，后方指林业的领导机关。——第 447 页。
- 317 北方八省是指长江以北的河南、山东、河北、山西、陕西以及湖北、安徽、江苏等省。——第 447 页。
- 318 宋庆龄（一八九三——一九八一），广东文昌人。当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郭沫若（一八九二——一九七八），四川乐山人。当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章士钊（一八一——一九七三），湖南长沙人。当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程潜（一八八二——一九六八），湖南醴陵人。当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何香凝（一八七八——一九七二），广东南海人。当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傅作义（一八九五——一九七四），山西临猗人。当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水利电力部部长。张治中（一八九〇——一九六九），安徽巢县人。当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邵力子（一八八二——一九六七），浙江绍兴人。当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蒋光鼐（一八八七——一九六七），广东东莞人。当时任纺织工业部部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蔡廷锴（一八九二——一九六八），广东罗定人。当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沙千里（一九〇一——一九八二），上海人。当时任粮食部部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张奚若（一八八九——一九七三），陕西朝邑（今大荔）人。当时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

-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 450 页。
- 319 这里所说的副委员长,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副主席,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政副,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副,指国务院副总理;两高,指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第 451 页。
- 320 李宗仁(一八九一——一九六九),广西临桂人,原为国民党桂系首领。一九四八年四月任国民党政府副总统,一九四九年一月任代总统。国民党政权崩溃后去美国。一九六五年七月回到北京。——第 451 页。
- 321 指宋庆龄和她的弟弟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及姐姐宋蔼龄、妹妹宋美龄。——第 451 页。
- 322 李葆华,一九〇九年生,河北乐亭人。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第 452 页。
- 323 李任之(一九一九——一九八三),广东东莞人。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安徽省副省长。——第 452 页。
- 324 陶铸(一九〇八——一九六九),湖南祁阳人。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后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一九六七年一月起被监禁。——第 452、454 页。
- 325 刘澜涛,一九一〇年生,陕西米脂人。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一九三一年,刘澜涛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判刑后监禁在北平军人反省院。一九三六年,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北方局为了开展工作,解决缺乏干部的问题,报请党中央批准,决定被捕同志履行手续后出反省院。这样出反省院的共有刘澜涛等六十一人。对此,中央早已有过结论,没有当作问题。“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江青伙同林彪等人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到处支持一些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揪斗这批老党员。一九六七年三月中共中央发出文件,错误地将这六十一人定为“叛徒集团”。粉碎“四人帮”后,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为这一大错案进行了平反。——第 452 页。
- 326 九大即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第 453、464 页。

- 327 王恩茂，一九一三年生，江西永新人。当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新疆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第 453 页。
- 328 徐海东（一九〇〇——一九七〇），湖北大悟人。曾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红十五军团军团长。一九六九年时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第 453 页。
- 329 邓初民（一八八九——一九八一），湖北石首人。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 454 页。
- 330 华罗庚，一九一〇年生，江苏金坛人，数学家。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 455 页。
- 331 西尧即刘西尧，一九一六年生，湖南长沙人。一九七〇年时是周恩来总理派往中国科学院的联络员，一九七二年时是国务院科教组组长。——第 455、473 页。
- 332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以贯彻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中关于党政机关干部也要学农、学工的指示为名，把干部集中下放劳动的场所称为“五七”干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它对一大批干部进行劳动惩罚和迫害。粉碎“四人帮”后，各地“五七”干校陆续停办。——第 455、472 页。
- 333 张霖之（一九〇八——一九六七），河北南宫人。一九五七年起，任煤炭工业部部长。“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第 455 页。
- 334 指当时根据中共中央通知派往北京矿业学院领导该校工作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第 455 页。
- 335 戚本禹，一九三一年生，山东威海人。“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积极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犯罪活动。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三日被关押。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因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第 455 页。
- 336 刘建章，一九一〇年生，河北景县人。一九五四年起任铁道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被关押。——第 456 页。

- 337 先念即李先念，一九〇九年生，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第 456、460 页。
- 338 登奎即纪登奎，一九二三年生，山西武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 456 页。
- 339 肖华，一九一六年生，江西兴国人。一九六四年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因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一九六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七四年国庆节前夕被关押。——第 457、460 页。
- 340 李力群，一九二一年生，江苏宿迁人。当时是国务院科教组工作人员。——第 457 页。
- 341 侯宝林，一九一七年生，北京人，相声表演艺术家。“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被批判、斗争。——第 457 页。
- 342 商震（一八八七——一九七八），浙江绍兴人，国民党元老。抗战胜利后，由于不满蒋介石的卖国内战政策和反动统治，一九四九年辞去了国民党政府驻日本代表团团长的职务，留居日本。一九七四年九月正在国内参观访问。——第 457 页。
- 343 刘志坚，一九一二年生，湖南平江人。一九五七年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一九六七年一月至一九七四年国庆节前夕被关押。——第 457 页。
- 344 齐燕铭（一九〇七——一九七八），北京人。一九六〇年起任文化部副部长、文化部党组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一九六六年夏至一九七四年国庆节前夕被隔离审查。——第 457 页。
- 345 卫立煌（一八九六——一九六〇），安徽合肥人，原国民党将领。一九四八年任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司令，因在辽沈战役中没有积极执行蒋介石的“反攻”命令，被软禁于南京。一九四九年获释后去香港。一九五五年三月回北京，后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第 457 页。
- 346 张学铭（一九〇六——一九八三），辽宁海城人，张学良的胞弟。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三年被关押。——第 457 页。
- 347 张学良，一九〇一年生，辽宁海城人，东北军爱国将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 任国民党军西北“剿总”副司令时和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一起发动西安事变，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后被蒋介石长期扣押。——第 457 页。
- 348 张学思（一九一六——一九七〇），辽宁海城人，张学良的胞弟。曾任辽宁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参谋长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一九六七年起被关押。——第 457 页。
- 349 吕案解案即吕正操专案和解方专案。这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党夺权，残酷迫害曾在东北军和东北各界工作过的吕正操、解方、刘澜波、张学思、万毅、阎宝航、高崇民、贾陶等人而蓄谋制造的一个所谓“东北叛党集团”的假案。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和民主人士曾受到株连。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个案件得到彻底平反。——第 457 页。
- 350 廖志高，一九一三年生，四川冕宁人。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第 459 页。
- 351 富春即李富春（一九〇〇——一九七五），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第 460 页。
- 352 剑英即叶剑英，一九一七年生，广东梅县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第 460 页。
- 353 成武即杨成武，一九一四年生，福建长汀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副总参谋长、代总参谋长。——第 460 页。
- 354 谷牧，一九一四年生，山东荣成人。当时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第 460 页。
- 355 秋里即余秋里，一九一四年生，江西吉安人。一九六七年时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一九七二年时是中共中央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第 460、463 页。
- 356 支左指在“文化大革命”中派人民解放军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群众的人们，是“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一个方面。这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第 460 页。
- 357 《六六通令》指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

- 央文革小组通令》。——第 461 页。
- 358 长汽、二汽、重汽、南汽 指第一汽车制造厂（在吉林长春）、第二汽车制造厂（在湖北十堰）、重庆汽车分公司和南京汽车制造厂。——第 463 页。
- 359 指“九一三事件”。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林彪乘飞机外逃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第 463 页。
- 360 地方五小工业是我国地方小型厂矿的统称。六十年代一般是指小钢铁厂、小煤矿、小电站、小化肥厂、小机械厂，后来又包括小水泥厂等。——第 464 页。
- 361 四个一样是对当时在分配方面的平均主义做法的概括说法，即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会干不会干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第 465 页。
- 362 王云五（一八八八——一九七九），原籍广东中山，生于上海。他首先将四角号码检字法运用于字典。一九四六年后曾任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部长、财政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等职。一九四九年去香港，一九五一年到台湾。——第 467 页。
- 363 普列汉诺夫（一八五六——一九一八），前期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一八八三年创建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翻译和介绍了许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并先后发表《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论著，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重大作用。一九〇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逐渐转向孟什维克，后成为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首领之一。——第 471 页。
- 364 剑、春、德指叶剑英、张春桥、李德生。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办公会议。张春桥、李德生当时是军委办公会议的成员。——第 472 页。
- 365 文裕即张文裕，一九一〇年生，福建惠安人。当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四〇一所副所长。——第 473 页。
- 366 指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八日第二机械工业部四〇一所一部张文裕等十八位科学工作者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信。这封信反映了我国高能物理研究的情况，提出了发展高能物理研究的建议。——第 473 页。
- 367 指物理学家萨拉姆教授，当时是巴基斯坦总统科学顾问。一九七二年九月五

-
- 日,周恩来在和他谈话中,强调了自然科学理论研究工作的重要性。——第 473 页。
- 368 指一九七二年四月四日第二机械工业部四〇一所一部提出的关于发展高能物理方向任务的请示报告。——第 473 页。
- 369 朱光亚,一九二四年生,湖北武汉人。当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第 473 页。
- 370 中国方面提出的中日复交三原则是: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第 478 页。